

故宫博物院  
学术文库

金文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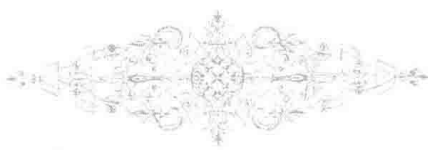
刘雨 著

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学术文库

# 金文论集



刘 雨 著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文论集 / 刘雨著.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8. 5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80047 - 601 - 3

I. 金… II. 刘… III. 金文 - 文集 IV. K877.3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661 号

金文论集

刘 雨 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430 千字 印张 33 图版 187 幅

2008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047 - 601 - 3

定价: 90.00 元



劉雨，字忠誠，1938年生於吉林省集安市，1950年到北京，1958年畢業於北京101中學，當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至1963年畢業，同年考入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師從容庚、商承祚兩位先生讀研究生。197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從事研究工作，1997年奉調故宮博物院，任古器物部主任，2001年退休。

劉雨的學術活動始終圍繞我國殷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為主要研究內容展開，他特別注重資料的科學整理，先後參與編著《殷周金文集成》、《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乾隆四鑒綜理表》、《故宮青銅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商周金文總著錄表》、《流散歐美殷周青銅器》等，學術著述以嚴謹著稱。

以青銅器銘文內容為基本史料，探討先秦史學的若干問題，是他學術活動的另一特色。他對西周官制、禮制、年代學以及監察制度、王稱等，有重要的獨立研究。他還對金文族徽問題以及一系列青銅器銘文的內容、時代、國別等，作出過新的考證。如他對多友鼎、呂簋編鐘、伯唐父鼎、南陽仲再父簋、燕侯克壺、幽公盨、師盨鐘和姬寗母豆等，都寫出過專題論文，見解頗有新意。

劉雨曾應邀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河南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訪問、講學，也曾應邀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達穆思大學、里海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澳洲悉尼大學等訪問、演講及合作研究。

劉雨於1992年被聘為研究員，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社會科學有突出貢獻專家”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現被故宮博物院返聘為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故宮博物院院刊》編委。

## 自序

1958年我帶着文學的夢想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想不到在四年級時卻被分配到“語言專業”。在以後的大學課業裡，唐蘭先生的“文字學”和周祖謨先生的“《說文》講讀”等課程引起了我對古文字學的很大興趣，因而五年級時我寫了《段注說文研究》的畢業論文，當時輔導我畢業論文寫作的是時任助教的裘錫圭老師。1963年考上中山大學容庚、商承祚兩先生招收的古文字學研究生，攻讀我國初創的“副博士學位”。在我求學階段，能得到這麼多位著名學者的指導，是十分幸運的，它為我以後的學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研究生畢業前夕（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我先後在工廠、機關、中學流浪了十餘年，直至1978年纔歸隊，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重新開始專業研究工作，這一幹就是整整二十年。

1997年底故宮博物院醞釀機構改革，我奉調故宮籌建“古器物部”，主持重新佈展“青銅器館”，2001年在故宮退休，這就是我簡單的個人經歷。

我剛到考古所時，很快就接到給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竹簡作釋文的任務，我想這是夏鼐所長對我業務能力的一次考核。當時戰國簡可參照比附的資料很少，釋文做的並不好，不過還是被附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信陽楚墓》書後，以《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為題出版。

在考古所的二十年裏，其實我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編寫《殷周金文集成》，個人的研究工作，都是圍繞《集成》展開的。比如，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和張亞初受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徐自強先生的委託，整理北圖收藏的金文拓本，編輯了《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我還與張亞初合寫了《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為整理《集成》所需的清代金文資料，我編寫了《乾隆四鑒綜理表》。與此同時，《殷周金文集成》共計十八冊，於1984年至1994年也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其中我承擔了鐘（第一

冊)、簠(第六、七、八冊)、盨簠敦豆(第九冊)、爵角(第十三、十四冊)共七冊主纂人的工作。在考古所的歲月裡,正值人生中年,精力旺盛,像《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這樣的書,是我和亞初僅用十五天的假期,把行李搬到辦公室,吃住都在一起,日夜兼程趕寫出來的。我寫《乾隆四鑒綜理表》時,父親病重,書是在父親住院的病榻前寫成的。

《殷周金文集成》一書原定分拓本、釋文、圖像三部分,在編輯完《殷周金文集成》的拓本部分之後,我與陳公柔、張亞初三人分工撰寫釋文,三人分頭撰寫的稿子最後由我統一,寫成定稿,交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以《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的書名於2001年出版。

編輯《殷周金文集成》拓本部分的同時,我就開始收集《集成》各冊編成之後陸續出現的新資料,準備編輯《集成》的續編。恰在這時,北大的古文字碩士盧岩即將畢業,她到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來聯繫畢業後的工作,我向她介紹了我的計劃,她很快就參加到工作中來,我們一起完成了《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的編寫工作。作為一個副產品,我們還同時編輯了《商周金文著錄總表》,也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我到故宮博物院以後,在重新佈展青銅器館之前,配合新館建設,和丁孟等一道,把故宮藏殷周青銅器中較重要的三百多件,編成《故宮青銅器》一書。

收在本論集中我的幾十篇文章,或以金文為基本資料闡述若干學術問題,或考釋單篇銘文,大都與金文有關,故名其為《金文論集》。其中有兩類論文,我做了專題集結:其一是禮制。先秦古禮又統稱為“周禮”,是於西周時代形成的系統禮儀制度,對後世影響很大,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也是理解中華民族性格的關鍵所在。過去的研究主要依賴傳世的《儀禮》、《禮記》、《周禮》等幾部禮書,而它們的成書大都晚在戰國至漢代之間。我想結合上述文獻資料,用西周金文所記錄的內容來考察“周禮”,可能來得更直接些,這幾篇論文就是我在這方面的嘗試,其中發表在《燕京學報》新3期上的《西周金文中的“周禮”》是這部分論文的總結之作。其二是曆法及年代學,年代是歷史的脊梁,而古代曆法的研究又是年代學的重要方面。可以說,可靠的文獻記載(如古本《竹書紀年》)和金文中所記錄的古曆內容,將是我們復原先秦年代原狀的最重要的資料。這幾篇論文記錄了我有關年代學問題的思考,其中在香港第三屆古文字會上發表的《金文饗祭的斷代意義》是我對這一問題認識的總結。我在參加“夏商周斷代工程”“金文曆法小組”工作的幾年時間裡,無保留的為同事們貢獻了自己積累的全部金文資料,但我對“斷代工程”所作出的結論是有不同看法的。2001年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訪港,無意中會見了正在中文大學演講的美國加州大學著名學者何炳棣教授,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出於對祖國歷史的責任感,他也在關注國

內正在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想不到我們的觀點竟完全一致，當下就決定要合寫一篇討論文章，這就是後來發表在《燕京學報》新16期上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文集中其他論文也大體是按內容類別排列的，具體銘文的考釋有：江蘇無錫前洲出土的楚鄖陵君三器（與李零合寫）、吳王光劍、敫戟、多友鼎、呂簋編鐘、伯唐父鼎、仲禹父簋、燕侯克壺、幽公盨、師盨鐘與姬奭母豆等。另外尚有討論金文八卦數字符號的兩篇論文，考證金文莽京地望、金文所記西周的監察制度、金文中與玉有關的記載、金文中的族徽問題、金文中的王稱等論文，以及一些有關金文綜論性和介紹性的文章。

在盤點學術歷程時，我常常想起兩位國外的朋友。一位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汪濤先生，1995年他出面邀請我訪問倫敦半年，使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外面的世界，能結識像艾蘭、羅森夫人、韋馱、湯普森等一批著名的西方漢學家。後來他們遍佈全球各地的學生像韓國的詩經學者吳萬鍾先生、澳洲新南威爾士博物館的柳楊先生等也相繼成為我的朋友。我和汪先生還在短短的訪問時間裡，合作完成了《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一書的編輯。在倫敦期間，我曾數十次參觀大英博物館，而且承蒙館方盛情，提供了館藏全部青銅器檔案資料，並容許我逐件作了拍照和記錄。另一位是美國里海大學的柯鶴立教授，2002年底，她邀請我訪問美國五個月，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合作研究金文的“族徽問題”。在美國期間，我先是接到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主持“早期中國講座”的李峰博士的邀請，作了《西周金文中的射禮》演講，我把原發表在《考古》上的文章作了補充，加進了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新出土的柞伯簋等銅器，對這一禮制做了進一步的論述。三月初，接到美國北部達穆思大學專為我國新出幽公盨所組織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主持會議的艾蘭教授要我作了《幽公盨考》的主題發言。接着還接到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李潤權教授的邀請，作了《金文饗祭的斷代意義》的演講，用這個題目向哈佛的學者們介紹了中國先秦青銅器金文斷代的原則、方法以及我個人在這一領域的探索。最後，在離開美國前夕，遠在中國訪問的夏含夷教授委託夏德安教授邀請我在芝加哥大學作了《近年中國大陸新出重要青銅器》的演講。在幾個大學演講的同時，還有機會順訪了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地區的各博物館。西方博物館對學者的開放程度是令人十分感動的，各博物館都毫無保留的將庫藏的全部青銅器實物允許我作了詳盡的拍照和記錄。歐美之行，與西方學術界的交流，增進了學者間的理解和友誼。

在這個集子即將付梓的時候，我還特別懷念我的師長、老朋友陳公柔先生，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廣受大家尊敬的一位學者，陳先生長我二十歲，博聞強記、學識淵

博。坎坷的一生，使他積累了許多處世為人的經驗，記得我初到考古所，感歎自己十餘年大好光陰的耗費，無所適從時。他對我說：“從現在起，你給自己的年齡減去十歲思考問題。”簡單的一句話，給我平添了許多信心。二十餘年裡，我們朝夕相處，他給了我許多貼心的指導和幫助。正當我們準備一起去杭州參加古文字會，也正當他的文集即將出版時，他卻黯然逝去。我在校勘他的遺稿時，睹物思人，心中無限惆悵傷感。

人的生命是短暫的，回顧自己六十餘年走過的人生道路和學術歷程，還算充實和有益，聊可自慰。

劉雨 2004年12月12日於北京甘露園



## 目 錄

自序·····	1
西周禮制·····	1
西周金文中的射禮·····	3
射禮考·····	15
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	27
西周金文中的相見禮·····	54
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	61
西周金文中的大封小封和賜田里·····	74
西周金文中的軍事·····	84
西周金文中的“周禮”·····	113
曆法及年代學·····	163
金文“初吉”辨析·····	165
再論金文“初吉”·····	178
殷周金文中的閏月·····	185
金文饗祭的斷代意義·····	193
叔虞方鼎銘的閏月與祭禮·····	207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	213
族徽銘文·····	247
商周族氏銘文考釋舉例·····	249
殷周青銅器上的特殊銘刻·····	258



數位記號·····	267
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	269
殷周金文中的象與數·····	281
 銘文考釋·····	287
楚郢陵君三器·····	289
益陽出土的戠戟銘商榷·····	297
關於安徽南陵吳王光劍銘釋文·····	298
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	299
邵盨編鐘的重新研究·····	306
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	314
南陽仲禹父簋不是宣王標準器·····	317
燕侯克壺盃銘考·····	324
幽公考·····	327
師盨鐘和姬寗母豆·····	337
 綜合論述·····	345
金文莽京考·····	347
“乾隆四鑒”的作者、版本及其學術價值·····	357
一九八八年甲骨金文研究·····	368
一九九〇年金文研究·····	374
一代大師 ——紀念唐蘭先生誕辰百年·····	378
近出殷周金文綜述·····	381
金文研究中的三個難題·····	392
商和西周金文中的玉·····	398
西周的監察制度·····	430
金文斷代法研究·····	435
金文中的王稱·····	445
 書評及序跋·····	473
介紹《金文著錄簡目》·····	475
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序·····	478

---

新版《金文編》評介 .....	482
跋考古研究所藏彩繪本《西清古鑑》 .....	485
《殷周金文集成》述評 .....	495
《故宮青銅器》前言 .....	501
《商周金文總著錄表》前言 .....	510
寫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出版前夕 .....	512
 本書相關文獻一覽表 .....	 515
本書使用的西周王年概念 .....	520

# 西周禮制



## 西周金文中的射禮

過去，對古禮的研究多以文獻資料為基礎，近代學者郭沫若、陳夢家、楊寬等開始注意運用古文字學的材料。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西周金文為主體，結合文獻和出土器物上的圖象，試對古禮中的射禮作一探討。

西周金文記述了周王室及貴族們許多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的活動內容，其中有部分銅器銘文對射禮作了簡要的描述，下面我們對這些銅器銘文的內容作一些簡單的考證，以歸納出西周時射禮的大概情況。

### 一 麥方尊（《西清古鑒》8.33）

王令辟邢侯出坏，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述。迨王饗莽京，酃祀。雩若昱日，在璧璽，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𪔐禽，侯乘于赤旂舟從……作冊麥易金于辟侯……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鑄。

本銘記述了邢侯參與周王“酃祀”和“大豐”的過程，銘文大意是：邢侯新封於邢地，在二月入宗周朝見周王，朝見過程很順利。此時正值周王去莽京，舉行酃祀，第二天，周王在辟雍大池裏乘船舉行“大豐”，周王射大𪔐禽，邢侯乘一艘張有紅旗的船跟隨周王，邢侯受到周天子的獎賞，作冊麥又受到邢侯的獎賞，因此麥在這年鑄了這件銅器以紀念上述事件。這裏可能是作冊麥輔佐邢侯參加了朝見和祭祀活動，使邢侯在各種場合都舉措合禮得體，因而受到邢侯獎賞。

“周王射大𪔐禽”一句是講射禮的內容，大𪔐禽有的學者認為就是大雁，《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銘中的“酃祀”是周人祭祀祖先的大典，估計與甲骨文中殷人的“乡祀”相近。銘文中的“大豐”即“大禮”，金文中“豐”和“禮”是一個字（在漢隸中還是一個字，豐和禮分為兩個字是很晚的事情）。《周禮·秋官·

大行人》“禮，九牢”，注：“禮，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爲一牢”。《周禮·秋官·司儀》“致飧如致積之禮”，鄭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餼”。這裏的“大禮”應是“酺祀”的一部分，指向祖先貢獻犧牲的大典。金文有大豐簋（《三代吉金文存》9.13，以下簡稱《三代》）從另一角度記述了“大豐”的過程，銘文云：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省，丕繇王作廢，丕克乞衣王祀。

這裏記述的“大禮”是祭祀周文王，配享上帝的典禮。銘中的“王凡（汎）三方”是指周王乘船汎遊辟雍大池的三方。麥方尊銘有“在辟雍，王乘於舟爲大豐”“侯乘於赤旂舟從”，二者所記大禮的環境和方式是一致的。根據《禮記》的記載，周王在舉行大的祭典之前必須先在澤中習射，所以麥方尊銘記周王在舉行“大禮”前要射大鼬禽。

金文中還有“射魚”的記載，也在莽京的辟雍大池中舉行，稱之爲“乎漁”。如：井鼎（《三代》4.13）

惟十月，王在莽京，辛卯，王漁于□池，乎井從魚。攸易魚，對揚王休，用作寶尊鼎。

又比如適簋（《三代》8.52.2）

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莽京，乎漁于大池。

《春秋·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

《淮南子·時則訓》“季春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

“矢魚”、“射魚”、“乎漁”大概是一回事，也是射禮的內容之一。宋代人編輯的《博古圖錄》16·41~46收錄了三件害簋，其銘文云：

“用餼乃且考事，官司夷僕、小射、底魚”。銘中的“底魚”據陳夢家先生考證就是專司射魚的官吏。<sup>①</sup>

麥方尊中的邢侯是今河北邢臺一帶的邦君，麥是其史官作冊。

## 二 令鼎（《三代》4.27）

王大藉農于諶田，錫。王射，有司罫師氏小子卿射。王歸自諶田。王御濂仲僕，令罫奮先馬走。王曰：“令罫奮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十家”。王至于濂官，□。令拜，頤首，曰：“小□適學”。

此鼎銘講的是周王在舉行藉禮之後舉行的一次射禮。射禮舉行的地點可能是在諶田，也可能在濂仲之宮濂官。金文敘事前後次序每不固定，“王歸自諶田”、“王至於濂官”是講周王舉行藉禮之後，由諶田到達濂官這一件事，銘文却分作兩處寫，而且中

間夾雜了一段射禮的內容。鼎銘中的“令眾奮先馬走”、“令眾奮乃克至”兩句講的都是有關射禮的內容，在射禮或投壺時，勝算曰馬。《禮記·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注：“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鼎銘的“馬走”疑即“立馬”，即一馬、二馬、三馬相從而立的過程。“先馬走”即“先立馬”的意思。“乃克至”是周王對令及奮射技的讚語，誇讚二人的射技能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至”有“盡”、“極”的含義。如鞅鐘（《三代》1.65~66）云：“王章伐其至，戡伐其都”，“至”與“都”相對，“都”爲中心，“至”爲邊陲，所用也是“極”、“盡”的意思。因爲二人射技表現突出，因此受到“臣十家”的賞賜。射禮本身帶有獎拔人才的目的，《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有慶而益地”。

令和奮兩人的身份可能是“小臣”、“小子”之類，因銘中有“小口迺學”一句，“小”字看得十分清晰。靜簋中的靜也是教射的，稱“靜學無𢆶”。靜是“小臣”，與令和奮身份相當。

參加這次射禮的除周王、令、奮以外，尚有“有司”、“師氏”、“小子”三種人。“有司”是職官的泛稱，指一般有所司掌的官員。“師氏”是“師”的尊稱，西周金文中“師”出現百餘次，多數指帶兵打仗的武官。金文中的“小子”作職官講多爲武官，如“伯大師小子伯公父”（伯公父簋，《陝西青銅器》3.94）、“仲大師小子休”（仲大師盃，《文物》1978年11期）、“大師小子師望”（師望鼎，《三代》4.35），這裏“小子”是“大師”的部下，自然應是武官，金文中還有一些小子是指一些貴族子弟，如遣小子（遣小子簋，《三代》7.28）、顏小子、衛小子（裘衛鼎，《文物》1976年5期）、散人小子（散盤，《三代》17.20）等，略相當於文獻中的“庶子”、“國子”、“余子”之類。《周禮·夏官·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注：“庶子，卿大夫之子”。《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周禮·地官·小司徒》“大故，致余子”。注：“余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這些貴族子弟也多擔當武職，故常常與師氏、虎臣等並列。

### 三 靜簋（《三代》6.55）

惟六月初吉，王在葦京，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官，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弼卿齒蓋自、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𢆶，王易靜鞞剡。

靜簋講了兩件事，一件是在六月初吉丁卯這天，王下令靜作學宮的司射，負責教導小子、服、小臣和夷僕學射。另一件是在八月初吉庚寅這天，王、吳來、呂剗與豳自、蓋自、邦周卿射於莽京大池。靜因司射有功受賞，因而作器紀念。

簋銘的第一件事說明，在小臣靜的時代射禮作為一種禮儀已經比較複雜，參加射禮的一般人員都需要經過專門的訓練纔行。據文獻記載射禮中有時需要一些身份較低的人員作一些服務性工作，如擺放射具、整理酒器等。有時也要求這些人員比耦參加較射，充當射禮中的配角。射禮進行中，參射者要揖讓上下、獻酬交酢，甚至在較射時還要節樂歌舞，不單純是會射箭的人就能勝任的，因此需要在學宮中設立專門的教官來教射。

簋銘的第二件事敘述的是周王與邦君在莽京辟雍大池中舉行的一次射禮，銘中的吳來呂剗有可能就是班簋中的吳伯、呂伯。學者多認為靜簋與班簋同為穆王時器。

班簋（《文物》1972年9月，現藏首都博物館）：

王令毛公以邦豕君、土御、戠人伐東國瘡戎。咸，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王令呂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從父征。

吳伯、呂伯就是王令中的邦豕君，王命他們率領族人跟隨毛公去征伐東夷。

“豳莽自邦周”是“豳自”、“莽自”、“周邦”三人的代稱。趨簋（《三代》4.33）有“命女作豳自豕司馬”。師旂鼎（《三代》4.31）有“在莽”。“邦周”就是“周邦”。這裏用三個地名代表三個地方諸侯君長的人名。金文中以地名代人名者尚有同自簋（《三代》7.20）、許子罇（《考古圖》7.7）等，“同自作旅簋”、“許子盪自擇其吉金”，“同自”、“盪自”都是地名。

靜簋所記的這次射禮也是在辟雍大池中舉行的，王、吳來、呂剗與豳自、蓋自、邦周卿射，三人對三人，金文中的“卿射”可能就是文獻中的“耦射”。文獻中強調“天子射，比六耦”，從靜簋看，周天子也比三耦，文獻中說“習射於澤”，從靜簋看，在大池中的射，似為正式的射禮，不像是演練射技而設的“習射”。

靜的身份是小臣，有小臣靜卣（《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5.31）可以證明。職務是司射，在平時他充當學宮的教官，在舉行射禮時充當“司射”，據《儀禮》的《鄉射禮》、《大射儀》記載，司射是整個射禮的主持人，在射禮進行中他腰裏要插一根教鞭，對下屬人員不按禮儀行事，有嚴重違反規則者執行“撲刑”。還要“誘射”，即作射的示範動作，在射禮中司射也是教官，因此“靜學無𠄎”就是“靜教無𠄎”。小臣是王左右近幸之臣，常常被王派出執行特殊使命，如小臣彘鼎（《博古圖錄》2.14）記王欲往楚麓，令小臣彘“先省楚應”，即為王安排臨時駐地。小臣守簋（《三代》8.47）記王令小臣守出使於夷。

在本銘中則任命為司射。服是“職事”的意思，金文每言“更其祖考服”。在這裏指一般有職事的官吏。



夷僕指從少數民族徵集來的近衛部隊，又稱“虎臣”，如師西簋（《三代》9.21—24）

冊命師酉司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夷、龔夷、秦夷、京夷、畀身夷。

這些夷人虎臣就是“夷僕”，平時保衛王宮並參與一些祭祀饗射活動，戰時要出征作戰，供周王驅使。

小子、服、小臣、夷僕都有參加射禮的任務，所以平時要進行有關射的訓練。

#### 四 長由盃（《商周金文錄遺》293）

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应，穆王鄉豐，即邢伯大祝射。穆王蔑長由，以迷即邢伯氏。邢伯氏彌不姦，長由蔑曆。

長由盃所記的這次射禮是在三月的一天舉行的，地點在“下減应”，“应”是臨時駐地，“下減”大約在今鳳翔秦雍城遺址一帶<sup>②</sup>。參加射禮的有穆王和邢伯，這個邢伯是居於陝西的邢，與麥方尊所記的邢臺之邢在字形上明顯不同。這次射禮專為邢伯而舉行，用意是考察其忠順程度。在射禮過程中，邢伯給周王留下“彌不姦”的好印象。《詩經·大雅》“誕彌厥月”，傳：“彌，終也”。金文暇辭每言“彌生”、“彌厥生”，即“終其生”、“得善終”的意思。《逸周書·寶典》“不誠之行曰姦”。所以“彌不姦”就是“始終很誠懇”的意思。長由因為能把邢伯召來參加射禮，而且邢伯表現良好，所以受到周王的“蔑曆”。

“大祝”是隨從周王的重要官員，一方面參加陪射，一方面與周王共同考察邢伯。周初有大祝禽鼎（《三代》2.41），“禽”就是周公之子伯禽，其官為大祝，地位很顯要。現存鎮江市博物館的申簋蓋（《考古與文物》1983年2期）上也有“大祝”一官出現，是衆祝之長。

#### 五 義盃蓋（《考古》1986年第11期）

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灋西工作隊在陝西灋西地區一墓葬中發現了這件盃蓋，其銘文：

惟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在魯，卿即邦君、諸侯、正、有司大射。義蔑曆罪于王迷，義易貝十朋。

這次射禮規模較大，有邦君、諸侯、正、有司四種身份的人參加，而且在金文中第一次提出“大射”的名稱。《儀禮》將古代射禮分為“鄉射”和“大射”兩種，義盃

蓋的出土證明這種區分是有根據的。義在這次大射儀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與長由盃中長由的作用一樣，負責把邦君、諸侯等召集到魯地與周王舉行射禮，因此受到周王十朋貝的賞賜。銘中“逖”即“召來”的意思。

這次射禮在十一月舉行，地點在魯。蔡尊（《金文曆朔疏證》1.25）“王在魯，蔡易貝十朋”，也記有“魯”地。

銘中邦君與諸侯分叙，其區別可能是以是否接受了周王封建為準。正即正長，是官員的泛稱，有司在這裏是比“正”低一級的官吏。正和有司都是周王的下屬官員。

## 六 十五年趙曹鼎（《三代》4.25）

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彝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史趙曹易弓矢、虎廬、冑、盾、甲、爰。

銘中所記的射禮在射廬中舉行，是專門較射的場所，師湯父鼎銘（《三代》4.24）也有射廬：

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乎宰廬易□弓象弭矢垂彤歆。

又匡卣銘（《三代》10.25）也記有射廬：

懿王在射廬。作兔<sub>𠄎</sub>，匡甫兔□二。

兩器銘所記當亦與射禮有關。

趙曹鼎銘的趙曹是周共王的史官，因對射禮有功而受賞。射禮在五月舉行，地點在“周”，“周”為周都之一。

## 七 鄂侯御方鼎（《三代》4.32）

王南征，伐角雋。唯還自征，在坏，鄂侯御方內壺于王，乃裸之。御方畚王，王休宴，乃射。御方卿王射，御方休闌，王寡，咸飲。王親易御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

鄂侯是周南方一强大部族首領，周王此次南征雖主要目標不是針對他，但對他的震動自然是會有的，而且據金文記載不久後他就發動了對周的反叛。在這次射禮中，鄂侯御方曲意奉承周王，故意將矢射在“侯”的框架上。《說文》“休，止息也”。“闌，門遮也”。“休闌”就是射矢於侯框的意思。（附錄圖三所示的是戰國時射禮的圖象，射侯有前後兩層框架）。御方的用意是想使周王獲勝，取得周王的歡心。然而不巧，周王也

没能射中，射得偏高了。銘稱“王寡”就是矢行高於侯的意思，《儀禮·大射儀》“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注：“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既然兩人都没射中，按禮都得罰飲酒，所以銘文接下去有“咸飲”一句。

鄂侯御方到了不窋簋（《三代》9.48）中就是反叛的首領了，“御方、玁狁廣伐西俞”。到了禹鼎中（《商周金文錄遺》99）他更“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內”。成了東南反叛的總頭領，從東、南兩方夾攻周，直打到中心地帶，對周王室構成極大威脅。禹警呼：“烏乎哀哉！天降大喪於下國”。迫使周王動用了西六師、殷八師等主力部隊纔撲滅了這場叛亂。

這次射禮舉行的地點在坏，與麥方尊中邢侯所出之地相同，是周王南征返回途中經過之地。

通過對上述金文資料的簡單考證，我們瞭解到西周射禮舉行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及有關儀節，文獻的有些記載與金文相合，但金文資料也記錄了一些不同於文獻資料的情況，給我們以新的認識，下面分幾個方面談談我們的認識：

### （一）舉行射禮的政治目的

西周實行的是分封政治，周王將土地人民封給諸侯去管理，並以武力鎮服着周圍大大小小的邦國。因此在國王領地以外廣大土地上，星羅棋佈着許多相對獨立的邦君、諸侯國，周王要維持對這些小國的統治，除以武力相威脅外，經常舉行射、饗、聘、問等禮儀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維繫統一的作用。上述七件器中除令鼎和趙曹鼎是周王與自家臣工舉行射禮之外，其餘都是講周王與邦君諸侯舉行射禮。在射禮過程中，互相施展計謀，鄂侯御方在反叛前有意麻痹周王，邢伯則裝出一付“彌不姦”的忠順樣子取得周王的信任，這都是政治鬥爭的需要。而周王也經常在京城之外的臨時住地召來邦君諸侯舉行射禮，目的也是爲了考察這些小國的動向。在射禮舉行時，金文中還記錄了一些“乎魚”、“射雁”的情景，這自然使我們想到《遼史》上一些記載。

《遼史·營衛誌》“春捺鉢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從鷹鵠捕鵝雁。……皇帝得頭鵝，薦廟”。

洪皓的《松漠紀聞》云：“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

《遼史·天祚帝記》天慶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阿骨打的態度很快引起遼主的警覺。《遼史》載：“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

顧視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

這些後世少數民族活動的資料，對我們理解西周時盛行的射禮的政治目的很有啓發意義。可以想見，周王頻繁地與諸侯、邦君舉行射禮，打魚射雁，其用意是很明確的，就是不斷考察各屬國的忠順程度，進而決定或安撫或鎮壓的政策。《禮記·射義》對射禮的政治目的作了概括，它說“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 （二）射禮盛行於穆王前後

甲骨文中有“射”與“多射”是主射之官。西周初期金文有“𠄎射”甗、尊、爵等出土於洛陽東郊（《考古》1959年4期），可能是以官爲氏，但這些射與射禮是否有關，無法確知。射禮的客觀存在只是在麥方尊等若干銅器的被認識後纔得以證實。

金文學者一般認爲麥方尊和令鼎是略早於穆王的器，而長由盃是穆王標準器，靜簋、義盃蓋也應是穆王時器，趙曹鼎是共王標準器，鄂侯御方鼎則可能是宣王時器。這些銅器除鄂侯御方鼎外都是穆王前後的器。我們據此推論，作爲一種繁複的禮儀，射禮是在西周穆王時代成熟盛行起來的。靜簋上記載參加射禮的一般人員都要經過專門的訓練纔能登場較射，也反映了這種傾向。大概周王朝初年征戰不已，四方不靜，尚無暇使射禮達到十分繁複完善的地步，而只有到了穆王前後，四海承平，纔有條件大興禮樂，因此也就給金文留下了這麼多有關射禮的寶貴的記錄。這一禮儀到了孔夫子的春秋時代演化成爲“六藝”之一，發展成一門專科學問和技藝，就變得更加瑣碎和複雜了。《儀禮》中所記的射禮，有可能就是以這個時代的實際情況爲基礎，加以推演而成。

## （三）水陸兩種射禮

令鼎、長由盃、義盃蓋、趙曹鼎、鄂侯御方鼎五件器上的射禮是在陸上舉行的。令鼎是在謀田行藉禮的地方或其御者的濂宮中舉行，長由盃是在下減王的臨時駐地舉行。義盃蓋在魯地，鄂侯御方鼎在坏地，這兩件器銘所記也可能是在王的臨時駐地。趙曹鼎中所記的射禮是在周都新宮的射廬中舉行。記“射廬”的銅器尚有兩件：

師湯父鼎（《三代》4.24.1）：

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乎宰雁易盛弓象弭、矢鏃、彤歃。

匡卣（《三代》10.25.1）：

懿王在射廬，作兔𠄎。匡甫兔口二，王曰：休。

師湯父鼎中記周王在射廬頒賞臣下，匡卣記懿王在射廬與臣下作捕兔戲。看起來射廬是陸上一個比較寬大的建築物。其特點可能是周圍沒有圍牆，如附錄圖二、圖三所示。據這幾件器銘所記射禮多數是在陸上舉行，而且一般規模比較大。另外，陸射除趙曹鼎在周都舉行外，其餘各器所記的射禮多在王巡行的臨時駐地舉行。

麥方尊、靜簋所記的射禮是在莽京辟雍的大池中舉行。適簋和攸鼎中的“乎漁”如上所述是“射魚”，是射禮的一種，也是在莽京辟雍大池中舉行的。靜簋所記是“卿射”，與陸射沒有什麼不同，只是規模略小而已。麥方尊記射“大彝禽”，適簋與攸鼎是“射魚”。而陸射多為射“侯”。（如鄂侯御方鼎所記“休闌”，就是注矢於侯框）

一般文獻認為“水射”不是正式的射禮，而是“習射”。《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從金文的情況看，周天子與邦君諸侯隆重的在莽京辟雍大池中射魚射雁，其射並不像是習射，而是射禮的一種，行禮的人在麥方尊中記載是乘舟船進行的。陝西武功出土的楚簋（《考古》1981年2期）記有“內史尹氏冊命楚……司莽畝官內師舟”一句。可見當時莽京辟雍大池中舟船是不少的，要設專官來加以管理。總之，水中的射禮應該與陸上的射禮有區別，這一點文獻很少具體的記載，金文給了我們許多新的認識。西周的射禮，分水陸兩種，作為射禮，它們有相同之處，但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 （四）關於“三番射”

《儀禮》的《鄉射禮》和《大射儀》兩篇集中地描述了射禮的過程，因其描述的儀節十分瑣碎繁複，我們將有關儀節各簡化成若干條。《鄉射禮》我們歸納為51條，其中1~13為射前準備<sup>④</sup>及享燕，14~24為第一番射，25~37為第二番射，38~44為第三番射。45~48為射後之享燕、49~51為送、拜、結束。《大射儀》我們歸納為46條。其中1~17為射前飲燕，18~24為第一番射，25~33為第二番射，34~38為第三番射、39~45為射後飲燕、46結束。

上述鄉射和大射各有五十個左右儀節，但是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射前飲宴、三番射、射後飲宴。射前後之飲宴是射禮的附加部分。而射禮的中心是“三番射”，即三次競射。凌廷堪《禮經釋例》說：“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衆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第一番射帶試射性質，雖射中也不計算成績。二、三兩番射都要計算成績（釋獲）。特別是第三番射，要節樂歌舞而射<sup>⑤</sup>。對三番射來說，鄉射與大射沒有本質的區別。二者主要是規格大小，參射者身份高低有別而已。

在記錄射禮的諸器銘中無一提到“三番射”，文獻所說的“比耦而射”，金文稱“卿射”。文獻說“射比三耦”，靜簋所記即三人對三人，應為三耦。文獻稱司射主持射儀，金文也有“司射”，多由小臣承當。文獻記射禮有釋獲、立馬、揚旌、唱獲、矢行上曰揚、下曰留、左右曰方，金文有先馬走、休闌、揚等。文獻所記射禮的各項內容，金文多有反映，唯“三番射”沒有記錄。這可能說明像《儀禮》所記的那種繁複的三番射在西周時尚未實行。文獻中的射禮是戰國至漢代的人所瞭解的射禮，估計當時的人所能知道的情況一般不早於春秋。而我們現在所舉的金文資料都是西周第一手史料。所

以我們認為像“三番射”那樣複雜的射禮可能是春秋以後纔有的事。但是《儀禮》中所述的許多射禮的具體儀節則可能是西周時已經存在的了。

### (五) 射禮舉行的季節

文獻中稱“春射秋饗”，因此有人主張射禮在春天舉行。金文所反映的情況與此不同，上述明確提到射禮的七件銅器銘文，有五件記有時間，分別是二月、三月、五月、八月、十一月，這些月份幾乎貫串一年，是無論哪個季度也不可能全包括進去的。這說明那些按政治形勢需要與邦君諸侯舉行的射禮是不受時間限制的，主要視政治需要而定。而文獻中所說的“春射”可能是指王室每年例行的宮中射禮，這種射禮有可能固定在一年的某個季節進行。

### (六) 射禮的參加者

在上述器銘中的射禮都有周王參加，是為“主”。與其相對的“賓”多是邦君、諸侯。如邢侯、吳來、呂剗、鄂侯等。參與陪射的多為周王的正長和有司，如大祝、師氏、史、作冊、小子、小臣等。有時也由夷僕等比耦配射。射禮一般由小臣作司射。

《儀禮》等書中所述及的射禮多為春秋以後的情況，其時周天子已名存實亡。所以在那裏射禮的最高形式——大射儀，也只是諸侯君長為“主”的射禮，這在規格上就不如西周金文反映的高。義盃蓋銘記由周王召集了大批的邦君、諸侯來，又由周王室抽調許多正長和有司，其規模氣象遠非《儀禮》等書中的情景所能比擬的。

## 注 釋

① 陳夢家：《釋底魚》，《考古社刊》第四期40頁，1936年。

② “下減”地望採用盧連成同志意見。《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周都減鄭考》。

③ 此處關於“王寡”的看法是採用陳夢家先生的意見。

④ 鄉射禮

1. 主誠賓 2. 陳設張侯 3. 主速賓 4. 迎賓 5. 主獻賓 6. 賓酢主 7. 主酬賓 8. 主獻衆賓 9. 一人舉觶 10. 與尊者獻酢 11. 合奏樂 12. 主獻工與笙 13. 立司正 14. 司射請射 15. 納射器 16. 司射比三耦 17. 司馬命張侯倚旌 18. 樂正遷樂 19. 三耦取弓矢俟射 20. 司射誘射 21. 三耦射 22. 取矢委楅 23. 司射請射比耦 24. 三耦拾取矢 25. 衆賓受弓矢 26. 司射作射請射獲 27. 三耦釋獲而射 28. 賓主射 29. 大夫與耦射 30. 衆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31. 司馬命取矢 32. 數獲 33. 飲不勝者 34. 司馬獻獲者 35. 司射獻釋獲者 36. 司射又請射 37. 主、賓、衆賓、三耦皆拾取矢 38. 司射請以樂節射 39. 全體節樂而射 40. 取矢數矢 41. 視算告獲 42. 飲不勝者 43. 拾矢授有司 44. 退



諸射器 45. 旅酬 46. 司正使二人舉觶 47. 請坐燕、因徹俎 48. 坐燕、無算爵、無算樂  
49. 送賓 50. 明日拜賜 51. 息司正

#### 大射儀

1. 誠百官 2. 誠宰、司馬，張侯 3. 設鼓樂 4. 陳設燕具席位 5. 命賓、納賓 6. 主獻賓  
7. 賓酢主 8. 主獻公 9. 公酢主 10. 主酬賓 11. 爲衆賓旅酬 12. 公酬賓 13. 主獻卿  
14. 再賡觶 15. 公爲卿舉旅 16. 主獻大夫 17. 作樂娛賓 18. 立司正、安賓、查儀 19.  
請射、納射器、誓射、比耦 20. 司射誘射 21. 三耦射 22. 取矢 23. 命耦 24. 三耦拾取  
矢 25. 三耦再射釋獲 26. 君與賓耦射 27. 公卿大夫及衆耦皆射 28. 取矢 29. 數獲 30.  
飲不勝者 31. 獻獲者 32. 獻釋獲者 33. 拾取矢 34. 鼓樂節射 35. 取矢數獲 36. 飲不  
勝者 37. 拾取矢 38. 退諸射器 39. 爲大夫舉旅酬 40. 徹俎安坐 41. 主獻士旅食 42.  
賓舉爵爲士旅酬 43. 燕或復射 44. 主獻庶子 45. 燕末盡歡 46. 賓出公人。

- ⑤ 《詩經·齊風·猗嗟》：“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詩中所記爲射禮實錄，詩三節與三番射相對應。“舞則選兮，射則貫兮”一句似在說明射禮的一部分要配合舞蹈來完成。

## 附錄：射禮圖象

### 一 上海博物館藏銅橢杯（局部，《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90）

圖案爲細劃的刻紋，有一組閣樓的圖案，閣下右方有二人，一人執弓向前作審視狀。另一人似在整理弓弦。各有二矢繫於腰間。其上有射侯一，一矢中的，一矢稍偏，射侯長方形，有曲綫紋，侯左有人作相揖狀，爲鏽所掩。此器上海博物館定爲戰國中期物。

### 二 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銅壺（《文物》1976年第3期）

1965年出土，上面有“鉛類礦物錯成的圖象”，圖分兩層：

第一層左面爲射禮圖象，上有射廬一，共五人：立檐外者手執長旌，應爲“獲者”，正在揚旌唱獲。踞於檐下者手執籌，應爲“釋獲者”。廬中二人正在耦射。後檐下者，左手持弓，似爲司射。下又五人即將入廬競射。

第二層右面一組爲射禮圖象。上七人，右前方置“侯”（與橢杯侯同），侯側一人，踞於地，其餘與第一層同。

圖象中長裳站立者爲貴族參射者，短服踞地者爲服務人員。此器據發掘者分析大體也在戰國中期。

### 三 故宮博物院藏燕射畫像壺（《文物》1976年3期）

此壺有兩組對稱圖案，與上兩器雷同，畫面中心爲一射廬，左面置“侯”，侯面雙層，由框架聯結，上中三矢，兩矢穿透前層，一矢正中“侯的”，廬內二人耦射，檐前一人跽地，乃釋獲者。檐後一人持弓，乃司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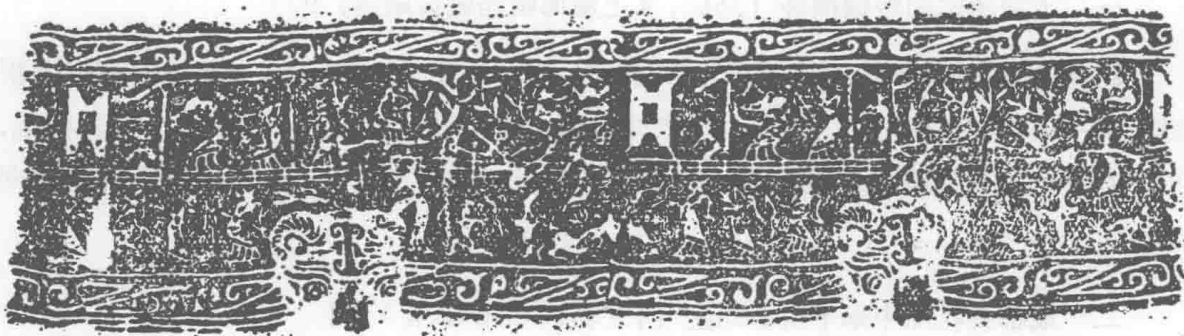
下有四人作接射狀。該壺也是戰國時物。



圖一



圖二



圖三

（原載《考古》1986年12期1112~1120頁）



## 射禮考

講求禮儀是古今中外世界各國都相同的，但與政治緊密結合，以至於用“禮”來治理國家，卻是中國古代政治所獨有的。

“禮制”作為一種制度體系，形成於西周時代，所以後世就把中國古代的禮制稱為“周禮”。我在《燕京學報》第3期上發表了《西周金文中的周禮》一文，依據金文資料考察了祭祖禮、軍禮、封建禮、相見禮、饗宴禮、射禮等六個方面，這是一次企圖復原真實的西周“周禮”的嘗試。今天，我對舊稿加以整理、修改和補充，向大家報告最後一個題目——射禮。

西周金文中有八篇銘文明確記錄了古代的射禮，下面我逐一介紹：

### 一 麥方尊（《集成》6015）

王令辟邢侯出坏，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述。迨王饗茅京，酹祀，雩若翌日。在璧雍，王乘于舟，為大禮，王射大龔禽，侯乘于赤旗舟從……作冊麥賜金于辟侯……惟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鑄。

該銘記述了邢侯參與周王“饗祭與酹祀”和“大禮”的過程。大意是：邢侯新封於邢地，在二月，入宗周朝見周王，朝見過程很順利。此時正值周王去茅京，舉行饗祭，第二天又行酹祀。在辟雍大池裏，王乘舟行大禮，周王射大龔禽，邢侯乘一艘張有紅旗的船跟隨周王，邢侯受到周王的賞賜。可能是因為麥輔佐邢侯參與朝見和祭祀活動，使邢侯在各種場合都舉措得體，作冊麥又受到邢侯的獎賞，因此麥在這年鑄了這件銅器以紀念。銘中“王射大龔禽”一句，講的是射禮中的“水射”，也就是文獻中所說的“澤射”。同類內容的銅器還有兩件：

## 攸鼎

惟十月，王在葦京，辛卯，王魚于□池，呼□從魚。攸賜魚，對揚王休，用作寶尊鼎。

## 適簋

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葦京，呼魚于大池……

這裏所說的“呼魚”，與文獻中的“射魚”、“矢魚”亦相類似。《春秋·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淮南子·時則訓》“季春之月，命魚師始魚，天子親往射魚。”《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魚師始魚，天子親往射魚。”《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魚師始魚，天子親往射魚。”《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魚師始魚，天子親往射魚。”據陳夢家先生考證，“底魚”就是專司射魚的官吏。這些金文與文獻的內容都與射禮中的“水射”有關。

## 二 令鼎（《集成》2803）

王大藉農于諶田，錫。王射，有司眾師氏小子卿射。王歸自諶田。王御謙仲僕，令眾奮先馬走。王曰：“令眾奮乃克至，余其舍汝臣三十家。”王至于謙宮，田。令拜，稽首，曰：“小子廼學……”

銘文講的是周王在舉行藉田禮後，進行的一次射禮。行禮的地點就在諶田，參加射禮的有王和有司官員、師氏小子等。其中說令眾奮“先馬走”、“乃克至”兩句話，是講射禮的專門術語。在射禮或投壺禮中，勝算曰馬。《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注：“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銘文中的“先馬走”，就是“先立馬”，指一馬、二馬、三馬相從而立的過程。“乃克至”是對兩師氏小子令及奮射技的讚揚。“至”有“極”、“盡”的含義，獸鐘“王敦伐其至，戡伐其都。”至與都相對，“都”為中心地區，“至”為邊陲，所用也是“極”、“盡”的意思。這裏誇讚二人的射技已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因此受到“臣三十家”的賞賜。

## 三 靜簋（《集成》4273）

惟六月初吉，王在葦京，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季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甥、師、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戢，王賜靜鞶韞……

銘文大意是說：在六月初吉丁卯這一天，王在葦京，靜被周王任命為學宮司射，負

責教導小子、服、小臣、夷僕學射。兩個月後，在八月初吉庚寅這一天，周王、吳來、呂惲與豳師、莽師、邦周組成三耦，在辟雍大池舉行射禮。因為靜教學有功，王賜靜鞶韞……

據文獻記載，射禮進行中，參射者要揖讓上下，獻酬交酢，節樂歌舞。在體容皆合於禮儀的情況下，又能射中靶的者，方可稱能。靜簋是穆王時器，銘文透露出此時的射禮已比較複雜，可能已經接近文獻所說的情況，因為參加射禮的人，需要經過專門的訓練纔能勝任。

銘文中的吳來、呂惲可能就是班簋中左右比毛父的吳伯、呂伯，身份是邦冢君。豳師、莽師、邦周是地方諸侯，金文中每以地名代人名，如：“同師作旅簋”、“許子將師擇其吉金”等，同師、將師都是地名。趯簋“命汝作豳師總司馬”、師旗鼎“在莽”。這裏豳師、莽師、邦周也是用三個地名代表三個人名。小臣靜卣可以說明靜的身份是小臣，其職務是司射，平時則充任學宮射藝教官。《儀禮》的《鄉射禮》和《大射儀》記載，司射是射禮的主持人，在射禮進行中，他腰裏別着一根教鞭，對下屬不按禮儀行事者，行“撲刑”。開始正式較射之前，他還要擔當“誘射”，即作規則的示範動作等。“服”指“職事”，金文每言“更其祖考服”，即“繼承其祖考的職事”，這裏指一般有職事的官吏。“小臣”一般是王的近臣，“小子”則多指一般貴族子弟。“夷僕”指從善於征戰的邊疆民族徵集來的人員，是王的近衛部隊“虎臣”的組成部分。平時保衛王室，戰時要出征供王驅使。上述人員都有參與射禮的義務，所以要進行有關射禮的訓練。

文獻中強調“天子射，比六耦。”“習射於澤。”

靜簋銘文表明，天子也可比三耦而射，“澤射”即“水中之射”，並非僅為練習而設，也可以是正規的射禮。

#### 四 長由盃（《集成》9455）

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泂，穆王饗豐，即邢伯大祝射。穆王蔑長由，以逖即邢伯氏。邢伯氏彌不姦，長由蔑曆……

銘文大意是：在三月第一個吉日丁亥這一天，穆王在下泂的一個臨時住地，舉行大饗禮，之後又舉行大射禮，有邢伯和大祝參加。長由為周王招逖了邢伯氏，而且邢伯氏在射禮過程中始終表現得很誠懇，因此長由受到穆王的贊許。看得出來，舉行這次射禮的目的是為了考察邢伯的忠順程度。大祝是衆祝之長，朝廷神職人員的總頭領，由他協助周王對邢伯進行考察。

## 五 義盃蓋（《集成》9453）

惟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在魯，卿即邦君、諸侯、正、有司大射。義蔑曆罪于王迹，義賜貝十朋……

銘文大意是：在十一月上半月甲申這一天，周王在魯地，舉行大射禮。參加射禮的有邦君、諸侯、正長和有司官員。義代王招徠了這些人員，因而受到周王的勉勵和賞賜……《儀禮》將古代射禮分為鄉射與大射，本銘在金文中第一次提到“大射”，證明《儀禮》的記載合於西周古禮，是有根據的。邦君指周邊異族方國的國君；諸侯指受到周王室列土封建的貴族，正長、有司則指在朝廷任職的大小官吏。因系大射，其規模之大，級別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 六 十五年趙曹鼎（《集成》2784）

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恭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史趙曹賜弓矢、虎盧、冑、盾、甲、戣……

銘文大意是：在周恭王十五年五月上半月壬午這一天，恭王在周都的新宮，在射廬裏舉行射禮，史官趙曹因參與射禮有功，受到一套兵器賞賜。與此銘類似的有師湯父鼎“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呼宰應賜弓、象珥、矢鏃、彤欵……”所記也與射禮有關。

懿王時期的標準器匡卣記有“懿王在射廬，作兔斝，匡捕兔斝二”，該銘始終未見通解，近期晉侯墓地出土多個兔尊，其中8號墓出土的一組敞口的兔尊引起我的聯想，文獻在記錄射禮時，其後也記投壺禮，戰國畫像銅壺及漢代的畫像石裏還有投壺禮的畫面，都是以矢投於敞口尊裏，是否匡卣銘中的“兔斝，匡捕兔斝二”與投壺禮有關，而晉侯墓出土的敞口兔尊是否可能是投壺禮中的受矢之壺。當然這純屬猜想，不足為訓。

## 七 鄂侯御方鼎（《集成》2810）

王南征，伐角雋。惟還自征，在坏，鄂侯御方納壺于王，乃裸之。御方侑王，

王休宴，乃射。御方卿王射，御方休闌，王揚，咸飲。王親賜御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

銘文大意是：周王征伐南方的角和僑，在返師路過坏地時，鄂侯御方迎接周王，舉行饗禮，他向周王獻了一壺醴酒，于是周王以酒灌地，行裸祭，御方一直在旁輔佐周王。周王休宴，于是舉行射禮，御方與王比耦而射，御方注矢於侯框，周王的矢則從侯的上方飛過，因為兩人都沒有射中，于是就都飲罰酒。典禮過後，周王親賜御方五種玉，四匹馬，五束矢等……

銘文透露出，周王此次南征，對東南巨酋鄂侯御方震動很大，因此在舉行的射禮中，他曲意奉承周王，《說文》“休，止息也。”“闌，門遮也。”所以，“休闌”就是“止矢於框”之意。他故意將矢射在侯的框架上，（見附圖，戰國時的侯有兩層框架）目的當然是取悅於周王。周王可能有些醉意，竟將矢射飛出了靶子。《儀禮·大射儀》“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注：“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比鄂侯御方鼎稍晚些的不其簋云：“御方、玁狁廣伐西俞。”禹鼎云：鄂侯御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於歷內。”他成了東南反叛的總頭領，從東南兩方夾攻周，直打到周的中心地帶，對周王室構成極大威脅。以至於禹驚呼：“嗚呼哀哉！天降大喪於下國。”迫使周王動用了西六師、殷八師等全部主力部隊與諸侯地方部隊配合，纔平息了這場叛亂。”

## 八 柞伯簋

惟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宮率王多士，師魯父率小臣。王夷赤金十版，王曰：小子小臣，敬有佑，獲則取。柞伯十稱弓，無廢矢。王則畀柞伯赤金十版，誕賜稅見。柞伯用作周公寶尊彝。

這是1993年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242號墓出土的簋，發表在《文物》1998年第9期，大意是說：在八月庚申這一天，周王在西京周都舉行大射禮，王命南宮率領王的多士小子為一方，命師魯父率小臣為另一方，比耦競射。王預先放置赤金十版作為懸賞，王說：“小子小臣們，恭敬其事而又有上天保佑的話，誰唱獲最多，誰就可以拿這十版赤金。”柞伯十次舉弓，無一廢矢，全部命中。王就把赤金十版給予柞伯，並且賞賜他稅見。柞伯因而作了這件紀念周公的寶尊彝。此器的時代大體在康昭之際，與麥方尊、令鼎接近。

通過對上述八篇銘文的分析，我們瞭解到西周射禮舉行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有

關儀節。爲了便於比照，我們將文獻中的有關記載作了摘錄，《儀禮》的《鄉射禮》和《大射儀》兩篇集中記錄了射禮的內容，現歸納其儀注如下：

鄉射禮儀注：（從略）

大射儀儀注：（從略）

鄉射的儀注1~13爲射前準備與飲燕，14~24爲第一番射，25~37爲第二番射，38~44爲第三番射，45~48爲射後之飲燕，49~51爲送拜結束。大射的儀注1~17爲射前飲燕，18~24爲第一番射，25~33爲第二番射，34~38爲第三番射，39~45爲射後飲燕，46爲結束。鄉射與大射的主要儀注都由三部分組成：射前飲燕、三番射、射後飲燕。射前後的飲燕是附加部分，射禮的核心部分是三番射。凌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及衆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第一番射是試射，雖射中也不計算成績（不釋獲），二、三番射都要計算成績（釋獲），特別是第三番射，要求節樂歌舞而射。對三番射來說，鄉射與大射是相同的，只是參射者身份高低和射禮規模氣派大小有別而已。文獻稱“比耦而射”，金文稱“卿射”；文獻稱“射比三耦”，靜簋所記即三人對三人；文獻記司射主持射儀，金文也有小臣擔任的司射；文獻的儀注有“釋獲”、“立馬”、“揚旌”、“唱獲”、“矢行上曰揚，下曰留，左右曰方”，金文有“先馬走”、“休闌”、“揚”等，幾乎文獻中的主要儀注西周金文中大部分都有一定反映，這說明《儀禮》確實真實的保存了一部分古禮，今天的學者若想瞭解古禮較全面的情況，必須重視對古代禮書的研究。

但是《儀禮》等禮書的內容畢竟是後世人對古禮的追述，不可能是西周時周禮的原貌，後世禮書的註釋者，因爲距離古代更加遙遠，只好根據想象，牽強比附，把問題越講越複雜。比如麥方尊和靜簋所記的“水射”，文獻逸失。《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記錄了水澤之射，所記還有一些水射的影子。後世的註家不知何以會在水澤之中行射禮，就杜撰出“澤宮之說”，以爲“射於澤”者，即射於“澤宮”。靜簋、麥方尊所記明明是在莽京的辟雍大池，是在船上進行的射禮，而且從其敘述情況看，也決非《禮記》所說的“習射”，而是十分隆重而正規的射禮。同樣的記載還有《伯唐父鼎》：“用射絳、釐虎、貉、白鹿、白狼於辟池。”這是講棄祭禮中射牲的儀注，王乘舟於辟雍大池中，射池中預置的牛牲與諸野牲。說明在西周時代射禮本來分爲水射與陸射兩種，文獻只記錄了其中的陸射一種。又比如，文獻中常說“春射秋饗”，因此有人便主張古代射禮只在春天舉行，從上述金文記時情況看，二月、三月、五月、八月、十一月都有，幾乎貫穿全年，難以某個季度來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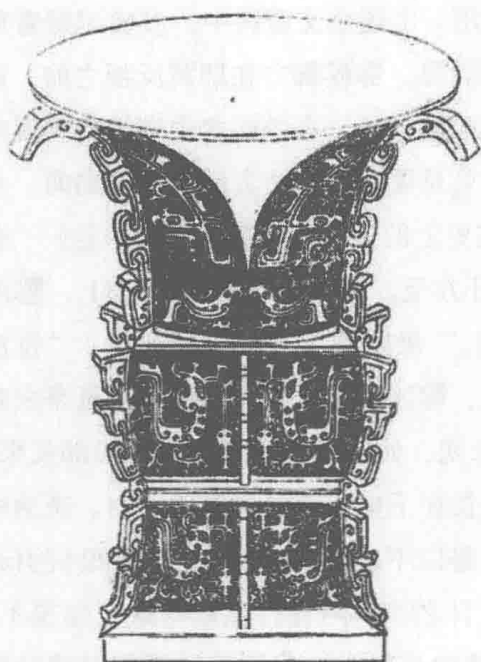
西周實行封建制度，周王把土地人民分封給各諸侯去管理，因此在周王直接控制的王畿領地之外，星羅棋佈着許多相對獨立的邦君、諸侯國，經常舉行的射、饗、聘、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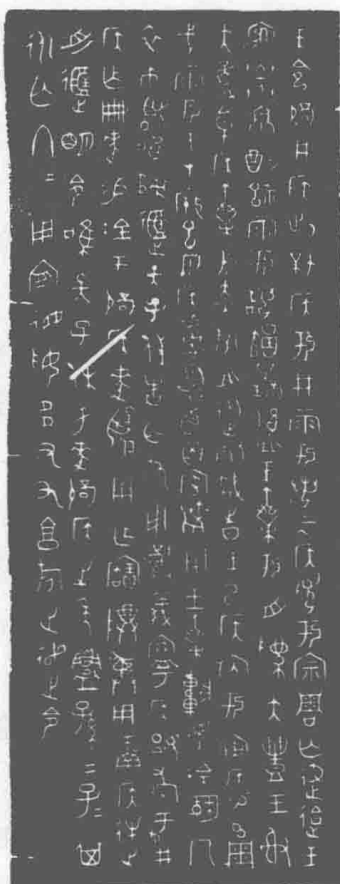
等禮儀，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維繫統一的作用。上述金文資料中，多數記錄着周王與諸侯邦君舉行的射禮。禮儀進行中，互相施展計謀。鄂侯御方在即將反叛之前，為麻痹周王，百般奉承周王，邢伯則裝出一副誠懇恭順的樣子，在遊藝之中進行着尖銳的政治較量。周王頻頻招徠邦君諸侯舉行射禮，目的就是要考察這些方國的政治動向。金文中呼魚射雁的情景，自然使我們聯想到一些民族史上的資料。《遼史·營衛誌》“春奈鉢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從鷹鵠捕鵝雁……皇帝得頭鵝，薦廟。”洪皓的《松漠紀聞》云：“甯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遼史·天祚帝記》天慶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阿骨打的態度很快引起遼主的警覺。“他日，上密謂樞密史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這些後世民族史資料，對我們理解西周射禮的政治目的是有啓發作用的。《禮記·射義》“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即一語道破天機。

《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有慶而益地。”說明射禮還帶有選拔人才的目的，後來從此發展成考試制度之一。金文中多次記述的小子、小臣以及有司官吏等參與射禮活動，實際上也帶有選士作用。

中國古代的政治主體是貴族，統治大小貴族階層的辦法是否有效，決定着王朝的盛衰成敗。“禮治”是一種巧妙而實用的統治藝術，它借助於煩瑣的儀註，把貴族們的舉止言行規定在不同等級的範圍內，把最高統治的意志，某些強制的甚至是暴力的企圖，掩蓋在一片溫文爾雅的禮儀之中。在威嚴的氣勢下，一切不滿和反抗的願望，都化解在觥籌交錯，樂舞翩跹之中。這種統治術介於倫理道德規範與刑罰之間，它既不像僅依靠習俗和倫理說教來約束人那樣軟弱無力，也不像動用法律和刑罰那樣粗暴無情，它要求貴族們頻繁地參加到無休止的禮儀活動中去，按等級身份把每個人都禁錮在某種格式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至於“刑不上大夫”，照樣可以維持社會應有的穩定局面。這種統治術，十分有效，因而得到歷代統治者的維護和強化，只要看一下後世史書中的《禮書》、《禮儀誌》等，就可以知道，西周時代形成的各種禮儀制度被不同程度的保存下來，而“周禮”是這個保守傳統的源頭，它對幾千年的中華文明產生過巨大影響，直至對今天中國人的一些心理活動仍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要想瞭解中華民族的傳統性格，對周禮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麥方尊



麥方尊銘文



令鼎銘文



靜簋



靜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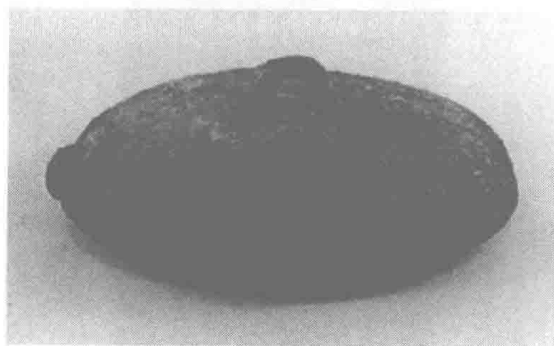




長由盃



長由盃銘文



義盃蓋



義盃蓋銘文



十五年趙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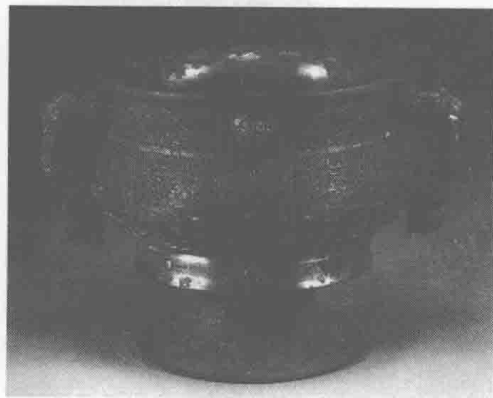
十五年趙曹鼎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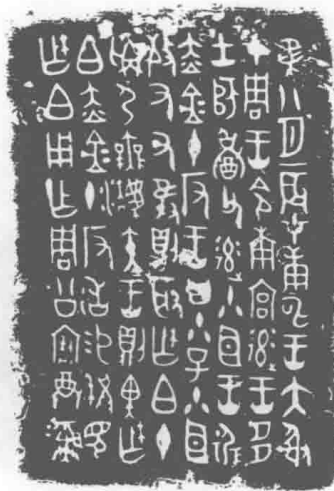
鄂侯御方鼎



鄂侯御方鼎銘文



柞伯簋



柞伯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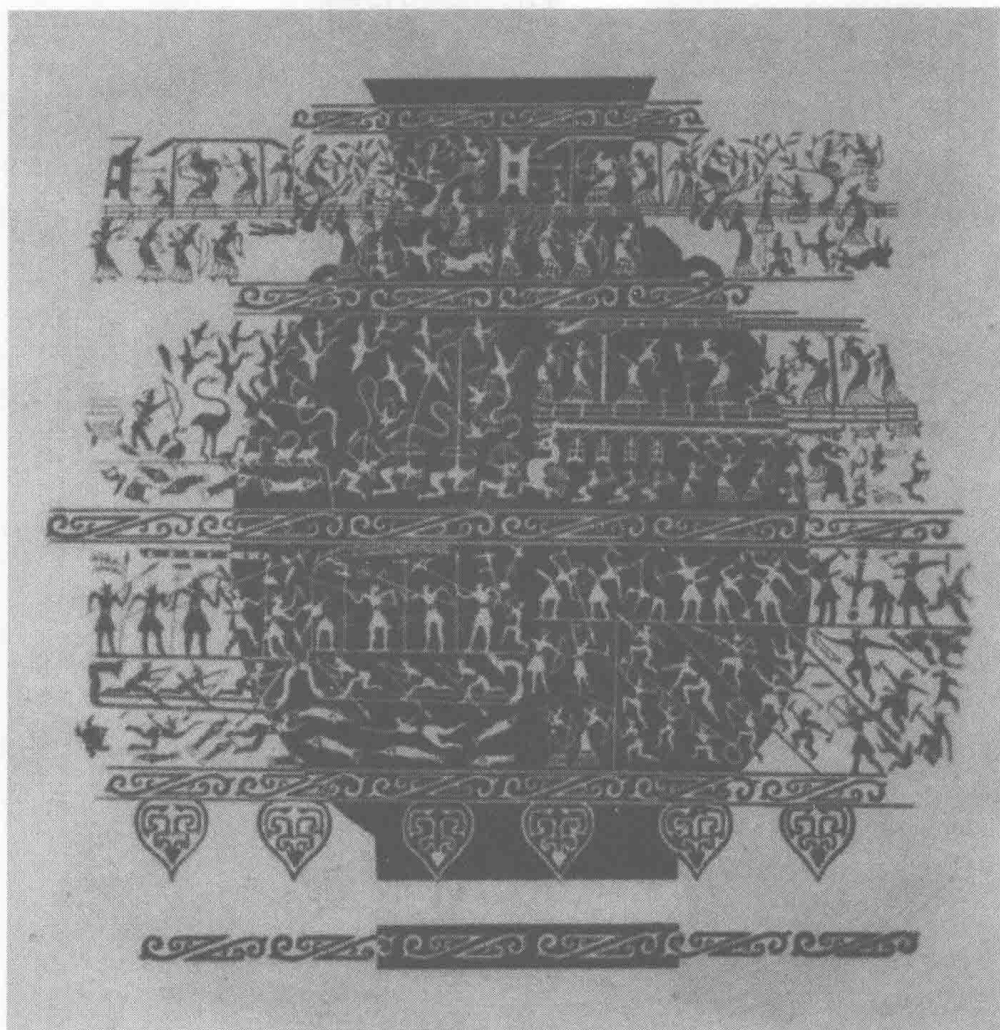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館藏銅桴杯圖



成都百花壇中學 M10 出土戰國銅壺圖



林已奈夫戰國銅器水射圖《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的研究》



故宮博物院藏戰國銅壺圖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稿，2002 年 12 月 9 日)



## 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

我國古禮傳統上分爲吉、嘉、賓、軍、兇五種，然而“禮有五經，莫重於祭”<sup>①</sup>，諸祭禮中又以祭祖禮更爲重要。西周是古禮盛行的時代，因此對西周祭祖禮的研究，是認識古禮的關鍵。本文擬以西周金文爲基本資料，兼及其他先秦銘刻資料和部分文獻，試對這一問題作些初步探討，並進而對西周王室祭祖禮儀和周人的祖神觀念作些粗淺的分析。

### 一 祭祖禮二十種

通過對西周金文資料的分析，我整理出二十種祭祖禮的材料，現簡要敘述如下：

#### （一）禘

小孟鼎（《三代》4.44~45）

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明，王各周廟……用牲，甯周王、武王、成王……  
惟王二十又五祀。

此器作於康王二十五年，銘中的“周王”指文王。

鮮簋（《彙編》4.238）<sup>②</sup>

惟王三十又四祀，惟五月既望戊午。王在菱京，甯于瑯王。鮮蔑曆，裸王鬯，裸玉三品，貝二十朋。對王休，用作子孫其永寶。

此器作於穆王三十四年。

刺鼎（《三代》4.23.3）

惟五月，王在初，辰在丁卯，王甯，用牡于大室，甯邵王。刺御，王易刺貝三十朋。天子萬年，刺對揚王休，用作黃公尊鬯彝，其孫子子永寶用。

此器作於穆王。

繁卣（《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

惟九月初吉癸丑，公酺祀。季旬又一日辛亥，公啻酺辛公祀。衣事，亡咎。公蔑繁曆，易宗彝一臂，車馬兩。繁拜手，頤首，對揚公休，用作文考辛公寶尊彝，其萬年寶。或。

此器作於穆王。

大簋（《三代》8.44.3）

惟六月初吉丁巳，王在鄭，蔑大曆，易芻羞。曰：用啻于乃考。大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皇考大仲尊簋。

金文禘祭之禘皆寫作啻，無一例外<sup>③</sup>。

關於古禘禮，其詳已不可得知，今能見到的後世儒者的描述，已矛盾叢出，帶有很多猜測成份，且往往以後世的制度摻雜其間。《禮記》說：“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sup>④</sup>。到了鄭玄的時代，對禘禮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百王通義”<sup>⑤</sup>。他又有“三禘”之說，即“禘天於圜丘”，“禘地於方丘”，“禘人鬼於宗廟”。再將宗廟之禘細分為“吉禘”和“時禘”。吉禘是“終王大禘”，亦即“三年喪畢之禘”。時禘是“四時之禘”<sup>⑥</sup>。《禮記·王制》“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也認為禘為四時祭祖禮之一。歸納起來，上述內容可以概括為：不王不禘；禘祭始祖；禘分祫（專祭、合祭）；禘分吉時（終王祭與四時祭）。因為禘祭是後世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的祭祖大禮，所以從漢儒直至清儒，都不厭其煩地反復討論，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主要是在上面幾個問題上互相辯難。

今天我們有幸見到出土的銘刻資料，能以當時的文字記載來認識古禮，應該比古人客觀一些。首先，從西周金文看，不但王有禘祭（如小孟鼎、鮮簋、刺鼎所記康王、穆王禘祭文王、武王、成王和昭王），諸侯和貴族也有各自對祖考的禘祭。大簋云：“賜芻羞，用啻於乃考”，是說王賞賜經過芻養的紅色公牛，用來禘祭“大”去世的父親。繁卣云：“公啻酺辛公祀。”是說“公”對去世的父親辛公行禘祭。顯然兩器銘所記的禘祭都不是王室之祭，說明諸侯貴族也可以在自家的祖廟裏舉行禘祭，“不王不禘”是後世制度。

其次，禘祭始祖在西周金文中沒有發現。相反，在西周金文中禘祭的對象都是近祖。記錄禘禮的銅器除小孟鼎是康王禘祭其三代先王之外，鮮簋、刺鼎為穆王禘祭其考昭王，大簋繁卣也是作器者禘祭其考大仲和辛公。

再有，禘禮在金文中不分祫，小孟鼎合禘文武成三代先王，並不稱“祫”。鮮簋、刺鼎、大簋、繁卣皆專禘其考，應屬特祭，也並不稱“祫”。所以鄭玄的“三年一



祫，五年一祫”並非“百王通義”，而可能是漢以後的制度。

鄭玄的“三祫”之說，也是靠不住的。金文祫祭全是以祖考為對象，不見祫天，也不見祫地。他所謂的“終王之祫”、“三年喪畢之祫”也與金文不合。鮮簋之祫行於穆王三十四年，小孟鼎之祫行於康王二十五年，早已超出三年喪的時限。至於祫不是四時之祭，在西周金文中更是十分明確的。鮮簋、刺鼎祫於五月，大簋祫在六月，小孟鼎祫於八月，繁卣祫在九月。由五月至九月，難以某個季度來概括。因此，祫不會是四時祭名之一，也不是某個特定時間纔舉行的祭禮。《周禮》的《大宗伯》、《司尊彝》、《公羊傳·桓公八年》、《小雅·天寶》也都不以祫入時祭，說明《禮記·王制》等所云的祫為時祭也是一種很晚的制度。

祫是對祖先的祭典，因此要在祖廟中舉行，小孟鼎云：“王在周廟”，指在周原的祖廟。刺鼎云：“用牡於大室”，大室在天亡簋中又稱“天室”，是祖廟中的主要建築之一，用來舉行各種典禮。鮮簋沒有講明祫祭的具體地點，只講在葦京，其地為鎬京附近的另一周都，金文中習見，內有辟雍大池等建築，也是周人宗廟所在之地。

文獻稱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小孟鼎云“用牲”，刺鼎云“用牡”，大簋云用“芻羊牯”，羊即騂、騂；赤色牲也<sup>⑦</sup>。牯，公牛也<sup>⑧</sup>。芻者，以芻莖養牛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生亦如之。”講的是祭祀先王要選用經過專門芻養的紅色公牛作犧牲。

《禮記·祭統》“古者於祫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鮮簋記王在祫後賜鮮“裸王珣、裸玉三品、貝二十朋。”刺鼎在祫後，王賜刺貝三十朋。繁卣在祫後，公賜繁宗彝和車馬，凡此祭祀地點、用牲、祫後之賞賜，文獻記載與金文相合。

晚期殷墟卜辭人王去世亦可稱“帝”，如“帝甲”（《後上》4.16）、“文武帝”（《前》4.27.3）等。“帝”字又有時作祭名，祫祀先公及舊臣。如“貞，帝于王亥”（《後上》19.1）、“戊戌卜，帝于黃□”（《林》1.11.6）。周人襲用了殷人的帝祭禮，並對其進行改造，使之成為周人最重要的祭祖禮。

周人行祫祭是為了強化宗的觀念。《禮記·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祫祭祖考，審序昭穆，是維繫宗統的重要手段。金文詳記宗統的銅器已發現兩件，一件是一九七六年陝西扶風出土的牆盤（《文物》1978年3期），其銘首述西周王室的譜系，文武成康昭穆逐一述及，這是大宗之統。然後詳述微史家族的譜系：高祖、刺祖、乙祖、亞祖辛、文考乙公等；另一件是宋代熙寧年間陝西扶風出土的姬寗母豆（《考古圖》5.15）：

姬寗母作太公、庸公、□公魯、仲馭、省伯、孝公、靜公豆，用漸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作器者姬寗母當為魯女嫁為齊婦，所記七代先祖與齊世家大宗有別，可能是齊國某



小宗的宗譜。這種宗譜在周人看來至關緊要，每次祭祀祖先時都要重新審視肯定一番，以免昭穆秩序發生混亂。

金文所記禘禮多行於西周前期（包括穆王），尤以穆王時代為盛，西周之後，此禮為歷代王者所尊崇，春秋戰國直至明代，史不絕書，盛祀不衰<sup>⑨</sup>。

## （二）衣

大豐簋（《三代》9.13）

乙亥，王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右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省，丕繇王作虘，丕克乞衣王祀。丁丑。王鄉，大宜……

此器又名“天亡簋”，現藏故宮博物院。過去把這件器叫作大豐簋，其實大後一字是“豐”字，“大豐”就是“大禮”。《周禮·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太禮。”銘中的“天亡右王”即大宗伯職之“詔相王”，天亡是作器者。“王凡（汎）三方”句說明此禮行於辟雍大池中。銘文大意是：武王衣祀其考文王，由於文王的保佑，武王繼承遺志，纔推翻了殷王朝。此器作於武王滅殷前後，銘中的“衣祀”是武王祭祀文王的“大禮”。

西周早期還有一件麥方尊（《西清》8.33）也記述了一次“大禮”：

王令辟邢侯出坏，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述。迨王饗葦京，酌祀，雩若翌日。在璧雍，王乘于舟，為大豐（禮），王射大尊禽……

與天亡簋一樣，此“大禮”也在辟雍大池中舉行，祭禮儀式是很隆重的。“衣祀”在金文中又稱“衣事”：

庚嬴鼎（《西清》3.39）

惟二十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王客琯宮，衣事，丁巳，王蔑庚嬴曆，易裸輶，貝十朋。對王休，用作寶簋。

繁卣（《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年）

公禘酌辛公祀，衣事，亡咎。

兩銘中的“衣事”都講的是對祖考祭祀的“大禮”，與天亡簋的“衣祀”相同。

陵叔鼎（《三代》3.4.2）

陵叔作衣寶彝。

陵叔作衣祀其祖考的寶彝，此鼎作於西周中期，說明在此時仍將祭祖大禮稱“衣祀”。《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因此《春秋》中的“大事”每與金文中的“衣事”、“衣祀”之大禮相合。《禮記·樂記》“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

衣，殷也，大也。《禮記·曾子問》“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孔疏：“殷祭謂大小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禮記·喪服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玄注：“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又劉熙《釋名·釋喪制》“朔望祭曰殷奠。”上舉庚嬴鼎的“衣祀”就行於“四月既望”日。

殷墟卜辭有衣祀的記載，多用於祭祀先王：

丁酉卜貞，王賓□自上甲至于武乙衣，亡尤：（《後上》20.3）

癸卯，王卜貞，酹翌日，自上甲至多毓衣，亡咎。自□，在九月。惟王五祀。  
（《後上》20.7）

在西周金文中，“衣”已不是某祀典的專用祭名，而泛指重大的祭祖禮，所以又可以稱為“殷祭”、“大事”、“大禮”、“衣事”等。

### （三）酹

麥方尊（《西清》8.33）

迨王饗莽京，酹祀，雩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為大豐。

金文敘事次序每致顛倒，這段話是說：王到莽京，在辟雍大池裏乘舟，舉行大禮。於第二天，又舉行酹祀。

繁卣（《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年）

惟九月初吉癸丑，公酹祀。雩旬又一日辛亥，公禘酹辛公祀，衣事，亡咎。

卣銘之“辛亥”可能是“癸亥”之誤<sup>⑩</sup>，癸丑至癸亥是十一天。方可稱“旬又一日”。這種記日法與王來奠新邑鼎（《文物》1963年3期）相同：

癸卯，王來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東……

癸卯至丁卯是二十四天，稱“二旬又四日”。繁卣銘的大意是：公準備禘祭其文考辛公。於九月初吉癸丑卜日，得旬又一日後的癸亥為祭日，于是在該日先禘後酹，祭奠了文考辛公。《周禮·天官·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享先王亦如之。”《周禮》所記王室享祀先王之禮與繁卣所記諸侯禘祭文考之禮，在前期十日以下取祭日這一點上相合。卣銘之禘酹連言，說明酹為禘後之“又祭”。

“酹”文獻作“繹”，《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祭之明日也。”《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尚書》有《高宗彤日》，彤即酹。殷墟卜辭之酹祀為祭祀先公先王祀典之一：

癸丑卜，賓貞，酹大甲，告于祖乙一牛。（《佚》115）

貞，來辛酉，酹王亥。（《釋》76）

對卜辭酹祀之內容，各家認識出入很大，陳夢家、于省吾認為是酒祭，唐蘭認為是

彡、翌<sup>①</sup>。殷代金文有戊寅鼎（《三代》3.37.3）言及酃祀：

戊寅，王口：𣎵，𠩺馬酃。易貝，用作父丁尊彝。亞受。

此鼎作器者應爲𣎵<sup>②</sup>，王后一字爲口，與曰同意<sup>③</sup>，馬前一字爲地名。銘文大意是：戊寅日，王說：𣎵，用𠩺馬作酃祀。王賞賜貝，用作父丁的尊彝。族名亞受。𣎵因參與酃祭受到王的賞賜。

總之，酃祭在殷墟卜辭和殷代金文中都已出現。是對祖先的祭禮。在西周金文中是祭祖禮的“又祭”，即在某祭祖禮的次日重祭一次。

#### （四）祿

獻侯鼎（《三代》3.50.2~3）

惟成王大業在宗周，賞獻侯鬲貝，用作丁侯尊彝。奄。

叔卣（《錄遺》161）

惟王業于宗周，王姜史叔使于大保。賞叔鬱鬯，白金，芻牛。叔對大保休。用作寶尊彝。

孟爵（《三代》16.41.3）

惟王初業于成周，王令孟寧鄧伯，賓貝，用作父寶尊彝。

圉卣（北京琉璃河 M253）

王業于成周，王易圉貝，用作寶尊彝。

矢令方彝（《三代》6.56.2）

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

明公易亢帥鬯、金、小牛，曰：用祿。易令鬯、金、小牛，曰：用祿……

歸卣進方鼎（《文物》1986年1期）

惟八月辰在乙亥，王在茅京，王易歸卣進金。肆業。對揚王休……

上述六器皆作於西周早期，說明祿禮盛行於西周早期。其實周人舉行祿祭的時間，還可以推得更早些。一九七七年春陝西周原地區出土一批卜骨<sup>④</sup>，在鳳雛村遺址 H11 的 84、112 兩片卜骨上就記有祿祭的內容：

貞，王其業又大甲，𠩺周方伯□？𣎵正，不左，于受有祐。（H11：84）

彝文武□。貞，王翌日乙酉，其業，𠩺武豐……（H11：112）

從其內容看，卜骨刻辭應作於文王受命至武王滅殷前這段時間，說明早在此時周人已有祿禮。業、祿其意爲祈求。瘳鐘（《文物》1978年3期）“用祿壽，介永命”。祿壽就是祈求長壽。殷墟卜辭中記祿祀多條，如祿年、祿雨、祿生等<sup>⑤</sup>，意爲祈求豐收、雨水、生育等，被祈求的對象則多是先王、先公和先妣。

西周金文中的祿禮多行於宗周或成周等都城內，並不指明祿祭的對象和祿求的具體

內容，往往以此禮作為紀年的標誌，說明禘禮在入西周以後，較殷與先周已有了較大發展。成為周人祭祖的重要禮儀了。

### （五）饗

臣辰盃、卣（《三代》14.12.2；13.44.1~2）

惟王大禽于宗周，饗茅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及史寅寢于成周，昔百生豚，眾賞卣鬯、貝。用作父癸寶尊彝。臣辰册册。

此銘以在茅京的饗禮為紀年標誌，器作於西周早期。

呂方鼎（《三代》4.22.1）

惟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饗大室，呂征于大室，王易呂獸三卣，貝三十朋。對揚王休，用作寶彝，子子孫孫永用。

此銘記饗禮在大室中舉行，器作於西周穆王時。

高卣蓋（《嘯堂》41.4）

惟十又二月，王初饗旁，惟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

此器亦以饗禮為紀年標誌，器作於西周早期。

對饗字諸大家均有考證，然尚未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郭沫若考其為館，云：“由二器（指呂鼎、臣辰盃）之辭旨與文字之結構以推之，當是古之館字，從食宛，宛亦聲也。”<sup>⑩</sup>陳夢家云：“疑為居字，字從門從食，從彐得聲。後者《說文》以為即《詩》我姑酌後金罍之姑。”<sup>⑪</sup>于省吾以為是甲骨文智字，云：“甲骨文智祭同於周人饗祭，但不知其詳。”<sup>⑫</sup>唐蘭以為是裸，云：“當讀為裸，《說文》裸，灌祭也。《詩·文王》裸將於京，即饗茅京之事。《書·洛誥》王入太室裸，即饗於大室。”<sup>⑬</sup>

按呂鼎云王饗大室，大室即天室，乃宗廟中的建築，應用於行祭禮為宜。因此釋館釋居的可能性不大。金文已有裸字作𠂔，所以此字釋裸也不確切。于先生以甲骨文智為饗祭，蓋以兩字聲符相同，可以通假，可備一說。

戊嗣子鼎（《考古學報》1960年1期）

丙午，王賞戊嗣子貝二十朋，在廟室，用作父癸寶彝。惟王饗廟大室，在九月。

此鼎出土於安陽後崗圓坑葬中，是殷末銅器。與殷墟卜骨屬同時之物，而其饗字寫法與西周金文全同。

上述各器於饗禮敘述十分簡略，若要弄清其含義，尚需借鑑沈子它簋（《三代》9.38.1）：

它曰：拜，稽首。敢眡昭告朕，考，命乃鵠沈子作紂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紂，休同公克成綏考以于顯顯受命。

銘中作紂之紂就是饗祭之饗的同音假借字，沈子它是周公的後人，於周公廟中作紂

祭，其目的是“陟二公”。陟者昇也，即將二公在宗廟中的位置依昭穆昇上去。二公應是沈子它的兩位未毀廟的先祖，很可能是其祖父、曾祖二公。《公羊傳·文公二年》“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昇，合食於大祖。”因為是合食之祭，故其祭名又可以寫作從食之饗。二公又稱休同公，曾使沈子它死去的父親（咎考）於顯顯受命，所以沈子它不敢不饗祭二公。這實際是一種調整宗廟次序的祭禮。沈子它之父新死，其神主要按昭穆祔入宗廟，其祖父、曾祖的神主也要按昭穆遞昇一級，這樣驚擾祖先神靈的舉動，當然應該舉行一次祭奠儀式。

因為饗禮是新死之父祔入宗廟的大典，所以王室饗禮可用為紀年的標誌。又王室饗禮必行於父王去世，新王繼位之時，所以凡金文記王室饗禮者等於記某王元年。驗之記饗禮諸器，皆不見記年，正說明記饗禮即記元年。這樣就又找到了一個銅器斷代的標準。依饗禮行於元年這個標準，戊嗣子鼎作於帝辛元年九月丙午日，高卣蓋作於康王元年十二月庚申日，臣辰盃卣作於昭王元年五月既望辛酉日，呂方鼎作於穆王元年等等。這一標準若能成立，可以使銅器斷代多出一個客觀標準，並將加深我們對西周前期曆法的認識。

#### （六）告

矢令方彝（《三代》6.56.2）

惟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官，公令佻同卿事寮……

銘文大意是：八月甲申日，王命周公的兒子明保掌管三事（指司土、司馬、司空）和四方諸侯，並任卿事寮的長官，三天後丁亥日，明保命史官矢在周公廟裏行告祭，將被周王任命一事告於周公神靈，周公之“尸”代周公宣佈接受這一任命……。周人祭禮特點之一是設“尸”。《禮記·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在祭禮中是祖先的化身，《禮記·郊特牲》“尸，神像也。”在祭禮中他穿上祖先的遺服，接受祭品和祝辭，祖先的嘏辭也由他轉達。《周禮·春官·守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各以其服授尸。”《禮記·祭義》“君獻尸”。《禮記·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尸亦餽鬼神之餘也。”只有明瞭周人祭禮設尸的制度，纔能明白此方彝銘中已去世的周公何以能應答王對子孫的任命。

麥方尊（《西清》8.33）

王令辟邢侯出坏侯于邢，季若二月，侯見于宗周……惟歸，遲天子休，告亡尤。

方尊銘記麥的君侯去宗周朝見周王，被封為邢侯。返國後舉行告祭。《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文獻所記與麥方尊銘所記合，邢侯返國設奠告廟，乃禮制

要求必行的。

沈子它簋（《三代》9.38.1）

它曰：拜，稽首。敢眚昭告朕考，命乃牖沈子作紂于周公宗。陟二公。

簋銘記述了沈子它對其去世的父親（考）所作的告辭。

《書·金縢》記載了一次周公的告祭：“既克商二年，王（武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威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亡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告。啓籥見書，乃並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這裏記錄了周公告祭三代先王，欲以身代武王應天之責的故事，文中的“設壇立墀”、“植璧秉珪”、“祝辭於冊”、“三卜於龜”、“啓籥見書”、“納冊於匱”等，細緻的記述了告祭禮的過程，可補充僅祇錄出告辭的金文的内容。

告祭在殷墟卜辭中有許多記載，有告麥、告疾、告戰事等，所告對象多爲先王。西周金文記錄了周人沿襲此禮的情景，而諸侯返國告廟之祭在文獻中多有記載，是知此禮在西周以後還延續了很長時間。<sup>②</sup>

## （七）禦

作冊彝卣（《三代》13.46.1）

作冊彝作父辛寶尊，厥名曰義。子孫不祿，彝子征先盡死亡，子弘有孫不敢梯鯀兄。鑄彝，用作大禦于厥祖妣父母多神。母念哉？未勿致彝鯀寡遺祠，石宗不剝。

此卣原銘爲“作冊彝作父辛尊，厥名義曰子孫寶不祿……”其中“曰”、“寶”兩字位置顯然錯亂，“寶尊”，乃金文常語，故寶字應調至尊字前面。“義”字是作器者爲卣所起名號。此種做法銘刻資料中習見，如秦公鐘“作盥和鐘，厥名曰昔邦”、（《考古圖》卷七）懷石磬“厥名曰懷石”（《考古圖》卷七）等等，都與此銘相同，故曰、義兩字應互調。《禮記·曲禮下》“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作冊彝子孫連遭短折不幸，因而鑄彝作大禦，祭於祖父母、父母多神在天之靈。不惦念嗎？請攘除對彝殘餘後代的欺侮。只有這樣，祖妣父母的石宗纔能不被剷除。《左傳·莊公十四年》鄭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是宗廟中藏神主之石室，銘中的石宗即此宗祏。



此器銘所記禦祭是作器者為攘除災難對祖先舉行的祭典。

奭尊（現藏瑞典遠東古物館）

奭啓謀為禦，作父甲旅尊彝。

耳卣觶（《三代》14.53.9）

耳卣作禦父辛。

上兩器皆作於西周早期，西周金文此祭名一律寫作“禦”，稱“為禦”、“作禦”、“作大禦”。《說文》“禦，祀也”。《禮記·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易·蒙》“利禦寇”。“禦”有“抵拒”、“止息”等意。周原甲骨（H11：1）：

癸巳，彝文武帝乙卣，貞王其為祭成唐鼎。禦艮二母，其彝血，豕三豚三？<sup>④</sup>  
有正。

此辭貞問王作祭祀成湯的鼎，禦艮二母，鼎彝彝以三公羊、三小猪的血是否合宜？得到肯定答復。鼎彝彝血文獻稱為“彝邦器”。《周禮·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於社稷……凡沈辜侯禋飾其牲，彝邦器”。此卜辭約作於文武之際，所記禦祭與西周金文相同。殷末金文我方鼎（《三代》4.21.1）也記有禦祭，與上述周原卜骨內容相似：

我作禦<sup>𠄎</sup>祖乙、妣乙，祖己、妣癸。征<sup>𠄎</sup>二母……

銘中“二母”應指妣乙、妣癸，是作器者的二位先妣。同例周原甲骨中的“二母”也應是兩位先妣<sup>⑤</sup>。殷墟卜辭禦祭寫作御：

貞，于羌甲御，克生<sup>𠄎</sup>。（乙1394）

乙亥卜，賓貞，作大御，自上甲。（後下6.12）

己亥卜，賓貞，御于南庚。（前1.13.2）

御婦鼠子于妣己，允有龍。（續1.39.4）

第一例是說禦祭於羌甲，可以攘除疾病。第四例是說禦祭於妣己，以攘除婦鼠不育之症，就可以得到王的寵愛。因此，“禦”在甲骨文中，也是一種為祓除不祥而向祖妣所作的祭祀。這種祭祀直至周厲王時在金文中仍有記錄：

猷簋（《文物》1979年4期）

猷其萬年鬻實朕多禦。

五祀猷鐘（《人文雜誌》1983年2期）

猷其萬年，永峻尹四方，保大命，作甞在下，邇，大福其各。

兩器中的“猷”就是周厲王胡，“多禦”指多次的禦祭。“邇，大福其各”，是說舉行禦祭。攘除了不祥，大福就會降臨。

#### （八）𠄎

師鬲鼎（《文物》1975年8期）



𣪠蔑曆伯大師，不自作小子，夙夕敷古先祖刺德，用臣皇辟。伯亦克𣪠古先祖，壘孫子一嗣皇辟懿德，用保王身。

此器作於孝王前後，銘文大意是：作器者𣪠雖因伯大師而受到王的獎賞，但不自以為了不起，仍然日夜發揚故先祖的美德，臣事偉大的上司。伯大師也能𣪠祀故先祖，衆孫輩後代都能繼承偉大上司美德，以保王身。

𣪠即𣪠字，《說文》“𣪠，塞也，從宀𣪠聲”。《漢書·郊祀誌》“冬塞禱祠”，顏注：“塞謂報其所祈也。”徐灝《說文段注》箋“蓋有所祈禱，許以牲醴相報，自實其言。故謂之塞也。”<sup>②</sup>殷墟卜辭及殷金文中都有𣪠祭，如：

庚辰卜，即貞，王賓兄庚日𣪠亡尤。（後上 7.8）

我方鼎（《三代》4.21.1）

我作禦𣪠祖乙、妣乙，祖己、妣癸，𠂔𣪠二母……

𣪠在我方鼎中寫作𣪠，其含意相同。這種以報塞先祖妣為內容的𣪠祭，在殷代已出現。而在西周中期的師𣪠鼎中仍有記載，是一種延續時間很長的祭典。

### （九）報

西周金文中報祭僅兩見：

矢令簋（《三代》9.26.2）

令敢揚皇王休，丁公文報，用稽後人享，惟丁公報……用作丁公寶簋。

丁公是作器者令的父親，銘中兩次提到報祭丁公。“文報”指有文彩的報祭。《書·洛誥》“祀於新邑，咸秩無文”。《風俗通·山澤》“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sup>③</sup>可見報祭分有文之報和無文之報兩種。作器者令受到王姜重賞，他認為這是因為去世父親丁公保佑的結果，因此作器設祭以報答丁公。

師𣪠鼎（《文物》1975年8期）

𣪠敢對王休，用妥，作公上父尊于朕考庸季易父報宗。

報宗即報祭宗廟。《國語·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從西周金文內容看，沒有發現報祭高圉、大王等先祖的記載。矢令簋乃矢令報祭其考丁公，師𣪠鼎是師𣪠報祭其考庸季易父，都是報祭近祖。《詩·周頌·維清》是一篇記敘周人因豐收而報祭祖妣的樂歌。其辭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詩中報祭的對象，也僅止祖妣而已，並不見報祭遠祖者。殷墟卜辭報祭之報寫作𠂔、𠂔等。如“其𠂔於祖乙”。（丙 60）與西周金文近似。都是為了答謝祖先保佑之恩而設的祭典。

## (十) 翟

史喜鼎（《泉遺》78）

史喜作朕文考翟祭，厥日惟乙。

西周金文翟祭僅此一見。楊樹達、唐蘭皆以聲訓定其為禴祭，其說頗為曲折。<sup>②</sup>按《說文》“翟，山雉長尾者”。《周禮·春官·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干舞、有人舞”。祭祖例有樂舞，《周禮·春官·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這是說王室祭祖用武王伐紂的“大武”樂舞。史喜是位史官，在祭其祖考時當然不能用“大武”之類盛大的樂舞，而祇能用“小舞”。翟祭有可能是翟舞之祭，翟舞應屬小舞中的羽舞。此祭典強調樂舞，並以樂舞之名為祭名，這與甲骨、金文中的燎、禋、血等祭名一樣，都是以祭祀方法來命名的。

## (十一) 禋

牆盤（《文物》1978年3期）

亞祖祖辛，竄毓子孫，緜髮多孳，濟角鬯光，義其禋祀。

牆在稱頌其祖先時提到禋祀，西周金文中僅此一見。《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於太室裸”。《韓詩外傳》“天子奉玉，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禋祀就是牲上加玉，以柴焚之令生煙，上達天廷，至於祖先之所的祭祖禮。

春秋末年有兩件銅器也記有禋祀：

哀成叔鼎（《文物》1981年7期）

哀成叔之鼎，永用禋祀。死于下土，以事康公，勿或能飢。

蔡侯盤（《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1956）

禋享是以。

《說文》“煙，火氣也……禋，籀文從火。”《說文》籀文之禋與哀成叔鼎禋祀之禋寫法全同。蓋這種祭祀的特點就是焚燒牲玉令其生煙，以祭於先祖。

## (十二) 燎

小孟鼎（《三代》4.44~45）

孟以人馘入門，獻西旅，□□入燎周廟……

庸伯馭簋（《三代》8.50.4）

惟王伐逖魚：征伐淖黑。至，燎于宗周。易庸伯馭貝十朋。

兩器皆作於西周早期，講的是孟和庸伯打了勝仗，凱旋後獻馘告廟，燎祭祖先。因為二人都是受王命出征的，所以要在周廟或宗周舉行燎祭。這種在宗廟中舉行的燎祭，當然是祭祀王的祖先。因此燎在西周金文中是祭祖禮之一。

周原甲骨也記有燎祭：

其𠬪，楚人其燎，師氏受燎。(H11: 4)

燎於河。(H11: 30)

第一辭有“師氏受燎”句，與小孟鼎、庸伯匚簋一樣，說明此辭也講的是有關軍旅之事。殷墟卜辭燎祭內容比較廣泛，有燎於夔、王亥、鳳、土、旬、河、蚺、東母等，其中有祖神，也有自然神。<sup>⑤</sup>

### (十三) 𠬪

子尊（《文物》1986年1期）

乙卯，子見在大室，伯□□琅九、𠬪百牢。王賞子黃瓚一、貝百朋……𡗗。

西周金文記𠬪祭者僅此一見。作器者子在宗廟大室中覲見周王，獻納玉石九品並獻納𠬪祭用的犧牲百牢。王則賞賜他瓚一件，貨貝百朋。從銘末族名看，作器者子是殷遺民，其爵稱為伯。玉及百牢是向周王繳納的貢品。《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鄭玄注：“祀貢，犧牲苞茅之屬。”《周禮·秋官·大行人》“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此尊作於西周早期，其時殷遺民已負有向周王納貢的義務了。周王回賜瓚及百朋貝，在周初也是價值很高的禮品。說明殷遺納貢的主要意義在於表示臣服，經濟上的剝削還在其次。

殷墟卜辭中的𠬪祭次數很多。主要用於祭祀先公先王：

貞，𠬪于王亥，四十牛。辛亥……（前4.8.3）

甲寅卜，𠬪貞，𠬪于唐，一牛。其𠬪……（前1.47.1）

𠬪于南庚，𠬪小宰。（前1.14.1）

辛巳卜，犬貞，𠬪自上甲元示，三牛；二示，二牛。十三月。（前3.22.6）

殷墟卜辭𠬪、又皆為祭名，其義與文獻之右、侑相近。《詩·周頌·我將》“我將我享，維牛維羊，維天其右之。”箋：“神享其德而助之。”以牛羊將享祖先，以祈祖先享其德而祐助之，這大概就是𠬪祭名的含義。

### (十四) 牢

貉子卣（《三代》13.41.1~2）

惟正月丁丑，王各于呂毳，王牢于厥，咸宜。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三。

銘文大意是：在正月丁丑日，王到呂毳，牢祭於厥，一切順利。王命士道送給貉子

三隻鹿。

呂伯簋（《西清》27.11~12）

呂伯作厥官室寶尊彝簋，大牢，其萬年祀厥祖考。

此簋形制紋飾近於班簋，作器者呂伯亦見於班簋。應與班簋同為穆王時器。又貉子卣云“王各呂毳”，貉子也應與呂地之君有關，幾件器可以聯繫起來考慮，時代大約都在穆王前後。呂伯簋講“大牢”是“萬年祀厥祖考”。《儀禮》有《少牢饋食禮》，講的是諸侯之卿大夫祭祀祖考於廟。是知牢祭尚有“大牢”與“少牢”之分。蓋牢作為名詞指牢養的牛羊豕等牲物，用為祭祀則指以牲物祭祖。殷墟卜辭也有牢祭：

貞，牢，王受又，吉。（佚310）

貞，牢新𠄎小乙。（林1.26.4）

殷墟卜辭之牢祭與西周金文之牢祭類似，皆為祭祖禮之一。

### （十五）饔

大豐簋（《三代》9.13）

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省，丕緡王作庥，丕克乞衣王祀。

劉心源、陳夢家都認為銘中之喜應讀作“饔”或“糒”，乃祭名之一。<sup>⑤</sup>陳夢家云：“喜應讀作《商頌·玄鳥》‘大糒是烝’之糒。釋文引韓詩云：大糒，大祭也。”《說文》“饔，酒食也。”又云：“糒，饔或從米。”“事喜上帝”，就是以酒食祭奠上帝。此銘的上帝從上下文義看，就是“丕顯考文王”。《禮記·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在上之帝則可稱上帝。因為文王監在上，故稱文王為上帝，這是周人特有的祖神觀念。因此我們把饔祭也列入祭祖禮之中。

殷墟卜辭有烹祭，或以為與周之饔祭相同。如：“吏祖乙烹用”。（後上21.13）亦可備一說。

### （十六）饗

嘏士卿尊（《三代》11.32.7）

丁巳，王在新邑，初饗。王易嘏士卿貝朋。用作父戊尊彝。子𠄎。

此祭名西周金文中僅一見。尊出土於洛陽，作於成周新建成仍稱新邑之時，是西周早期器。過去將此字讀為“饗工”兩字。《金文編》將下面部分入“工”字。現在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館收藏的玉戈銘，可以糾正這個長期沿襲的錯誤。早在四十年代陳夢家先生就發現了這件玉戈。他說：“昔年在哈佛福格博物館見一玉戈，亦刻銘一行，花文行款地位相同，而是殷末之物。”<sup>⑥</sup>李學勤同志近年赴美尋蹤查訪了這件玉戈，

並作了摹本<sup>②</sup>。其文如下：

曰饌王大乙，在替，俞殳。

王太乙即商王成湯，說明饌是商王室祭祖祀典之一。殷墟卜辭有饌祭，祭名與此相近。僅下部缺“生”。如“丙辰貞，𠂔𠂔王亥。其饌，自祖乙至多口。”（南明 572）也可能是同一祀典的祭名。敲土卿尊所記周王在新邑的“初饌”，是周人襲用殷人的祀典來祭祀祖考的有力證明。從銘末族名看，敲土卿是殷遺民，他很有可能是因為幫助周王完成這次祭祀活動而受到獎賞的。

### （十七）禴

臣辰盃、卣（《三代》14.12.2；13.44.1~2）。

惟王大龠于宗周侂饗莽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眾史寅寢于成周……

金文之龠就是文獻中的禴祭，《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這是說禴祭不用殺牲。《通鑑前編》卷五引《竹書紀年》“（帝辛）六年，周文王初禴於畢。”殷墟卜辭禴祭也寫作龠：

□□卜，旅貞，王賓小乙𠂔龠𠂔，亡尤。（後上 4.3）

戊辰卜，旅貞，王賓大丁𠂔龠農，亡尤。在十一月。（戠 2.9）

從殷墟卜辭看，龠為殷人祭祖禮之一。周人沿用殷禮，也應用以祭祖。臣辰盃銘第一句以“龠於宗周”和“侂饗莽京”為並列的紀年標誌，如上述饗是父考祔入宗廟的大典，盃銘龠稱“大龠”，也應是祭祖禮中較重要者。

### （十八）嘗

六年召伯虎簋（《三代》9.21.1）

惟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莽……用作朕刺祖召公嘗簋……用享于宗。

姬鼎（《三代》4.9.2）

用禘用嘗，用孝用享，用介眉壽無疆。

兩器都是西周晚期器，此祭名不見於殷代銘刻資料，也不見於西周早期和中期金文，可能是周人在西周晚期新設的祭祖禮儀。《詩·魯頌·閟宮》“秋而載嘗，夏而禘衡。”《左傳·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稟災。乙亥，嘗。”《周禮·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文獻皆以嘗為時享之一，蓋取秋季農作物收穫，以新谷薦於宗廟，使先祖嘗新之意。嘗為享祀先王之祭，文獻與金文相合。然是否時祭，在金文中却得不到肯定的證明。召伯虎簋作於四月，却用以嘗祭刺祖，似乎可以成為反證。上述稱“秋嘗”的文獻多作於春秋戰國間，可能此禮在春秋戰國後纔成為時祭之一。

此祭典在金文中延至春秋戰國銅器上仍有記載：

墜侯午敦（《三代》8.42.1~2）

惟十又四年，墜侯午以羣諸侯獻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罇罇，以登以嘗，保又齊邦，永世不忘。

戰國晚期此祭名楚系文字又寫作“棠”：

禽肫鼎（《三代》3.25.1~4）

楚王禽肫作鑄鉞鼎，以共歲棠。

禽肫盤（《三代》17.5.2~6.1）

楚王禽肫作為盥盤，以共歲棠。

無錫前洲出土的邾陵君鑑、豆（《文物》1980年8期）也有“以共歲棠”、“攸立歲棠”等，棠即嘗祭之嘗。

### （十九）烝

大盂鼎（《三代》4.42~43）

獻酒不敢醺，有崇糞祀無敢醺……夙夕紹我一人，登四方，享我其適省先王，受民受疆土。

銘中的“糞祀”、“登四方”皆指烝祀，這是一篇康王對孟的酒誥，要其汲取殷人酗酒亡國的教訓，在烝祭先祖時也不能借故大肆飲酒。

高卣蓋（《嘯堂》41.4）

惟十又二月，王初饗旁。惟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登，咸。

段簋（《三代》8.54.1）

惟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在畢登。戊辰，曾。

姬鼎（《三代》4.9.2）

用禋用嘗，用孝用享。

大師盧豆（《三代》10.47.5）

大師盧作糞尊豆，以卨洛朕文祖考。

大盂鼎、高卣蓋是西周早期器，段簋是西周中期器，姬鼎、大師盧豆是西周晚期器。此種祭典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像墜侯午敦“以登以嘗”，“登”即“糞”，亦即烝祭。殷墟卜辭烝祭作𠄎或𠄎，如：

貞；王賓般庚𠄎。（前1.15.6）

其𠄎兄辛。（後上7.10）

□亥，𠄎于祖乙。（林1.26.17）

也是殷代祭祖禮之一，這說明烝祀自殷至兩周相沿盛祀不衰。《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左傳·桓公五年》“閉蟄而烝。”



《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入獻禽，以享烝。”文獻以冬祭爲烝，有烝祭不以時者，春秋筆法削伐之如《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穀梁傳》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又《春秋·桓公八年》“夏五月丁丑，烝。”《穀梁傳》曰：“黷祀也，志不敬也。”《爾雅·釋天》“冬祭曰烝。”郭璞注曰：“進品物也。”據《周禮·大司馬》烝祭用田狩之野牲、而《洛誥》云烝祭用騂牛，乃豢養之芻牛。殷墟卜辭及金文之烝祭字多作𠂔或𠂔，乃雙手持豆，豆中盛米狀。與文獻所云或有出入。然皆爲祭祖先、進品物則是一致的。

文獻所謂“時享”。四時祭名歧說衆多。《禮記》的《祭統》、《王制》等以爲是春杓、夏禘。秋嘗、冬烝。《周禮》的《大宗伯》、《司尊彝》，《詩·天寶》，《公羊傳·桓公八年》，《春秋繁露》等認爲是春祠、夏杓（禴）、秋嘗、冬烝。西周金文中不見杓祭。殷墟卜辭有禴祭。殷金文（我方鼎）有杓祭，似乎看不出其祭典集中安排在那個季度的傾向。西周金文中也不見祠祭，但周原甲骨中有兩片言及祠祭：

祠自蒿于豐（H11：20）

祠自蒿于周（H11：117）

東周金文中有祠祭的記載。如趙孟壺（《河南吉金圖志賸稿》20）“以爲祠器。”壺銘記魯哀公十三年吳晉黃池之會，是春秋末年器。中山王墓出土的蚤壺（《文物》1979年1期）有“敬命新地，雨祠先王”句，器作於戰國初年。從上述資料看，文獻所言“時享”的幾種祭名，在銘刻資料中都有記載，且都是祭祀先祖的祭典，但尚看不出它們與四季有什麼聯繫。這種以四季劃分的祭祖禮，可能是春秋戰國間形成的，殷與西周還不存在四季定時享祀先祖的制度。

## （二十）闕

《禮記·月令·中春之月》曰：“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禴。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高禴前。”這裏說的是王室祈子之祭，《魯頌·闕宮》“闕宮有恤，實實枚枚”。毛傳曰：“先妣姜嫄之廟。”又引孟仲子曰：“是禴宮也。”周人祭祀高禴神要在闕宮中進行。高禴神卹憫周人，使其子子孫孫實實枚枚繁衍不斷。西周金文沒有高禴的記載，但有闕祀和闕宮的記載：

頂卣（《錄遺》272）

頂作母辛尊彝，頂易婦嫄曰：用鬯于乃姑宐。

子卣（《三代》13.35）

子作婦姁彝，母子母庚宐祀尊彝。𠂔。

兩器中的“宐”即文獻中的“闕”。第一器頂爲子，婦嫄乃其妻，母辛乃頂之母，婦嫄之姑，作卣宐祀母辛。第二器婦姁爲子之妻，作卣用以宐祀母庚。兩器皆作於西周



早期，銘文記載了西周的高禘祭。《閼宮》所記與金文合，高禘祭行於閼宮，在周人是由來已久的。從西周金文看，祭祀高禘由妃婦單獨進行，閼祀的對象也不必是先妣姜嫄，而往往是“先姑”。<sup>②</sup>這與周人祭祖重近祖的習俗一樣，祈求繁衍子孫也只是向近世的先姑神求告。殷人先妣之廟稱“必”，如“于妣辛必，王此”。（京津 4092）殷人之“必”，周人之“宓”，大概就是《魯頌》之“閼宮”。而《月令》《毛傳》所講的情況可能是春秋戰國以後的制度。彼時列國皆有各自的高禘祭所。《墨子·明鬼》“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閼祀高禘神係對先妣（對婦來說是先姑）的祭典，因與祭祖禮類似，姑附於此。

綜上所述，列表如下：

祭名	殷墟卜辭	殷金文	周原甲骨	西周前期金文	西周後期金文	春秋戰國金文
禘	△			小孟鼎 鮮簋 刺鼎 繁卣 大簋		
衣	△			大豐簋 庚嬴鼎 繁卣	陵叔鼎	
酺	△	戊寅鼎		麥方尊 繁卣		
祿	△		△	獻侯鼎 叔卣 孟爵 圉卣 矢令方彝 歸卣進方鼎		
饗		戊嗣子鼎		臣辰盃卣 呂方鼎 高卣蓋 沈子它簋		
告	△			矢令方彝 麥方尊 沈子它簋		
饗	△	我方鼎	△	作冊 癸卣 夷尊 耳口觶	猷簋 五祀猷鐘	
叙	△	我方鼎			師鬲鼎	
報	△			矢令簋	師鬲鼎	
翟					史喜鼎	
裡					墻盤	哀成叔鼎蔡侯盤
燎	△		△	小孟鼎 庸伯馭簋		
虫	△			子尊		
牢	△			貉子卣 呂伯簋		
饗	△			大豐簋		
饗		（玉戈銘）		敝土卿尊		
禴	△			臣辰盃、卣		
嘗					六年召伯虎簋 姬鼎	墜侯午敦 齊肅鼎 盤 邾陵君鑑、豆
烝	△			大孟鼎 高卣蓋	段簋 姬鼎 大師盧豆	墜侯午敦
閼	△			頂卣 子卣		

說明：成王至穆王為西周前期，恭王至幽王為西周後期。

上述二十種不同的祭名，有的反映祭祀目的不同，如禘、饗、饗、釁、報等；有的反映祭祀方法的不同，如告、禋、燎、翟、饗、饗、嘗、烝、闕等。有的一件銘文中記有兩三種祭典，但其大致內容是可以區分開的。上述祭禮有的不專用於祭祖，如

班簋（《西清》13.12；《文物》1972年9期）

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御□人伐東國疇戎……三年靜東國，亡不咸旻天畏，否卑屯陟。公告厥事于上：惟民亡咎才（哉）！彝恣天命，故亡。允才顯，惟敬德亡迺違。

這是一篇毛公告祭上天的告辭：由於東國疇戎違背天命，故遭到滅亡。只有敬德纔能不背離天命。

何尊（《文物》1976年1期）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

這裏記錄的是武王克商以後告祭於天的告辭，成王用以動員周貴族遷都洛邑。周原甲骨也有告祭於天的記載：“□告於天，亡咎。”（H11：96）。上述告祭的對象不是先祖，而是“天”，說明告禮在西周不只用於祭祖，是一種使用比較廣泛的祭禮。又比如大孟鼎有“豎四方”的記載，說明烝禮也不是專用於祭祖的，也可以用來烝祀“四方”。由於金文內容的局限，對西周各種祭祖禮的祭法、祭義缺乏詳盡的說明，目前尚無法如甲骨文那樣排出周人的祀譜。我們對各種祭祖禮中的複雜關係，所知也是極膚淺的，這裏所作的僅只是弄清這二十種祭祖禮的大概含義而已。

從上表可以看出，除翟、禋、嘗三種次要祭禮外，其餘十七種祭祖禮都是殷周同名。這正如孔子所說的“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其中禘、饗、燎三種重要祀典在周原甲骨中已有記載，說明早在文武創業時，已有意利用殷人禮儀。《書·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周初幾乎全盤繼承了殷人祭祖禮儀的名稱，但周人並非照搬硬套，他們在運用時是有所改造的。周人的嫡庶、尊卑、親盡毀廟等制度在祭祖禮中是有反映的，綜觀二十種祭祖禮，所祭對象沒有超出三代者，這與殷人徧祀先公先王的制度明顯不同。再有，禘與饗在殷代是較次要的祭禮，而在西周却被改造成祭祖大典，出現次數較多，有的竟可以作大事紀年的事件。燎祭在殷代使用極為頻繁，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祭典。而在西周金文中出現次數較少，且多關乎軍旅之事，好像除在戰爭凱旋後祭祖時使用外，其他場合很少使用。再有，禘禮不言祈求的對象及具體內容，祭祀用牲尚赤，祭典用尸、祝等都是周人祭祖禮獨自創設的。

從上表還可以看出，十七種殷周同名的祭祖禮，大多盛行於穆王以前，這反映出僻居西偏的周人入主中原後，面對在文化上大大高出於自己的殷遺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採取大量襲用殷禮的政策，並利用殷遺民中的知識階層為其服務。穆王以後，周政權穩定下來，纔逐步形成自己的禮儀系統。這正如《白虎通》所云：“王者始起，何用正

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製作焉。”

## 二 周王室的祭祖禮儀

先秦文獻沒給我們留下祭祖禮儀的系統記載，王國維說：“周之祭法，詩書禮經，皆無明文。”<sup>⑩</sup>《禮記·郊特牲》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這是就祭祀目的而言，有祈求、報塞和禳祓。祭祀目的和名稱不同，其儀節自然也應不同。但是銘刻資料對每種祭禮的記述十分簡略，要想逐個弄清諸祭典的儀節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裏所作的是試對周王室祭祖禮的一般儀節作些描述。周人的祭祖禮大體分三個部分：

### （一）祭前準備

爲了表示對祖神的敬意，供享的祭品如犧牲、玉帛、粢盛、酒醴、瓜果都要由王及后妃親自生產。《禮記·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共純服。”令鼎（《三代》4.27）“王大藉農於諶田。”《國語·周語》記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大發議論，對古代天子親耕藉田制度作了詳細的描述。

祭祀典禮要有各種祭器陳列，西周青銅器每自銘“尊彝”、“祭器”、“醴壺”等，多數曾作爲禮器置於宗廟，用於祭祀。陝西扶風出土的一對伯公父勺（《文物》1978年11期）云：“伯公父作金爵，用獻用酌，用享用孝於朕皇祖考。”自銘其用途爲祭祖。

《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周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大祭祀供其玉器而奉之。”金文賞賜之隆重者，每以圭瓚璋等禮玉及醴酒爲賜，如呂方鼎“王易呂獸三卣。”鮮簋“鮮蔑曆，裸玉璋，裸玉三品。貝百朋。”子尊“王賞子黃瓚一，貝百朋。”王賜貴族祭禮用的玉器及酒醴等於降賜其祭祀權，故此類賜品需列於諸賜品之首，以示尊貴。

周人祭禮要設“尸”和“祝”，祝爲典禮中的主持人，王對先祖的祝辭由他禱告，祖神對人間的嘏辭也由他宣讀。《禮記·禮運》“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他是一位能交通神人的巫者。西周金文職官有大祝和祝，西周初年的大祝禽鼎（《三代》2.41.5）就記載周公子伯禽作過大祝。西周金文中還有“五邑祝”，“九盤祝”等<sup>⑪</sup>。由祝頌禱的祝嘏之辭，在西周金文中隨處可見：

汧其鼎（《陝西青銅器圖釋》69）

用漸多福，眉壽無疆，畯臣天子。

啓卣（《文物》1972年5期）

用介魯福。

癸鐘（《文物》1978年3期）

用祿壽，介永命。

虢簋（《文物》1973年5期）

用易眉壽、黃耆、霽冬。

鮮鐘（《陝西青銅器圖釋》126）

用降多福。

周人祭祖禮必先設“尸”，穿上被祭先祖的遺服，充當神象。一切祭奠禮儀均圍繞他來進行。祝所作祝辭和嘏辭都以他為中介。金文中沒發現直接記錄尸活動者，但從矢令方彝銘中可以感到尸的存在。

祭日要通過占卜來選定，《周禮·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繁卣記九月初吉癸丑卜日，得旬又一日後的癸亥為祭日。《周禮·師氏》“凡祭祀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名服守王之門外且蹕。”師酉簋（《三代》9.21.2）“嗣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夷、隳夷、秦夷、京夷、畀身夷。”靜簋（《三代》6.55.2）“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銘中的夷僕和諸夷人即師氏所轄的“四夷之隸”。在祭禮中負責駐蹕、守衛、戒嚴等事。《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告備”之後祭禮即可正式開始了。

## （二）主要儀節

《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昇歌，舞莫重於舞宿夜。此周道也。”這是對周代祭禮的簡要概括。獻裸是指以清酒飲尸者，《書·洛誥》“王入太室裸。”《禮記·祭統》“君執圭瓚裸尸。”伯公父匚也說：“用獻用酌，用享用孝於朕皇祖考。”樂歌則貫串整個祭禮過程，《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周禮·太師》“大祭祀率瞽登歌，令奏擊拊。”作樂歌可以降神，《周禮·大司樂》“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青銅樂器編鐘編鐃多為祭祖時節歌節舞而作，如戲鐘（《三代》1.17~18）“戲作寶鐘，用追孝於己伯，用享大宗。”武宿夜即大武舞，《周禮·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禮記·祭統》“及入舞，君執干戚入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大武”相傳是描述武王伐紂戰鬥景像的舞蹈，用在宗廟祭祖禮中，表示不忘先祖創業時的勇武精神。

## （三）祭後之冊賜、脰膳、繹祭

《禮記·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西周金文所記衆多冊賜禮的儀節與此相似，如：頌簋（《三代》9.38.2~39.1）

王在康卣宮，旦，王各大室，即位。宰引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令書。王乎史虢生冊令頌。王曰：頌，令女官嗣成周貯，監嗣新造貯用官御。易女玄衣，黼純、赤市、朱黃、纁旂、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令冊，佩以出。反入瑾璋。

可見《祭統》所記是有所本的。

《周禮·大宗伯》“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左傳·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胾。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胾。”是知古有脤膾之禮。金文胾、脤、膾統作“禴”或“彛”：

德方鼎（《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28）

惟三月，王在成周，征珣禴，自蒿。

何尊（《文物》1976年1期）

惟王初遷宅于成周，復面武王豐禴，自天。

史獸鼎（《三代》4.23.2）

尹賞史獸彛。易方鼎一、爵一。

庚嬴鼎（《西清》3.39）

王蔑庚嬴曆，易彛、軛、貝十朋。

郭沫若釋禴爲福字，並舉殷末銅器我方鼎和毓祖丁卣爲例說之。認爲即指祭後的胾肉。<sup>②</sup>將此字釋爲福字難以肯定，但指其爲祭後之胾是正確的。這種脤膾之禮至春秋戰國間仍盛行。如《孟子·告子下》云：“孔子爲魯嗣寇，不用。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祭後之繹祭金文稱“醕”，已詳前，此不贅述。

### 三 周人的祖神觀念

#### （一）祖神與上帝

大豐簋（《三代》9.13.2）

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省，丕隸王作虒，丕克乞衣王祀。

銘中的上帝，考釋各家都認爲是“至上神”。其實銘中文王地位與上帝是平行的，

將上帝視為至上神則文義很難貫通。我認為“上帝”與“丕顯考文王”在文中指的是同一人。對武王來說文王是“丕顯考”，其時文王之神靈在天已被尊為上帝，故在喜祭文王時又稱“事喜上帝”。上帝是對下帝而言。如邢侯簋（《三代》6.54.2）“克奔走上下帝，無終命於有周。”“下帝”當指人間的周王。庚姬尊（《文物》1978年3期）“帝后賞庚姬貝三十朋。”銘中的“帝后”顯然是指下帝之后。亦即西周初年某王之后。大孟鼎（《三代》4.42—43）“丕敏朝夕入諫，享奔走，畏天畏。”麥方尊（《西清》8.33）“妥多友，享奔走命。”“奔走”是“奔走上下帝”的省稱。即在祭享上帝時交通神人，在上帝天廷和下帝王室宗廟間上下走動。這種區分上帝與下帝，且將文考神尊為上帝的意識，是周人所獨有的。這與殷墟卜辭中殷人上帝的概念不同，與後世人的至上神上帝概念也是不同的。到西周晚期，金文中還出現了“皇帝”一詞：師卣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14.14）“肆皇帝亡吳，臨保我有周。”周人以死去的父親為“帝考”，稱死去的父祖為“皇祖帝考”，“皇帝”就是“皇祖帝考”的省稱。仲師父鼎（《三代》4.19）“其用享用孝於皇祖帝考。”賈簋（《三代》8.39）“其用追孝於朕皇祖帝考。”到厲王時，又有“皇上帝”一詞。趯簋（《文物》1979年4期）“申圖皇上帝大魯令。”趯鐘（《三代》1.65）“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在西周人的宗教觀念中，太空有一個與地上相對應的王朝，地上的王（下帝）死了，如果德行很好，就去天上作上帝。上帝與下帝一樣，也是不斷更換的。被換下的上帝，去掉帝號稱“皇祖”和“前文人”。趯簋“趯作鬯彝寶簋，用康惠朕皇文刺祖考，其格前文人，其瀕在帝廷陟降。”駘狄鐘（《三代》1.11.2）“先王其嚴在帝左右。”“陟降”即上下走動，歷代去世的先王都在帝廷上帝左右，經常天上地下走動。當人間祭祀祖先，樂舞之聲上動天廷，祖神們就紛紛下來歆享供祭的犧牲醴酒。接受了人間的祭享，就降賜給子孫福祐平安。

戎簋（《文物》1976年6期）

戎率有嗣師氏奔追，御戎于棫林，搏戎馘。朕文母競敏啓行，休宕厥心，永襲厥身，卑克厥敵，獲馘百……衣搏，無詛於戎身。

簋銘云戎受到文母在天之神靈的保佑，大敗敵軍，而自身却沒有任何損傷。

周人崇拜近祖，西周金文中所見最早先祖為文王。文獻中所說的太王、王季沒有出現。這可能是因為周人的先祖都未能在天廷取得上帝的地位，文王是第一個取得上帝地位的緣故。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周王的地位每況愈下，禮崩樂壞，天上的神權也發生動搖。諸侯國各自追述其始祖，以與周王室對抗。春秋邾國的邾公鋤鐘（《三代》1.19.2）云：“陸蠡之孫邾公鋤鑄其禾鐘。”以祝融氏為其始祖。春秋齊國的叔夷鍾（《博古圖錄》22.5）云：“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虞虞成唐，又嚴在帝所，搏受天命，刪伐夏后，敗厥靈師。□小臣惟補，咸有九州，處禹之都。”以滅夏的商湯為其高祖。



到了戰國初年的墜侯因胥敦（《三代》9.17）更把始祖上溯到黃帝：“其惟因胥揚皇考，卽申高祖黃帝。”

## （二）祖神與天命

西周成王時的何尊云：“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昔在爾考公氏克逮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嗚呼！爾有惟小子亡哉。視於公氏，有爵於天。徹命，敬享哉。”這裏提出的“天”和“天命”的觀念，是一個全新的觀念。康王時的大盂鼎進一步明確了這個觀念：“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從西周金文內容看，“天”是周人心目中的至上神。它高踞太空，超自然、超上帝。“天命”是這個天神向天廷和上帝發佈的命令。所謂“文王受天命”，就是受了天神要他在天廷改朝換代的命令，也就是要他去作上帝的命令。按周人的邏輯，上帝本來是殷人去世的歷代先王作的，但“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惟有德者居之。殷人的上帝不合天意了，天命令在天廷發動一場以周代殷的革命，然後再把這場革命移植到人間，演出了武王滅商的事變。這就是為什麼武王滅商，而周初彝銘不講“武王受天有大命”，而祇講“文王受天有大命”的緣故<sup>③</sup>。大凡一個新政權的建立，為求鞏固與發展，必要提出一個新理論，用以說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周人提出的“文王受天命”的理論，是對付強大的殷遺民的有效精神武器。因為商革夏命，成為商代的上帝，在地上建立商王朝是合理的。那麼，周革商命，建立周王朝也是完全合理的。

綜觀西周金文，先祖和上帝所給予子孫的多是福祐：猷鐘：“先王其嚴在上，龔龔黻黻，降余多福。”墜盤：“上帝嗣□□，保受天子縮命、厚福、豐年，方蠻亡不矧見。”而“天”却不然，大盂鼎提出要“畏天畏（威）”。班簋說：東國戎人因為“彝昧天命”，故遭到滅亡的命運。到了西周晚期，政局動盪，周王則驚呼：“烏乎！哀哉，用天降大喪於四國。”（禹鼎《錄遺》99）“哀哉！今日。天疾畏降喪。”（師匱簋）。由此可見天是與祖先、上帝不同的另一大神。他具有人格神的威力，可以發佈天命，可以禍福人間。但它沒有具體人格神的形象，是一位超出一切之上的神密力量。

## （三）效法祖先大德

周人認為“天命靡常”，周之所以能取殷而代之，既不是因為他們武力強大，也不是因為他們文明發達。這些他們都不如殷人，而是因為周先王德盛於殷王。毛公鼎（《三代》4.46~49）“丕顯文武，皇天弘厥厥德，配我有周，應受大命。”天神最重德，用周代殷，目的就是使德政可以在天上人間繼續。何尊：“亓天彝德，欲天順我不敏。”大盂鼎：“今我惟卽型□於文王正德……今余惟令女孟，召榮敬雍德。”班簋：“惟敬德



亡迺違。”伯貳簋（《小校》8.32）：“褒呼前文人，秉德共屯。”番生簋：（《三代》9.37.1）“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不殽元德……夙夜專求不隸德。”師鬲鼎“余小子肇盥先王德……天子亦不忘公上父猷德……嗣皇辟懿德。”叔向父簋（《三代》9.13.1）“肇帥型先父祖，共明德，秉威儀。”施行德政，這是盛行於西周的政治口號。文王因為德高望重死後被天命為新的上帝，成為周人心目中德的最高典範。子子孫孫效法文王，個人修養德性，管理國家用德政，這樣“天”就會“順我不敏”。

綜上所述，從西周金文的內容看，周人對土地、山川、河流，風雨雷電等自然神的崇拜觀念比較淡薄。而對祖先却十分崇拜，為此他們制定了許多繁複的祭祖禮儀。這是與有周一代實行的宗法政治分不開的，祇有敬祖纔能重宗。西周的這種崇祖重宗意識對後世影響很大，我國在此後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歷代統治者宣揚的所謂“周禮”，其核心就是這種意識，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大力倡導的“孝道”，其根源也在於此。因此，對西周祭祖禮制的研究是十分有意義的。

## 註 釋

- ① 見於《禮記·祭統》。
- ② 《彙編》收錄時誤作盤，現據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提供資料改為簋。
- ③ 買簋“其用追孝於朕皇祖啻考”、墜侯因甯敦“高祖皇啻”，啻乃帝字的繁寫，啻祭之啻亦為帝字的繁寫。
- ④ 見於《禮記》的《大傳》、《喪服小記》、《祭法》。
- ⑤ 見於《禮緯》鄭玄注。
- ⑥ 《周禮·春官·大司樂》鄭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商頌玄鳥》鄭箋：“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明年春禘於羣廟。”
- ⑦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尚黑，殷尚牡，周辟剛。”疏云：“辟，赤色。”
- ⑧ 《說文》“犝，特牛也。”又“特，牛父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魯公用特犝。”
- ⑨ 據秦蕙田《五禮通考》輯錄歷代禘禮選摘如下：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春秋》）  
“昭公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左傳》）  
“元始五年春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書·平帝本紀》）  
“後漢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劉秀）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文獻通考》）  
“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後漢書·章帝本紀》）

“太和十五年八月乙巳，親定禘祫之禮。”（《北魏書·高祖本紀》）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皇后預。”（《隋書·禮儀誌》）

“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舊唐書·禮儀誌》）

“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嘉祐四年十月，仁宗親詣太廟行祫享禮……南渡之後，有祫而無禘。”（《宋史·禮誌》）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戌，祫享於太廟。”（《金史·世宗本紀》）

“明昌四年四月戊申，親禘於太廟。”（《金史·章宗本紀》）

元代禮文散佚，僅《元史·禮樂誌》存親祀禘祫樂章。

“國初，以歲除日祭太廟，與四時之祭合爲五享，其陳設樂章並與時享同，累朝因之。”（《大明集禮》）

“洪武元年，祫饗太廟。”（《明史·禮誌》）

“嘉靖十年夏四月甲子，禘於太廟。”（《明史·世宗本紀》）

⑩ 或以爲此乃作器者有意將癸亥日改寫爲辛亥日，因爲祭祀辛公最好是在辛日。

⑪ 陳夢家：“酺，從彡從酉，疑彡日用酒祭，故合爲一字。”（《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載《燕京學報》19期）

于省吾：“言酺𩇑，酺爲酒祭，𩇑爲係屬物。”（《甲骨文字釋林》28頁《釋𩇑》，中華書局，1979年）

唐蘭：“金文和卜辭都有酺祭，阮元說是耐，羅振玉釋爲酒字都是錯的。在卜辭裏，酺祭分爲彡日和翌日兩種。”（《史徵》252頁）。

⑫ 𩇑角（《三代》16.47.2—3）“丙申，王易荀亞𩇑奚貝。”此器亦爲殷器，𩇑即𩇑之省，其職官爲“荀亞”是一武官。

⑬ 殷金文中“口”用爲“曰”者尚有四祀卣其卣（《錄遺》275.2）：“乙巳，王口：隤文武帝乙宜。”

⑭ 見《考古與文物》1982年2期《岐山鳳雛村兩次發現周初甲骨文》。

⑮ 癸卯于河，燎，三牢，沉。（簠222）

貞，癸卯于土，九牛。（《鐵》216.1）

癸卯卜，癸雨于示壬。（《鄴》1.33.6）

甲子卜，其癸雨于東方。（《鄴》3.38.4）

乙未卜，于妣壬癸生。（《乙》·4678）

庚辰貞，其癸生于妣庚、妣丙，在祖乙宗。（《拾》1.10）

甲辰卜，王賓癸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衣，亡尤。（《後上》20.5）

⑯ 《金文叢考》234頁臣辰盃考釋。

⑰ 《西周銅器斷代》（二）土上盃考釋。

⑱ 《甲骨文字釋林》40頁釋卣。

⑲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133頁高卣蓋考釋。

⑳ 如《左傳·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

- ②① 陳夢家認為“二母”為東母、西母，指日、月二神，亦可備一說。（《燕京學報》19期《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
- ②② 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36頁《釋叙》。
- ②③ 此段考證請參見《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278頁，唐蘭先生的考釋。
- ②④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191頁，《史喜鼎跋》；唐蘭《古文字研究（二）》92頁。
- ②⑤ 見前6.18.2；1.49.7；後上23.7；22.15；戡1.2；佚4；通別錄之二等等。
- ②⑥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4.12；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一）天亡簋。
- ②⑦ 《西周銅器斷代》（五）《附記玉戈銘》。
- ②⑧ 李學勤文見《文物》1979年12期。
- ②⑨ 《爾雅·釋親》：“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 ③⑩ 見《觀堂集林》的《殷周制度論》。
- ③⑪ 鄭簋（《考古圖》3.10）有五邑祝。申簋蓋（《考古與文物》1983年2期）有九盤祝。
- ③⑫ 《文物》1959年7期。毓祖丁卣（《三代》13.38.6）“歸禱於我多高。”我方鼎（《三代》4.21.1）“遣禱於𡗗”。
- ③⑬ 到西周晚期如毛公鼎等提出“文武受命”。那是因為周人立國已久，把兩個天命合二而一了。

（原載《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495~522頁）

## 西周金文中的相見禮

在周代，王及貴族間十分重視交際的禮儀，其中的尊卑等級制度體現了那個時代政治的一個方面。文獻中有許多這方面的記載，尤其是《儀禮》、《周禮》、《禮記》等禮書中更有較系統的記載。但是，古文獻所記的內容，除保存了一部分西周禮制外，混入了大量春秋戰國乃至以後時代的禮制，再經過漢以來經學家們的詮釋，就變得相當混雜了。西周金文中有許多有關禮制的具體記載，應為第一手史料，能較準確的反映“周禮”的本來面貌。因此，本文擬以西周金文為主要資料，探討西周王公貴族間的交際禮儀制度，對這類禮儀古人統稱其為“相見禮”。

### 一

在西周金文中諸侯邦君朝見周王稱“覲”（覲）或“見”，如“雙覲于王。癸日，賞雙貝二朋”（雙鼎，《集成》5.2579）。“乙卯，子見在大室，伯□□琅九，虫百牢。王賞子黃瓚一，貝百朋……鬯”。（子尊，《集成》11.6000）“公叔初見于衛”。（賢簋，《集成》7.4104~4106）子尊中子的身份是殷遺民，所獻應為“祀貢”。（史牆盤《集成》16.10175）銘“微史烈祖迺來見武王”記述的也是殷遺民覲見周王。麥方尊（《集成》11.6015）記錄了一次嗣封典禮：老邢侯去世，新邢侯由坏地徙封于邢地，按禮制規定須覲見周王，討得封賞，方能取得繼承權。銘中兩次提到告“亡尤”，第一次是向載出祖先神主祝告，第二次是在返國後設奠告祖，《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儀禮·覲禮》記諸侯在覲見周王之前有“侯氏裨冕釋幣於禰”的儀注。注解云“禰謂行主遷主矣。”銘中還兩次提到祭祀，一次云“王祀”，一次云“祀月”。可能即禮書上所說的祭祀日月之禮。《儀禮·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

外。”《儀禮》與《禮記》所記與西周金文相合，說明兩書是保存了部分古禮的。

西周早期金文記諸侯朝見周王又可稱“見事”，如“匱侯初見事於宗周，王賞旨貝廿朋”。（匱侯旨鼎，《集成》5.2628）下級貴族朝見高級貴族也可稱“見事”。如“己亥，揚見事於彭，車叔賞揚馬”。（揚鼎《集成》5.2612 5.2613）朝見周王又有時稱“見服”。如惟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作冊醜卣《集成》10.5432）這裏公大史除覲見周王外，還會見了諸執政官（多正）。《孟子·梁惠王》“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上述銘文中的覲見不稱覲或見，而稱“見事”、“見服”可能與其述職性質有關。

上述諸器皆作於西周早期，可以考見周初諸侯貴族覲見周王時的一些禮儀規定。西周中晚期金文則多記錄夷族邦君朝見周王之禮。如裘衛盃（《集成》15.9456）記矩伯以價值百朋的十三田與裘衛交換“赤琥兩、廖羣兩、羣韜一”和“覲璋”，以備覲見周王之用。頌鼎（《集成》5.2827~2829）與善夫山鼎（《集成》5.2825）有“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璋”的記載。看來，文獻覲見禮中有關瑞玉和皮幣的授受是有根據的，《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儀禮·覲禮》的儀注有郊勞、致館、覲見、將幣、賞賜等，每個儀注在行禮時都需要授受贊幣，《周禮·小行人》記載贊幣的配合是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繡、璜黼等。裘衛盃中的璋、琥、羣、韜就是玉幣和皮幣，這些在覲禮中是不可或缺的。《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說明這種禮儀直到東周仍在實行。

九年衛鼎（《集成》5.2831）記九年正月“眉敖諸臚爲使見於王”。結合裘衛盃銘可知矩伯是邦君眉敖的“諸臚”之一，被遣爲使覲見周王，此時眉敖並未徹底臣服於周王，因此同年九月又有益公征伐眉敖的記載。“惟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賁。”（卣伯簋，《集成》8.4331）《孟子·告子》“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這是孟子理想中王應有的權威，也是西周王室強有力時的實際情況。這次眉敖的覲見，是武力征服的結果。眉敖臣服以後，成爲戎狄邦君的帶頭人，致使大量青銅流入周王室，“戎獻金於子牙父百車”。（眉敖簋蓋《集成》8.4213）

像這種以武力征伐爲背景的覲見，史牆盤稱“覲見”，（“方蠻亡不覲見”）西周晚期金文也多有類似記載，如厲王時的猷鐘（《集成》1.260）：“王敦伐其至，戡伐厥都，艮孳迺遣間來逆邵王，南夷東夷俱見二十有六邦。”駒父盃蓋（《集成》9.4464）“南仲邦父命駒父設南諸侯，達高父見南淮夷，厥取厥服。覲，夷欲墜，不敢不辨畏王命，逆見我，厥獻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敢不口，俱逆王命。”

綜上所述，在西周早期，隆重的王室大覲禮有祭奠日月的儀式，各種覲見後都有優厚的賞賜。西周中期以後，覲見禮儀趨於複雜，覲見時必須呈獻贊幣，主要是瑞玉及獸

皮。王之賞予則男賜車馬命服，女賜絲帛。西周中晚期周王室與四圍邦國連年征戰，金文中所記多為被征服的邦國的“覯見”，這種溫文爾雅的覯見禮儀背後掩藏着血腥的暴力。

## 二

在西周金文中，王或其使者巡視各地稱“省”。如“王大省公族，於庚振旅，王賜中馬”（中觶，《集成》12.6514）“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玁王卬。”（中方鼎《集成》5.2751、2752）“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玁卬，在曾。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女使小大邦，厥又舍女芻糧，至于女麋小多口。中省自方，復造口邦，在鄂自次”（中甗《集成》3.949）三件中器所記皆為昭王南巡之事。（唐蘭先生有考證）記同樣內容的器物尚有太保玉戈銘（陶齋古玉圖84）“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大保省南國。”小臣彣鼎（《集成》5.2775）“令小臣彣先省楚卬。……小臣彣賜鼎，馬兩。”蓋昭王南巡之前作了許多準備，派遣重臣反復視察了南方諸邦國。記錄視察東方的有臣卿鼎（《集成》5.2595）“公違省自東，在新邑，臣卿賜金。”（唐蘭先生認為“公違”即《逸周書》中的“百韋”。）

以上諸器皆作於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後“省”或寫作“徯”“徯”“徯”等，如“伯益父使靚徯尹人於齊自，妊小從。靚有頰貝，用作妊小寶簋”。（妊小簋《集成》8.4123）“師雍父徯導至于馱，竈從，其父蔑竈曆，賜金。”（竈鼎《集成》5.2721）“王在宗周，令史頌徯蘇，濶友里君百姓帥塢整于成周，休有成事，蘇賓璋、馬四匹、吉金。”（史頌鼎《集成》5.2787、2788）“省”字金文從目生聲，《說文》“省，視也”。宜侯矢簋（《集成》8.4320）“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四國圖”。用的也是視意。《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成法則。”鄭注云：“存、頰、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七歲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像這種一、三、五、七、九、十一年一徧巡視之事是《周禮》作者理想中君王視察邦國諸侯的制度，並非古代實際實行的制度。至於鄭玄注中所發揮的召其瞽史象胥聚於天子之宮而教習之，則更是無根之談。但是他們所說的王或其使臣巡視邦國諸侯稱“省”則合於西周金文。從金文的內容看，西周王室經常派使者去視察諸侯邦國，這是周王推行其統治的手段之一。其使命則一為征伐前的偵察，一為例行巡視。後者較注重禮儀，被巡視者對使者往往有所賄贈。



## 三

周王或其后妃派出使者與邦國諸侯聯絡，（或貴族間派出使者聯絡）金文一般稱“使”，被使者例需對使者有所賄贈，稱“賓”。如“王史小臣守使於夷，夷賓馬兩，金十鈞”。（小臣守簋《集成》8.4179~4181）“王命鬲眾叔絳父歸吳姬饌器，自黃賓鬲璋一、馬兩。吳姬賓帛束。”（鬲簋《集成》8.4195）“公令繁伐于吳伯，吳伯蔑繁曆。賓繁紱廿、貝十朋。”（繁簋《集成》8.4146）“仲幾父史幾使于諸侯諸監，用厥賓作丁寶簋”。（史幾簋《集成》7.3954）上述諸器中被使者皆為邦國諸侯及其監國者，派出使臣者，繁簋為地位很高的“公”，其餘皆為周王。很顯然派出使臣者地位高於被使者，這時被使者需用較隆重的賓禮接待使者，對使者賄贈豐厚，且稱“賓”。若反之，被使者地位高於派使者，賄贈稱“賞”、“賜”，而不稱“賓”。如“區侯令堇饌大保於宗周，庚申，大保賞堇貝。”（堇鼎《集成》5.2703）“惟王奉于宗周，王姜史叔使于大保，賞叔鬻鬯、白金、芻牛。”（叔簋《集成》8.4132、4133）“同公在豐，令宅使伯懋父，伯賜小臣宅畫干戈九錫，金車、馬兩。”（小臣宅簋《集成》8.4201）惟王于伐楚伯，在炎……作冊矢令尊宜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矢令簋《集成》8.4300、4301）師雍父戍在古自，遇從，師雍父肩史遇使于馱侯，馱侯蔑遇曆，賜遇金。”（遇甗）录貳卣（《集成》10.5419）云：“王命貳曰：馱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自。”甗鼎云：“師雍父省導至于馱。”甗與遇應為一人，這幾件器銘記錄的是抵禦淮夷的一次軍事行動前的外交活動。”“內史令邾使，賜金一鈞，非余。曰：內史葬朕天君”。（邾鼎《集成》5.2696）此銘記內史命邾去告訴太后，他仍效忠於太后。“唯十月，使于曾，寔伯于成周休眡小臣金。”（小臣鼎《集成》5.2678）“王命小子生辨事口公宗，小子生賜金、鬻鬯。”（小子生尊《集成》11.6001）上兩器被使者身份不明，賞賜由寔伯及王施予。

“賓”有時用為名詞，指賓賄之幣。上面提到的史幾簋“用厥賓作丁寶彝”，就是用為名詞。這種賓物又可用來頒賜於人。如“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征兄六品，蔑曆于保，賜賓，用作文公癸宗寶尊彝。”（保卣《集成》10.5415）“召伯令生史使於楚伯，賜賓，用作寶簋。”（生史簋《集成》7.4100）

有時賄贈女性或由女性賄贈，不稱賞賜也不稱賓，而稱“類”（洙）。如“君在雍即宮，命邇使于述土陪諶，各后寮女寮奚逆華，天君史邇使類。”（邇盂《集成》16.10321）這與妊小簋的“甗有類貝”的含義相近。

王命使者去撫慰邦國諸侯，金文稱“寧”或“安”，被撫慰者亦例需對使者有所賓



贈。如“王令孟寧鄧伯，賓貝。”（孟爵《集成》14.9104）“王姜令作冊景安夷伯，夷伯賓貝布。”（作冊景卣《集成》10.5401）“君令作冊景安夷伯，夷伯賓用貝布。”（作冊景尊《集成》11.5989）“叔氏使貧安員伯，賓貧馬轡乘。”（公賈鼎《集成》5.2719）。

《周禮·鄉大夫》“以禮禮賓之”，鄭衆注曰：“賓，敬也”。又寫作“儔”，《儀禮·覲禮》“侯氏用束帛乘馬儔使者”、“儔大史亦如之”。《禮記·禮運》“所以儔鬼神也。”釋文曰：“敬也，儔與賓通”。賓賞物品西周早期以貨貝爲主，中期以金爲主，兼及車馬、玉器、皮帛。皮馬玉帛是文獻中贄幣的主要內容。《儀禮·聘禮》記“命使”之後有“夕幣”，入境之後有“展幣”、“授幣”，使者即將返國，被使者例有“覲幣”、“面幣”等儀注，而這些禮儀中的贄幣不外乎皮馬玉帛之類。說明文獻中所記贄幣與西周中期金文中所記部份內容是相同的，不過西周早期贄幣用貝，中期多用金，文獻中却没有反映。

#### 四

西周早期凡有重大政令或任命，周王往往由宗周派遣特使去成周頒佈，金文稱“殷於成周”。如“惟明保殷成周年，公賜作冊鬲鬯貝。”（作冊鬲卣《集成》10.5400）本銘用“明保殷成周”紀年，即矢令方彝所記“明公朝至於成周”之事：周公子明保受王命任卿事寮長官，管理三事（司土、司馬，司工）和四方（侯、甸、男等四方諸侯），他於八月在宗周受命，十月至成周“舍命”，並會見寮屬及四方諸侯。其後還分別在京宮、康宮及王城舉行殺牲祭禮。“王在莽京，令師田父殷成周年，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小臣傳簋《集成》8.4206）“惟王大禴于宗周征饗莽京年……王令士上眾史寅殷于成周，替百姓豚眾賞鬯貝。”（臣辰盃《集成》15.9454）“王在成周，令豐殷大矩，大矩賜豐金、貝。”（豐尊，《集成》11.5996）《周禮·大宗伯》“殷見曰同。”《周禮·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周禮·職方氏》“王殷國亦如之”。郭沫若認爲金文中的“殷”與《周禮》中的“殷同”、“殷類”相同，各家多從之。但《周禮》所說的“殷同”、“殷國”指周王對諸侯的巡視，這在金文中稱“省”，不稱“殷”。而且從金文看，“殷”禮乃王之使臣所爲，他們“殷於成周”是代宣王命。如豐尊所記，王在成周，却不親見大矩，而命豐去殷見，可見此禮並不如周禮所述，必爲王禮。另外，周禮鄭注多次云：“殷猶衆也”，即指會見衆多諸侯貴族。從豐尊所記情形看，王使者會見一名大矩亦可稱“殷”。可見《周禮》所記“殷”禮是後世禮制，只是借用古禮之名而已。鄭玄之注亦非古訓。從金文看，殷者，

大也，指較隆重的會見之禮。蓋西周時，王室的主要政治活動仍以豐、鎬、莽等周原老家一帶地點為核心，祇是遇有重大政令和任命需向全國頒佈時，則派特使至“天下之中”的成周去發佈。金文所記“殷”禮皆行於成周，無一例外，正說明了這一點。這一制度可能一直貫徹到西周末，如宣王時的克鐘（《集成》1.204）：“王在周康刺宮，王乎士矧召克，王親令克適涇東至於京師，……專奠王命。”宣王遣膳夫克循涇水東行至成周去專奠王命，祇是此時金文已不使用“殷於成周”一類的詞語了。平王東遷以後，政治中心徹底移至成周，當然也就不存在“殷於成周”的禮儀了。

## 五

在西周，貴族間辦理交涉，亦需以禮相見，並互相有所賄贈。如“王呼吳師召大，賜趨嬰里，王令膳夫豕曰趨嬰曰：余既賜大乃里。嬰賓豕璋、帛束。嬰令豕曰天子：余弗敢吝。豕以嬰導大賜里，大賓豕訊璋、馬兩，賓嬰訊璋、帛束。”（大簋蓋《集成》8.4298、4299）此銘記周王將本屬趨嬰的邑里轉賜給大，膳夫豕傳達王命，他分別得到嬰和大的賓贈，大對嬰也有賓贈。傳世兩件琯生簋也有類似記載：“琯生有事，召來合事，余獻婦氏以壺，告曰，以君氏令曰：余老止公僕庸土田多諫，弋（亦）伯氏縱許，公庥其參，汝則庥其貳，公庥其貳，汝則庥其一。余惠於君氏大璋，報婦氏帛束、璜。召伯虎曰：余既訊戾我考我母令，余弗敢亂，余或至我考我母令。琯生則覲圭。”（五年琯生簋《集成》8.4292）“王在莽，召伯虎告曰：余告慶。曰：公厥稟貝，用獄諫，為伯有祇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余告慶。余以邑訊有司，余典勿敢封，今余既一名典獻伯氏，伯氏則報璧琯生。”（六年琯生簋《集成》8.4293）兩銘人物關係複雜，其內容為王后調解琯生與召伯虎的僕庸土田糾紛。在宣王五年琯生有訟事，召伯虎來對質其事。琯生獻婦氏（王后的女官）以壺。婦氏宣告王后判辭：我的家宰止公（琯生）僕庸土田多有爭訟，這也是伯氏（召伯虎）縱容準許的結果。現判決如下：公（止公琯生）拓取其參，則你拓取其貳；公拓取其貳，則你拓取其一。琯生賄於君氏（王后）大璋，報答婦氏帛、璜。召伯虎說：我死去的父母對此有成命，我不敢變亂，我要求達到父母的願望。琯生向召伯虎獻覲圭。六年簋記琯生又將有爭議的邑里全部典獻召伯虎，使他認為實現了父母的遺願，獄訟取得勝利，多次告慶，並以禮向琯生報以玉璧，表示事件已圓滿解決。“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周禮·司約》）琯生即將此銘鑄於這對簋上。解開兩銘的關鍵在“余老止公”一句，《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儀禮·聘禮》“授老幣”，注“賓之臣”，疏：“大夫家臣稱老”。蓋古時稱家臣為老，琯生在師彘簋中又稱“宰琯生”，其身份是王室家臣，被尊為“止

公”也是有可能的，因此銘中以王后的口吻稱琯生爲“余老止公”是完全可能的。至於有的同志以爲金文中“余”只能作人稱代詞而不能作物主代詞，則是一種誤解，如“順余子孫”（越王鐘《集成》1.144）、“作爲余鐘”（郢簋鐘，《集成》1.225~237）、“擇余吉金”（徐王義楚卣，《集成》12.6513）等，“余”皆作爲物主代詞使用。

九年衛鼎（《集成》5.2831）記矩伯與裘衛交換林里車馬的事：裘衛給矩伯省車及一套精美車具，給其妻矩姜帛二兩，矩則給裘衛林里。該里中的顏林是顏陳的，故裘衛又給顏陳大馬兩，給其妻顏姒虞鬯，給顏的下屬壽商貉裘，給盞匱。矩乃與漙彝命令壽商和音講定。交付裘衛林里。於是確定四周界封。由衛小子樹封，壽商鬯。裘衛又給盞匱，給叔氏羊皮二、從皮二、鑿烏循皮二。給肅白金一鈞，吳喜皮二。給漙一些車具，給東臣羔裘，給顏下皮二。由衛小子寬和衛臣鬻、肅辦理授受。上述幾件器皆作於西周中晚期，其時在貴族間辦理各種交涉，贄幣已成爲十分重要的交際手段。

通觀西周金文，在西周早期，王及貴族間交際的禮儀尚比較簡樸。入中期後，禮儀繁雜起來，交際中講究賄贈贄幣，其種類又視身份和性別而不同。據文獻記載，春秋以後，這種交際禮儀就更加複雜，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中庸》）“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禮器》）以致“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禮記·聘義》）經過與西周金文對比，就會發現《儀禮》、《周禮》、《禮記》等禮書中是保存了一些古代禮制的，有的甚至可以和西周早期金文相合。但這些書畢竟成書於戰國或以後的時代，混入了大量後世禮制和整理者的主觀安排。比如《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這種把朝見周王的用辭分配四時的作法，顯然是作者主觀的安排。但是，其中“覲”確係諸侯朝見周王時的用語，（不必在秋季）“殷”也是周王遣特使去成周頒布政令的專門用語。這些用語與西周金文暗合。又比如《周禮·大行人》“凡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這些用語却與戰國金文完全相合，“其惟因齊揚皇考，昭申高祖黃帝，弭嗣桓文，朝問諸侯。”（陳侯因齊敦《集成》9.4649）“齊遣卿大夫衆來聘。”（商鞅量）諸如“朝”、“問”、“聘”之類詞語在西周金文中是沒有的，而在戰國金文中出現，且與文獻用義完全相合，說明這些禮書是戰國人用當時的語言加以整理的。

總之，我們在研究古代禮制時，簡單地摒棄這些禮書是不應該的，但迷信這些書，不加甄別地使用這些書中的材料，也是不可取的。只有認清這些書的性質，有選擇地使用纔會有益於我們的研究。

（原提交1990年古文字學年會論文，未刊）

## 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

古有饗燕之禮儀，《儀禮·燕禮》詳記了士大夫燕禮的儀節，而饗禮亡佚，文獻中沒有留下系統的記載。後世儒者檢索文獻，輯逸補亡饗禮之作多有：元代吳澄撰《儀禮逸經傳》二卷，在聘覲禮中兼涉逸饗禮。清代諸錦著有《補饗禮》一卷，收入《四庫全書》經部禮類。

陳壽祺《饗禮考》收入《左海經辨》。林昌彝《三禮通考》撰有《饗禮》。秦蕙田《五禮通考》有《饗燕禮》等等。或重構饗禮儀節，或分辨饗燕異同，他們作了許多扎實的考據工作。近人許維遹、楊寬又先後對兩禮作了很好的研究。許著《饗禮考》（《清華學報》一九四七年一四卷一期）、楊著《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古史新探》一九六五年版）記錄了他們研究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他們都使用了部分金文材料去印證文獻資料，是其改進之處。

本文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主要依據西周金文資料，結合部分文獻記載，弄清饗燕兩禮的主要內容及其發生發展的過程。

### 一

#### （一）文獻中有饗與享兩字，有時混用。

一般說“享”用於“祀鬼神”，“饗”則用於“待賓客”。《詩經》“享”字十五見，無一例外，全部用於祀鬼神。

《左傳》“享”字九十餘見，多數用於鬼神，“饗”字在兩書中使用情況較複雜，但多數用於生人的傾向是明確的。

金文“饗”作“鄉”，共約四十見<sup>①</sup>，幾乎全部用於生人。如：

獸鼎（《三代》3、51、3）

用朝夕鄉厥多朋友。

趙曹鼎（《三代》4、24、3）

用鄉朋友。

沫叔昏簋（《美集錄》A222、R293）

用鄉賓。

長由盃（《錄遺》293）。

穆王鄉豐。

衛鼎（《三代》4、15、21）

乃用鄉王出入事人眾多朋友。

到目前為止，僅發現兩件器例外。

仲枏父鬲<sup>②</sup>（《考古》1979年2期）

用敢鄉考于皇祖考。

伯旂簋（《三代》7、41、1）

旂其萬年寶，用鄉孝。

像這種將“饗”用為祭祀祖先的銘文，在金文中是極少見的，僅此兩件而已。

“享”金文作“亨”，共約二百見，約有一百七、八十用於祭祀鬼神。如：

六年召伯虎簋（《三代》9、21、1）

用享于宗。

珣伐父簋（《考古》1963年10期）

用享于皇祖文考。

獻鐘（《三代》1、18、2）

用追孝于已伯，用享大宗。

杜伯盃（《三代》10、40、3~43、1）

用享于皇祖考。

周生豆（《三代》10、47、4）

用享于宗室。

如此等等，至於“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之類金文熟語，不勝枚舉，其“享”字亦為祭享鬼神。到目前為止，僅發現一器，將“享”字用於生人：

貳鼎（《文物》1976年6期）

厥復享于天子。

可以說，在西周金文中，鄉（饗）與亨（享），一用於生人，一用於鬼神。極個別混用者，可能是音同通假，二字的分別是相當嚴格的<sup>③</sup>。

(二) 西周金文中記饗禮用“鄉”、“鄉酉(酒)”、“鄉醴”、“大鄉”等，現將各器按時代分列於下

### 1. 西周早期

天亡簋(《三代》9、13、2)

乙亥，王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右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丁丑，王鄉，大宜。王降，亡得爵復囊。惟朕有慶，敏揚王休于尊簋。

征人鼎(《三代》4、4、1)<sup>④</sup>

丙午，天君鄉饗酒，在斤。天君賞厥征人斤貝，用作父丁尊彝。奄宜侯矢簋(《錄遺》167)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四國圖。王立于宜，入土，大鄉。王令虞侯矢曰：遷侯于宜。易□鬯一卣，商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易土厥川三百，……厥宅邑三十又五……易在宜王人……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矢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 2. 西周中期

效卣、效尊(《三代》13、46、2~3; 11、37、1)

惟四月初吉甲午，王觀于嘗，公東宮內鄉於王。王易公貝五十朋，公易厥涉子效王休貝二十朋。效對公休，用作寶彝……

穆公簋蓋(《考古與文物》1981年4期)

王初女(如)□，適自商師復還至于周，王夕鄉醴於大室，穆公吝(侑)□，王乎宰利易穆公貝二十朋，穆公對王休，用作寶皇簋。

適簋(《三代》8、52、2)

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莽京，乎漁于大池。王鄉酒，適御，亡遣。穆王親易通饗。通拜首，稽首，敢對揚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

長由盃(《錄遺》293)

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應。穆王鄉豐。即井伯大祝射。穆王蔑長由，以來即井伯氏，井伯氏彌不姦。長由蔑歷。敢對揚天子不坏休，用肇作尊彝。

大鼎(《三代》4、32、2)

惟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王在盤佞官，大以厥友守。王鄉醴。王乎善夫駟召大以厥友入戎(捍)，王召走馬雁，令取雉駟三十二匹易大。大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刺考已伯孟鼎……

師遽方彝(《三代》11、37、2)



惟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寢，鄉醴。師遽蔑曆、吝（侑）。王乎宰利易師遽瑱圭一、環璋四。師遽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祖它公寶尊彝。

三年癸壺（《文物》1978年3期）

惟三年九月丁巳，王在鄭，鄉醴，乎虢叔召癸，易羔俎。己丑，王在句陵，鄉逆酒，乎師壽召癸，易彘俎。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皇祖文考尊壺……

### 3. 西周晚期

虢季子白盤（《三代》17、19、1~2）

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丕顯子白，將武於戎工，經維四方。搏伐獫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趯趯子白，獻馘于王，王孔加子白義，王各周廟宣廟，爰鄉。王曰：白父孔覲有光。王易乘馬，是用左王。易用弓彤矢，其央。易用鉞，用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

（三）由上述十一件器銘，可以歸納古饗禮數事如下

#### 1. 饗禮的發生與發展

天亡簋是武王器，征人鼎、簋是成王器<sup>④</sup>，宜侯矢簋是康王器，這三件西周早期器稱饗禮為“鄉”、“大鄉”、“鄉禮酒”，不見稱“鄉醴”者，說明此時之饗禮尚未有醴酒之設。周初禮制多沿用殷禮，殷人尚酒，饗必飲酒，如：

遷鼎（《三代》4、10）

乙亥，王惟在臯師，王鄉酒。尹光遷，惟各，賞貝，用作父丁彝。惟王征井方。

宰甫卣（《文物》1986年4期）

王來獸自豆泉，在祿師，王鄉酒。王光宰甫貝五朋，用作寶鬯。

上二器為殷末銅器，所記殷人饗用酒，稱“鄉酒”，與周初諸器相同，說明周初饗禮因於殷禮。入西周中期後，周人形成自己有別於殷禮的饗禮，其主要特徵是“用醴”，穆王時的穆公簋蓋、師遽方彝、長白盃，恭王時的大鼎，懿王時的三年癸壺都用“鄉醴”來記饗禮，說明此時饗用醴，已為通常現象，而遷簋及三年癸壺之饗用酒，則是少數情況下的作法了。《說文》“醴，酒一宿孰也”，是以原始的簡單方法釀造的，所含酒精極少，故又名“清酒”，饗用醴，據云是“以示追懷遠古之義”。在饗禮進行時，淺嘗則止，並不大量飲用。《禮記·聘義》“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左傳·成公十二年》杜注曰：“饗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等都講的是這個意思。

周人這種重威儀，輕飲食，以“用醴”為特徵的饗禮，大約始於穆王時，在此之前則沿用殷人禮儀。《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杜注云：“始則先行饗禮，先置醴酒”。以饗醴之醴為醴酒，這本來是很通順的註解，而凌廷堪《禮經



釋例》却說：“饗爲饗禮，醴爲醴賓馬者。”許維遜《饗禮考》對凌氏之說又加以引伸，把問題弄得更複雜了。其實杜注是對的。《左傳》用“饗醴”來記饗禮，與金文正合，因爲此時饗禮的特點是“用醴”，故又可以稱其爲“饗醴”。凌氏、許氏的所謂“醴賓馬者”，是混同醴、禮爲一，且將其用爲動詞了。

王國維之《釋禮》（《觀堂集林》卷六）也將醴、禮混淆。他說“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曲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王氏這三句話，前兩句還是對的，第三句則不對，而楊寬將王氏的第三句話又加以伸引，作出禮起源於醴的結論。（見楊氏《古史新證》306～309頁，〈由“鄉飲酒”禮和“饗禮”推論“禮”的起源和“禮”這個名稱的來歷〉）。王、楊之說實際是倒本爲末了，查金文，西周早期之“豐”即後世的“禮”字，蓋取“以玉盛器中而奉於神人”之意。天亡簋、麥方尊中的“大豐”就是“大禮”，（過去多釋爲“大豐”是不對的）與醴酒無干。在金文中是先有禮儀之禮，寫作“豐”，後有醴酒之醴。那種用簡單方法釀製的清酒被稱爲醴，並用於祭饗，是穆王以後的事。穆王晚期的長由盃中的“鄉豐”之豐，應是“醴”之省，其字形雖與西周早期天亡簋、麥方尊中“大豐”之豐相同，但時代不同，其含義是不同的。

據金文記載，醴酒至穆王時始入饗禮。文獻記載，至春秋戰國間，仍使用醴酒於饗禮。秦以後古禮多已廢弛，但醴酒之用，間或有記載。如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竹簡《養生方》中有：“爲醴，取黍米、稻米……稻醴孰，即每朝厭歠……”（《馬王堆漢墓帛書》〔肆〕99頁）《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 2. 金文中的大饗禮

宜侯矢簋云：“王立於宜，入土，大鄉”，是知所謂逸饗禮，不是一般的饗禮，而是“大饗”。因爲規格較低的饗禮有《儀禮·鄉飲酒禮》記載，並未亡逸。文獻中也有“大饗”的記載。如《禮記·郊特牲》云：“大饗尚殷脩而已矣”。《周禮·春官》中的《大師》、《小師》、《鞀師》之職皆有“大饗亦如之”一句。《周禮·天官·大司樂》有“大饗如祭祀”一句。說明確有亡逸的“大饗禮”。《周禮》及《禮記》中的“大饗”與宜侯矢簋銘相合。“大饗”是王室大禮，一般要由王或后來主持其事。金文記饗禮的十一篇銘文。除征人鼎、簋由成王后“天君”主持外，其餘十篇銘文無一例外，全部由時王主持。因此上述金文所記都是大饗之禮。《儀禮》中有《鄉射禮》和《大射儀》，二者規格級別迥然不等，但又有部份儀節十分相似，可以看作射禮的兩個層次。《儀禮》中的《鄉飲酒禮》與亡逸的“大饗”之禮，情況也十分相似，也可以看作不同層次上的禮儀。楊寬已注意到這一點，但他把金文中的“鄉酒”歸入“鄉飲酒”禮却是很不恰當的（見《古史新證》286～287頁）。征人鼎、簋、適簋、三年癸壺上的

“鄉酒”都是王及后主持的大饗之禮，與《儀禮》中士大夫所行的《鄉飲酒禮》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金文中的“鄉酒”與《儀禮》中的“鄉飲酒”，雖僅有一字之差，但却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禮儀。

### 3. 饗近於祭

許維遹在《饗禮考》中舉六事證成饗近於祭。

#### (1) 齋戒

《國語·周語上》“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

《禮記·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是知祭饗皆用齋戒。

#### (2) 尊彝

《周禮·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裸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 (3) 腥俎

《左傳·宣公十六年》“王饗有體薦”。孔疏云：“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食，故不解析”。《詩經·閟宮》述及祭祀云：“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是知祭饗皆用房俎盛腥體。

#### (4) 裸事

《國語·周語中》“鬱人薦鬯，王裸鬯，饗禮乃行”。《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是知祭饗皆有裸事。

#### (5) 立而成禮

《國語·周語中》“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記·祭統》“君純冕，立於阼”。“立飫”即“饗”，因饗祭皆在廟行之，禮重主敬，故立而不能坐。

#### (6) 用樂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是知祭饗用樂相同。

許氏所舉六事，皆據之文獻，但其多與金文相合。西周記饗禮十一篇銘文中，有七件所記饗禮行於宗廟。如天亡簋祭饗皆在“天室”，穆公簋蓋也饗於“大室”，大室即天室，乃宗廟中之建築。宜侯矢簋云：“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四國圖”。其地應是“周廟”之“圖室”。無惠鼎（《三代》4、35、2）云：“王各于周廟，□于圖室”。可見周廟中有圖室。虢季子白盤也云饗於“周廟”。師遽方彝饗於“康寢”，此乃康王之廟寢，而非時王之路寢。大鼎之“盥偃宮”、適簋之“辟雍大池”都是宗廟所在。因饗祭皆行於宗廟，故齋戒、尊彝、立而成禮、用樂相同是不難理解的。

金文賞賜之隆重者，每言“賜柅鬯一卣”，且列於諸賜品之首，即因“柅鬯”乃祭、饗之裸事所用，頒賜“柅鬯”，意味着賜予祭、饗之權，極表尊寵，故需列於諸賜品之首。宜侯矢簋記大饗之後，“易柅鬯一卣”，即含有此義。知饗有裸事，在金文中

也有根據。

三年癸壺記王在鄭地饗後賜癩“羔俎”，在句陵饗後賜癩“彘俎”。可以證成“饗用腥俎”的記載。此羔與彘皆為半解的體薦，禮中並不食用，故可於饗後賜予癩。這與祭禮用房俎，祭後賜胙之舉是十分相似的。

許氏饗近於祭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 4. 講大事、昭大德

《禮記·王制》孔穎達疏引皇侃說饗有四種：

- (1) 諸侯來朝。
- (2) 王親戚及諸侯來聘。
- (3) 戎狄之君使來。
- (4) 饗宿衛及耆老孤子。

秦蕙田《五禮通考·饗燕禮》云饗禮有三：

- (1) 天子饗元侯。
- (2) 兩君相見。
- (3) 凡饗賓客。

總之，過去經學家認為饗是待賓之禮。西周金文多有記諸侯及戎狄君使朝宗覲聘者，却不見王以饗禮待之，如：

雙簋（《三代》3、40、3）

雙莛（覲）于王。癸日，王賞雙貝二朋。

蟠鼎（《文物》1979年9期）

惟三月初吉，蟠來遘于妊氏，妊氏令蟠使保厥家，因付厥祖僕二家……

臣辰盃（《三代》14、12、2）

王令士上眾史黃殷于成周，昔百生豚眾賞卣鬯貝，用作父癸寶尊彝。

上述西周諸器皆為記錄王及諸侯間交接事，如覲、遘、殷等字皆王及諸侯間交接的專門用語，但從金文看，在這些待賓過程中，沒有施饗禮的記載。蓋西周時，王設饗乃大禮，一般賓客之事較少使用。王室待賓用饗，恐怕是春秋以後，王室地位下降的結果。

據西周金文，饗禮行於以下場合：

- (1) 大祭之後：天亡簋。
- (2) 出征凱旋：虢季子白盤、征人鼎、簋。
- (3) 封建諸侯：宜侯矢簋。
- (4) 巡視地方：效卣、效尊。
- (5) 大射前後：適簋、長由盃。
- (6) 賞賜臣工：師遽方彝、三年癸壺。

(7) 答謝宿衛：大鼎。

祭祀征伐，封建巡察，大射大賞等皆為國之大事大典。可見在西周時，大饗之禮是為講大事、昭大德而設，並非專為待賓而設。皇侃所說“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許維遹批駁此說非饗禮，以為乃鄉飲酒。據西周金文看，大鼎云“大以厥友守”，“以厥友入捍”，知王所饗之“大”，乃宿衛之長。故皇氏所云“饗宿衛”是合於金文的。至於“耆老孤子”之饗，且“以醉為度”則可能是鄉飲酒的儀節，許氏的分析因未能以金文資料為基準，亦失之籠統。

二

西周早期的燕禮，以實地飲酒為其主要特徵，故金文以“飲”或“酒”記之。

壺方鼎（《金文曆朔疏證》1、10）

惟周公于征伐東夷、豐伯、敲古（薄姑）咸戔。公歸戔於周廟。戊辰，會秦會。公賞壺貝百朋，同作尊鼎。

“秦會”即指秦地之酒，“飲秦飲”乃以秦地酒行燕禮。

小孟鼎（《三代》4、44-45）

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喪，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各周廟……大采，三左三右入服酒，王各廟……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雩若翌日乙酉，□三事大夫入服酒……王令賞孟……一、矢百、畫鞬一、貝冑一、金千一，戟戈二……用作□伯寶尊彝，惟王廿又五祀。

“入服酒”即行飲酒之禮，亦即燕禮。

高卣蓋（《博古圖》11、18~19）

惟十又二月，王初饗豢，惟還在周。辰在庚申，王會西官，豢（烝），咸釐，尹易臣惟小斂。揚尹休，高對作父丙寶尊彝。

“王飲西官”即王於西官行燕禮。

在西周早期金文中，不見用“宴”或“區”來記燕禮，但有若干件器銘用“言”字來記燕禮。如：

伯矩鼎（《三代》3、23、2）

伯矩作寶彝，用言王出內事人。

斂卣（《三代》13、33、6~7）

斂作旅彝。孫子用言出入。

蓋古時燕禮乃因外交活動，欲有所“言”而設，故以“言”字記之。“宴”用為

“燕”義乃西周晚期事。“𩇛”字西周早期乃專用於國名、地名，即燕國、燕侯之燕，至春秋以後始用為燕飲之義，“言”古音元部疑母，𩇛、宴元部影母，後世以音近而假宴、𩇛來記言（燕）禮。

西周早期，饗燕並舉，如對上述“王出入事人”，既可用“言”（燕），亦可用饗：令簋（《三代》9、26、2）

用鄉王逆復，用覲察人。

伯寇父鼎（《三代》3、28、1）

用鄉王逆復事人。

衛鼎（《三代》4、15、2）

乃用鄉王出入事人。

倬卣蓋（《考古》1979年1期）

女其用鄉乃辟軹侯逆復出內事人。

應當指出的是，這部分用“言”和“鄉”所記的燕饗之禮，都是諸侯邦國所舉行的，雖也是燕、饗，但與王室所行的大燕、大饗是等級不同的禮儀。

西周晚期出現“宴”字，專記燕禮：

鄂侯御方鼎（《三代》4、32、1）

王南征，伐角雋。惟還自征，在坏。鄂侯御方內（納）壺于王<sup>⑤</sup>，王乃裸之，御方侑王。王休宴，乃射。御方卿王射，御方休闌，王寡。咸飲。王親易御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御方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釐，用作尊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銘中“王休宴”前之“內（納）壺于王”、“王乃裸之”、“御方侑王”等，都應是宴（燕禮）的內容。

春秋之後，諸侯大夫間之燕禮記載轉多，金文中或用“宴”、或用“𩇛”來記錄此禮，而不再用“言”字來記錄了，如用“宴”字者：

邾公華鐘（《三代》1、62、2）

以宴士庶子。

邾公恠鐘（《三代》1、49、1~2）

以宴大夫，以喜諸士。

邾王子旃鐘（《錄遺》4、1~2）

以宴以喜。

又如用“𩇛”字者：

王子嬰次鐘（《殷周金文集成》52）

王子嬰次自作游鐘，永用𩇛喜。

王孫遺者鐘（《三代》1、63~64）

闌二和鐘，用匱以喜，用樂嘉賓父兄及我朋友。

沅兒鐘（《三代》1、53、2~1、54、1）

吾以匱以喜

配兒句鐘（《考古》1983年5期）

以匱賓客

子璋鐘（《三代》1、28、1~2）

用匱以喜，用樂父兄諸士。

許子罍（《考古圖》7、7）

用匱以喜。

杅氏壺（《三代》12、27、3~5）

吾以匱飲。

### 三

（一）據上述西周金文內容看，西周的饗與燕，相同及相近之處尚有許多。

#### 1. 王室大禮

饗禮銘文十一篇，除征人鼎、簋記饗禮由王后主持外，其餘十篇所記饗禮皆由時王主持。燕禮情況亦類似，小孟鼎、高卣蓋、鄂侯御方鼎之燕禮由時王主持，匱方鼎之燕禮由周公主持，東征時，成王年幼，周公攝政，其身份當於時王相伴。因此，西周金文所記之饗燕，其中主要為王室大饗、大燕之禮。另有諸侯一級的饗燕，則金文記敘十分簡略，多為“言”（燕）饗“王出入事人”，即諸侯用饗、燕之禮招待王的傳令使者。

#### 2. 場合

小孟鼎記孟獻俘馘於王，王於周廟行慶功燕。匱方鼎記周公東征凱旋後，於周廟行慶功燕。這與虢季子白盤記虢季子出征凱旋，獻俘馘，王於周廟行慶功之饗情況相似。又小孟鼎記康王禘祭文、武、成三王，然後行燕禮，高卣蓋記行燕禮後又行豷（烝）祀，這與天亡簋在“衣祀”之後行饗禮情況也類似。又鄂侯御方鼎記王應鄂侯之邀行燕禮，這與效卣記王應“公東宮”之邀行饗禮，情況也相似。總之，西周金文所記王室之大饗大燕，舉行場合是相似的。諸侯招待王的使者用饗用燕已如上述，此不贅述。

#### 3. 侑者

穆公簋蓋云：“王夕饗醴于大室，穆公吝（侑）□”。師遽方彝云：“王在周康寢饗



醴，師遽蔑曆、吝(侑)”。適簋云：“王饗酒，適御”。“御”即是“侑”。可見王行饗禮，必設“侑”者。在上述金文中，穆公、師遽、適等皆為作器者，王專門為他們舉行饗禮，命他們在饗禮過程中作“侑”者，因為是件極榮寵的事，故銘之於彝器。

饗設侑，燕亦設侑。鄂侯御方鼎在記燕禮時云：“御方吝(侑)王”。御方也是作器者，在燕禮中充當侑者。與上面饗禮情況相同。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饗）醴，命之宥”。《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於王……王享（饗）醴，命晉侯宥”。“宥”即“侑”，說明王饗禮設侑之儀，直到春秋年間，仍保留着。

#### 4. 獻裸

文獻中記饗有多獻，燕僅一獻。《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饗禮九獻；侯伯之禮，饗禮七獻；子男之禮，饗禮五獻”。其“獻數”與“命數”相當，因為文獻稱“九命成公”。《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楚子入饗於鄭，九獻”。蓋此時楚子身份相當於“公”。

金文記饗燕諸器皆未明言獻儀，更不著若干獻。然而有另一些銅器記錄了獻儀。如：伯父公勺（《文物》1978年11期）

伯公父作金爵，用獻用酌。

善夫山鼎（《文物》1965年7期）

王曰：山，令女官司飲獻人……

善夫克盥（《三代》10、44、2）

用獻于師尹、朋友、婚媾。

《周禮·膳夫》“王燕飲則為獻主”。此所記膳夫之職，與善夫山鼎、善夫克盥所記相合。饗燕有“獻”，膳夫為“獻主”，是可以肯定的。

“裸”為“獻”之重者，《尚書·洛誥》疏云：“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謂之裸”。是知裸者，以酒灌地之儀也。《論語·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裸）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尚書·洛誥》“王入太室，裸”。這些都講的是祭禮中的裸。

《國語·周語中》“及期，鬱人薦鬯，王裸鬯，饗禮乃行”。這是講饗禮中的裸。

祭饗有裸，禮有明文，文獻多有記載。燕禮用裸，則不見文獻記錄。鄂侯御方鼎補充了文獻之不足，云：“鄂侯御方內（納）壺於王，王乃裸之”。御方所獻納之壺當為盛鬱鬯之壺，如孟載父壺（《三代》12、8）云：“孟載父作鬱壺”，說明古有專用盛鬱鬯之壺。王受此壺後，以壺中鬱鬯之酒灌地，行裸儀。說明在西周王參與的大燕中，有儀式化了的“裸”，裸之後纔有盡歡樂的飲宴。《儀禮·燕禮》沒有記燕禮有裸，說明它所記錄的儀節，屬春秋時士大夫間的禮儀，與西周王室大燕儀節有較大出入。



### 5. 酬幣

祭饗之後有酬幣之儀，金文多有記載，如天亡簋記在祀饗之後，天亡得到王爵與囊之賜。師遽方彝記師遽得到王“珣圭一，環璋四”之賜。征人鼎簋、效卣、穆公簋蓋在饗後皆有數十朋貝之賜。大鼎記在饗後有三十二匹馬之賜，三年癸壺記在饗後有羔俎、彘俎之賜，這些都屬酬幣之儀節。

燕之後也有酬幣之儀。如壺方鼎、小孟鼎之燕後，皆有貝及兵器之賜。鄂侯御方鼎記在燕後，王賜御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侑）。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王引之《經義述聞》云當作“三匹”（四匹）。

《左傳》饗後酬幣之數。恰與鄂侯御方鼎燕後酬幣之數相等。師遽方彝之“珣圭一，環璋四”也應該屬“玉五穀”之數，很可能古代饗燕酬幣本有常數。

（二）以上五點是饗燕兩禮之同者，就其異者而言，秦蕙田《五禮通考》一五六卷云：“饗禮烹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禮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履昇堂，無算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

許維遹《饗禮考》舉九事以別饗燕：

饗在廟、燕在寢。

先饗後燕。

饗在晝，燕在夜。

饗立燕坐。

饗不脫履，燕脫履。

婦人入饗不入燕。

饗不飲食燕飲食。

饗後不射，燕後射。

饗賦詩或不賦詩，燕必賦詩。

許氏所言九事，皆據春秋以來文獻資料，其中饗立、不脫履、不飲食、不必賦詩，而燕坐、脫履、飲食，且必賦詩等等，可能與西周饗燕禮儀是相符的。如三年癸壺記王在饗後賜羔俎、彘俎，此饗不飲食也。再如金文稱燕為“言”，詩以言志，故燕必賦詩也。許氏的分析，雖據之文獻，有的却與西周金文暗合，說明傳世典籍確實保存許多先世制度。

然而許氏的分析，有些則與金文不合，如西周早期小孟鼎、壺方鼎的燕禮皆行於周廟，高卣蓋銘的“西宮”，既用於燕飲，又用於烝祀，也應是宗廟建築，故燕亦可以行於宗廟，許氏所謂“饗在廟、燕在寢”與西周早期金文不合。又如長由盃記饗後有大射儀、遯簋記饗前有“矢魚”禮，故許氏所謂“饗後不射燕後射”亦與西周金文不合。

再有穆公簋蓋云“王夕饗醴于大室”。說明西周之饗禮也可行於夜間，許氏所謂饗必在晝，亦不合古禮。

總而言之，王室之大饗大燕之禮，有許多相同的儀節。但饗重威儀，用醴，酒食殽饌，備而不用；燕重言，飲酒食饌，賦詩言志，盡歡而散。二者目的不同，其主要儀節也是有區別的。

本文立論的基礎是經過斷代分析的金文資料，而以文獻資料為附庸，故結論往往與過去經學家們的說法相左。對這些新解是否正確，我是沒有十分把握的。首先，金文本身受其內容的局限，沒有對饗燕兩禮作詳盡的描述。其次，我對有關銘文的理解也不敢說沒有錯誤，這篇小文祇能算是用新資料去探討老問題的一次嘗試吧。

## 注 釋

- ① 這裏統計的四十例是僅就其用作“饗”義而言。尚有嚮義，如“北鄉”即“北嚮”，約二十例。又作“卿”義，如“卿事寮”等，約十餘例。又用作人名，約十例。其他字義總共約五十例，沒有計算在內。
- ② 仲栢父鬲共出土七件，仲栢父簋一件，八器同銘，這裏作一例計算。  
另有中山王方壺、圓壺銘有“以鄉上帝”、“鄉祀先王”等句子，“饗”用於鬼神，但考慮到此時已進入戰國時代，故不計算在內。
- ③ 金文“𠂔”字用為其他意義者尚有二十餘例，如“𠂔奔走”、“𠂔以吉金”、“𠂔皇天”以及用為族名等等。
- ④ 征人簋銘（《西清》27、5）如下：  
奄。癸亥，我天君鄉口酒，賞貝，厥  
征斤貝，用作父口尊彝。  
銘文內容與征人鼎大致相同，作一例算。
- ⑤ 征人鼎、簋唐蘭先生定為共王器，見所著《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唐先生將銘中的“天君”與尹姑鬲（錄遺九七）、公姑鼎（《美集錄》R400）之“天君”誤視為一人，可能是失查其器形所致。《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三、一八七有征人鼎器形照片，乃一分襠柱足鼎，腹飾大饗餐面，是典型周初形制，絕晚不到共王時。征人簋器形見《西清古鑑》二七、五，亦為西周早期形制。
- ⑥ 鄂侯御方鼎現藏上海博物館，我曾目驗原器銘文，御方所內（納），確為“壺”，過去多有釋為“豐”字者，不確。

## 西周金文中的大封小封和賜田里

據文獻記載，西周初年周王大量分封諸侯，用以蕃屏宗周，維繫新生的政權。分封的對象主要是同姓兄弟子姪，也有部分異姓的功臣謀士和先聖王之後。被分封者有的當即就國（如師尚父就國於齊），有的則自己留相王室，以子弟就國。周王在宗周畿內又為這些留相王室者設置采地（如旦采於周，奭采於召等），封建諸侯有大封之禮，設置采地則有小封之典。西周中期以後，大封小封之典禮不常見，而多有土田邑里之賜，這些都透露出西周一代土地所有制度發展變化的軌跡。本文擬以西周金文資料為主體，在探討西周禮制的同時，也對這一時期土地所有制度的若干問題作些初步考察。

### 一 大封

1986年冬，北京郊區琉璃河1193號大墓出土燕侯克壘盃（見《考古》1990年1期），銘文記錄了周初一次大封典禮。壘盃銘文相同，釋文如下：

王曰：“大保，惟乃明（盟），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對（封）。 ”乃享，令克侯于燕。事（剗）羌豸，獻（祖）于御微，克來燕，入土眾有司，用作寶尊彝。

銘中的“對”可讀作“封”<sup>①</sup>，“大對”就是“大封”，這是金文中首次出現“大封”。《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鄭注云：“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鄭注云：“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鄭注反映出漢儒對《周禮》中所記“大封”的內容已不甚瞭然，將此封建諸侯之禮講成軍禮了。《詩·周頌·賚》：“文王既勤之，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毛傳：“大封於廟也。”毛氏認為該詩是廟堂之上行大封典禮時所用的頌歌。“惟乃盟，乃鬯享于乃辟”、“乃享”，前句三“乃”字是代詞，相當於現代漢語“你的”。後句“乃享”之“乃”是副詞，相當現代漢語“於

是”。鄂侯御方鼎（《集成》5·2810）：“鄂侯御方納壺于王，乃裸之。”又“王休宴，乃射”，兩“乃”字用法與後句相同。金文通例，燕饗生人用“鄉”（饗）不用“享”，祭祀鬼神用“享”不用饗。武王乃太保奭之辟君，故“享于乃辟”、“乃享”都是講享祀先辟武王。鬯是浸過香草的酒，幽香可聞於下，多用於祭禮之裸儀。“命克侯于燕”是命侯的述辭。“事（剝）羌豸，獻（祖）於御微”是燕侯赴封前殺牲祖道之祭。《詩·大雅·韓奕》記周宣王錫命韓侯，有“韓侯出祖，出宿於屠”句。疏云：“《烝民》有‘仲山甫出祖’，仲山甫爲二伯，韓侯爲侯伯，故兩詩皆有出祖祭道神之事。”韓侯、仲山甫受封爲侯伯，赴任時有祖祭道神的儀式，與本銘克赴燕，殺牲祖道是相似的。“入土眾有司”指燕侯克受納列土及燕地民衆。《書·禹貢》：“徐州厥貢惟五色土。”《逸周書·作洛》：“乃建大社於國中，其位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這種列土封建的制度，看來確曾行於周初，後世沿用，作社稷壇，成爲國家的象徵。

1193 號大墓有四條墓道，其規模已具備諸侯墓葬條件，按一般分析，墓中所出長銘重器的器主燕侯克，有可能就是該墓的墓主。文獻記載，燕國第一代燕侯是武王滅商後所封的召公奭。召公年高多壽，歷仕三王，康王時仍出任太保。因此是在他在世時就將爵位封地嗣繼給其子克了，燕侯克起碼應是第二代燕侯（當然，也不能排除召公在武王時就未受封，而由其子克受封，那樣的話，克就是第一代燕侯）。惟克嗣封爲燕侯的典禮召公是一定會到場的，故銘文中記有成王對太保說話的口氣，因爲克能在召公生年得繼燕侯，必定是由召公作出決定的。從銘文看，大封禮後燕侯克殺牲祖道就封於燕，可能這個大封典禮是在宗周（或成周）舉行的，這樣就更便於當朝輔政的召公就近出席典禮。

西周早期記封侯的還有宜侯矢卣（《集成》8.4320）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四國圖。王卜于宜，入土，大鄉（饗）。王令虞侯矢曰：“遷侯于宜。”賜□鬯一卣、賞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賜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百又四十。賜在宜王人□□又七里，賜奠□伯厥□□又五十夫，賜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矢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該銘記封建宜侯典禮有“王省圖”儀注。無惠鼎（《集成》5.2814）云：“王各於周廟，□於圖室，”說明周廟中有圖室。圖當指地圖，長沙馬王堆曾出土西漢地圖，文獻記載古人繪製地圖早於西漢。如《周禮·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圖與人民之數。”《周禮·土訓》：“掌道地圖”等都說在周代就有各種地圖和掌管地圖的官員和機構。王封建諸侯例需察視擬封之國的地理，故需入

圖室省圖，本銘之“武王成王伐商圖”、“四國圖”都是圖室中的專用地圖。而將“入土”與“賜土”分開記載，說明“入土”是納受“列土”，與後面所說的山川田土之賜不是一回事。綜觀全銘是記錄虞侯矢受王命遷侯於宜，宜的土地田宅及率土之貴族庶民一並賜予新封的宜侯。

記錄封建諸侯的還有麥方尊（《集成》11.6015）

王令辟邢侯出坏，侯于邢。于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尤。會王饗蓼京，酹祀，于若翌日。在璧雍，王乘于舟，為大禮。王射大龔禽，侯乘于赤旂舟從。死戚之日，王祀，侯內于寢。侯賜玄琫戈。于王在戩，祀月，侯賜者矧臣二百家。儗用王乘車馬、金勒、門、衣、市、焉……用龔義寧侯，覲考于邢侯……

該銘記錄王命麥的辟君離開坏地，封於邢，作邢侯。然後記錄了邢侯覲見周王，此時正值周王饗祭酹祀於蓼京，禮儀十分隆重，稱“大禮”，有祭祀日月的儀注（“王祀”即祀日，與後銘之“祀月”相對應），新邢侯參與其事並受到賞賜。唐蘭指出：“本銘說‘覲孝於邢侯’，明‘邢侯出坏’並非第一代邢侯。此說王命‘侯於邢’，是嗣位須受王命。”“第一代邢侯封於康王時，見邢侯簋。此疑第二代，當昭王時。”所以本銘所記封侯應為嗣封。銘中的周王乘舟於辟雍水中射禽的禮儀有可能是饗祭及酹祀的儀注，而祭祀日月的禮儀則可能是大覲禮的儀注。<sup>②</sup>

大孟鼎（《集成》5.2837）銘記的也是嗣封之事，銘文前段敘誥辭，後段敘嗣封的文句：

王曰：“惟命女孟型乃嗣祖南公。”王曰：“孟，迺召夾死司戎，敏諫罰訟。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于我其適省先王，授民授疆土。賜女鬯一卣、門、衣、市、焉、車、馬，賜乃祖南公旂，用狩。賜女邦司四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賜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

這裏孟繼嗣的是其祖南公的封地，而不是其父的封地，而且銘中有“……自厥土”的文句，似乎賜予孟的土地人民祇是南公原領有的部分土地，可能嗣封者尚不祇孟一人。如果這種猜測可以成立的話，那麼這種類型的嗣封就含有弱幹強枝在政治上削弱某些大貴族權勢的用意在內。銘中的“邦司”、“夷司”即燕侯克器中的“有司”，這些管事者率其民衆土地統歸新君孟領有。

金文中記嗣封的還有伯晨鼎（《集成》5.2816）

惟八月辰在丙午，王命亘侯伯晨曰：“嗣乃祖考侯于亘，賜女秬鬯一卣、玄衮衣、幽夫、赤焉、駒車、畫靳、韞父、虎幃、冪衮、里幽、攸勒、旅五旅、彤、紗、旅弓、旅矢、□戈、虎冑。用夙夜事，勿廢朕命。”

伯晨的父祖是亘地之君，歷代為亘侯，現已去世，故稱祖考，由其子伯晨嗣繼其封地。此器作於西周中期，說明此時諸侯的嗣封仍須得到周王的承認，並舉行過大封典

禮，受到王的禮器、兵器及車馬命服的頒賞之後纔算正式確認。

金文中還有兩件器記有大封禮，但內容更為簡略。

沫司土疑簋（《集成》7.4059）

王來伐商邑，詎令康侯圖于衛。沫司土疑罍圖，作厥考尊彝。

文獻記載，原封於康的康侯，在二次伐商，平定管蔡之亂後，被封於衛，稱衛康侯。簋銘中的圖即鄙，《廣雅·釋詁》：“鄙，國也。”《周禮·大宰》注云：“都之所居曰鄙。”建國之都於衛地，自然是指封為衛侯的意思，文獻與金文相合，這是金文中記封侯命辭的又一種敘述方式。作器者“疑”是沫地司徒，沫是衛之都邑，凡封侯賜土需連同當地有司及民衆一並賜予新君，故沫司土疑在康侯圖於衛時，也一並“罍圖”。

與上述簋銘類似的還有雍伯鼎（《集成》5.2531）

王令雍伯圖于生，為官，雍伯作寶尊彝。

銘中的“圖于生”與沫司土疑簋的“圖於衛”同例，即封建於生地之意。《左傳·莊公九年》：“殺子糾於生竇。”杜注：“魯地。”指今山東荷澤北部，或許就是銘中生地所在。此雍伯之雍國可能有二，一為文王子所封國，姬姓，在今河南沁陽一帶。一為黃帝之後，姁姓，在河南杞縣一帶，估計此雍伯為前者可能性大些。不管是那個，雍伯由河南遷封到山東應該是某種政治鬥爭的需要，是西周早期大量封建諸侯的又一例證，可補文獻之不足。

上述諸器除伯晨鼎外，燕侯克器、宜侯矢簋、大孟鼎、麥方尊、沫司土疑簋、雍伯鼎皆作於西周早期，大約都在康昭以前，與文獻所記封侯集中在西周早期的情況是一致的。

燕侯克器、大孟鼎、麥方尊、伯晨鼎所記是嗣封，即新侯襲承父祖之封。宋程公說云：“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春秋分記》）。從銘文看，西周諸侯的襲承確需經周王批准方可。宜侯矢簋、沫司土疑簋、雍伯鼎所記是遷封，虞侯遷封於宜、康侯遷封於衛、雍伯遷封於生。這反映西周早期政治動盪，周王為把親族和親信安置到要害地方所作的努力。西周王室就是通過這些封建、嗣封、遷封的措置來控制版圖內大大小小諸侯國，以實現其政治統治的。

這是周人的重大政治活動，可以想見其禮儀一定十分隆重。根據上述，可以擬測大封禮的儀注如下：

第一，王入圖室省圖。

第二，於廟堂享祀先祖，行大享禮，頌歌用《賚》。

第三，內史冊命，命侯之辭有“命某侯于某”、“命某遷侯于某”、“命某嗣侯于某”、“命某圖于某”等。



第四，入（納）土，即頒賜五色列土。

第五，授民授疆土，即頒賜土地宅里及有司民隸等。

第六，頒賜秬鬯、玉瓚、弓矢、戈胄、命服、車馬、旌旗等。

第七，行大饗禮。

以上七項是金文中記錄的大封禮的重要儀注，典禮過後，受封諸侯要殺牲祖道就國，就國後要啓宮宇，左祖右社，立社壇，置列土，並由王室官員測土地，封疆界等。在周代，這些禮儀都有專門文字作出規定，一些重大典禮也都有專人加以記載。《周禮·春官·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協事，祭之日執書以位次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昭王。”說的是在行祭禮和會同朝覲禮之先，大史要與衆執事按禮書演習，在正式舉行典禮時要按規定的儀注行禮。可以想見，大封禮也有可能曾有過專門的記載，祇是秦火之後沒有保存下來而已。

《周禮》一書大約成書於戰國時代，其中保存了許多西周的典章制度，是我們今天瞭解西周禮制的重要文獻資料。但此書是經過後世人加工整理的，有許多後世制度摻雜其間，是需要謹慎取捨的。比如《大宗伯》及《大祝》職文都有“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一句，並記祭祀“用牲幣”。鄭玄更以后土爲黎，爲句龍之神。其實，這些神祇都是春秋戰國間人附會出來的，在大封禮中除敬祀祖先而外，是否還用敬祀后土，並用牲幣，則難以肯定，金文中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極可能是將後世制度摻入了。

## 二 小封

《周禮·大宗伯》賈疏云：“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先秦文獻中並沒有小封的記載，但考慮到古代禮制往往大小相配的習慣（如《儀禮》中有《大射》和《鄉射》、《大饗》和《鄉飲酒》等禮，其基本儀注相似，祇是級別規模不同而已），金文和文獻都有大封禮的記載，賈公彥所說的小封禮也可能是有所本的。

金文中確有記封賜采邑的銘文，如：

中方鼎（《集成》5.2785）

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兄（貺）鬲土。王曰：中，茲鬲人入使賜于武王作臣，今兄（貺）畀女。鬲土作乃采。中對王休令，鬻父乙尊。

遣尊（《集成》11.5992）

惟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序，賜遣采曰趙。賜貝五朋。遣對王休，用作媯寶彝。

上兩器都明確提到賜采，但什麼是“采”呢？《左傳·莊公八年》疏云：“人君賜



臣以邑，令取賦稅，謂之采地。”《詩·緇衣》疏云：“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曰：“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公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禮記》、《左傳》及《詩經》諸註家對采邑的說法應該是秦漢以後的制度。據中方鼎銘所記，鬲土與鬲人是一並賜予中的，土作采，人作臣。並非僅賜田邑取其賦稅而已。這與大封禮中封建諸侯的情況是相同的，祇是賜采地較之封建諸侯規模要小一些。至於西周世官世祿，文獻和金文都有許多材料可以證明，比如周公的子孫世爲周公，食其采，嗣其位，並無不得嗣爲公卿大夫的規定。

從上兩器銘看，采邑之賜，可以是王對臣下的恩賜，中及遣都是王的近臣，並不是如《禮記·禮運》所云祇有大夫所賜者稱采（“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爲制度。”）食邑何以名采，其詳不知。從上兩器看，遣尊之采僅祇一個邑，而中方鼎之采稱“鬲土”，可能是指包括若干邑的一塊領地。

金文中明確提到賜采者僅上述兩器，而言及賜土者尚有若干器，我以爲賜土當指賞賜包括若干邑的一塊領土，與中方鼎之賜鬲土類似。

召卣器（《集成》16.10360）

惟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啓進事，旋走事。皇闡君休王自穀使賞畢土方五十里。

《禮記·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這種整齊劃一的地塊當出自後世儒者的安排，但“方五十里”爲當時領地的一個特定單位則是有可能的。

作冊矢尊（《集成》11.6016）

惟五月，王在庠，戊子，令作冊折兄（貺）望土于相侯，賜金賜臣……

大保簋（《集成》8.4140）

王伐象子貳，獻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永大保，賜休余土……

上述五件記賜采土的銅器，賜采土之地點兩在庠地，一在寒次，一在穀地，一在伐象子返途中某地，皆不在京師。說明小封之禮不像大封之禮那樣隆重，都要在京師廟堂之中舉行，而是可以隨處舉行。又五件器中有四件記有時間，兩件在十三月，一件在十二月。十三月應是年終置閏，即閏十二月。這好像並非偶然巧合，可能這種頒賜采土的禮儀多於年終舉行。

上述諸器中被賜采土者如大保、中、遣、召、作冊折等人都是王朝命官，可見采地之賜主要是王對大臣的特殊封賞。公卿大臣本人對其下屬有采土之封賞者，金文中僅有一見：

亳鼎（《集成》5.2654）

公侯賜亳杞土、巢土，𠄎禾、𠄎禾。

這條材料很重要，它說明西周確實存在着不同等級的頒賜土地制度，起碼這種等級有王及公侯兩級。上述六器皆作於西周早期，說明在西周早期周王朝對土地的管理制度，除有封建諸侯外，還有頒賜采土作為補充。

記錄賜采土諸銘文都十分簡略，極少言及禮儀的具體內容。可能其禮儀不像封建諸侯那樣隆重，沒有宏大的規模和場面，因而也就沒有必要在銘文中詳加鋪敘了。

### 三 田里之賜

田指耕地，里指邑里。田里之賜較之采土之賜，其規模又小一層，而且多行於西周中期以後，西周早期僅發現一件銅器。

旗鼎（《集成》5.2704）

惟八月初吉，王姜賜旗田三千待𠄎。

賜田者王姜為周初某王之后妃，被賜者旗是王朝史官，可能因為有功於王姜，被賜三田。西周早期賜田是個別現象，且不是由王頒賜。西周中期以後，金文中所記田里之賜就多起來了。

永孟（《集成》16.10322）

惟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內，即命于天子。公迺出厥命：“賜畀師永厥田，陰陽洛疆畀師俗父田。”厥畀公出厥命井伯、榮伯、尹氏、師俗父、遣仲。公迺命鄭司徒函父、周人司工眉、致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厥田。厥率履厥疆宋句。

此銘記賜田過程較為詳細，先在冊命辭中劃出所賜田的疆界，命朝廷重臣到場監督執行，然後由下級吏員具體執行交付。

記載賜邑里的銘文有大簋蓋（《集成》8.4298）

惟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在蠶俛官，王乎吳師召大，賜趨嬰里。王令善夫豕曰趨嬰曰：“余既賜大乃里。”賓豕璋、帛束。嬰令豕曰天子：“余弗敢吝。”豕以嬰導大賜里。大賓豕鬯璋、馬兩。賓嬰鬯璋、帛束。

本銘記周王將原屬趨嬰的邑里轉賜給大。里是邑中的行政單位，其長曰“里君”（文獻作“里居”）鬴簋（《集成》8.4215）：“命女司我成周里人及諸侯大亞。”史頌簋（《集成》8.4215）：“里君百生帥堦盤於成周。”兩銘中的“里君”、“里人”都是成周都邑內的基層行政的管事者。永孟和大簋蓋皆作於西周中期，說明在此時，周王可以

重新安排田地和邑里的領有權，既或改賜他人，原領有者也“不敢吝”。從銘文看，這種改賜是和平進行的，得到賞賜的“大”送給原里主人嬰璋和帛，被剝奪了領有權的嬰不但“不敢吝”，而且還要賓贈傳達王命者豕以璋和帛，並要親自去向大交割邑里。

西周晚期的賜田，多是賞賜有功者，在冊命典禮中與其他物品一並頒賜，不另設特殊儀式。

#### 大克鼎（《集成》5.2836）

……王在宗周，旦，王各穆廟，即位。申季右善夫克入門，立中廷，北向。王乎尹氏冊令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納朕命，今余惟申京乃命，賜女叔市、參同、莒恩。賜女田于野、賜女田于淠、賜女邢寓 □ 田于嵒，以厥臣妾。賜女田于康、賜女田于匱、賜女田于陶原、賜女田于寒山。賜女史、小臣、霽龠、鼓鐘。賜女邢微、□人輶，賜女邢人奔于量。敬夙夜用事，勿廢朕命。”

克盨云：“王令尹氏友史趁典善夫克田人”，與克鼎銘所記當為一事。本銘重申並提高對善夫克的任命，故賜其命服和田人。善夫克職司出納王命，從克組銅器規模宏大的氣勢中，可以想見其在西周晚期是一位十分顯要的貴族，王對其賞賜田人的數量也是很可觀的。

#### 敵簋（《集成》8.4323）

惟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敵，告擒馘百、訊四十。王蔑敵歷，使尹氏授釐敵圭瓚、□貝五十朋、賜田于斂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本銘記王命敵抵禦南淮夷的進攻，取得勝利，然後賜田達百田之多。《周禮·司助》：“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鄭玄注云：“鄭司農云正謂稅也。”“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這是講賞田需按比例向王室納稅，加賞的田可不再徵稅。賞田是否納稅？納多少比例？在金文中都沒有反映，只能存疑。

#### 卯簋蓋（《集成》8.4327）

惟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榮季入右卯立中廷，榮伯乎令卯曰：“叡乃先祖考死司榮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司荊人。不淑取我家窠用喪，今余非敢夢先公有進退，余懋再先公官，今余惟令女死司荊官荊人，女毋敢不善。賜女瓚、璋四穀、宗彝一將寶。賜女馬十匹、牛十。賜于乍一田、賜于密一田、賜于隊一田、賜于猷一田。”

此銘記榮伯賜其家宰卯田四田及玉器、命服、牛馬，彝器等。

#### 不其簋（《集成》8.4328）

伯氏曰：不其，女小子，女肇誨于戎工，賜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

用永乃事。

兩器皆作於西周晚期，賜田者榮伯和伯氏是朝廷重臣，其賜田規模遠不如王室，一賜四田，一賜十田，較之敵簋動則百田之賜的氣派大有遜色。但這兩件器銘說明，在西周晚期，耕地也是可以分等級頒賜的。王可以賜予臣，大臣亦可以賜予下級貴族，說明此時大貴族有權處置自己領有耕地的一部分。

不其簋記王命伯氏伐玁狁和御方，不其協助伯氏取得軍事勝利，故受伯氏賞賜。與此相類似的有多友鼎（《集成》5.2835）記武公元士多友奉命追擊玁狁，恢復京師，凱旋受賞一事。其銘有：“王迺曰武公曰：女既靜京師，釐女，賜女土田。”王對武公賞賜“土田”，一般的說，在西周晚期極少見以“土”相賜的，此銘之“土田”也可能即指田，亦即耕地。

綜上所述，可歸納如下幾點：

第一，分封諸侯有“命侯”、“嗣侯”、“遷侯”之別，但皆需舉行由王蒞臨的大封禮，該禮儀式十分隆重，現根據金文可擬測其中主要儀注七項。賜采地需行小封禮，其儀注不詳。賜田則沒有專門禮儀，多隨冊命賞賜儀式一並進行，田算作諸賜品之一。

第二，在西周，土地田邑人民皆屬王有，土地上的奴隸、官吏以至貴族往往隨土地田邑一並封賞。王有權改封和改賜，諸侯貴族不得有反對的表示。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確實是西周一代土地制度的如實寫照。

第三，西周土地分封制度大體分兩個階段，在西周早期主要是封建賜采，把大量土地劃歸大小諸侯去分頭管理。中晚期則採取賞賜耕地的辦法，稱賜田若干，其規模顯然遠不如早期那麼大。

第四，王分封賞賜給大貴族的土地田邑，一經成為固有領地，就具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大貴族可以闢出小塊土地或耕地賞賜給下一級小貴族。不過，從金文看，這些地塊都相當小，不足以動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所有制。但可以想見，隨着王權的衰落，正是這些蟻穴終於導致王有土地所有制大堤的崩坍，引發出土地私有化的革命，使社會大步向前邁進一步。

## 注 釋

① 古文字中“奉”、“封”、“對”三字皆像人以手植樹於地之形，為樹藝本字所分化而成此三字。甲骨文中的“東對”、“西對”可讀作東封、西封。散氏盤的“一奉”、“二奉”也應讀作“一封”、“二封”。1984年平頂山市出土封虎鼎，封字像雙手植木於地之奉（見《考古》1985年3期）。六年召伯虎簋（8.4293）：“對揚朕宗君其休”，中觶（12.6514）：“中對王

休”，兩“對”字皆寫成人植樹木於地之“封”。與同銘之“余典勿敢封”之“封”字相類似。因字形相近，此三字在金文中每相混用。

- ②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年4期。《西周金文中的相見禮》，第八次古文字討論會論文，待刊。

（原載《中國考古學論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紀念》315～322頁，科學出版社，1993年5月）

## 西周金文中的軍事

研究西周時代軍事歷史，可靠的資料十分缺乏。近年，中國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把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運用到軍史研究中去，會為軍史研究增加一批新的第一手資料。西周金文之銘長者多為銘功紀賞而作，其中銘記戰功諸器保存了許多當時戰事的實錄。我從中選出 70 篇金文和一篇玉戈銘（見附錄一），它們記錄了當時軍隊的編制和西周早、中、晚期各次戰役的實況。我還選出 35 篇金文（見附錄二），它們記載着西周各個時期俘獲和賞賜的車旗、兵器、防護器的情況。作器者在記述這些戰事的同時，也記錄了一些當時軍禮的儀節。本文擬以金文資料為主，結合考古和文獻資料，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上述諸問題，再作些探討。

### 一 表示征戰的詞語

征。在本文收錄的 71 件有關西周戰事的銘文中，共 26 次使用了征字，早期 15 次，中期 2 次，晚期 9 次。《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孟子》對征字所下定義，例之金文，無一不合。金文中用為戰事的征字，都是用於王或貴族自上而下對異族或叛反邦國的討伐。

伐。此字在金文表述戰爭諸詞中，使用頻率最高，在本文收錄的 71 件銅器銘文中，使用達 41 次之多。《說文》“伐，擊也。”征與伐在詞意上相近，但也有兩點不同：第一，征字全部用於上伐下，伐字可以用於上伐下，也可以用於下伐上。如：“馭淮夷敢伐內國”（𠄎𠄎尊、卣）、“南淮夷遜、爰內伐涇昂、參泉、裕敏、陰陽洛”（散簋）、“亦惟鄂侯御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禹鼎）、“御方、玁狁廣伐西俞”（不其簋）、“用玁狁方興，廣伐京師”（多友鼎）等，從作器者角度考慮，在文意上都是下伐上的例證。第二，征字用為總括的較大的戰役，伐字則多用於具體戰役。有時兩



詞對用，這一點就看得更清楚，如“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虢仲盃）、“玁狁從王南征，伐楚荆”（玁狁簋）、“王征南淮夷，伐角淮、桐邇”（麥生盃）、“伯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伐海眉”（小臣諶簋）、“東征…廣伐東國…伐長必…伐長必”（史密簋）。征與伐兩字也有時連用，構成一個複音詞，如“惟周公于征伐東夷”（豐方鼎）。這裏還有一個歷史積案，即周法高先生在考釋《師旂鼎》時曾說：“在金文中征伐的征字，後加賓語時，從不用‘于’字作介詞。”又說：“其實和征字用法相近的倒有伐字，通常也未見用‘于’字爲介。”因此，他斷言鼎銘之“師旂衆僕不從王征于方雷”之“方雷”不是地名或方國，而主張所征地爲“于方”（《金文零釋》）。後來考釋《師旂鼎》諸家多從其說。其實這個結論囿於當時有限的材料，是不能成立的。1955年陝西郿縣出土的《盩駘尊》銘“方雷駱子”、“方雷騅子”是指方雷地的兩匹馬駒（《文參》1957.4），“方雷”應爲地名。又《殷周金文集成》新著錄的《繁簋》“公令繁伐于豳伯”（《集成》8.4146），此銘中的“于”字無法它釋，祇能認爲是伐字後之介詞。所以我認爲征、伐之後加介詞“于”字是可以的，師旂衆僕所不從王征者即應是“方雷”之地。

克、殽、戔。

克：“克昏”（利簋）、“克商”（小臣單觶）、“丕克乞衣王祀”（天亡簋）。此字意指“攻殺”，《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即用此意。

殽：“惟巢來殽”（肇貯鼎），西周戰事金文中用此字僅此一見。其意如文獻之“作”字。《禮記·內則》“魚曰作之。”注：“斫也”。即殺、伐、斬、斫之類意。

戔：“王令遣戔東反夷”（寔鼎）、“呂行戔，俘貝”（呂行壺）、“惟周公于征伐東夷、豐伯、薄姑，咸戔”（豐方鼎）、“以師氏有司後或戔伐鵠”（窆鼎）。《說文》“戔，傷也。”意爲“打擊”，金文中這幾處用爲戰爭詞語的戔字，講爲“傷也”，皆可通，不必強作它解。

狩。金文寫作獸。“王出狩南山”（啓卣）、“交從狩”（交鼎）、“令大保省南國，帥漢，徂狩南”（大保玉戈）、“王狩于視南”（貝鼎）、“賜乃祖南公旗，用狩”（大孟鼎）。狩，獵也，原意爲田獵。古代常以田獵作爲軍事演習、校閱軍隊的一種方式（可參見楊寬先生《大蒐禮新探》，《古史新探》256頁），當然也是炫耀武力的一種方式。《易·明夷》九三：“明夷於南狩”，注曰：“狩者，征伐之類。”《啓卣》云“王出狩南山”又云：“啓從征”，《啓尊》云：“啓從王南征。”兩器所言爲一事，可見狩字已成爲征伐的隱語，此字也多用於西周早期。

及。“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保卣）、“戎大同，永追汝，汝及戎，大敦搏”（不其簋）。這個“及”字諸家爭議較大，而此字的確詁，關係到對整篇保卣銘的理解，即“東國五侯”是敵方抑或是盟方的關鍵問題。我以爲從《不其簋》銘“及”字用意看，



祇能理解為“追擊”之意，《說文》“及，逮也。”因此，《保卣》銘“及殷東國五侯”，應即“追擊殷東國五侯”之意，“五侯”應為敵方，《不其簋》“汝及戎，”即“你追擊戎”之意。

戍。“伯買父乃以厥族人戍漢中州”（中甗）、“命戍南夷”（竟卣）、“汝以成周師氏戍于古師”（𠄎貳尊）、“𠄎從師雍父戍于古師之年”（𠄎尊）、“師雍父戍在古師”（遇甗）、“𠄎從師雍父戍于古師”，（𠄎卣）。《說文》“戍，守邊也。”《爾雅·釋言》“戍，遏也”。注：“戍守所以止寇賊。”《左傳·桓公六年》“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注：“守也。”綜上所述，戍字意為武裝駐守禦敵，此字多用於西周中期。

御。“貳率有司、師氏奔追御戎于械林”（貳簋）、“王用肇使乃子貳率虎臣御淮戎”（貳鼎）、“王令敵追御于上洛焮谷”（敵簋）、“余命汝御追于罍”（不其簋）。《左傳·襄公四年》“季孫不御”，注“止也”。御即禦，有阻止、抵抗的意思。《不其簋》、《敵簋》之“追御”、“御追”即《貳簋》之“奔追御”之省，此字多用於西周中晚期。

追。王令東宮追以六師之年”（肇貯簋）、“追于𠄎”（昌鼎）、“貳率有司、師氏奔追御戎于械林”（貳簋）、“王令敵追御于上洛焮谷”（敵簋）、“王令我羞追于西”、“余命汝御追于罍”（不其簋）、“命汝羞追于齊”（師族簋）、“告追于王”、“羞追于京師”、“韞追于楊豕”、“追搏于世”（多友鼎）。“羞追”有時又可省為“羞”，“王羞于𠄎”（師同鼎）。《說文》“追，逐也”。金文有“奔追”、“羞追”、“韞追”等。《說文》“奔，走也”。《詩·周頌·清廟》“駿奔走在廟”。奔有奔跑意，“奔追”即疾追也。《說文》“羞，進獻也”，有“進”意，《書·盤庚》“今我既羞告爾於朕志”，傳：“已進告爾之後。”因此，“羞追”即“進追”。“韞”字較繁複，車、戈為附加的意符，《說文》“楚謂疾行曰逞”，《廣韻》“逞，疾也”所以此字實為“逞”字，“韞追”，即以兵車疾追。

搏。“邢侯搏戎”（諫簋）、“搏戎胡”（貳簋）、“大敦搏”（不其簋）、“搏伐玁狁，于洛之陽”（虢季子白盤）、“搏于邾”、“搏于龔”、“追搏于世”（多友鼎）。《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與楚子搏”，搏，手擊也，指近距離的戰鬥。

以上九種戰事用語，帶有上伐下語意的如征、狩、克、伐等多用於西周早期，帶有防守、抵禦語意的如戍、御等則多用於西周中晚期，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西周中晚期周人所處的被動局面。

觀兵。

《效卣》（《三代》13.46）

惟四月初吉甲午，王觀于嘗，公東宮納饗于王，

王賜公貝五十朋，公賜厥陟子效王休貝二十朋……

日人高田忠周指出：《效卣》“觀於嘗”之“觀”字乃假借爲“觀”，並引《左傳·襄公十一年》“觀兵於南門”爲例加以說明（《古籀篇》），這是很對的。《史記·周本紀》記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國語·周語》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左傳·僖公四年》“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左傳·襄公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史密簋》（文物 1989 年 7 期）

“惟十又一月，王令師俗、史密曰：東征。攸南夷：盧、虎、檜，杞夷、舟夷。觀，不陟，廣伐東國。”

王命師俗和史密東征，他們會合南夷的盧、虎、檜及東方的杞夷、舟夷。觀兵，大踏步前進，廣伐東國。綜上所述，“觀兵”類似於“出狩”，是西周時一種炫耀武力的軍事行動，而不是單純的田獵和檢閱部隊。從上引《國語》及《史密簋》所記看，“出征”也可隱稱“觀兵”。

射魚。

《井鼎》（《三代》4.13）

惟十月，王在葵京，辛卯，王漁

于口池，呼井從漁，攸賜魚……

《通簋》（《三代》8.52）

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葵京，呼

漁于大池。王饗酒，通御，亡譴。

穆王親賜通犒……

又《公姑鬲》記天君賜公姑魚三百，（《美集錄》R400）當爲射魚後的賞賜。《害簋》記“官司夷僕、小射，底魚”。“底魚”據陳夢家先生考證即爲專司射魚的官吏。這些都是射禮中“水射”的一種（見作者《西周金文中的射禮》《考古》1986 年 12 期）。《淮南子·時則訓》“季春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春秋·僖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左傳》云：“公將如棠觀魚。”爲此，臧僖伯還發表了一通十分迂腐的議論，僖公最後道出其射魚的真意，曰：“吾將略地焉”。是知，“矢魚”也如“出狩”、“觀兵”一樣，是一種軍事行動的隱語。

以上所說，周人對其軍事行動往往使用隱晦的語句加以記敘，盛行於《春秋》、《左傳》等儒家經典中的“春秋筆法”，想不到早在西周金文中即已露端倪。

## 二 西周軍隊的編制與裝備

### （一）編制

1964~1965年于省吾先生與楊寬先生對金文中的“六師”和“八師”問題，展開過兩輪辯論（見《考古》1964第3期、8期和1965年3期、10期）。于先生通過對一些銘文內容的考證指出：西周軍隊中“設置了冢司土、司佃事、司藝、司牧及冢司馬等專職，以掌管土地、農佃、種藝、放牧、馬政等各項有關生產方面的事務，則在軍隊物質生活供應上，只要取償於軍隊的經常駐在地，便可以自給自足，省却了轉粟輸犂之勞。可以說，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初出現的屯田制”。楊寬先生認為西周時期已分國野，因而有一套完整的鄉遂制度，軍隊的編制完全是和鄉黨組織結合起來的，“六軍”就是由六鄉的居民編制而成。這種鄉邑的國人又稱“士”，平時肆力於耕耘，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者也。既然古代的戰士沒有脫離農業生產，那麼西周的六師、八師設有掌管農業生產的官也就是很合理的了。兩位先生的辯論，引發了人們對西周軍事制度和社會結構的深入思考，對西周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于先生認識到的西周軍制中耕戰結合的特點，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當然，先生把這說成是完整意義上的“軍事屯田制”，則顯然是把問題說過了一些。楊先生把西周金文中耕戰結合的軍制與《周禮》中提到的鄉遂制度互相比勘，這個意見也同樣很有價值。從新出《史密簋》中，我們又發現了明確記載的“遂人”，“齊師族徒、遂人乃執圖、寬、亞。師俗率齊師遂人左□伐長必。”這裏“遂人”是齊師的組成部分，這證明起碼在西周晚期齊地已有了鄉遂制度。但這與楊先生的另一觀點却是矛盾的，即楊先生依《周禮》所記認為只有六鄉里的國人（或稱士）纔有資格成為軍隊的戰士，遂野之氓只能充當芻糧的生產和供應者。而《史密簋》銘却告訴我們，遂人也可以充當戰士，是軍隊的組成部分。金文資料說明，六鄉之士（金文稱“邑人”）與六遂之氓，在戰時都將被徵調參加戰鬥。所以，我認為楊先生依《周禮》所構想的，認為在西周有一套完整的鄉遂制度，又用西方古代氏族社會末期實行的“軍事民主制度”來套合中國西周時代的國野、鄉遂制度，也有些脫離中國的歷史實際。看得出來，兩位先生在下結論時，都受到已有文獻中傳統結論的影響，用其已有的模式去套合金文資料。如我們能客觀地分析金文資料，就會發現，在西周戰爭舞臺上活躍着一支支“族武裝”。如《明公簋》曰：“惟王令明公遣三族伐

東國”《班簋》曰：“遣令曰：以乃族從父征，出城衛父身。”《史密簋》曰：“史密右率族人，桀伯、焚眉周伐長必。”這個“族武裝”的概念當然不只包括血緣親族，也當包括從屬於其家族的家臣武士及其他附屬於其家族的武裝。如《師旂鼎》說，其衆僕不從王征，因而引起訴訟。可見其“衆僕”理應是從征的戰士，應為師旂族武裝的組成部分。這種族武裝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如《禹鼎》中的武公，一次戰役可動員“公戎車百乘，斯御二百，徒千”。《多友鼎》於一次戰役可以公車俘戎車 117 乘之多。在《禹鼎》中雖然包圍鄂侯御方聯軍主力的任務由西六師和殷八師來承擔，但出奇兵，攻入鄂京，生俘御方的還是靠武公的家族武裝。《多友鼎》記對玁狁的戰爭是十分激烈的，其來勢兇猛，京師淪陷，四方震盪，西周王室面臨岌岌不可終日的局面。這時，主要是靠武公的族武裝解除了對京城的威脅，使周王朝轉危為安。西周早期金文，文辭簡約，如周公、太保召公奭等家族武裝的規模沒有記載，其詳不可知，但從他們擔當的政治、軍事任務看，是肯定會有很強大的族武裝的。因為西周初年曾實行分封制度，封君一方面要鎮撫土著，另外還要對付四周夷族和殷遺的攻擾，沒有一個強大的武裝集團，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就是這些族武裝構成了屏障宗周的強大的地方武裝。地方武裝一般也以師為單位，如《趯鼎》“命汝作幽師冢司馬，嫡官僕、射、士”（《三代》4.33）、《善鼎》“命汝左正冢侯，監幽師戎”（《三代》4.36）地方各師官員由王直接冊命，並由王派“監”加以控制。

對西周軍隊的六師和八師，于、楊二先生都認為是西周王室控制的主力部隊。但于先生認為六師為西土部隊，殷八師和成周八師是東土一個隊伍的兩個不同稱呼。楊先生認為殷八師和成周八師是兩個不同的隊伍。這裏順便提一下，容庚先生也認為殷八師和成周八師是兩個隊伍，而且形象地比喻殷八師是滿洲八旗，成周八師是漢軍八旗。我同意楊、容先生把殷八師和成周八師分開的意見，我認為西六師由其駐防西土而得名，殷八師因其駐防於殷地而得名，《小臣謎簋》曰：“伯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俘其復歸在牧師。”可見殷地牧師為其駐防地。成周八師也應因其駐防於成周而得名。關於六師及兩八師的組成，容老提出的看法十分形象，但卻無法證實。仔細閱讀西周戰事金文會發現，王族（可能包括部分公族）的族武裝應是六師和兩八師的核心力量。如《肇貯簋》曰：“王命東宮追以六師之年”，東宮是周王太子，是他統率六師去追擊來伐的巢部。《盂方彝》曰：“王冊命……曰：用司六師王行……”“王行”應是王族武裝。《中觶》曰：“王大省公族於庚。”可見“公族”也有獨立的族武裝。《小臣謎簋》曰：“伯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伯懋父又稱王孫牟，乃周衛康叔之子，是王族成員，殷八師由他統帥自然是適宜的。這些說明，西六師和兩八師可能都是以王族的王行或公族的族武裝為核心組成的部隊，而且指揮官也都是從王族中選任的，只有這樣纔便於周王直接控制。

西周軍隊中還有一個特殊部隊——虎臣，可能即文獻中的“虎賁”，是王的近衛部隊，其中有一部分夷人。如《師西簋》曰：“王呼史嗇册命師西，司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夷、鬲夷、秦夷、京夷、畀身夷、新。”（《三代》9.21~24）。《詢簋》曰：“詢，丕顯文武受命，則乃祖莫周邦，今余令汝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夷、秦夷、京夷、鬲夷、師零側新、□華夷、畀身夷、匭夷、成周走亞，戌、秦人、降人、服人。”師西稱其文考爲乙伯，詢稱其文祖爲乙伯，西、詢可能是父子關係，西周世官，父子相繼，皆司邑人及虎臣，而虎臣兵員來源，夷人是其一（參見王祥《說虎臣與庸》，《考古》1960年5期；黃盛璋《關於詢簋的製作年代與虎臣的身份問題》，《考古》1961年6期；郭沫若《弭叔簋及匭簋考釋》，《文物》1960年2期）。另外，一些族武裝也擔當保衛王的任務。如《毛公鼎》曰：“以乃族干吾王身”（《三代》4.49），《師克盃》說師克祖先曾“干害王身，作爪牙，”現在王命師克“司左右虎臣”。（《文物》1959.3）。《師詢簋》說詢之先祖曾佐佑先王，作爪牙。現在命詢“率以乃友干吾王身。”看來，王的貼身衛士——爪牙，還是由可靠的族武裝中選拔出來的。這與古代希臘、羅馬國王近衛部隊使用異族武裝擔任的情況也是不同的。虎臣部隊負責王宮的近衛任務，有時戰況緊急，也要隨軍出征。如《師寰簋》曰：“今余肇令汝率齊師、異釐、夔旼、左右虎臣征淮夷”。

綜上所述，西周金文中所見軍隊編制情況如下：

王室部隊：

由王族和公族武裝爲核心組成，以王族成員爲指揮官。下分：

第一，西六師，駐防宗周地區

第二，殷八師，駐防牧師地區

第三，成周八師，駐防成周地區

地方部隊：

以諸侯貴族的族武裝爲核心組成，部隊也稱師，各以其駐防之地命名。

近衛部隊：

稱虎臣，分左右兩部。以諸侯貴族的族武裝爲核心，也吸收部份被征服的四夷之人參加，作外圍。

## （二）裝備

西周軍隊的裝備情況可以通過幾個方面加以瞭解：第一，考古發掘出的實物資料；第二，傳世的實物資料；第三，金文中記載的戰爭俘獲品；第四，金文記載的賞賜品等。限於篇幅，本文重點以後兩項爲主對這個問題加以闡述。在附錄二中，我選出35篇記有俘獲或賞賜軍事裝備的銘文，從中可以看出，西周軍隊的裝備大體可分三類：戰



車旌旗、兵器、防護器，下面就據此分類加以說明：

### 1. 戰車

《小孟鼎》記第一次戰役俘車 30 輛，第二次戰役俘車 100 餘輛，俘馬 104 匹，還記俘牛若干。《多友鼎》記俘車，一次 117 乘，一次 10 乘。《師同鼎》記俘車馬 5 乘，大車 20。

早期俘獲，車馬分計，車稱輛，馬稱匹，晚期如《師同鼎》所記車馬合計，可能四馬一車爲一乘，據山東膠縣西庵村出土西周車馬情況看，車前有兩服兩驂共四馬，車左有戈、鈎戟、鏃十枚、鎧甲一副，車右有戈一件。因此，這是一輛西周戰車是沒有問題的。（見《膠縣西庵遺址調查試掘報告》《文物》1977 年 4 期）據楊泓先生估計，戰車一乘三人，一御居中，一將居左，一士居右（見《中國古兵器論叢》增訂本，1986）。《禹鼎》稱“戎車百乘，斯御二百，徒千”，似乎是說也有一種戰車是一車二士：一御一斯。傳世戰國銅器上刻畫的戰車也是一御一斯兩人。一輛戰車還應配備徒兵十名，有如今日之坦克與步兵配合的情況。

另據李零考證，“大車”應是牛拉的輜重車。

### 2. 旌旗

西周早期金文對旌旗的記述很簡單，《大孟鼎》稱“乃祖南公旗”，蓋出征時，將祖旗建於兵車上，戰時用以招衆。西周中期記有“鑾旗”和“鑾旗五日”等。鑾旗指綴有鑾鈴之旗。“鑾旗五日”指旗上有“五日”圖案。西周晚期的《番生簋》有“朱旗旛金芳二鈴”。《周禮·司常》曰：“通帛爲旛”，注“通帛爲大赤”，《麥方尊》也有“赤旗舟”的記載，鮮紅的旗幟再配以“金芳二鈴”，赤旗耀目，金鈴繁響，活畫出一幅旌旗招展的圖象。

### 3. 遠射器

《小孟鼎》稱賞賜“弓一矢束”。《宜侯矢簋》稱“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看來“弓一矢百”是一個賞賜的定數。彤、旅是顏色詞，《說文》：“彤，丹飾也。”《玉篇》“赤色”。《詩·小雅·彤弓》傳：“彤弓，朱弓也。”旅，孫詒讓云從驢字假借，指黑色。（見《古籀拾遺》下 17）《尚書·文侯之命》有“盧弓一、盧矢百”，即金文之“旅弓一、旅矢百”。這裏賞賜的紅色和黑色的弓，從《小雅·彤弓》所述看，似乎主要用於宴樂嘉賓的饗射之禮上，而非實戰用器。西周中期的一些賞賜銘文中記有鞞、象珥、矢矟、彤欵等弓上的飾件和盛矢的箠。

弓矢是一種長距離殺傷武器，已發現的石矢鏃有早到石器時代的，在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也很早就有使用弓矢的記載，最早的青銅鏃發現於二里頭時期，在商和西周的遺址、墓葬中也經常發現青銅鏃，說明弓矢的使用是很普遍的。但弓却很少實物出土。可能是因其質地屬易朽之物的緣故。現在可見到最早的出土物爲春秋時代的，如長沙劉城



橋 M1 出土的弓，長 125 ~ 130 厘米，共三件，竹質，箠一件，亦竹質。

#### 4. 長兵（指帶有長柄的兵器）

矛：刺兵。金文中對此種兵器記載很少，賜品中沒有見到，僅西周中期《戎簋》的俘獲品中有一見，但此種兵器出土品和傳世品數量是相當大的，在諸兵器中僅次於戈。在商代和西周的遺址、墓葬中經常發現。這種兵器最早有湖北黃陂盤龍城和河北藁城臺西出土的，時代在商代二里崗期，歷經西周、東周、秦漢一直使用到近代，是諸長柄兵器中生命力最強的一種，這種兵器的特點是與木柄結合時，不必反復捆綁即可牢固地固定。用於直刺，殺傷力很大。

戈：鉤兵。商周出土兵器中數量最大的一種。在金文中其稱呼也最多，西周早期《小孟鼎》稱“戠戈”，《麥方尊》稱“玄雕戈”。西周中期《王臣簋》稱“戈畫戠厚必彤沙”，《伯晨鼎》稱“𠄎戈”，《師奎父鼎》稱“戈雕戠”。西周晚期師籍簋稱“戈雕戠彤沙”，《寰盤》稱“戈雕戠厚必彤沙”，以《師旅簋》稱呼最為繁複：“生皇畫內戈雕戠厚必彤沙。”戈的眾多修飾詞中“戠”字最為關鍵，吳大澂將此字釋為“戟”字（《古籀補》72 頁），後諸家多從之。郭沫若先生在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書中專作了《戈雕戠雕戠必彤沙說》，指出“戠”乃戈的援部，依郭說：“戠戈”，即有“鋒利援部之戈”。“戈畫戠”，即“援部有繪畫之戈”。“戈雕戠”，即“援部雕有紋飾之戈”。“彤沙”，郭先生釋為“而其內末則有紅綬者也”。“必”郭先生釋“秘”，這些都是對的。但他將“厚”字釋出，又轉釋為“簠”字，則嫌迂曲。“厚”有長大意，《戰國策》“非能厚勝之也”。注：“厚猶大也”。因此“厚秘”即長大之柄。車戰用戈，因兩車相交，間距較大，只有柄長大，方可交兵。長沙劉城橋墓葬出土的春秋時代戈七件，除三件短的在一米左右外，其餘四件皆在三米以上。《師旅簋》中所說的戈，除有雕戠、厚秘、彤沙外，尚有“生皇畫內”的修飾語，說明古人對戈在秘後的部分早已稱“內”。“生皇”即“鳳凰”，以鳳凰圖案飾於戈內部。《中方鼎》有“生鳳”與此“生鳳”所指相同。也有的先生認為這種戈並非實用青銅戈，而可能是儀仗用玉戈，可備一說。

在殷周時代還有一種兵器——戟，早期的戟是將戈與矛連結為一體而形成的，如河北藁城臺西早商墓中曾出土過這種戈矛合體的戟，1932 年河南浚縣辛村西周早期墓葬中曾出土三十餘件合鑄的戟，矛與戈已鑄成一體，不再分開。以後陸續又出土過類似的戟很多件，1976 年山東膠縣西庵村出土一乘戰車馬，車輿上也發現一件青銅戟，說明在西周時代戟也是軍隊裝備之一。它將矛與戈兩者的優勢結合到一起，既可刺，亦可鉤啄，是一種很有殺傷力的武器。但在西周金文中這種兵器却很少記載，可能金文中的戈，同時可以用來稱呼矛和戟。到春秋戰國之後，自銘為戟的兵器纔多起來。

殳：擊兵。《趙曹鼎》賞賜物中記有此器，因同時所賜物為“弓矢、虎盧、冑、干

等，知此“殳”亦應為兵器之一種。殷周出土物中未見此種兵器。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一種帶刺圓錘狀兵器自稱為“殳”。其中三件棱上有銘“曾侯郢之用殳。”柄長3.29~3.40米。《詩經·伯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蓋亦兵車上使用的長柄擊兵。

鉞：寬刃長柄，主要用於砍殺。文獻記斬首多用此器，如武王克殷之後，“以黃鉞斬紂頭”以“玄鉞斬二嬖妾之頭”（《史記·周本紀》）。因此，賞賜此器往往意味着賜予生殺大權。《虢季子白盤》“賜用鉞，用征蠻方。”

𠂔：其制不詳。暫列於鉞後，因其功用與鉞相類似。《毛公鼎》：“賜汝茲𠂔，用歲用征。”說明此兵器既可用於祭祀，亦可用於征伐。

### 5. 短兵

斧：西周早期有《宗人斧》和《司土北征斧》，從《司土北征斧》銘文看，它是兵器之一種。北京昌平縣白浮村 M3 曾出土兩把斧，與兵器同出，也是作為武器使用的。（見《考古》1976 年 4 期，《北京地區的又一重要考古收穫——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啓示》）。

劍：西周金文中很少記載，僅《師同鼎》記有俘獲的“劍二十”。出土的西周劍都很短，1956~1957 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裏出土一把劍，長僅 27 厘米（見《豐西發掘報告》1962 年）。北京琉璃河出土的一把僅 17.5 厘米（見《北京附近發現西周奴隸殉葬墓》，《考古》1974 年 5 期）這樣短的兵器只能在近戰時使用，或作為防身兵器使用。

### 6. 防護器

蔽體器：西周早期金文中稱“干”，西周中、晚期稱干，也稱“盾”。《小孟鼎》有“金干一”，《小臣宅簠》稱“畫干”。西周中期的《虢簠》、《趙曹鼎》、《昌鼎》稱干，《弋簠》則稱盾。西周晚期《師旋簠》稱“儕汝十五錫登盾”，《師獸簠》稱“干五錫”。“錫”是一種銅泡，飾於盾面，既可起加固作用，又可形成威猛的圖案，起到威懾敵人的作用。（見于省吾：《釋盾》《古文字研究》第二集；劉昭瑞：《說錫》，《考古》1993 年 1 期）。《禮記·郊特牲》：“朱干設錫”，鄭注：“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師旋簠》稱盾上登有十五個錫，當是規格較高者。《師獸簠》稱干上有五個錫，是規格較低者。北京琉璃河西周墓（M53）曾出土一件飾有七個錫的盾，組合成一個口鼻眼俱全的獸面，形像威猛可怖。M1193 是西周早期燕侯大墓，據報告稱“這次發掘的收穫之一是發現了西周時期的漆盾……其中以南壁的六個漆盾保存最好，可知當時的漆盾形狀有多種，有的作長方形，有的上部為山形脊。另外，盾表面除了髹漆（或朱或黑或褐色）外，還有人面形、菱形、圓形銅製品（一稱大銅泡）等作為嵌飾。盾的高度一般在 1.3 米上下，寬在 0.7 米左右。另外，報告還說：“銅泡，數量很多，形制也有多種，分四式，前三式為漆盾上裝飾物，第四種可能是皮甲上的飾物。”並

稱”背面多有“鄆侯舞”或“鄆侯舞錫”等銘文。這就明確標示了銅泡的作用和名稱。它是燕侯用於樂舞之盾上的飾物。《周禮·春官·司干》鄭注云：“干舞者所持謂木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雖然這些盾不是用於實戰的，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實戰用盾的大體情況。

護首器：西周各個時期金文中皆有出現，都稱胄。《小孟鼎》稱賞其“貝胄一”，飾貝之胄出土物中未發現。北京琉璃河西周早期大墓 M1193 出土一胄，“半球形，兩側耳部下垂一小圓孔，中部起脊，頭頂正中有一半環。高 21、左右寬 22.5、前後長 24.8 厘米。”北京昌平縣白浮村西周墓 M2、M3 各出土一件青銅胄，背部起高脊。此外，遼寧好幾個地方也出土過西周青銅胄，胄頂部的脊及環可容飾物。

護身器：即後世稱為甲者，《小孟鼎》稱“畫鞬一”，西周中期金文稱：衣、虎盧、裨、鞬、紕。衣、裨二字皆從衣，說明其為被於人身如衣者。虎盧、鞬、紕三種甲名，名皆從虎，蓋取其甲面如虎皮之義。1984 年在陝西長安普渡村西周墓（M18）中曾出土一組青銅甲片，共 42 枚。墓主是一位身高 1.8 米的武士，同出有戈、鑾鈴、鏹等。據整理者分析：部分甲片背後附有褐色腐蝕層，呈粉狀，似為皮革背面網狀纖維朽後所留痕迹，這表明在甲片背後可能曾以皮革作襯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這副銅甲作了復原處理（見《考古》，1988 年 9 期《西周銅甲組合復原》）。考古發掘出土的甲，更多的是皮甲，即由皮甲片聯綴而成，形式種類很多，現已復原數具。如曾侯乙墓出土皮甲數十具，有人被的甲和馬被的甲兩種，人被甲又分吳甲、楚甲（以出產地來區分），又有畫甲、彤甲、漆甲、素甲等（以甲面紋飾性質區分）。

西周戰爭以兵車為主要戰具，上述許多兵器及防護器可能多數用於車戰。車戰要求兵器長大，而徒兵作戰則要求兵器短小靈活。出土兵器中有的自稱徒戈、徒戟，即專用於徒兵作戰使用。如武城徒戈（《文物》1983 年 12 期），平阿左造徒戟《文物》1979 年 4 期）等。

### 三 軍祭與軍儀

#### （一）軍祭

《禮記·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禴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這裏所記詳於征前，而略於征後。金文所記與此相反，詳於征後之獻禮，而略於征前之祭禮。金文中不見類禴之祭，有宜造之祭，但所用與文獻亦有不同。

燎。保員鼎曰：“惟王既燎，厥伐東夷。”《庸伯馭簋》“惟王伐逯魚，徯伐淖黑。至，燎于宗周”。《小孟鼎》：“以口入燎周廟。”周原甲骨“其𠄎，楚人其燎，師氏授燎”（H11：4）。《保員鼎》說，燎祭完畢就去征伐東夷，說明燎祭可以行於征伐之前，用兵出師，是國家的大事，要昭告祖先神靈，燎柴煙騰於上，在天之先祖必有知覺，出征必然受到他們的保佑。《庸伯馭簋》及《小孟鼎》的燎祭行於征後，細審《小孟鼎》銘，其所燎，使用了新折之鬼方酋首，蓋將鬼方酋之首置於柴上燎之。周原甲骨云：施燎於楚人，出征師氏將楚酋之首授於燎柴之上。西周金文之燎祭多行於軍旅之事，卜辭燎祭則行於祭祀饗、王亥、鳳、土、旬、河、蚩、東母等祖先神與各種自然神。

脤。《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戎有受脤。”這種戎事受脤的禮儀，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禽鼎》曰：“禽有脤祫。”王伐蓋侯，周公、伯禽父子皆與其事，祭後分發脤肉時，伯禽也得到了一份，伯禽為此作了禱告。

宜。《天亡簋》：“王饗，大宜。”《矢令簋》：“作冊矢令奠宜於王姜。”《天亡簋》之宜祭行於衣祀先王和饗禮之後，在宗廟大室中舉行。行禮時為表示恭敬，王要降於臺階下。《矢令簋》記作冊矢令為王姜置備了王伐楚伯的宜祭禮，可能行於出征前，祭地在炎。《禮記·王制》說：“宜乎社。”這與金文記載不合，在金文中，宜祭出征前後皆可，祭地可在宗廟，也可在王的臨時駐地，沒有行於國社的記載。

造。《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曰造。大師，宜於社，造於祖。”《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師同鼎》“羊百，契，用造。”這是說，將俘獲的羊百隻，切割後用於造祭。《小臣彘鼎》曰：“王造于楚麓……王造应。”講的是王於楚林麓之處行造祭，又於新設之駐地行造祭。《王制》之禰，是考廟。《師同鼎》之造祭行於征後，所造之處沒有交待。《小臣彘鼎》之造祭，行於出征途中之臨時駐地，可能在隨軍載出之考廟中舉行。

𦣻。《塋方鼎》記周公征伐東夷取得勝利，“公歸，𦣻于周廟”。其字不識，像兩手倒持佳於示前，可能是敬獻俘獲於神前之意。此祭名卜辭習見，“癸酉卜，貞，王賓祖甲𦣻”（《前》1.42.1）、“卜，貞，□□大示𦣻”（《前》4.34.5）、“彣曰，彘甲曰：𦣻祖乙𦣻”（《前》1.42.1），可見是一種很古老的祭典。

## （二）軍儀

定兵謀。《禽鼎》曰：“王伐蓋侯，周公謀禽，祫。”講的是王伐蓋侯，出征前，周公與伯禽定兵謀，謀成之後，伯禽禱告祝號。《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註曰：“定兵謀也。”

告祖。軍祭告祖廟，如上述有燎與脤，脤祭分福肉，從征將帥分得之。《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註：“告祖也。”

誓師。《尚書》有《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等多篇，皆為出征前誓師之辭，所言多為被征伐的對象如何荒亂昏惡，應行天之罰，出征將士應爭先殺敵等等。《禹鼎》所錄由“禹曰……”到“撲伐鄂侯御方，勿遺壽幼”。《師寰簋》由“王若曰……”到“今余肇令汝率齊師、異虺、熨尻、左右虎臣征淮夷”等可能皆錄自出師誓辭。

遣間。《宗周鐘》：“𠄎孳迺遣間來逆昭王，南夷、東夷俱見二十又六邦……”《爾雅·釋言》“間，倪也。”注：“《左傳》謂之謀，今之細作也。”𠄎孳入侵周室，被周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迫使其降服於周，他特派遣間諜人員來與周王協議，裏應外合，使東夷、南夷二十六邦都來朝拜周王，這是西周軍事鬥爭中“用間”的珍貴史料。

振旅。《中觶》：“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公族是某部隊族武裝中的主力，王親自校閱這支隊伍，激勵士氣。《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公羊傳》：“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爾雅·釋天》：“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是知振旅為得勝回朝舉行的一種典禮，從《中觶》所記情形看，振旅是一種檢閱部隊的閱兵禮。

獻俘獲。《周禮·太祝》：“大師，……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詩經·魯頌·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記獻俘獲之禮最詳細者莫過於《小孟鼎》銘，其所記儀節如下：

第一，告獻：在正式獻俘獲之前，先要報告俘獲情況，包括執酋、獲馘、俘人、俘車馬牛羊的具體數字。

第二，訊酋：將所執酋首“進即大廷”，由重要官員（榮伯）主持審訊，如《泮水》所云“淑問如皋陶”。經過審訊，弄清其反叛的原因，鬼方酋首承認了“從商”的“罪行”。

第三，折酋：將鬼方酋首斬首。

第四，獻馘：這是將斬殺的酋首之馘入門獻於西旅。

第五，燎祭：以所折酋首之馘入燎周廟，告慰於先王。

第六，告成：有鬻伯、明伯、鬻伯等接受孟的告成功禮儀。

第七，飲至：王親自為孟祝賀，“王呼獻孟”，以示榮寵，以慶勝利，這實際上是進行一次大饗禮。（見作者《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臺北，《大陸雜誌》，83卷第2期）

第八，禘祖：所禘祭者為文、武、成諸先王。

第九，獻俘獲：入獻分區、分品類。

第十，賞賜：第二天，在宗廟中又專門舉行賞賜典禮，所賜之物多為兵器，有弓矢



干戈甲冑等。

除《小孟鼎》外，其他金文中對此禮也有零星記載，如《豐方鼎》有“飲秦飲”記載，據譚介甫先生考證這就是文獻中所說的飲至禮（見譚介甫：《周西壘鼎銘研究》，《考古》1963年12期），在《小孟鼎》中是第七項儀註。再有《敵簋》記載了一次對南淮夷的戰爭，勝利後也舉行了獻俘獲之禮。《敵簋》所記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此次戰役共截首百，執訊四十，俘人四百，但在成周大廟告擒時，祇講了馘百訊四十，而不及俘人之數。大概在這種典禮上，祇報告和獻出戰鬥人員的斬獲，而一般平民與奴隸的俘獲不計在內。第二，這次俘獲的南淮夷邦君沒有按一般慣例殺掉，而是把他遣返了，這可能是要利用他進一步招撫其他部族。這種攻心戰術的運用，說明此時周人已脫離了一味蠻殺的原始戰爭方式，而初步掌握了講求謀略的戰爭藝術。

#### 四 結語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結束本篇時，我想從政治的角度來評議一下西周戰事的得失。我以為周人的戰爭得失各有其二：得之一，周初實行了分封政治，龐大的西周國土，各有其主。各諸侯國都建有自己強大的族武裝，封地內的土地人民無不為王所賜予，這樣他們就都對周王承擔了重大的義務，遇有內憂外患，周王可以隨時就近調遣他們去鎮撫。周王又設計了一套控制各諸侯國的有效辦法。如諸侯設諸監，《仲幾父簋》“使於諸侯諸監”（《三代》7.50）、又有《應監甗》之“應監”（《考古學報》1960年1期）、《叔赴父鬲》之“榮監”（《考古與文物》1982年4期）等的侯國監察制度。諸侯國的新君和重要官吏皆須周王親自冊命的冊命制度，周王隨時有權“遷侯”，即可以使甲地諸侯改封乙地的封建制度等等（見作者：《西周金文中的大封、小封和賜田里》，《中國考古學論叢》，1993）。在生產不是十分發達的西周社會，中央集權尚不可能實行的情況下，諸侯國的建立，起到了屏藩宗周王朝的作用。得之二，周人建立了耕戰結合的軍事體制，軍隊中專設了管理農、林、牧業的官吏，管理行政的官員如邑人、遂人等戰時也是軍隊的官員，王朝中幾乎全體重要命官，都是戰時可以帶兵出征的將帥。從經濟上講，這省却了供養一大批常規部隊的軍費開支；從軍事上講，戰爭的補給供應，可以由軍隊自行解決，使前方和後方聯成整體，戰鬥力更有保障。因此，西周王朝可以承受住較長時間戰爭的消耗。失之一，周人在殷遺武庚叛亂後，對殷遺民喪失了耐心，由原來的懷柔政策一改而成武力鎮壓，這樣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對立面，迫使殷遺竄向四夷部族。於是，殷遺熟練的車戰經驗，高度發達的青銅兵器冶煉技術等都迅速擴散到夷族部落，大大加強了四夷的軍事力量。失之二，周人對四夷部族沒有制定出穩定的政



策，而迷信於武力鎮服，這就使得周人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最後，在幽王正熱心於南征、東伐時，西戎攻入宗周，周王朝終於亡於犬戎之手。

要想較好地進行西周的軍史研究，我以為應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整理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第二，深入綜合研究古文字資料。第三，結合上述兩項，研究古文獻資料。本文只是側重第二方面作了些粗淺的分析工作。限於篇幅，有許多問題也無法充分展開，如周人的用兵謀略、西周軍隊的軍積倉廩制度、西周的馬政、西周的車戰、西周軍事的地理等，對這些問題都應作出專題的研究。

## 附錄一 記述西周戰事的金文資料

### 一 西周早期的戰事

#### 1. 武王

##### (1) 利簋（《文物》1977，8）

珙征商。惟甲子朝，歲（越）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闡師，賜有司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金文歲通越“越”有“奪”意。《逸周書·世俘》：“辛亥，薦俘殷王鼎。”“奪鼎”是奪取政權的象徵。（此用唐蘭先生《史徵》中的意見。）銘中的檀公可能是周初檀伯達的先人，“有司利”或為檀伯達，或其後裔。此器出於臨潼一窖穴，其地或為檀氏采邑。

##### (2) 天亡簋（《三代》9.13）

乙亥，王有大禮，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使饁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省，丕繇王作虺，丕克乞衣王祀。丁丑，王饗。大宜，王降，亡得爵退橐。惟朕有慶，敏揚王休於尊簋。

此銘記武王克殷後，乙亥日行大禮，殷祀於先王和文王，兩天後的丁丑日，行饗禮和宜祭。文獻上一般講出師前行宜祭，此銘記戰事完畢後行宜祭，值得注意。

紀事金文中能明確為武王時器者，僅此兩件而已。《利簋》對克殷時間的記載，與文獻合。殷末，王朝內部已十分腐敗，周人在克殷前作了充分準備，政治和軍事上都作了巧妙的部署，在殷人力量未及充分集中的情況下，突然實施決戰，“夙有商”，從“朝”至“夙”，即解決了在商都附近的戰鬥。

#### 2. 成王

##### (3) 禽鼎（《三代》4.2）禽簋（《三代》6.50）

王伐蓋侯，周公謀禽，祫。禽有脤，祫。王賜金百鏹，禽用作寶彝。

《韓非子·說林》、《墨子·耕柱》皆有“商蓋”，即“商奄”。《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銘稱“王伐蓋侯”，即成王東征踐奄。謀，兵謀。周公與伯禽出兵前之“廟算”。脤，宜祭有“受脤”之禮。祫，不識，蓋禱祝類禮儀，伯禽官司大祝（見《大祝禽方鼎》），職司禱祝呼號之事。

#### (4) 剛劫尊、卣（《斷代》二）

王征蓋，賜剛劫貝朋，用作朕高祖寶尊彝。

#### (5) 小臣單觶（《三代》14.55）

王後返，克商。在成師，周公賜小臣單貝十朋，用作寶尊彝。

#### (6) 沫司土疑簋（《斷代》一圖版6）

王來伐商邑，誕令康侯鄙于衛。沫司土疑眾鄙，作厥考尊彝。

《史記·衛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遺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殷墟。”按周代封建例，封建時，連同土地上的官吏民衆奴隸等也一並歸屬於新君。因此，沫地司土名疑者也在此次康叔徙封於衛時，歸屬於衛康叔，作器以志紀念。

#### (7) 豐方鼎（《斷代》一）

惟周公于征伐東夷、豐伯、薄姑，咸戔。公歸，禦于周廟。戊辰，飲秦飲。公賞豐貝百朋，用作尊鼎。

《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此銘記事，疏於戰前而詳於戰後，如記周公東征後，於周廟行禦祭、飲至、賞賜諸禮儀。

#### (8) 保尊、卣（《斷代》一）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誕貺六品，蔑歷于保，賜賓，用作文父癸宗寶尊彝。邁于四方，王大祀，祓于周，在二月既望。

保即太保召公奭。《漢書·地理誌》：“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蓋三監與豐伯、薄姑合稱“東國五侯”，“及”有“追擊”意，《不其簋》：“戎大，同，永追汝，汝及戎，大敦搏。”其中“及”字用法即與《保尊》同。這裏說的是周王命太保召公追擊殷地叛亂的五侯。

#### (9) 臣卿鼎、簋（《三代》3.41；6.48）

公違省自東、在新邑。臣卿賜金，用作父乙寶尊彝。

唐蘭先生認為“公違”即《逸周書·世俘》中的“百韋”。

上述(3)～(9)七器記成王東征二次伐商的戰事。這次重大軍事行動從整體看，是由成王親自指揮的，七件器銘中五件記成王親征或由成王指派要員出征，如《禽簋》記成王與周公、伯禽一起出征。《沫司土疑簋》記“王來伐商邑”。可見文獻稱“周初

成王年幼，在襁褓中”，“周公攝政稱王”等是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這次戰事所伐的對象主要是“三監”、豐伯和薄姑等“東國五侯”，所謂“踐奄”之戰，金文稱“伐蓋”或“征蓋”。戰事的出擊地在“成師”，亦即“新邑”，可見周初營造洛邑是一個對付殷遺民謀反的很有戰略眼光的措施。東征後，為進一步鎮撫東方，特將康侯徙封於衛地（沫司土疑簋）。殷代末年周人自稱“小邦周”，甲子一戰而得天下，戰勝大邑商。政權是極不穩固的，一場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勢必會是十分激烈和持久的。

### 3. 康王

#### (10) 大保簋（《三代》8.41）

王伐象子聖。獻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永大保，賜休余土，用茲彝對令。

《逸周書·作雒》：“二年，又作師旅，臨衛征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成王東征之役並未徹底消滅殷遺的力量，而是迫其“北奔”。很可能殷遺竄入西北鬼方。因此，康王之世戰事多在北方，此銘之象子聖有可能是祿父的後代。傳召公奭官到大保，至康王世尚健在；其封地在北燕，以此為基地進行北伐之戰應是適宜的。

#### (11) 小孟鼎（《三代》4.44~45）

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各周廟，□□□□賓，誕邦賓尊其旅服，東向，孟以多旗佩鬼方□□□□入南門，告曰：“王曰孟以□□伐鬼方。□□□□執酋二人，獲馘四千八百□二馘，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俘馬□□匹，俘車卅輛，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孟或□曰：□□□□乎□我征。執酋一人，獲馘二百卅七馘，俘人□□□□人，俘馬百四匹，俘車百□輛。王若曰：嘉！孟拜，稽首，以酋進即大廷。王令榮訊酋，□□即酋，訊厥故，□越伯□□鬼闢，鬼闢盧以新□從商。折酋於□，王乎□□令孟以厥馘入門，獻西旅，以□入燎周廟。孟以□□□□入三門，立中廷，北向。孟告鬻伯即位，鬻伯告□□於明伯、豳伯、□伯。告成。孟以□大侯田□□□□孟征□，咸。賓即位，獻賓。王乎獻孟。王以□□□進賓，□□大采，三周入服酒。王各廟，祝誕□□□□邦賓不裸，□□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卜祭戕。王裸，裸從，獻邦賓，王乎□□令孟以區入，凡區以品。雩若翌日，乙酉，□三事大夫入服酒，王各廟，獻王邦賓，誕王令賞孟□□□□弓一矢百，畫鞬一，貝冑一、金千一、戣戈二，□□□用作□伯寶尊彝，惟王廿又五祀。

該鼎已佚，銘拓漫患不清，但經過郭沫若、陳夢家、唐蘭等前輩學者細心考索，已大體可讀。銘文記錄了兩次對鬼方的戰役後的獻俘馘大典。有一段銘文大意是：孟將捉到的鬼方酋首（兩戰共三人）帶進大廷，康王命榮伯主持審訊，當訊問其謀反的緣故時，他們承認了“從商”的“罪行”。這就告訴我們，這次戰爭的起因與殷遺王子祿父

北奔有關，蓋其北奔之後與鬼方結合起來，對周王朝形成威脅，康王為徹底摧毀殷遺的武裝抵抗，纔組織了這次戰役。從俘獲情況看，第一戰役俘車三十輛，第二戰役達百餘輛，說明曾進行了激烈的車戰，鬼方之所以能建有強大的車戰部隊和熟練地進行車戰攻防，可能與殷遺的加入有關。這也是金文中第一次車戰的實錄。文獻稱武王克商，不過“率戎車三百乘”，此次戰役僅俘獲就達百數十輛，可以想見，戰役的規模是相當大的。

此銘可貴之處還在其詳細記錄了一次獻俘獻獲大禮的全過程：典禮在周廟中進行，由王親自主持，有朝中重要官吏及諸侯邦君參加，禮儀的儀節十分繁複隆重，大的儀注就有十項之多，由甲申始，至乙酉止，共進行兩日。

#### (12) 吕行壺（《西清古鑒》19.8）

惟四月，伯懋父北征。惟還，吕行戔俘貝，厥用作寶尊彝。

伯懋父即衛康叔封之子康伯髦，又稱王孫牟，約在康王晚期出任北伐統帥，後在昭王初年亦主持過對東夷和南方的鬥爭。

#### (13) 司土斧（《小校》9.93）

獻司土北征蒿盧。

斧上鑄銘是很少見的，此斧為傳世品，形制與新出《宗人用斧》（《文物》1992年12期，63頁）類似，那件斧出土於洛陽西周早期大墓中，時代明確，故《司土斧》也應作於周初，估計與《吕行壺》所述北征為同時事，斧往往被誤認為專作生產工具用，其實其中有的是兵器。

### 4. 昭王

#### (14) 小臣譚簋（《三代》9.12）

獻東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惟十又一月，遣自囂師，述東旻，伐海眉，季厥復歸在牧師，伯懋父承王命賜師帥征自五鬲貝，小臣譚蔑歷眾賜貝，用作寶尊彝。

此銘提到“殷八師”，並指出復歸之地為牧師，說明此次東征出發地及返回之地皆在牧師，牧師應為殷八師駐地，殷八師亦因其駐地於殷而得名。

#### (15) 明公簋（《三代》6.49）

惟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遣，魯侯有囷功，用作旅彝。

明公及魯侯皆為周公後裔，封在山東，如命封於北燕的大保北征一樣，以東征之命命於明公、魯侯也是適宜的。此次東征軍隊以族為單位，說明西周軍隊的組成有一部分是以家族、氏族為基礎的。

#### (16) 窳鼎（《三代》4.18）

惟王伐東夷，濂公令窳眾史旗曰：以師氏眾有司後或戔伐鴈。窳俘貝，窳用作饗公寶尊彝。

## (17) 寔鼎（《斷代》一）

王令遣戈東反夷，寔肇從遣征，攻踰無敵，省于人身，俘戈，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其永寶。

## (18) 保員簋（《考古》1991年7期）

惟王既燎，厥伐東夷，在十又一月，公返自周。己卯，公在虜，保員遷，辟公賜保員金、車，用事。

保員簋銘記在東征之前先行燎祭值得注意。蓋東夷時叛時服，昭王初年，又有大的反復，昭王派老將伯懋父帥殷八師出征，後又派公、遣、保員等對東夷作戰。

## (19) 員鼎（《三代》4.5）

惟正月既望癸酉，王狩于視南，王令員執犬休善……

## (20) 小臣麥鼎（《博古圖》2.14）

正月，王在成周，王造于楚麓，令小臣麥先省楚應。王造應，無遣。小臣麥賜貝，賜馬匹……

## (21) 啓卣（《文物》1972年5期）

王出狩南山，搜廋山谷，至于上侯澆川上。啓從征，謹不擾。……

## (22) 中甗（《薛氏》16.2）

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玆應，在曾。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汝使小大邦，厥又舍汝芻糧，至于汝麋小多邦。”中省自方、鄧，洧□邦，在鄂師次。伯買父乃以厥人戍漢中州：曰段、曰旄。厥人隸廿夫，厥貯審言曰貯，□貝駟傳，肆王□休，肆肩有羞……

## (23) 中方鼎（《博古圖》2.20）

惟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玆王應，在射隼得山，中乎歸生鳳于王，玆于寶彝。

## (24) 啓尊（《文物》1972年5期）

啓從王南征，遶山谷，在洧水上，啓作祖丁旅寶彝。

## (25) 交鼎（《三代》3.23）

交從狩，來即王，賜貝，用作寶彝。

上述七銘記錄了昭王南巡所作的戰前準備：①在南方設立王的臨時駐驛處，銘稱“省應”、“玆應”。②頻繁的外交活動，分化瓦解，孤立要打擊的對象。銘稱“使小大邦”。③輸送糧秣等軍事物資，安排驛站，作好通訊聯絡準備，如《中甗》所記“芻糧”、“貯”、“駟傳”等都是這方面的記載。④以狩獵為名，進行軍事演習，實行武力威脅。當昭王認為準備工作已完成後，就實地開始了他的“南巡”事業，從金文所記情況看，對南方作戰，起碼有兩次。

## (26) 矢令簋（《三代》9.26；9.27）

惟王于伐楚伯，在炎。惟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矢令莫宜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 (27) 小子生尊（《西清古鑒》8.43~44）

惟王南征，在□，王令生辯事于公宗，小子生賜金，鬱鬯……

## (28) 過伯簋（《三代》6.47）

過伯從王伐反荆，俘金……

## (29) 𢆶御簋（《小校》7.43）

𢆶御從王南征，伐楚荆，有得……

## (30) 肅簋（《三代》7.21）

肅從王伐荆，俘，用作饅簋。

## (31) 鴻叔諶簋（《文物》1986年1期）

惟九月，鴻叔從王員征楚荆，在成周，諶作寶簋。

## (32) 鴻叔諶鼎（《薛氏》9.10~11）

鴻叔從王南征，惟歸，惟八月。在詁應，諶作寶鬲鼎。

## (33) 員卣（《三代》13.37.1~2）

員從史旗伐會，員先入邑，員俘金，用作旅彝。

## (34) 中卣（《博古圖》6.32）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賜中馬，自隴侯四驥，南宮貺。王曰：用先。中卣王休，用作父乙寶尊彝。

以上九銘所記可能是昭王第一次南巡的情況，從銘文內容看，南征的主要對象是“楚荆”，周原鳳雛遺址出土甲骨有“其𢆶楚人，厥燎，師氏授燎“(H11:4)”燎於河”(H11:30)等。此戰役同時也兼及檜。多數器記“從王”出征，看得出是昭王親征，《鴻叔諶簋》記此次出征在成周發兵，所經之地有炎、詁等，戰爭取得一定勝利，並舉行了隆重的公族部隊閱兵典禮，但叙及俘獲却很簡單，祇抽象地說“俘”、“有得”、“俘金”等，可能俘獲很有限。

## (35) 師旂鼎（《三代》4.31）

惟三月丁卯，師旂衆僕不從王征於方雷，使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在芳……

## (36) 旅鼎（《三代》4.16）

惟公大保來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整師，公賜旅貝十朋……

## (37) 大保玉戈（《陶齋古玉圖》84頁）

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大保省南國，帥漢，誕狩南，令厲侯辟用蛛走百人。

上述三器銘記昭王二次南巡的遭遇。由於長期對南方作戰，軍力耗盡，軍心浮動。



以致師旅衆僕敢於不服從王的出征命令，而作為主帥之一的伯懋父也不能絕對禁絕此類事，草草交納贖金了事。《大保玉戈》記昭王南狩已至漢水之上，離“溺水不復”的地點已不遠了。二次南征，除昭王外，主帥為大保與伯懋父，記出征諸器銘不談俘獲，可能與此次出征以失敗而告終有關。

## 二 西周中期的戰事

文獻稱穆王以祭貢不致為由西觀兵，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國語·周語》、《史記·周本紀》）。說來也巧，穆王時的金文中却真的出現了用白狼、白鹿作祭品的記載：《伯唐父鼎》（《考古》1989年6期）：“乙卯，王饗莽京。王祿，辟舟臨舟龍。咸祿，伯唐父告備。王各，乘辟舟，臨祿白旗。用射綏、釐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此銘的考證可參見作者所寫《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一文，《考古》1990年8期）《穆天子傳》記周穆王巡遊西方，會西王母等，對西方用兵之事，在金文中却没有見到明確記載，西周中期金文所見，多為對東方和南方用兵之事，少數也記載了北方的戰事。

### （38）班簋（《西清古鑒》13.12、《文物》1972年9期）

惟八月初吉，王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號城公服，粵王位，作四方極。秉繁、蜀、巢，令賜鈴、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御、或人伐東國痾戎。咸，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王令呂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從父征，出城衛父身。三年靜東國，亡不咸允天威，否畀屯陟。公告厥事于上，曰：“惟民亡拙哉！彝昧天命，故亡允哉，顯惟敬德，亡迺違”……

文中之吳伯、呂伯可能即上文之友邦冢君，徒御者即徒兵與御車兵，或人是受其控制的夷族部隊。班被王命以族人出征，主要任務是在中軍保護主帥的安全。

### （39）繁簋（《殷周金文集成》8.4146）

惟十又一月初吉辛亥，公令繁伐于吳伯，吳伯蔑繁歷，賓繁被廿，貝十朋……

可能痾戎與吳伯皆為與殷遺有牽連的夷人。這場對東部的戰爭，據《班簋》講，一直持續了三年纔平靜下來。《班簋》稱“秉繁、蜀、巢”。秉，執持也。《書·君奭》：“秉德明恤”、《詩·大雅》：“民之秉彝。”秉皆有執持義。周王既已執持這南方三國，說明此前已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鬥爭，如：

### （40）肇貯簋（《西清古鑒》7.30）

□肇貯及子鼓鑄旅簋，惟巢來伐，王命東官追以六師之年。

### （41）繇侯鼎（《考古》1964年10期）

繇侯獲巢，俘厥金冑，用作旅彝。

周原甲骨有“征巢”（H11.110）、大概也說的是這場鬥爭，王朝在對巢的戰鬥中

動用了西六師，這是直屬王朝的主力部隊，因其駐守在西土宗周一帶故得名。

(42) 𠄎尊（《小校》5.34）

𠄎從王如南……

(43) 孟簋（《考古學報》1962年1期）

孟曰：朕文考眾毛公、遣仲征無需，毛公賜朕文考臣，自厥工……

上述兩器也是講南征的事，《孟簋》中也提到毛公，大概與《班簋》時代接近。

(44) 𠄎尊、𠄎（《三代》13.43；16.26）

王令𠄎曰：“𠄎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師。”伯雍父蔑𠄎歷，賜貝十朋……

(45) 𠄎簋（《文物》1976年6期）

惟六月初吉乙酉，在堂師，戎伐，𠄎率有司、師氏奔追御戎于械林，搏戎胡。朕文母競敏啓行，休宕厥心，永襲厥身，卑克厥敵。獲馘百，執訊二夫，俘戎兵：盾、矛、戈、弓、荀、矢、裨、冑凡百又三十又五款。捋戎：俘人百又十又四人。衣搏，無尤于𠄎身。……

(46) 𠄎鼎（《文物》1976年6期）

𠄎曰：烏乎！王惟念𠄎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𠄎率虎臣御淮戎……

(47) 競卣（《三代》13.44）

惟伯犀父以成師即東，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坏，伯犀父皇競，各于官。競蔑歷，賞競璋……

(48) 𠄎尊（《三代》11.36）

惟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𠄎從師雍父戍于古師之年，𠄎蔑歷，仲競父賜赤金……

(49) 遇甗（《三代》5.12）

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雍父戍在古師，遇從。師雍父肩史遇使于胡侯，侯蔑遇歷，賜遇金，用作旅甗。

(50) 𠄎鼎（《三代》4.13）

惟十又一月，師雍父省導至于胡，𠄎從，其父蔑𠄎歷，賜金……

(51) 𠄎卣（《博古圖》10.34）

𠄎從師雍父戍於古師，蔑歷，賜貝三十鏹……

上述八器記述的都是西周中期對南淮夷的戰事，其中（44）～（46）記錄的是衆伯受王命協同成周八師對淮夷作戰，主帥是伯雍父，戍守的據點為古師，作戰對象主要是“戎胡”，戰爭到緊張的時刻，周王不惜派出近衛部隊虎臣受𠄎統率出征。《競卣》講的是周王派出的另一支抵禦南淮夷的部隊，主帥是伯犀父，駐地在坏。（48）～

(51) 講的仍然是伯雍父戍古師之事，鬥爭的對象仍然是“戎胡”，但這幾件器記錄的不是武裝衝突，主要是外交鬥爭。一方面頻繁派員出使，一方面對胡地“省導”，即巡視，偵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周王採取了在南方建立根據地，長期據守的戰略。

(52) 庸伯戣簋（《三代》8.50）

惟王伐逌魚，誕伐淖黑。至，燎于宗周。賜庸伯戣貝十朋……

(53) 諫簋（《考古》1979年1期）

惟戎大出于軹，邢侯搏戎，誕令臣諫以□□亞旅處于軹，從王□□，臣諫曰：“拜手，稽首，臣諫□亡，母弟引庸又長子□，余关皇辟侯令，肆服”……

淖黑及軹皆在北方，這兩件器銘記錄的應是西周中期對北方的戰事。其中《諫簋》記錄的是邢侯對北戎的征戰。以諸侯發佈命令出征之戰事在金文中並不多見，新出《昌鼎》記晉侯命昌出征事也屬此類，作戰於邠地，也在周的北方。

(54) 昌鼎（山西晉侯大墓新出器，見《上海博物館集刊》，6.153頁）

惟七月初吉丙申，晉侯令昌追于邠，休有擒。侯釐昌韋、冑、干、戈、弓、矢束，貝十朋……

文獻對西周中期戰事記載甚少，從金文所記看，西周中期的周王朝仍然是四方不靜，十分動蕩。特別是南方的淮夷諸部在擊潰了周昭王的南巡之旅後，其勢更熾。穆王時對繁、蜀、巢的鬥爭雖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戎胡諸部仍堅持與周為敵，他們利用距周人腹心地帶較遠，南方地形複雜，丘嶺多，水道多，利水戰，不利車戰的特點，與周人周旋。周王室則汲取昭王南巡失利的教訓，改變了鬥爭策略，不再作長驅直入的進攻，而是在南方交通要道上建立據點，遠交近攻，分化瓦解，逐步向南推進。這一策略在中期對南淮夷的戰爭中是奏效的，周人繼昭王之志，繼續對南方進行征伐戰爭。

### 三 西周晚期的戰事

從金文內容看，西周晚期的戰事主要集中在南方和北方，東西方雖也有戰爭，但規模遠沒有南北方的激烈。

#### 1. 對南淮夷諸部的鬥爭

(55) 無彣簋（《三代》9.1）

惟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王賜無彣馬四匹……

(56) 虢仲盃（《三代》10.37）

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盃，茲盃有十又二。

(57) 麥生盃（《三代》10.44）

王征南淮夷，伐角淮、桐適。麥生從，執訊折首，捋戎器，俘金，用作旅盃……

## (58) 敵簋(《博古圖》16.39)

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適爰內伐涇昴、參泉、裕敏、陰陽洛。王令敵追御于上洛焮谷，至于伊，班。長榜截首百，執訊四十，奪俘人四百。獻于榮伯之所。于焮衣諱，復返厥君。惟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入佑敵，告擒：馘百，訊四十。王蔑敵歷，使尹氏授釐敵圭瓚，□貝五十朋。賜田于舍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 (59) 鄂侯御方鼎(《三代》4.32)

王南征，伐角、適。惟還自征，在坏，鄂侯御方納壺于王，王迺裸之。御方侑王，王休宴，乃射。御方合王射，御方休闌，王揚，咸飲。王親賜御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

## (60) 禹鼎(《錄遺》99)

禹曰：丕顯赳赳皇祖穆公克夾召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段忘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朕祖考政于邢邦，肆禹亦弗敢褻，惕恭朕辟之命。烏乎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亦惟鄂侯御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內。王迺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鄂侯御方，勿遺壽幼。”肆師彌守甸匡，弗克伐鄂。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御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肅慕，直西六師，殷八師伐鄂侯御方，勿遺壽幼。”季禹以武公徒御至于鄂京，伐鄂，休，獲厥君御方。肆禹有成。……

## (61) 宗周鐘(《三代》1.66)

王適省文武勤疆土，南國良孳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良孳迺遣間來逆昭王，南夷東夷俱見廿又六邦……

## (62) 兮甲盤(《三代》17.20)

……王令甲政司成周四方積，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賁晦人，毋敢不出其賁、其積。其進人、其貯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

## (63) 師寰簋(《三代》9.28)

王若曰：“師寰，□淮夷舊我賁晦臣，今敢搏厥衆段，反厥工吏，弗迹我東國。今余肇令汝率齊師、吳釐、楚夷、左右虎臣征淮夷。”即折厥邦首曰冉、曰裘、曰鈴、曰達。師寰虔不墜，夙夜恤厥穡事，休既有功，折首執訊，無謀徒御毆俘士女羊牛，俘吉金……

## (64) 駒父盨蓋(《文物》1976年5期)

惟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駒父殷南諸侯、率高父見南淮夷，厥取厥服。董夷欲墜，不敢不恭畏王命，逆見我，厥獻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敢不□俱逆王命。四月，還至于蔡，作旅盨，駒父其萬年永用多休。

南淮夷又稱南夷和淮夷，指淮水流域諸邦國。《後漢書·東夷傳》曰：“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虢仲盃》所記，殆即此事。這是對南淮夷戰爭的第一個回合。《麥生盃》、《敵簋》所記為征伐角淮、桐遼的戰役，戰果較虢仲時為大。《鄂侯御方鼎》、《禹鼎》所記是對鄂侯御方的鬥爭，緊接伐角桐之後。初時，鄂侯御方為得勝歸來的周王納壺，宴射，周王也對他優禮相待，賞賜有加，看來鄂侯是為了麻痹氣勢正盛的周王得勝之軍。過了不久，他就發動了大規模的入侵戰爭，會合南淮夷和東夷的武裝力量，從東南兩方向對周王室進攻，直打到首都附近，聲勢之大，令禹驚呼：“烏乎哀哉！用天降大喪於下國。”王動用了西六師和殷八師的隊伍進行抵抗，反攻。開始，雙方於匡地對峙，無法戰勝鄂侯的聯軍。後來，武公命禹帶領公族的私家精銳部隊，出奇兵抄到鄂侯御方的大後方，直襲其京城，一舉搗毀其總部，並生擒鄂侯御方。這一戰役，戰術運用是成功的。

《宗周鐘》是厲王標準器，銘中的“南國良孳”疑即古“房子”（考證將另行文），《姓纂·十陽》云房，“帝堯子丹朱封為房邑侯。”卜辭有“丁亥，貞，王其旁良乎御史”（《屯南》1059），周初有《良孳君簋》“良孳君休于王，自作器，孫子永寶”（《集成》3791），又有《旁良子父乙鼎》（《三代》2.47）。金文又有《亞旁壘》（《三代》12.1.9）。卜辭有“乙巳卜，何，貞亞旁以羌其禦用。”（《甲》2464）。《國語·周語》：“昔昭王娶於房。”蓋古房子國居於南（約在今湖北北部）其君稱“旁良子”或“良子”。曾為南夷、東夷數十邦之首領，初時與周為敵，後被征服，被厲王利用，乃遣間來逆迎周王，使東南諸夷與周王修好。

《兮甲盤》、《師寰簋》、《駒父盃蓋》銘文說明經過周王朝幾代人的反復征討，至西周末年，南淮夷諸部基本降服，成了西周王室的重要貢賦擔當者，其中製造兵器及禮器的青銅原料主要由他們供應，《戾敖簋》稱“戎獻金于子牙父百車，”（《三代》8.53）。若有貢賦不至或稍有反抗，則大加撻伐。

## 2. 與西北獫狁的戰事

### （65）不其簋（《三代》9.48）

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御方、獫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擒。余命汝御追於畧，汝以我車宕伐獫狁于高陶，汝多折首執訊。戎大同，永追汝，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我車函於艱。汝多擒，折首執訊。”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誨于戎功，賜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

### 兮甲盤（《三代》17，20）

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獫狁于畧盧。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敗。王賜兮甲馬四匹、駒車……（按：此器與62重出，故不計號）

## (66) 虢季子白盤 (《三代》17, 19)

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丕顯子白，將武于戎功，經維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趯趯子白，獻馘于王，王孔嘉子白義，王各周廟宣榘，爰饗。王曰：“伯父孔揚有光，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彤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

## (67) 師同鼎 (《文物》1982 年 12 期)

彝畀其形，師同從，折首執訊，俘車馬五乘，大車廿。羊百，契，用造。王羞于鬯，俘戎金冑卅，戎鼎廿、鋪五十、劍廿。用鑄茲尊鼎……

## (68) 多友鼎 (《人文雜誌》1981 年 4 期)

惟十月，用玁狁方興，廣伐京師。告追于王，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師。”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于京師。癸未，戎伐荀，衣俘。多友西追，甲申之辰，搏于邾，多友有折首執訊：凡以公車折首二百又□又五人，執訊二十又三人，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復荀人俘。或搏于龔，折首三十又六人，執訊二人，俘車十乘。從至，追搏于世，多友或有折首執訊。乃轍追于楊冢，公車折首百又十又五人，執訊三人，惟俘車不克，以衣焚，惟馬馵盡，復奪京師之俘。多友迺獻俘、馘、訊于公，武公迺獻于王。迺曰武公曰：“汝既靜京師，釐汝，賜汝土田。”丁酉，武公在獻官，公親曰多友曰：“余肇使汝，休，不逆，有成，使多擒。汝靜京師，賜汝圭瓚一，湯鐘一將，鐻鎗百鈞”……

從《不其簋》描述的戰況看，此次戰役是鄂侯御方與玁狁同時入侵的，對周王朝形成南北夾擊的形勢。玁狁是一個流動性很大的部族，與周人先戰於高陶（不其簋），又戰於囂廬（兮甲盤），三戰於洛之陽（虢季子白盤），四戰於京師一帶（多友鼎）。從《多友鼎》的俘獲看，玁狁也有大規模的戰車部隊，車戰仍是此時中原及北方戰爭中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

《師同鼎》講到俘獲品時有“羊百，契，用造”一句，“造”為祭名，這是將俘獲的羊殺掉，用於凱旋後的“造祭”。《多友鼎》記獻俘、馘，頒賞之禮，須分級舉行，武公命多友以公車出征，戰有俘獲，先是多友“獻俘、馘、訊于公，武公迺獻于王。”然後王賜武公土田，武公再賜多友圭瓚、湯鐘、鐻鎗等。

## 3. 東征與西伐

## (69) 史密簋 (《文物》1989 年 7 期)

惟十又一月，王令師俗、史密曰：“東征。”敔南夷：盧、虎、檜，杞夷、舟夷。觀，不陟，廣伐東國。齊師族徒、遂人乃執圖、寬、亞。師俗率齊師遂人左□伐長必；史密右，率族人、釐伯、焚眉周伐長必。獲百人……

《說文》：“敔，會也。”王命師俗及史密東征，二人會合南夷的盧、虎、檜和杞夷、



舟夷的部隊。東觀兵，大踏步前進，討伐東國。《說文》：“陟，登也。”“不”即“丕”，大也。“不陟”即班簋中的“否畀屯陟”之省，應指“大踏步前進”之義。這次東征主要打擊對象是“長必”，師俗率齊師遂人爲左翼，史密率族人、釐伯、奭眉爲右翼。

(70) 師旅簋（《考古學報》1962年1期）

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王曰：“師旅，令汝羞追于齊，儕汝十五錫登盾、生皇畫內戈雕戡厚必彤沙，敬毋敗迹”……

(71) 卣伯簋（《上海》54）

惟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微，益公至告。二月，眉微至見，獻齔。己未，王命仲姪歸卣伯貂裘……

《史密簋》、《師旅簋》記東征事，《卣伯簋》記所征之眉微爲西部方國。西周晚期東西方向的征伐僅見此三器有記載。在西周晚期，南方的淮夷、戡子，西北的玁狁對周王室構成很大威脅。有時直進攻到京師，並一度使京師淪陷。這些情況和《詩經》的《六月》、《出車》、《采薇》、《采芑》等所描述的對玁狁戰爭的情景十分相像。而《江漢》、《常武》等篇中所描述的對南淮夷的鬥爭與上述伐南淮夷諸器所記也是相類似的。各器中有些人名與文獻也相合，如虢仲、武公、南仲、尹吉甫等。綜觀晚期的戰爭，多爲防禦性質，主動出征較少，有不少是異族入侵，嚴重威脅其生存時，纔組織抵抗，這也反映出西周王室逐步走向衰敗的歷程。

## 附錄二 記述西周軍事裝備的金文資料

### 一 西周早期

1. 小孟鼎“俘馬□□匹、俘車三十輛、俘牛三百五十五牛……俘馬百四匹、俘車百□輛”。“王賞孟□□□□□弓一、矢束、畫鞬一、貝冑一、金干一、戣戈二。”（《三代》4.44~45）
2. 大孟鼎“賜乃祖南公旗，用狩”。（《三代》4.43）
3. 宜侯矢簋“賞瓚一、搏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文參》1955年5期）
4. 憲鼎“俘戈”（《斷代》一）
5. 麥方尊“侯賜玄雕戈”（《西清古鑒》8.33）
6. 小臣宅簋“伯賜小臣宅畫干、戈九、錫金車、馬兩。”（《三代》6.54）

## 二 西周中期

7. 康簋“賜衣、冑、干、戈”(《三代》6.52)
8. 靜簋“王賜靜鞞”(《三代》6.55)
9. 靜卣“王賜靜弓”(《三代》13.41)
10. 應侯見工鐘“賜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文物》1975年10期)
11. 趙曹鼎“賜弓、矢、虎盧九、冑、干、殳”(《三代》4.25)
12. 王臣簋“賜……鑾旗五日、戈畫戡厚必彤沙”。(《文物》1980年5期)
13. 師湯父鼎“賜口弓象珥、矢錡、彤欵”。(《三代》4.24)
14. 戎簋“俘戎兵：盾、矛、戈、弓、箛、矢、裨、冑，凡百又三十又五款”。(《文物》1976年6期)
15. 昌鼎“侯釐昌鬲、冑、干、戈、弓、矢束”。(《上海博物館集刊》6, 153頁)
16. 斂簋“賜斂弓、矢束、馬匹”。(《錄遺》160)
17. 伯晨鼎“賜汝……旅五旅、彤弓、彤矢、旅弓、旅矢、~~殳~~戈、~~殳~~冑”(《三代》4.36)
18. 師奎父鼎“賜……戈雕戡，旗”。(《三代》4.34)

## 三 西周晚期

19. 師藉簋“賜汝……戈雕戡彤沙、鑒勒、鑾旗五日”(《文物》1966年1期)
20. 輔師釐簋“賜汝……戈彤沙雕戡、旗五日”(《考古學報》1958年2期)
21. 寰盤“王呼史減冊賜寰……鑾旗、鑒勒、戈雕戡厚必彤沙”。(《三代》17.18)
22. 休盤“冊賜休戈雕戡彤沙厚必、鑾旗”。(《三代》17.18)
23. 無惠鼎“賜汝……戈雕戡厚必彤沙、鑒勒、鑾旗”。(《三代》4.34)
24. 麥生盨“俘戎器”(《三代》10.44)
25. 鄂侯御方鼎“王親賜御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三代》4.32)
26. 不其簋“賜汝弓一矢束”(《三代》9.48)
27. 虢季子白盤“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彤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三代》17.19)
28. 多友鼎“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俘車十乘……”(《人文雜誌》1981年4期)
29. 師同鼎“俘車馬五乘、大車二十……俘戎金冑三十、戎鼎二十、鋪五十、劍二十”。(《文物》1982年12期,《考古與文物》1992年2期)
30. 師族簋“儕汝十五錫登盾、生皇畫內戈雕戡厚必彤沙”。(《考古學報》1962年)

## 1 期)

31. 師克盃 “賜汝……朱旗、馬四匹、鎗勒、素鉞”。(《陝青》102)
32. 毛公鼎 “賜汝茲<sup>4</sup>，用歲用征”。(《三代》4.49)
33. 詢簋 “賜汝……戈雕戡厚必彤沙、鑾旗、鎗勒”。(《文物》1960年2期)
34. 師獸簋 “賜汝戈雕戡厚必彤沙、干五錫……”。(《博古圖》16.30)
35. 番生簋 “賜……朱旗旛金芳二鈴……”。(《三代》9.37)

(原載《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228~251頁，科學出版社1998年11月)

## 西周金文中的“周禮”

以禮治國是中國古代政治所特有的現象，“禮治”作為一種制度體系形成於西周時代，又稱“周禮”。後世有《儀禮》、《禮記》、《周禮》等幾部禮書記錄了古代禮制的一些內容，這些書大約編成於戰國至西漢這段時期，多已殘缺不全。因此，據這些後世文獻資料保存下來的“周禮”，遠非西周原貌。我國地下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數量已相當可觀，其中不乏西周禮制的記錄，雖然比較零碎，但却是第一手資料，把它們細心地聯綴起來，當可以看到真實的周禮的原貌。本文擬以西周金文為主要資料，作一次復原“周禮”的嘗試。在敘述時，本文將不按傳統禮書上吉、嘉、賓、軍、兇的分類，而根據金文內容分為祭祖、軍、封建、相見、饗燕、射等六個題目。禮書中述及的喪禮及喪服制度、冠、婚之禮等是古禮的重要內容，但在西周金文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錄，只好從略。金文中常見的“冊命禮”，已有幾部專著和許多論文發表，本文也不再贅述。

### 一 祭祖禮

從西周金文反映的周人意識看，他們認為天上與地上有兩個完全對應的王朝，天上的王朝由上帝主宰，地上的王朝由下帝主宰。邢侯簋：“克奔走上下帝，無終命于有周。”<sup>①</sup>庚姬尊：“帝后賞庚姬貝三十朋。”<sup>②</sup>銘中的下帝即指現實中的周王，帝后指周王的后妃。周人以死去的父親為“帝考”，死去的父祖稱“皇祖帝考”。仲師父鼎：“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sup>③</sup>賈簋：“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帝考。”<sup>④</sup>到西周晚期“皇祖帝考”又簡稱“皇帝”，如師詢簋：“肆皇帝亡吳，臨保我有周。”<sup>⑤</sup>厲王時又稱其先祖為“皇上帝”，趯簋：“申國皇上帝大魯令。”<sup>⑥</sup>（圖一）趯鐘：“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sup>⑦</sup>地上的王（下帝）死了，如果他的“德”很高，就有可能去天上做上帝。上帝和下帝一樣，

也是不斷更換的，被換下來的上帝們，去掉帝號，稱“皇祖”和“前文人”。猷簋：“猷作蕭彝寶簋，用康惠朕皇文烈祖考，其格前文人，其瀕在帝廷陟降。”敦狄鐘：“先王其嚴在帝左右。”<sup>⑧</sup>《詩經·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陟降”和邢侯簋中“克奔走上下帝”的“奔走”意思一樣。奔走是在上下帝間奔走，陟降是在上下帝間昇降，歷代去世的先王都在帝廷上帝左右，執行上帝陟降奔走之命，當人間祭奠祖先時，樂舞之聲，燎牲之煙氣，上達天廷，祖神們就紛紛由天而降，到人間歆享供祭的犧牲醴酒。接受了人間的祭享後，就降賜給子孫福祐平安。戣簋：“戣率有嗣師氏奔迫，御戎于棫林，搏戎胡。朕文母競敏啓行，休宥厥心，永襲厥身，卑克厥敵，獲馘百……衣搏，無尤於戣身。”<sup>⑨</sup>這是說戣受到去世母親在天之靈的保佑，大敗敵軍，而自身却沒有任何損傷。

成王時的何尊有這樣的話：“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述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嗚乎！爾有惟小子亡識，視于公氏，有爵于天，徹命，敬享哉。”<sup>⑩</sup>這裏提出的天和天命是兩個全新的觀念。康王時的大盂鼎進一步明確這個觀念：“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在西周金文中，天是周人心目中的至上神，它高踞太空，超自然，超上帝。天命是這個天神向天廷和上帝發佈的命令。所謂“文王受天命”，就是文王受了天神要他在天廷改朝換代的命令。按周人的邏輯，雖然上帝本來是殷人歷代去世先王輪流來做的，但“天命靡常”<sup>⑪</sup>，惟有德者居之。此時殷人的上帝不合天意了，天命令在天廷改換朝代，然後再把這場革命移植到人間，演出了武王滅商的事變。這就是為什麼武王滅商，而周初彝銘不講“武王受天有大命”的緣故。文獻中所記周人的先祖后稷、公劉、古公、太王、王季等在西周金文中一概沒有出現，西周金文中出現最早的周人先祖是文王，這是因為各代先王都沒有在天廷取得上帝的地位，只有文王受天大命，做了上帝。

先祖和上帝給予子孫的都是福祐，從不加禍於人間。猷鐘：“先王其嚴在上，龔龔數數，降余多福。”牆盤：“上帝司□□，保授天子綰命、厚福、豐年、方蠻亡不矧見。”<sup>⑫</sup>而天却不然，大盂鼎提出要“畏天威”，班簋說“東國戎人”因為“彝昧天命”，所以要遭到滅亡的命運<sup>⑬</sup>。到西周晚期，政局動蕩，周人則驚呼“嗚乎，哀哉！用天降大喪于四國”<sup>⑭</sup>，“哀哉！今日，天疾威降喪”<sup>⑮</sup>。可見天與祖先神、上帝是不同的，它是一種既可以降福人間也可以加禍人間的神秘力量。

大凡一個新政權建立，為求鞏固其統治地位，必要提出一個新的理論，用以說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周人提出的“文王受天命”，是對付強大殷遺民勢力的有效精神武器。商革夏命，商人祖先在天上取得上帝的地位，從而在地上建立商王朝，如果這是合理的，那麼周革商命，文王在天上受命作上帝，從而在地上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也應該

是合理的。上述天、天命、上帝為祖神的觀念，是周人獨創的，是在周初特定歷史條件下，為政治鬭爭的需要而構擬出來的，這是在研究西周時代祭祖禮時應該首先提出來的。

根據西周金文資料，我整理出西周祭祖禮的祭名二十種，現對部分祭名舉例考釋如下：

### （一）禘祭

古禘禮其詳已不可知，後世儒者的敘述已矛盾百出，《禮記·喪服小記》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到了鄭玄的時代，又作了進一步發揮，他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百王通義”。他又有“三禘”之說，即“禘天於圜丘”、“禘地於方丘”、“禘人鬼於宗廟”。再將宗廟之禘分為“吉禘”與“時禘”，吉禘是“終王大禘”，亦即“三年喪畢之禘”；時禘是四時之禘，即如《禮記·王制》所說的：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綜合上述可歸納為（1）不王不禘。（2）禘祭始祖。（3）禘分植祫。（4）禘分吉時。這些對禘祭的敘述，多不合西周的實際，從西周金文看，王有禘祭，如小孟鼎<sup>①</sup>、鮮簋<sup>②</sup>、刺鼎<sup>③</sup>記康王禘祭文、武、成王，穆王禘祭昭王。但諸侯和貴族也有各自對祖考的禘祭禮。大簋云：“賜芻羊牯，曰：用啻于乃考。”<sup>④</sup>這是說周王賞賜經過芻養的紅色公牛，使其用來禘祭去世的父親皇考大仲。繁卣：“公啻酺辛公祀。”<sup>⑤</sup>這是說公對去世的父親辛公行禘祭。顯然辛公與大仲都不是王，“不王不禘”是後世制度，在西周時代貴族也可以對祖考行禘祭禮。在西周金文中，禘祭的對象都是近祖，一般不出三代。小孟鼎記康王禘文、武、成三代先王，鮮簋、刺鼎為穆王禘昭王，大簋、繁卣是作器者禘其父考，文獻所言禘祭始祖的情況沒有出現。其次，禘祭在金文中有植祫，如小孟鼎合禘三王，其餘各器專禘其父考等，但並不特別加以區別的稱呼。在西周金文中不見對天地的禘祭，鄭玄所謂的“三年喪畢之禘”也與金文不合。鮮簋禘於穆王三十四年，小孟鼎禘於康王二十五年，它們都大大超出三年喪的時限。至於禘非四時之祭，在金文中也是明確的。鮮簋、刺鼎禘於五月，大簋禘於六月，小孟鼎禘於八月，繁卣禘於九月，由五月至九月，難以某個季節來涵括。

文獻所記也有與金文相合者，如《禮記·明堂位》說：用牲“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牝，周騂剛”。大簋說用“芻羊牯”，羊即騂，赤色牲也。芻者以芻莖養牛也。《周禮·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禮記·祭統》：“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鮮簋記王在禘後賜鮮：“裸王軛、裸玉三品、貝二十朋。”繁卣記在禘後公賜繁宗彝和車馬。

周人禘祭金文寫作“啻”，無一例外。殷墟卜辭禘祭之禘寫作“帝”。如：“貞，帝于王亥。”<sup>⑥</sup>“戊戌卜，帝于黃口。”<sup>⑦</sup>殷代的禘祭禮在諸祭禮中地位並不十分顯要。周人



沿用這一祭名，加以改造，使之成為周人最重要的祭祖禮之一。

## （二）饗祭

臣辰盃：“惟王大龠於宗周誕饗莽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sup>②</sup>麥方尊：“迨王饗莽京，彫祀，孚若翌日。”<sup>③</sup>伯唐父鼎：“乙卯，王饗莽京。”<sup>④</sup>呂方鼎：“在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饗口大室，呂誕于大室。”<sup>⑤</sup>高卣蓋：“惟十又二月，王初饗旁。”<sup>⑥</sup>以上五器皆作於西周前期。殷末銅器戍嗣子鼎：“丙午，王賞戍嗣子貝二十朋，在闡牢，用作父癸寶簋。惟王饗闡大室，在九月。”<sup>⑦</sup>由上述諸器看，饗祭多行於莽京的宗廟大室，呂方鼎、戍嗣子鼎饗於大室，臣辰盃、麥方尊、伯唐父鼎饗於莽京，高卣蓋記饗於旁，旁即金文習見之莽京，是周王室宗廟所在之地。臣辰盃、伯唐父鼎中的饗祭作為紀年的大事，更應加以注意。

沈子它簋：“它曰：拜，稽首。敢昃昭告朕考，命乃鵬沈子作紼於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紼，休同公克成綏考，以於顯顯受命。”<sup>⑧</sup>（圖二）銘中的“作紼”就是饗祭，紼、饗音同通假，作器者“它”是周公的後人，於周公廟中作紼祭，其目的是“陟二公”。陟者昇也，即將二公的神主位置依昭穆次序昇上一級。二公應是作器者“它”的兩位未毀廟的先祖，很可能是其祖父和曾祖父，即下文的同公與己公。《公羊傳·文公二年》：“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祖皆昇，合食於大祖。”因為是合食之祭，故其祭名又可以寫作從食之饗。“二公”之一“休同公”，曾使“它”去世的父親（考）當年在世時“於顯顯受命”，所以“它”不敢不饗祭二公。這實際是調整宗廟次序的祭禮，沈子它的父親新死，其神主須進入宗廟，其祖父、曾祖的神主亦須遞昇一級，這樣驚擾祖先神靈的大事，當然需要舉行一次隆重的祭奠儀式。

正因為饗禮是新死之父祔入宗廟的大典，所以王室饗禮可用為紀年的標誌。又王室饗禮必行於父王去世、新王繼位之時，故凡金文記王室饗禮者等於記某王元年，驗之記饗禮諸器皆不見記年者，正說明記饗禮即記元年。如這一推理能够成立，就又為殷周銅器斷代找到一個新的標準。依饗禮行於元年的標準，戍嗣子鼎應作於帝辛元年九月丙午日，高卣蓋作於康王元年十二月庚申日，臣辰盃作於昭王元年五月既望辛酉日，麥方尊作於昭王元年，伯唐父鼎、呂方鼎作於穆王元年等。

## （三）彫祭

麥方尊：“迨王饗莽京，彫祀，孚若翌日。”繁卣：“惟九月初吉癸丑，公彫祀。孚旬又一日辛亥，公禘彫辛公祀，衣事，亡尤。”文獻稱彫為繹，《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尚書》有

《高宗彤日》篇，彤即酺。殷墟卜辭：“癸丑卜，賓貞，酺大甲，告於祖乙一牛。”<sup>③</sup>“貞，來辛酉，酺王亥。”<sup>④</sup>卜辭中的酺祀是對先公先王的祀典之一，未表現出“明日又祭”的意思。在麥方尊中提到“孚若翌日”，所以，西周金文中的酺祀，是指次日之又祭；在繁卣中禘酺聯言，也應該是禘祭次日之又祭。

酺祀，陳夢家、于省吾先生認為是酒祭。陳先生云：“酺，從彡從酉，疑彡日用酒祭，故合為一字。”<sup>⑤</sup>于先生云：“言酺茲，酺為酒祭，茲為繫屬物。”<sup>⑥</sup>唐蘭先生云：“金文和卜辭都有酺祭，阮元說是酎，羅振玉釋為酒字都是錯的。在卜辭裏，酺祭分為彡日和翌日兩種。”<sup>⑦</sup>

殷代金文有戊寅鼎言及酺祀：“戊寅，王曰：𠬞，𠬞馬酺。賜貝，用作父丁尊彝。”<sup>⑧</sup>“馬”前一字是地名，大意為以該地之馬行酺祭。陳、于兩先生的意見，多從字形方面考慮，恐不一定合於這一祭名的原意，唐蘭先生所說的是卜辭中的情況，到了西周金文中，此祀典只見“翌日”不見“彡日”，這就與文獻所說的“祭之明日又祭”的情況十分接近了，所以文獻對這一祭名的解釋是合於西周實際的。金文的“酺”是文獻的“繹”，依《爾雅》所云周人的繹與夏人的“復胙”是同一祭典的不同祭名，內容是一樣的，可能這一祭典的實質是在祭之明日，分食胙肉的儀式。<sup>註</sup>

#### （四）祿祭

獻侯鼎：“惟成王大率于宗周，賞獻侯鬲貝，用作丁侯尊彝，奄。”<sup>⑨</sup>叔簋：“惟王率于宗周，王姜史叔使于大保，賞叔鬲鬯、白金、芻牛。”<sup>⑩</sup>孟爵：“惟王初率于成周，王令孟寧鄧伯，賓貝，用作父寶尊彝。”<sup>⑪</sup>圉卣：“王率于成周，王賜圉貝，用作寶尊彝。”<sup>⑫</sup>矢令方彝：“明公歸自王，明公賜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祿；賜令鬯、金、小牛，曰：用祿。”<sup>⑬</sup>歸卣進方鼎：“惟八月辰在乙亥，王在葦京，王賜歸卣進金，肆率。對揚王休……”<sup>⑭</sup>

上述六器皆作於西周前期，祭名寫作“率”或“祿”。比這幾件器更早的銘刻資料有周原甲骨 H11 的兩片，編號為 84 和 112。“貞，王其率又大甲，咎周方伯□？由正，不左，于受有祐。”“彝文武□，貞，王翌日，乙酉，其率，再中□武豐……。”這兩片甲骨刻於文王受命至武王滅商前這段時間。

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灃西隊在陝西長安縣張家坡西周墓地發掘的 183 號墓，出土了伯唐父鼎，銘文如下：“乙卯，王饗葦京。王率，辟舟臨舟龍。咸率，伯唐父告備。王格，乘辟舟，臨率白旗。用射絳、釐虎、貉、白鹿、白狼於辟池。咸率，

註：將酺與“復胙”聯繫這段話是此次結集時添加的。

王蔑歷，賜秬鬯一卣，貝廿朋。對揚王休，用作安公寶尊彝。”<sup>④</sup>此器按饗禮行於某王元年的規律，應作於穆王元年。

獻侯鼎、叔簋、孟爵、圉卣、歸卣進方鼎等五篇銘文都以禘祭為紀年的大事，說明此一祭禮在西周時代被看作十分重大的事件。諸器所記祭禮地點一在宗周，一在成周，一在葦京，是西周三個王都所在地，不見在其他地點舉行者。而且，除矢令方彝沒有明確指出是那一級禘禮以外，其餘各器皆指明是周王所舉行的祭禮。伯唐父鼎更記載了一次禘祭的過程，其儀注有“辟舟臨舟龍”、“告備”、“乘辟舟臨禘白旗”以及射牲等。這一祭禮是在葦京的辟雍大池中舉行的。

禘字意為“祈求”，癸鐘“用禘壽，介永命”<sup>⑤</sup>，“禘壽”就是祈求長壽。在殷墟卜辭中有“禘年”、“禘雨”、“禘生”等，意為祈求豐收、雨水和生育，被祈求的對象是先公、先王和先妣，周原甲骨禘祭的對象大甲亦為先王。西周金文沒有講明禘祭的祈求內容，也沒有講明被禘祭的對象。但從殷墟卜辭和周原甲骨內容推測，也應為周的先王。

下面我將西周金文中出現的二十種祭祖禮的祭名列成表格，與殷墟卜辭、殷代金文、周原甲骨文以及春秋戰國金文作一對照，以看出這些祭典發展的脈絡。

祭名	殷墟卜辭	殷金文	周原甲骨	西周前期金文	西周後期金文	春秋戰國金文
禘	△			小孟鼎 鮮簋 刺鼎 繁卣 大簋		
衣	△			天亡簋 庚嬴鼎 繁卣	陵叔鼎	
酺	△	戊寅鼎		麥方尊 繁卣		
禘	△		△	獻侯鼎 叔簋 孟爵 圉卣 矢令方彝 歸卣進方鼎 伯唐父鼎		
饗		戊嗣子鼎		臣辰盃卣 呂方鼎 高卣蓋 沈子它簋 麥方尊 伯唐父鼎		
告	△			矢令方彝 麥方尊 沈子它簋		
饗	△	我方鼎	△	作冊 癸卣 夷尊 耳口觶	猷簋 五祀猷鐘	
叙	△	我方鼎			師卣鼎	
報	△			矢令簋	師卣鼎	
翟					史喜鼎	
禘					牆盤	哀成叔鼎 蔡侯盤
燎	△		△	小孟鼎 庸伯馭簋		
虫	△			子尊		
牢	△			貉子卣 呂伯簋		
饗	△			天亡簋		

續表

祭名	殷墟卜辭	殷金文	周原甲骨	西周前期金文	西周後期金文	春秋戰國金文
饅		(玉戈銘)		敝土卿尊		
禴	△			臣辰盃、卣		
嘗					六年召伯虎簋 姬鼎	陳侯午敦 齊肅鼎 盤 邾陵君鑒 豆
烝	△			大孟鼎 高卣蓋	段簋 姬鼎 大師盧豆	陳侯午敦
閟	△			頂卣 子卣		

表中的西周前期指武王至穆王，西周後期指恭王至幽王這段時期。這二十種祭名有的反映出祭祀目的不同，如祿、饗、饗、報等；有的反映出祭祀的方法不同，如告、禋、燎、翟、饗、饗、嘗、烝、閟等。有的一件銅器銘文中記有兩到三種祭名，但其內容大致可以分開。有的也不專用於祭祖，如告祭，班簋有“公告厥事于上”句，何尊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句，周原甲骨文也有“口告于天，廼亡咎”句（H11：96），這幾處告祭的對象都不是祖神，而是天神。又如大孟鼎有“烝四方”的記載，說明烝祭也不專用於祭祖，也可以用來祭“四方神”。

從表中可以看出，除翟、禋、嘗三種次要祭禮外，其餘十七種祭祖禮都是殷周同名，這正如孔子所說：“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sup>④</sup>其中祿、饗、燎三種較重要的祀典在周原甲骨上已有記載，說明早在文武創業時期，已有意利用殷人禮儀。《尚書·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周初雖然幾乎全盤繼承了殷人祭祖禮儀的名稱，但是他們在運用時是有所改造的，並非全部照搬硬套。比如禘與饗在殷代是較次要的祭祖禮，而在西周則被改造成最重要的祭祖典禮，出現在西周金文中次數較多，有的甚至可以用來作紀年的大事。燎祭在卜辭中出現次數很多，祭祀的範圍也很廣，在西周金文中則主要用於軍祭。西周金文中所記祭祖禮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是所祭祖先沒有超出三代者，這與殷人徧祀先公先王的作法明顯有別，這可能與周人“親盡毀廟”的制度有關。

王室的祭祖禮每種都應有各自獨特的祭儀，但諸祭祖禮又應有許多共同的祭儀，有大同也有小異，現就其大同者作些考證：

為表示對祖神、上帝的尊敬，供享的犧牲、玉帛、粢盛、酒醴等都要由王及后妃親自動手生產。《禮記·祭統》：“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令鼎云：“王大藉農于諶田。”<sup>⑤</sup>令鼎作於西周早期，說明王親耕藉田的制度確實

始於周初，當然這種所謂親耕是儀式性的，對內表示敬祖重宗，對外則表示重農務本，號召臣民不誤農時，及時耕作。《國語·周語》記周宣王不藉千畝，引起虢文公大發議論，藉以對古代天子親耕的制度作了詳細的描述。

舉行祭典的宗廟需有各種祭器陳列，西周青銅器每自名“尊彝”、“祭器”、“醴壺”等，說明大部分銅器都曾作為禮器置於宗廟，用於祭祀。伯公父勺云：“伯公父作金爵……用享用孝于朕皇祖考。”<sup>④</sup>更自己講明作器的用意即在於享孝祖考。

金文賞賜之隆重者每以圭瓚璋等禮玉及醴酒為賜，如呂方鼎：“王賜呂甝（柅鬯）三卣。”鮮簋：“鮮蔑歷，裸王鞞、裸玉三品，貝百朋。”子尊：“王賞子黃瓚一、貝百朋。”<sup>⑤</sup>王賜予貴族此類物品皆列於諸賜品之首，以示尊貴。實際上，賜予禮玉、醴酒，就表示賜予該貴族祭祀的權力，是十分榮寵的事情。《周禮·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周禮·春官·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大祭祀……供其玉器而奉之。”祭祖禮儀中祭器、禮玉、醴酒是三種必不可少的品物，這在金文和文獻中都有明確的記載。

周人祭祖禮的特點是設尸和祝，尸是神像，選用孫輩中人充當，祭禮進行時，穿上被祭祖先的遺服，端坐於上，代替祖神接受祭享。西周金文中記祭祖禮諸器皆未見尸者出現，在記饗禮的穆公簋蓋中有“王夕饗醴於大室，穆公侑尸”的記載<sup>⑥</sup>，蓋古代饗近於祭，祭饗皆有尸。祝是祭祖禮中的主持人，王對先祖的祝辭由他來禱告，祖神對後嗣的嘏辭也由他來宣讀。《禮記·禮運》：“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祝頗似一位能交通神人的巫者。西周初年的大祝禽鼎記周公子伯禽曾任大祝之職<sup>⑦</sup>，鄆簋銘中有“祝”和“五邑祝”<sup>⑧</sup>，申簋蓋中有“大祝”和“九疊祝”<sup>⑨</sup>。西周的宗祝不僅活動在宗廟，而且參與行政，班列在朝。在西周的職官體制中，神職人員與行政官員是並列的。由祝頌禱的祝嘏之辭在西周金文中隨處可見，如梁其鼎：“用祈多福，眉壽無疆，峻臣天[子]。”<sup>⑩</sup>啓卣：“用介魯福。”<sup>⑪</sup>癸鐘：“用禱壽，介永命。”<sup>⑫</sup>虢簋：“用賜眉壽、黃耆、耄終。”<sup>⑬</sup>鮮鐘：“用降多福。”<sup>⑭</sup>等等。

祭祖禮的祭日要通過占卜來選定，繁卣記九月初吉癸丑日占卜，得辛亥日為祭日。《周禮·天官·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所記與金文相合。

伯公父勺：“用獻用酌，用享用孝于朕皇祖考。”這裏的獻、酌即文獻中的獻、裸，指以清酒飲尸者。《禮記·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尚書·洛誥》：“王入太室，裸。”這是祭祖禮最重要的儀注之一。獻鐘：“獻作寶鐘，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sup>⑮</sup>出土的青銅編鐘編鐃多數用於廊廟之上，作為祭祖時節歌節舞而用。樂歌貫串整個祭禮過程，《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率瞽登歌，令奏擊拊。”《周禮·春官·大司樂》：“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禮記·祭統》：“乃



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大武舞相傳是描述武王伐紂時戰鬪景象的舞蹈，用在宗廟祭祖禮中，表示不忘先祖創業時的勇武精神。《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昇歌，舞莫重於舞宿夜，此周道也。”《祭統》對周人祭祖禮主要儀注的概括與西周金文是相合的。

頌簋：“王在周康昭宮，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嗣成周貯，監嗣新造貯用宮御。賜汝玄衣，黼純、赤市、朱黃、鑾旂、鞶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璋。”<sup>⑤</sup>《禮記·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賞賜冊命之禮往往是祭祖禮之後的重要儀注。祭祖禮後另一重要儀注是“脰膾之禮”，德方鼎：“惟三月，王在成周，誕珅禘，自蒿。”<sup>⑥</sup>何尊：“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面武王豐禘，自天。”史獸鼎：“尹賞史獸彝，賜豕鼎一、爵一。”<sup>⑦</sup>庚嬴鼎：“王蔑庚嬴歷，賜彝、璋、貝十朋。”<sup>⑧</sup>上述諸器中的禘、彝兩字，郭沫若先生釋爲“福”字，認爲即祭後之胙肉<sup>⑨</sup>。將這兩字釋爲“福”字尚難以肯定，但指爲胙肉則是對的。這種脰膾之禮，至春秋戰國間仍盛行不衰，如《孟子·告子下》：“孔子爲魯嗣寇，不用。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說明在此時祭後分贈膾肉仍爲常禮。

王國維先生說：“周之祭法，詩書禮經皆無明文。”<sup>⑩</sup>先秦文獻沒有給我們留下周人祭祖禮的系統記載。《禮記·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這是就祭祀目的來講有祈求、報賽和禳祓的區別。祭祀目的不同，所用祭名各異，其儀注自然也應有不同，但銘刻資料對每種祭禮的記述十分簡略，要想把每個祭祖禮的儀注都弄清楚，幾乎是不可能的，上述只能算是對西周王室祭祖禮一般儀注的初步重構。

## 二 軍禮

西周金文中記述戰事的銘文有七十餘篇，它們分別記錄了西周早中晚各次戰役的實況，同時也記錄了一些當時軍禮的儀注。

周人在用兵之前有“定兵謀”的儀注，禽簋：“王伐蓋侯，周公謀禽，祗。”<sup>⑪</sup>這是說，王在出征去討伐蓋侯之前，主帥周公與其子大祝伯禽有“兵謀”的儀注，謀成之後，伯禽進行禱告祝號。銘中的“祗”字不識，其意應爲禱告祝號。《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注曰：“定兵謀也。”在出征前還有各種祭祀活動。師同鼎：“羊百，契，用造。”<sup>⑫</sup>這是說，屠宰百隻羊來行造祭。小臣彘鼎：“王造于楚麓……



王至于造应。”<sup>⑥</sup>這是說王在楚麓和新設之駐蹕地（应）行造祭。西周武王時的天亡簋有“王饗，大宜”的記載<sup>⑦</sup>（圖三），作册矢令簋有“作册矢令尊宜於王姜”的記載<sup>⑧</sup>（圖四）。兩器都記錄了一次宜祭。造與宜是周人出征前的兩種主要軍祭。《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西周金文中不見類禡之祭，宜造之祭則有之。天亡簋之宜祭行於宗廟大室之中，矢令簋之宜祭行於南國炎地，都不在“社”中，小臣奭鼎記造祭行於南國楚麓和王臨時駐蹕之地。《禮記·曾子問》說周人有載父考神主出行的制度，《史記·周本紀》也記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而行，小臣奭鼎所記可能就是在出行的禰廟中行造祭。這些征戰前的祭祀，主要用意在向祖先神靈和上帝告知戰事，以便求得他們的保佑，並不拘泥於時間和地點。保卣鼎“惟王既燎，厥伐東夷。”<sup>⑨</sup>從行文次序看，似乎表明在出征前也需要行燎祭，蓋以燎牲之煙氣上達天廷，以求祖先和上帝給以保佑。宜、造、燎各種祭典必用犧牲，祭後當然也應分發胙肉，禽鼎：“禽有脔，祗。”說明在祭後伯禽分得一塊胙肉，並為此又進行了禱告和祝號。

出征前除舉行各種祭禮之外，還有誓師的儀注。禹鼎：“禹曰：丕顯赳赳皇祖穆公克夾召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暇忘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朕祖考政于邢邦，肆禹亦弗敢愆惕，恭朕辟之命。烏乎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亦惟鄂侯御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內。王廼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鄂侯御方，勿遺壽幼。”<sup>⑩</sup>師寰簋：“王若曰：師寰，感淮夷舊我貞晦臣，今敢搏厥衆段，反厥工吏，弗迹我東國。今余肇令汝率齊師，異嫠、熒尸、左右虎臣征淮夷。”<sup>⑪</sup>這些銘文從語氣上看，都可能節選自出師的誓師辭中。《尚書》有《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等多篇誓師辭，都是在各個時代大戰役前誓師所用，所言也都是講被征伐的對象如何荒亂昏惡，應行天之罰，出征將士應爭先奮勇殺敵等等。

《孫子·謀攻》：“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想是對前人戰爭經驗的很好總結，早在西周戰史中，這一思想就已露端倪。西周金文中有一些“出狩”的記載，如啓卣：“王出狩南山，搜廋山谷，至于上侯澆川上。啓從征，謹不擾。”<sup>⑫</sup>交鼎：“交從狩。”<sup>⑬</sup>大保玉戈：“令大保省南國，帥漢，誕狩南，令厲侯辟用蛛走百人。”<sup>⑭</sup>員鼎：“王狩于視敵，王令員執犬休善。”<sup>⑮</sup>大孟鼎：“賜乃祖南公旗，用狩。”金文狩均寫作獸，《易·明夷》九三：“明夷於南狩。”注曰：“狩者，征伐之類。”啓卣：“出狩南山。”啓尊：“啓從王南征。”<sup>⑯</sup>兩器爲一人所作，所記亦同一事件，一個說“出狩”，一個說“南征”，可見此時的出征往往以出狩爲掩護。大隊兵馬，浩浩蕩蕩地於山川之上狩獵，這本身就是一種炫耀武力的戰爭演習。文獻中所記的“大蒐禮”講的也是借狩獵之機演練軍陣，作爲一種戰爭準備的手段。

西周金文中還有“觀兵”的記載，效卣：“惟四月初吉甲午，王觀于嘗。”<sup>⑦</sup>日人高田忠周先生引《左傳·襄公十一年》“觀兵於南門”加以說明<sup>⑧</sup>，這是很對的。《史記·周本紀》記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國語·周語》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左傳·僖公四年》：“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史密簋：“惟十又一月，王令師俗、史密曰：東征。啟南夷：盧、虎、檜、杞夷、舟夷。觀，不陟，廣伐東國。”<sup>⑨</sup>這裏說王命令師俗和史密東征，他們會合南夷的盧、虎、檜及杞夷、舟夷共同觀兵，然後大踏步前進，去征伐東國。金文中記觀兵，只用一“觀”字。上述金文和文獻中有關觀兵的記載說明，觀兵是周人一種很重要的戰爭手段，其作法是使用強大武力相威脅，而不直接使用武力，用軍事壓力使敵人屈服。

西周金文中還有幾件器記有“呼漁”。井鼎：“惟七月，王在葦京。辛卯，王漁于□池，呼井從漁。”<sup>⑩</sup>適簋：“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葦京，呼漁于大池。”<sup>⑪</sup>害簋：“官嗣夷僕、小射、底漁。”<sup>⑫</sup>據陳夢家先生考證，“底漁”即專嗣射魚的官員<sup>⑬</sup>。《淮南子·時則訓》：“季春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春秋·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左傳》：“公將如棠觀魚。”爲此，臧僖伯還發表了一番十分迂腐的議論，魯僖公並未理會他的勸告，直接講出其射魚的真正用意，他說：“吾將略地焉。”是知周人的“射魚”並非一般的遊藝活動，它同“出狩”一樣，也是一種掩護軍事行動的手段。周人這種構兵於禮的作法把殘酷的軍事鬭爭掩蓋在諸如出狩、呼漁、軍事演習等活動中，以求達到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猷鐘：“艮孳迺遣間來逆昭王，南夷、東夷俱見二十又六邦。”“艮孳”曾侵犯周的領土，被周王派遣部隊打敗，並“敦伐其至，撲伐厥都”，導致他降服於周。這時，艮孳爲表示歸順，特派間諜迎接周王，裏應外合，使東夷、南夷二十六邦都來朝見周王。這是西周軍事鬭爭中“用間”的珍貴史料。

中觶：“王大省公族於庚，振旅。”<sup>⑭</sup>“公族”應是某族武裝的核心部隊，王在庚地親自檢閱這支打了勝仗的部隊。《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蓋與出征前的儀注類似，得勝返回的部隊也需舉行校閱、祭祀等。其中“獻俘禮”十分隆重，小孟鼎有詳細記載：“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格周廟，□□□□賓，誕邦賓尊其旅服，東嚮，孟以多旗佩鬼方□□□□入南門。告曰：王曰孟以□□伐鬼方。□□□□執酋二人，獲馘四千八百□二馘，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俘馬□□匹，俘車三十輛，俘

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三十八羊。孟或□曰：□□□□乎□我征。執酋一人，獲馘三百三十七馘，俘人□□□□人，俘馬百四匹，俘車百□輛。王若曰：嘉！孟拜，稽首，以酋進即大廷。王令榮訊酋，□□即酋，訊厥故，□越伯□□鬼聞，鬼聞盧以新□從商。折酋于□，王乎□□令孟以厥馘入門，獻西旅，以□入燎周廟。孟以□□□□□入三門，立中廷，北嚮。孟告鬻伯即位，鬻伯告□□□於明伯、鬻伯、□伯。告成。孟以□大侯田□□□□□孟征□，咸。賓即位，獻賓。王呼獻孟。王以□□□進賓。□□大采，三周入服酒。王格廟，祝誕□□□□□邦賓不裸，□□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卜祭戕。王裸，裸從，獻邦賓，王乎□□令孟以區入，凡區以品。季若翌日，乙酉，□三事大夫人服酒，王格廟，獻王邦賓，誕王令賞孟□□□□□弓一矢百，畫鞬一，貝胄一，金干一，戟戈二，□□□用作□伯寶尊彝，惟王二十又五祀。”

該鼎已佚，銘拓漫漶不清，但經過郭沫若、陳夢家、唐蘭等前輩學者細心考索，已大體可讀。銘文記錄了兩次對鬼方的戰役後舉行的獻俘大典。有一段銘文大意是：孟將捉到的鬼方酋首（兩戰共三人）帶進大廷，康王命榮伯主持審訊，當訊問其謀反緣故時，他們承認了“從商”的罪行。這就告訴我們，這次戰爭的起因與殷遺王子祿父“北奔”有關，蓋其北奔之後與鬼方結合起來，對周王朝形成威脅，康王為徹底摧毀殷遺的武裝抵抗，才組織了這兩次戰役。從俘獲情況看，第一次戰役俘車三十輛，第二次戰役俘車達百餘輛，說明曾進行了激烈的車戰，鬼方能建起強大的車戰部隊並熟練地進行車戰攻防，可能與殷遺的加入有關。這也是西周金文中第一次車戰的實錄。文獻稱武王克商，不過“率戎車三百乘”，此次戰役僅俘獲就達百餘乘，可以想見，戰爭的規模是相當大的。

此銘詳細地記錄了一次獻俘獻獲大禮的全過程，典禮在周廟中舉行，由康王親自主持，有許多重要官員和諸侯邦君參加，由甲申始至乙酉止，共進行兩日，禮儀十分繁複隆重，大的儀注有十項：

第一，告獻：在正式獻俘獲前，先報告俘獲情況，包括執酋、獲馘、俘人、俘車馬牛羊的具體數字。

第二，訊酋：將所執酋首“進即大廷”，由重要官員（榮伯）主持審訊，如《詩經·泂水》所說的“淑問如皋陶”。經過審訊，弄清其反叛的原因，鬼方酋首承認了“從商”的罪行。

第三，折酋：將鬼方酋首斬首。

第四，獻馘：將所斬鬼方酋首之馘入門獻於西旅。

第五，燎祭：將酋首之馘入燎周廟，告慰於先王。

第六，告成：鬻伯、明伯、鬻伯等接受孟告成。

第七，飲至：王親自為孟祝賀，“王呼獻孟”，以示榮寵，以慶勝利，這實際是舉

行“大饗”。

第八，禘祖：所祭者為文、武、成三代先王。

第九，獻俘獲：入獻分區、分品類。

第十，賞賜：第二天，在宗廟中又專門舉行賞賜典禮，所賜多為兵器，有弓矢干戈甲冑等。

除小孟鼎外，還有幾件器銘記有獻俘禮，豐方鼎有“飲秦飲”的記載<sup>⑧</sup>，譚介甫先生考證它就是文獻中的“飲至禮”<sup>⑨</sup>，屬小孟鼎獻俘禮第七項儀注。在西周晚期還有一件敵簋，記載了一次對南淮夷的戰爭，戰勝之後也舉行了獻俘禮：“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適爰內伐湏臯、參泉、裕敏、陰陽洛。王令敵追御于上洛焜谷，至於伊，班。長榜截首百，執訊四十，奪俘人四百。獻于榮伯之所。于焜衣諱，復返厥君。唯王十又一月，王格于成周大廟。武公入佑敵，告擒：馘百、訊四十。王蔑敵歷，使尹氏授釐敵圭瓚，口貝五十朋，賜田于含五十田、于早五十田。……”<sup>⑩</sup>敵簋所記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此次戰役共截首百，執訊四十，俘人四百，但在成周大廟告擒時，祇講了馘百訊四十，而不及俘人之數，這說明在西周晚期獻俘禮中“告擒”祇限報告和獻出戰鬪人員的斬獲，而平民和奴隸的奪俘則不必上繳，這與西周早期小孟鼎中所記是不同的。第二，這次俘獲的南淮夷邦君沒有殺掉，而是“復返厥君”，將其遣返了。這可能是要利用他進一步招降其他部族，這種攻心戰術的運用，說明周人在戰爭藝術的講求上已有了很大進步。

另外，豐方鼎在記周公征伐東夷取得勝利後說：“公歸，禦于周廟。”禦字不識，像兩手倒持鳥於示前，可能表示敬獻祭物於神前之意。此祭名卜辭習見：“癸酉卜，貞，王賓祖甲，禦。”<sup>⑪</sup>“卜、貞，口口大示，禦。”<sup>⑫</sup>“彡日，彡甲曰：‘剛祖乙，禦。’”<sup>⑬</sup>等等。在卜辭中是一祭祖的祭名，西周借為凱旋後的軍祭之名了。

### 三 封建禮

一九八六年冬，北京郊區琉璃河 1193 號大墓出土匭（燕）侯克壺、盃，兩器銘文相同，釋文如下：“王曰：大保，惟乃明（盟），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對（封）。乃享。命克侯于燕。事（剗）羌豸，獻（祖）于御微。克來燕，入土眾有嗣，用作寶尊彝。”<sup>⑭</sup>銘中的“對”字可讀作“封”，“大對”就是“大封”。在金文中奉、對、封三字皆像以手植樹於地上之形，可能都是由樹藝之藝字分化而成。甲骨文中的“東對”、“西對”應讀作東封、西封，散氏盤的“一奉”、“二奉”也應讀作一封、二封<sup>⑮</sup>。一九八四年河南平頂山市出土封虎鼎中的封字像雙手植木於地之“奉”字<sup>⑯</sup>。六年召伯虎

簠：“對揚朕宗君其休”<sup>⑤</sup>（圖五），中觶“中對王休”<sup>⑥</sup>，兩器中的“對”字都寫作人植樹木於地之“封”，與同一簠銘之“余典勿敢封”之封字類似。因字形相近，這三個字在金文中每相混用。《荀子·正論》：“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非，對屨……。”郝懿行曰：“對屨，《慎子》作履紲，對當作紲。”王先謙《集解》亦云：“對當爲紲。”說明在荀子的時代，對、封仍有時混用。這是金文中首次出現《大封禮》的記載。該銘中有“惟乃盟，乃鬯享于乃辟”的句子，句中三“乃”字是代詞，相當於現代漢語“你的”。後面又有“乃享”句，這個“乃”字是副詞，相當現代漢語“於是”。鄂侯御方鼎“鄂侯御方納壺于王，乃裸之”、“王休宴，乃射”，兩“乃”字用法與後句相同<sup>⑦</sup>。金文通例燕饗生人用鄉（饗），祭祀鬼神用“享”。武王是大保奭的辟君，故銘中的“享於乃辟”、“乃享”都是講享祀先辟武王。“命克侯于燕”是封建諸侯的述辭。“剗羌豸，獻（祖）于御微”，是燕侯克赴封前殺牲祖祭道神。《詩經·大雅·韓奕》記周宣王錫命韓侯，有“韓侯出祖，出宿於屠”句，疏云：“《烝民》有仲山甫出祖，仲山甫爲二伯，韓侯爲侯伯，故兩詩皆有出祖祭道神事。”韓侯、仲山甫受封爲侯伯，赴任時有祖祭道神的儀注，本銘爲克受封爲燕侯，殺牲祖道的儀注是一樣的。“入土眾有嗣”，指燕侯克受納裂土及燕地官吏民衆。《尚書·禹貢》：“徐州厥貢惟五色土。”《逸周書·作洛》：“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這種裂土封建的制度確曾行於周初，後世沿用，作社稷壇，成爲國家的象徵。

1193 號大墓有四條墓道，其規模已具備諸侯墓葬條件，按一般分析，墓中所出長銘重器的器主燕侯克有可能就是墓主。據《史記·周本紀》和《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封召公奭於燕”，“封召公於北燕”，武王所封第一代燕侯應是召公奭。召公年高多壽，歷仕三王，康王時仍出任太保。因此是在他在世時就將封地嗣繼給其子克了，燕侯克最早祇能是第二代燕侯。本銘記錄的是克在成王時嗣封爲燕侯的典禮，有召公到場，故銘中記有成王對太保說話的口氣。克能在此時得繼爲燕侯，當然必定是由召公作出決定的。

西周早期記封建諸侯的還有宜侯矢簠：“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四國圖。王立于宜，入土，大鄉（饗）。王令虞侯矢曰：遷侯于宜。賜鬯一卣，賞瓚一卣，弓一、矰矢百、旅弓十，族矢千。賜土：厥川三百卣，厥田百又二十，厥宅邑三十又五，田百又四十。賜在宜王人田百又七里，賜奠田伯，厥田百又五十夫，賜宜庶人六百又田百六夫。宜侯矢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sup>⑧</sup>該銘記封建宜侯典禮有“王省圖”儀注。無惠鼎：“王格於周廟，田于圖室。”<sup>⑨</sup>說明周廟中有圖室。圖即地圖，長沙馬王堆曾出土西漢地圖，文獻記載古人早有繪製地圖事。《周禮·天官·司書》：



“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周禮·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圖與人民之數。”《周禮·地官·土訓》：“掌道地圖。”這些都說明在周代就有各種地圖和掌管地圖的官員和機構。王封建諸侯之前例需察視擬封之國的地理，故需入圖室省圖，本銘之“武王成王伐商圖”、“四國圖”都是圖室中的專用地圖。而將“入土”與“賜土”分開記載，說明“入土”是納受“裂土”，與銘後部所說的山川田土之賜不同。綜觀全銘是記錄虞侯矢受王命遷侯於宜，宜的土地田宅及率土之貴族庶民一併賜予新封的宜侯。

記錄封建諸侯的還有麥方尊：“王令辟邢侯出坏，侯于邢。於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尤。迨王饗莽京，酺祀，于若翌日。在璧雍，王乘于舟，爲大禮。王射大鼉禽，侯乘于赤旂舟從。死咸之日，王祀，侯內于寢。侯賜玄琫戈。于王在啟，祀月，侯賜者翬臣二百家。儕用王乘車馬、金勒，冂、衣、市、寫……用龔義寧侯，覲考于邢侯……。”<sup>⑨</sup>該銘記錄王命麥的辟君離開坏地，封於邢地，作邢侯。然後記錄邢侯覲見周王，此時正值周王饗祭酺祀於莽京，行“大禮”，有祭祀日月的儀注（“王祀”即祀日，與後銘之“祀月”相對應），新邢侯參與其事並受到賞賜。唐蘭先生指出：“本銘說‘覲考於邢侯’，明‘邢侯出坏’並非第一代邢侯。此說王命‘侯於邢’，是嗣位須受王命。”“第一代邢侯封於康王時，見邢侯簋，此疑第二代當昭王時。”<sup>⑩</sup>

大盂鼎銘記的也是嗣封之事，銘文前段叙誥辭，後段叙嗣封的文句：“王曰：惟命汝孟型乃嗣祖南公。王曰：孟，迺召夾死嗣戎，敏諫罰訟。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于我其適省先王，授民授疆土。賜汝鬯一卣、冂、衣、市、寫、車、馬，賜乃祖南公旂，用狩。賜汝邦嗣四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賜夷嗣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sup>⑪</sup>這裏孟嗣繼的是其祖南公的封地，而不是其父的封地，且銘中有“……自厥土”的文句，似乎賜予的只是南公領地的一部分。銘中的“邦嗣”、“夷嗣”即燕侯克盃中的“有嗣”，這些管事者率其民衆土地統歸新君孟領有。

金文記嗣封的還有伯晨鼎：“惟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桓侯伯晨曰：‘嗣乃祖考侯于桓，賜汝桓鬯一卣、玄袞衣、幽夫、赤寫、駒車、畫靳、韞爻、虎幃、冪袞、里幽、攸勒、旅五旅、彤、彤、旅弓、旅矢、□戈、黼冑。用夙夜事，勿廢朕命。’”<sup>⑫</sup>伯晨的父祖歷代爲桓侯，其父現已去世（故稱祖考），由其子伯晨嗣繼其封地。此器作於西周中期，說明此時諸侯的嗣封仍須得到周王的承認，並舉行過大封典禮。這種嗣封在受到王的禮器、兵器及車馬命服的頒賞之後才算正式確認。

金文中還有兩件器記有大封禮，但內容更爲簡略。沫鬲土疑簋：“王來伐商邑，誕令康侯圖于衛，沫鬲土疑眾圖，作厥考尊彝。”<sup>⑬</sup>文獻記載，原封於康的康侯，二次伐商後被封於衛，稱衛康侯。銘中的圖即鄙，《廣雅·釋詁》：“鄙，國也。”《周禮·天官·大宰》注云：“都之所居曰鄙。”建國都於衛地，自然是封建爲衛侯的意思，文獻與金



文相合。這是金文記封侯命辭的又一種敘述方式。作器者“疑”是沫地嗣徒，沫是衛之都邑，西周封建慣例是賜土需連同當地有嗣及民衆一起賜予新君，故沫嗣土疑在康侯圖於衛時，也一併“眾圖。”

與上述簋銘類似的還有雍伯鼎：“王令雍伯圖於生，爲宮，雍伯作寶尊彝。”<sup>⑩</sup>銘中的“圖於生”與沫嗣土疑簋的“圖於衛”相同，即封建於生地之意。《左傳·莊公九年》“殺子糾於生竇”，杜注“魯地”。指今山東荷澤北部，這可能即是銘中“生”地所在。此銘所記之雍國可能有二：一爲文王子所封國，姬姓，在今河南沁陽一帶；一爲黃帝之後，姁姓，在河南杞縣一帶。估計此雍伯前者可能性大些，不管是哪個，都在今河南境內，由河南遷封到山東，應該是某種政治鬭爭所需要的。

上述諸器除伯晨鼎外，燕侯克壘盃、宜侯矢簋、大孟鼎、麥方尊、沫嗣土疑簋、雍伯鼎皆作於西周早期，大約都在康昭以前，與文獻所記封建諸侯集中在西周早期的情況是一致的。燕侯克壘盃、大孟鼎、麥方尊、伯晨鼎所記是嗣封，即新侯襲承父祖之封。宋程公說云：“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sup>⑪</sup>從銘文看，西周諸侯的襲承確需經周王批准方可。宜侯矢簋、沫嗣土疑簋、雍伯鼎所記是遷封，虞侯矢遷封於宜，康侯遷封於衛，雍伯遷封於生。這反映在西周早期政治是動蕩的，這些封建、嗣封、遷封是周王爲把親族和親信安置到要害地方所作的安排，也是西周王室控制其版圖內大小諸侯國，實現其統治的重要政治手段。進行這樣大的政治活動，其禮儀是十分隆重的。根據上述金文內容，可以擬測“大封禮”的儀注如下：

第一，王入圖室省圖。

第二，於廟堂享祀先祖。

第三，內史冊命。命侯之叙辭有“命某侯於某”、“命某嗣侯於某”、“命某遷侯於某”、“命某圖於某”等。

第四，入（納）土。即頒賜某色裂土。

第五，授民授疆土。即頒賜土地宅里及有嗣民衆等。

第六，頒賜柅鬯、玉瓚、弓矢、戈冑、命服、車馬、旌旗等。

第七，行大饗禮。

以上七項是西周金文中記錄的“大封禮”的重要儀注。典禮過後，受封諸侯要殺牲祖道就國，左祖右社，啓宮宇，立社壇，置裂土，由王室官員測土地，封疆界等。在周代，這些儀注都有專門文字作出規定，一些重大典禮也都有專人加以記載。《周禮·春官·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昭王。”這是說在行祭禮和會同朝覲禮之先，大史要與衆執事按禮書演習，以便在正式行禮時能按禮書規定的儀

注進行。可以想見，“大封禮”也會有專門的記載，只是秦火之後沒有保存下來而已。

賈公彥在註釋《周禮·春官·大宗伯》時曾說：“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先秦文獻中沒有“小封”的記載，但考慮到古代禮制往往有大小相配的設置（如《儀禮》中有“大射”和“鄉射”、“大饗”和“鄉飲酒”等禮，其基本儀注相似，只是級別規模不同），金文和文獻都有大封禮的記載，賈氏所說的“小封禮”也可能是有所本的。西周金文中有記封賜采邑的銘文，如中方鼎：“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兄（貺）鬲土。王曰：中，茲鬲人人使賜于武王作臣，今兄（貺）畀汝，鬲土作乃采。中對王休令，鬲父乙尊。”<sup>⑩</sup>遣尊：“惟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序，賜遣采曰趙，賜貝五朋。遣對王休，用作姑實彝。”<sup>⑪</sup>上兩器都明確提到賜采，《左傳·莊公八年》疏云：“人君賜臣以邑，令取賦稅，謂之采地。”《詩經·鄭風·緇衣》疏云：“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曰：“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公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左傳》、《詩經》、《禮記》諸註家對采邑的說法應該是秦漢以後的制度，據中方鼎所記，鬲土與鬲人是一併賜予中的，土作采，人作臣，並非僅賜田邑取其賦稅而已。這與大封禮中封建諸侯的情況是相同的，只是賜采地較之封建諸侯規模要小。至於西周世官世祿，文獻和金文都有許多材料可以證明，比如周公的子孫世爲周公，食其采，嗣其位，並無不得嗣爲公卿大夫的規定。

從上兩器銘看，采邑之賜，也可以是王對臣下的恩賜，中及遣都是王的近臣，並不是如《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爲制度”，只有大夫所賜者可以稱采。遣尊之采僅只一個邑，中方鼎之采稱“鬲土”，可能是指包括若干邑的一塊領地。金文中明確提到賜采者僅上述兩器，而言及賜土者尚有若干器，賜土當指賞賜包括若干邑的一塊領土，與中方鼎之賜鬲土類似，也應屬小封禮的範疇。

召鬲器：“惟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啓進事，旋走事。皇辟君休王自穀使賞畢土方五十里。”<sup>⑫</sup>《禮記·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所說的這麼整齊劃一的地塊當出自後世儒者的安排，但從召鬲器銘看，“方五十里”確爲西周時代計算土地的一個特定單位。

作冊折尊：“惟五月，王在序，戊子，令作冊折兄（貺）望土于相侯，賜金賜臣……。”<sup>⑬</sup>大保簋：“王伐畎子聖，畎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永大保，賜休余土……。”<sup>⑭</sup>上述五件記有賜采土的銅器，所記賜采土之地點兩在序地，一在寒地，一在穀地，一在伐畎子返途中某地，皆不在京師。說明小封之禮不像大封之禮那樣隆重，必要在京師廟堂中舉行，而是可以隨處舉行。又五件器中有四件記有時間，兩件在十三月，一件在十二月。十三月應是年終置閏，即閏十二月。這好像並非偶然巧

合，可能這種頒賜采土的禮儀多於年終舉行。上述諸器中被賜采土者如大保、中、遣、召、作册折等人都是王朝命官，可見采土之賜主要是王對大臣的封賞。公卿大臣本人對其下屬有采土之封賞者，在西周金文中僅發現一例。亳鼎：“公侯賜亳杞土、冢土，□禾、□禾。”<sup>⑩</sup>這條材料很重要，它說明西周確實存在着不同等級的頒賜土地的制度，起碼這種等級有王及公侯兩級。上述六器皆作於西周早期，說明在西周早期周王朝對土地的管理制度，除有封建諸侯外，還有頒賜采土作為補充。

記錄賜采土諸銘文都十分簡略，極少言及儀注的具體內容。可能其儀注不像封建諸侯那樣隆重，沒有宏大的規模和場面，因而也就沒有必要在銘文中詳加鋪敘了。《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鄭注云：“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周禮·春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鄭注云：“境界侵削，卜以兵征之。”鄭玄的這些解釋說明漢儒對“大封禮”的內容已完全不清楚了，將一個封建諸侯的大禮竟然記成軍禮了。又《周禮·春官》的《大宗伯》《大祝》職文都有“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一句，鄭玄更有“后土”為“黎”、為“句龍之神”等附會之詞，其實從金文內容看，記封建諸禮除需祭祀祖先外並不見對其他神祇的祭祀。

#### 四 相見禮

在西周，王及貴族都十分重視交際的禮儀，其中尊卑上下的等級制度體現了那個時代政治的一個方面。西周金文中，諸侯邦君朝見周王稱“覲”（寫作“堇”）或“見”，如雙鼎：“女雙覲于王。癸日，賞雙貝二朋。”<sup>⑪</sup>子尊“乙卯，子見在大室，伯□□琅九，虫百牢。王賞子黃瓚一，貝百朋……鬯”<sup>⑫</sup>賢簋：“公叔初見于衛。”<sup>⑬</sup>從銘末族名看，子尊中子的身份是殷遺民，他向周王的貢獻應為“祀貢”，所獻用於虫祭的牛羊達百牢之多。史牆盤：“微史烈祖迺來見武王。”<sup>⑭</sup>記述的也是殷遺民覲見周王。麥方尊記一次嗣封典禮，按禮制規定須覲見周王，討得封賞，方能取得繼承權，新邢侯於二月，“侯見于宗周”，即在二月去宗周覲見周王。然後銘內兩次提到“告亡尤”，第一次是向載出神主祝告，第二次是在返國後設奠告祖。《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馬，而後就舍。反必告。”《儀禮·覲禮》記諸侯在覲見君王之前有“侯氏裨冕釋幣於禰”的儀注。注解云：“禰謂行主遷主矣。”銘中還兩次提到祭祀，一次云“王祀”，一次云“祀月”。可能即禮書上所說的祭祀日月儀注。《儀禮·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兩次告亡尤，兩次祭祀都應是覲禮的儀注，《儀禮》與《禮記》所記與西周金文相合。西

周早期金文記諸侯朝見周王又可稱“見事”，如燕侯旨鼎：“燕侯初見事于宗周，王賞旨貝二十朋。”<sup>⑩</sup>某貴族朝見高一級貴族也可稱“見事”。如揚鼎：“己亥，揚見事于彭，車叔賞揚馬。”<sup>⑪</sup>朝見周王又有時稱“見服”。如作冊虢卣：“惟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sup>⑫</sup>這裏公大史除覲見周王外，還會見了諸執政官多正。《孟子·梁惠王》：“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上述銘文中的覲見不稱覲或見，而稱“見事”、“見服”，可能與其述職性質有關。

以上諸器皆作於西周早期，可以考見周初諸侯貴族覲見周王時的部份禮儀規定。西周中晚期金文則多記錄夷族邦君朝見周王的禮儀。如裘衛盃記矩伯以價值百朋的十三田與裘衛交換“赤琥、麇棗兩、棗韜一”和“覲璋”，以備覲見周王之用<sup>⑬</sup>。頌鼎<sup>⑭</sup>與膳夫山鼎<sup>⑮</sup>有“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璋”的記載（圖六）。從西周金文內容看，文獻中覲禮中有關瑞玉和皮幣的授受是有根據的。《周禮·春官·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儀禮·覲禮》的儀注有郊勞、致館、覲見、將幣、賞賜等，每個儀注在進行時都需要授受贄幣。《周禮，秋官·小行人》記贄幣的配合是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繡、璜黼等。裘衛盃中的璋、琥、棗、韜就是玉幣和皮幣，這些在覲禮中是不可或缺的。《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受策以出，出入三覲。”這與頌鼎“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璋”的記載完全相合，說明這些儀注直至東周仍在實行。

九年衛鼎記九年正月“眉敖諸臚爲使見于王”<sup>⑯</sup>，結合裘衛盃銘可知矩伯是邦君眉敖的“諸臚”之一，被遣爲使覲見周王，此時眉敖並未徹底臣服於周王，因此同年九月又有益公征伐眉敖的記載。卣伯簋：“惟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賁。”<sup>⑰</sup>《孟子·告子》：“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這是孟子理想中王應有的權威，也是西周王室強有力時的實際情況。這次眉敖的覲見，是武力征服的結果。眉敖臣服之後，成爲戎狄邦君的帶頭人，致使大量青銅流入周王室。眉敖簋蓋：“戎獻金于子牙父百車。”<sup>⑱</sup>像這種以武力征伐爲背景的覲見，史牆盤稱“虢見”，“方蠻亡不虢見”<sup>⑲</sup>。西周晚期類似記載如趯鐘：“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艮孳迺遣間來逆邵王，南夷東夷俱見二十有六邦。”<sup>⑳</sup>駒父盃蓋：“南仲邦父命駒父段南諸侯，率高父見南淮夷，厥取厥服。覲，夷欲墜，不敢不恭畏王命，逆見我，厥獻厥服。我乃至於淮，小大邦亡敢不口，俱逆王命。”<sup>㉑</sup>

綜上所述，在西周早期，隆重的王室大覲禮有祭奠日月的儀注，各種覲見禮後都有優厚的賞賜。西周中期以後，覲見禮儀注趨於複雜，覲見時必須呈獻贄幣，贄幣主要是瑞玉及獸皮。王之賞賜則男賜車馬命服，女賜絲帛。西周中晚期周王室與四周邦國連年征戰不息，金文中所記多爲被征服邦國的“虢見”，這種溫文爾雅的覲見禮實際上成了“臣服禮”，儀注背後掩藏着血腥的暴力。

在西周金文中，王或其使者巡視各地稱“省”。如中觶：“王大省公族於庚，振旅，王賜中馬。”<sup>②</sup>中方鼎：“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玁王应。”<sup>③</sup>中甗：“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玁应，在曾。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汝使小大邦，厥又舍汝芻糧，至於汝麋小多□。中省自方，復造□邦，在鄂自次。”<sup>④</sup>三件中器所記皆為昭王南巡之事，記這一內容的銘刻資料尚有太保玉戈銘：“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大保省南國。”<sup>⑤</sup>小臣彳鼎：“令小臣彳先省楚应……小臣彳賜鼎、馬兩。”<sup>⑥</sup>昭王在南巡之前作了許多準備，派遣重臣反復視察了南方邦國，上述幾件器銘記錄的就是這種過程。記錄視察東方的有臣卿鼎：“公違省自東，在新邑，臣卿賜金。”<sup>⑦</sup>唐蘭先生認為銘中的“公違”即《逸周書》中的“百韋”。

以上諸器皆作於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後，“省”或寫作“徂”、“徂”、“徂”等。如妊小簋：“伯莒父使鬲徂尹人於齊自，妊小從。鬲有類貝，用作妊小寶簋。”<sup>⑧</sup>殷鼎：“師雍父徂導至於馱，殷從，其父蔑殷歷，賜金。”<sup>⑨</sup>史頌鼎：“王在宗周，令史頌徂蘇，濶友里君百姓帥堦整于成周，休有成事，蘇賓璋、馬四匹，吉金。”<sup>⑩</sup>省字從目生聲，《說文》：“省，視也”。宜侯矢簋：“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四國圖。”用的也是“視”意。《周禮·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成法則。”鄭注云：“存、類、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七歲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像這種一、三、五、七、九、十一年巡視之事，是《周禮》作者理想中君王視察邦國諸侯的制度，並非古代實際實行的制度。至於鄭玄註解中所發揮的召其象胥瞽史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者，則更是無根之談。但是他們所說的王或其使臣巡視邦國諸侯稱“省”則合於西周金文。從金文內容看，西周王室經常派使者去視察諸侯邦國，這是周王推行其統治的手段之一。其使命則一為例行巡視，一為征伐前的偵察。前者較注重禮儀，被巡視者對使者往往有所賄贈。

周王或其后妃派出使者與邦國諸侯聯絡（或貴族間派出使者聯絡），金文稱“使”，被使者例需對使者有所賄贈，賄贈稱“賓”。小臣守簋：“王史小臣守使于夷，夷賓馬兩，金十鈞。”<sup>⑪</sup>芮簋：“王命芮眾叔歸父歸吳姬饌器，師黃賓芮璋一、馬兩。吳姬賓帛束。”<sup>⑫</sup>繁簋：“公令繁伐于鬲伯，鬲伯蔑繁歷，賓繁紕廿、貝十朋。”<sup>⑬</sup>史幾簋：“仲幾父史幾使于諸侯諸監，用厥賓作丁寶簋。”<sup>⑭</sup>上述諸器中被使者皆為邦國諸侯及其監國，派出使臣者在繁簋為地位很高的“公”，其餘皆為周王，很顯然派出使臣者地位高於被使者。在這種情況下，被使者需用較隆重的賓禮接待使者，對使者給予豐厚的賄贈，賄贈稱“賓”。若反之，被使者地位高於派出使臣者，賄贈稱“賞”或“賜”，而不能稱“賓”。如堇鼎：“燕侯令堇饌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賞堇貝。”<sup>⑮</sup>叔簋：“惟王棗于宗



周，王姜史叔使于大保，賞叔鬱鬯、白金、芻牛。”<sup>⑭</sup>小臣宅簋：“同公在豐，令宅使伯懋父，伯賜小臣宅畫干戈九錫，金車、馬兩。”<sup>⑮</sup>遇甗：“師雍父戌在古自，遇從，師雍父肩史遇使于猷侯，猷侯蔑遇歷，賜遇金。”<sup>⑯</sup>這裏大保、伯懋父、猷侯地位高於燕侯、王姜、師雍父，故賄贈稱賞或賜，而不稱賓。

“賓”有時用爲名詞，指所賓之幣。上面提到的史幾簋“用厥賓作丁寶簋”的賓，就是用爲名詞。這種賓物又可以轉賜於人，如保卣：“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誕兄六品，蔑歷於保，賜賓，用作文父癸宗寶尊彝。”<sup>⑰</sup>

有時賄贈女性或由女性施賄贈，不稱賞賜也不稱賓，而稱“類”，即“沐”。如遯盂：“君在雍即宮，命遯使于述土隤謨，格后寮女寮奚迭華，天君史遯使類。”<sup>⑱</sup>此字用法與妊小簋“甗有類貝”之類字用法相似。

王命使者去撫慰邦國諸侯，金文稱“安”或“寧”，被撫慰者亦例需對使者有所賓贈。如孟爵：“王令孟寧鄧伯，賓貝。”<sup>⑲</sup>作冊景卣：“王姜令作冊景安夷伯，夷伯賓景貝布”<sup>⑳</sup>，公賈鼎：“叔氏使賁安旻伯，賓賁馬轡乘。”<sup>㉑</sup>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禮禮賓之”，鄭衆注曰：“賓，敬也。”賓又寫作儐，《儀禮·覲禮》：“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儐大史亦如之”。《禮記·禮運》：“所以儐鬼神也。”《釋文》曰：“敬也，儐與賓通。”用於賓之物品，西周早期以貝爲主，中期以金爲主，兼及車馬、玉器、皮帛。皮馬玉帛是文獻中贄幣的主要物品。《儀禮·聘禮》記“命使”之後有“夕幣”，入境之後有“展幣”、“授幣”。使者將返國，被使者例有“覲幣”、“面幣”等儀注，而這些儀注中的贄幣都是皮馬玉帛之類。這說明文獻所記贄幣與西周中期金文所記部分賓物內容相合，但西周早期用貝，中期多用金的情況在文獻中卻沒有反映。

西周早期，周王凡有重大政令頒佈或有重要任命宣佈，往往由宗周派遣特使去成周發佈，金文稱“殷於成周”。作冊鬲卣：“惟明保殷成周年，公賜作冊鬲鬯貝。”<sup>㉒</sup>本銘“明保殷成周”與矢令方彝“明公朝至於成周”是一件事。方彝銘記周公子明保受王命任卿事寮長官，管理三事（嗣土、嗣馬、嗣工）和四方（侯、甸、男等四方諸侯），他於八月在宗周受命，十月至成周“舍命”，並會見寮屬及四方諸侯。其後分別在京宮、康宮及王城殺牲舉行祭禮<sup>㉓</sup>。小臣傳簋：“王在葦京，令師田父殷成周年，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sup>㉔</sup>，臣辰盃：“惟王大禴於宗周誕饗葦京年……令士上眾史寅殷於成周，替百姓豚眾賞卣鬯、貝。”<sup>㉕</sup>豐尊：“王在成周，令豐殷大矩，大矩賜豐金、貝。”<sup>㉖</sup>《周禮·春官·大宗伯》“殷見曰同”，《周禮·秋官·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周禮·夏官·職方氏》“王殷國亦如之”。郭沫若先生認爲金文中的“殷”禮與《周禮》中的“殷同”、“殷類”等相同，各家多從其說。但《周禮》所說的“殷同”、“殷國”等是指周王對諸侯的巡視，這在西周金文中稱“省”，不稱



“殷”。而且從金文看，殷禮乃王之使臣所爲，他們“殷於成周”是代宣王命。豐尊記王在成周，却不去親見大矩，而命豐去殷見，可見此禮並不如《周禮》所述，必爲王所施之禮。另外，鄭玄注多次說：“殷猶衆也。”即指會見衆多諸侯貴族。從豐尊所記情形看，王使者會見一名大矩亦可稱殷，可見《周禮》及鄭玄所知皆非古禮、古訓，祇是借用古禮之名而已。從西周金文所記內容觀察，殷禮都是較隆重的會見禮，殷者大也，蓋取其盛大之意。在西周時，王室的主要政治活動仍以豐京、鎬京和葦京等周原老家一帶地點爲核心來進行，祇是遇有重大政令、任命和重要會見需向全國頒佈時，纔派特使去“天下之中”的成周發佈。金文所記殷禮皆行於成周，無一例外，正說明了這一點。這一制度可能一直沿用到西周末年，如宣王時的克鐘：“王在周康刺宮，王呼士召克，王親令克適涇東至於京師……專奠王命。”<sup>⑧</sup>祇是這時金文已不使用“殷於成周”一類詞語了。平王東遷以後，政治中心移至成周，當然也就不存在“殷於成周”的禮儀了。

在西周，貴族間辦理各種交涉，亦需以禮相見，並互相有所賄贈。大簋蓋：“王呼吳師召大，賜趨嬰里，王令膳夫豕曰趨嬰曰：余既賜大乃里。嬰賓豕璋，帛束。嬰令豕曰天子：余弗敢吝。豕以嬰導大賜里，大賓豕鬯璋、馬兩，賓嬰鬯璋帛束。”<sup>⑨</sup>此銘記王將本屬趨嬰的邑里轉賜給大，膳夫豕傳達王命，他分別得到嬰和大兩人的賓贈，大對嬰也有賓贈。傳世的兩件召伯虎簋也有類似記載。五年召伯虎簋：“珣生有事，召來合事，余獻婦氏以壺，告曰：以君氏令曰：余老止公僕庸土田多諫，弋（亦）伯氏縱許，公庥其參，汝則宕其貳；公庥其貳，汝則庥其一。余惠於君氏大璋，報婦氏帛束、璜。召伯虎曰：余既訊戾我考我母令，余弗敢亂，余或至我考我母令。珣生則覲圭。”<sup>⑩</sup>（圖七）六年召伯虎簋：“王在葦，召伯虎曰：余告慶。曰：公厥稟貝，用獄諫，爲伯有祇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余告慶。余以邑訊有嗣，余典勿敢封，今余既一名典獻伯氏，伯氏則報璧珣生。”<sup>⑪</sup>兩器銘中人物關係較複雜，其內容大意是王后調解珣生與召伯虎之間的僕庸土田糾紛。在宣王五年珣生有訟事，召伯虎來對質其事。珣生獻婦氏（王后的女官）以壺，婦氏宣告王后判辭：我的家宰止公（即珣生）僕庸土田多有爭訟，這也是伯氏（召伯虎）縱容准許的結果。現判決如下：公（止公珣生）拓取其參，則你拓取其貳；公拓取其貳，則你拓取其一。珣生賄於君氏（王后）大璋，報答婦氏帛、璜。召伯虎說：我死去的父母對此有成命，我不敢變亂，我要求達到父母的願望。珣生向召伯虎獻覲圭。六年召伯虎簋記珣生又將有爭議的邑里全部典獻召伯虎，使他認爲實現了父母的遺願，獄訟取得勝利，多次告慶，並以禮向珣生報以玉璧，表示事件已圓滿解決。“凡大約劑書於宗彝”<sup>⑫</sup>，珣生即將該訴訟的經過鑄於這對簋上。兩銘中的關鍵人物是“余老止公”。《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儀禮·聘禮》“授老幣”，注曰：“賓之臣。”疏曰：“大夫家臣稱老。”蓋古代凡家臣

皆可稱“老”。琯生在師斃簋中又稱“宰琯生”<sup>⑩</sup>，其身份應是王室家臣，被尊為“止公”也是有可能的，銘中以王后的口吻稱琯生為“余老止公”是可能的。至於有的先生以為金文中的“余”字只能作為人稱代詞，而不能作為物主代詞則是一種誤解，越王鐘“順余子孫”<sup>⑪</sup>、即簋鐘“作為余鐘”<sup>⑫</sup>、徐王義楚崗“擇余吉金”<sup>⑬</sup>等諸器中“余”字皆作為物主代詞使用。

九年衛鼎記矩伯與裘衛交換林里車馬的事：裘衛給矩伯一套省車及精美的車具，給其妻矩姜帛二兩，矩伯則給裘衛林胥里。該里中的顏林是顏陳的，故裘衛又給顏陳一對大馬，給其妻顏姁虞鬯，給顏的下屬壽商貉裘、盂匱。矩乃與隤葬命令壽商和音講定，交付裘衛林胥里。於是確定四周界封，由衛小子樹封，壽商闕。裘衛又給盂冒，給叔氏羊皮二、從皮二、鑿焉甬皮二，給肫白金一飯，吳喜皮二。給隤一些車具，給東臣羔裘，給顏下皮二。由衛小子寬和衛臣馮、肫辦理授受<sup>⑭</sup>。

上述幾件器皆作於西周中晚期，其時在貴族間辦理各種交涉，贄幣已成為不可或離的交際手段。通觀西周金文，在西周早期，王及貴族間交際的禮儀尚比較簡樸。入中期後，禮儀逐漸繁複起來，交際中講究賄贈贄幣，其種類又視身份和性別有所不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秋官·大行人》：“凡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把這些交際詞語作機械分配的作法顯然是後世禮書編者主觀安排的，但有些詞語如覲、殷等在交際中的運用是有根據的，在西周金文中這些詞語已在使用。另外一些詞語如朝、問、聘等在西周金文中雖沒有出現，但在戰國金文中卻有記載。陳侯因脊敦：“其惟因脊揚皇考，昭申高祖黃帝，弭嗣桓文，朝問諸侯。”<sup>⑮</sup>商鞅量：“齊遣卿大夫衆來聘。”<sup>⑯</sup>兩器中朝、問、聘諸詞的用意與文獻完全一致，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些禮書應成書於戰國時代，是用戰國時的語言加以整理的。

## 五 饗燕禮

西周金文記大饗禮者已見到的有十一件器，現分列於下：

天亡簋：“乙亥，王有大禮，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於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丁丑，王鄉，大宜。王降，亡得爵復囊，惟朕有慶，敏揚王休於尊簋。”<sup>⑰</sup>征人鼎：“丙午，天君鄉饗酒，在斤。天君賞厥征人斤貝，用作父丁尊彝。奄。”<sup>⑱</sup>宜侯矢簋：“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四國圖。王立於宜，入土，大鄉。王令虞侯矢曰：遷侯於宜。賜口鬯一卣，賞瓚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族矢千。賜土……，賜在宜王人……宜侯矢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sup>⑲</sup>效卣：

“惟四月初吉甲午，王觀於嘗，公東宮納鄉於王。王賜公貝五十朋，公賜厥涉子效王休貝二十朋。效對公休，用作寶尊彝……。”<sup>⑩</sup>穆公簋蓋：“惟王初如□，迺自商白復還至于周，王夕鄉醴于大室，穆公侑尸，王呼宰利賜穆公貝二十朋，穆公對王休，用作寶皇簋。”<sup>⑪</sup>適簋：“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葦京，呼漁於大池。王鄉酒，適御，亡遣。穆王親賜適饌。適拜首，稽首，敢對揚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sup>⑫</sup>，長由盃：“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泮，穆王鄉豐。即邢伯大祝射。穆王蔑長由，以來即邢伯氏，邢伯氏彌不姦。長由蔑歷，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肇作尊彝。”<sup>⑬</sup>大鼎：“惟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王在盪振宮，大以厥友守。王鄉醴。王呼膳夫馭召大，以厥友入捍。王召走馬雁，令取誰駟三十二匹賜大。大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烈考己伯孟鼎。”<sup>⑭</sup>師遽方彝：“惟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寢，鄉醴。師遽蔑歷，侑。王呼宰利賜師遽珎圭一、環璋四。師遽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祖它公寶尊彝。”<sup>⑮</sup>三年癸壺：“惟三年九月丁巳，王在鄭，鄉醴。呼號叔召癸，賜羔俎，己丑，王在句陵，鄉逆酒，呼師壽召癸，賜彘俎。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皇祖文考尊壺。”<sup>⑯</sup>號季子白盤：“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號季子白作寶盤。丕顯子白，將武於戎功，經維四方。搏伐玁狁，於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趯趯子白，獻馘於王，王孔加子白義，王格周廟宣尉，爰鄉，王曰：白父孔覲有光。用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sup>⑰</sup>

上述十一器中，天亡簋、征人鼎、宜侯矢簋屬西周早期，效卣、穆公簋蓋、適簋、長由盃、大鼎、師遽方彝、三年癸壺屬西周中期，號季子白盤屬西周晚期。諸器中“饗”字皆寫作“鄉”，記饗禮分別用“饗”、“饗酒”、“饗醴”、“大饗”等詞語。西周早期三器稱“饗”、“大饗”、“饗禴酒”，不見稱“饗醴”者，說明在西周早期的饗禮中尚未有醴酒之設。周初禮制多沿用殷禮，殷人尚酒，饗必飲酒。如尹光鼎：“乙亥，王惟在巢次，王饗酒。尹光邇，惟格，賞貝，用作父丁彝，惟王征邢方。”<sup>⑱</sup>宰甫卣：“王來狩自豆麓，在雞次，王饗酒。王光宰甫貝五朋，用作寶彝。”<sup>⑲</sup>上兩器作於殷代末年，銘文反映出殷代饗禮必用酒的情況。西周早期金文中也有饗禮用酒的記載（如征人鼎），說明周初饗禮還沿襲殷人的儀注。入西周中期後，周人形成有別於殷人的饗禮，其主要特徵是“用醴”。穆公簋蓋、師遽方彝、長由盃、大鼎、三年癸壺都用“饗醴”來記饗禮，說明這時饗用醴已是通常情況，而適簋的饗仍用酒則是少數情況下的特殊作法。《說文》：“醴，酒一宿孰也。”這是說醴酒是用較原始的簡單的辦法釀造的，一夜之間可就，因此所含酒精極少，故又名“清酒”。饗用醴，據云是“以示追懷遠古之義”。實際上也可能是周人汲取殷人酗酒喪國的教訓，特意規定的。在饗禮進行時，對如此清淡的酒也是淺嘗輒止，並不大量飲用。《禮記·聘義》：“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左傳·

成公十二年》杜注曰：“饗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這些講的都是這個意思。周人這種重威儀，輕飲食，以“用醴”為特徵的大饗之禮，大約形成於穆王時，此前則尚沿用殷禮。《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杜注云：“始則先行饗禮，先置醴酒。”杜預去古未遠，知道以饗醴之醴為醴酒，這本來是很通順的註解，而凌廷堪《禮經釋例》卻說“饗為饗禮，醴為醴賓馬者”。許維遹先生的《饗禮考》對凌氏之說又加以引伸，就把問題弄得更複雜了。其實杜注是對的，《左傳》有多次用“饗醴”來記饗禮，這正與西周金文相合，因為此時饗禮的特點就是“用醴”，故又可以稱為“饗醴”。凌氏、許氏的所謂“醴賓馬者”是混同醴、禮，且將醴字用為動詞了。王國維先生的《釋禮》<sup>⑧</sup>也誤將醴、禮混同，他說：“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幽，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王氏這三個推論，前兩個是對的，第三個推論則不能成立。而楊寬先生卻將王氏的第三個推論又加以引伸，作出禮起源於醴的結論<sup>⑨</sup>。兩位先生實際是倒本為末了，查金文西周早期之“豐”即後世的“禮”字，蓋取“以玉盛器中而奉於神人”之意。天亡簋、麥方尊中的“大豐”就是“大禮”，過去釋為“大豐”是不對的，它與醴酒無干。在西周金文中是先有禮儀之禮，寫作“豐”，後有醴酒之醴。那種用原始簡單方法釀出的“清酒”被稱為醴，並用於祭饗是穆王及穆王以後的事。穆王晚期的長由盃中“饗豐”之豐，應是“醴”之省，其字形雖與西周早期天亡簋、麥方尊中的“大豐”之“豐”相同，但時代不同，其含義是有區別的。

《周禮·春官·大司樂》：“大饗如祭祀。”《周禮·春官》中的《大師》、《小師》、《韎師》職文皆有“大饗亦如之”句，《禮記·郊特牲》有“大饗腥”、“大饗尚殷脩而已矣”。這些文獻中明確提到“大饗”，宜侯矢簋也提到“大饗”，是知古代確有“大饗禮”存在過，而《儀禮》中卻僅有“鄉飲酒禮”的記載，沒有“大饗禮”的記載，顯然是“大饗禮”亡佚而沒有保存下來。“大饗”是王室大禮，在西周金文中沒有見到王室以外貴族使用此禮的，該禮一般由王或后主持，上述十一篇金文中，征人鼎由王后主持，其餘十件器銘皆記由周王主持此禮。《儀禮》中的《鄉飲酒禮》與亡佚的《大饗禮》應看作兩種等級不同的饗禮（與《儀禮》中的《大射》、《鄉射》類似），可能它們有許多儀注是相似的，但規模和行禮人的等級是不同的。楊寬先生已注意到這一點，但他却誤把西周金文中的“鄉酒”歸入“鄉飲酒禮”<sup>⑩</sup>。征人鼎、遼簋、三年癸壺上都有“鄉酒”，但這些都是王及后主持的大饗禮，與《儀禮》中的士大夫所行的《鄉飲酒禮》雖只有一字之差，卻絕不能相提並論。

許維遹先生在其所作《饗禮考》中舉六事證成饗近於祭：齋戒、尊彝、腥俎、裸事、立而成禮、用樂。許氏所舉皆據之文獻，但卻多與西周金文相合。上述十一篇金文所記大饗禮有七件明確提到行於宗廟，祭禮（特別是祭祖禮）亦多數行於宗廟，既然



二者都行於宗廟，像齋戒、設尊彝、立而成禮、用樂相同就是很自然的了。穆公簋蓋：“王夕饗醴於大室，穆公侑尸。”這是金文記饗禮有“設尸”的儀注。“設尸”是周人祭祖禮的特殊安排，一般由孫輩後人穿上被祭先祖的遺服，充當神像，一切祭奠儀式都圍繞他來進行，祝者所作祝辭與嘏辭都以他為中介，穆公簋蓋記穆公因“侑尸”有功而受到王的賞賜，說明饗與祭確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文獻中的記載當是有根據的。三年癸丑王在鄭地饗後賜癸“羔俎”，在句陵饗後賜癸“彘俎”羔、彘兩俎皆為半解的體薦，行禮中並不食用，故可在饗後賜予癸。這與祭禮用“房俎”，祭後賜胙的儀注是相同的，故知文獻所云“饗用腥俎”、“大饗腥”的記載是可信的。

據西周金文所記，大饗禮行於以下場合：大祭之後（天亡簋）；出征凱旋（征人鼎、虢季子白盤）；封建諸侯（宜侯矢簋）；巡視地方（效卣）；大射禮前後（適簋）、（長由盃）；賞賜臣工（師遽方彝、三年癸丑）；答謝宿衛（大鼎）。祭祀征伐，封建巡狩，大射大賞等皆為國家的大事大典，是知大饗禮是為講大事、昭大德而設。《禮記·王制》孔穎達疏引皇侃說饗有四種：諸侯來朝；王親戚諸侯來聘；戎狄之君使來；饗宿衛及耆老孤子。秦蕙田《五禮通考》之《饗燕禮》云饗禮有三：天子饗元侯；兩君相見；凡饗賓客。總之，經學家們都認為饗禮是待賓之禮。這與西周金文不合，在西周金文中多有記載諸侯及戎狄君使朝宗覲聘者，卻從不見王以饗禮待之。如虢季子白盤記虢覲見於周王<sup>⑧</sup>、虢季子白盤記“虢來遘于妊氏”<sup>⑨</sup>、臣辰盃記“王令士上眾史寅殷于成周”，覲、遘、殷等都是王及諸侯間交接相見之事，但這些篇金文中並未見用饗的記載，蓋西周時一般待客賓不用大饗禮。皇侃說：“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許維遹先生批評“此非饗禮”，認為是“鄉飲酒禮”。記饗禮的大鼎云：“大以厥友守”，“以厥友入捍”，知王所饗之大，乃宿衛之長，故皇侃所說的“饗宿衛”是合於金文的。至於對“耆老孤子”之饗，且“以醉為度”，則可能是“鄉飲酒禮”的儀注。許氏的批評，因未以金文資料為基準，亦失之籠統。

以上所作是對大饗禮的分析，西周金文對古“燕禮”也有部分記載，因該禮的主要特徵是“用酒”，故金文主要用“飲”和“酒”兩字來記此禮。匱方鼎“飲秦飲”<sup>⑩</sup>、小孟鼎“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三周入服酒……三事大夫人服酒……”<sup>⑪</sup>、高卣蓋“王飲西宮”等，這幾件器皆作於西周早期，在這一時期不見用“宴”或“匱”來記燕禮，有些器用“言”字來記燕禮。伯矩鼎：“伯矩作寶彝，用言王出內事人。”<sup>⑫</sup> 卣：“言作旅彝，孫子用言出入。”<sup>⑬</sup> 蓋西周早期燕禮乃因外交活動欲有所言而設，故以“言”記此禮。在金文中是先有“言”記燕禮，後有宴、匱（燕）記燕禮。“宴”用為記燕禮在西周晚期纔出現。“匱”在西周專用於記地名、國名，至春秋時代纔開始用來記燕禮。言，古音元部疑母；宴、匱，元部影母。以音近假借來記“言禮”，“燕禮”本應作“言禮”。

在西周金文中，對“王出入事人”有時也用饗禮（並非“大饗禮”），作冊矢令簋：“用饗王逆復，用毖寮人。”<sup>⑧</sup>伯寇父鼎：“用饗王逆復事人。”<sup>⑨</sup>攸卣蓋：“汝其用饗乃辟軹侯逆復出內事人。”<sup>⑩</sup>很顯然這是諸侯用較“大饗”低一級的“饗禮”來招待王的使者，這與王室舉行的大饗禮是不同的，而與“言（燕）禮”接近。

西周晚期出現用“宴”字記燕禮者，鄂侯御方鼎：“王南征，伐角雋。惟還自征，在坏。鄂侯御方納壺於王，乃裸之。御方侑王。王休宴，乃射。御方卿王射，御方休闌，王揚，咸飲。王親賜御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sup>⑪</sup>（圖八）銘中“納壺於王，乃裸之，御方侑王”是燕禮的三個重要儀注。春秋以後，諸侯間的外交活動頻繁，燕禮轉多，一些樂器銘文或用“宴”，或用“匱”，而不再用“言”字來記燕禮了。邾公華鐘：“以宴士庶子。”<sup>⑫</sup>邾公輕鐘：“以宴大夫，以喜諸士。”<sup>⑬</sup>徐王子卣鐘：“以宴以喜。”<sup>⑭</sup>王子嬰次鐘：“王子嬰次自作游鐘，永用宴喜。”<sup>⑮</sup>王孫遺者鐘：“闌闌和鐘，用匱以喜，用樂嘉賓父兄及我朋友。”<sup>⑯</sup>沈兒鐻：“吾以匱以喜。”<sup>⑰</sup>配兒句鐻：“以匱賓客。”<sup>⑱</sup>子璋鐘：“用匱以喜，用樂父兄諸士。”<sup>⑲</sup>許子鐻：“用匱以喜。”<sup>⑳</sup>欒氏壺：“吾以匱飲。”<sup>㉑</sup>等等。以上各器作於春秋至戰國早期，可以看出記燕禮詞語由“言”至“宴”、“匱”演變的軌跡。

綜上所述，大饗、大燕之禮的儀注相同之點有三：1. 設侑。穆公簋蓋：“王夕饗醴于大室，穆公侑尸。”師遽方彝：“王在周康寢饗醴，師遽蔑歷，侑。”適簋：“王饗酒，適御。”這裏“御”就是“侑”。王行饗禮必設侑者，王為穆公、師遽、適行饗禮，就命他們本人作侑者，這是件極榮寵的事，故銘之於彝器，子孫永誌不忘。這與記燕禮的鄂侯御方鼎有“御方侑王”是相同的。《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宥”即“侑”。說明大饗、大燕設侑之制一直延續至後代。

2. 獻、裸。伯公父勺：“伯公父作金爵，用獻用酌。”<sup>㉒</sup>膳夫山鼎：“王曰：山，命汝官鬲飲獻人。”<sup>㉓</sup>膳夫克盃：“惟用獻於師尹、朋友、婚媾。”<sup>㉔</sup>《周禮·天官·膳夫》：“王燕飲則為獻主。”《周禮》所記膳夫之職與膳夫山鼎、膳夫克盃所記相合。《尚書·洛誥》“王入太室裸”，疏云：“《周禮》小宰之職：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注曰：“裸為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國語·周語》：“及期，鬱人薦鬯，王裸鬯，饗禮乃行。”裸就是以酒灌地的儀式，祭饗皆有裸的儀注，禮有明文。《論語·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裸）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但燕禮用裸，則不見文獻記載。鄂侯御方鼎：“鄂侯御方納壺於王，乃裸之。”御方所獻納之壺當為盛鬱鬯之壺。孟戡父壺：“孟戡父作鬱壺。”<sup>㉕</sup>說明古有專盛鬱鬯之壺，王受此壺後，以壺中鬱鬯灌地，行裸儀。在西周，王參加的大燕禮中有儀式化的“裸”，既裸之後纔有盡歡樂的飲宴。《儀禮·燕禮》不記裸儀，說明它所記燕禮屬春秋間士大夫級的禮儀，與西周王室大燕之禮是不同的。鄂侯御方鼎卻保存了古大燕禮這一重要儀注。



3. 酬幣。祭饗之後有酬幣之儀注，金文多有記載。師遽方彝記師遽在饗後得到“珣圭一、環璋四”，征人鼎、效卣、穆公簋蓋記在饗後得到貝數十朋，大鼎記饗後得到三十二匹馬。記祭禮諸器銘也多記祭後的賞賜，此不贅述。大燕之後的酬幣儀注在鄂侯御方鼎中也有記載，周王在燕後賜御方“玉五穀、馬四匹”。《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王引之《經義述聞》指出“當作三（四）匹”。師遽方彝之“珣圭四、環璋一”也應屬“玉五穀”之數，古饗燕之酬幣本有定數，在此可見一斑。

上述是就饗燕相同之處而言，就其不同而言也有多處。秦蕙田《五禮通考》一五六卷云：“饗禮烹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禮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履昇堂，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許維遜先生《饗禮考》舉九事以別饗燕：饗廟燕寢、先饗後燕、饗晝燕夜、饗立燕坐、饗履燕不履、婦饗不燕、饗不食燕食、饗不射燕射、饗不必賦詩，燕必賦詩。許氏所言九事，皆據之文獻，其中饗立、不脫履、不飲食、不必賦詩；燕坐、脫履、飲食、必賦詩等皆與西周金文相合。如三年癸壺記王在饗後賜羔俎、彘俎，此饗不飲食也。金文稱燕爲言，詩以言志，此燕必賦詩也。但秦、許之說亦有與西周金文不合者。如小孟鼎、豐方鼎之燕皆行於周廟，高卣蓋之“西宮”，既用於燕飲，又用於烝祀，也可能是宗廟建築，故知大燕之禮也往往在宗廟中舉行，所謂“燕必在寢”並不合古禮。再有長由盃記饗後有大射之儀，適簋也記饗前有“矢魚”之儀注，所謂“燕射饗不射”也不合古禮。還有穆公簋蓋有“王夕饗醴於大室”之句，說明饗不必在晝，亦可行於夜間。

總而言之，王室大饗大燕之禮有許多相同的儀注，但饗重威儀，用醴，酒食殽饌備而不用是其特徵；燕重言，賦詩言志，飲酒食饌，盡歡而散爲其特徵。二者目的不同，其儀注也是有區別的。

## 六 射禮

已知的西周金文記射禮的有以下幾件：

麥方尊：“在辟雍，王乘於舟，爲大禮，王射大𪔐禽，侯乘於赤旂舟從。”“大𪔐禽”有的學者以爲就是大雁。《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這裏記周天子在辟雍大池中射“大𪔐禽”與《禮記》所記內容相近。井鼎、適簋有“呼漁”的記載，實際就是文獻中所說的“矢魚”，<sup>⑤</sup>也應是射禮的內容。

令鼎：“王大藉農於淇田，錫。王射，有嗣眾師氏小子卿射。王歸自淇田。王御謙仲僕，令眾奮先馬走。王曰：令眾奮乃克至，余其舍汝臣三十家，王至於謙宮。”<sup>⑥</sup>

(圖九) 這件器記錄了一次由王親自參加的射禮，參加者還有“有嗣”和“師氏小子”。“有嗣”泛指一般有所嗣管的官員。“師氏小子”指一種專職武官。師望鼎有“太師小子師望”<sup>29</sup>、伯公父簠有“伯太師小子伯公父”<sup>30</sup>、仲太師盨有“仲太師小子休”<sup>31</sup>，銘中的“師氏小子”可能即指這類太師屬官，令及奮二人的身份也應是“師氏小子”。在射禮中，二人因“先馬走”和“乃克至”而受到賞賜。《禮記·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注：“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也。”鼎銘之“馬走”即“立馬”，亦即一馬二馬三馬相從而立的過程。“先馬走”就是“先立馬”。“乃克至”是周王對二人射技的讚揚。“至”有“極”、“盡”義，如猷鐘：“王敦伐其至，撲伐其都。”銘中的“至”與“都”相對，“都”爲中心，“至”爲邊陲，所用也是“盡頭”、“邊極”之義。所以這句話是周王誇讚二人射技能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的意思。金文敘事前後次序每不固定，這段講射禮的話，夾在“王歸自諶田”和“王至於濂宮”之間。

靜簠：“惟六月初吉，王在莽京，丁卯，王令靜嗣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孚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剛卿、幽蓋師、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戾，王賜靜鞶剡。”<sup>32</sup>（圖十）此銘說了兩件事：第一，在六月初吉丁卯日，王命靜作學宮嗣射，負責教導小子、服、小臣、夷僕學射。第二，在八月初吉庚寅日，王、吳來、呂剛與幽師、蓋師、周邦合射於莽京大池。第一件事說明在小臣靜的時代（穆王）射禮的儀注已相當複雜，因此要在學宮中設專門教官來教射。第二事記述了一次射禮，周王、吳來、呂剛與幽師、蓋師、周邦合射，三人對三人。金文中的“卿射”就是文獻中的“耦射”。有的文獻云“天子射比六耦”。從靜簠銘看，天子也可以比三耦而射。《禮記·射義》稱水射爲“習射於澤”。靜簠在莽京大池之射，十分正規，似乎不像演練技藝而設的“習射”。銘中的吳來、呂剛可能即同時代（穆王）的班簠中的吳伯、呂伯，二人是王命中的邦冢君，王命他們率族人隨毛公去征東夷<sup>33</sup>。趙簠“命汝作幽師冢嗣馬”，<sup>34</sup>師旂鼎“在莽”，<sup>35</sup>“邦周”即“周邦”，幽師、蓋師、周邦是三個地名，在簠銘中代指三地君長。金文中每以地名代人名，如同師簠有“同師作旅簠”句<sup>36</sup>，許子縛有“許子將師擇厥吉金”句<sup>37</sup>。金文有小臣靜卣<sup>38</sup>，可證靜的身份是“小臣”，在平時任學宮教官，舉行射禮時任司射。《儀禮》的《鄉射禮》和《大射儀》都記“司射”是整個射禮的主持人，在進行射禮時，他腰中插一根教鞭，對其下屬不按規定儀注行事者行“撲刑”。在射禮中還要擔當誘射，即作射的示範動作。

長由盃：“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應，穆王饗豐，即邢伯、大祝射。穆王蔑長由，以逖即邢伯氏。邢伯氏彌不姦，長由蔑歷”<sup>39</sup>。周穆王舉行這次饗射大禮，目的是爲考察諸侯邦君的忠順程度，邢伯是此次考察的重點人物（此邢伯爲居於今陝西之邢，與麥方尊中提到居於今河北的邢侯之邢在字形上是有分別的）。射禮在“下減應”

舉行，“应”是周王臨時駐蹕之地，“下減”大約在今鳳翔雍城一帶<sup>②</sup>。通過這次射禮，邢伯給周王留下“彌不姦”的好印象。《逸周書·寶典》：“不誠之行曰姦。”《詩經·大雅·生民》“誕彌厥月”，傳：“彌，終也。”金文嘏辭每言“彌生”、“彌厥生”，即“得善終”的意思。所以“彌不姦”就是“始終很誠懇”的意思。長由因能把邢侯召到穆王下減应來參加射禮而受到“蔑歷”。參加射禮共提到三人，周穆王、邢伯和大祝，若三耦較射，則另外三人在銘文中被省略了。大祝是衆祝之長，周初大祝禽鼎記魯侯伯禽曾任此職，申簋蓋也記有此一職官活動的情況<sup>③</sup>，他是周王朝中一位十分重要的官員，由他來協同周王一起用射禮考察邢伯。

義盃蓋：“惟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在魯，卿即邦君、諸侯、正、有嗣大射。義蔑歷眾於王迷，義賜貝十朋。”<sup>④</sup>這次射禮的規模很大，有邦君、諸侯、正和有嗣四種身份的人參加，邦君與諸侯的區別可能是以是否接受周王室的封建為準，接受裂土封建者得為諸侯，諸夷族未受封建者被視為“邦君”。此次射禮與長由盃所記一樣，也是為考察邦君諸侯而設。作器者義因能召集邦君諸侯到魯地與周王行大射儀，故受到十朋貝的賞賜。這件器銘中第一次出現“大射”一詞，《儀禮》將射禮分為“鄉射”和“大射”兩種，看來這種區分是有根據的。

十五年趙曹鼎：“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彝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史趙曹賜弓、矢、虎盧、冑、盾、甲、殳。”<sup>⑤</sup>銘文記此次射禮在射廬中舉行，師湯父鼎也有“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的記載<sup>⑥</sup>，匡卣記有“懿王在射廬”<sup>⑦</sup>。“射廬”是專門用於較射的場所。這幾件器都作於西周中期恭王和懿王的時代，因此遣辭用語及所記名物都是很接近的。

鄂侯御方鼎：“王南征，伐角僑。惟還自征，在坏，鄂侯御方納壺於王，乃裸之。御方侑王，王休宴，乃射。御方卿王射，御方休闌，王揚，咸飲。王親賜御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sup>⑧</sup>這次射禮在坏地舉行（與麥方尊中邢侯所出之地相同），是周王南征返途必經之地。鄂侯御方是南方一强大部族的邦君，周王此次南征雖目標不是討伐他，但周王的這一軍事行動對他震動還是很大的。他不但獻壺於王，而且在射禮中曲意奉承周王，為取得周王歡心，故意將矢射偏，射在侯框上，銘中的“休闌”就是這個意思。《說文》：“休，止息也。”“闌，門遮也。”“休闌”就是“止矢於框”之意。御方欲故意輸掉比賽，使周王得勝算。然而不巧，周王也未射中，銘稱“王揚”。《儀禮·大射儀》：“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註：“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周王射的偏高了，也沒有射中。於是“咸飲”，按儀注規定都喝罰酒。鄂侯御方到了後來的不嬰簋中，就是聯合玁狁在周人西部反叛的首領了，“御方、玁狁廣伐西俞”<sup>⑨</sup>，到再後的禹鼎中，他更“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於歷內”<sup>⑩</sup>，成了東南反叛的總頭領，從東南兩面夾擊周人，直進攻到周王室的腹心地帶，迫使周王

室動用了“西六師”、“殷八師”和大批地方武裝纔撲滅這場叛亂。

通過對上述金文資料的簡單分析，我們瞭解到西周射禮舉行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和有關儀注，使我們對這一禮儀制度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西周實行的是分封政治，周王將大部分土地人民分封給各級諸侯去管理，又對各異族邦國通過要求貢賦等使其臣服。因此，王畿之外星羅棋布地有着許多相對獨立的諸侯國與異族邦國，周王除保持有強大武裝力量不時以武力相威脅外，經常舉行射、饗、聘、問等禮儀，也是其維繫版圖統一的政治手段。上述七件銘文除令鼎、十五年趙曹鼎是周王與自家臣工舉行射禮外，其餘五件都記的是周王與諸侯邦君舉行的射禮。在射禮進行中，互相施展計謀，鄂侯御方在大舉反叛前夕的射禮中曲意奉承周王，有意麻痺他。邢伯則裝出一副“彌不姦”的樣子，取悅周王。這對雙方來說，都是政治鬭爭的需要。金文中還有一些“呼漁”、“射雁”的記載，這使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遼史》上的一些記載。《營衛誌》云：“春捺鉢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從鷹鵠捕鵝雁……皇帝得頭雁，薦廟。”洪皓的《松漠紀聞》云：“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遼史·天祚帝紀》：“春正月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阿骨打的態度很快引起遼主的警覺：“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這些後世民族史資料對我們理解西周射禮的政治意義很有啓發。可以想見，周王與邦君諸侯頻繁地舉行射禮並打魚射雁，絕非僅爲遊藝娛樂，主要想通過這些活動觀察動靜，考察其忠順程度，進而決定或安撫或鎮壓的政策。《禮記·射儀》：“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一語道破設置這一禮儀的政治目的。

甲骨文中“射”與“多射”，那是武官之名。西周金文有以“𠄎射”爲族名的甗、尊、爵等出土於洛陽東郊<sup>②</sup>，但無法肯定他們與射禮的直接關係。射禮在西周金文中的存在，主要是通過對上述七件器銘的分析後，纔得以肯定的。麥方尊和令鼎略早於穆王，長由盃是穆王標準器，靜簋、義盃蓋也是穆王時器，趙曹鼎是恭王標準器，鄂侯御方鼎是晚期宣王時器。除鄂侯御方鼎外，其餘六件都作於穆王前後。所以我推想，作爲一種複雜的禮儀制度，射禮可能是在穆王時完善起來的。靜簋記參加射禮的人員都要經過專門訓練纔能勝任，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種情況。

文獻稱“春射秋饗”，因此有人主張古代射禮祇在春天舉行，這却與金文不合。上述七件器銘有五件記有時間，分別是二月、三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幾乎貫串全年，說明這些按政治需要安排的射禮是不受季節限制的，而且有時饗射在同一時間舉

行。如長由盃就記先饗後射。又雍伯原鼎：“雍伯原作寶鼎，子子孫孫其萬年永用享（饗）射。”<sup>②</sup>饗射連言。可能文獻所說的是每年王室舉行的例行射禮，這種射禮帶有“選士”的作用。《禮記·射儀》：“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這種類似於考試的制度應該是後世的事情，在西周金文中沒見到反映。

上述七件器銘中的射禮都有周王參加，儀注中的“賓”則多是諸侯邦君，如邢侯、吳來、呂剛、鄂侯御方等。參與對耦陪射的多為周王的重要官員和近臣，如大祝、師氏小子、史、作冊、小臣等。有時也由“夷僕”參與作些輔助工作和配射。而“司射”一般由小臣來擔當。

《儀禮》的《鄉射禮》和《大射儀》各有五十條左右儀注，現分述如下：

《鄉射禮》：1. 主誠賓。2. 陳設張侯。3. 主速賓。4. 迎賓。5. 主獻賓。6. 賓酢主。7. 主酬賓。8. 主獻衆賓。9. 一人舉觶。10. 尊者獻酢。11. 合奏樂。12. 主獻工與笙。13. 立司正。14. 司射請射。15. 納射器。16. 司射比三耦。17. 司馬命張侯倚旌。18. 樂正遷樂。19. 三耦取弓矢俟射。20. 司射誘射。21. 三耦射。22. 取矢委楅。23. 司射請射比耦。24. 三耦拾取矢。25. 衆賓受弓矢。26. 司射作射請射獲。27. 三耦釋獲而射。28. 賓主射。29. 大夫與耦射。30. 衆賓繼射，釋獲告卒射。31. 司馬命取矢。32. 數獲。33. 飲不勝者。34. 司馬獻獲者。35. 司射獻釋獲者。36. 司射又請射。37. 主、賓、衆賓、三耦皆拾取矢。38. 司射請以樂節射。39. 全體節樂而射。40. 取矢數矢。41. 視算告獲。42. 飲不勝者。43. 拾矢授有司。44. 退諸射器。45. 旅酬。46. 司正使二人舉觶。47. 請坐燕，因撤俎。48. 坐燕，無算爵，無算樂。49. 送賓。50. 明日拜賜。51. 息司正。

《大射儀》：1. 誠百官。2. 誠宰、司馬、張侯。3. 設鼓樂。4. 陳設燕具席位。5. 命賓、納賓。6. 主獻賓。7. 賓酢主。8. 主獻公。9. 公酢主。10. 主酬賓。11. 爲衆賓旅酬。12. 公酬賓。13. 主獻卿。14. 再媵觶。15. 公爲卿舉旅。16. 主獻大夫。17. 作樂娛賓。18. 立司正、安賓、查儀。19. 請射、納射器、誓射、比耦。20. 司射誘射。21. 三耦射。22. 取矢。23. 命耦。24. 三耦拾取矢。25. 三耦再射釋獲。26. 君與賓耦射。27. 公卿大夫及衆耦皆射。28. 取矢。29. 數獲。30. 飲不勝者。31. 獻獲者。32. 獻釋獲者。33. 拾取矢。34. 鼓樂節射。35. 取矢數獲。36. 飲不勝者。37. 拾取矢。38. 退諸射器。39. 爲大夫舉旅酬。40. 撤俎安坐。41. 主獻士旅食。42. 賓舉爵爲士旅酬。43. 燕或復射。44. 主獻庶子。45. 燕末盡歡。46. 賓出公人。

《鄉射禮》儀注1~13爲射前準備及飲燕，14~24爲第一番射，25~27爲第二番射，38~44爲第三番射，45~48爲射後之飲燕，49~51爲送、拜、結束。《大射儀》儀注1~17爲射前飲燕，18~24爲第一番射，25~33爲第二番射，34~38爲第三番射，39~45爲射後飲燕，46結束。《鄉射禮》與《大射儀》雖有不同的儀注，



但其主要内容皆由三部分組成：射前飲燕、三番射、射後飲燕。射前後之飲燕是射禮的附加部分，射禮的核心是“三番射”。凌廷堪《禮經釋例》：“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及衆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第一番射是試射，雖射中也不計算成績，二、三番射都要計算成績（釋獲），特別是第三番射要節樂歌舞而射。對三番射來說，《鄉射禮》與《大射儀》是相同的，祇是參射者身份高低和規模大小有別而已。文獻稱“比耦而射”，金文則稱“卿射”；文獻有“射比三耦”，靜簋所記即三人對三人；文獻記司射主持射儀，金文也有由小臣擔任的司射；文獻記射禮的儀注有“釋獲”、“立馬”、“揚旌”、“唱獲”、“矢行上曰揚、下曰留、左右曰方”，金文有“先馬走”、“休闌”、“揚”等，幾乎文獻中射禮的主要儀注金文都有反映，但卻不見“三番射”的記載，也可能像《儀禮》所描述的那種繁複的“三番射”在西周尚未全面實行。文獻中所記射禮是戰國至秦漢人所熟悉的，估計當時人所知一般不會超出春秋時代。射禮在孔子的時代已發展成一門專業的學問和技藝，被列為“六藝”之一，相當複雜。《儀禮》所說的射禮就是以春秋時代的儀注為基礎推演而成的。

麥方尊和靜簋所記的射禮是在葦京的辟雍大池中舉行的，遯簋和井鼎中的“呼漁”也是在葦京的辟雍大池中舉行的。靜簋所記是“卿射”，與陸上的射禮相同，麥方尊記射“大髀禽”，遯簋、井鼎記“射魚”，與陸射的射侯應有區別。《禮記·射儀》：“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此所射之地明言是水澤之地，但由於文獻中射禮水射的儀注失載，故後世註家無法解釋這一現象，就杜撰出“澤宮”之說，認為“習射於澤”就是在“澤宮”中演練射技。從西周金文內容分析，西周射禮確分水陸兩種，而且不是“習射”。靜簋云“王在葦京……射於大池”，麥方尊云“在辟雍，王乘于舟，為大禮，王射大髀禽，侯乘于赤旗舟從”。說明水中的射禮是在船上進行的，而且是在辟雍大池中的船上，也是十分正規和隆重的。伯唐父鼎：“用射絳、釐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這是講禘祭禮的射牲儀注，王乘於辟雍大池之舟，射於辟雍大池之中的牛牲和諸野牲，也是水射之一種。日本林已奈夫先生編著的《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的研究》一書的340頁收錄一件戰國時代銅壺，上面有水射的畫面，可資參考（圖十一）。陸射的圖像有成都百花潭中學10號墓出土銅壺上的圖畫<sup>①</sup>（圖十二），故宮博物院藏燕樂畫像壺<sup>②</sup>（圖十三），上海博物館藏銅櫛杯圖畫<sup>③</sup>，陝西鳳翔高王寺出土銅壺圖畫（圖十四）等，這些圖畫都是戰國時期的，但它們對射禮的描繪是很形象直觀的，可以增進我們對射禮的感性認識。

古代的中國向以禮義之邦著稱於世，有着悠久的禮治傳統。商代的甲骨文中就記錄了大量的禮制內容。黃然偉先生用甲骨文資料寫了《殷禮考實》一書，可惜簡約了些。



“周禮”就是在“殷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古禮範圍很大，它貫串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它既是一種深刻的政治思想——禮治思想，又是一種巧妙而實用的統治藝術，它藉助於繁瑣的儀注，把貴族們的言行規定在不同等級的範圍內，把統治階級的意志，某些強制的甚至是暴力的企圖，掩蓋在溫文爾雅、觥籌交酢和優美的樂舞之中。這種統治術介於倫理道德規範與刑法之間，它既不像僅僅依靠習俗和輿論說教來約束人那樣軟弱無力，也不像用法律和刑罰待人那樣粗暴無情，它要求人們頻繁地參與到無休止的禮儀活動中去，按等級身份把每個人都禁錮在某種格式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sup>⑧</sup>以達到統治的目的。這種統治術十分有效，因而得到歷代統治階級的保護和強化，後世幾乎變成一種宗教，對中國幾千年文明史產生過巨大影響。因此，要理解中國古代文化，應該從這裏入手。反過來說，研究“周禮”也必需從政治的角度去觀察，纔可能看透這些繁瑣儀注背後隱藏着的真正內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祖先，軍事戰爭固然是國家政治大事，封建諸侯當然也是國家重大政治舉措，就連聘問相見，饗燕飲食，甚至較射投壺等遊藝活動也無不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說，禮制表達了古代政治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這是禮的本質所在。

《儀禮》、《禮記》、《周禮》三部禮書是系統記錄古代禮制的重要文獻，《禮記》是為闡釋《儀禮》而作，其重要性不能與《儀禮》相提並論。將《儀禮》所記與金文資料對比研究，就會發現它真實地反映了春秋時代以來古禮的基本面貌，過去稱它為“士禮”，似乎它祇是士階層禮儀的記錄，其實它記有許多國君一級的大禮，諸如《大射》、《覲》、《公食大夫》等篇名已說明了這一點，這在春秋時代已經是當時最高一級的禮儀了，所以它的記載許多與西周金文所記王禮有相合之處。但它畢竟不是西周古禮的實錄，又有許多與西周金文不合，如果我們能把它們看作記錄春秋以來古禮的文獻，是我們理解西周古禮的階梯，把它放到恰當的位置上，那就真正找到了它的價值所在，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它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對禮書的禁除是不遺餘力的。秦火之後，先秦古禮的文獻蕩然無存，因此給漢以後的經學家註釋殘存禮書造成很大困難，現存的註釋雖然輯逸補缺，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也雜有許多猜測附會之辭，揉進許多後世禮制內容。我們用西周金文來重新審視這些禮書，一方面看出禮書本身與西周時代的距離，同時也可以看清這些註釋的附會之處。反過來，禮書中許多對各種儀注細節的描寫，也可以幫助我們更確切地理解西周金文的含義。當然這裏有個主次問題，我們是以西周金文為主體去利用禮書，去復原周代禮制的，而不是相反。

《周禮》一書是記錄古代官制的，以天地四時配稱六官體系，作者將古代官制納入他主觀構擬的整齊體系之中，人為劃一的痕跡隨處可見。但《周禮》中許多職官名及其職文卻與西周金文相合，這說明該書作者在編輯此書時，是一定參考了許多今人見不到的先秦典籍的，絕非嚮壁虛造。（我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書中將《周禮》中的

官制體系與西周金文官制體系作過全面對比，讀者可以參看。)《周禮》在記敘古代官制的同時，也記錄了一些古代禮制的内容，這些資料十分珍貴，當我們用金文鑒別後則可以加以利用了。

後世儒者稱周公制禮作樂，開創有周一代制度。觀察西周金文，周初述及的禮制多沿襲殷禮，而周禮多數是在穆王前後方始完備。蓋西周初年，四方不靜，強大的殷遺勢力和周圍衆多異族邦國始終沒有停止和周人的武裝對抗，為維護新生政權，周公即使有精力制禮作樂，也無暇將其付諸實施。只是到了穆王時代，四海承平，國力强盛，纔可能將禮制建設提到日程上來。從後世史書中的《禮書》、《禮儀誌》等内容看，西周時代形成的各種禮制被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下來，這個傳統是一貫的，“周禮”是這個保守的傳統的源頭。追本溯源，弄清“周禮”的本來面貌，是我們理解這個在中華大地上盛行數千年，因而對中華民族的性格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傳統的關鍵所在。

#### 註 釋

- ① 《集成》8.4241。
- ② 同上，11.5997。
- ③ 同上，5.2743。
- ④ 同上，8.4129。
- ⑤ 同上，8.4342。
- ⑥ 同上，8.4317。
- ⑦ 同上，1.260。
- ⑧ 同上，1.49。
- ⑨ 同上，8.4322。
- ⑩ 同上，11.6014。
- ⑪ 《詩經·大雅·文王》。
- ⑫ 《集成》16.10175。
- ⑬ 同上，8.4341。
- ⑭ 《禹鼎》、《集成》5.2833。
- ⑮ 《師由簋》。
- ⑯ 《集成》5.2839。
- ⑰ 同上，16.10166。此簋《集成》因故誤收入盤類。
- ⑱ 同上，5.2776。
- ⑲ 同上，8.4165。
- ⑳ 同上，10.5430。

- ②1 《殷虛書契後編》上 19.1。
- ②2 《龜甲獸骨文字》1.11.6。
- ②3 《集成》15.9454。
- ②4 同上，11.6015。
- ②5 《考古》1989 年第 6 期。
- ②6 《集成》，5.2754。
- ②7 同上，10.5431。
- ②8 同上，5.2708。
- ②9 同上，8.4330。
- ③0 《殷契佚存》115。
- ③1 《殷契粹編》76。
- ③2 《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載《燕京學報》19 期。
- ③3 《甲骨文字釋林》38 頁《釋茲》，中華書局 1979。
- ③4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252 頁。
- ③5 《集成》5.2594。
- ③6 同上，5.2626。
- ③7 同上，8.4132。
- ③8 同上，14.9104。
- ③9 同上，10.5374。
- ④0 同上，16.9901。
- ④1 同上，5.2725。
- ④2 《考古》1989 年第 6 期。作者的考釋《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收入《考古》1990 年第 8 期。
- ④3 《集成》1.246。
- ④4 《論語·為政》。
- ④5 《集成》5.2803。
- ④6 同上，16.9935—6。
- ④7 同上，11.6000。
- ④8 同上，8.4191。
- ④9 同上，4.1937。
- ⑤0 同上，8.4296。
- ⑤1 同上，8.4267。
- ⑤2 同上，5.2768。
- ⑤3 同上，10.5410。
- ⑤4 同上，1.246。
- ⑤5 同上，8.4204。

- ⑤⑥ 同上, 1. 143。
- ⑤⑦ 同上, 1. 88。
- ⑤⑧ 同上, 8. 4332。
- ⑤⑨ 同上, 5. 2661。
- ⑥⑩ 同上, 5. 2778。
- ⑥⑪ 同上, 5. 2748。
- ⑥⑫ 見《文物》1959年第7期《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簡化》。
- ⑥⑬ 《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
- ⑥⑭ 《集成》, 7. 4041。
- ⑥⑮ 同上, 5. 2779。
- ⑥⑯ 同上, 5. 2775。
- ⑥⑰ 同上, 8. 4261。
- ⑥⑱ 同上, 8. 4300。
- ⑥⑲ 《考古》1991年第7期。
- ⑦⑩ 《集成》, 5. 2833。
- ⑦⑪ 同上, 8. 4312。
- ⑦⑫ 同上, 10. 5410。
- ⑦⑬ 同上, 4. 2459。
- ⑦⑭ 《西周銅器斷代》五。
- ⑦⑮ 《集成》5. 2695。
- ⑦⑯ 同上, 11. 5983。
- ⑦⑰ 同上, 10. 5433。
- ⑦⑱ 見《古籀篇》。
- ⑦⑲ 《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3期。
- ⑧⑩ 《集成》5. 2720。
- ⑧⑪ 同上, 8. 4207。
- ⑧⑫ 同上, 8. 4259。
- ⑧⑬ 《釋底漁》, 見《考古社刊》第4期第40頁, 1936年。
- ⑧⑭ 《集成》12. 6514。
- ⑧⑮ 同上, 5. 2739。
- ⑧⑯ 《西周壘鼎銘研究》, 《考古》1963年第12期。
- ⑧⑰ 《集成》8. 4323。
- ⑧⑱ 《殷虛書契》, 1. 42. 1。
- ⑨⑩ 同上, 4. 34. 5。
- ⑨⑪ 同上, 1. 42. 1。
- ⑨⑫ 《考古》199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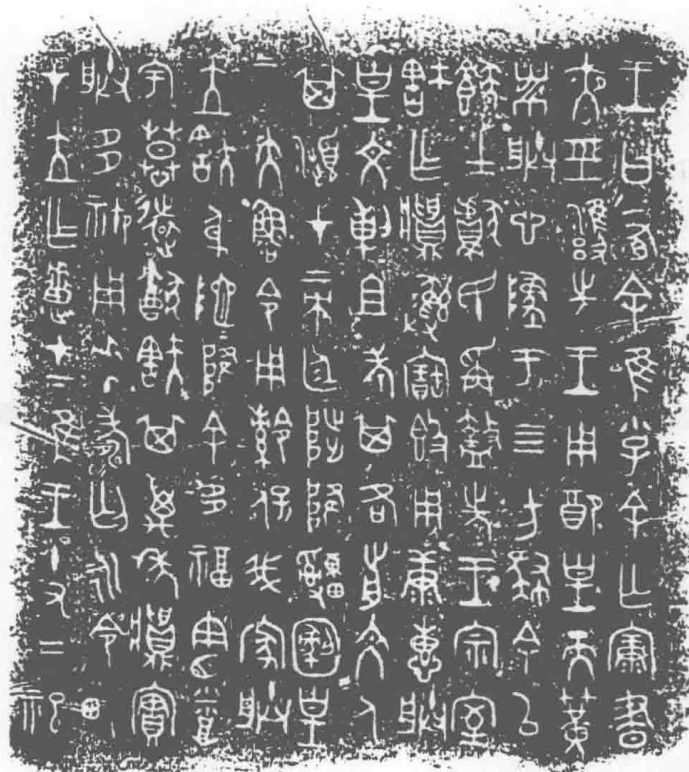
- ⑨② 《集成》16. 10176。
- ⑨③ 《考古》1985 年第 3 期。
- ⑨④ 《集成》8. 4393。
- ⑨⑤ 同上，12. 6514。
- ⑨⑥ 同上，5. 2810。
- ⑨⑦ 同上，8. 4320。
- ⑨⑧ 同上，5. 2814。
- ⑨⑨ 同上，11. 6015。
- ⑩①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第 250 頁。
- ⑩② 《集成》5. 2837。
- ⑩③ 同上，5. 2816。
- ⑩④ 同上，7. 4059。
- ⑩⑤ 同上，5. 2531。
- ⑩⑥ 《春秋分記》。
- ⑩⑦ 《集成》5. 2785。
- ⑩⑧ 同上，11. 5992。
- ⑩⑨ 同上，16. 10360。
- ⑩⑩ 同上，11. 6002。
- ⑩⑪ 同上，8. 4140。
- ⑩⑫ 同上，5. 2654。
- ⑩⑬ 同上，5. 2579。
- ⑩⑭ 同上，11. 6000。
- ⑩⑮ 同上，7. 4104。
- ⑩⑯ 同上，16. 10175。
- ⑩⑰ 同上，5. 2628。
- ⑩⑱ 同上，5. 2612。
- ⑪① 同上，10. 5342。
- ⑪② 同上，15. 9456。
- ⑪③ 同上，5. 2827。
- ⑪④ 同上，5. 2825。
- ⑪⑤ 同上，5. 2831。
- ⑪⑥ 同上，8. 4331。
- ⑪⑦ 同上，8. 4213。
- ⑪⑧ 同上，16. 10175。
- ⑪⑨ 同上，1. 260。
- ⑫① 同上，9. 4464。

- ⑫ 同上, 12. 6514。
- ⑬ 同上, 5. 2751。
- ⑭ 同上, 3. 949。
- ⑮ 《西周銅器斷代》五。
- ⑯ 《集成》5. 2775。
- ⑰ 同上, 5. 2595。
- ⑱ 同上, 8. 4123。
- ⑲ 同上, 5. 2721。
- ⑳ 同上, 5. 2787。
- ㉑ 同上, 8. 4179。
- ㉒ 同上, 8. 4195。
- ㉓ 同上, 8. 4146。
- ㉔ 同上, 7. 3954。
- ㉕ 同上, 5. 2703。
- ㉖ 同上, 8. 4132。
- ㉗ 同上, 8. 4201。
- ㉘ 同上, 3. 948。
- ㉙ 同上, 10. 5415。
- ㉚ 同上, 16. 10321。
- ㉛ 同上, 14. 9104。
- ㉜ 同上, 10. 5401。
- ㉝ 同上, 5. 2719。
- ㉞ 同上, 10. 5400。
- ㉟ 同上, 16. 9901。
- ㊱ 同上, 8. 4206。
- ㊲ 同上, 15. 9454。
- ㊳ 同上, 11. 5996。
- ㊴ 同上, 1. 204。
- ㊵ 同上, 8. 4298。
- ㊶ 同上, 8. 4292。
- ㊷ 同上, 8. 4293。
- ㊸ 《周禮·秋官·司約》。
- ㊹ 《集成》8. 4325。
- ㊺ 同上, 1. 144。
- ㊻ 同上, 1. 225。
- ㊼ 同上, 12. 6513。



- ⑩<sub>64</sub> 同上，5. 2831。
- ⑩<sub>65</sub> 同上，9. 4649。
- ⑩<sub>66</sub> 同上，16. 10372。
- ⑩<sub>67</sub> 同上，8. 4261。
- ⑩<sub>68</sub> 同上，5. 2674。
- ⑩<sub>69</sub> 同上，8. 4320。
- ⑩<sub>70</sub> 同上，10. 5433。
- ⑩<sub>71</sub> 同上，8. 4191。
- ⑩<sub>72</sub> 同上，8. 4207。
- ⑩<sub>73</sub> 同上，15. 9455。
- ⑩<sub>74</sub> 同上，5. 2807。
- ⑩<sub>75</sub> 同上，16. 9897。
- ⑩<sub>76</sub> 同上，15. 9726。
- ⑩<sub>77</sub> 同上，16. 10173。
- ⑩<sub>78</sub> 同上，5. 2709。
- ⑩<sub>79</sub> 同上，10. 5395。
- ⑩<sub>80</sub> 見《觀堂集林》卷六。
- ⑩<sub>81</sub> 見楊寬先生《古史新探》第306~309頁《由“饗飲酒”禮和“饗禮”推論“禮”的起源和“禮”這個名稱的來歷》。
- ⑩<sub>82</sub> 見《古史新探》第286~287頁。
- ⑩<sub>83</sub> 《集成》5. 2579。
- ⑩<sub>84</sub> 同上，5. 2765。
- ⑩<sub>85</sub> 同上，5. 2739。
- ⑩<sub>86</sub> 同上，5. 2839。
- ⑩<sub>87</sub> 同上，4. 2456。
- ⑩<sub>88</sub> 同上，10. 5354。
- ⑩<sub>89</sub> 同上，8. 4300。
- ⑩<sub>90</sub> 同上，4. 2487。
- ⑩<sub>91</sub> 同上，10. 5428。
- ⑩<sub>92</sub> 同上，5. 2810。
- ⑩<sub>93</sub> 同上，1. 245。
- ⑩<sub>94</sub> 同上，1. 149。
- ⑩<sub>95</sub> 同上，1. 182。
- ⑩<sub>96</sub> 同上，1. 52。
- ⑩<sub>97</sub> 同上，1. 261。
- ⑩<sub>98</sub> 同上，1. 203。

- ①<sup>99</sup> 同上, 2. 427。
- ②<sup>00</sup> 同上, 1. 113。
- ③<sup>01</sup> 同上, 1. 153。
- ④<sup>02</sup> 同上, 15. 9715。
- ⑤<sup>03</sup> 同上, 16. 9935。
- ⑥<sup>04</sup> 同上, 5. 2825。
- ⑦<sup>05</sup> 同上, 9. 4465。
- ⑧<sup>06</sup> 同上, 15. 9571。
- ⑨<sup>07</sup> 見《春秋·隱公五年》、《淮南子·時則訓》等。因前面軍禮部分已有敘述, 此從略。
- ⑩<sup>08</sup> 《集成》, 5. 2803。
- ⑪<sup>09</sup> 同上, 5. 2812。
- ⑫<sup>10</sup> 同上, 9. 4628。
- ⑬<sup>11</sup> 同上, 9. 4397。
- ⑭<sup>12</sup> 同上, 8. 4273。
- ⑮<sup>13</sup> 同上, 8. 4341。
- ⑯<sup>14</sup> 同上, 8. 4266。
- ⑰<sup>15</sup> 同上, 5. 2809。
- ⑱<sup>16</sup> 同上, 6. 3703。
- ⑲<sup>17</sup> 同上, 1. 153。
- ⑳<sup>18</sup>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5. 31。
- ㉑<sup>19</sup> 《集成》15. 9455。
- ㉒<sup>20</sup> 參見盧連成《周都滅鄭考》,《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
- ㉓<sup>21</sup> 《集成》, 8. 4267。
- ㉔<sup>22</sup> 同上, 15. 9453。
- ㉕<sup>23</sup> 同上, 5. 2784。
- ㉖<sup>24</sup> 同上, 5. 2780。
- ㉗<sup>25</sup> 同上, 10. 5423。
- ㉘<sup>26</sup> 同上, 5. 2810。
- ㉙<sup>27</sup> 同上, 8. 4328。
- ㉚<sup>28</sup> 同上, 5. 2833。
- ㉛<sup>29</sup> 見《考古》1959年第4期。
- ㉜<sup>30</sup> 《集成》5. 2559。
- ㉝<sup>31</sup> 《文物》1976年第3期。
- ㉞<sup>32</sup> 同上。
- ㉟<sup>33</sup> 《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90。
- ㊱<sup>34</sup> 《論語·顏淵》。



圖一 趺簋銘文



圖二 沈子它簋銘文



圖三 天亡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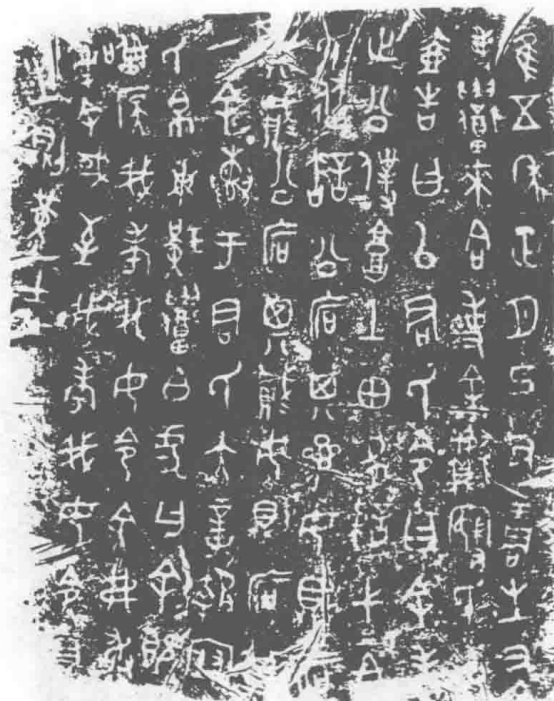
圖四 作冊矢令簋銘文



圖五 六年召伯虎簋銘文



圖六 頌鼎銘文



圖七 五年召伯虎簠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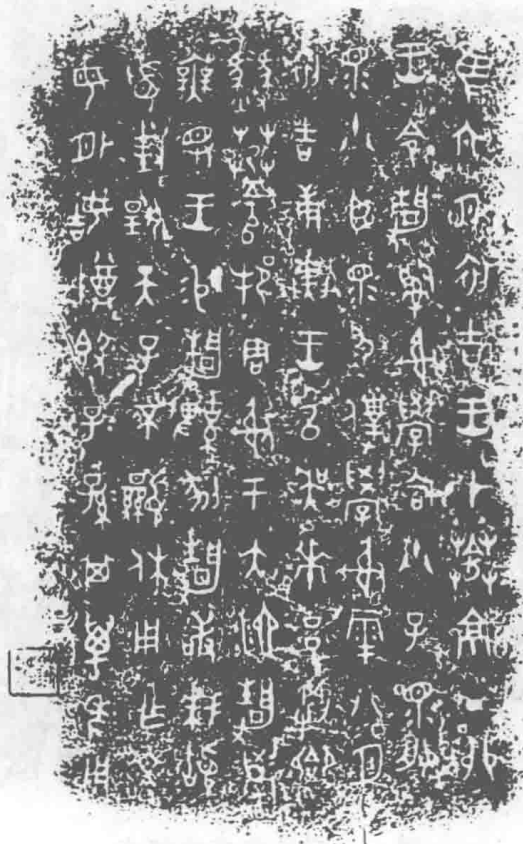


圖八 鄂侯御方鼎銘文





圖九 令鼎銘文



圖十 靜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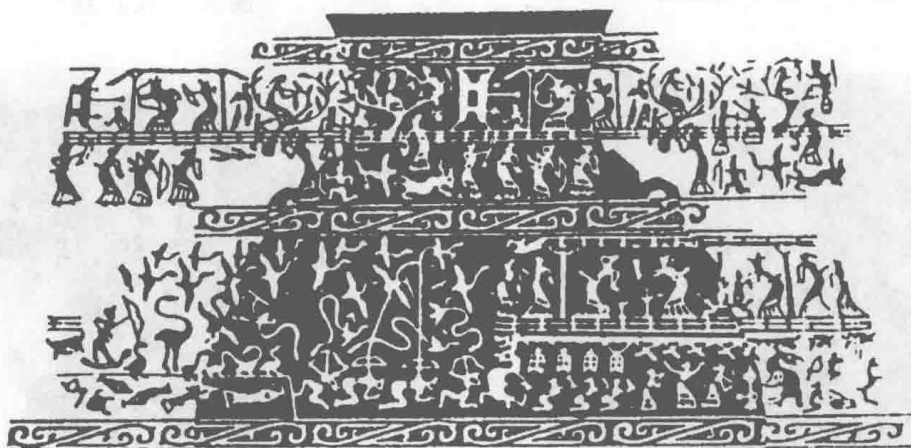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引自《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的研究》P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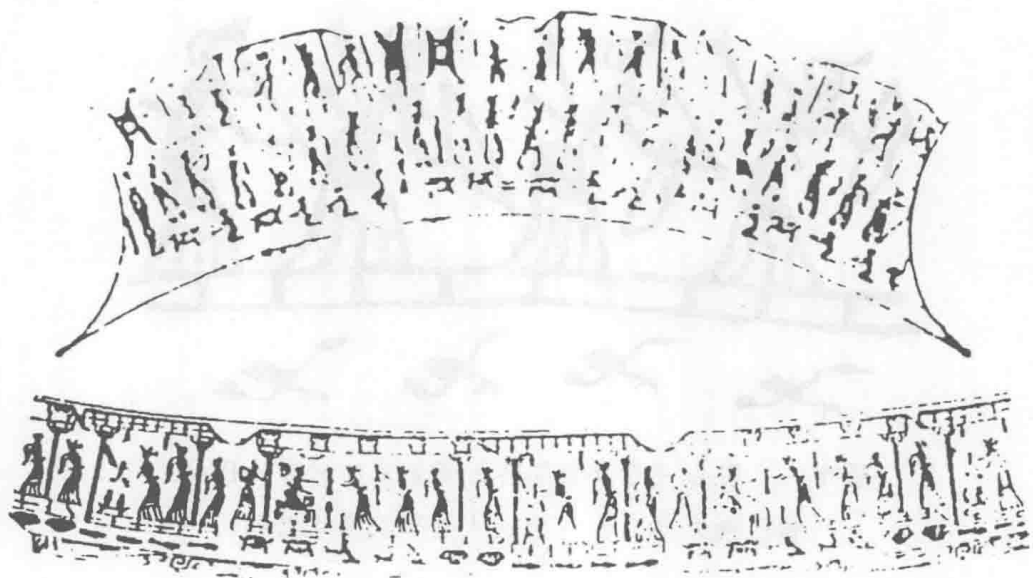
林巳奈夫（日） 京大人文研究考古資料



圖十二 成都百花潭中學 M<sub>10</sub> 銅壺圖（戰國）



圖十三 故宮博物院收藏銅壺圖（戰國）



圖十四 陝西鳳翔高王寺出土銅壺圖（戰國）



圖二 沈子它簋蓋



圖三 天亡簋



圖四 作冊矢令簋



圖五 六年召伯虎簋



圖六 頌鼎



圖七 五年召伯虎



圖八 鄂侯御方鼎

(原載《燕京學報》新3期55~1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 曆法及年代學





## 金文“初吉”辨析

講“初吉”最有影響者應首推王國維，他在《生霸死霸考》（見《觀堂集林》卷一）一文中指出：“余攬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爲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於晦也。”王氏以爲“初吉”與其他三者同爲月相，指每月初一至初八這幾天。此說影響甚大，日人新城新藏、研究金文曆法的吳其昌等都以此說爲理論基礎作了大量研究工作，證成和補充王氏之說（見《東洋天文學史研究》、《金文曆朔疏證》）。研讀金文的諸大家郭沫若、唐蘭、容庚等亦多崇此說。甚至天文學界有人竟將王氏所述中國古代的“四分一月法”與巴比倫公元前兩千多年前實行過的“四分一月法”聯繫起來（見《日曆漫談》，197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還有人以爲中國古代銅器銘文所記的“四分一月法”就是西方的星期制。長期以來，王氏之說幾成定論，在學術界佔據統治地位。

陳夢家同意王氏“初吉”爲月相之說，而主“定點說”，認爲“初吉”即朏，指每月初三日（見《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十冊）。

董作賓主張“初吉”是朔，指每月的初一日（見《董作賓學術論著》下第989頁）。

劉啓益亦主“定點說”，認爲“初吉”是初二或初三日（見《西周金文中月相詞語的解釋》，《歷史教學》1979年第6期）。

勞干近時提出：初吉爲一日，既生霸爲五日，既望爲十五日，既死霸爲二十日，並各可延伸三四日（見《周初年代問題與月相問題的新看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七卷一期）。

黃盛璋主張“初吉”非朔、非朏，非月相，乃是“初干吉日”，即爲每月初一至十，他還不同意王氏“四分一月說”（見《釋初吉》，《歷史研究》1958年第4期）。他

的意見近年來被天文學界所採納。1981年新出的《中國天文學史》說“初吉很可能就是初干吉日”（見該書21頁）。

綜觀上述各家之論，黃盛璋說中國自古以來實行的是“旬法”而非“四分一月法”，其說可從。中國古代神話云“若木上生十日，輪流相值”。商周人之名號多以十日干爲記，即可爲證。

記日用旬，西周亦如此。陝西扶風出土的西周銅器東鼎銘云：

癸卯，王來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東……（見《文物》1963年第2期）

癸卯距丁卯二十四日，銘稱“二旬又四日”，此可作周人記日用旬之確證。記日用旬與四分一月記日法不可同時併存，所以我們也認爲王氏四分一月法是缺乏有力證明的。

我們整理了全部載有“初吉”的金文材料，作《金文初吉表》一份附於文後，共收三百多件銅器（因部分材料尚未發表，故表中只列出二百八十六條）。其中西周前期銅器二十件左右，西周後期和春秋銅器各一百三、四十件，戰國初年銅器十件左右。另外，我們還對“既生霸”、“既死霸”、“既望”在銅器上出現的次數作了統計：“既生霸”出現五十九次，“既死霸”出現二十六次，“既望”出現二十九次，三者共計出現一百一十四次，它們絕大多數出現在西周銅器上，春秋前期銅器上只出現了三、四次，春秋後期和戰國銅器上則一例也未出現。

兩相比較，“初吉”在銅器上出現的次數大大超過了“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的次數，相當於三者總和的三倍。而且，“初吉”稱日法實行的時代從周初到戰國初，其他三者則主要限於西周。情況如此差異，我們有理由認爲二者可能不是一類事物。1955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的吳王光鑒銘云：“惟王五月，既子白期，吉日初庚。”據郭沫若先生考證，“既子白”就是“既生霸”。而在春秋時期，銅器上的“吉日”一詞與“初吉”的含義是相同的。所以，可以說在吳王光鑒的記時詞語中，既生霸的時期內包含了初吉。由此可確證初吉與既生霸等詞語內容是有區別的。如果說“既生霸”是月相稱呼，則“初吉”就不能是月相稱呼，而爲另外一種日稱。然而也不可能是“初干吉日”，因爲有靜簋銘爲證：

惟六月初吉，王在茅京，丁卯，王令靜爾射學官。小子罍服罍小臣罍夷僕學射。季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剛……卿射於大池……（《三代》6.55）

此器一銘而具二“初吉”，是目前見到能證明“初吉”含義的唯一材料。對此銘，董作賓認爲“初吉”爲朔，故假定“六月初吉丁卯”與“八月初吉庚寅”中間隔了一年，以遷就其說。郭沫若、黃盛璋認爲“初吉”乃月初之七、八日或十日，故假設“丁卯”乃七月之“丁卯”，與“六月初吉”不連屬，以遷就其說。而在我們看來，上兩種意見都不能成立。按金文慣例，“初吉”或“既生霸”、“既死霸”、“既望”之後

如有干支日（此干支日前又無年月連屬），則不管中間是否插入其他詞語，該干支日應屬於前面“初吉”等記日詞語，免尊、免卣“惟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王各于大室”；班簋“惟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號城公服”；應侯見工鐘“惟正月初吉，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遣王于周，辛未，王各于康”；鄭簋“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廟”；師旅簋“惟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滅應，甲寅，王各廟，即位”。以上諸例，從銘文內容看，“在鄭”、“在宗周”、“王在周邵宮”等都是把記地詞語插入記時詞語中，並不表示記地詞語前後的記時詞語是不連貫的。金文中年月日分書幾處的例證尚多，不得隨意指成不同的年或月。如刺鼎“惟五月，王在初，辰在丁卯，王啻”；叔專父盃“惟王元年，王在成周，六月初吉丁亥，叔專父作鄭季寶鐘六”；保卣“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在二月既望”；寧鼎“庚午，王令寧農省北田四品，在二月”。像這種顛倒各分句次序的現象，與顛倒句子中主語賓語位置的現象一樣，同屬周代金文的特殊語式，不足為奇。

靜簋中“司射學宮”、“衆人學射”、“王及衆人合射於大池”，三事一貫，董氏稱其間相隔一年是沒有根據的。

靜簋中有“六月”和“八月”，都明確標出月份，如有七月，也應標出，否則即成爲一種無法理解的混亂記時法了。而且，據我們統計，在三百多件記有“初吉”的銅器銘文中，記“七月初吉”者只有兩器一銘，即同銘的壘簋、壘鼎。在記“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的百多件器中，也只有伯克壺一件記“七月既生霸”（此器現能見到的乃宋代摹刻本，其字爲“七”爲“十”尚難作定論）。故金文中銘記“七月”，乃極個別現象，僅占四百分之一、二。因此，“七月”很有可能爲周人禁忌較多之月。其月爲秋之始，古稱肅殺之月。《呂氏春秋·孟秋紀》云：“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戮有罪，嚴斷刑。”“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此種制度當有所本。靜簋之“司射”、“學射”、“合射”皆關乎周王之射禮所行，射禮乃吉禮，往往與饗禮、冊命、賞賜之禮同時舉行，不會專選一肅殺之月去施行。郭沫若、黃盛璋之“丁卯”七月說是不能成立的。靜簋之“六月”、“八月”乃同一年之兩月，“丁卯”爲“六月初吉”之“丁卯”是應該肯定的。

丁卯距庚寅爲五十四日，這表明六月丁卯之“初吉”與八月庚寅之“初吉”必然是在六月、八月之首尾兩端。即一爲初一至初五中之一日，一爲二十五至三十中之一日，亦即兩“初吉”不可能同爲初一、二、三或“初干”之十日之一。至此，我們找到了一個“初吉”，它必然是二十五至三十中之一日。六月到八月僅有兩月，因此無論“連大月”、“年中置閏”（注：如上分析，若有年中置閏，如閏七月出現，則可能安排兩初吉皆在月初，此句誤。）等那種情況出現，都無法改變我們的結論。靜簋銘有力地證明“初吉”可以不是朏、朔，它不是月相，也可以不是“初干吉日”。

欲知“初吉”的含義，尚需對表中的金文材料作進一步分析。首先我們將初吉干支日各干支出現次數按天干和地支分別作一統計，統計結果：丁、庚、午、亥遠遠超出其他干支；丙、戊、己、辛、癸，丑、辰、巳、未、酉很少出現；“子”一例也沒有，干支日分配很不平衡。我們認為這表明“初吉干支日”是周人擇出之“吉宜干支日”。正如新出盜叔壺銘云：“擇厥吉日丁，盜叔之尊壺，永用之。”（《考古》1982年第2期）

《爾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始也。”《說文》：“吉，善也”。“初吉”者，“首善”也。“初”又與“大”通。孟爵：“惟王初率於成周”。獻侯鬲鼎：“惟成王大率在宗周。”“初率”者，“大率”也。故“初吉”者，“大吉”也。所以，矢令方彝云“惟十月月吉癸未”，春秋戰國銘文多稱“吉日”、“元日”等，而不稱“初吉”，然其所稱却皆與“初吉”含義相同，可見初吉之初並無始意。

上面我們證明了“初吉”即“首善”、“大吉”之義。然而此“首善”、“大吉”之吉日周人是如何選取的呢？《尚書》、《詩經》及各種史書都沒有明確的記載，我們根據出土文物及文獻中的有關記載加以推測。

古代有講吉宜禁忌事之書，見於出土者如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陳夢家云：“解放前長沙東郊杜家坡出土戰國帛圖書，繪十二神之圖而以《爾雅·釋天》十二月月名註寫其旁，在十二神像之旁環書十二月之禁忌，幅中則叙楚世歲月之起源並及三者之吉凶，疑所謂歲月傳也。”（見《武威漢簡》）“歲月傳”即漢王充所謂“歲月之傳”。《論衡·譏日》云：“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

雲夢睡虎地秦簡中有《日書》甲乙兩種，計四百餘簡，是一部戰國至秦代流行的專講如何擇日以及歲月五星吉宜禁忌和驅鬼術的書。其中有：

732 簡：

陽日，百事順成，邦郡得年，小夫四成。以蔡（祭），上下羣神鄉（饗）之，乃盈志。

735 簡：

陰日，利以家室祭祀。家（嫁）子、取（娶）婦、入材（財），大吉。以見君上，數達毋咎。

746 簡：

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丑。

753 簡：

國良日：甲午、乙未、乙巳。

856 簡：

行。凡且有大行遠行，若飲食、歌樂、聚畜生及夫妻同衣，毋以正月上旬午，二月上旬亥，三月上旬申，四月上旬丑，五月上旬戌，六月上旬卯，七月上旬子，八月……

857 簡：

上旬巳，九月上旬寅，十月上旬未，十一月上旬辰，十二月上旬酉。凡是日赤帝（帝）恒以開臨下民而降其英（殃）。不可具為百事，皆毋所利，節有為也。

759 簡：

葬日，子卯巳酉戌是胃（謂）男日，午未申丑亥辰是胃女日。女日死，女日葬。

《日書》與子彈庫帛書及漢代“歲月傳”、“日禁”之書內容是相通的。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有《五星占》，講五大行星運行與人世休咎禍福的關係，也是同類書。

武威漢簡、敦煌漢簡都有一些日忌簡，亦為同類之書。武威日忌簡分日（天干）忌、辰（地支）忌兩冊。如甲日毋治宅，乙日毋納財，丙日毋置衣，戊日毋渡海，辰日毋治喪等。

文獻載漢代吉宜禁忌亦十分煩瑣，如：

“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論衡·譏日》）“驚，駿馬，以壬申日死，乘馬忌之。”（《說文》）“冠，以戊子為元日，婚，以戊寅之旬為忌日。”（《漢書·王莽傳》）“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論衡·譏日》）“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顏氏家訓·風操》）“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論衡·譏日》）

根據上述材料我們推測，在西周時也應該有類似的吉宜禁忌之書，其書應載明某些時日對某類事的吉宜或禁忌。使用者尚需用占卜或占筮之法以占定某具體干支日。如《春秋·僖三十一》“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傳》“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公羊傳》“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儀禮·士冠禮》載求日之儀云：“士冠禮，筮於廟門。”“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儀禮·少牢饋食禮》載筮日之儀云：“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儀禮·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諷日。”《禮記·曲禮》對擇日之法作有注解：“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日分遠近，說明其時吉宜禁忌之書所定之日當有若干個干支日可供選擇，使用者根據情況，占得其中之一具體干支日來使用。銅器銘文多記賞賜冊命等大吉之事，故



“初吉”之用特多。西周時諷日之法其詳雖不得確知，然根據戰國以來出土帛書、竹書及文獻所載，尚可推得其大概如上述。

探討“初吉”的含義，關係到有些同志正在進行的金文月相整理工作的認識基點是否可靠，關係到古天文史的某些研究工作，對於金文本身的研究也有一定重要性。比如克組器的研究，唐蘭先生曾據“康宮原則”把克鐘定為宣王時器，因為克鐘云“王在周康刺宮”，刺通厲，刺宮者，厲王之廟也。其說十分正確。然唐先生因克鐘之“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與克盨之“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兩初吉日排起來其一當在既望之後，以為不妥，遂採納了郭沫若的鐘、盨乃兩王器之說，將克盨克鼎等其他克器斷在厲王之世。唐、郭二先生信從王國維之說，以為“初吉”必在既望之前，故有此解。然克組器同出一地，器主同為克，紋飾形制一致，似應為同世之物。且克鐘記十六年，銘稱克。克盨、克鼎記十八年以後事，銘稱其為善夫克，職官有加。其賞賜、冊命、差使皆逐年有加，故十八年應在十六年後，不應反斷在厲王之世。陳夢家《西周紀年考》考定厲王年數在十四與十八之間。因此，十八年後之器斷在厲王是不可靠的。“初吉”者“大吉”也，此大吉之日出現於既望之後當然是允許的。

金文初吉表

器 名	年 月 日	著 錄
旗鼎	惟八月初吉	文物 72.7
靜簋	惟六月初吉，王在葦京，丁卯，王令靜嗣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季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剛……射于大池……。	三代 6.55
靜卣	惟四月初吉丙寅	三代 13.41
班簋	惟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號城公服……子孫多世其永寶	文物 72.9
鼂簋	惟正月初吉丁卯	錄遺 163
次尊	惟二月初吉丁卯	三代 11.35
次卣	惟二月初吉丁卯	三代 13.39
御正衛簋	五月初吉甲申	三代 6.49
斂簋	惟八月初吉丁亥	錄遺 160
長由盃	惟三月初吉丁亥	文參 55.2
效尊	惟四月初吉甲午	三代 11.37
效卣	惟四月初吉甲午	三代 13.46
耳尊	惟六月初吉辰在辛卯……耳日受休	錄遺 206

續表

器 名	年 月 日	著 錄
刺鼎	惟五月，王在口，辰在丁卯	三代 4. 23
召卣	惟十又二月初吉丁卯	三代 13. 42
遘盂	惟正月初吉	考古 77. 1
沝簋	惟十月初吉辛巳	三代 6. 51
獻仲方鼎	惟六月初吉庚寅	錄遺 92
何簋	惟三月初吉庚午	嘯堂下 97
命簋	惟十又一月初吉甲申	三代 8. 31
沝簋	惟四月初吉丁卯	三代 8. 51
賈鼎	惟十又二月初吉壬午	三代 4. 12
旂鼎	惟八月初吉辰在乙卯	三代 4. 3
甕簋	惟八月初吉庚午	三代 8. 19
不 <sub>𠄎</sub> 簋	惟九月初吉戊辰	錄遺 159
壘簋	惟七月初吉甲戌	三代 8. 30
壘鼎	惟七月初吉甲戌	小校 3. 2
裘衛鼎	惟正月初吉庚戌……惟王五祀	文物 76. 5
衛簋	(一)(二)(三)(四)惟八月初吉丁亥	考古 74. 1
衛卣	惟九月初吉庚午	綴遺 12. 31
仲桷父簋	惟六月初吉	文物 65. 11
仲桷父鬲	惟六月初吉	文物 65. 11
作冊吳方彝	惟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大室，旦，王各廟……惟王二祀	三代 6. 56
永盂	惟十又二年初吉丁卯	文物 72. 1
貳簋	惟六月初吉乙酉	文物 76. 6
不伯壘	惟正月初吉丁亥	考報 63. 2
賢簋	惟九月初吉庚午	文物 59. 10
賢簋	惟九月初吉庚午	三代 8. 28
殺簋	惟二月初吉	文物 p93 頁 1979. 2 天津文物簡訊 77. 6
君匜	惟正月初吉丁亥	河北文物選 45
匡卣	惟四月初吉甲午	三代 1. 25
師緡簋	惟八月初吉戊寅	文物 66. 1

續表

器 名	年 月 日	著 錄
癸壺	(一)(二) 惟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	文物 78.3
盞方彝	(一)(二) 惟八月初吉	考報 57.2
盞方尊	惟八月初吉	考報 57.2
免簋	惟十又二月初吉, 王在周, 口味曹, 王各于大廟	三代 9.12
免盤	惟五月初吉	三代 14.12
免尊	惟六月初吉, 王在鄭, 丁亥, 王各大室	三代 11.36
免卣	惟六月初吉, 王在鄭, 丁亥, 王各大室	三代 13.43
兌簋	惟正月初吉甲午	三代 8.46
宴簋	惟正月初吉庚寅	三代 8.36
辛事簋	六月初吉癸卯	薛氏 2.11
邠仲壘	惟正月初吉丁卯	小校 4.70
同簋	惟十又二月初吉丁丑	三代 9.17
康鼎	惟三月初吉甲戌	三代 4.25
習壺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2.29
應侯見工鐘	惟正二月初吉, 王歸自成周, 應侯見工遣王于周, 辛未, 王各于康……	文物 75.10
善夫山鼎	惟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	文物 65.7
師察簋	(一)(二) 惟五月初吉甲戌	斷代(文物 60.2)6.116
諫簋	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師錄宮旦王各大室	三代 9.19
師賂簋	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斷代 6.117
穀卣	惟三月初吉戊寅	小校 3.98
善鼎	惟十又二月初吉辰在丁亥	三代 4.36
師湯父鼎	惟十又二月初吉丙午	三代 4.24
師賁簋	(一)(二) 惟二月初吉戊寅	文物 64.7
望簋	惟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 王在周康宮新宮, 旦、王各大室	摺古 31.83
君夫簋	惟正月初吉乙亥	三代 8.47
師猷簋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嘯堂 53
大簋	惟六月初吉丁巳	三代 8.44
盧鐘	(一)(二)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17
絞鐘	惟九月初吉丁亥	西甲 17.28

續表

器 名	年 月 日	著 錄
師趯鬲	惟九月初吉庚寅	三代 4. 10
格伯簋	(一) — (五) 惟正月初吉癸巳	三代 9. 14 ~ 9. 16
格伯簋	惟三月初吉	三代 8. 5
楚簋	(一) (二) (三) (四) 惟正月初吉丁亥	考古 81. 2
殷穀盤	惟正月初吉	三代 17. 12
瘠鼎	惟正月初〔吉〕	三代 3. 37
大夫始鼎	惟三月初吉甲寅	嘯堂 92
囂伯盤	惟正月初吉庚午	三代 17. 15
弣壺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雙玉 18
鐘伯侵鼎	惟正月初吉乙亥	三代 4. 3
大師鐘伯匜	惟正月初吉乙亥	周存 4. 22
散季簋	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嘯堂 52
仲偃父鼎	惟王五月初吉丁亥	嘯堂 15
仲偃父方甗	惟六月初吉	考圖 2. 17
毛遣簋	惟六月初吉丙申	善齋 7. 70
正考父鼎	惟四月初吉	王集 9
猷叔伯姬鼎	惟王正月初吉乙丑	文物 76. 1
泓其鼎	(一) (二) 惟五月初吉壬申	陝青 69 錄遺 96
泓其壺	(一) (二) 惟五月初吉壬申	陝青 70 美帝 A649 R485
師兑簋	(一) (二) 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	三代 9. 31
鄭簋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各于宣射	考圖 3. 10
克鐘	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三代 1. 23
善夫克盨	惟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三代 10. 44
號季子白盤	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7. 19
無彛簋	惟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三代 9. 1
鬲攸從鼎	惟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	三代 4. 35
不嬰簋	惟九月初吉戊申	三代 9. 48
南宮柳鼎	惟王五月初吉甲寅	陝青 79
敵簋	惟四月初吉丁亥	三代 8. 44
師簠簋	(一) (二) 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三代 9. 35 9. 36

續表

器 名	年 月 日	著 錄
鮮鐘	惟□月初吉□寅	陝青 126
伯鮮鼎	惟正月初吉庚午	文物叢刊（二）
伯鮮鼎	（一）惟正月初吉庚午	三代 4.4（見錄一）
柞鐘	（一）—（五）惟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	文物 61.7
几父壺	（一）（二）惟五月初吉庚午	文物 61.7
散伯車父鼎	（一）—（四）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文物 72.6
伯吉父簋	惟十又二月初吉	文物 74.1
伯吉父鼎	惟十又二月初吉	文物 74.1
叔專父鬲	（一）—（四）惟王元年，王在成周，六月初吉丁亥，叔專父作鄭季寶鐘六……	考古 65.9
即簋	惟王三月初吉庚申	文物 75.8
吳生鐘	惟□□□□初吉甲戌	綴遺 1.12
華母壺	惟正月初吉庚午	錄遺 230
公父宅匜	惟王正月初吉庚午	三代 17.38
覈鼎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中日澳新紐》229
絃大子鼎	惟九月之初吉丁亥	周存 2.39
曾伯從龍鼎	惟王十月既吉	文物 72.2
曾子原簋	惟九月初吉庚申	江漢考古 80.1
曾伯震簋	惟王九月初吉庚午	三代 10.26
曾子□簋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0.16
楚羸盤	惟王正月初吉庚午	英國
楚羸匜	惟王正月初吉庚午	三代 17.37
楚王鐘	惟正月初吉丁亥	考圖 7.12
楚王頌鐘	惟楚稱王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10
楚子燮簋	惟八月初吉庚申	三代 10.15
楚王盱忌鼎	（一）（二）正月吉日	三代楚展 3.4.17
楚王盱忌盤	正月吉日	三代 17.16
吳王光鑒	（一）（二）惟王五月，既子白期，吉日初庚	考報 56.2
者減鐘	（一）—（十）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48
臧孫鐘	（一）—（九）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考古 65.3
越王鐘	惟正月孟春吉日丁亥	博圖 22.7

續表

器 名	年 月 日	著 錄
越王者旨於賜鐘	惟正月初春吉日乙亥	嘯堂 82
其次句鐘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8. 1
姑馮句鐘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8. 2
蔡侯尊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	考報 56. 2
蔡侯盤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	考報 56. 2
蔡侯罇鐘	(一) — (八) 惟王正月初吉孟庚	考報 56. 2
蔡大師鼎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4. 18
蔡□子壺	惟正月初吉庚午	三代 12. 24
邾大宰簠	惟正月初吉	文物 59. 10
邾公輕鐘	惟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	三代 1. 49
邾公華鐘	惟王正月初吉乙亥	三代 1. 62
邾叔鐘	惟王六〔月〕初吉□□	三代 1. 19
邾太宰簠	惟正月初吉	三代 10. 24
郟王子旃鐘	惟正月初吉元日癸亥	錄遺 4
儼兒鐘	惟正九月初吉丁亥	三代 1. 50
宜桐孟	惟正月初吉日乙酉	周存 4. 39
王孫遣者鐘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 64
沈兒鐘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 54
郟釐尹鉦	惟正月月吉日在庚	三代 18. 3
郟王義楚鐺	惟正月吉日丁酉	三代 14. 55
黃孫鑑	惟正月初吉丁亥	文物 80. 1
黃太子盤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周存 4. 6
黃韋俞父盤	惟正月初吉庚申	三代 17. 13
伯盞盞	惟八月初吉庚午	考圖 5. 22
伯盞盤	惟王月初吉日丁亥	考圖 6. 2
叔賁父簠	惟正月初吉丁亥	文物 72. 3
孫賁父匜	惟正月初吉庚午	文物 72. 3
彭子仲盆	惟八月初吉丁亥	考古 63. 12
鄧公簠	惟鄧九月初吉	三代 8. 16
鄧伯氏始氏鼎	惟鄧八月初吉	三代 3. 47
都公平侯鼎	惟都八月初吉癸未	三代 4. 23



續表

器 名	年 月 日	著 錄
都公攷人鐘	惟都正二月初吉乙丑	三代 1. 10
都公攷人簋	惟都正二月初吉乙丑	三代 8. 47
仲子平鐘	惟正月初吉庚午	考報 78. 3
三兒簋	惟王三月初吉丁巳	錄遺 166
筮太史申鼎	惟正月初吉辛亥	三代 4. 15
許子鐘	惟正月初吉丁亥	考圖 7. 7
子璋鐘	(一) — (六) 惟正十月初吉丁亥	三代 1. 27
許子妝簋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0. 23
晉公盞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8. 13
樂書缶	正月初春元日己丑	錄遺 514
郢爰鐘	(一) — (十三)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 57
吉日壬午劍	吉日壬午	貞松 12. 20
虢叔簋	惟王三月初吉癸卯	三代 8. 37
陳公子壺	惟正月初吉庚午	綴遺 13. 13
陳侯簋	(一) (二)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0. 21
陳侯鼎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3. 49
陳子匱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7. 39
陳逆簋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0. 25
陳助簋	惟王五月元日丁亥	三代 8. 46
鞫罇	惟王五月初吉丁亥	三代 1. 68
齊鮑氏鐘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 42
叔原父甗	惟九月初吉丁亥	三代 5. 12
者尚余卑盤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7. 17
叔朕簋	惟十月初吉庚午	三代 10. 23
冫叔盤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7. 17
冫叔匱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17. 40
王孫壽甗	惟正月初吉丁亥	錄遺 106
蟠鼎	惟三月初吉	文物 79. 9
庚兒鼎	(一) (二) 惟正月初吉丁亥	考古 63. 5
樂子襄甗	惟正月初吉丁亥	文物 64. 7
長子匱	惟正月初吉丁亥	文物 64. 7

續表

器 名	年 月 日	著 錄
鄭叔上匜	惟十又二月初吉乙巳	三代 17. 40
鄭仲子紳簋	惟十月初吉丁卯	善齋 7. 78
鑄叔皮父簋	惟一月初吉	三代 8. 38
王子吳鼎	惟正月初吉丁亥	三代 4. 14
孫叔右簋	正月初吉丁亥	頌續 43
孫叔師父壺	惟王正月初吉甲戌	日精華 4. 301
寬兒鼎	惟正八月初吉壬申	三代 4. 13
番羽生壺	惟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	三代 12. 24
拍尊	惟正月吉日乙丑	三代 11. 33
伯居孟	惟正月初吉	錄遺 513
曾口壬女鐘	惟正月吉日丁亥	頌續 120
子鑿舟	惟正月吉日乙丑	周存 4. 33
井南伯簋	惟八月初吉壬午	小校 8. 26
命瓜君壺	惟十年四月吉日	三代 12. 28

(原載《文物》1982 年 11 期, 76~84 頁)

人辭問“辰丁”與“吉游辰六”意情。

“辰辰不錄二辰吉吉辰”，“辰辰吉王”。

## 再論金文“初吉”

我在八十年代初寫了《金文“初吉”辨析》一文（《文物》1982年11期），提出了金文“初吉”不是月相，也不是“初干吉日”，而只是一個大吉之日的看法。那篇小文立論的主要根據是對《靜簋》（集成4273）所記兩“初吉”日距的分析。後來看到一些批評文章，主要是對靜簋銘文的理解不同，可歸納為以下四點：（1）認為兩“初吉”間有閏月。（2）認為“六月初吉”與“丁卯”之間插有“王在莽京”一句，因而“丁卯”不屬六月，而屬七月。（3）認為兩“初吉”間隔有一年時間。（4）認為《靜簋》是孤證。幾條意見都很尖銳，只要其中一條得以成立，我那篇文章的論點就將值得懷疑。

在1993年香港古文字會上，我發表了《殷周金文中的閏月》一文（收入香港《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文中我用金文資料討論了殷末和西周時代曆法中置閏的一些情況，證明在《靜簋》時代（穆王前後）的周曆中不可能有閏六月或閏七月存在，回答了第一條意見<sup>①</sup>。本文擬討論其餘三個問題。為方便討論，重列靜簋釋文：

惟六月初吉，王在莽京，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於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剛會幽、蓋師、邦周射於大池。靜學（教）無斁，王賜靜鞶剡。靜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母外姑尊簋，子孫孫其萬年用。

### 一 靜簋“六月初吉”與“丁卯”間插入 “王在莽京”，是否表示二者不連屬？<sup>②</sup>

現將金文中記有此類句式的銘文排列如下：

叔專父鬲（集成4454）

惟王元年，王在成周，六月初吉丁亥，叔專父作鄭季寶鐘六、金尊盥四、鼎七……

作冊折尊（集成 6002）

惟五月，王在卣，戊子，令作冊折兄望土于相侯，賜金賜臣，揚王休。惟十又九祀……

刺鼎（集成 2776）

惟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禘。用牡於大室，禘昭王……

高卣蓋（集成 5431）

惟十又二月，王初饗葵，惟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烝咸□，尹賜臣惟小焚，揚尹休……

保員鼎（《考古》1991年7期）

惟王既燎，厥伐東夷。在十又一月，公返自周，己卯，公在組，保員邇。辟公賜保員金車，曰：用事……

應侯見工鐘（集成 107）

惟正二月初吉，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辛未，王格于康。榮伯入佑應侯見工，賜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

免卣（集成 5418）

惟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王格大室。邢叔佑免，王蔑免歷，令史懋賜免尊市、冏黃，作司工……

班簋（集成 4341）

惟八月初吉，王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號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極……  
《鄴簋》（集成 4296）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於宣廟。毛伯入門立中廷，佑祝鄴，王呼內史冊命鄴……

《師旅簋》（集成 4279）

惟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滅居，甲寅，王格廟即位、遲公入佑師旅即立中廷，王呼作冊尹克冊命師旅……

在西周金文中，此種句式的銘文，除靜簋外，可能僅有十餘種。其中叔專父盥大家認識是一致的，還沒見到誰認為銘中的“元年”與“六月初吉丁亥”間因插入“王在成周”就說“六月初吉丁亥”應屬二年、三年或其他什麼年，或以為整個元年王都沒離開成周。同樣，作冊折尊、刺鼎、高卣蓋、保員鼎四器銘是將記地或記事詞語插入月與日之間。這也不應該理解成月與干支日間不連屬，道理很簡單，如果作器者在前面記事僅用月，而在同一篇銘文中，後面記事又僅用干支日，這是很不好理解的。一般金文

記不同的月日和事，是會有交代的。如：

作册矢令方彝（集成 9901）

惟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矢告於周公官，公令出同卿事寮。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自于成周……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官。乙酉，用牲于康官，咸既，用牲于王……

此器銘把每個不同的時日都作了交代，絕不含糊其辭，其中“十月月吉癸未”一句尤應注意，作器者對癸未日不稱“初吉”而稱“月吉”，顯然是將其看作十月之內的一個吉日，這對我們理解西周金文中的“初吉”是有啓發的。

上述五器說明，在年與月之間或月與干支日之間插入記事詞語，並不改變其連屬性，應該看到這是金文的一種習慣語式。這種在記時詞語中插入記事詞語不改變連屬性的語式，也反映在應侯見工鐘、免卣、班簋、鄧簋、師族簋五器銘中，與前五器銘不同的只是記事詞語插入的位置略有不同而已。一般地說，如年、月、月相與干支日不連屬，銘文本身會有所交代。如：

庚嬴鼎（集成 2748）

惟二十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王格瑯宮，衣事。丁巳，王蔑庚嬴曆，賜……

段簋（集成 4208）

惟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在畢烝。戊辰，曾……

庚嬴鼎記在己酉日王到瑯宮衣事。八天後的丁巳日，王賞賜庚嬴。《段簋》記在十四年十一月的丁卯日，王在畢地行烝祭。第二天戊辰日又行曾祭。兩個不同的干支日作兩件事情，區分得很清楚。在西周金文中，更多的是將記事詞語放在記時詞語之後來敘述，如：

走簋（集成 4244）

惟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在周。格大室，即位……

此簋（集成 4303）

惟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夷官。旦，王格大室……

寰簋（集成 1017）

惟二十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官。旦，王格大室，即位……

大簋（集成 4165）

惟六月初吉丁巳，王在鄭。蔑大曆，賜芻羊剛……

師簠簋（集成 4324）

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即位……

諫簋（集成 4285）

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師泉官。旦，王格大室，即位……

師俞簋蓋（集成 4277）

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師象官。旦，王格大室，即位……

伊簋（集成 4287）

惟王二十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在周康宮。旦，王格穆大室，即位……

蔡簋（集成 4340）

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在減居。旦，王格廟，即位……

趯鼎（集成 2815）

惟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王在周康昭宮。格于大室，即位……

微繼鼎（集成 2790）

惟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

趯觶（集成 6516）

惟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格大室……

諸如此類的銘文很多，不贅述。這些都是將記事詞語正常地置於記時詞語之後敘述，試將上述諸銘中緊接記時詞語的“王在周”、“王在鄭”等插入記時詞語中，也會構成如靜簋、免卣、班簋等的那種句式。這種分句倒置的句式，與金文中習見的主語、賓語倒置的句式一樣，屬於變異的語法現象，不應作機械的理解。

綜上所述，西周金文在記時詞語中插入記事詞語，並不影響記時詞語的連屬性。因此，將靜簋之“丁卯”人為地劃入七月是“添字解經”，是不能成立的，仍應視其為連屬“六月初吉”。

## 二 靜簋兩“初吉”間是否可以間隔一年？

何幼琦先生在其《西周年代學論叢》一書“下編”著有《論初吉》一文，該文認為靜簋兩“初吉”間隔一年，其根據是他自編的《正朔表》（《西周諸王逐年正月朔日日辰表》），他在該表厲王七年和八年分別找到一個合適的日子，於是就說：“這位靜可能即太子靜，就是後來的宣王，可以作為時代的內證。”

首先，何先生的《正朔表》還很難說是一個準確的標尺，比如該表考定穆王在位十四年，而新發現的《鮮簋》（集成 10166）却記穆王有三十四年。該簋銘云：“惟王三十又四祀，惟五月既望戊午，王在葦京，禘於昭王……”該簋形制花紋是典型穆王時期風格，字體也與穆王時期諸器相似，銘文中又提到“禘於昭王”，因而大家公認此器為穆王時所作。其中“三十又四祀”起碼應是穆王在位年數的下限。何先生的《正朔表》恐怕穆王及此後諸王都得重新修訂。



其次，靜簋形制、紋飾都有穆王時代典型特徵，銘文風格又與《長由盃》、《遁簋》等穆王標準器相似，稍具青銅器常識的人也不會將其安排到厲王時代。靜簋銘文並不難理解，“司射”一職在《儀禮》的《鄉射禮》和《大射儀》中都有記載，他在射禮中的身份是教官，腰裏別着一根教鞭，對失禮者有權執“撲刑”，行禮前由他“誘射”，即作示範。銘中記六月份王命靜司射後，他在學宮中對小子、服、小臣、夷僕等進行訓練。八月份在王舉行的大射儀中，他訓練的小子、小臣等表現很好，王誇獎他“靜學（教）無斁”，受到獎賞。銘文內容是連貫的，人爲的在兩“初吉”間隔出一年，也是“添字解經”，是不能成立的。

### 三 靜簋是否孤證？

有的先生不理解我爲什麼只對靜簋特別重視，也有的先生指出靜簋是孤證。

我國西周時代的曆律和年代研究的還很不够，諸如西周曆法中的曆元、置閏、節氣及西周紀年的始年、積年、諸王年等還沒搞得很清楚，在有許多未知因素的情況下制定的西周曆譜和曆表，都帶有探索的性質，尚不能作爲討論問題的原理來使用。試諸西周金文，總有若干銘文不能入譜，正說明其方法還不够嚴密，而不是銘文寫錯了。我認爲在目前階段，比較可行的是先找出若干能說明問題的金文資料，資料須能迴避目前尚未搞清的紀年和曆律問題，然後由已知去推測未知，也許能切實解決幾個問題。在西周金文中，一件銘文記有兩個對應月日的僅有作冊魑卣（集成 5432）、召卣（集成 2838）和靜簋三件器銘，前兩器所記爲“既望”和“既生霸”，只有靜簋記有兩個“初吉”，而且相距不到三個月，沒有曆律和年代等未知因素干擾，是西周金文中最能說明“初吉”性質的珍貴資料，這就是我爲什麼特別重視靜簋的原因。雖然如此，靜簋却並非孤證，現再舉出兩件器銘來說明：

元年師兑簋（集成 4274；4275）

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廟，即位。同仲佑師兑入門立中廷。

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兑，疋師和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賜女乃祖市、五黃、赤鳶……”

三年師兑簋（集成 4318；4319）

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大廟，即位。隆伯佑師兑入門立中廷。

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兑，余既命女疋師和父司左右走馬，今余惟申京乃命，命女翬司走馬。賜女秬鬯一卣。金車、朱虢弘靳、虎冪熏里、右軛、畫轉、畫輶、金甬。馬四匹、攸勒……”

三年師兑簋講，我既任命女協助師和父管理左右走馬（指元年師兑簋的任命），今天我重申前命並增高對你的任命，命你總管理走馬。由這段話看，兩器作於同一王世，前後相距僅二十一個月，基本上可排除曆律和年代諸不定因素的干擾，按大小月順排下來，兩“初吉”的干支相距十四天。兩銘文分鑄簋蓋、底七處（元年師兑簋其一之蓋疑偽），銘文一致，器體形制花紋亦相同，沒有理由不承認這個現實。在這裏，“定點說”、“四分說”、“周法說”、“初干吉日”說都無法解釋得通，只好說“初吉”僅是某月中的一個吉日而已。靜簋兩“初吉”的干支相距二十五日，元年師兑簋中的“初吉”距三年師兑簋中的“初吉”十四日，這說明在證明“初吉”非月相亦非初干吉日這一點上，靜簋並非孤證。“初吉”既非月相亦非“初干吉日”，它到底是什麼呢？作冊矢令方彝“惟十月月吉癸未”句給我們以啓發，銘文說“癸未日”是十月中的一個“月吉日”，這說明在西周時代每個月都可能有若干“月吉日”，“初吉”自然就該是每月最初出現的那個“月吉日”。這種每月第一個出現的“月吉日”可能是曆書上事先安排好的，也可能是臨時用占卜等方法確定的，但無論如何，從後人看來，它可能出現在每月的任何一日。

近一年來，大家對新出子犯編鐘進行了討論，該編鐘首句為“惟王五月初吉丁未”，張光遠先生、李學勤先生起初都認為是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三二年）城濮之戰之“五月丁未”。但又覺得所斷干支日與“初吉”傳統說法不合。裘錫圭先生依此鐘銘認為“初吉”應為黃盛璋先生所主張的“初干吉日”。李先生後改從張聞玉先生的看法。張聞玉先生持定點說，認為編鐘銘之月日應連下讀，乃指“重耳去齊復國”一事，是公元前六三九年的五月初吉丁未。其根據仍然是對“初吉”的推算。他說：“可以看出，子犯和鐘的五月初吉丁未，與獻俘於王的五月十一日丁未並無任何瓜葛，如果強行勘合，初吉不僅是王靜安先生的七天八天，而居然可以管到十一天了，絕無此理。”<sup>③</sup>

張先生仍未能跳出“初吉”為月相的成說來看待鐘銘。若說西周金文中的“初吉”是否月相還有討論的價值的話，那麼春秋以後金文中的“初吉”是否月相，我認為已沒有多少討論的必要了。大家知道，進入春秋以後，作為月相的“既生霸”、“既死霸”、“既望”在金文中基本消失。我統計，春秋以後的119件記時銘文中，僅有《胃公湯鼎》（《集成》2714·二七一四）“惟王八月既望”、《吳王光鑑》（集成10298）“惟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二件春秋早期器上還殘存有月相的痕跡外，其餘116件器銘中，有107件記的都是“初吉”，另有7件記“吉日”，3件記“元日”，可以看出此一時期的“初吉”與“吉日”、“元日”含義是相同的。因為如果仍堅持此時的“初吉”必在月初的某日或某幾日的話，那豈不是說，進入春秋以後，各國鑄造銅器或舉辦大事祇在月初進行，這是無法講得通的。子犯編鐘所記月日指的是那個歷史事件或以

爲是鑄器時日，都可以繼續討論，但不必去與“初吉”的傳統說法套合了，因爲“初吉”不過是一個吉日而已，它可以是某月中的任何一日。

### 註 釋

① 《金文“初吉”辨析》有“六月到八月僅有兩月，因此無論連大月、年中置閏等那種情況出現，都無法改變我們的結論”一句，應將“年中置閏”改爲“連小月”。有先生指出該銘如出現閏六月或閏七日，則兩“初吉”皆可出現於月初，這個批評是對的。

② 見劉啓益：《再談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與銅器斷代》（古文字年會論文）。

③ 張光遠：《春秋晉國子犯和鐘淺說》（《故宮文物月刊》十四卷二期）。

李學勤：《補論子犯編鐘》（《中國文物報》1995.5.28）、《子犯編鐘續談》（《中國文物報》1996.1.7）。

裘錫圭：《也談子犯編鐘》（《故宮文物月刊》十三卷五期）。

張聞玉：《子犯和鐘“五月初吉丁未”解》（《中國文物報》1996.1.7）《再談子犯和鐘曆日》（《中國文物報》1996.6.2）。

（原載《中國文物報》1997年4月20日第3版）

## 殷周金文中的閏月

我在《文物》1982年11期上發表了《金文初吉辨析》一文，指出在金文中“初吉”一詞不是月相辭語，主要根據是靜簋銘文記錄六月初吉是丁卯日，八月初吉是庚寅日，兩初吉日相距54天，其一必在月末的幾天，因而否定了傳統上認為初吉日必出在月初的結論。但是也有的先生認為，若六至八月間夾一個閏七月，則仍可能出現兩初吉皆在月初的情形。靜簋是穆王時代的銅器，在那個時代的曆法中閏月是如何安排的？是否有可能出現閏七月？帶着這個問題，我檢索了殷周金文資料，對殷周時代的置閏規律作了初步考察，在十年前寫成此文，今天我願公開這篇文章中的觀點，以求得諸位方家的批評指正。

### 一 殷代的閏法

前輩學者董作賓、陳夢家以甲骨文材料研究殷代曆法，得出結論是：殷代前期實行的是年終置閏，閏月稱十三月或十月又三，他們又指出殷晚期甲骨文中沒發現十三月，通過所排商王征人方曆表，發現同年九月、十月皆有甲午日，這樣兩月中必有其一為31天，他們認為這在實行陰陽曆的殷代曆法中是不可能的，斷定該年必有閏九月。由此說明殷代晚期實行的是年中置閏。其實，只要殷代仍處於以觀測新月為月始的階段，出現31天的大月就不能完全排除。同時，二位先生忽略了在晚殷金文中有十三月的記載。

如《博古圖》20.23 著錄的周文姬匜：

丙寅，子賜癸貝，

𠄎

用作文嬖己寶

彝。在十月又三。

（器銘）

（蓋銘）

該器實際上是一件兕觥，蓋作帶角獸頭，器身飾細雷紋一道，鑒亦有帶角獸頭。原銘

缺作器者，容庚先生以癸亥補之（見《宋代金文著錄表》）。此器形制紋飾皆為典型殷末作風。<sup>①</sup>銘文稱“在十月又三”，與殷墟五期卜辭“在十月又一”、“在十月又二”稱月法相同（見《甲骨文合集》37964～37985）。而與西周金文稱“十又一月”、“十又二月”、“十又三月”者截然不同。到目前為止，稱十月後的月份，殷周各有不同，故此稱月法可作區分商周銅器的斷代標誌之一。癸兕觥銘證明殷末有十三月記載，存在年終置閏。

又比如《三代》8.33 著錄的小子罍簋：

癸巳，𠄎賞小子□貝  
十朋，在□自。惟𠄎令  
伐人方罍。□□用  
作文父丁尊彝。  
在十月四。

該器銘記有殷末伐人方事、是殷代晚期器。對銘末之“在十月四”一句，過去學者往往釋為“在十月𠄎”或“在十月𠄎日”。<sup>②</sup>按卜辭通例，𠄎、𠄎、羽是祀季名，只能置於“祀”後，不能置於“月”後，如：

銘 文	著 錄
在九月，惟王六祀，𠄎日	（甲 3939）
惟王七祀，𠄎日	（前 2，22，2）
在十月二，惟王十祀，𠄎	（庫 1672）
在五月，惟王六祀，𠄎日	（佚 518）
在十月，惟王三祀，𠄎日	（骨之文化圖 1）

殷金文與卜辭同，如：

器 名	銘 文	著 錄
六祀卣其卣：	惟王六祀，羽日	（錄遺 273）
四祀卣其卣：	惟王四祀，羽日	（錄遺 275）
豐簋	惟王六祀，𠄎日	（考古圖 4，29）
小臣邑罍	惟王六祀，𠄎日，在四月	（三代 13，53）
𠄎卣其卣：	在九月，惟王十祀，𠄎日	（考古圖 4，5）
戌鈴方彝	在九月，惟王十祀，𠄎日五	（博古圖 8，15）
肆簋	在十月一，惟王廿祀，𠄎日	（三代 6，52）
宰桴角	在六月，惟王廿祀，羽又五	（三代 16，48）
小臣俞尊	惟王十祀又五，𠄎日	（三代 11，34）

到目前爲止，尚未發現將祀季名置於月後的例證。因此，小子罍簋銘末“在十月”後之字只能是“四”不可能是“彡”或“彡日”。這說明晚殷不僅有年終置閏，還有年終再閏的存在。

所以，從目前發現的古文字資料看，殷代晚期並沒有實行年中置閏，整個殷代很可能都實行的是年終置閏。

## 二 西周早期的閏法

西周早期曆法置閏與殷代同，也是年終置閏，閏月則一律稱“十又三月”。而決不稱“十月又三”。如：

器 名	銘 文	著 錄
中方鼎	惟十又三月庚寅	(博古圖 2, 19)
受尊	惟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	(三代 11, 36)
遣卣	惟十又三月辛卯	(三代 11, 35)

上述三器時代定爲西周早期，各家意見一致。郭沫若云：“十又三月，閏月也。古者閏月置於歲終，故有閏之年有十三月，卜辭已習見，周人沿襲殷制而已。”（見《兩周金文辭大系》遣尊考）。陳夢家云：“十三月亦見於成王時的小臣靜卣<sup>③</sup>，是置閏月於年終，其制同於殷代前期曆法。”（見《西周銅器斷代》2.115）西周早期曆法與殷曆當有許多不同，但其置閏却與殷代相同，也實行年終置閏，這一點已爲古文字材料所肯定。

## 三 周曆中閏月的稱呼

年終置閏稱“十月三”或“十又三月”，因其記月數已多出十二月，很容易與常月相區別，閏月無須再加特殊標識字。而年中某月爲閏月，如月前無特殊標識字，則很容易與其同名月份相混淆，按常理推論，月前應加特殊標識字，以示區別。在兩周金文中，月前所加標識字一般爲“王”或“正”兩字。“王某月”自然是指“周王曆法中之某月”（下面還將專門論及），“正某月”各家說法不一，下面將兩周金文中稱“正某月”的銅器列表如下：



器 名	銘 文	時 代	著 錄
應侯見工鐘	惟正二月	西周中晚期	文物 1975, 10
竈乎簋	惟正二月	西周晚期	文物 1972, 2
呂服余盤	惟正二月	西周晚期	文物 1986, 4
上都公攸人簋蓋	惟都正二月	春秋前期	《三代》8, 47
都公攸人鐘	惟都正四月	春秋前期	《三代》1, 10
上都府簋	惟正六月	春秋前期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95 頁
申公彭宇簋	惟正十又一月	春秋前期	《中原文物》1982, 1
寬兒鼎	惟正八月	春秋後期	《三代》4, 13
余購遽兒鐘	惟正九月	春秋後期	《三代》1, 50
子璋鐘	惟正十月	春秋後期	《三代》1, 27 ~ 31
蔡侯鬬鐘	惟正五月	春秋後期	考古學報 1956, 2
□子季□盒	惟正九月	春秋後期	《綴遺》28, 5
□可忌豆	惟王正九月	戰國早期	考古 1990, 11
陳侯因育敦	惟正六月	戰國早期	《三代》9, 17

對上述各器“正某月”之“正”字，歷來都認為是“周正”、“王正”之省。清末學者方濬益在考釋□子季□盒時說：“今按漢書郊祀志注曰：正，正朔也。此作器者為周人，自是用周正之朔，言此為周正九月，所以別於夏正、商正歟”（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 28.6）。陳夢家在考釋蔡侯鬬鐘時說：“正五月可能是王正五月之省，即周正五月。春秋都公攸人簋有都正二月，所以別於王正、周正。春秋之邾公華鐘、叔夷罇、齊大宰盤、晉姜鼎等有王某月。春秋末戰國初之子璋鐘，寬兒鼎、鑑兒鐘、陳侯因育敦等有正某月，正某月可能是王某月。”（壽縣蔡侯墓銅器《考古學報》1956, 2, p95）馬承源在考釋上都公攸人簋蓋時說：“正指法制，也通政，古代曆法由曆官頒佈，具有法制性質。西周有頒朔制度。在這個意義上，金文中的正某月，也可以說是官曆的某月。”（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4, 419）。黃然偉說：“正有善意。《儀禮·士喪禮》‘決用正’注云：‘正猶善也’。故銘文之惟正六月即吉善之六月也。”（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

上述說法都很難解釋為什麼西周僅有三件器上記有“正某月”，且恰恰都是“正二月”，春秋、戰國器上也不過十餘件記有“正某月”這一現象。西周中期以後有一部分銅器銘文中記有“王某月”。如：惟王正月（魯伯貳簋、鬲簋）惟王二月（豆閉簋、貯子匜），惟王三月（即簋）惟王五月（錫叔簋、南宮柳鼎），惟王八月（伯晨鼎），惟王九月（利鼎、揚簋、輔師簋簋），惟王十月（曾伯從龍鼎）惟王十又一月（卯簋）等，進入春秋以後，則多數記月銘文稱“王某月”，有數十件之多，僅徐、鄭、戴、宋

等少數幾國沒發現稱“王某月”者。這說明在兩周時期通行周曆，西周中晚期開始，有其他曆法流行，故行周曆時有時需加“王某月”來特別標明。春秋以後，各國在通行周曆的同時，一些國家制定了自已的曆法，如都公平侯鼎稱“惟都八月”，鄧伯氏鼎“惟鄧八月”，鄧公簋蓋“惟鄧九月”等，就更有必要特別標明周曆的某月了。標識方法一律稱“王某月”。“王”即是“周王”，故稱“王某月”自然是講周曆的某月。我想既然已有了“王某月”來指示“周曆的某月”，那就不太可能再用“正某月”也來標識周曆的某月了。對“正某月”的含義陳夢家在考釋蔡侯鬲鐘時，除了提出“周正”、“王正”之省的說法外，還作了另一種推測，他說：“此正五月亦可能是所以別於同年的閏五月的。”高鴻縉發揮了陳先生這一看法，他說：“正者，頂也、首也、頭也。正某月者，頭某月也。故正九月之後必有閏九月，正六月之後必有閏六月。”（師大學報四期，轉引自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41頁註五）。這就接近於弄清“正某月”的含義了。我推測金文中的“正某月”，實際上就應該是指後世的“閏某月”，道理很簡單，只有閏月纔需要特別加以標識，因為它異於常月，加以標識後，可避免與不閏的同名月混淆。而閏月前後的月份是常月，沒必要加特別標識。

作後世“閏月”講的“閏”字是後起字，甲骨文金文中不見此字，戰國以前的其他古文字資料中也未見此字。古文獻中《詩經》未見此字，《春秋》中有兩處提到此字，其一在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其二在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魯史記至哀公當然出自戰國人之手，即文公一條也不能排除是戰國文字竄入者。《尚書·堯典》有“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一句。《堯典》為戰國人所作，自然也是戰國人用當時的語言講古代的事情。最早使用閏字當推《左傳》，共發現十二條之多，但《左傳》也是戰國人作的。從以上幾種材料可以看出，戰國以前的文獻中沒出現“閏”字。

出土古文字資料中最早記有閏字的是長沙子彈庫帛書，其時已至戰國晚期，共出現兩處：

第一，……是逆月，閏之勿行。

第二，……神則閏四……。

其一是說某月為逆月，如恰逢此月為閏月，要人為地改變，不能行閏月。其二前後有缺文，意義不明。雲夢睡虎地出土竹簡有一條魏律簡，記有“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的句子。該簡出於11號墓，年代為秦始皇三十年，其中閏字應作閏月講。這些材料說明，在戰國中晚期以後纔出現作閏月講的閏字，那麼戰國早期、春秋、西周的周曆中閏月用什麼字表示呢？我想很可能是用“正”字。《說文》“正，是也。”“正”有“是正”、“正之”的意義。《尚書·盤庚》：“盤庚教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正法度”、“正厥位”皆有“是正”之意。曆法中設置閏月是為了“是正”由月餘造成的節候不正，糾正太陰曆與太陽曆

間的誤差。此“正”字應讀爲糾正之“正”，與歲首月稱正月，讀如“征”有別。用“正某月”表示“閏某月”是有可能的。

#### 四 西周中晚期的閏法

西周中晚期周曆的置閏方法，在金文中反映得比較複雜，一方面有年終置閏的記載，如：

器 名	銘 文	時 代	著 錄
小臣靜卣	惟十又三月	西周中期	《斷代》3, 83
牧簋	惟王七年十又三月	西周中期	《考古圖》3, 24
雍公誠鼎	惟十又四月	西周晚期	《博古圖》2, 23

此表中的靜卣、牧簋爲西周中期器，雍公鼎是西周晚期器，銘文有年終置閏和年終再閏的記載<sup>④</sup>。另一方面，又有閏二月的記載，西周金文“閏某月”稱“正某月”已如上述。如本書188頁表中的應侯見工鐘、匱乎簋、呂服余盤，在西周金文中僅發現這三件器銘記有閏月，且都閏二月。說明此時曆法中除有年終置閏外，尚有二月置閏作補充。這使我們想起一條民族學材料：雲南岳宋佧族的頭人在每年二月份到江邊看魚上水了没有，或者到郊外看一塊大石頭上野蜂是否已經聚集，如果魚没有上水，野蜂遲遲不來，就增加一個二月，稱之爲“怪月”。（引自鄭文光《天文學源流》64頁）這是在陰陽合曆初始階段，根據物候觀察，用在某年年中某固定月份設置閏月的辦法來調整太陰年與四時變化間的誤差。西周中晚期的周曆，肯定早已脫離根據物候觀察置閏的低級階段，但此時曆法一定是僅靠年終置閏無法完全調整好太陰年與四時變化的矛盾，只好另設閏二月來調整，此時曆法的閏法呈過渡狀態。只有當人們發現了“無中氣置閏法”後，纔能安排好閏月，但那需要人們對二十八宿天象具備較清楚的認識，從總體情況看，這在西周中晚期尚不可能。

#### 五 春秋時期的閏法

前代學者根據分析文獻材料，得出“春秋時期没有統一曆法”的結論。如清代王韜著有《周不頒朔列國之曆各異說》：“周既東遷，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頒曆，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日日常有參差。”（見《春秋曆學三種》下卷《春秋曆雜考》）他的這

個意見被近現代許多研究天文學史的人所接受。但是，這個意見却與春秋金文所記錄的實際情況相左。如吳王光鑑、臧孫鐘、姑馮勾鑄、蔡侯鑄、蔡大史錡、許公買簠、黃大子伯克盤、楚王領鐘、楚羸匱、曾伯雋簠、邾公慆鐘、邾公華鐘、邾叔止伯鐘、邾公孫班鑄、齊大宰歸父盤、鞫鑄、叔夷鑄、晉姜鼎、晉公雒簠、郕鐘、郕孝子鼎、寬兒鼎、虢叔簠、伯盞盤、江叔孫師父壺等器上都記有“唯王×月”，這裏包括了春秋時期吳、越、蔡、許、黃、楚、曾、邾、齊、晉、郕、蘇、虢、江等14國的稱月銘文，春秋時各國多未稱王，故此“王某月”即應指天下共主“周王”之某月，這說明春秋時各國皆行周王之曆。當然這不排除各國並行各自的曆法，就像我國現在並行公曆與農曆一樣。但在正式的場合，皆需奉王室正朔行用周曆，如上述春秋金文所反映的那樣。王韜指出《春秋》經傳中曆法記錄混亂，說明春秋時代各國曆法不同，這是對的。但他說“天子未必頒曆”根據金文材料看則不能成立。春秋時期五霸尚需“挾天子以令諸侯”，盡管王室微弱不堪，但其虛架子還是存在的，很可能周王“頒朔之禮”不廢，《周曆》仍是各國統一的曆法。

本書188頁表中，上都公狄人簠蓋，都公狄人鐘、上都府簠、申公彭宇簠四件記有“正某月”的器為春秋前期器。可證明此時期周曆與都曆都有年中置閏的存在。寬兒鼎、余賁逯兒鐘、子璋鐘、蔡侯觶鐘、□子季□簠是春秋後期器，陳侯因脊敦、□可忌豆為戰國早期器，說明春秋後期及戰國早期在周曆中也是實行年中置閏。總之，進入春秋以後，金文中再沒發現十三月的記載，說明在春秋時期年中置閏的閏法已固定下來。此時的閏法是否“無中氣置閏”呢？按一般理解，無中置閏法的出現應在人們對二十八宿體系有了較充分認識之後。這就牽涉到二十八宿體系在我國創立的時代問題，日人能田忠亮根據《禮記·月令》天象紀事的觀測年代推算出我國二十八宿體系應創立於春秋時代。夏鼐先生也認為“二十八宿體系在中國創立的年代。就文獻記載而言，最早是戰國中期，但可以根據天文現象推算到公元前八至六世紀（620±100B.C）（見《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考古學報1967年第2期）。出土星圖記有二十八宿體系者，最早應推曾侯乙墓漆箱蓋上的星圖，那是一幅完整的二十八宿位置草圖。該墓時代為戰國初年，從草圖普及程度看，已脫離初創階段，依此完全可以把二十八宿體系上推到春秋時代。這裏二十八宿體系在我國創立的時代和金文中反映的年終置閏完全消失、年中置閏記載增多的時代都在春秋時代，所以我們說周曆的閏法從春秋時代開始，已進步到“無中置閏”，這是有可能的。

秦統一中國後直至漢武帝太初改曆為止，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顓頊曆，史書已有明文記載。這是與周曆不同的曆法，其置閏也與周曆不同，它以十月為歲首，實行年終置閏，閏月稱“後九月”，這已被新出雲夢睡虎地秦簡和山東臨沂漢簡所證實，因其材料已超出金文範圍，這裏就不詳加討論了。

通過分析殷周金文材料，對殷周時代曆法中閏法的認識，可歸納為如下幾點：

第一，殷代晚期曆法中實行的仍然是年終置閏，閏月稱“十月又三”，年終再閏稱“十月四”，可能整個殷代實行的都是年終置閏。

第二，西周早期實行的也是年終置閏，閏月稱“十又三月”。

第三，西周中晚期有年終置閏的記載，稱“十又三月”，再閏稱“十又四月”。同時也有“正二月”的記載。金文中“正某月”就是“閏某月”，“閏二月”是一種年中固定置閏法，但不是“無中置閏”，此期周曆閏法呈過渡狀態。靜簋是穆王時器，這一時期的曆法中，在六月至八月間不可能出現閏七月，因此它仍然是“初吉月相說”難以逾越的障礙。

第四，春秋時期各國仍通行周曆，廢止了年終置閏法，閏月一律安排在年中，稱“閏某月”為“正某月”，有可能此時期已實行“無中氣置閏法”。

## 註 釋

- ① 黃然偉先生認為此兕觥為周初器，見其所著《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29頁，我認為該器形制紋飾以及銘文的遣辭用語風格都是殷代作風，而且稱十三月為“在十月又三”，這在西周是決不可能的，因此本文不擬採納黃先生的意見。
- ② 見陳夢家《卜辭綜述》304頁；赤塚忠《中國古代的宗教和文化·殷金文考釋》679頁；晏琬《北京遼寧出土銅器與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5月；沈之渝《介紹一片伐人方的卜辭》《考古》1974年4月等。
- ③ 陳先生對小臣靜卣斷代嫌偏早，多數學者認為靜組器應定在穆王時代。
- ④ 郭沫若認為雍公鼎“十又四月當是十又三月之僞，下筆過短，蓋是鏤紋”。後又說：“頗疑‘十又’二字是都字殘劃誤摹。”（《兩周金文辭大係》考176）我認為《考古圖》《博古圖》《嘯堂集古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幾部宋人書都收錄了此鼎，字劃一致，十分清晰，說其“誤摹”、“字僞”都是沒有根據的，應當承認當時曆法中確有年終再閏存在。

（原載《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3~203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編輯，1993年10月）

## 金文饗祭的斷代意義

### 一

金文成為史料之關鍵在於明確其時代，近代學者在金文斷代方面取得兩項突出成果，其一是王國維提出的“時王生稱說”，王氏在考釋適簋時指出：“此敦稱穆王者三，余謂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滿也。何以生稱穆王？曰：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謚也。”<sup>①</sup>按此原則，有一批銅器的時代得以明確：

利簋

珙征商，惟甲子朝。

獻侯鼎

惟成王大祿在宗周。

長由盃

穆王在下減。

趙曹鼎

龔王在周新宮。

匡卣

懿王在射廬。<sup>②</sup>

上述諸器分別作於武王、成王、穆王、恭王、懿王則成為多數學者的共識。郭沫若據此原則寫成《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推衍出“標準器斷代法”，即以時代明確之諸器為標準器，其他器按其類似特徵向“標準器”靠攏，將西周二百五十件器編成互相聯繫的系列。陳夢家又將此法加以完善，寫成《西周銅器斷代》，將考古學研究成果引入銅器斷代。由此，將原來分散的銘文資料加工成可以使用的珍貴史料。

唐蘭在六十年代提出“康宮原則”<sup>③</sup>，他認為“康宮”即“康王之廟”，凡記有



“康宮”的銅器應為康王身後之器。用此原則，他將過去郭沫若，陳夢家定在成王的一批銅器，如令尊、令方彝、令簋、鬯尊、鬯卣、遣尊、遣卣、中方鼎一、中方鼎二<sup>④</sup>等改定為昭王，與昭王南巡的記載相聯繫。又根據這一原則，提出康宮中有“夷宮”和“厲宮”，應為夷王、厲王之廟。因此，凡記有二宮之名者，亦應是夷、厲二王身後之器。鬲比鼎有“王在周康宮夷大室”，此鼎有“王在周康宮夷宮”句，二器應作於夷王後厲王時。克鐘有“王在周康宮刺宮”句，刺即厲，鐘銘應作於厲王後之宣王時<sup>⑤</sup>。他的這些分析，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與考古發掘器物相矛盾者，並不斷被新出土的銘文所肯定，因而他的“康宮原則”也逐漸為多數學者所贊同。這一原則可視為對“標準器斷代法”的補充，使之更趨精密，這是近代學者在金文斷代方法上取得的第二項突出成果。

## 二

在殷及西周金文中，記饗祭的銅器有如下七件：

### 戍嗣子鼎

王賞戍嗣子貝廿朋，在闡宰，用作父癸寶彝。惟王饗闡大室，在九月。

### 高卣蓋

惟十又二月，王初饗旁，惟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

### 臣辰盃

惟王大禽於宗周誕饗荃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命士上眾史寅殷於成周，替百姓豚眾賞卣鬯貝。

### 麥方尊

王命辟邢侯出坏，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見於宗周，亡尤。會王饗荃京，酹祀，雩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為大禮。王射大龔禽，侯乘于赤旗舟從。死咸時，王以侯內于寢，侯賜玄雕戈。雩王在啟，祀月，侯賜者嬖臣二百家，用王乘車馬金勒、門、衣、市、舄。

### 呂方鼎

在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饗於大室，呂誕於大室。王賜呂獸三卣，貝卅朋。

### 伯唐父鼎

乙卯、王饗荃京。王祿，辟舟臨舟龍。咸祿，伯唐父告備。王格，乘辟舟，臨祿白旗。用射絳、釐虎、貉、白鹿、白狼於辟池。咸祿，王蔑歷，賜秬鬯一卣，貝廿朋。對揚王休，用作□公寶尊彝。

## 沈子它簋

它曰：拜，稽首。敢丕昭告朕考，命乃齔沈子作純於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純，休同公克成綏考以于顯顯受命。烏乎！惟考肇念自先王先公乃妹克衣，告烈成功，獻考克淵克。乃沈子其靜懷多公能福。烏乎！乃沈子妹克蔑，見厭于公休。沈子肇敷玆貯，作茲簋。用飗鄉己公，用格多公。其孔哀，乃沈子它惟福，用永靈命，用綏公惟壽。它用懷佐我多弟子我孫，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sup>⑥</sup>

上述諸器中的饗字各大家都有考釋，然而尚未有滿意的結果。郭沫若考為“館”字，云：“由二器之詞旨與文字之結構以推之，當是古之館字。從食宛，宛亦聲也。”<sup>⑦</sup>陳夢家考為“居”。云：“疑為居字，字從宀從食，從彳得聲，後者《說文》以為即《詩》我姑酌彼金罍之姑”。<sup>⑧</sup>于省吾認為即甲骨文之智字。云：“甲骨文智祭同於周人饗祭，但不知其詳。”<sup>⑨</sup>唐蘭考為“裸”字。云：“當讀為裸。《說文》裸，灌祭也。《詩·文王》裸將於京，即饗葦京之事。《書·洛誥》王入太室裸，即饗於大室”。<sup>⑩</sup>

戊嗣子鼎出土於安陽後崗之圓坑葬中，一般認為是帝辛時銅器，銘記饗祭行於闡大室。闡為朝歌附近一都邑，殷王常在此地舉行大的祭禮。高卣蓋銘記饗祭行於“旁”，“旁”即“葦”。臣辰盃、麥方尊、伯唐父鼎皆云饗祭行於葦京。葦京是距豐鎬不遠處又一周都，內有辟雍大池、天室等宗廟建築，周王經常於此地舉行各種大的祭禮。<sup>⑪</sup>呂方鼎云饗祭於大室，據上述諸器內容推測，也可能饗祭於葦京之大室，蓋周王室之饗祭必於宗廟所在之葦京行之。

沈子它簋云“作純於周公宗”。純與饗音同字通，字意應是相同的。“周公宗”即周公旦之宗廟，沈子它之祖廟。“大室”是宗廟中的中心建築。因此，上述諸器所記饗禮都發生在宗廟或宗廟中之大室，饗禮應是周王室或貴族宗室祭祖禮祭名之一。郭、陳釋館釋居，都不能體現祭禮的內容，本文不擬採納。唐蘭釋裸，雖合於祭禮，但金文已有裸字，寫作𠂔，此字也釋為裸，則嫌重複。于省吾以甲骨文智字釋之，但又“不知其詳”，其說也難於利用。

細心揣摩沈子它簋銘，知其為代新死之父（考）向宗廟中諸先公（多公）所作禱辭。沈子它是周公旦之後人，接受實考之冥命，作純（饗）祭於周公宗廟。陟者，昇也。“陟二公”，即將曾祖、祖父二公（即下文的“己公”“同公”）之神主按昭穆遞昇一級，以使實考的新主祔入宗廟。因此，須沈子它代實考向諸先公禱告此事。禱辭中沈子它稱“不敢不純”，因為休同公（指其祖父）曾使實考“於顯顯受命”。沈子它在禱辭中兩次感慨：第一次說，我死去的父考深深地懷念先公先王克殷的偉大功烈，我沈子它也靜享先公大福。第二次說，我沈子它不被先公嫌棄，得到勉勵和休美。因此，我盡搜積蓄作這個簋，用給死去的曾祖己公饌食享用，用致諸先公來一同享用。因為我貢獻了哀思，一定會得到諸先公給予的福分、長命、年壽。沈子它並祈禱其多弟子及孫輩

能以它為榜樣，教導他們的後代。

這很像是一篇虞禮中的致祭之辭。《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儀禮·士虞禮》云：“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濟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又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尚饗。”《釋名·釋喪制》：“又祭曰祔，祭於祖廟，以後死孫祔於祖也。”《儀禮》雖為士禮，然所述多合古制，《士虞禮》這段記載對我們理解沈子它簋的內容是有啟發的。

據沈子它簋的內容，饗祭乃是新死之父祔入宗廟的祭禮。因其是生死大典，故在戊嗣子鼎、臣辰盃等器中用為“大事記年”。高卣蓋、麥方尊、呂方鼎、伯唐父鼎、沈子它簋諸器皆不標年份，蓋在當時人看來，記此等大典即等於記年，無須再贅記年份。

如上述分析能够成立，那就說明王室饗祭必行於父王去世新王繼位之時，即應是新王元年之時。這就找到一個新的銅器斷代手段，即凡記饗祭之器應為某王元年之器。如能綜合其他條件將某器王世確定，則可得到一批新的標準器。如戊嗣子鼎可能作於帝辛元年九月丙午日，高卣蓋可能作於康王元年十二月庚申日，臣辰盃可能作於昭王元年五月既望辛酉日，麥方尊可能作於昭王元年二月，呂方鼎可能作於穆王元年五月既死霸壬戌日，伯唐父鼎可能作於穆王元年某月的乙卯日等。目前收集到的年、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俱全的銅器，西周早期的較少，如此說得以成立，則可以彌補這個不足。

### 三

根據上述“時王生稱”、“康宮原則”、“饗祭元年”諸原則，並參照形制花紋以及各家的考釋意見，現試排列西周記年銅器如下表：

表一

成王	何尊 5			
康王	高卣蓋 1	庚嬴鼎 22	大孟鼎 23	小孟鼎 25
昭王	臣辰盃 1	麥方尊 1	作冊折尊 19	作冊寰卣 19
穆王	呂方鼎 1	伯唐父鼎 1	鮮簋 34	
恭王	卻卣簋 1	作冊吳方彝 2	趯觶 2	裘衛盃 3
	衛鼎一 5	趙曹鼎一 7	師卣鼎 8	衛鼎二 9
	走簋 12	永孟 12	師望簋 13	段簋 14

續表

	趙曹鼎二 15	走馬休盤 20	裘衛簠 27	虎簠 30
懿王	師虎簠 1	王臣簠 2	師俞簠蓋 3	師晨鼎 3
	師遽簠蓋 3	癸鼎 3	癸壺一 3	癸盃 4
	諫簠 5	卣伯簠 9	癸壺二 13	
孝王	蔡簠 1	召鼎 1	達盃蓋 3	牧簠 7
	魯方彝 8	大師盧簠 12		
夷王	師旋簠一 1	鄭簠 2	柞鐘 3	頌鼎 3
	史頌鼎 3	散季簠 4	散伯車父鼎 4	師旋簠二 5
厲王	逆鐘 1	師兌簠一 1	叔專父盃 1	師穎簠 1
	師兌簠二 3	猷鐘 5	師簠簠 11	猷簠 12
	大簠蓋一 12	無異簠 13	大鼎 15	大簠蓋二 15
	駒父盃蓋 18	趨鼎 19		
共和	師猷簠 1			
宣王	師酉簠 1	師詢簠 1	虢姜簠 4	兮甲盤 5
	琯生簠一 5	琯生簠二 6	史伯碩父鼎 6	
	虢季子白盤 12	伯克壺 16	克鐘 16	詢簠 17
	此鼎 17	善夫克盃 18	小克鼎 23	微盃鼎 23
	閑碩鼎 24	鬲比盃 25	番羽生壺 26	伊簠 27
	寰盤 28	鬲比鼎 32	晉侯猷鐘 33	
	伯窺父簠 33	善夫山鼎 37 <sup>②</sup>		

據上述九十二件西周紀年銅器，可列出西周各王最低金文年數，如成王五年、康王二十五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三十四年、恭王三十年、懿王十三年、孝王十二年、夷王五年、厲王十九年、共和一年、宣王三十七年等，這些最低金文王年是一個正確的《西周王年表》應該認真參考的。

現再將上表中年、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俱全的銅器（我認為“初吉”不是月相，此處只是為了統計的方便）單獨列出如下：

表二

康王	庚嬴鼎	惟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小孟鼎	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
		惟王廿又五祀
昭王	臣辰盃	惟王大龠於宗周誕饗莽京年，
		在五月既望辛酉
穆王	呂方鼎	惟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
		王饗口大室

續表

穆王	鮮簋	惟王卅又四祀，惟五月既望戊午
恭王	吳方彝	惟二月初吉丁亥
		惟王二祀
	趯觶	惟三月初吉乙卯
		惟王二祀
	裘衛盃	惟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
	衛鼎一	惟正月初吉庚戌
		惟王五祀
	衛鼎二	惟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
	走簋	惟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
	師望簋	惟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
	趙曹鼎	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走馬休盤	惟廿年正月既望甲戌
	裘衛簋	惟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
	虎簋	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
懿王	師虎簋	惟元年六月既望甲戌
	王臣簋	惟二年三月初吉庚寅
	師俞簋蓋	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師晨鼎	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師遽簋	惟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
	癸盃	惟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
	諫簋	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
	癸壺	惟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
孝王	召鼎	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
		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
	達盃蓋	惟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
	牧簋	惟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
	魯方彝	惟八年十又二月初吉丁亥
	大師盧簋	正月既望甲午
		惟十又二年
夷王	師旅簋一	惟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滅应，甲寅
	鄭簋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

續表

夷王	柞鐘	惟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
	頌鼎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散季簋	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散伯車父鼎	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師族簋二	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
厲王	逆鐘	惟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
	師兑簋一	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
	叔專父盨	惟王元年，王在成周，六月初吉丁亥
	師穎簋	惟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
	師兑簋二	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
	師釐簋	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大簋蓋	惟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
	無彘簋	惟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大鼎	惟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
	趨鼎	惟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
共和	師歆簋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宣王	師詢簋	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
	兮甲盤	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
	史伯碩父鼎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巳
	虢季子白盤	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伯克壺	惟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
	克鐘	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此鼎	惟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
	善夫克盨	惟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吳虎鼎	惟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
	鬲比盨	惟王廿又五年七月既——
	番匶生壺	惟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
	伊簋	惟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
	寰盤	惟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鬲比鼎	惟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



續表

宣王	晉侯穌鐘	惟王卅又三年，王親適省東國南國。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償往東。三月方死霸，王至于萁，分行……六月初吉戊寅……
	伯窺父盨	惟卅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
	善夫山鼎	惟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

上述四要素俱全的銅器共計六十三件，其中記既生霸器十五件，記既望器十五件，記既死霸器六件，記初吉器二十九件。大鼎記月相為“既霸”，生死不明，無法利用。鬲比盨所記月相只能看到“既”字，餘皆不清，目前也無法利用。此器現藏故宮博物院，根據我們的經驗，只需用X光照相即可解決字跡不清問題。我個人認為“初吉”不是月相詞語，他與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等月相詞語不能相提並論，它可能出現在每月的任何一天。因此，記初吉的二十九件器對研究西周曆法的重要性遠不如其餘三十六件，我們應把注意力集中到“表二”記生霸、死霸和望的三十六件器上<sup>⑬</sup>。

“表一”的九十二件器中，除小孟鼎、鮮簋、五祀衛鼎、十五年趙曹鼎、五祀獸鐘、獸簋、師獸簋、克鐘、此鼎、鬲比鼎等少數器王世可由銘文本身肯定外，其餘諸器都是按“標準器斷代法”，考慮器形花紋及銘文中的人物、事件等因素人為擬定的。我們為這些器所定王世只具有相對的可靠性，並無絕對把握。比如某個人就很難說他只在一個王世裏活動。因此，當我們用天文學知識對這些器進行測算時，應當允許每件器比照我們擬定的王世有上下一個王世的移動。又因為恭懿孝三世中，恭孝為兄弟行，這三世器有兩個王世上下移動也是合理的。大體說，有了這樣的活動空間，上述三十六件記有月相的四要素俱全銅器的具體王世及曆日是可以推算出來的，那將形成西周年代的多個定點，為制定一個合理的西周曆譜和王年表打下基礎。

上述原則明確後，我們不妨先作一個假想的《西周王年表》，用作將來供修改的草本。陳夢家所作《西周年代考》是一部重要的西周年代學著作<sup>⑭</sup>。他在分析了多種武王克殷年代說之後，將衆說歸納為“三統說”和“竹書紀年說”兩說。他認為《竹書紀年》和金文紀年是重構西周年代的主要材料。《竹書紀年》記西周積年為257年，又共和元年為公元前841年，已為學術界所公認，因而考定周元為公元前1027年。我根據陳先生所定諸原則和框架，參照新出土的金文資料，試對他作的《西周王年表》作出補充和修改：

表三

王世	金文	竹書	史記	試擬	公元前年數
					1027
武王				2	1025
成王	5	40	40 <sub>+</sub>	15	1010
康王	25			25	985
昭王	19	19	19	19	966
穆王	34	37	55	37	929
恭王	30			30	899
懿王	13			13	886
孝王	12			12	874
夷王	5	7 <sub>+</sub>		9	865
厲王	19		15 ~ 17	24	841
共和	1		14	14	827
宣王	37	39 <sub>+</sub>	46	46	781
幽王		10 <sub>+</sub>	11	$\frac{11}{257}$	771

“表三”符合《竹書紀年》如下：

第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

第二，“〔昭王〕十九年，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

第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表三”武成康昭穆共九十八年，近百年。）

第四，“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鼃鼃以爲梁。”

第五，“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

第六，“自武王滅殷，以致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表三”共和以前按《竹書紀年》和金文記年安排，共和以後按《史記》安排。西周積年和周元按《竹書紀年》定爲公元前 1027 ~ 771 年。公元前 899 年鳳翔地區曾發生過一次食分較大的日環蝕，可能即是懿王元年的“天再旦”。公元前 841 年爲共和元年，是中國有明確紀年的開始，此後的共和，宣王，幽王年數都是已知王年，又所擬王年與金文王年完全相容，“表三”應該是一個準確的《西周王年表》的草本。

至於完成西周王年研究，制定一個理想的《西周王年表》，我認爲尚須完成幾項研究工作：第一，弄清“既生霸”、“既死霸”、“既望”、“初吉”的確切含義。過去對四

詞所作訓詁考證，都可以自成體系，自圓其說，但很難得出一個公認的結論，是不夠的。我認為重要的是找到有對比價值的金文資料，根據已知的天文學史知識進行日距測算，以確定每個詞的客觀允許日數值，從而找到該詞的準確含意。第二，在四詞概念明確後，通過測算和篩選，修正“表一”、“表二”所列各器王世。第三，以準確的西周金文王世王年來修改“表三”。第四，將全部四要素俱全的銅器入譜檢查，以證實修改後的《西周王年表》的真實性。

以上是我近年來用銘刻資料進行西周年代學研究的初步結果和對今後研究方向的一些想法，很不成熟，請大家批評指正。

## 註 釋

① 王國維：《觀堂集林》十八卷《通簋跋》895頁中華書局，1959年。

② 利簋，《殷周金文集成》8冊4131號（下簡稱：《集成》）。

獻侯鼎，《集成》5·2626~2627。

長由盃，《集成》15·9455。

趙曹鼎，《集成》5·2784。

匡卣，《集成》10·5423。

③ 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年1期。

④ 令尊，《集成》11·6016。

令方彝，《集成》16·9901。

令簋，《集成》8·4300~4301。

景尊，《集成》11·5989。

景卣，《集成》10·5407。

遣尊，《集成》11·5992。

遣卣，《集成》10·5402。

中方鼎一，《集成》5·2785。

中方鼎二，《集成》5·2751~2752。

⑤ 鬲比鼎，《集成》5·2818。

此鼎，《集成》5·2821~2823。

此簋，《集成》8·4303~4310。

克鐘，《集成》1·204~209。

⑥ 戌嗣子鼎，《集成》5·2708。

高卣蓋，《集成》10·5431。

臣辰盃，《集成》15·9454。

麥方尊，《集成》11·6015。

- 呂方鼎,《集成》5·2754。
- 伯唐父鼎,《考古》1989年6期。
- 沈子它簋,《集成》8·4330。
- ⑦ 郭沫若:《金文叢考》324頁,《臣辰盃考釋》。
- ⑧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土上盃考釋》,《考古學報》,第十冊1955年12月。
- ⑨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40頁《釋智》,中華書局,1979年。
- ⑩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133頁,中華書局,1986年。
- ⑪ 劉雨:《金文萃京考》,《考古與文物》,1982年3期。
- ⑫ 何尊,《集成》11·6014。
- 高卣蓋,《集成》10·5431。
- 庚嬴鼎,《集成》5·2748。
- 大孟鼎,《集成》5·2837。
- 小孟鼎,《集成》5·2839。
- 臣辰盃,《集成》15·9454。
- 麥方鼎,《集成》11·6015。
- 作冊折尊,《集成》11·6002。
- 作冊折觥,《集成》15·9303。
- 作冊折方彝,《集成》16·9895。
- 作冊景卣,《集成》10·5407。
- 呂方鼎,《集成》5·2754。
- 伯唐父鼎,《考古》1989年6期。
- 鮮簋,《集成》16·10166(誤作盤)。
- 卻咎簋,《集成》8·4197。
- 作冊吳方彝,《集成》16·9898。
- 趯卣,《集成》12·6516。
- 裘衛盃,《集成》16·9456。
- 裘衛鼎一,《集成》5·2832。
- 趙曹鼎一,《集成》5·2783。
- 師趯鼎,《集成》5·2830。
- 裘衛鼎二,《集成》5·2831。
- 走簋,《集成》8·4244。
- 永孟,《集成》16·10322。
- 師望簋,《集成》8·4272。
- 段簋,《集成》8·4208。
- 趙曹鼎二,《集成》5·2784。
- 走馬休盤,《集成》16·10170。

- 裘衛簋，《集成》8·4256。
- 虎簋，陝西漢中新出土。
- 師虎簋，《集成》8·4316。
- 王臣簋，《集成》8·4268。
- 師俞簋蓋，《集成》8·4277。
- 師晨鼎，《集成》5·2817。
- 師遽簋蓋，《集成》8·4214。
- 癸鼎，《集成》5·2742。
- 癸壺一，《集成》15·9726~9727。
- 癸盃，《集成》9·4462~4463。
- 諫簋，《集成》8·4285。
- 昔伯簋，《集成》8·4331。
- 癸壺二，《集成》15·9723~9724。
- 蔡簋，《集成》材·4340。
- 召鼎，《集成》5·2838。
- 達盃蓋，張長壽文：《達盃蓋銘》，《燕京學報》，新2期。
- 牧簋，《集成》8·4343。
- 魯方彝，《集成》16·9896。
- 大師盧簋，《集成》8·4251~4252。
- 師族簋一，《集成》8·4279~4282。
- 鄭簋，《集成》8·4296~4297。
- 柞鐘，《集成》1·133~139。
- 頌鼎，《集成》5·2827~2829。
- 頌簋，《集成》8·4332~4339。
- 頌壺，《集成》15·9731~9732。
- 史頌鼎，《集成》5·2787~2788。
- 史頌簋，《集成》8·4229~4236。
- 散季簋，《集成》8·4126。
- 散伯車父鼎，《集成》5·2697~2700。
- 師族簋二，《集成》8·4216~4218。
- 逆鐘，《集成》1·60~63。
- 師兑簋一，《集成》8·4274~4275。
- 叔專父盃，《集成》9·4454~4457。
- 師穎簋，《集成》8·4312。
- 師兑簋二，《集成》8·4318~4319。
- 猷鐘，《集成》2·358。

師簋簋，《集成》8·4324~4325。

猷簋，《集成》8·4317。

大簋蓋一，《集成》8·4298~4299。

無彣簋，《集成》8·4225~4228。

大鼎，《集成》5·2806~2808。

大簋蓋二，《集成》8·4125。

駒父盨蓋，《集成》9·4464。

趨鼎，《集成》5·2815。

師猷簋，《集成》8·4311。

師酉簋，《集成》8·4288~4291。

師詢簋，《集成》8·4342。

虢姜簋，《集成》7·3820。

兮甲盤，《集成》16·10174。

琯生簋一，《集成》8·4292。

琯生簋二，《集成》8·4293。

史伯碩父鼎，《集成》5·2777。

虢季子白盤，《集成》16·10173。

伯克壺，《集成》15·9725。

克鐘，《集成》1·204~209。

詢簋，《集成》8·4321。

此鼎，《集成》5·2821~2823。

此簋，《集成》8·4303~4310。

善夫克盨，《集成》9·4465。

小克鼎，《集成》5·2796~2802。

微繼鼎，《集成》5·2790。

閼碩鼎，《小校經閣金文拓本》3·26。

鬲比盨，《集成》9·4466。

番匍生壺，《集成》15·9705。

伊簋，《集成》8·4287。

衰盤，《集成》16·10172。

衰鼎，《集成》5·2819。

鬲比鼎，《集成》5·2819。

鬲比簋，《集成》8·4278。

晉侯穌鐘，《上海博物館集刊》7期。

伯窺父盨，《集成》9·4438~4439。

善夫山鼎，《集成》5·2825。



- ⑬ 劉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年11期；《再論金文“初吉”》，《中國文物報》，1997年4月20日。
- ⑭ 陳夢家：《西周年代考》，商務印書館，1955年。

（原載《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研討會論文集》241~259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編輯，1997年10月）

## 叔虞方鼎銘的閏月與祭禮

山西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2000年10月—2001年1月），清理了M113、M114兩座大型西周墓葬，其中M114出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有銘方鼎。近日，拜讀了李伯謙、李學勤兩位先生發表在《文物》2001年第8期和第10期考證方鼎銘的文章，李學勤先生認為從接觸到的同墓銅器看，都是西周早期的。李伯謙先生則進一步認為器主人叔矢有可能就是晉國始封君叔虞。我認為李伯謙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新整理的材料裏找不到反證，此說即可成立。該方鼎、該墓地將是十分重要的，為強調該銘文的重要性，故本文徑直稱其為叔虞方鼎。二位已將銘讀的大部分問題基本解決，讀後很受教益。我想補充兩點意見：

### 一 十四月

兩位先生在說到叔虞方鼎的十四月時，認為是西周彝銘的“首見”或“惟……一例”，似乎可以看成西周金文中僅有的特例，其實叔虞方鼎的十四月並非西周金文中的孤例，鄧公簋銘第一句稱“惟十又四月”<sup>①</sup>與叔虞方鼎銘全同，該簋無器形著錄，但從其“王在侯”三字的肥筆看，應是西周早期或中期器。宋代的金文書籍著錄一件下都雍公緘鼎，首句銘文為“惟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sup>②</sup>，《集古錄跋尾》云該器出土於“陝西商洛”地區，故又名其為“商洛鼎”。《考古圖》公佈的器形是蹄足圓鼎，頸部飾竊曲紋，腹部飾大波浪紋，頸部與足部帶扉棱，與小克鼎、史頌鼎、晉侯邦父鼎等相似，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形制，又“既死霸”是只有西周時期纔使用的記時詞語，《集成》將其定為春秋早期器，顯然不妥，應將其改定為西周晚期器。

我在1993年香港古文字會上發表了《殷周金文中的閏月》一篇小文，目的是繼續

辯論“初吉月相說”，<sup>③</sup>對商和西周曆法中的閏法做了一些不成熟的探討，文章的結論原文如下：

“通過分析殷周金文材料，對殷周時代曆法中閏法的認識，可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殷代晚期曆法中實行的仍然是年終置閏，閏月稱‘十月又三’，年終再閏稱‘十月四’，可能整個殷代實行的都是年終置閏。

（二）西周早期實行的也是年終置閏，閏月稱‘十又三月’。

（三）西周中晚期有年終置閏的記載，稱‘十又三月’，再閏稱‘十又四月’。同時也有‘正二月’的記載。金文中‘正某月’就是‘閏某月’，‘閏二月’是一種年中固定置閏法，但不是‘無中置閏’，此期曆法呈過渡狀態。靜簋是穆王時器，這一時期的曆法中，在六月與八月間不可能出現閏七月，因此它仍然是‘初吉月相說’難以逾越的障礙。

（四）春秋時期各國仍通行周曆，廢止了年終置閏法，閏月一律安排在年中，稱‘閏某月’為‘正某月’，有可能此時期已實行‘無中氣置閏法’。”

看來，應當在上文的結論（二）中增加“年終再閏稱十又四月”一句。叔虞方鼎的出現，使西周金文中記錄十四月的器達到三件，而且分佈于自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各時間段。大家知道，終西周一世“十三月”也不過出現六次，因此這三件“十四月”不應該看作特例而加以忽視，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由此，我們對西周曆法的置閏情況可以得出下面的認識：西周曆法中特有的藉助於用“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等月相詞語來限定干支日的做法，可能說明此時的曆法還不十分穩定，尚處在需依賴隨時觀測天相記錄的階段。西周金文中不見春夏秋冬四季的記載，《尚書》和《詩經》裏也不見二十八宿的痕跡，說明西周人不明瞭全部二十四節氣的安排，用周天二十八宿來描述星空的辦法尚未發明，不可能執行“無中氣置閏”，也不可能執行十九年七閏的規律，這時年終僅置一閏，往往無法全部協調陰陽曆之間的誤差，有時需在年終安排十四月來進一步協調誤差。

《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在表述“西周曆法的幾個要點”時，關於閏法，只簡單的提到“西周曆法一般採用年終置閏”一句，話雖不錯，但顯然是很籠統的。聯想到《簡本》對有關西周“記時詞語”的界說和對“金文曆譜”的安排並不完善，對有些文獻資料，如對《國語》“伶州鳩語”的所謂“分野說”的利用，對劉歆的《武成》曆日的利用，就很難說進行了審慎的思考。我想還不能說我們對西周曆法的面貌已基本搞清楚了，而我們的有些結論，如對“武王伐紂年”的選擇等，是與這些並不準確的認識緊密相關的。叔虞方鼎的出現，提醒我們應當繼續開展對西周曆法的進一步研究，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後續工作中的一個十分緊迫的課題。

## 二 酺大柵棗

叔虞方鼎銘有“王酺大柵棗”一句，金文中“酺”字大概僅出現過4次，列舉如下：

第一，戊寅作父丁方鼎：戊寅，王曰：酺，隄馬酺，賜貝，用作父丁尊彝。亞受。

第二，繁卣：惟九月初吉癸丑，公酺祀。季旬又一日辛亥，公啻酺辛公祀。衣祀，亡尤。

第三，亞酺父乙尊：亞酺，酺作父乙尊彝。

第四，麥方尊：會王饗莽京，酺祀。<sup>④</sup>

其中亞酺父乙尊中之“酺”，也可以理解爲人名，姑置不論。其餘三件器銘中的“酺”字，都應該理解爲祭名。戊寅作父丁方鼎是一件商代末年的器，銘文很難讀。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一件商末銅角銘有“丙申，王賜簠亞酺奚貝”句<sup>⑤</sup>，其中“酺”是作器者名，其官名爲“酺亞”。戊寅作父丁方鼎中的“酺”與角銘中的“酺”應爲一人，只是寫法有繁簡不同而已。“隄馬酺”或可理解爲以隄地之馬爲犧牲進行酺祭。繁卣也有一段不好理解的銘文，距離九月初吉癸丑十一天應該是癸亥，而文中稱“辛亥”，祭祀辛公確應在天干爲“辛”的辛亥日舉行，於是只能認爲卜日之事，是在“辛丑”日進行的，卜得“季旬又一日”的辛亥日，並於該日“啻酺辛公祀。”這說明在西周時，大祭祀前的卜日、祭日的天干都要選擇與被祭者的日名天干相同才行。《周禮·天官·太宰》“祀五帝……前期十日，率執事而卜日……享先王亦如之。”金文的禘祭之禘，一律寫作“啻”，如小孟鼎、鮮簠、刺鼎、大簠<sup>⑥</sup>等無一例外。因此，這次酺祭是與禘祭緊密相連的。麥方尊所記是在莽京舉行的一次饗祭之後進行的酺祀。

如果按唐蘭先生的說法，“酺”即是“彤”的話，酺祭就應該是文獻中的“繹祭”。《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辛巳的第二天是壬午，所以《公羊傳》說“祭之明日也。”《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這種祭祀的內容夏商周應該是一脈相承的，其名雖不同，其實爲“復胙”則是一致的。“復胙”可能是把前一天祭禮上的胙肉，在第二天舉行一個儀式，然後大家分而食之。《孟子·告子下》云：“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周禮·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左傳·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祭神的胙肉被大家吃掉，就表示被神享用了。

“大柵”，疑即“大冊”，亦即盛行於西周中晚期的“冊命”。“柵”、“冊”皆有

“冊”意。周原甲骨：“貞，王其率佑太甲，咎周方伯？□由正，不左，于受有佑。”（H11：84）卜辭大意是，貞問：周王率祭商王太甲，祈求太甲佑助，是否可以冊命周王爲方伯？驗辭記錄這一貞問得到神“有佑”的肯定答覆。如此說可以成立，方鼎所記的冊命既然稱“大冊”，就有可能是指周初對唐叔虞的一次重大的冊命。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多記錄冊命典禮，有一套完整的儀注，如頌鼎“……尹氏授王命書，王呼史號生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周貯廿家，監司新造貯用宮御。賜汝玄衣黼純、赤市朱黃、鑾旗、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返入覲璋……。”膳夫山鼎“王呼史率冊命山。王曰：‘山，命汝官司飲獻人於冕，用作憲司貯，毋敢不善。賜汝玄衣黼純、赤市朱衡、鑾旗。’山拜，稽首。受冊，佩以出。返入覲璋……。”<sup>⑦</sup>西周早期的冊命典禮儀注尚不完備，但賞賜命服、車馬、貨貝等儀注却是與中晚期的銘文相似的。

金文記率祭者有九件（組）器，列舉如下：

第一，御鬲：庚寅，御率□，在寢。王光賞御貝。

第二，圉鬲、圉簋、圉卣：王率於成周，王賜圉貝。

第三，獻侯鼎：惟成王大率在宗周，賞獻侯鬲貝，用作丁侯尊彝。奄。

第四，不指方鼎：惟八月既望戊辰，王在上侯應，率裸。不指賜貝十朋。

第五，叔簋：惟王率於宗周，王姜史叔使於大保，賞叔鬲、白金、芻牛。

第六，孟爵：惟王初率於成周，王令孟寧鄧伯，賓貝。

第七，矢令方尊、方彝：明公賜亢師鬲金、小牛。曰：用祿。賜令、鬲金、小牛。曰：用祿。

第八，歸卣進方鼎：惟八月辰在乙亥，王在莽京，王賜歸卣進金，肆率。

第九，伯唐父鼎：乙卯，王饗莽京。王率，辟舟臨舟龍，咸率，伯唐父告備。王格，乘辟舟，臨率白旗。用射絳、鼈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咸率，王蔑歷，賜桓鬲一卣，貝廿朋。<sup>⑧</sup>

又有周原甲骨兩片，也記錄了率禮：

第一，彝文武〔宗〕。貞：王翌日乙酉，其率，稱中□武豐……

第二，貞，王其率佑太甲，咎周方伯？□由正，不左，於受有佑。<sup>⑨</sup>

綜觀上述銘文，對率祭禮可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全部記錄率祭的材料都是西周中期以前的，御鬲和兩片周原甲骨可以早到商代末年，伯唐父鼎是穆王初年時器，不指方鼎作於西周中期。結合甲骨文中率祭的材料來看，此祭禮是周人直接從商代繼承下來的，盛行於西周早中期。

第二，此祭禮是周王室較重要的大禮之一，多由周王於都城舉行。但從矢令方尊、方彝銘文看，也不排除一般貴族使用，只是祭名加示旁作“祿”，與王室之祭作“率”

不同。

第三，記此禮最詳細的伯唐父鼎透露了一些該禮的具體內容，該銘所記王之牽祭禮舉行於辟雍大池的船上。儀注有：

辟雍池中的船靠臨船壘，船壘即後世之碼頭。

告備，《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祭之日，逆齋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賈公彥疏云“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也。”伯唐父在銘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小宗伯相似。

王登辟舟。

王親臨白旗行牽祭，麥方尊記邢侯所登為赤旗舟，武王伐紂用大白之旗，蓋西周時王用白旗，諸侯用紅旗。周原甲骨 H11：112 記牽祭有“稱中”，“稱中”亦“舉旗”之意。看來“建旗”是牽祭禮的儀注之一。

澤射犧牲。絳，牛牲。《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絳，共其水稿，歌舞牲及毛炮之豚。”鄭注：“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此處代指牛牲。釐虎、貉、白鹿、白狼都是野牲。《尚書大傳》“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周禮·夏官·司弓矢》“澤射共楛質之弓矢。”銘文中的在辟雍大池中水射，可能就是文獻所說的“澤射”。

賞賜。<sup>①</sup>

第四，從周原甲骨“王其牽佑太甲，昃周方伯？”的內容看，牽禮是祈求先祖佑助的祭禮。

叔虞方鼎銘文中的酺與牽似乎都是圍繞“大冊”進行的，下文有周王殷見諸士的記載，說明在舉行大冊命之後，例應召見諸臣屬，以公佈此項冊命。如上述猜測不錯的話，本銘的最大意義可能就在於記錄了周初成王冊命唐叔虞的大冊命一事。

## 註 釋

- ① 鄧公簋《殷周金文集成》3858“惟十又四月，王在侯口，鄧公作旅簋。”此器拓本以前未見著錄，《集成》首次公佈的資料，係來源於考古所收集的拓本集子。《集成》將其定為西周晚期，失之過晚，應改為西周早或中期。
- ② 下都雍公緘鼎“惟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下都雍公緘作尊鼎。用追享孝於皇祖考，用乞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集成》2753、《考古圖》1·9、《博古圖錄》2·29、《歷代鐘鼎彝器款識》91·2、《嘯堂集古錄》14 等著錄，《集成》將其定為春秋早期器，顯然不妥。
- ③ 劉雨《殷周金文中的閏月》《香港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3～203 頁



1993 年版。

- ④ 戊寅作父丁方鼎《集成》2594、繁卣《集成》5430、亞戠父乙尊《集成》5894、麥方尊《集成》6015。
- ⑤ 簠亞罍角《集成》9102。
- ⑥ 小孟鼎《集成》2839、鮮簋《集成》10166、刺鼎《集成》2776、大簋《集成》4165。
- ⑦ 頌鼎《集成》2827-2829、膳夫山鼎《集成》2825。
- ⑧ 御鬲《集成》741；圉甗、圉簋、圉卣《集成》935、3824、3825、5374；獻侯鼎《集成》2626、2627；不指方鼎《集成》2735、2736；叔簋《集成》4132、4133；孟爵《集成》9104；矢令方尊、方彝《集成》6016、9901；歸卣方鼎《集成》2725、2726；伯唐父鼎（陝西長安張家坡洞室墓出土，《考古》1989 年 6 期）。
- ⑨ 《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 10 期。  
1、周原甲骨 H11：112。2、周原甲骨 H11：84。
- ⑩ 劉雨《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考古》1990 年 8 期。

（原載《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66~271 頁，上海博物館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 ——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

2002年我與劉雨先生合寫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一文，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總第七十輯。當時百務羈身，時間倉促，稿件整理得不够完善，加之文章發表後，我們又發現了一些新的資料，於是我們對稿件作了必要的補充，並適當增加了有助於理解本文的若干圖片。我本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經是燕京大學歷史系哈佛燕京的研究生，經與《燕京學報》編委會協商，得到他們慨允，決定在《燕京學報》重新發表此文。這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研討的最後文本。敬希讀者察鑒。

——何炳棣 2003年10月

“夏商周斷代工程”以釐清夏商周三代的年代為目標，集結了中國歷史、考古、天文、核物理、古文字等學科領域的當代優秀學者二百餘人，經過近五年的聯合攻關，對有關中國古史年代問題的資料進行了全面檢索和研究，解決了許多長年懸而未決的難題，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成績是很大的。中國上古年代問題與世界其他文明古國的早期年代問題一樣，由於標記年代的遺跡多已被歷史的長河所淹沒，恢復古史年代的工程是十分艱巨而繁難的。工程領導清醒地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因此將目前取得的結論稱為“階段成果”，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既然結論已經公佈，本着對中華民族歷史負責的精神，對工程的每一個關鍵性的結論進行審視和評價，是學術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 一 從斷代工程選定“武王克商年”說起

《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第三章《武

王克商年的研究》記述了工程專家組選定克商年的過程，他們首先利用賓組卜辭記載的五次月食定位了商王武丁、祖庚時期的具體年代，然後用 C14 測定考古發掘選取的商周之際特定地層出土的系列標本，將克商年的範圍逐步縮小到公元前 1050 ~ 公元前 1020 三十年之內，然後根據新出利簋“甲子”、“歲鼎”銘文、《尚書·武成》、《逸周書·世俘》伐商曆日、《國語》伶州鳩語的天象和《竹書紀年》記載等，以及與擬定的金文曆譜的相容程度，提出三種解決方案：公元前 1046、1044、1027。最後再對三方方案與上述材料相合程度加以優選，得出公元前 1046 年為武王克商年。

上述三個方案代表了求取“武王克商年”的兩種方法，一種是利用文獻記載的古代天象資料，以現代天文學的知識，推算“武王克商年”，1046BC、1044BC 屬於這類；另一種方法是避免使用推算過程，利用可靠的文獻記載直接找出“武王克商年”，1027BC 屬於後者，當然兩種方法最後都必須通過金文記載的檢驗，纔能令人信服。《報告》採納了前一種方法，並在兩個年代之間優選了 1046BC。

我們認為《報告》使用出土和傳世文獻資料時難稱嚴謹，取捨多有失當，所採用的方法缺少必要的前提，選出的所謂“最優解”1046BC，缺乏可信性。試逐一考察工程公佈的論據：

### （一）伶州鳩語

《國語》記周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二十三年鑄無射鐘，單穆公認為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問題很嚴重，極力諫說。景王不聽，又問於伶州鳩，伶州鳩也表示反對，並配合單穆公繼續勸說周景王，在這種情況下，他說了如下一段話：

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伶州鳩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鑄鐘起樂，非同一般，需天地相應，人神相合方可，不得隨意為之。

《報告》用天文推算的辦法選定克商年，這段“伶州鳩語”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因為在所有文獻資料裏，只有這段話給出了武王伐殷時的歲、月、日、辰、星等系列天象條件。大家知道，用現代天文學知識往往可以非常精確地找出古代的某種天象出現的具體時間，但困難在於天象的變化一般都有一定的週期，比如同一日月干支，每五年就

重複出現一次，日月星辰的位置也在各自的軌道上按各自的規律周而復始地重複着，用現代天文知識找出的古代天象出現的時間，並不是惟一的可能時間。因此，還須要對結果加以論證，搞清楚這個結果確實符合某些已知的條件，纔能認為結論成立。伶州鳩這段話按字面理解，應該是在武王伐紂從宗周發兵時，有一個觀測天象的人，如實地記錄了當時宗周上空可見的歲、月、日、辰、星等具體位置，並把這個觀測準確地記錄下來，過了數百年後，伶州鳩由於世任樂官的關係，從其先祖所傳述中得知了這個天象記錄，並牢記在心，當周景王爲了鑄鐘，問到他一個音律問題時，他就以曆說律，說出了這個觀測結果。因爲五種天象同於一天出現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從漢代的劉歆開始，就說上述五種天象是從武王伐紂誓師到師渡孟津這一段時間裏連續出現的，這當然就給說者以很大的靈活空間。雖然這一點是無法證明的，我們姑且承認這個條件，但要想使人相信這個故事是真實的，像工程首席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所說的，是“伶州鳩家世任樂官，武王時天象應爲其先祖所傳述”<sup>①</sup>，並將它作爲論證武王伐紂的重要論據的話，它應該起碼還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第一，伶州鳩這段話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

第二，它是對周初原始觀測記錄的敘述，而非後世人自行推算出來的結論。

第三，西周初年的周人已對二十八宿有了清楚的劃分，並且已有將二十八宿分成十二次的“分野說”。

十分遺憾，根據我們的考察，上述三項條件沒有一項可以成立。

#### 1. 伶州鳩這段話缺乏邏輯的合理性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玄注引《堪輿》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樑，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鶉火，周也”與伶州鳩所說“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相符，說明《堪輿》的十二星次分野與伶州鳩所說是同一來源。但是這段話難以理解之處頗多：

(1) 這裏“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看來是自西向東排列，鶉首如對應秦地，那麼鶉火所對應的周地，只能是洛陽的東周，不會是指西土的宗周。也就是說，鶉火在武王伐紂時，適值商人的疆界，並非周的分野。

(2) “玄枵，齊也。”依韋昭解，即天竈。按《堪輿》所記，齊、衛、魯的分野都在東方。武王伐紂時，姜姓族人尚在西方，齊人之祖“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的“逢公之神”自然也在西方，周公東征薄姑以後姜姓纔封於齊地。因此“星在天竈”和齊人之祖神保佑周人是不相干的。

(3) 這裏“大樑，趙也。實沈，晉也”、“壽星，鄭也”，其中趙、晉、鄭顯然是

三家分晉後趙、魏、韓三國的自稱。析木在今遼寧，燕人及於此地也應在進入戰國以後。說明《堪輿》與伶州鳩這段話所記的“分野說”，顯然是“三家分晉”以後流行的戰國星占說。

## 2. 伶州鳩語所述天象並非周初原始觀測的記錄

(1) “歲在鶉火”，據天文學家們研究，凡《左傳》、《國語》所記“歲在某某”之“某某”皆與實際天象不符，而所差是有規律的，只要以戰國中期前後的歲星位置，按十二歲一周往上推，即可相符。因此，“歲在鶉火”，日本學者新城新藏<sup>②</sup>認為，這是在公元前376年左右推算出來的，中國學者張培瑜認為是在公元前360年左右推算出來的。因此，《國語》所記伶州鳩所說的“歲在鶉火”也不會例外，必然也是戰國時人推算出來的。

(2) “日在析木之津”是講太陽所在的星宿位置。大家知道，當太陽出來的時候，天上一片光亮，衆星宿盡都隱去，無法直接觀測到它所在的位置，這個記錄只能是靠推算所得。

(3) “辰在斗柄”，按韋昭注為“日月之會”，即日月斗宿合朔，朔月是不可見的，無法觀測，只能靠推算得到（西周的曆法中是否有“朔”的概念，這本身就是一個待證明的問題）。

(4) “星在天龍”之星，按韋昭注為“晨星也”，即水星。水星因為近日，為日光所掩，也是肉眼很難看見的，大概也是靠推算得出來的。因此，伶州鳩這段話所說的五種天象都不可能是周初原始觀象的記錄，只能是戰國人自行逆推出來的，然後用戰國人的分野說加以敘述的。

## 3. 西周人尚不具備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識

如伶州鳩和《堪輿》所記，戰國秦漢以來流行的十二次，是按星宿劃分的，即十二歲行二十八宿一周天，因為星宿寬狹不一，有一次二宿者，一次三宿者。若以此記周初星象分野是真實的話，其前提是周初的人得具有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識。中國人何時具備了二十八宿的知識，就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中，最早的當是曾侯乙墓出土漆箱蓋上的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圖（圖一）<sup>③</sup>，時代為戰國早期。從該圖的熟練程度看，不像是初建的二十八宿星圖，人們對二十八宿的認識可能還會早一些，但再早也早不到西周。從流傳至今的古籍《詩》、《書》和金文的內容看，皆不見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痕跡；《豳風·七月》中還沒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概念，《夏小正》還在靠觀星象定歲中的次序，並沒有節氣的知識。日人能田忠亮根據《禮記·月令》天象記事的觀測年代認為我國二十八宿體系應創立於春秋時代。夏鼐先生認為“二十八宿體系在中國創立的年代，就文獻記載而言，最早是戰國中期，但可以根據天文現象推算到公元前八至六世紀（620±100BC）”<sup>④</sup>。說明西周人還沒有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識，也不可能

說出伶州鳩那麼一段話來。

綜上所述，伶州鳩這段話所記的星象語句是典型的戰國星象家的星占說，用春秋時代的人伶州鳩的口講出戰國人編造的故事來，這本身就近似於胡言亂語。他所述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的，只能是推算出來的，而西周早期的人尚不具備推算出這些天象的知識，不可能由他們推算出這一套天文星象。至於《國語》中何以會出現這麼一段離奇的話，從上下文意看，並不奇怪，伶州鳩這段話的用意是爲了神化音律的作用，以警示不通音律的周景王，使其不得隨意鑄造編鐘，他是在配合單穆公做周景王的工作，目的是要取消周景王勞民傷財的糜費之舉，對這樣性質的一段話，今天的人完全沒有必要那樣認真看待。若一定要把它作爲推論武王伐紂的重要論據使用的話，須要找出更有力的解釋，僅說其爲“故老相傳”，難以令人信服。否則，爲慎重計，最好不用。

## （二）《武成》、《世俘》、利簋等曆日

《漢書·律曆志》下引劉歆《三統曆》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sup>⑤</sup>

《逸周書·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翌日丁巳，王乃步自於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粵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則咸劉商王紂……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籥於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於國周廟。”

利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圖二）<sup>⑥</sup>

《武成》、《世俘》的曆日，由於利簋的出土，“甲子日”得到證實，其餘的曆日是否真實還需要另作考證。至於利簋“歲鼎”之“歲”字，是否可以釋爲歲字，難以完全肯定，金文中歲字從無如利簋寫作那樣的。唐蘭先生將此字釋爲“戊”即“越”字，他說：“戊與奪音近可通用”古人有“殺人越貨”的成語，“越”有奪意，“越鼎”即“奪鼎”，亦即奪取政權，其說顯得更直白一些。退一步講，即或可以釋爲歲字，是釋爲“歲星”，還是釋爲“歲祭”，仍難以確定。再退一步講，即或把“歲鼎”講成“歲星當頭”，它與“歲在鶉火”也不是一回事。

雷海宗先生說過一段話：“根據片段史料而以曆法推定歷史上年代，須有以下條件爲先題：（一）由吾人所確知之最早年代（如共和元年）至吾人所欲推定事實之年代（如周室元年），其間片段史料必須完全可靠，而非疑似之傳說。（二）於先後兩年代間所用曆法情形吾人必須詳知。若有曆法上之改革，吾人亦須明晰。”<sup>⑦</sup>

在使用上述兩篇文獻材料時，有幾個問題顯然違背了這些先決條件：



第一，通過岑仲勉、顧頡剛等先生的考證，大家都認為現存的《武成》和《世俘》是合二而一的。既如此，二者的曆日不同又如何理解？顯然凡有曆日干支不同的地方，必有錯誤存在。這裏武王伐殷出征日，《武成》云“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世俘》云“丙午旁生魄，若翌日丁未”。有人先是把“丙午”改成“丙辰”，“丁未”改成“丁巳”，再後又把“丙辰”改成“壬辰”，“丁巳”改成“癸巳”，最後再把《武成》的“三月”改從《世俘》的“二月”（《報告》對月份就是這樣處理的），以求得兩篇文獻中的曆日能够相合。這些改造理由並不充分，一般手民之誤，只會誤寫天干或地支中的一個，不太可能干支全誤，二者的月相記錄也明顯不同。這正暴露出這些曆日是很不可靠的。但即或允許如此改動，仍有矛盾不好解釋。如顧頡剛先生指出的：“所可惜的，這是一篇斷爛的文章，錯簡、脫字、誤字不知凡幾。例如‘一月’、‘二月’、‘四月’是有的，三月便沒有。排起干支來，從‘一月壬辰’到‘四月乙卯’該有144天，即佔五個月，從一月朔算起，便有175天，該佔六個月；然而從文字上看，‘一月’到‘四月’只有四個月，可見月份和干支是不適應的。”<sup>⑧</sup>

第二，《武成》保存下來的曆日從一月至四月是連貫和完整的82字，而《世俘》在二月至四月間插入有太公望、呂他、百弇征伐，武王薦鼎俘、祭祖、狩獵、敦服國等一系列事件，這些插入的部分恰好《武成》全部沒有。也就是說《武成》的殘餘部分恰好把《世俘》的兩段話拼到了一起，這樣錯爛斷簡的省略拼接，獨曆日却完整無缺。聯繫到劉歆曾作過改魯公年代以從“三統曆”、造偽古文經以取悅新莽等事，應該說《武成》、《世俘》所記史事或有根據，其引文中的曆日實在令人不太放心。

第三，在《報告》中，1044BC與1046BC兩說同是工程內著名的天文學家推算出來的，同樣可以滿足《世俘》、《武成》、“伶州鳩語”等天象條件，1044BC只是因為不能通過《報告》所擬定的金文曆譜而被排除，這正說明兩部分天文學家在使用這些天文條件時，對天象的理解是各取所需的，其結論可以是這樣，也可以是那樣，並非無可選擇的唯一解釋。

綜上所述，《武成》、《世俘》的曆日疑點尚多，《武成》逸文82字，也只是靠《漢書·律曆志》下所引劉歆《三統曆》的一條引文而已。至於《報告》頁45說到“《武成》本為西漢孔壁所得古文《尚書》中的一篇”云云，就牽涉到更多問題。據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壁，得古文書若干的故事，最早是劉向、劉歆父子說出來的<sup>⑨</sup>。後來“壁中書”的種類就逐年增多。奇怪的是，文化史上如此重大的發現，司馬遷却隻字未提，《史記·儒林傳》只提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而據《史記》載，魯恭王死於武帝初年，何以“武帝末”他還會去壞孔子宅呢？在這段歷史懸案沒有考察清楚之前，尚不能說《武成》就是所謂“孔壁古文”。所以對劉歆《武成》的版本源流，實際上我們並不清楚。西周曆法的真實狀況如何？在西周二百餘年中，曆法是一成

不變，還是發生過一些變革？對這些問題我們目前都難以回答，連若干記時的月相詞語到底是什麼意思，也不甚了然，在這種情況下，貿然使用這些曆日、月相材料去推論伐商年，我們認為是不慎重的，從方法論上看也是十分危險的。

### （三）所謂“金文曆譜”

《報告》稱“公元前 1027 年說與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以及古本《竹書紀年》西周積年為 257 年等記載配合最好，但與工程所定‘金文曆譜’難以整合，也不能與天象記錄相合”<sup>⑩</sup>。所謂“天象記錄”，批評已如上述。至於“工程”的這個“金文曆譜”仍須詳加考察。《報告》利用《武成》、《召誥》、《畢命》的曆日與 63 條金文材料，共計“66 條年、月、記時詞語、日干支確定的文獻和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曆譜”（見《報告》頁 29）。然後考察各種方案與此曆譜的相合程度，以決定對方案的取捨。工程領導決定不取 1027BC 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其與這個所謂的“金文曆譜”不合。但是經我們考察，《報告》所擬定的“金文曆譜”存在一系列問題，如不做重大修改，它就難以取得評判諸方案優劣的資格。

#### 1. 關於“初吉”：

《報告》頁 35 “金文紀時詞語涵義的歸納”云：“初吉，出現在初一至初十。”

《報告》摒棄了王國維認為“初吉”必在月初的七、八日的“四分說”和一些先生所主張的“四定點說”，因而也摒棄了初吉是月相的傳統說法，這是正確的。而《報告》爲了不捨棄這些“初吉”資料，大體上採納了自王引之以來到黃盛璋先生的“初干吉日說”，這個說法是否可以成立，要看記“初吉”的金文資料裏是否有反證，如有堅強的反證存在，其結論就值得懷疑。檢索金文資料，我們發現兩組反證資料：

反證一：靜簋（圖三）<sup>⑪</sup>。

惟六月初吉，王在薺京，丁卯，  
王令靜嗣射學官。小子眾服、  
眾小臣、眾夷僕學射。寧八月  
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剛卿  
豳、莽師、邦周射於大池。靜學  
無辜，王賜靜鞶褱……

靜簋的時代在穆王，是大家公認的。銘文內容淺顯通暢，不存在釋讀上的分歧。大意爲在六月“初吉”日，周穆王在薺京，於丁卯日，王命靜任學官的教官司射。負責教授小子、服、小臣和夷僕的射藝。到八月“初吉”庚寅日，王、吳來、呂剛與豳師、莽師、邦周組成三耦，在辟雍大池裏舉行大射禮。可能是因爲小子、服、小臣和夷僕等在射禮過程中表現良好，靜因爲對他們教授有功，受到王的賞賜……

在分析靜簋兩“初吉”時，這裏有四個條件，我們認為是可以為大家所接受的：

- (1) 在西周曆法中，每月含日數大月 30 日、小月 29 日。
- (2) 西周金文中因為有十三月存在，在靜簋所在的穆王時，應該是年終置閏。
- (3) 銘文中的兩個干支日連續出現，應是同一年中的兩天。
- (4) “丁卯”不管是否屬於“初吉”，但應是六月的一天。

只要大家同意上述四個條件，“初吉”在靜簋中的含義就是清楚的。六月的丁卯日距八月的庚寅日按六十干支表順序計數，應為 85 天，如果六月的丁卯是初一日的话，八月的庚寅就是二十五日；若六月的丁卯是初六日的話，八月的庚寅就是三十日；若六月的丁卯是初七日的話，八月就沒有庚寅了。所以六月的丁卯只可能是六月的 1~6 日，而八月的庚寅就只能是八月的 25~30 日。因為年中置閏已排除，六月初至八月底最多 90 天，最少 87 天，這說明即或有“連大月”或“連小月”出現，也不會改變這個分析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說，靜簋中的兩個“初吉”，其中之一的“初吉”，必然在月末幾天出現。它清楚的告訴我們，“初吉”是可以在月末幾天出現的。金文中在一件器上記錄兩個“初吉”，靜簋是唯一的一例，而在這僅有的一件銅器銘文中就明確地出現了“初干吉日說”的反證，這是不容忽視的。因為是在一件器內出現兩個“初吉”，它不存在王世、時代不同的問題。又因為是在一年中的接續很近的兩個月，也迴避了跨年度計算時要考慮的許多複雜因素。這件幾乎排除了各種未知因素干擾的銅器資料，是研究“初吉”含義的十分珍貴的資料。

#### 反證二：元年師兑簋（圖四）<sup>⑫</sup>。

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  
在周，格康廟，即位。同仲佑  
師兑入門，立中廷。王呼內  
史尹册命師兑：疋師和父  
鬲左右走馬、五邑走馬。賜  
汝乃祖市五黃、赤烏。兑拜，  
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  
休，用作皇祖城公鬻簋，師  
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三年師兑簋（圖五）<sup>⑬</sup>。

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  
格大廟，即位。咥伯佑師兑  
入門立中廷。王呼內史尹  
册命師兑：余既命汝疋師

師父嗣左右走馬，今余惟  
 申京乃命，命汝駮嗣走馬。賜  
 汝秬鬯一卣、金車：轅較、朱號  
 輶、虎羃熏裏、右軛、畫轉、  
 畫輶、金甬，馬四匹、鑒勒。師  
 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  
 魯休，用作朕皇考釐公鬯簋，  
 師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元年師兌簋兩器兩蓋共四篇相同的銘文，三年師兌簋兩器一蓋共三篇相同的銘文，其中元年簋一蓋銘容庚云偽<sup>④</sup>，三年簋蓋銘結尾部分字殘，但二者都不會對釋讀銘文造成影響。上海博物館現藏元年簋、三年簋各一套。四簋七篇兩組銘文字體接近，形制花紋相似，作器者同為師兌，過去人們都認為它們是同一王世且元年、三年連續的兩組器。元年簋銘首為“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三年簋銘首為“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兩組銘文的干支如連續計算，在不置閏月的情況下，甲寅如為初一，丁亥就是十五日；元年與三年間如置一閏月，甲寅必須是十七日時，三年二月纔有丁亥。說明不論是否有閏月存在，兩個“初吉”總有一個要超出“初干吉日”，而在月的中旬出現。這兩組銘文與靜簋銘文成為“初吉初干吉日說”有力的反證。

《報告》對兩組銘文採取位置互換的辦法避免其成為“初吉初干吉日說”的反證，這個辦法是根據李學勤先生的研究得出的。李學勤先生在1998年4月發表《論師兌簋的先後配置》一文<sup>⑤</sup>，文中以新出虎簋蓋與師虎簋銘文的關係為例，考察元年與三年師兌簋銘文內容，得出三年簋在前，元年簋在後，兩器分在兩王的結論。隨後，彭林先生發表《也談師兌二器的排序問題》，李朝遠先生發表《關於元年、三年師兌簋的先後順序》，不同意李學勤先生的觀點，兩位先生認為三年簋的職官走馬是正職，元年簋的職官是副職，仍以元年在先，三年在後，兩器一王為正確。李學勤先生在1998年6月又發表《細說師兌簋》一文<sup>⑥</sup>，進一步申論原有的觀點，但沒有正面回答彭、李兩位的主要論據：即銘文中元年師兌的官階低於三年師兌。我們認為兩簋銘所記職官位置哪一個高是問題的關鍵，這一點明確了，自然應該職位高的在後，職位低的在前，因為一個人不可能為了降職來作器紀念。元年簋師兌所管轄是“疋師師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三年簋師兌管轄的是“駮司走馬”。這裏有一個很關鍵的字“駮”，過去從字形到字意，始終未得到很好的解釋，現將記有“駮”字的資料列舉如下：

逆鐘

用駮于公室僕傭臣妾小子<sup>⑦</sup>。

叔夷錫

余命汝職佐正卿，黻命于外內之事<sup>⑮</sup>。

叔夷錫

余命汝職佐卿，為大事，黻命于外內之事<sup>⑯</sup>。

宥鼎

遣仲命宥黻嗣奠田<sup>⑰</sup>。

微繼鼎

王命微繼黻嗣九陂<sup>⑱</sup>。

毛公鼎

命汝黻嗣公族掣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掣朕褻事<sup>㉑</sup>。

走簋

王呼作冊尹〔冊賜〕走：黻疋益<sup>㉒</sup>。

師俞簋

王呼作冊內史冊命師俞：黻嗣任人<sup>㉓</sup>。

諫簋

王呼內史微冊命諫曰：先王既命汝黻嗣王宥<sup>㉔</sup>。

伊簋

王呼令尹封冊命伊：黻官嗣康官王臣妾百工<sup>㉕</sup>。

鄧簋

王呼內史冊命鄧，王曰：“鄧，昔先王既命汝作邑，黻五邑祝，今余惟申京乃命……。”<sup>㉖</sup>

師斂簋

余命汝死嗣我家，黻嗣我西偏東偏僕御百工牧臣妾，董裁內外<sup>㉗</sup>。

三年師兑簋

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兑：“余既命汝疋師蘇父嗣左右走馬，今余惟申京乃命，命汝黻嗣走馬。”<sup>㉘</sup>

番生簋

王命黻嗣公族、卿事、太史寮<sup>㉙</sup>。

蔡簋

王若曰：“蔡，昔先王既命汝作宰，嗣王家。今余惟申京乃命，命汝累習黻疋對各，死嗣王家內外。”<sup>㉚</sup>

師克盃

王曰：克，余惟經乃先祖考克黻臣先王。昔余既命汝，今余惟申京乃命，命汝更乃祖考，黻嗣左右虎臣<sup>㉛</sup>。

### 盞方尊、方彝

王册命尹賜盞赤市、幽亢、攸勒。曰：“用嗣六師王行參有嗣：嗣徒、嗣馬、嗣空。”王命盞曰：“𡔷嗣六師眾八師藝。”<sup>③</sup>

### 宰獸簋

王呼內史尹仲册命宰獸曰：“昔先王既命汝，今余或申京乃命：更乃祖考事，𡔷嗣康宮王家臣妾僕傭，外內毋敢無聞知。”<sup>④</sup>

### 逯編鐘

天子經乃先祖服，多賜逯休命，𡔷嗣四方虞林<sup>⑤</sup>。

此字多見於西周中晚期器銘，不見於西周早期器。從上引 19 條材料看，此字多數情況下與“嗣”字合用，有十三例稱“𡔷嗣”，有一例稱“𡔷官嗣”，有兩例稱“𡔷疋”、有三例單稱“𡔷”。金文語詞多有省簡之例，此處省簡的痕跡似為：𡔷官嗣—𡔷嗣—𡔷。李學勤先生將“𡔷”字釋為“管理”，其實“官”、“嗣”都有管理的含義，若將“𡔷”字也釋為“管理”，在“𡔷官嗣”和“𡔷嗣”句中，就嫌重複。按接在此動詞後面的賓語多非一種人，常為多種人並列。如“公室僕傭、臣妾、小子”（逆鐘）、“康宮王臣妾、百工”（伊簋）、“西偏東偏僕御、百工、牧、臣妾”（師散簋）、“王家臣妾、僕傭”（宰獸簋）等。宰獸簋云“𡔷嗣康宮王家臣妾僕傭，外內毋敢無聞知”，故知叔夷鐘、罍單言“𡔷命於外內之事”，蔡簋“𡔷疋對各，死嗣王家內外”，不言“臣妾、僕傭”，而只言“外內”，實際含義是一樣的，也應包括管理僕傭臣妾等。另外像“𡔷嗣公族孚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孚朕褻事”（毛公鼎）、“𡔷嗣公族、卿事、太史寮”（番生簋）等管理的也是眾多執事。我們試將整個辭語（包括𡔷官嗣—𡔷嗣—𡔷三種詞形）釋為“總管理”，而將“𡔷”字的字意釋為“總”，這樣來讀上述諸文例，無不文通意暢（當然，這裏只是釋意，字形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如果我們對於“𡔷”字的解釋可以成立的話，兩個師兌簋的職官高低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元年師兌簋“疋師穌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是命其協助師穌父管理左右走馬和五邑走馬。而三年師兌簋“命汝𡔷嗣走馬”是命其總管所有與走馬有關的事務，即管理包括左右走馬、五邑走馬以及其他有關馬政事務等的全部馬政，而不是去協助別人管理馬政了。當然是後者的職官大於前者，這個關係明確了，其他關係都是次要的，至於說因為三年簋在重複以前的任命時，漏掉了“五邑走馬”一句，就必須改變兩簋的前後次序，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種改變造成了更大的不通，就是造成了“降職貶官而做器紀念”的荒謬結果，這是不可理解的。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證明了“初吉”可以出現在月中旬和下句，《報告》為“初吉”限定的“初干吉日”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本來這個說法從訓詁學上來講，就犯了“添字解經”的忌諱，因為在“初”與“吉”之間硬加一個干支的干，本來就沒有



什麼道理。按我們的理解，“初吉”是“每月第一個吉日”，這個吉日很可能是通過占卜得到的，如1980年湖北隨縣出土的盜叔壺所云“擇厥吉日丁，作盜叔尊壺，永用之”<sup>⑥</sup>。這樣得到的“初吉”之日，當然多數會出現在月初，但却不能否認有月中和月末的“初吉”存在的可能。湖北穀城出土的熹兒壺記有“惟正月初、冬吉”一句<sup>⑦</sup>，“冬者，終也”，可證明此時記時詞語中，在正月裏有“初吉”和“終吉”兩個“吉日”，這對我們認識“初吉”一詞的含義很有啓發（該器對研究“初吉”的重要性，張政烺先生早在數年前就對劉雨指出過）。這些“初吉”日在當時人們可能有曆書查考，是明確的，但是對幾千年後的今天來講，是完全無法找出它的規律來的，我們應當毫不惋惜地捨棄這些材料，因為對“月相辭語”的解釋不同，會導致整個金文曆譜的不同安排。只要看一看《報告》所擬的“金文曆譜”，以及前此出現的各種曆譜，與譜不合者多數為“初吉”這個現象，就應該明白，主要是各曆譜使用了不可能完全入譜的“初吉”資料，造成了排譜的混亂。

## 2. 月相詞語涵義不明

西周曆法中所使用的諸如“既生霸”、“旁生魄”、“既死霸”、“旁死霸”、“既望”等月相詞語，關於它們的含義，學術界目前研究工作還做得很不够，難以有較公認的看法。《報告》在同一個“金文曆譜”中，文獻中月相詞語後往往說“越幾日干支”，這些干支日說明前面的月相詞語肯定是定點的某一天；而在金文中大量月相詞語是指代若干天的一段時間，顯然是不定點的<sup>⑧</sup>。這裏把三條文獻資料與金文資料混排在一起，實在不倫不類。如上所述，這裏文獻的記時辦法與金文的記時辦法顯然是兩個不同的系統。而且，再可靠的文獻資料畢竟是二手的，它的史料價值是不能與金文等同的。《報告》的“金文曆譜”兩說並存，在同一個“金文曆譜”中，不定點說與定點說雜陳並存，這種不正常的狀況，只能說明“工程”的專家們對這些詞語的確切含義是不甚瞭解的。

## 3. 離譜與勉強不離譜之器

《報告》僅承認在其所擬定的曆譜中有師斂簋“初吉”排在二十日，與曆譜不合，另有克盃、伊簋干支有錯，需改干支纔能與曆譜相合。實際仔細閱讀該曆譜，不合者當不止這些，如《畢命》的朏日出現在五日，十分費解。無異簋“初吉”十一日，十三年癸壺“初吉”十一日，三年師兌簋若不與元年師兌簋對調，“初吉”將是十五日等，都已超出“初干吉日”的範圍。另有王臣簋“初吉”在朔前一日，師望簋“初吉”朔前二日，番菊生簋“初吉”朔前二日，善夫山鼎“初吉”朔前二日，虢季子白盤“初吉”朔前一日等，需引入“平朔”概念看待曆日方可與譜相合。天文學家一般認為西周時還沒有朔的概念，當然更談不上有“平朔”與“實朔”相區別的概念，這些朔前曆日合曆是很勉強的。再有，小孟鼎是一件十分著名的康王標準器，其曆日年代是可以讀出來的，依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四）釋文為“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惟王廿

又五祀”（圖六）。但因與《報告》所擬定的《曆譜》不合，就乾脆摒棄不用。看來《報告》所擬定的這個“金文曆譜”，是主觀排他的產物，凡與其觀念不合的資料都遭到不公正的排斥，爲了維護這個主觀的觀念，幾千年前的銘文干支可以改寫，珍貴的標準器小孟鼎銘文可以摒棄不用，兩個師兑簋可以不顧其內容，隨意顛倒其前後順序，這些做法已超出學術研究水平高低的範圍，而是學風不誠實的表現。盡管如此，現在所謂的“金文曆譜”中，離譜的器和勉強不離譜的器仍達十餘件之多，與前此出現的諸種曆譜，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別，這樣水平的曆譜，本身的問題如此嚴重，恐怕很難擔負起檢驗斷代工程所擬定的年代方案是否正確的重任。可以斷言：斷代工程的所謂“金文曆譜”研究，還在摸索階段，距離可以拿出來爲學術界使用的水準相差還很遠。我們認爲短時間研究不清楚某些問題，得不出合理的結論，可能是方法有待改進，也可能是客觀條件還不成熟，這是科學研究中常有的情況，多聽聽不同的意見，從不同的角度不斷進行試驗，也許會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實在找不出解決的辦法，老實承認這個現實，向讀者如實講清研究的進展情況，也可以對今後的研究有所幫助。最可怕的是強以不知爲知，甚至不惜故意誤解科學資料，以求符合主觀設想，製造偽科學結論。綜觀工程對金文曆譜的研究，是失敗的！

#### 4. 西周的曆法水平

過去人們以爲周人長期以來生活在一個農耕社會裏面，爲了生產的需要，他們會很注意對天象的觀測，因而可能具有較高的曆法水平。從金文留下的記錄看，他們對天象的觀測，尤其對月相的觀測，是十分注意的。但較之後世的曆法，水平仍是很有限的。請看下述金文資料：

器 名	銘 文	時 代
中方鼎	惟十又三月庚寅 <sup>⑨</sup>	西周早期
匚尊	惟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 <sup>⑩</sup>	西周早期
遣卣	惟十又三月辛卯 <sup>⑪</sup>	西周早期
小臣靜卣	惟十又三月 <sup>⑫</sup>	西周中期
牧簋	惟王七年十又三月 <sup>⑬</sup>	西周中期
吳虎鼎	惟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 <sup>⑭</sup>	西周晚期

上述銘文反映出在西周時期周人曆法實行的是年終置閏，閏月安排在一年的末尾十二月之後，稱十三月，並未實行無中氣置閏的年中置閏法。更有甚者，天馬曲村遺址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114 號墓出土一件叔矢方鼎，銘首一句稱“惟十又四月”。該鼎是西周早期銅器（圖七、左）<sup>⑮</sup>，考釋諸家異口同聲稱其爲“西周獨此一件”，似乎可以例外不計處置。據我們查閱，西周金文中還有一件鄧公簋，銘首第一句也稱“惟十又

四月”（圖七、右）<sup>⑥</sup>，與叔矢方鼎銘全同，該簋無器形著錄，但從其“王在侯”三字的肥筆看，應是西周早期或中期器。另外，宋代的金文書籍裏還著錄一件下都雍公緘鼎，首句銘文為“惟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圖八）<sup>⑦</sup>，宋代的《集古錄跋尾》云該器出土於“陝西商洛”地區，故又名其為“商洛鼎”。《考古圖》公佈的器形是蹄足圓鼎，頸部飾竊曲紋，腹部飾大波浪紋，頸部與足部帶扉棱，與小克鼎、史頌鼎、晉侯邦父鼎等相似，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形制；又“既死霸”是只有西周時期才使用的記時詞語，金文中概無例外，《集成》將其定為春秋早期器，顯然不妥，應將其改定為西周晚期器。雖只有這三件器記有十四月，但考慮到金文記特殊月份的几率並不大，比如整個西周金文中能够確認的“十三月”也只發現六條。而這三件十四月銘文却分佈在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整個西周時期，應該承認它如實地反映了西周時代的曆法水平。這時年終僅置一閏，無法全部協調陰陽曆之間的誤差，有時需在年終安排十四月來進一步協調誤差。其實，這並不奇怪。春秋時代還常常有失閏的記錄，西周時的置閏就更容易出現閏而不盡的情況，對幾千年後的我們來說，其規律實在是難以掌握的，古人在什麼情況下置十三月？什麼情況下置十四月？西周人根據什麼來安排閏月？恐怕我們一時還說不十分清楚。閏法是曆法的基礎，閏法不明，又硬要推算曆日，其結論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 5. 甲骨文五次月食與 1046BC

斷代工程對甲骨賓組五次月食卜辭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工程”首先由古文字學者從字體上認定賓組五次月食均屬武丁晚期到祖庚之間，根據新的卜辭分期分類，排定了五次月食的順序。再由天文學者加以計算，在 1500BC 到 1000BC 之間，找出既符合卜辭干支，又符合月食順序的惟一可能的組合：

癸未夕月食 1201BC

[甲] 午夕月食 1198BC

己未夕向庚申月食 1192BC

壬申夕月食 1189BC

乙酉夕月食 1181BC

經甲骨學家研究，癸未夕月食、[甲] 午夕月食、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屬武丁時期，壬申夕、乙酉夕月食延至祖庚時期。結合《史記·殷本紀》記“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武丁元年應該是從公元前 1192 年向前推 59 年，即，1250BC，武丁在位時間自然就是 1250BC ~ 1192BC。

古本《竹書紀年》記盤庚遷殷以後的殷商積年為 273 年，這是大家都接受的，其實，到此為止，按“工程”所定的盤庚遷殷 1300BC 減去 273 就可以直接得出克商年 1027BC 的結果。而“工程”却繞了一個大圈子，又是天文，又是考古，經過一番複雜

的研究，得出一個 1046BC 來，把一個本來十分簡單明了的問題，複雜化了。

嚴格地說，“工程”所定武王伐紂 1046BC 與五次月食的推算是有衝突的。武丁以下有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六世八王，其中《史記·殷本紀》記武丁在位 59 年，《尚書·無逸》記祖甲 33 年，古本《紀年》記武乙在位至少 35 年。用商代周祭祀譜對文丁、帝乙、帝辛年代的研究，三王皆大於 20 年，合計不會小於 65 年，這幾個年代合起來是 133 年，其餘用來安排祖庚、廩辛、康丁三王的年代已很有限了， $1192 - 33 - 35 - 65 = 1059$ ，若以“工程”所定的武王克商 1046BC 來算，1059 減去 1046 僅剩下 13 年，而上述武乙年和文丁、帝乙、帝辛年都是按最低年計算的，若稍有游移，剩餘的用來安排祖庚、廩辛、康丁三王的年數，就所剩無幾了，這是不合常理的，也是極危險的。五次月蝕的研究有古文字和天文學的計算為基礎，是客觀的根據，所定年代若與其相左，必然是靠不住的。

## 二 對“工程”基本研究思路的批評

通過上述舉例分析，可以看出，根據某些古代文獻記錄的天象，用現代天文學知識，逆推“武王克商年”的研究思路，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難：一是文獻中的所謂古代天象記錄不一定可靠；二是對古代曆法的實際情況我們無法完全掌握，因此工程盡管在局部認識上取得不少成果，但從總體研究方向把握上却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導致一批關鍵性結論論證失敗，因而其擬定的《三代年表》整個框架不能成立。

美國前國家博物院院長、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古代近東研究所所長 Robest Mc Cormick Adams 先生在 1971 年看了何炳棣《東方的搖籃》一書的文稿，該書詳盡地論述了豐富的中國古代文獻流傳歷程，特別介紹了古本《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看後他說：“你們的古代文獻遺存遠比古代近東的文獻優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獻資料，往往成為研究古史年代學的主要根據，可惜你們沒有很好地利用這些珍貴的資料研究中國的歷史年代。”這是美國第一流的學者對中國歷史年代學研究發出的感慨。斷代工程在總體思路上的重大失誤，不幸為美國學者在三十年前所言中。斷代工程沒有充分利用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是整個研究中的最大敗筆。

### （一）關於古本《竹書紀年》

古本《竹書紀年》是西晉太康年間河南汲縣古墓中出土的一批戰國竹書中的一種，那次發現引起了當政者晉武帝司馬炎的重視，親命當時主管中書省的著名學者中書監荀勗與中書令和嶠一起整理這批資料，兩人都親自動手，作了編次、註寫的工作。竹書在

出土時曾遭到一定程度破壞，“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割”（《晉書·束皙傳》）。可以想見整理考證之困難。當時著名學者徐廣、傅瓚、衛恒、束皙、摯虞、王接、荀勗等也先後參與了校訂考證工作，其後還有杜預、續咸等作了註釋的工作。工作進展很快，隸書寫定工作可能得益於正始石經<sup>⑧</sup>的刊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離正始石經刊立（公元240—248年）不過四十年，石經當完好無損，其戰國古文與隸書併列的形式，自然便於寫定者參考利用，所以荀勗得以在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將《紀年》和其他全部隸書寫定的汲冢竹書列入中經，副在三閣。應該說，當時對這批竹書所作的整理研究工作，水平是很高的。《紀年》於北宋時散佚，但其大部分文字却保存於北宋以前的引文和古註、古類書中。到了清代有陳逢衡、洪頤煊、郝懿行、雷學淇、林純溥等十餘家對此書進行了輯佚的工作，清道光年間朱右曾開始區分今、古本，刪除今本補進的各條，作《汲冢紀年存真》，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朱書的基礎上，又作《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現代學者范祥雍又在王國維書的基礎上作《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方詩銘、王修齡又在上述各書之後編成《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學問之道，譬如積薪，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各家又都是飽學之士，後出諸書，逐步轉精，經過千錘百煉，終於成就了我國學術史上這一重要史書的復原工作。

陳夢家先生為研究古史年代問題，在1945年發表了《西周年代考》一書<sup>⑨</sup>他在《序言》中說：“學者所標定的年代，都是根據不甚可靠的材料，擬構而成的。其中共和以前，年代尤為渺茫。今日要定這一段的年代，所憑藉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戰國以來的書籍記錄，一是古器物銘文。前者則以晉代出土的魏國竹書紀年，最為可貴。其他書籍所記，或失之過晚，不用則可惜，用之則不能盡信。後者則近代古器物學的發達，頗足補文獻之不足，證若干文獻之可據。”他又在《前言》中說：“但大致說來，作者認為竹書紀年和金文的紀年，是重構西周年數的主要材料。”其後他又發表了《六國紀年》<sup>⑩</sup>，該書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編制《六國紀年表》，二是作了《汲冢竹書考》。在《表叙》中他寫了四個題目：一、編作六國紀年表的方法；二、竹書紀年原文的甄別；三、竹書紀年的記年與周正；四、餘論。在《汲冢竹書考》中，他對《竹書》的出土年代、地點、竹簡形制、整理經過、著錄情況、內容類別等一系列問題做了考證。看得出來，陳先生為解決古史年代問題，對古本《竹書紀年》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以他的古文獻修養和古文字水平做這一項工作，可以說是對古本《竹書紀年》進行了集大成的工作。古本《竹書紀年》的整理研究，凝聚了我國前代衆多著名學者的心血和智慧。直至今日，雖不斷有新的地下文字資料出土，但還沒有那一項發現可以取代它，其史料價值及在年代學上的重要性，史學界是已有定論的。

《竹書紀年》編纂時，周王室及列國的譜牒檔案尚存，晉國早期的文獻，魏國必有保存。《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商王世系與諸王年代宋國也必有保存。因



此,《紀年》有關夏、商、周年代的記錄應該是有根據的。古本《紀年》記“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湯滅夏以至於紂,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它具體給出了夏、商、周三代各代的積年,如經過考察,這些積年是有根據的話,就有理由成為斷代工程總年代框架的基礎。

古本《紀年》佚於宋代。有關西周總年及武王伐紂年,被徵引自宋以前的有兩種著作:

(1) 裴駰《史記集解》:“駰案: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

(2) 劉恕《資治通鑑外紀》:“汲冢《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汲冢《紀年》曰: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裴駰,劉宋時人,距《竹書紀年》出土僅百餘年,其所引《竹書》文,又得到其後的劉恕引用,從而證實裴駰的引文並沒有改動原文,是真實可信的。西周總積年 257 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數據,應該是三代年表的第一塊基石。

《史記·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記盤庚遷殷至紂滅的時間,原文是“七百七十三年”,年數顯然過長,多數學者認為是“二百七十三年”之誤。商湯至商紂總積年,《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竹書紀年》為 496 年,《通鑑外紀》作了同樣的徵引,這條記錄學術界也沒有什麼爭議,496 和 273 這兩個數據,應該成為三代年表的第二塊基石。

《太平御覽》卷 82 引《竹書紀年》記夏積年,自禹至桀是 471 年,《史記集解》、《通鑑外紀》、《路史·後紀》都作了同樣的徵引,這個資料也是學術界公認的,它應該成為三代年表的第三塊基石。

## (二)《魯周公世家》將中國有明確紀年的時間上推到西周初年

研究西周年代的另一重要資料是《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紂……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湏立。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武王伐紂年封周公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及武王既崩,而使其子伯



禽代就封於魯。這裏武王伐紂年至魯公伯禽卒年之間的年數無考，其餘各公在位年代是連貫一系的，其中“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一句話，貫通了西周和魯國的紀年<sup>⑤</sup>。考公酋元年至共和元年合計 157（或 158）年。共和元年為 841BC，因此考公酋元年應為 998BC（或 997BC），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有明確記年的年代應該是魯考公酋元年的 998BC。《竹書紀年》記武王伐紂為 1027BC，故武王伐紂年至魯公伯禽卒年之間的年數應為 29（或 30）年，這也是非常合理的，魯公的世系證實了《竹書紀年》所記武王伐紂年是可靠的。

### （三）魯公世系譜牒來源有自

《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史記·孔子世家》：“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只迴留之不能去云。”《史記·魯周公世家》：“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司馬遷青年時代曾在曲阜講業、習禮，親見四百餘年保存下來的孔子的車服禮器，以及周天子禮樂。司馬遷對有關具體年代數字，在沒有可靠材料情況下，是不會輕易下筆的，視其列國世家於共和前皆不系年，而獨魯世家例外，就可見《魯世家》所述世代魯公的年代，很可能是司馬遷得自魯國故都舊文獻之免於秦火者，應視為周代魯國的世系年代的第一手史料，較之經秦火後由記憶背誦的史料，如《尚書》各篇，要可靠得多。司馬遷並未看到《竹書》出土，歷代魯公年代是一個有獨立來源的史料，因而也就成為考核魏紀年的絕好材料。

### （四）斷代工程對古本《竹書紀年》利用的情況

《報告》先後使用了古本《紀年》的夏積年自禹至桀 471；“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十九年，……王南巡不返”、“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報告》在考證盤庚遷殷年時，使用了《紀年》“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資料，得出盤庚遷殷年為 1300BC 的結論等。《報告》在討論其他年代時，有時也引《紀年》的資料，但半信半疑。1300BC 這個結論無疑是很好的，下面的一個順理成章的結論就應該是盤庚遷殷年 1300BC 減去《紀年》的盤庚遷殷至紂王滅亡的記年 273，一年不差，直接可以得出克商年 1027BC。西周積年 257，加上東周始年 770BC，也是 1027BC，從前後兩個不同方向計算，只要你信從古本《竹書紀年》，結論都是一個，這恐怕不是巧合。斷代工程對這樣好的資料棄而不用，對這樣重要的古籍將信將疑，却偏偏去相信伶州鳩的鬼話，去相信販賣歷史假貨出了名的劉歆的《武成》曆日，這不能不說他們在研究的大思路上迷失了方向。

### (五) 三代總積年的確證

古本《紀年》記夏積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記商積年“湯滅夏以至於紂，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記西周積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這裏夏積年《路史·後紀》十三注：“紀年並窮、寒四百七十二年”。“窮、寒”應即“有王與無王”中的“無王”。商積年的“二十九王”應指依古本《紀年》所記的全部商王，與《史記》略有不同。其實關於商王數目問題，早在王國維作《殷先公先王考》時，即已根據甲骨所記，考定為二十九王：“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自湯至於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sup>②</sup>日人島邦男先生曾據甲骨卜辭列出商王世系，自太乙至帝辛也是二十九王<sup>③</sup>，甲骨所記商王數與古本《紀年》所記不謀而合，這再一次說明，《紀年》自有其史料的獨立來源，絕不應如《報告》那樣，再加帝乙帝辛的年數，因為《紀年》明說是“湯滅夏以至於紂”，這種敘述方式與其記西周積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應該包括幽王年數在內是一樣的。因此，武王伐紂年1027BC加上商積年496，再加上夏積年471，得出夏始年是1994BC。這恰好與《太平御覽》卷七引《孝經鈎命訣》禹時“五星纍纍如貫珠，炳炳若連璧”的“五星聚”相合。美國太空總署的天算專家彭飈鈎博士曾推算，於公元前1953年2月23日，五大行星幾乎排成一條直綫；張培瑜先生測算，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黎明時分東方地平綫上，土、木、水、火、金五大行星角距小於4度，這是中國5000年來唯一的一次難得天象。張培瑜先生還說：“由於行星運動比較複雜，古代學者不可能對其進行準確的計算，因而這次記錄不可能是後世星象家逆推出來的，更不可能是偽造的。”禹元年是1994BC，禹時五星聚是1953BC，相差41年，古本《紀年》記“禹立四十五年”<sup>④</sup>這次五星聚發生在禹的晚年。這個重大的天象記錄，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結論：

第一，古本《紀年》所記夏、商、周三個積年合於中國古代“極端天象”的實錄，其史料價值之高，無與倫比，應當成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三代年表的合理框架，可惜“工程”領導層對此認識不足，“工程”捨此而求出的所謂夏始年2070BC，雖然比1994BC早了幾十年，但其根據並不充分，遠不如古本《紀年》的原始記載可靠有據。

第二，這個研究成果因為有天象記錄的支持，它證明了中國夏王朝存在的客觀性，它有力地回答了部分西方學者對我國夏王朝存在的懷疑。

令人不解的是，集中了當代如此衆多知名學者的“斷代工程”，對這樣一個關係到全局的文獻資料却採取了一種輕率的態度。我們一直疑惑，是否“斷代工程”的文獻

研究小組對古本《竹書紀年》進行了新的研究，有了過於前人的新發現？劉雨在參加“斷代工程”工作過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過這個問題，在一次會議上，劉雨曾很激烈地指出：“歷代參與考證研究、搜輯整理古本《竹書紀年》的學者比在座各位的學問要大得多，我們對古本《竹書紀年》不能採取這樣輕蔑的態度！”

以前我們還只是不理解，那時並沒有看到“斷代工程”討論古本《竹書紀年》的具體文字資料，近日讀到一本書——《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sup>⑤</sup>，這是一本訪談錄性質的書，作者在書中對25位不同時期活躍在夏文化研究前沿的考古學者，分別進行了專題訪談。對李學勤先生的訪談是其中之一，對他的訪談錄，共記了十條，其中與本文有關的第六條內容如下：

問：“六、您曾專門探討《古本竹書紀年》對夏史研究的價值，能否在此簡單談談？”

答：“老實說，我這個人對《古本竹書紀年》信仰不大。有些人特別相信《古本竹書紀年》，我過去也如此。《中國史稿》將武王伐紂年定為公元前1027年，現在一般年表都用公元前1027，其實公元前1027年真是有問題。《古本竹書紀年》是一本戰國時代的有思想傾向的書，有子書性質。不是一個單純的歷史著作，在這一點上與《春秋》還不一樣。它的戰國部分當然可靠，因為作者是戰國人，當然比漢代人的記載可靠。它講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關於這一點我在文章中舉了很多例子。他的思想傾向是很清楚的，有些事說法與傳統的記載不同，可是這些事的思想傾向都是一致的。如果它與傳統說法不同的地方都是事實，我們就會懷疑為什麼如此一致呢？例如伊尹把太甲關了起來，志在謀權篡位，太甲從桐宮出來以後，就把伊尹給殺了。這肯定不是事實，因為如果是這樣殺的，那麼甲骨文中還能那麼祭祀伊尹嗎？像這樣的亂臣賊子，和王莽一樣是應該滅族的，怎麼寬大也不能對這種人進行祭祀。夏代的益干啓位也是一樣。周代的周召共和，它說是共伯和干王政。這些說法的思想傾向完全一致，就是提倡一種暴力干政。這就是戰國人的思想，而戰國人有時篡改歷史臉皮是非常厚的。”

訪談錄結尾處有附記曰：“採訪及錄音整理者為張立東，訪談時張運先生在座。本文已經李學勤先生審定。”

我們認為李先生是“斷代工程”四位首席科學家中的組長，高踞整個“斷代工程”領導層的首位，他的這種觀點不可能不對“斷代工程”的研究思路產生重大影響，說“斷代工程”對待古本《竹書紀年》的態度是在他的這種觀點指導下形成的，恐怕也不為過。

李先生上面說的“它（指古本《竹書紀年》）講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關於這一點我在文章中舉了很多例子”。那篇文章可能即是李先生寫的《古本〈竹書紀年〉

與夏代史》一文<sup>⑤</sup>該文內容與上述《訪談錄》雖有相近之處，但那篇文章對《竹書紀年》還是採取十分肯定的態度的。李先生說他過去和一般人一樣，是特別相信《古本竹書紀年》的，可能在1987年寫那篇文章時，他還是基本上相信古本《竹書紀年》的。而現在，在經過十餘年的思考，到了2001年以後，已經“對古本《竹書紀年》信仰不大”了。看來，李先生是對古本《竹書紀年》有了新的認識，他的新認識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古本《竹書紀年》不是一個單純的歷史著作，而是一本戰國時代的有思想傾向的書，作者有一種提倡暴力干政的思想。對此他舉出古本《竹書紀年》記益干啓位、伊尹放太甲於桐宮篡權被殺、周召共和是共伯和干王政三條例證，並特別指出“伊尹放太甲於桐宮，篡權被殺”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甲骨文一直記載祭祀伊尹，他認為如果如古本《竹書紀年》所記，那麼“像這樣的亂臣賊子，和王莽一樣是應該滅族的，怎麼寬大也不能對這種人進行祭祀”。

第二，古本《竹書紀年》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

鑒於以上兩點新的認識，李先生斷定古本《竹書紀年》有子書性質，是為宣傳戰國人的暴力干政思想而作，而戰國人有時篡改歷史臉皮是非常厚的，因而古本《竹書紀年》不可信。

其實，李先生的訪談錄內容和斷代工程結題《報告》的內容，對待古本《竹書紀年》的態度都是矛盾和混亂的，在訪談錄中，一方面李先生強調古本《竹書紀年》不可信，因為“戰國人有時篡改歷史臉皮是非常厚的”。而同時又說：“他的戰國部分當然可靠，因為作者是戰國人，當然比漢代人的記載可靠。”在斷代工程的結題《報告》中，一方面摒棄古本《竹書紀年》商周兩個總積年不用，而另一方面又先後使用了古本《竹書紀年》的夏積年自禹至桀是471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十九年，……王南巡不返”、“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在考證盤庚遷殷年時，使用了古本《竹書紀年》的“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資料，得出盤庚遷殷年為1300BC的結論。在他們那裏，有時古本《竹書紀年》是可信的，有時又是不可信的，可信之處為甚麼可信？不可信之處又原因何在？並沒有作起碼的交待。這裏似乎對待史料的態度隨意性很大，給人的印象是凡與我主觀意願相合者則信之，與我主觀意願相背者則不信。

李先生對古本《竹書紀年》的所謂新認識，其實也並不新，清代的焦循在其《尚書補疏·序》中就說過“束皙等之偽造《竹書》，舜可囚堯，啓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這是千百年來流行的正統史觀，持這種觀念的史學家認為，在遠古聖賢時代，社會結構與政治秩序是完美和諧的，即使是改朝換代，也必

然是禪讓的或和平的，他們不能容忍在聖賢時代有暴力的記載。如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在這種歷史觀的指導下，益干啓位、伊尹放太甲於桐宮，篡權被殺、共伯和干王政等，這些離經叛道的記載當然都是不能容忍的。於是，“益干啓位”變成“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史記·夏本紀》）；而“伊尹放太甲於桐宮，篡權被殺”就變成“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史記·殷本紀》）；“周召共和”就變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周本紀》）。

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但他也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學者，當有不同來源的史料擺在他面前時，像孟子那樣選擇有利於儒家說教的史料來記載歷史，恐怕也是必然的。我們不必苛求古人，但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則沒有必要全盤接受所謂“傳統的記載”。

李先生對古本《竹書紀年》的兩點新認識，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說甲骨文記錄商人祭祀伊尹，伊尹就不可能是篡權被殺，我們認爲這件事是說不死的。甲骨文並沒有交待是在甚麼情況下，對伊尹進行了祭祀。我們對古代的祭祀制度所知甚少，到底商人根據甚麼原則祭祀先人，我們並不詳知。商的後人是否會因伊尹篡權被殺，就會像漢代以後那樣，把他看成如王莽一樣的“亂臣賊子”，恐怕也很難說。1977年春天，陝西周原地區鳳雛村遺址出土一批周原甲骨，其中有兩片內容如下：①H11：1：“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貞，王其邵□成唐，鬯饗，服二女，其彝，血三豚三，由有正。”②H11：84：“貞，王其祿佑太甲，冊周方伯？□由正，不左，於受有佑。”這裏出現了周王祭祀商王成湯和太甲的記錄，這兩片甲骨刻於先周文王時期，其時商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雙方已經仇敵相視，很快就發生了武王伐紂的革命，何以周王還要在這時祭祀“非我族類”的商王呢？刻辭的含義不容有其他理解，於是就有人說，可能這批甲骨不是周人的，而是周人俘獲的商人甲骨。可是從這批甲骨的其他內容看，從甲骨的小字書寫風格看，都只能是周人的。當然，現在已沒有人再懷疑這批甲骨是周人的了，剩下的只是如何認識“周王祭祀商王”的問題了。也許今天的人，始終講不清楚確切的原因，因爲我們不知道周人的祭祀原則是甚麼，也不知道周王是在甚麼一種特殊情況下對商王進行祭祀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決不可以僅僅因此就懷疑資料



本身有問題，說這片甲骨不可靠。正如我們不應該一到排金文曆譜排不下去了，就懷疑金文的干支寫錯了一樣。至於“益干啓位”和“共伯和干王政”都較傳統的儒家色彩很濃的說法更合理些，這是爲郭沫若先生多次稱道，也是史學界所公認的，如果找不到更有說服力的材料，恐怕也很難推翻。考史最大的忌諱，莫過於“以今律古”，我們却總是不自覺地犯同樣的錯誤。

其二，李先生在訪談錄裏說古本《紀年》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言外之意是說，《紀年》並不是一本嚴肅的史書，其資料是拼湊的，編纂的目的主要是要宣揚某種個人的思想，有子書性質，不能當信史對待。這顯然是他的新認識，他在1987年發表的《古本〈竹書紀年〉與夏代史》一文中，只是說二者有相同或大同小異的記載，並無貶義。李先生在訪談錄裏說“關於這一點我在文章中舉了很多例子”。試將李先生在《古本〈竹書紀年〉與夏代史》一文中所舉的十一個例證鈔錄於下：

《紀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莊公盟於蔑。”

《紀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春秋》隱公二年文同，惟《左傳》本經文“伯”字作“帛”。

《紀年》：“魯桓公、紀侯、莒子盟於區蛇。”《春秋》桓公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區池。”“杞”字《公》、《穀》作“紀”，“區池”《公》作“毆蛇”。

《紀年》：“隕石於宋五。”《春秋》僖公十六年傳文同。

《紀年》：“齊襄公滅紀邢、鄆、郕。”或引作“齊襄公滅紀遷紀。”《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郕。”

《紀年》：“齊人殲於遂。”《春秋》莊公十七年文同。

《紀年》：“鄭棄其師。”《春秋》閔公二年文同。

《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春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紀年》：“惠公見獲。”《春秋》僖公十五年：“獲晉侯。”

《紀年》：“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

《紀年》：“楚囊瓦奔鄭。”《春秋》定公四年：“楚囊瓦出奔鄭。”

這些例子能說明甚麼呢？我們認爲它只能說明當時各國編纂本國史書在寫到涉及國與國之間關係時，總是要參考和引用其他國家的歷史著作而已。孟子曾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離婁下》）可見，孟子曾有條件親見晉國、楚國和魯國的史書。墨子說過“吾見百國《春秋》”（見孫詒讓《墨子閒詁》所輯《墨子》佚文），說明其時墨子更有條件親讀各國史書。古時各國自有各國的史書，《紀年》是晉、魏的史書，其來源可能與“乘”有關，其性質與魯國的史書——《春秋》是一樣的，當時各國之間有大事通報的制度，所以在記寫各國史書時，互有相同之處並不足



奇怪。魯在編寫《春秋》時，參考了其他國家的史書，這是研習《春秋》經傳的學者所熟知的，這裏不存在誰抄襲誰的問題，因此也不應該因為《紀年》裏有與《春秋》相同的内容，就認為《紀年》抄襲了《春秋》，因而就不是嚴肅的史學著作。至於說到兩書的不同是有的，那主要表現在書的體裁上，兩書雖都是編年體史書，《紀年》是魏國的通史編年體史書，紀事起於黃帝，夏、商、周、晉、魏一路按年代順序記下來，而《春秋》是魯國的斷代編年體史書，起於魯隱，迄於魯哀。這類史書雖體裁各異，但多為官修，因為個人是無法掌握那麼多王室史料的，也可能汲冢的墓主就是一個魏國的史官，死後以其自編的史書隨葬。由史官據本國所積史料而編著史書，就很難像一般子書那樣可以自由闡發私人觀點。所以，李先生看到《紀年》有些記載與《史記》等不同，就懷疑《紀年》的可靠性，是沒甚麼道理的。《紀年》與傳統史書記載有別，這種區別更大的可能性是由於史料來源不同而形成的。閱讀類似史書，倒是應該注意，流傳到今天的傳統史書，多數經過受儒家思想熏染的史學家的粉飾和加工，其中的有些記載以及對史事的解釋，確可能有主觀因素在內，多一些參照不同來源的史學文獻，可能會使我們對歷史的觀察更客觀些。

《紀年》所記是與傳統記載如《尚書》、《史記》等多有不同，但這些不同之處却得到甲骨、金文的證實。王國維、郭沫若在研究甲骨、金文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時，對《紀年》的史料價值就有很高的評價，如王國維曾指出，《史記》的《殷本記》和《三代世表》有先祖冥之子名振的說法，而《紀年》却名“王子亥”，證之甲骨應為“王亥”<sup>⑤</sup>《尚書·無逸》中的商“中宗”，《史記·殷本記》等都認為是“太戊”，而《紀年》記為“中宗祖乙”，卜辭有“中宗祖乙牛告”句（《戡壽堂所藏殷墟文字》頁3），王國維先生說：“此辭稱祖乙為中宗，全與古來尚書家之說違異，惟《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曰：祖乙滕即位，是為中宗，居庇……。”甲骨文記有中宗祖乙，與《紀年》相合，王國維先生因此說：“《殷本記》以太甲為大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此本《尚書》今文家說。”<sup>⑥</sup>王氏又說：“《殷本紀》‘武乙震死，子大丁立’。《竹書紀年》大丁作文丁。案大丁與湯子大甲父同名，且此丁於丁為最後，不得稱大，《紀年》是也。”<sup>⑦</sup>“今有此斷片，知紀年是而古今尚書家說非也。”戰國齊桓公午在位年數，《史記》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國年表》都記為六年，《紀年》記為十八年，出土的陳侯午敦銘文有“惟十又四年”句，郭沫若先生說：“有本銘之十又四年，足證《紀年》為是，而《史記》實非。”<sup>⑧</sup>再者，將島邦男據甲骨所列商二十九王世系與《殷本紀》所列三十一王世系對照，發現甲骨世系較《殷本紀》世系多出‘祖己’一王（武丁子），少仲壬（湯子）、沃丁（太甲子）、廩辛（祖甲子）三王，恰為二十九王，與《紀年》所記數目相合。從上述所舉文例看，幾乎凡《紀年》與傳統文獻不同之處，皆有地下古文字證明《紀年》是，

而傳統文獻非。如果我們發現了新的考古資料，證明古本《紀年》有些地方不可靠，當然要修改已有的認識，但是迄今尚沒有甚麼新的發現，只是曲爲之另立新說，那就只有妨害進行正常的研究了。

“斷代工程”有國家力量的支援，運用考古、天文、核物理、古文字、古文獻等聯合攻關，開創了使用多學科、多種手段交叉互補的優勢進行研究，這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大盛事，但它也是一個新生事物，回顧幾年來“工程”的進行情況，多學科聯合交叉效果是好的，它取長補短，對各學科都有一定促進，擴展了各學科的研究廣度和深度，“斷代工程”的實踐證明，通過這種新的研究方法，確實可以解決一些過去難以解決的問題。但對研究年代學來說，考古學、天文學、核物理學從其學科本身說，都畢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古文字學方面，特別是“金文曆譜”的研究，可能研究方法和已有資料積累上都存在一定問題，對這個連王國維、郭沫若、陳夢家都認爲目前尚無法全面解決的問題，“斷代工程”的研究，也同樣沒有取得甚麼有效的進展。

是甚麼原因使得“工程”進行得不够順利呢？我們認爲是因整個研究工作沒有分清主次。“斷代工程”是一個年代學研究課題，按理說對這個課題起決定作用的應該是可靠的古文獻記載，我們應該花大力氣研究古代文獻，認真總結汲取前輩學者已經取得的成果，如果古人在文獻中已經講清楚的事情，而這個古代文獻經過研究又是可靠的，其結論就可以加以使用，就像過去郭沫若、陳夢家等前輩學者所做的那樣，比如他們就把武王伐紂年，根據《紀年》記載，定在 1027BC。如果不放心，還可以參照考古、天文、古文字、碳 14 的研究成果，它們可以起到旁證和限制結論的作用。比如本來“斷代工程”使用綜合研究的多種研究方法，已經成功的取得“武王伐紂年”在 1050BC—1020BC 三十年之間，而《紀年》的 1027BC 也恰在這個範圍之內，這正說明《紀年》是完全可靠的，爲甚麼放着現成的結論不用呢？再者《紀年》給出的夏商周三個總積年，現在看來它與考古、天文、古文字、碳 14 等也是不矛盾的，又爲甚麼不用呢？有甚麼必要另搞出一套並無文獻根據的結論，捨本逐末，把問題複雜化呢？而“斷代工程”恰在對古本《竹書紀年》這樣重要的古代文獻研究上，表現出無知和主觀的傾向。學術研究是有傳承的，總是要在前代學者已有學術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樣纔能不斷向前發展。我國文化古籍之豐富，是舉世無雙的，我們今天研究這些古籍的條件和手段，比之前代學者要優越得多，今天所能見到的地下資料也遠比前人豐富，但卻應該老實承認，我們對古籍所下的功夫，我們對古籍的掌握和熟悉程度，遠不如古代和近代的學者，這是今天的學者在從事古史課題研究時，應該清醒認識到的問題。否則，脫離前代學者艱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盲目地另立新說，就會使我們的研究有可能不是在前進，而可能是在倒退。這種標新立異的學風，貽誤

“斷代工程”，貽誤國家在人文科學研究上的形象，確實應該是引以為戒的事情。

我們的結論是：

第一，《國語》“伶州鳩語天象”是一段政治性語言，顯然是戰國時人杜撰的，不能作為實際天象看待。《武成》所述史實或有一定根據，但其版本來源不清，其所述曆日可能已經後人修改，不能作為考證武王克商年的主要論據來加以利用。“斷代工程”所擬訂的金文曆譜，名實不符，月相詞語涵義不明，離譜的、勉強不離譜的銘文過多，暴露了主持者缺乏應有的嚴肅學風，問題很多，它尚不具備用以檢驗諸種武王克商年的資格。

第二，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極高，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其諸多數據有一貫的正確性，它與《史記·魯周公世家》相印證，可以把中國可信年代上推到998BC，“武王克商年”無需捨近求遠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書紀年》的1027BC。夏始年也可用古本《竹書紀年》的1994BC，而不必延長到2070BC，它所記載的夏積年、商積年、周積年都是可靠的，理應成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框架。

通過剖析“斷代工程”對武王伐紂年求取的過程和對古本《竹書紀年》的再認識，可以看出，“斷代工程”主持者研究思路有明顯的偏差，其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任意性，他們號稱要“走出疑古”，而實際卻墜入了“懷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

## 註 釋

① 《夏商周年代學割記》，第212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

② 《由歲星之記事論左傳、國語之著作年代》。

③ 《曾侯乙墓》上册第356頁，圖216：1，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④ 《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考古學報，1967年2期。

⑤ 《漢書·律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1983年。

⑥ 《殷周金文集成》4131。

⑦ 《殷周年代考》，《文哲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武漢大學，1931年。

⑧ 《〈逸周書·世俘篇〉校註，寫定與評論》，《文史》第二輯，1963。

⑨ 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前漢紀·成帝紀》引劉向語。

⑩ 見《報告》第48頁。

⑪ 《殷周金文集成》4273。

⑫ 《殷周金文集成》4274·1—2；427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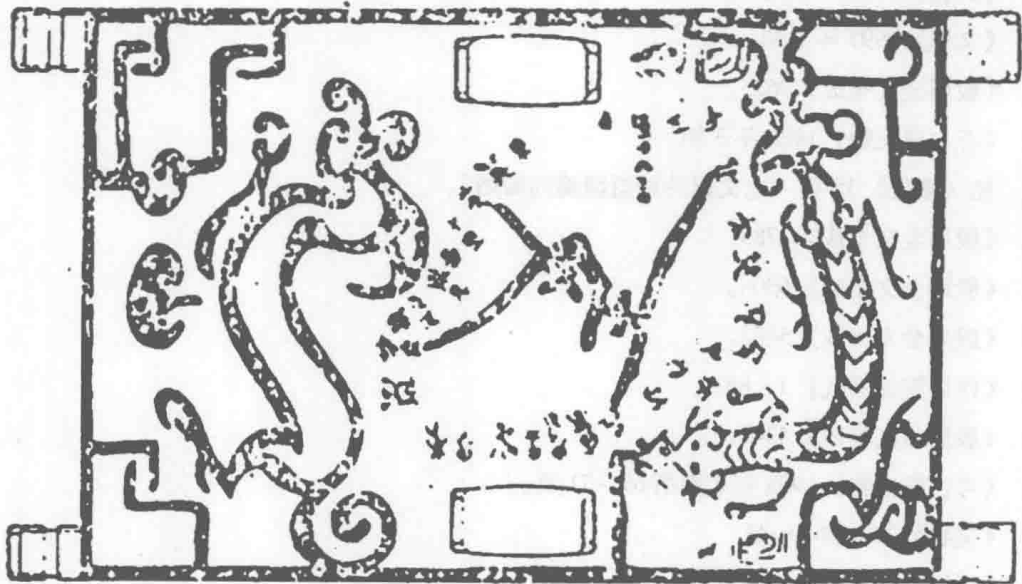
⑬ 《殷周金文集成》4318·1~2。

⑭ 見《商周彝器通考》上219。《殷周金文集成》仍然收入，不以為偽。

- ⑮ 《夏商周年代學割記》第 162 ~ 170 頁。
- ⑯ 見《夏商周年代學割記》第 171 ~ 180 頁。這篇文章也登載於《中國古文字研究》創刊號上。
- ⑰ 《殷周金文集成》1 · 62。
- ⑱ 《殷周金文集成》1 · 274。
- ⑲ 《殷周金文集成》1 · 285。
- ⑳ 《殷周金文集成》5 · 2755。
- ㉑ 《殷周金文集成》5 · 2790。
- ㉒ 《殷周金文集成》5 · 2841。
- ㉓ 《殷周金文集成》8 · 4244。
- ㉔ 師俞簋 8 · 4277
- ㉕ 《殷周金文集成》8 · 4285。
- ㉖ 《殷周金文集成》8 · 4287。
- ㉗ 《殷周金文集成》8 · 4296; 8 · 4297。
- ㉘ 《殷周金文集成》8 · 4311。
- ㉙ 《殷周金文集成》8 · 4319。
- ㉚ 《殷周金文集成》8 · 4328。
- ㉛ 《殷周金文集成》8 · 4340。
- ㉜ 《殷周金文集成》9 · 4467; 9 · 4468。
- ㉝ 《殷周金文集成》11 · 6013; 16 · 9899; 16 · 9900。
- ㉞ 《文物》1998 年 8 期。
- ㉟ 《文博》1997 年 2 期。
- ㊱ 《殷周金文集成》9625。
- ㊲ 《考古與文物》1988 年 3 期。
- ㊳ 見《報告》35 頁“金文紀時詞語涵義的歸納”。
- ㊴ 《殷周金文集成》2785。
- ㊵ 《殷周金文集成》6008。
- ㊶ 《殷周金文集成》5402。
- ㊷ 《西周銅器斷代》3 · 83。
- ㊸ 《殷周金文集成》4343。
- ㊹ 《考古與文物》1998 年 3 期第 69 ~ 71 頁。
- ㊺ 《文物》2001 年 10 期。
- ㊻ 《殷周金文集成》3858。
- ㊼ 《殷周金文集成》2753。
- ㊽ “正始石經”又名“三字石經”或“三體石經”，三國魏正始年間刊立，內容為《尚書》、《春秋》和《左傳》的一部分，經文每字皆古文、小篆、隸書三體並列，其中“古文”即戰

國時的列國文字。“三體石經”至北齊時，始因遷徙而至散失殘缺，西晉時當尚完好可用，其部分殘石及歷代拓本有的還保存至今。

- ④⑨ 《西周年代考》，陳夢家著，1945年初版於成都，195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
- ⑤⑩ 《六國紀年》，陳夢家著，1955年上海學習生活出版社出版。
- ⑤⑪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共和元年為魯真公十五年，故此年代可十四、十五兩存之。
- ⑤⑫ 見王國維《古史新證》第37頁，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十五）祖某父某兄某。
- ⑤⑬ 見島邦男著《殷墟卜辭綜類》第556頁，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67年初版，1977年增訂二次印刷版。
- ⑤⑭ 《太平御覽》卷82引。
- ⑤⑮ 《手鑑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張立東、任飛編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 ⑤⑯ 李學勤著《古本（竹書紀年）與夏代史》，發表在田昌五主編的《華夏文明》第一輯第15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
- ⑤⑰ 見王國維著《古史新證》的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四）王亥，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 ⑤⑱ 見王國維著《古史新證》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十）中宗祖乙。
- ⑤⑲ 見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十四）文武丁。
- ⑥⑩ 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1957年重版增訂本）第八冊第216頁，齊國《陳侯午敦考釋》。



圖一 曾侯乙墓出土漆箱蓋上的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圖



圖二 利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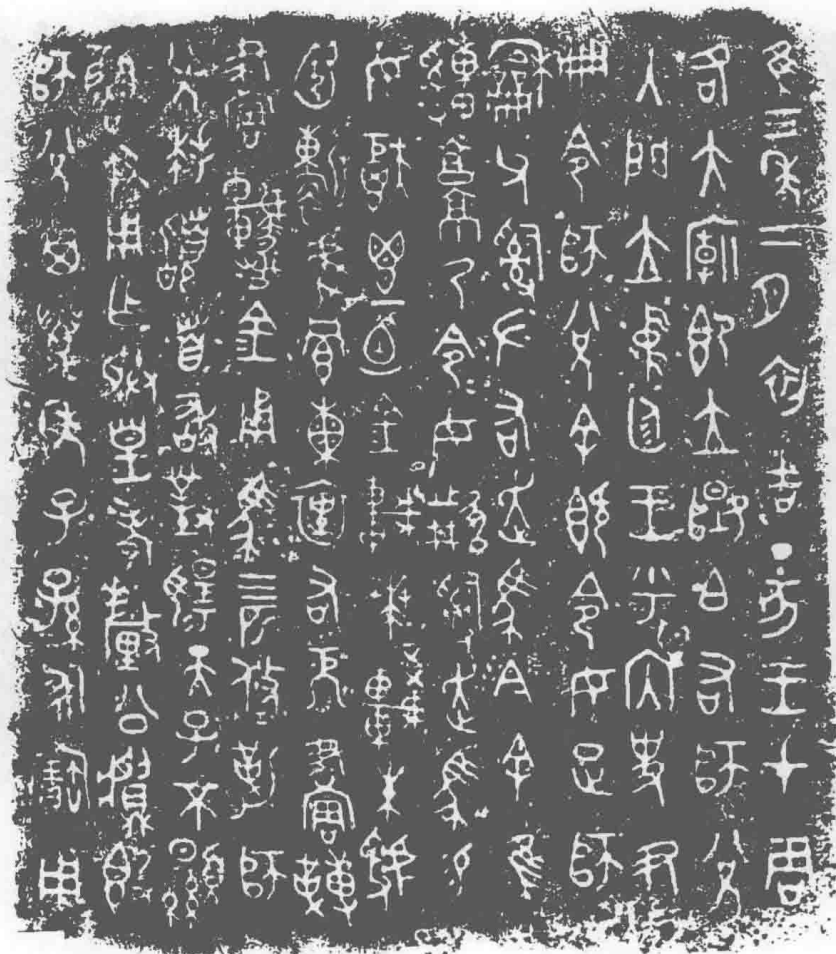


圖三 靜簋銘文



圖四 元年師兌簋銘文





圖五 三年師兑簋銘文



叔矢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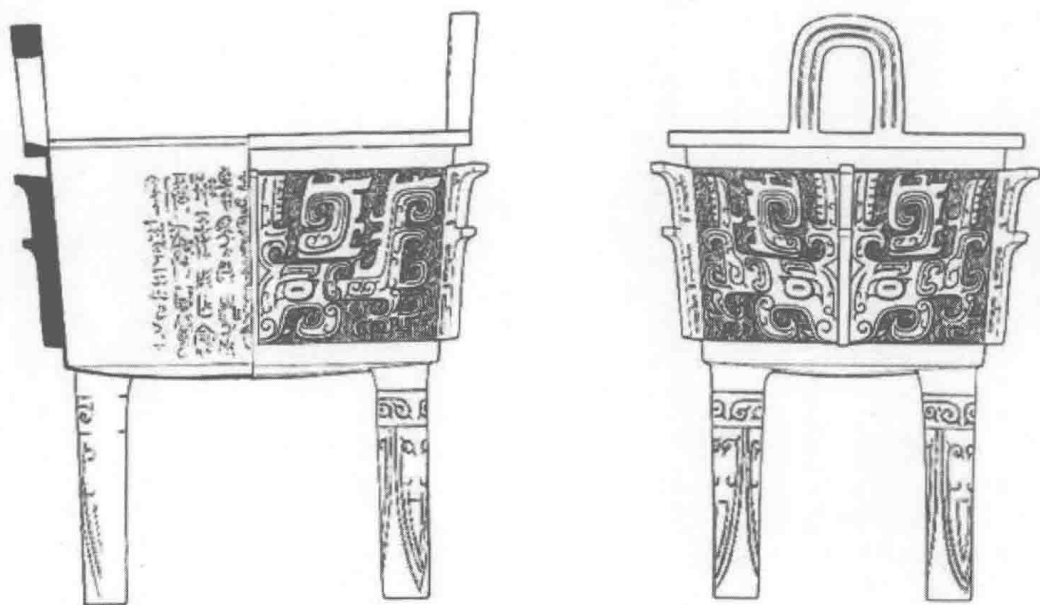


鄧公簋

圖七 叔矢方鼎與鄧公簋銘文







叔矢方鼎圖



元年師兑簋



利簋

(原載《燕京學報》第16期，21~3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與何炳棣合寫)



# 族徽銘文





## 商周族氏銘文考釋舉例

我們在參加編纂《殷周金文集成》的過程中，收集整理了有關族氏銘文方面的資料。據初步統計，商周銘文總數在一萬條左右，其中族氏銘文就有四千幾百條，數量相當可觀，幾乎接近總數之半。因此，對於族氏銘文的收集、整理與研究，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從宋代開始，就有人提出這類文字是氏族名（《考古圖》4.36，木父己卣，釋文云：“木者，恐氏族也。”）郭沫若同志曾專門撰文論證“此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號”、“此圖形文字為族氏”（《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11~20）。丁山先生在《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一書中也論述了很多氏族。日本林已奈夫等學者也作過綜合性的研究（如《殷周時代的圖象記號》東方學報京都第39冊）。此外，有關文章還有不少。總之，近幾十年來，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對這個問題是十分重視的。

但是，過去的研究除個別學者外，均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沒有全面地整理這部分資料。二是對資料缺乏斷代的研究。我們認為，全面地佔有資料是認識這一事物的基礎，而材料的時代性又是我們認識這一事物的發生、發展、衰亡的依據，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第一步我們儘可能地把國內外已發表，著錄的材料收集齊全，去掉偽器和重複的材料，然後進行斷代分析，大體上排出每件器物的時代，按族別，分早晚進行分類排比。在這個基礎上，聯繫甲骨文、金文和古代文獻，並結合器物的出土地點和同出關係，分析各族氏名間的關聯，進行綜合考察。下面我們從一千多個族氏名的說明中選取八個例子，向大家作一介紹。

### 一 冉

#### （一）概况

##### 1. 數量

一七九。

##### 2. 時代

從殷墟文化二期到西周前期。

### 3. 地點

河南安陽、濬縣。陝西長安、岐山、扶風。湖南寧鄉。湖北江陵。遼寧喀左（以上爲出土物）。山東膠縣（採集）。

### （二）說明

𠂔字在殷墟文化二期作𠂔、𠂔，即二斜劃在上部不交叉，下部不出頭，個別交叉出頭者兩豎向內收斂作𠂔，殷墟文化四期至西周初期一般是二斜劃上部交叉，下部出頭作𠂔。稍晚些的上部平劃兩側下垂作𠂔、𠂔，或省橫劃作𠂔，也作𠂔、𠂔、𠂔。其演變情況可圖示如下：

殷墟二、三期	𠂔 𠂔 𠂔
殷末周初	𠂔 𠂔
西周前期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字舊釋爲舉、鬲、再、萐、鑪等等，均不確。劉心源曾釋爲冉（奇觚五、二冉尊，奇觚八、三〇昇册匣釋文）。甲骨文、金文的冉、偁都從此，釋爲冉是對的。冉即月，均與𠂔、𠂔形近。冉、月當由𠂔、𠂔隸變而來。國名冉、月文獻亦作邠、聃等。傳爲周文王子苒季戴封國（《史記·管蔡世家》）。劉心源引《元和姓纂》云：“冉，高辛氏之後”。是否可以早到高辛氏，姑且不論。根據甲骨文、金文的材料，至少可以證明這個國族的確相當古老，在殷墟文化二期便已存在。有人認爲其地在河南開封府境內（參看江永《地理考實》僖公廿四年條），甲骨文有“𠂔比齡”（人2161），在甲骨文中“某比某”之“某”均爲人名、族氏名。“其目𠂔用，𠂔”（庫108），“目”爲進貢之意，“用”爲用作犧牲意。𠂔爲拊𠂔國族的人。這材料說明𠂔國族是臣屬於商人的國族，故其族人被商人殺以祭祖，冉器多至一七九件，這又說明該國族似曾有過相當實力。周初，冉地易主，成爲冉（聃）季戴的封國。

與冉氏族有聯繫的族氏名有亞、册、𠂔、𠂔、若、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亞字册字或系職官名，餘皆爲族氏名，說詳各條。

## 二 𠂔

### （一）概況

#### 1. 數量

八。

## 2. 時代

殷墟文化四期至西周早期。

## 3. 地點

不清。

## (二) 說明

𢇛字吳大澂釋鄉（憲齋 22、22，甲鄉爵），朱芳圃釋拳（釋叢 155），李孝定釋執（《金文詁林附錄》1041 頁）。此外還有釋乘、舉的。吳氏釋鄉於字形不類。李氏混同𢇛，執，以為是一字，亦誤。朱氏釋拳是對的。該字從𢇛從収，収（拱）亦聲，是形聲兼會意字。《說文》：“拳，兩手同械也，從手從共，共亦聲。周禮上罪梏拳而桎”。與字形正相合，且音義皆同，故知𢇛當即拳之初文。𢇛為形聲兼會意，拳則變成單純的形聲字，本意就不大清楚了。

在甲骨文中𢇛一作動詞，為加手拷束縛之意。一作人名族氏名，“甲辰貞，𢇛目鬯用於父丁”。（鄴三下 40.6），“令𢇛比畎，勿令𢇛比畎”（乙 3290），“丁酉，𢇛弗其氏媾”（續 5.19.8），“丁卯卜，勿令𢇛氏人田於𣎵，十一月”。“丁卯卜，令𢇛氏人田於𣎵”（人 268、269）。這都是人名族氏名的例證。甲骨文中有一婦嬪（甲 38），嬪即𢇛族氏之女子。此族氏的存在至少可以追溯到武丁時期。但其所作銅器目前僅見於商末周初。

# 三 弔

## (一) 概況

### 1. 數量

五十七。

### 2. 時代

殷墟文化二期至西周中期。

### 3. 地點

傳出河南安陽。

## (二) 說明

𣎵或作𣎵，方濬益釋𣎵、𣎵，認為“𣎵即𣎵字，古籀作重文者多矣”（綴遺 6、21

赫紂父乙簋）。𠄎字清人除吳榮光釋虎（虬）外，（筠清 2、9 商父乙彝），諸家都釋爲叔（如奇觚 6、24 叔觚、憲齋 13、24 叔尊等），其後羅振玉、容庚從之。𠄎字疑爲𠄎之省，在金文中，早期作𠄎、𠄎，後來統作𠄎。𠄎即𠄎，𠄎龜或作𠄎龜可證，說詳弔龜條。

𠄎作二弔形，二蟲之頭相向對稱，晚期多作此形，早期則通行單個的𠄎，且早期蟲頭以填實者居多，晚期則以虛者爲多，頭上有兩點，更爲像蟲之形。

𠄎爲族氏名，“丁酉卜，矣貞，多君曰來，𠄎氏魯。王曰：余其畀，在十月”（後下 13.2）可證。子組卜辭有“丁卯，子卜，𠄎歸”（庫 1557），所以，弔也可能是多子族的成員。第一期卜辭有：“貞𠄎弗其日凡虫疾”（前 7.21.2），“貞𠄎於兄丁”（前 1.39.3）。弔與商王關係很密切，廩辛時期有卜人弔。

與𠄎共存的族氏名有車、𠄎、龜等。

《西拾》五一簋銘作𠄎，寫法比較特殊，疑亦爲弔字，附記於此。

## 四 𠄎（藝）

### （一）概況

#### 1. 數量

十二。

#### 2. 時代

殷墟文化三、四期至西周前期。

#### 3. 地點

河南安陽、陝西寶雞出土。

### （二）說明

𠄎、𠄎甲骨文作𠄎，王襄釋爲執，各家從之。𠄎、執、執即藝之初文，本爲藝樹禾苗之會意字。在卜辭中此字有的假爲禰邇、（參看《駢枝》初編 39 頁“釋𠄎”，有的作地名用。“王其田𠄎，亡𠄎”（甲 1991），“王其田𠄎，亡𠄎”（京津 4310），在上述兩條材料中，𠄎都是地名。父丁卣（三代 13、2、7~8，器現藏北京師院），器銘爲“𠄎公父丁”，蓋銘爲“𠄎父丁”，𠄎公之𠄎顯系國邑氏名。本文收集的十二條材料，都是族氏名。從甲骨文材料看，𠄎地似在殷墟的西面。

𠄎字舊釋爲𠄎，柯昌濟云：“𠄎字從兩人執兵（即戈省形）相𠄎形”（韓華·己篇

2 頁鬩彝)。𠂔與戈有根本區別，𠂔爲禾苗形，二人相嚮而跪，雙手持禾，根本不像相鬩的樣子。清人釋爲“雙鳳集木形”固然錯誤，近人釋鬩，也與字形不符。郭沫若同志把此字與甲骨文的鬩字相混，以爲就是“王在鬩”之鬩（《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1.20），也是錯誤的。銘文爲了追求美觀，對稱，經常採取一字重復對稱出現的寫法，最常見的就是“册册”，“册册”或作“册”，實際上應看作一個字的繁文。掌握了這個規律，我們就會明白，𠂔即𠂔，亦即𠂔。

與𠂔族氏名有關聯的族氏名有戈、戍、弁等。戍或稱西戍，地在殷墟之西，說見戍條。

## 五 光（𠂔）

### （一）概況

#### 1. 數量

二十六。

#### 2. 時代

殷墟文化二期至西周前期。

#### 3. 地點

傳出河南孟津（河清）、安陽。

### （二）說明

𠂔字舊釋同（𠂔）、景、北等，都不確切。《善齋吉金錄》1.19 釋光，可從。青銅器是子子孫孫永實用的一種藝術品，因此從形制花紋到文字本身都刻意求精，求美。婦好之好作𠂔，左右各從一女，就是證明。𠂔字上從火，下從對稱之二人形（古文字單綫與雙鉤無別）。一般說來，如果對稱的話，應作𠂔。此字上部𠂔字假借筆劃重合而爲𠂔，是比較特殊的對稱例子。所以，這個字上從火，下從人，應即光字。這種對稱裝飾，在金文、甲骨文中都不乏其例。特別是在族氏名的銘文中，爲數更多，甚至可以說是這類銘文字體的重要特點之一。

單獨的光字，在商末，上部所從之火，多以填實爲主，西周則以虛廓爲其特徵。

光在甲骨文中作地名、國族名。“貞，光隻羌”（前 5.32.7），“光來羌”（京津 1287），可證。梁上椿云：“光銘之彝器近屢見，均出安陽，意爲一族之符號歟”（巖窟上 22），梁氏的意見是可取的。



有八件器銘爲“單光”，成組地出土於河南河清（孟津），當爲同一族氏所作器。應該指出，在西單條中，我們已經提到西單光方鼎（嘯堂 12、博古 2.32，周單父乙鼎）、西單光觚（冠壘中 11），由“西”“單”“光”三字組成族氏名。光字也如上述，諸器作對稱繁體形，頗具特徵，爲它器所未見。因此，我們有理由把單光看成是西單光之省。也就是說，河南河清（孟津）之單光族應與西單光族和西單族有極爲密切的關係。

與光相關聯的族氏名還有冊等，冊或係職官名。

## 六 𠂔

### （一）概況

#### 1. 數量

二十九。

#### 2. 時代

殷墟文化三、四期至西周中期。

#### 3. 地點

傳出河南安陽、洛陽。

### （二）說明

𠂔舊說分爲兩字，大釋爲子，豕釋爲祭祀之物。自從殷墟甲骨文字問世後，知道第一期卜辭有𠂔，係族氏人名，所以應釋爲一字。它究屬後世的什麼字，待考。

𠂔字舊釋爲“人牽三牲形”，有的釋爲“馬形鼠形”，解爲：“周鼎作鼠，令馬履之”，（綴遺 17、26，父丁馬形尊），由於不明其義而曲爲之解。此字，中爲𠂔，左右各從一馬形，應釋爲馬𠂔二字的合文。在族氏銘文中，爲求美化、對稱，一個字出現在另一個字兩側的例子很多，此不贅述，甲骨文中有𠂔字，張家坡在一九六七年曾出土一觶，其銘文爲兩馬相對形（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四期 468 頁）。兩馬間夾以族氏名的還有馬馬羊先父乙鼎等（錄遺 47），這些都爲釋𠂔爲馬𠂔二字合文提供了證據。

馬爲商代職官名，“多馬”、“族馬”，“馬小臣”之類的例子很多（參看《綜述》508~509 頁）。馬𠂔與亞雀、小臣𠂔、自般相類，前面的馬爲職官名，後面的𠂔爲族氏人名。值得注意的是亞，自之類官名和族氏人名相結合的例子很多，而馬某的例子在甲骨文中尚未發現。馬𠂔的銘文爲這方面提供了例證。同時，在甲骨文中，𠂔的活動記

載較多，這對探討馬這一職官的職務當是有益的。

豪這一族氏最早見於武丁時期，後來一直延續到西周中期，也是屬於歷史較長的族氏之一。

## 七 曹

### (一) 概況

#### 1. 數量

二。

#### 2. 時代

殷墟文化三、四期。

#### 3. 地點

不清。

### (二) 說明

大曹爵一作大棘，二字分書。一作𣎵，大曹二字合書。後者似爲一字，但與前者比較，可知確爲二字。棘之分爲東、東，猶𠂔之分隔𠂔爲口、口。這是合文的另一種形式。

東爲橐之本字（徐中舒先生說，詳《甲骨文字集釋》2029），假橐爲東方之東，久假不歸，遂作橐以區別於東。《說文》：“棘，二東，曹從此，闕。”許氏對此字無說，僅指明其與曹有關，其實它就是曹之本字。《說文》：“曹，獄之兩造（曹）也。在廷東，從棘。治事者，從曰。”許氏“獄之兩造”，“在廷東從棘”，“治事者，從曰”之說，皆不可取。但曹於文獻訓偶，輩、群則與兩造之意合。二東（橐）相併，故有偶、輩、兩造、群之意，“獄之兩造”非其本義。棘，亦作曹，曹從口（從口之字後作曰者，其例甚多），殆即槽之本字。

曹在第一期卜辭中就以國族地名出現：“貞𩇑伐棘其𣎵”（後上 15、15），第五期卜辭有：“壬寅卜，才𣎵貞，王步於瀑，亡𩇑”（前 2.5.5）。文獻上有曹國，傳爲周文王子叔振鐸所封國，地在山東境內。由商代的甲骨文和族氏銘文可知，曹國早就存在，周武王滅商以後，曹被滅國，後改封給曹叔振鐸，這當可補文獻之不足。

與曹有關聯的族氏名爲大（天）。

## 八 西隻單

### (一) 概况

#### 1. 數量

四。

#### 2. 時代

殷墟文化四期至西周早期。

#### 3. 地點

傳出陝西。

### (二) 說明

𠂔從偏旁分析應為西隻（獲）單三字。舊釋旗雞單、出爵單、西獸單等均於字形不相符。有此銘者共見四器，出土地均不詳。其中一觶收於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中，有可能得之於陝西境內。

金祥恒所編的《陶文編》4.26 收一陶文作𠂔（原釋畢）。如果這條材料可靠的話，我們可以用來與銘文中的西隻單相比較，發現二者酷似。陶文之佳應為隻之省變。陶器上有此數字，證明它們應為地名或族氏名。

上面指出西隻單是合文，但其讀法尚需研究。我們認為，族名有西單、有隻（詳西單條與隻條），很可能這是西單和隻的複合族氏名。

例一是冉。我們首先根據銅器形制的早晚，排列出銘文的早晚，歸納出冉字在殷墟二、三期、殷末周初、西周前期這三個時期的不同形體。掌握了這個形體規律，反過來，對若干不大容易斷代的銅器，再根據這個規律去推定其時代。可見，銅器斷代與文字斷代是互為表裏的。通過斷代分析，可以看出，冉國族很古老，是商周間的大族或大氏之一，周初滅國以後改封給文王之子月季戴。弄清這個族氏的情況，對古代史的研究無疑也是有益的。

例二是𠂔。𠂔為其初文。過去人們往往把這個族名理解為動詞，就不得要領。𠂔作動詞為拷綁意，銅器上單獨著一表示拷綁的銘文，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從幾個方面證明，𠂔確為商代的一個族氏名。

例三是𠂔。𠂔字前人釋𠂔，但它與𠂔是什麼關係，字形上是怎樣變過來的，都不

清楚。我們從𠄎龜或作𠄎龜，證明𠄎即𠄎，這是一個字的兩種寫法。𠄎是𠄎的省文。這就從𠄎之即𠄎找到了字形上的依據。同時，通過斷代研究，我們發現早期作𠄎，晚期作𠄎，𠄎作𠄎是出於美化對稱的需要。前人認為未即赫，是信而有徵的。

例四是藝。舊說把藝之繁文釋為鬩是不妥當的。我們用偏旁分析的方法，並注意族氏銘文經常採用一字對稱重複書寫的規律，提出了新的看法。

例五是光，繁文光是較特殊的對稱裝飾例證，我們通過對銘文書寫特點的分析，提出了單光族氏即西單光族氏，光族氏與西單族氏有密切關係，這就為研究族氏的分合找到了很好的例證。

例六是𠄎。我們對這個古文奇字考釋為馬𠄎。這個族氏名的考釋不僅對瞭解商代職官的情況有所幫助，而且對瞭解族氏銘文的特點，以及運用這種認識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銘文也是很重要的。

例七是曹。我們論證了東、棘、曹的關係，又證明了𠄎即大棘二字的合文，找到了在族氏銘文中另一種合文形式。同時也指出了商之曹滅國後改封的又一個史實。

例八是西隻單。我們確認這是由西、隻、單三字構成的合文，應讀為西單隻。這是又一種新的合文形式。這樣，與西單族氏關聯的除西單光外，又找到了西單隻族氏。

綜上所述，對商周金文族氏銘文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對研究古代文字的形體演變、書寫特點，對研究古代的族氏制度，研究商周社會歷史，研究商周考古等等都是極為有益的、極為必要的。我們對此只是做了一些資料工作，研究還是初步的。不當之處，請專家學者多多批評指正。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七輯31~41頁，中華書局，1982年6月，與張亞初合寫）

## 殷周青銅器上的特殊銘刻

### 一

迄今爲止，已著錄的先秦有銘青銅器約 13000 件，其中半數左右銘刻極爲簡短，有的僅銘刻一個十分象形的字，有的在此外再加一父祖日名，由於缺少上下文例比附，對這些字或短語的釋義，學者們見仁見智，說法不一。較有影響的有郭沫若的“族徽說”、“族氏說”和“族名說”<sup>①</sup>，張振林的“家族標記說”<sup>②</sup>，吳其昌、饒宗頤的“私名說”<sup>③</sup>以及日人白川靜的“特殊集團說”<sup>④</sup>和林已奈夫的“旗上之物說”<sup>⑤</sup>等。其實，早在宋代已有學者對這一問題作了研究。如《考古圖》4·36 木父己卣，釋文云：“木者，恐氏族也。”以上諸說，皆能言之成理，各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部分器物上銘刻的內容，但終難概括所有此類銘刻。在沒有完全搞清其內容的情況下，我們不妨暫稱其爲“特殊銘刻”。對這部分資料的理解，恐怕是金文研究領域中最困難的部分了，應給予足夠的重視，並加以特殊的處理和研究。

### 二

這類銘刻雖少有文例比附，但多數可在甲骨文中找到同形的字，下面我們舉例作些對比分析：

𠂔 金文釋大或天，在特殊銘刻中有 50 餘例。

甲骨文寫作𠂔，有作地名者：如“丁卯卜，貞，王田天，往來亡𠂔”（《前》22784）；金文有“𠂔”（《集成》9798），甲骨文有“貞，翌甲……子大……征𠂔”（《合集》7631）；金文有“𠂔天”（《集成》8141），甲骨文𠂔亦爲地名：“羊𠂔芻於𠂔……”

(《存》1、719); 金文有“天舟”(《集成》5205), 甲骨文“舟”亦地名: “于舟炆, 雨”(《甲》637)。

𠂔(《集成》) 10635) 金文“亦”字, 甲骨文作地名: “己未卜, 行貞, 王……𠂔亡尤, 在亦卜”(《文》456)。

𠂔(《集成》1635、1636、10636) 金文釋“需”, 甲骨文爲地名: “……往奠……乎般在𠂔《合集》4258)。

𠂔金文釋矢, 有 20 餘例, 甲骨文爲先王名或地名: “虫王矢, 伐三, 卯牢”(乙 5317), “辛酉卜, 𠂔貞, 於矢先鬯, 一月”(《前》1、48、3)。

𠂔金文釋𠂔, 有十餘例。甲骨文爲人名: “𠂔口𠂔令監凡”(《寧》1、500)。

𠂔此字金文中有 20 餘例, 無確釋。甲骨文作人名: “𠂔不其呼來”(《合集》4444), “𠂔𠂔令蓋射”(《合集》5770)。

𠂔金文釋𠂔, 有 20 餘例。甲骨文作人名: “乙丑卜, 翌丙, 𠂔虫至”(《合集》72)。

𠂔金文並字, 凡 10 餘見, 甲骨文用爲地名和方國名: “王令並”(《甲》609), “𠂔般乎田於並。”(《佚》95)。彭邦炯考其地在山西太原、石樓一帶, 是殷人一大族<sup>⑥</sup>。

𠂔金文𠂔字, 凡 20 餘見, 甲骨文方國名: “乙未卜, 勿用𠂔於咸”(《合集》238)。

𠂔𠂔字不識, 金文凡 80 餘見, 有與“小臣辰”、“臣辰”連用者, 𠂔顯然是其家族名號。甲骨文爲方國名: “……爭貞, 𠂔齊亡禍”(《乙》8264)。

𠂔金文疑字, “亞疑”凡百餘見, 有與𠂔侯連用者, 應是𠂔侯家族的名號。甲骨文則用爲貞人名。

𠂔(《集成》7402、9120) 金文釋北, 又有“北子”(《集成》2329、5762、6476、6507、10084)、“北伯”(《集成》1911)。甲骨文爲方國名: “辛亥卜, 北方其出?” “王其征北方”(《存下》755)。王國維據北器出於河北涿水, 定其地在殷北部地區<sup>⑦</sup>。

𠂔、𠂔(《集成》2919、3196、3206、3518、4977、5074、6282、6587、9058) 金文釋執。甲骨文作地名或方國名: “王其田執, 亡灾”(《甲》1191)。“癸卯卜, 貞, 執其戎汴”(《遺》964)。

𠂔金文凡百餘見, 字不釋。甲骨文作人名: “辛卯, 王……小臣𠂔……其亡圖……於東對, 王占曰吉”(《合集》36419)。“𠂔其遷至於攸若, 王占曰大吉”(《合集》36824)。

限於篇幅, 我們只舉出上述例證, 這只是全部材料中很小的一部分。從中不難看出, 與金文同形的甲骨文多是方國名、地名、人名。在甲骨文中方國名、地名、人名往



往是同一的，蓋古代個人的活動與其家族、地區乃至方國的活動聯繫非常緊密，因此常常混用不分。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金文特殊銘刻中應該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代方國（地區）、家族以及個人的名號。

### 三

殷周金文特殊銘刻中的古代方國名，被成功解讀的有三個例證：

第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郭沫若作《金文餘釋之餘》有《釋須句》一節（後收入《金文叢考》）。他對𠄎簋（《集成》3034）的銘文作了如下考證：“今按，此乃須句二字之合文也。𠄎自句之異，𠄎乃須之省。……須者鬚之初文，象形，今作𠄎，則是省頁而存鬚，其爲須字無疑。句者鉤帶之鉤之本字，𠄎像帶鉤之形，口聲，今作𠄎，乃移口聲於象形文之間耳，自當是一字。須句，古國名，春秋僖公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其前年左氏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今得識此銘，則須句有古物可徵矣。”

此銘金文僅一見，《攀古樓彝器款識》下35、《恒軒吉金圖錄》45有綫圖著錄。其器爲一簋，雙耳有珥，腹部布滿乳釘，故又稱“百乳彝”，形制應定在殷墟晚期。郭老對須句的考證，爲我們解讀金文特殊銘刻提示了一個有效的方法，即將文字結構的分析和歷史史實的分析結合起來，用以探求特殊銘刻的特殊含義。

第二，1965年，陝西綏德縣塢頭村一商代墓葬裏出土一件戈，銘文作𠄎。裘錫圭先生於1990年寫《釋“無終”》一文，他考證道：“我們認爲這一族名是由兩個字合成的。上方的𠄎跟屢見於殷墟甲骨文的終字初文𠄎顯然是一個字……上引族名合文中的下方一字是在刀形的鋒刃部分加一圓圈而成的……可知此字的本義當爲鋒刃一類意義……我們考察的由終、𠄎二字合成的族名無疑應讀爲亡終，亡、無古通，例不勝舉。亡終就是見於《左傳》的戎狄族名無終。1986年，山西文物工作者在公安部門緝獲的走私文物中發現了一枚‘亡𠄎’，三孔布。朱華《略談無終三孔布》釋此幣面文爲無終（《中國錢幣》1987年第3期），十分正確，可證無終在古文字裏確可寫作亡終……無終兩見於《左傳》……所以就現存史料而言，說無終是北狄的一支比較妥當。”

按，與綏德戈銘相同的銘文在金文中尚有八例：《集成》1450、1451、1452著錄三件鼎，7023、7024著錄兩件觚，7611、7612著錄兩件爵。這七件皆屬商代器，其中1451、7024、7612三件現藏故宮。此外《集成》6418著錄一觶，現存上海博物館，似可晚至西周早期，銘文爲“無終、𠄎、父辛”，𠄎有可能是作器者的私名，銘文大意爲

無終國的𠂔爲其父辛作此器。

順便提一下，甲骨文有“……占曰：有崇婁……𠂔𠂔𠂔”（《合集》4307反）。《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的作者將𠂔𠂔就釋爲無終<sup>⑧</sup>。

第三，1973年，遼寧喀左縣發現銅器窖藏，其中一件壘上有“父丁、𠂔𠂔、亞𠂔”六字銘文。唐蘭先生看到這組器後，立即斷言：“這個地區，在商代屬於孤竹國，也就是伯夷、叔齊的老家，現在從出土實物可以得到證明了。”他還在註解中作了詳細考證：“《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下說：有孤竹城。應劭注：故伯夷國。清《一統志》令支故城今遷安縣西，又孤竹山在盧龍縣西，孤竹城在山陰。據《爾雅·釋地》觚竹是北荒。《逸周書·王會解》有孤竹、不令支，《國語·齊語》、《管子》和《史記·齊世家》都記載齊桓公伐孤竹事。今河北省遷安縣附近的古孤竹城，可能是孤竹國的一個都邑，而孤竹國的國境絕不止此。清呂調陽的《漢書地理志詳解》則說：（今喀喇沁左翼）旗南八里有故龍山城，蓋即令支城也。……又旗東北二十五里有元利州城，蓋志所云孤竹城。汪士鐸《水經注圖》所附《漢志釋地略》則以喀喇沁左翼爲《漢書·地理志》的遼西郡文成縣。今按喀左在遷安東北，離遷安不到三百里。這種屬於四荒的國家，還在遊牧情況下，地廣人稀，喀左應屬孤竹是無疑的。”<sup>⑨</sup>

唐先生雖正確地指出銅器所出地喀左是古孤竹國，但並未對銘文作詳細考證，只是隸定爲“父丁𠂔冉𠂔亞”六字。對銘文作出考證的是晏琬，他指出：“前一字從子從日，上左從瓜得聲，應隸定爲𠂔。《說文》瓜字象形，徐鍇說：外像其蔓，中像其實，銘文𠂔、𠂔等形正是如此。《古璽文字徵》戰國私印令狐佗，狐字的偏旁瓜作𠂔。戰國前期器令狐君嗣子壺瓜字作𠂔，互相參照，不難看出瓜字演變的途徑。後一字𠂔，在卜辭和銅器銘文中常見，前人或釋竹，或釋冉。按周代銘文中的冉都從毛作𠂔，像毛冉冉，不同於𠂔，而作爲偏旁的竹作𠂔，則與𠂔相近。因此，北洞壘中這兩個字是𠂔竹，即文獻裏的孤竹，全銘應爲父丁，孤竹，亞𠂔。”

按上述銘文中的亞𠂔，有可能是作器者的家族名，全銘應理解爲：“孤竹國亞𠂔家族中的成員爲其父丁所作的銅器。”假若這種理解可以成立，與孤竹相聯繫的器就都可以得到較好的解釋。如：金文有銘爲“亞𠂔孤竹”的方壘一件𠂔𠂔𠂔（《集成》9793），應理解爲：“孤竹國亞𠂔家族的成員所作的器。”又有銘爲“亞𠂔孤竹𠂔”的鼎一件（《集成》2033），應理解爲：“孤竹國亞𠂔家族一個名叫𠂔的成員所作的器。”又有銘爲“亞𠂔孤竹父丁室”的卣、觚各一件（《集成》5271、7293），應理解爲：“孤竹國亞𠂔家族的一個叫室的成員爲其父丁所作的器。”上述情況說明，特殊銘刻在記載古代方國、家族、人名時，用詞很簡短並僅用名詞。即使這些名詞也經常有所省略，如：亞𠂔竹室鼎（《集成》2362）孤竹就簡省爲竹。亞𠂔室鼎（《集成》2427）

將孤竹國名全部省略，只保留了家族名和私名。《集成》的 386、1423、6986、7793、7794、11444 等六件器，只有“亞婁”兩字，省略了國名和私名。《集成》1424 鼎銘爲“亞婁止”，《集成》8777 銘爲“亞婁天”，省略了國名，也省略了家族名或私名中的一個。

類似的古國名，如息國、斟尋國、房子國、北子國等等，也都在新出的銅器中找到了相應的特殊銘刻，並得到出土地和文獻的印證，可見在特殊銘刻中可能有一些是古國名。

#### 四

在特殊銘刻中，有一些家族名也可以得到較好的證明。如大家所熟知的陝西扶風莊白出土的微史家族銅器，在折、豐、癸幾代人所作銅器銘文的末尾都記有册木羊册，其中“册”是官名“作册”的縮寫，“木羊”則應是微史家族的家族名。

再如陝西長安灃西張家坡邢叔墓地 152 號墓出土的炭盤鼎銘爲“井叔作……”，而同墓所出帶流鼎却僅名一“井”字，可知“井”應爲邢叔家族的族名。

又如有一出現近百次的特殊銘刻“大𠄎”，我們試舉其中幾件器銘加以分析：

獻侯𠄎鼎

唯成王大彙在宗周，賞獻侯𠄎貝，用作丁侯尊彝。大𠄎（《集成》2626）

天君鼎

丙午，天君饗禋酒，在斤。天君賞厥征人斤貝，用作父丁尊彝。大𠄎（《集成》2674）

大𠄎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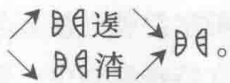
大𠄎、獻、祖丁（《集成》7213）

大𠄎簋

大𠄎、亞尤、獻（《集成》3393）

這很可能是獻侯家族祖孫三代所作的一組銅器，第一代是丁侯，第二代是獻侯𠄎，第三代是亞尤。此家族用“大𠄎”作族名，其中“獻侯”在後兩件器中省作“獻”，這一省稱又構成晚世族名的一部分。

類似族名省簡的例證尚有許多，如《集成》4059 著錄一簋，其作器者爲濬司土逯，銘末族名爲𠄎。《集成》2344、5363、5364、5954 所著錄諸器銘文爲“濬伯逯𠄎”，《集成》2177、2178、6480、9424、10078 諸器銘文爲“逯𠄎”，《集成》8229、8230、8231 諸器銘文爲“濬𠄎”，而《集成》899、3366、3557、3579、9827 諸器銘文僅爲

一字“𠄎”。其省簡的軌迹是：渣司土送𠄎→𠄎渣伯送。。𠄎應為渣伯家族的族名。

上述例證說明，在特殊銘刻中，確有一些是家族名。

## 五

在特殊銘刻中也有一些似乎不是族名。如：1935 年安陽侯家莊西北崗 1004 號大墓出土的兩件方鼎，出土時挨在一起。大鼎內底銘一牛形，實測容積為 62585 毫升（約合六斗），小鼎內底銘一鹿形，實測容積為 35033 毫升（約合三斗）。陳夢家先生早年曾指出，這兩件方鼎上的銘文是標明鼎的用途的<sup>⑩</sup>。

按《九家易》云：“牛鼎受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sup>⑪</sup>《淮南子·詮言》云：“夫函牛也，鼎沸而蠅蚋弗敢入。”金文中對鼎的功用也有說明，如：

卣鼎

作朕文考兗伯鬯牛鼎（《集成》2838）

史獸鼎

賜豕鼎一、爵一（《集成》2778）

伯庠父鼎

伯庠父作羊鼎（《集成》2535）

函皇父盤

自豕鼎降十又一（《集成》10164）

這說明鼎之功用是有分別的，侯家莊兩方鼎中牛方鼎之牛字，指明其功用是煮牛的，鹿方鼎之鹿字是指明其功用是煮鹿的，而並非表明該鼎是牛族或鹿族所有的。

安陽侯家莊西北崗 1001 號大墓曾出土三件方盃，一件銘文為“左”，一件銘文為“右”，一件銘文為“中”。多數學者認為該墓三盃的銘文左、中、右是標明在禮儀中擺放的位置，而並非標明三個盃為左、中、右三族所有。

有些金文在通常出現族名的位置處綴以一組數字符號。如：

史游父鼎銘末綴有“𠄎”應釋為七五八（《集成》2373）

堯伯鼎銘末綴有“𠄎”應釋為八五一（《集成》2156）

效父簋銘末綴有“𠄎”應釋為五八六（《集成》3822）

中方鼎銘末綴有“𠄎”應釋為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集成》2785）

這些數字符號已被著名學者張政烺先生考證為八卦符號，與族名無關<sup>⑩</sup>。

可能在特殊銘刻中，還有不少我們暫時無法理解的銘文，因為有些銘文既無文例可循，又無出土記錄可參照，無法考其確切含義。所以，在釋讀這些銘文時，應持謹慎態度，不能隨意指其為某某族名。

## 六

綜上所述，殷周金文中的特殊銘刻，應該肯定其多數是由古代的方國名、家族名、個人私名組成的。其構成特點有三：一是祇羅列名詞，不夾雜其他詞類和語法成分。二是經常省簡某些成分。三是某些方國名常以合文的形式出現，文字拼合得十分巧妙。還應注意特殊銘刻中也包含一些非族名銘文。

因為族名金文的構成是分層次的：方國——家族——私名，所以釋讀這些銘文也應分層次進行。第一步應設法找出方國名，第二步將凡與某方國名聯繫的銘文聚在一起，分析各家族名和私名。

記載這些族名的銅器的時代，絕大多數屬於殷周之際，所以這項研究對瞭解殷周社會的組織結構是十分有意義的，這些第一手材料將極大地加強對殷周社會史的研究。

### 註 釋

- ① 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P11～20《殷彝中國形文字之一解》，科學出版社，1961年。
- ② 張振林：《對族氏符號和短銘的理解》，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屆年會論文，1990年。
- ③④⑤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的圖像記號》“以前的研究”，《東方學報》京都第三十九冊，1968年。
- ⑥ 彭邦炯：《并氏、并器與并州》，《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2期。
- ⑦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5《北伯鼎跋》。
- ⑧ 《殷墟甲骨文刻辭類纂》第1192頁。
- ⑨ 唐蘭：《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銅器談起》，《文物》1973年第10期。
- ⑩ 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3年。
- ⑪ 黃奭輯：《九家易集注》，載《漢學堂經解·易類》。
- ⑫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書名簡稱對照表

簡稱	全名	作者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合集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主編
存	甲骨續存	胡厚宣
甲	殷墟文字甲編	董作賓
乙	殷墟文字乙編	董作賓
前	殷墟書契前編	羅振玉
文	甲骨文錄	孫海波
寧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	胡厚宣
遺	殷契遺珠	金祖同
佚	殷契佚存	商承祚

(原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13~18頁)





# 數位記號



# 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 筮法的幾個問題

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中方鼎”，銘文末尾有兩個由數字組成的“奇字”。王黼在《博古圖》上釋為“赫赫”。郭沫若同志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中認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

解放後，出土物日益豐富，這類“奇字”也隨之而增多。唐蘭先生於《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一文中，收集了若干材料，認為這都是“文字”，是“特殊形式的文字”，而且是“殷和周以外一個民族的文字。”

不管是“文字說”還是“族徽說”，都沒有反映事物的本質。因此，也就都無法講清楚這個問題。

李學勤同志在《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1期）一文中曾提出：“這種紀數的辭和殷代卜辭顯然不同，而使我們想到《周易》的‘九’‘六’。”一九七八年年底，於長春召開的古文字學術討論會上，張政烺先生第一次具體地運用《易·繫辭》所載八卦揲蓍法的原理，來解釋周原新出土甲骨上的這類紀數符號，確認它們是八卦的數字符號。這在與會者中間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為科學地認識和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我們收集了這方面的一些材料，初步形成了幾點粗淺的認識，現提出來，就正於同志們。

## 一 在商、西周甲骨文金文陶文中 出現的八卦數字符號

我們整理了絕大部分金文材料和部分甲骨、陶文材料（剔除了偽器、偽銘），共找

出銅器十三件（十四條）、甲骨十一片（包括骨制箭鏃兩件，共十五條）、陶範、陶罐等四件（共六條），璽印一件，共計二十九件器物上，記有三十六條八卦數字符號（圖一、二；表一）。上述材料中1~14、22、27、28，十三件器物（十七條）材料系科學發掘出土物，占全部材料的半數。這些符號廣泛見於商和西周的甲骨、銅器和陶器上，包括青銅禮器的鼎、簋、甗、卣、壺、盤，制銅器的陶範、日用陶罐、龜甲、獸骨和骨制箭鏃等。應該說，材料已比較豐富，可以從中得出一些比較明確的認識了。

## 二 談幾點認識

### （一）為什麼說上述符號是占筮的八卦數字符號

上述三十六條材料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數目字的組合，而且都是由三個或六個數字構成的組合。這不能不使我們與導源於數卜<sup>①</sup>的我國古代占筮法——八卦聯繫起來。八卦的每個卦由三個爻（單卦）或六個爻（重卦）組成，每個爻也都是可以用數字來表示的。

材料16的銅鼎銘文為：“史旂父𠄎（作）寶尊彝，貞𠄎。”第一字“𠄎”與“中”之作“𠄎”，“仲”之作“𠄎”字形均不同。與“史”之作“𠄎”字形相近，所不同的是下部不從“𠄎”。我們認為此字即“史”字之省文。這與“對”之作“𠄎”（《金文編》122頁、亳鼎）、“敢”之作“𠄎”（《金文編》219頁頌壺）、“射”之作“𠄎”（《金文編》293頁射女盤）相仿。在金文中省“𠄎”之例習見。所以此應讀為“史旂父”，其職為“史”，其字為“旂父”。銘文以“作寶尊彝”為句，下面一“貞”字，當即“貞卜”之“貞”。再下之“𠄎”，當是占筮以後得出的八卦符號。“貞”與“𠄎”相連，是這類符號為八卦數字符號的有力證據。由文獻可知，古代卜筮是由巫史掌管的，“筮者”亦為“史”（可參看《儀禮·少牢饋食禮》、《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傳等記載）。那麼“史官”“旂父”自己占筮，並把占得的八卦數字符號鑄於銘文之末，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史懋壺”蓋銘（三代12.28）看得更清楚。“唯八月既死霸戊寅，王在莽京滋宮，窺（親）令史懋路𠄎（筮）。咸。王呼伊伯錫懋貝。懋拜稽首，對王休。用作父丁寶壺。”“筮”字過去誤釋為“筭”（算），方濬益第一個認出此字，他認為“路筮”即文獻所載的“露筮”。（《綴遺齋彝器考釋》13.8）史懋因“露筮”有功而得到周王的賞賜。

就殷墟出土的甲骨而言，絕大多數是占卜文字，與宗教活動有密切關係。四盤磨出土的甲骨，在原發掘報告中，編者曾指出：“橫刻三行小字，文字不合卜辭通例”，這是對

的。但認為此類甲骨文為“習刻”，則並不妥當。據原始發掘記錄所載，這是一片塗硃字骨。如果是隨意的“習刻”，何以要那麼鄭重其事的塗上硃砂呢？我們認為這可能與宗教活動有關，似乎不應解釋為“習刻”。材料1、3上部各為六個數字，下面為“曰：□，”“曰”下一字不識。按文例看，與卜辭之“卜曰”“王固曰”似乎是相同的。“卜曰”是根據卜兆得出的結論。“王固曰”云云，是占辭。那麼，與八卦數字符號相連的“曰”字下面的“某某”即應為占筮的卦辭（或卦名）。這種情況在材料11中表現得更清楚。“曰”字後面的“其人王□魚”，顯然是根據“七六六七一八”這個八卦符號作出的判斷。

商代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與西周陝西岐山周原出土的甲骨上都出現“‘八卦數字符號’加‘曰’加‘某某’”這種文例，應該看作不是偶然的巧合。這說明占筮這種宗教活動，商、西周是一脈相承的。這種符號雖然也記錄到甲骨上，但它與卜辭有明顯的不同。它既不與卜兆相對應，文辭也與卜辭不符，而與八卦的記載却吻合無間。因此，我們認為這類符號就是占筮的八卦數字符號，也是最早記錄下的我國古代占筮的材料。

## （二）筮法起源於何時

據文獻記載，筮法起源很古。《易·繫辭傳下》“古者包（伏）義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對於這一記載，學者間也有不同看法，但多數持肯定意見，認為伏犧氏是原始社會的傳說人物，雖然不一定確有其人，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代表來理解，則是合理的。在原始社會存在占筮這樣的迷信活動也是完全可能的，這是一種意見。另一種意見認為“卜用龜，殷人有之。筮用蓍，法較簡，乃周人發明”（鄭衍通《周易探源》十九頁）。

考古材料是歷史的見證，對評判上述兩種意見的得失最有發言權。原始社會是否有筮法可以存而不論，因為目前考古材料中尚未發現。而商末記載八卦數字符號的材料却有多條，如1~3、30~32等。材料30是山東平陰朱家橋M9中的隨葬陶罐肩部刻文，是由“一八八六一一”六個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該墓的時代是商代末期。在遠離殷都的邊遠地區村落遺址中，在一個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的墓葬中，在一個普通的日用陶罐上出現這種八卦數字符號，這當然是商代已經盛行占筮活動的確切例證。

安陽四盤磨出土的胛骨從字體上看相當於甲骨第五期。它說明在商王朝的統治中心，與邊遠的朱家橋一樣，通行着同類的占筮活動。

其實，可以找到更直接的材料，說明早在武丁時期已有占筮活動。在從武丁到帝辛時的甲骨文中，有許多“𠄎”字（爻字亦其例），就能說明這個問題。楊樹達先生在《積微居金文說·史懋壺跋》中認為，“𠄎”即“筮”字。“史懋壺”“路筮”的“筮”，作“𠄎”，從“竹”、從“ΨΨ”。詛楚文“巫”作“𠄎”。在古代“巫者”、“史



官”，“筮人”是三位一體的。而且在上古音中，“巫”“筮”同屬“明紐”、“魚部”，聲韻俱同。《周禮春官宗伯》“筮人：……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九曰巫環，以辨吉凶。”鄭玄注曰：“此九巫，讀皆爲筮，字之誤也。”陸德明音義曰：“巫音筮。”所以，“巫”、“筮”形義相近，聲音相同，在甲骨文中還是一個字，後世纔分化爲二字。

《京都》122：“丙戌卜……𠩺曰禦……百……於自……六月。”《續存》2.28：“丙戌卜……貞𠩺曰𠩺，貝於帚用，若，一月。”“𠩺曰”即“巫曰”，即巫史從占筮中得出的“卦辭”。在甲骨文中“𠩺”字不下四、五十見。說明在甲骨文中當有一定數量的占筮記錄材料。

我們認爲，從現有材料看，筮法的出現，最遲不能晚於武丁。而且，運用筮法以占卦，商人大大早於周人。材料15是更加直接的證據。

### （三）駁“文王發明重卦”說

占筮的“卦”的創始人有“神農”說，“伏羲”說，“夏禹”說，但最流行的還是“文王”說。《史記·周本紀》：“西伯（文王）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司馬遷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史學大家，因此他的這段推測之辭也就爲後人普遍相信了。其實仔細讀他的書就會發現，他在這段話裏，連用了兩個“蓋”字，也就是“大概”的意思，說明他對這種說法是沒有把握的。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經通說》中指出：“重卦爲何人所作，先秦古書均未道及，司馬遷云：‘文王……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史記·周本紀》）。班固云，‘文王……重《易》六爻’（《漢書·藝文志》）。其後王弼謂伏羲重卦，鄭玄謂神農重卦，孫盛謂夏禹重卦（並孔穎達《周易正義·序》引）。此皆無徵之言，不足信也。竊謂重卦之事，至晚當在殷代。”如果說，這是高亨先生合理的假設的話，那麼今天我們可以用考古材料來予以證實了。

材料1~3、30~32都是商代後期的重卦，有的略早於文王，有的與文王活動的時代相當。以材料30來說，平陰朱家橋M9的時代雖與文王約略相當，如果“重卦”是文王發明的，怎麼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把這種複雜的筮法普及到遙遠的東方平民中去呢？這是不好理解的。

材料說明，在文王之前或同時，從商王都城到邊遠地區都廣泛地流行着這種重卦的占筮方法。因此，說“重卦”是文王發明的，是不太可能的。“重卦”這種比較複雜的占筮方法，說是某個人在一時一地發明的，按常理推論也是不大可能的。正如說“火”是燧人氏發明的，“文字”是倉頡造的，“採桑養蠶”是嫫祖發明的等等一樣，是不足爲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擁有的材料看，單卦數字符號絕大多數不是出在商代或商的器物上。而是大多出在西周政治中心的張家坡的骨器或西周的各種銅器上，如材料13、

14、17、20、21、23。早期形態的單卦符號，較普遍的在西周出現，這可能是周人占筮方法比較落後的一種反映。重卦的筮法首先出現於商，後來纔推廣到周，也就是“周因殷禮”，這倒是十分可能的事。而不論商或西周，也不論“單卦”“重卦”，組成八卦的數字符號的數字都是“一”、“五”、“六”“七”、“八”等這幾個字，這又從另一方面說明，商周筮法是同源的。

#### （四）傳統的揲蓍法與商代、西周的八卦符號有什麼關係

保存至今的我國最早的一部筮書——《周易》，其中的《繫辭上》講到了怎樣纔能演算出一個卦的成卦法。其文為：“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卦。……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高亨先生在其所著的《周易古經通說》中，總結了前人對揲蓍法的研究，通俗講解如下：

占筮者擺好五十根筮草（或小竹棍，這就是筮字從“竹”的由來），實際使用 49 根。從這 49 根中抽出一根，另放。然後把其餘的 48 根任意分成兩份，每一份分別以四根為一組逐次扣除。最後，把這兩份中剩下的餘數，與從 49 根中抽出另放的一根放置在一起，其和數，我們假設它為 A。這是第一次演算得出的結果。這 49 根去掉 A 後，肯定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餘 44 根，一是餘 40 根。

然後，再用這餘下的 44 根或者 40 根棍，再按上面的辦法演算一遍，得出第二次演算結果，假設它為 B。44 根或者 40 根棍減去 B，必然剩餘 40 或者 36 或者 32 三種情況。

最後，再把 40 或 36 或 32 根棍，再依上法演算，第三次演算結果，假定它為 C。

49 根總數減去 A、B、C 以後，必然會出現下列四種情況：剩 36、32、28 或者 24。這四個數以四除，得出 9、8、7、6。這四個數，就叫四營。它們分別稱為老陽、少陰、少陽、老陰。通過上面演算纔得出一個爻。爻是八卦的基本符號，分陰陽兩種。以奇數（9、7）象陽，以偶數（8、6）象陰。陽爻用一長劃“——”來表示，陰爻用兩個短劃“——”來表示。

試將四營及其相應關系列表如下：

四 營	名 稱	A + B + C	八卦符號
九	老陽	13	——
八	少陰	17	——
七	少陽	21	——
六	老陰	25	——

上面已指出，通過三次演算，只能得出一個爻。單卦由三個爻組成，需要經過九次演算；重卦則需要經過十八變纔能成一個卦。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成卦法，是不是商代、西周當時通行的那種辦法？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並無成卦法的記載。所以，商和西周的成卦法是否依上面的辦法進行，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今後進一步來研究。

商代和西周的八卦，不是用後世的卦畫符號“——”和“— —”來表示，而是直接由三個或者六個重疊的數字符號來表現。這三個或六個數字構成的八卦符號，據目前已發表的材料看，主要由五個數字組成，即一、五、六、七、八。從上述 36 條材料看，這五個數字與上面講的作為成卦依據的四營數六、七、八、九有不同之處。前者沒有九，多出一和五。但也有相同之處，如都有六、七、八。值得注意的是，前者雖然奇數有三個，即一、五、七，但在每一個卦中，最多只同時出現其中的兩個數，也就是說，嚴格地遵循着兩奇兩偶（也就是後世所說的兩陰兩陽）的規律。這種現象怎樣解釋呢？是商代西周另有一套成卦法呢？還是同為一個成卦法，只是因為時、地不同，而有所差別呢？這尚待進一步研究。當然，後世的成卦法即使適用於早期，也不一定是早期唯一的成卦法。因為早期筮書除了《周易》以外，還有《連山》、《歸藏》等，筮法也可能不同。

#### （五）怎樣理解文獻中所說的“卜筮並用”與“筮不過三”

卜，指龜卜。筮，為用蓍草或小竹棍算卦。這是使用不同材料，通過不同方式，用以定吉凶、決猶疑的宗教活動。卜與筮這兩種形式同時存在於商代和西周。

據文獻記載，卜和筮往往同時並用。《周禮·春官·宗伯》下有大卜，統管卜和筮，其下屬有卜師、筮人等。筮人條下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從考古實物材料看，卜筮並用的說法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四盤磨的甲骨有鑿，無疑是卜骨。上面同時記有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材料（四）8 之甲骨上，有兩個圓形的鑽。材料 4、5 的甲骨上也有圓形的鑽和鑿，並有灼痕和卜兆。沒有疑問，以上都是卜骨。《周禮·春官·宗伯》下的占人條云：“凡卜筮既事則係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算其占之中否。”可證卜後有記錄，筮後也有記錄，以便日後作驗證、總結。以前，我們只知道卜辭刻在甲骨上，不知道占筮情況記載在什麼地方。根據上述的 4、5、8 等條材料，我們現在終於看清了這個問題：商代和西周，不但有占筮的記載，而且卜筮同時進行，占筮的數字符號和筮辭，與占卜的卜辭占辭一樣，都可以刻在甲骨上。由於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注意和研究得不够，甲骨文中這一類材料雖然有不少，却並未引起我們的重視。

《侯馬盟書》卜筮類中有關占筮的材料列出了三條，即 17:1, 303:1, 340:1。17:1 是玉環，340:1 是玉戈，刻文因殘斷缺文，不能完全弄明白，但它們都講的是占筮，這是沒有疑問的。最值得注意的是 303:1，其物為不成形玉片，文分兩部分，右邊字較大，四字一行，為“癸二百五”，左下方字較小，三字一行，兩行六字，文為“卜目（以）吉，筮乙 11”，同時記載了卜和筮的結果。

《左傳》僖公四年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哀公九年傳記載晉趙鞅卜救鄭，先由史趙、史墨、史龜卜之，後由“陽虎以《周易》筮之”，這都是卜筮並用的例證。

上述春秋時期的實物材料和文獻材料，都說明卜和筮這兩種宗教活動，往往是同時穿插進行的，筮和卜的結果有時是同時記錄在一起的。從商代的甲骨文看，也是如此。我們當然不能割斷歷史，應該從聯繫和發展中來觀察一切社會現象。春秋時期大量材料證明，古代卜筮是同時進行的，商代和西周雖然有關這方面的材料不算多，但說明它們的出現也並不是偶然的，應該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

下面來談談“筮不過三”的問題。

《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尚書·金縢》有“乃卜三龜”之文，上面提到的史趙、史墨、史龜三人同時占卜的記載，都是三卜的例證<sup>②</sup>。從甲骨材料看，商代也以三卜爲常見，但個別的也有“四卜”（南師 60，外 30），乃至“六卜”（乙 5399）等例外。三卜的問題比較清楚，此不贅述。“筮不過三”之說，過去還沒有經過可靠的實物材料的驗證。上述四盤磨所出的材料，共存於一版，我們認爲這是三筮的實例。占三次筮，得出三個由數字組成的卦，緊湊地并排記錄於一版。其中有兩條是一個方向另一條則倒書。應該指出，材料 16 也是倒書的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其下爲正書的“召”字。這兩條倒書的八卦符號，是無意的，還是寓有特殊的含意？如果是有意的，這意味着什麼？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

在“筮不過三”這個問題上，我們當然不能機械地去理解，以爲占筮非三次不可。“不過三”的含意是，可一，可二，但占筮一事，一般講以三次爲常見。實物資料也的確是這樣。有的上面有三個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有的則是兩個或者一個。甲骨有的因爲殘缺，有時要觀察這個問題比較困難。金文材料一般保存得比較完整。材料 16、17、20~25 等，都是占一次卦，記錄一個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單卦或重卦；也有的是兩組八卦符號共存於一器上，如中方鼎的銘文末尾（材料 18、19）。爲了便於說明問題，下面把銘文錄之於下：

“惟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在）寒次，王令大史兄（貺）禡土。王曰：‘中，茲禡人入史（事），易（賜）於武王乍（作）臣。今兄（貺）卑女（汝）禡土，乍（作）乃采。’中對王休令，鬻父乙尊。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

末句的斷句，一般學者都斷爲“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把“臣”字後面的“尚中”和“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都當作人名或國族名。我們認爲，這種斷句法值得商榷。末句第二個“臣”字後面爲兩個八卦符號，顯然不是國族名或人名。我們以“惟臣尚中臣”爲句。銘文是講周王把“禡”這個地方賞賜給“中”，作爲采邑。“中”爲此而答揚王的嘉命，並爲父乙作祭器。“尚”字，在銘



文中往往作“常”或“當”字用。在這裏，也應該爲“常”或“當”。“惟臣尚（常）中臣”，意爲禡臣永遠作中的臣。或者說，禡臣適當爲中之臣。按早期銘文慣例，這一句話有表示時間的作用。上面是我們在確定中方鼎銘文末尾爲八卦符號之後，對於此器的斷句及其解釋，有一點與過去不同的意見，附記於此。

中方鼎銘文最後是兩個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說明在作此器的時候，曾經占了兩個卦。

材料 31、32 是在殷墟出土的一塊銅器陶範的陽面上刻的兩個八卦符號，可能是爲占問鑄器是否順利而算的兩個卦。這與中方鼎一樣，都是一事二筮的例子。

可見占筮的次數，一次、兩次、三次，並不一定，但一事之筮，一般當不超過三次。

#### （六）幾何形直線的卦畫符號始於何時

郭沫若同志曾經斷言：“周金文中無八卦痕跡”（《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郭沫若“有關〈易經〉的信”》）。這一點，如果郭老健在的話，我們想，現在他自己也會出來修正舊說的。在此，我們並不想停止在探討西周金文中有無八卦痕跡的問題上，而要進一步探討商代和西周有無卦畫的問題。

什麼叫卦畫呢？就是八卦的符號寫成直線條形的“——”和“——”。由這些直線組成的三個爻或六個爻的八卦，稱爲卦畫或卦象。爲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爲表中所列出的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不是由“——”和“——”構成，而是由比較複雜的一、五、六、七、八等數字直接組成。那麼由“——”和“——”組成的卦畫究竟始於何時？我們來看看表一中的 26~29 這幾條材料。26、27 是由三條平行直線夾着兩行平行的六個短綫組成。29、28 是由兩條平行直線夾着兩行平行的六個短綫組成。這是同類的但結構略有不同的兩個符號。過去，學者皆以爲是一個字，或釋“潮”，或釋“雨”均不確。這兩個符號與“潮”字“雨”字字形上都判然有別。王黼在《博古圖》中曾釋爲“卦象”，認爲一長劃爲陽，爲乾，三短劃爲陰，爲坤。過去，對王說都認爲是無稽之談，一笑了之。現在看來，這個意見倒是值得我們鄭重考慮了。我們既然已經肯定，占筮起源很早，至少可以早到武丁時期。那麼，在這個歷史條件下來談卦象問題，就不是毫無道理的。而且，我們從基本結構來分析，上述四個符號，都是由長劃和與之相平行的短劃構成，彼此是平行的直線。從形狀講，它與八卦的卦畫十分相近。所不同之點在於：（1）短劃不是由兩劃組成，而是三劃；（2）卦爻不是由三個或六個組成，而是由四個爻或五個爻組成。這使我們想起了西漢揚雄所著的《太玄經》。這是不同於《周易》的另一部筮書。揚雄的《太玄經》稱“卦”爲“首”。“首”的基本符號是“——”、“——”和“——”。每個“首”由四個這樣的符號組成，稱爲“四位”。有趣的是，28、29 兩條與《太玄經》中的一個名叫“爭首”的卦畫形狀完全相同（爭首作䷆）。這是偶然的巧



合呢？還是有一定的淵源關係？我們想，既然形狀如此一致，大概不會毫無關係。至於 26、27 有五個“位”，與《太玄經》所載不同，但畢竟比較接近，與此當有一定關聯。材料 36 為東周璽印文字，吳大澂釋為𠄎字。現在我們知道這也是卦畫。它與《太玄經》卷二的銳首相同，一方、二州。二部、二家。這些早期材料的出現，並與《太玄經》相合，說明《太玄經》並不是無源之水，二者當有一定淵源關係。

我們初步認為：上述五個符號，是占筮的卦畫符號，與八卦可能是同源而不同流，這是我國目前所見的最早的卦畫<sup>③</sup>。

綜上所述，我們的初步看法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根據目前掌握的較可靠的材料看，占筮的時代，至少可以上推到商代武丁時期，而且卜和筮同時並用，卜和筮的結果都可以記在甲骨上。因此，在過去我們所熟悉的卜辭當中，應該區分出一部分卦辭。過去把此類由數字組成的八卦符號誤認為是人名，國族名，是特殊文字，都是錯誤的。

第二，在八卦問題上，我們認為是商文化影響周文化。文王演八卦，把八卦發展為六十四卦的傳說，也應予以糾正。

第三，就目前所知，商代和西周的八卦數字符號，是由一、五、六、七、八等數字組成，後世傳統的揲蓍法，是否適用於商和西周，這個問題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第四，是否有卦畫，尚不得而知。目前所見，商代和西周的八卦大多是由數字構成的八卦符號。商周金文璽印文中類似於卦畫符號的銘刻，與揚雄《太玄經》中“太玄術”的“爭首”“銳首”符號一致或相接近，應有一定關係。

古代筮法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千百年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甲骨文金文陶文和璽印文中的這批珍貴的材料，對於進一步弄清筮法起源及其演變過程等問題，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匯攏這方面的材料，並把幾點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來，供同志們參考。對於這個領域，我們是陌生的。上面的論述，肯定會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高亨先生的指導，謹表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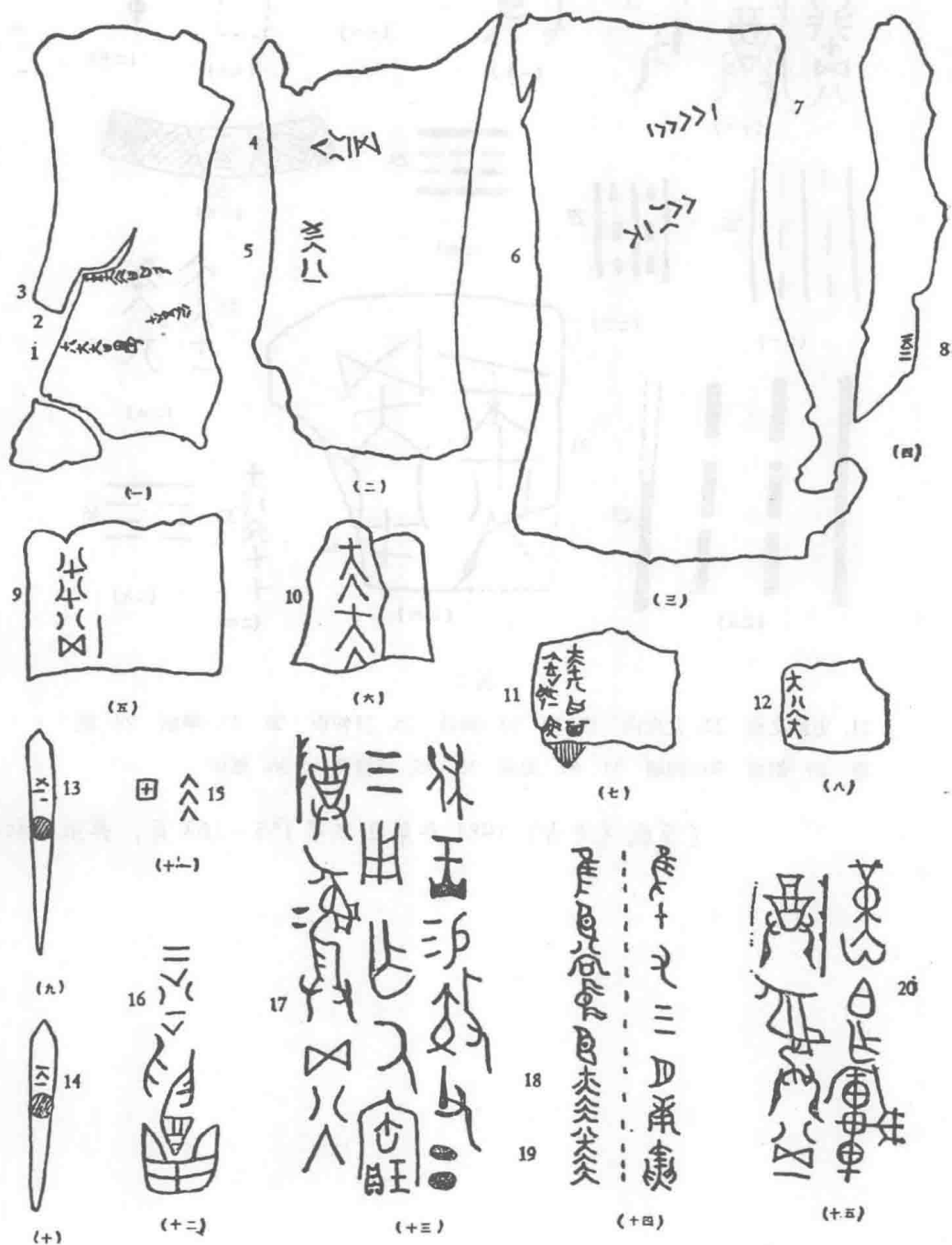
## 註 釋

① 《左傳》僖公十五年：“龜，象也。筮，數也”。說明龜卜，吉兇表現在龜甲裂紋所成的象上。用蓍草來筮，吉兇表現在蓍草成卦所得的數上。《考古》1976年第4期，汪寧生同志在《八卦起源》一文中，又從民族學的角度找到了數卜的例證。

② 河北藁城 M14、56、103 三墓，每墓出三片卜骨，在二層臺上，方向一致，似原有繩捆扎，證實了卜用三骨使用卜骨的一般情況。參見《河北藁城臺西村商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

1979年第6期第40頁。

- ③ 與此相類的，還有《岩窟吉金圖錄》下·32所著錄的戈銘，安陽出土，同出兩戈，銘文作 ，形狀與上述五條材料接近，但略有出入，可能屬於同一類型。如果確是如此，則說明這種卦畫的上限可以早到商代，太玄術也很古老。



圖一

- 1~3. 四盤磨甲骨 4、5、8、13、14. 張家坡甲骨 6~17. 豐鎬遺址甲骨 9~12. 鳳雛遺址甲骨  
15. 《殷墟文字外編》448 16. 召卣 17. 效父簋 18、19. 中方鼎 20. 董伯簋




圖二

21. 史旂父鼎 22. 父戊卣 23. 盤 24. 銅鼎 25. 召仲卣 26、27. 銅甌 28. 銅  
甌 29. 銅卣 30. 陶罐 31、32. 陶范 33~35. 殷墟陶簋 36. 璽印

(原載《考古》1981年第2期第155~163頁，與張亞初合寫)

## 殷周金文中的象與數

宋宣和五年（1123）成書的《博古圖》中，收錄了1件西周早期的《商卦象卣》（卷9.16~17頁）。其上有符號爲, 蓋器同銘。編纂者王黼曾釋爲卦象。並且解釋說：“古人畫卦，奇以象乎陽，耦以配乎陰，一奇一耦，而陰陽之道全。……是卦也，上下爻皆陽，有乾之象；中二爻皆陰，有坤之象。……雖不見於書，惟漢揚雄作《太玄》八十一首以擬易，曰方、州、部、家，今《爭首》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與此卣卦象正同。雄於漢最號博聞，殆《玄》之所自而作耶。”他認爲青銅器上的這種符號是卦象，並將其與揚雄《太玄經》中《爭首》相比附，在當時都是很有見地的。但這種符號及其初步的解釋，在其後的若干年中，並未被研治金文的學者們所注意。


近二三十年以來，由於田野考古工作日益發展，從新石器時代的骨片、石器以及甲骨、青銅器上出現了大量的有關數字的銘刻，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對於這種符號或稱之爲“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sup>①</sup>或如李學勤同志提出：“這種紀數的辭和殷代卜辭顯然不同，而使我們想到《周易》的“九”、“六”。<sup>②</sup>而最早對此作出系統研究、識出其爲占蓍數字符號並與《周易》八卦加以聯繫解釋的，首推張政烺先生。<sup>③</sup>先生在這方面寫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

從新石器時代以至殷周時代關於甲骨文、金文上的卦象、卦數的資料很多。本文所發表的只限於殷周時代青銅器上的資料；並且主要取其與後世卦象可以聯繫的、典型的材料（見附表）。其餘的，這裏一律從略。

從《表》中可以看出，殷周之際這種材料很集中，可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稱文王“拘羑里，演《周易》”，當有其時代背景。

殷周青銅器上的象、數資料（一般稱之爲卦畫和紀數），有些是鑄在通常寫族徽（或稱之爲族名）的部位，因而常常被誤認爲是族徽。新出資料可以說明它們確應爲筮卦。因爲：第一，如本文編號（6）鼎，在“七六八六七五”的下面爲“者◇”，◇號爲族徽，亦見於卜辭中；第二，編號（14）的《大保卣》在紀數符號“五一七六七”

五個數字的上面，鑄有“大保鑄”三字。都可以說明紀數不應是族徽。

青銅器上所鑄的紀數符號，如七五四六等，譯寫為陰陽（或乾坤）……，即所謂的卦象。紀數符號，見於甲骨刻辭及青銅器上，都是表示“數”的。《左傳》僖公 15 年“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杜注：“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告吉兇，不能變吉兇也。”這實際上是後世的解釋。朕兆屬於卜，是一種巫術。在甲骨上主要通過鑽、鑿、灼等來觀察上面的兆；至於所紀數字，應屬於筮法，是用蓍草算出來的。古代卜筮並用，《左傳》中就很有這方面的例子。<sup>④</sup>在卜辭上，觀兆所推吉兇，由於有文字記載，可以很明確地知其“驗辭”的意義。而青銅器上的紀數符號，雖然可以找出相對應的“卦題”，但它們與現在通行的《周易》所記，在“卦”的意義上却不易很好的聯繫起來並加以解釋。前面舉過的編號（6）鼎，從卦象上看，上為艮，下為兌，應為“損卦”。遇損之七，應以損卦本卦辭占之。文云：“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其大意是筮遇此卦，將有所俘獲；大吉而無咎。所占之事可行。但是，何以要將這一卦銘刻在該件銅鼎上，現在還是不很明確的。這實際上包括兩層意思：

第一，根據所紀的數，可以在《周易》的卦題下找出相對應的卦來，說明它們肯定是表示“卦”的。但不知當時人對其吉兇的意義，是否與《周易》中的解釋相同。

第二，由於不像甲骨上面之有驗辭，使我們不能明確將紀數（卦象）刻在銅器上是表示什麼意思的。

殷周金文中的紀數符號一般為六個數字（爻），但如前面所舉的《大保卣》（《集成》10、5018），除鑄有“大保鑄”三字外，尚有陽文的“五一七六七”五個紀數符號。最近新發現的一件銅爵上，除鑄有“矧乍祖丁”四字外，還有“八六七六七”五個紀數字（圖 13）。其中“六”字的寫法，是以前所未見過的。這樣，八卦紀數符號除有三個數、四個數外，又發現了五個數的符號。

金文中的象數資料，在紀數符號如（圖 1～14）所列舉的以外，還有所謂類似“卦象”的符號。這類符號除了（圖 15～20）以外，還有以下兩類例外的情況：

第一，金文中的《川子父丁壘》（《集成》15、9799），《川彝觚》（《集成》12、6936）兩器（插圖 1、2）。其銘中的川與《周易》乾卦的卦畫相同。但它們是否為乾卦的卦畫，目下青銅器銘刻資料中此類例證尚少，因此不能肯定。

第二，至於（圖 15～20）所舉的符號，我們以為如果陰爻的卦象可以用--和---表示的話，圖中的 15 和 16 可看作是四位的卦象，而 17、18、19、20 則可看作是五位的卦象。亦可認為是“卦象”，鑄有這類符號的銅器，其時代均為殷末至西周初年。因它們與上述紀數符號是同時並行的，可以認為在卜筮過程中，這兩類符號或可同時採用。

表中編號(15) 壘上銘刻，見《集錄》A785、R、283，它和揚雄《太玄經》中《爭首》的卦象完全相同[5]。這裏不能對《太玄經》的政治涵義及其所蒙受的道家思想作較深的討論。我們只是認為《太玄經》中的卦象與上述銅器上的一些符號有相似之處；從而考慮到《太玄經》中的象，當有淵源。我們認為《太玄經》的卦象形式既有所本，而書中所表現的又有道家思想，那麼，它可能是蒙上了道家思想的《周易》的另一個流派。揚雄有可能見過博士的舊本；並且他受學於嚴君平，書中保存了《京房氏易》的內容，可能是承襲了《京房氏易》的餘緒。揚雄卒於天鳳五年，下距班固爲之作傳不過四十餘年。班固說：“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可見這一流派在當時已“不顯”了。

在談金文中的象與數的問題時，本文實際上只是涉及了卦象（或稱卦畫與紀數符號）與卦題（爻題）等部分問題。但這中間有一個很爲重要的題目，即紀數以及卦畫符號，從何時起轉變爲陰爻作——而陽爻作—。

當戰國至西漢初年，從皇家到民間對於《周易》的研究很爲盛行。解釋《周易》之書，百家紛紜。這可能與西漢皇室重黃老之學有關。

這時，在卦象與數的記述上，也曾有過很大的變動，當時正是卦象的書寫從△等過渡到——的階段。例如：卦數符號𠄎（洛陽北窑西周墓出土的銅戈銘），張政烺先生說：“我當然讀爲一六一，而讀《阜陽漢簡》則不得不讀爲初九、六二、九三，這一點，對考證易卦陽爻、陰爻的來源十分重要”<sup>⑥</sup>《馬王堆帛書本》六十四卦，其陰爻作𠄎，猶帶八字一分爲二的痕迹。如《臨卦》之象，今本作䷒，馬王堆帛書本作𠄎，阜陽本《作》𠄎，是此本在卦象的書寫上猶保存了古老的形式。馬王堆3號墓，葬於公元前168年，阜陽汝陰侯墓，葬於公元前165年，兩者時代相近，兩個寫本同處於新舊寫法的過渡時期。阜陽雙古堆竹簡和長沙馬王堆帛書，是現在所見到的最早的《周易》。

在新石器時代的骨器、骨片上所刻的紀數符號，每6個數爲1組，合乎卦象與每卦六爻的爻象（爻的陰陽）和爻數（爻的位數）。其中有不少可以和後世的《周易》中的卦題相對應。例如：震上、兌下爲“歸妹”，等等（江蘇海安縣青墩遺址出土）。但有一些青銅器上所記這類符號，反而不如新石器時代所記的規整。這應是屬於一些不同的系統和流派。《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由於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古人占卜之術也應有不同。司馬遷在當時已能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今天我們不能一律和現在的《周易》一書相對應。

殷周金文中的這類紀數符號及卦畫之所以引起我們的特別注意，乃在於：金文中的象數資料，它們沒有後世筮人附加的紛繁萬端的解說；並且它處於殷周之際，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

我們認為研究《周易》的卦辭、爻辭，以及爲之註解的大傳，最好利用新石器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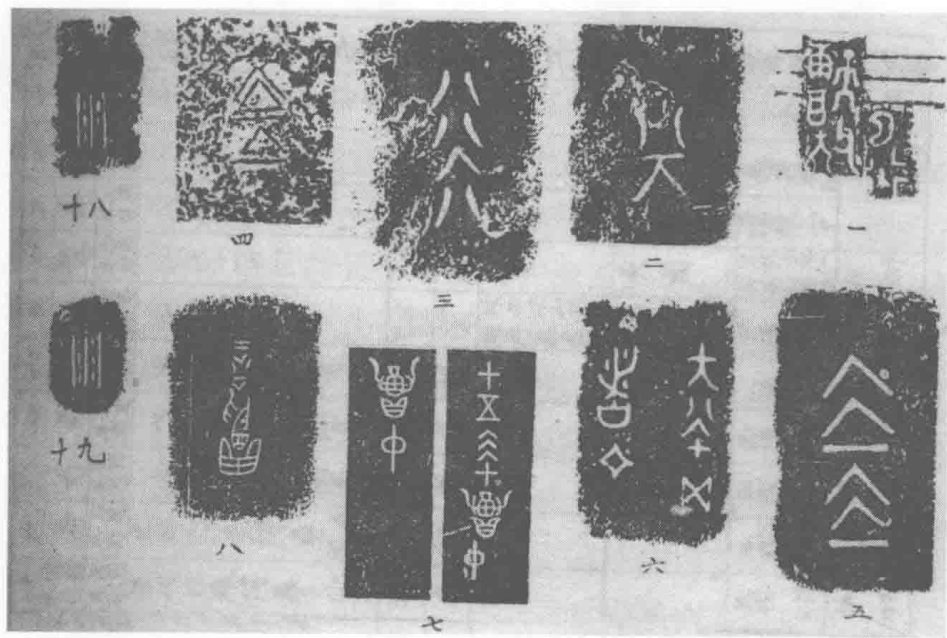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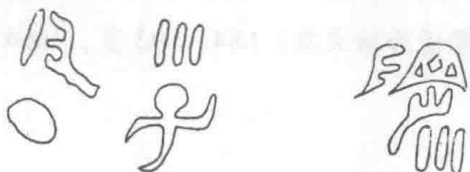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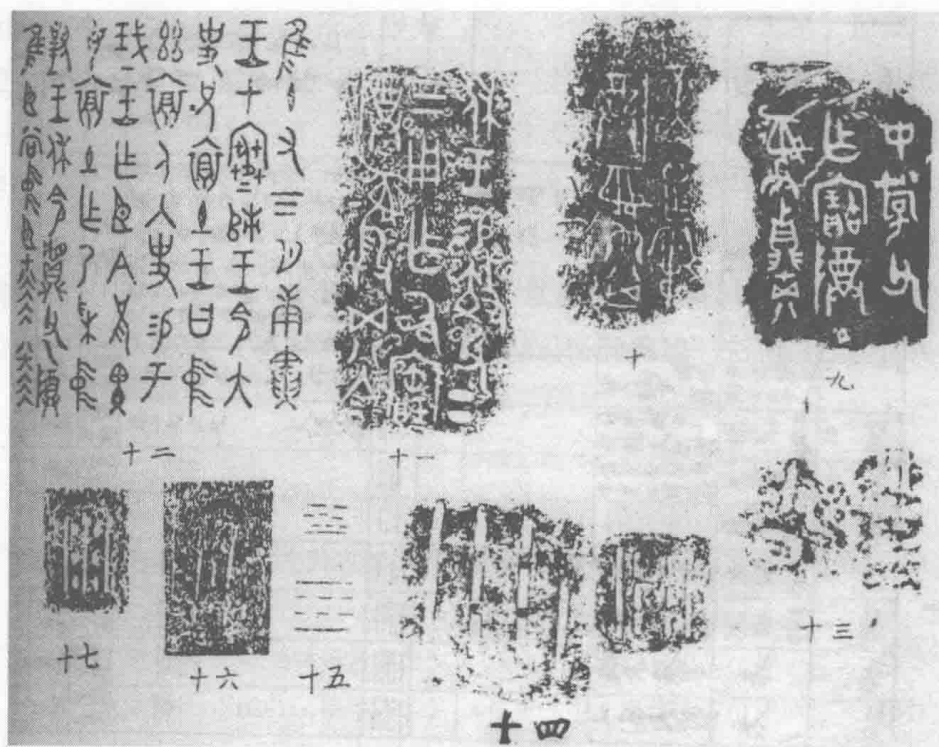
20	鼎	西周早期	䷁		䷁		上海博物館	集成二二三二
19	鼎	西周早期	䷁		䷁		北京故宮	集成二二三二
18	甗	西周早期	䷁		䷁	山城鳳家 山西翼城	翼城縣文化館	集成七七二
17	甗	西周早期	䷁		䷁	陝陽縣 西涇	陝西省博物館	集成七七三
16	卣	西周早期	䷁		䷁			集成四八〇四
15	壘	西周早期	䷁		䷁		美國博物館 聖路易市	集成九七六〇
14	卣	西周早期	五 一 七 六 七 大保鑄		䷁		美術館 日本神戶白鶴	集成五〇一八
13	爵	西周早期	八 六 七 六 七 奴 作 祖 丁		䷁		寶雞市博物館	考古與文物一 九九〇年四期
12	鼎	西周早期	八 七 六 六 六 六 乙尊惟臣尚中臣 七八六六六六 褒土作乃采中對王休命庸父 人人使賜于武王作臣今貺景女 王令大史貺褒土 王曰中茲褒 惟十又三月庚寅 王在寒次		䷁	比剝 傳麻城 湖北		集成二七八五 博古二·二七
11	簋	西周早期	彝 五 八 六 休王賜效父 三 用作厥寶尊		䷁	艮		集成三八二二
10	不明	西周早期	墓伯作旅尊彝 八 五 一		䷁	兌		集成一〇五七
9	鼎	西周早期	史游父作寶尊彝 貞 七 五 八		䷁	異		集成三三七三
8	卣	西周早期	六 一 八 六 一 一 盟		䷁	節		集成四八六八
7	卣	西周早期	七 五 六 六 六 七 盟仲		䷁	益		集成五〇二〇
6	鼎	西周早期	七 六 八 六 七 五 者 𠂔		䷁	損	上海博物館	集成一七五七
5	甗	西周早期	六 六 一 六 六 一		䷁	震 陝西鳳雛墓 岐山	周原博物館	集成七八八
4	盤	西周早期	六 六 一 一 六 一		䷁	豐	美國	集成一〇〇一九
3	鼎	西周早期	八 八 六 八		䷁	坤		續殷上七
2	盤	西周早期	八 一 六		䷁	坎	美國	集成一〇〇六
1	爵	殷	耳 衍 天 父 庚 日 七 六 八		䷁	艮	北京故宮	集成九〇七四
编号	器类	时 代	釋 文	卦 名	出 土	現 藏	著 錄	

代以來以至簡冊、帛書等考古學方面的資料，收集其原有的象數資料，恢復象數原本的面目，建立起一個有確切根據的古經定本（當然是以簡冊與帛書為底本），考其章次、字句異同，盡掃後世為古經和大傳作註釋的附會穿鑿、五彩迷離的陳說，特別是宋代以來的一些註釋。然後，依據此種定本以探討《周易》的思想體系，等等。這種整理研究古籍的辦法，學者中間在研究《尚書》、《毛詩》時，是已經用過並曾產生了極好的效果。我們認為研究《周易》也應採取這種方法和態度。這是一項比較複雜的問題，有待於更多的努力來解決。但我們相信這項工作對於《周易》的深入研究能有裨益。

### 註 釋

- ① 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
- ② 李學勤：《談安陽小屯以外的有字甲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1期。
- ③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 ④ （清）毛奇齡：《春秋占筮書》，對《春秋》、《左傳》所記有關卜筮各條記事，分析較詳。
- ⑤ 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年，第2期。
- ⑥ 張政烺：《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78年，第8期。





（原載《周易與自然科學》第 89～96 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 9 月；後收入該出版社編輯的《現代易學優秀論文集》684～692 頁，1994 年 10 月與陳公柔合寫）

銘文考釋



## 楚鄴陵君三器

1973年12月，江蘇無錫前洲公社前洲大隊社員在高瀆灣蘆塘裏，從一米多深處挖出三件帶有“鄴陵君”銘文的銅器，同時發現的還有匜、洗以及據稱為“刀”和“劍”的銅器各一件。其中除“刀”和“劍”已碎折成數截當時即被拋棄外，其他各器經馮其庸先生搶救，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前些時候，我們有機會看到了這批銅器，承馮先生囑代為施拓照像，並承同意將有關材料先予發表，以饗讀者。為此，我們對這批銅器做了盡可能的考察，把它們介紹給大家<sup>①</sup>。

有銘文的三件銅器，鑒一豆二，銘文基本相同，都是通體純素，不施花紋，很明顯是一組東西。

第一，鑒（圖版肆：3）高25厘米、口徑54厘米。折沿，平唇，圜底，無耳，頸部微斂，與緩收的腹部界以一道細褶綫。器形與漢代的銅和鑒有類似處，但有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圜底。這種圜底鑒，過去很少見到。

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出土遺冊載有“二方監”和“二圓監”，與出土實物對照，實際上是三件圓陶鑒和一件方陶鑒。那三件圓陶鑒也是折沿、平唇、圜底、無耳，與此銅鑒相似<sup>②</sup>。

銘文一行三十字，刻在鑒的頸部外壁（圖一：左）。釋文如下：

鄴麥（陵）君王子申，攸（脩）綏（茲）造（造）金監（鑒），攸（脩）立（蒞）戡（歲）棠（嘗）。呂祀皇祖，呂會父佳（兄）。兼（永）甬（用）之，官攸（脩）無疆。

銘文中的鄴陵君是王子申的封君名，其封地在鄴陵。“攸”字三見，末一字並連“官”字為讀，似是動詞，其讀法還可以研究<sup>③</sup>。茲，此也。造，這裏是“所造”之義。“茲造金監”可能如同十年陳侯午敦“用乍平壽造器辜（敦）”以及兵器上常見的某某“之造戈”、某某“之所造戈”（“造戈”即“所造戈”之省），就是指這一銅



鑒。“歲嘗”，曾見於壽縣朱家集出土盂、盂、盂諸器，作“日共歲嘗”。歲嘗之嘗，即烝嘗之嘗。古書有所謂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祭，各書所記春夏祭名頗有異文，但秋曰嘗、冬曰烝則是共同的。古人解釋說，嘗是指穀熟嘗新，烝是指穀物的登藏。我們在銅器銘文中常常可以見到“以簋（烝）以嘗”這類話，有的銅器還以簋器或嘗器自名，如大師盧豆自銘“簋尊豆”，六年琿生簋自銘“嘗簋”。但烝、嘗二字，其使用可能亦如四時之獵名，並不十分固定。銘文中，嘗、兄、疆諸字押韻。

第二，豆之一（圖版肆：1）通高29.1厘米、口徑18.2厘米、足徑15厘米。器形屬於通常所說高校盤豆，淺盤，平底，高校上粗下細。盤與高校的足體分鑄焊接（校體上端一側有灌注焊錫的小孔），但現在二者已經分離。器身半個側面佈滿紅褐色銹斑。此器器形類似漢代的錠。戰國楚墓曾出土同式陶豆或陶燈臺，如解放初湖南長沙龍洞坡戰國楚墓出土的陶豆<sup>④</sup>，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M2）出土的陶燈臺<sup>⑤</sup>。同樣形制的銅豆是否在戰國楚墓中發現過，我們不很清楚。1956年山東臨淄姚王村齊故地出土過同一形制的春秋末銅豆一式六件<sup>⑥</sup>，類似的陶豆當地也出土過不少，有的並有陶印，表明自身是豆。1935年河南汲縣山彪鎮戰國墓（M1）出土兩件銅豆<sup>⑦</sup>，一件較此粗矮，一件較此細長，形制也是類似的。可見此種形制的豆在漢代以前已經流行。

銘文分刻兩處。一處在盤口外壁，一行，原銘三十字，末五字為銹所掩，難以辨認；除記器名的一句作“攸棼故錫盍”外，餘同鑒銘（圖二：右）。另一處在盤的外底，兩行，原銘二十三字，現在還可見十九字，第一行“四𣎵”二字和第二行“四□”二字為銹所掩，是據X光片補出的（圖一：右上）。盤口外壁銘文不再錄，盤底銘文釋文如下：

郢郟（？）廣（府）所告（造），𣎵十𣎵四𣎵冬朱（銖）；」攸（？）裏，𣎵三朱二冬朱（銖）四□。

盤口銘文所記器名“盍”，前所未聞。盍是豆的異名或是相近的另一種器名，待考，此處姑仍稱豆。

“盍”上一字在兩件豆上字形稍異，似應以豆之二為正。這個字可能是形容金屬質地、色澤的；或連“盍”字為讀，解釋為器名。盤底銘文中，“郢郟廣”，應為楚之郢地監造這批銅器的官署名。“𣎵”字不識，右半兩點拓本不清晰，照片有之（李家浩同志告，此字應釋為豕，字不從貝，右半兩點恐不是字劃），疑是表示資費一類的字，以下所記似為造器所費之值而非器重。此器實測重2509克，當秦衡制八斤之多，而銘文所記卻不過是一些比銖略大或略小的單位，因此不像是指器重。銘文分兩次計值，第一次似較大，十𣎵、四𣎵連在一起，下面沒有朱這一位，直接是冬朱。

第二次計值似較小，最大一位是朱，次於朱的是𠂔朱，最末一位摹出的字不一定準確，隸定暫缺。

𠂔、朱、𠂔朱和二行末字也許是大小相次的四種幣值。“𠂔”字不識，但從銘文看，似是“朱”的上一位。“朱”的下一位是“𠂔朱”。“𠂔朱”見於楚銅貝即所謂蟻鼻錢，過去釋法頗有爭議，近人有釋為“各一朱”等的，今按應隸定為𠂔朱。“𠂔”字，出土材料中見的不多，過去壽縣朱家集出土禽肯盤和兩件匕（舊稱勺）上有這個字，都是人名用字，對此啓發不大。比較重要的是《楚文物展覽圖錄》六八所錄湖南長沙出土的一件鐵足銅鼎，鼎銘刻在蓋內外以及器內，三處同作“后𠂔刃”三字。刃，似與中山王墓出土銅器中記重的“刀”為一回事，在該墓所出器銘中，“刀”次於“石”下，“石”大於“刀”上千倍，因此“刀”就是“兩”，與刃為同一字，乃“梁”字上半所從。𠂔字的讀法，還未便遽定<sup>⑧</sup>。就此器銘文的前後關係看，𠂔朱當是次於朱，表示若干分之一朱的一種單位。而且如果這一銘文是以若干固定的幣值累計，則𠂔還有可是表示半的意思。銘文分兩次計值，其義不甚了然。“敝襄”，可能如同“郢鄒賁所造”，是某一官署所造的省稱。兩次計值可能是因一器在兩處分鑄或器成後再經加工的緣故。

這段銘文值得討論的地方還很多，很明顯，它對楚國幣制以及衡制的研究都有參考價值。

第三，豆之二（圖版肆：2）通高 29.4 厘米、口徑 19 厘米、足徑 15 厘米。與豆之一形制相同，大小相近，重 2258 克。銹蝕情況也基本相同。

銘文刻在盤的外底，作螺旋狀排列，自外向內盤繞兩周半（圖二：左）。文字結體鬆散，字口帶有規則的小毛刺，與鑒和豆之一的銘文風格差異較大，個別字並異構，如“𠂔”作“陵”，“崇”作“常”，“𠂔”作“侃”，“支”旁一律書作“攴”（與鑒及豆之一書作“父”不同）<sup>⑨</sup>。文字內容全同豆之一口外壁的銘文，其中“𠂔盍攴”三字被銹所掩，是據 X 光片補出的。

兩件沒有銘文的銅器是否與上述三器同一出處，還有待進一步瞭解，也附記於此：

第一，匱（圖版肆：4）高 9.5 厘米、流至尾長 33.5 厘米、寬約 24.5 厘米。俯視略呈橢方形。流作平槽狀，斷面呈 U 形。尾有獸首銜環。底平。口壁垂直，與腹壁界以一道細褶綫，腹與底相接處也有一道相同的褶綫。器形與漢代習見的匱基本相同。同樣器形的銅匱，曾見於湖南瀏陽縣北嶺出土的一組戰國銅器中，云夢睡虎地秦墓（M11）也曾出土<sup>⑩</sup>。

第二，洗（圖版肆：5）高 7.5 厘米、口徑 20.5 厘米。腹壁有一道細褶綫。形狀與漢代的洗無別。安徽壽縣蔡侯墓也出土過形狀類似的器物<sup>⑪</sup>，過去有稱之為洗的，也有

稱之爲盆的。

這批銅器中有兩件可以按本身的銘文叫做“盂”，但器形是屬於通常稱之爲豆的一類，它們與豆類銅器的關係是耐人尋味的。

過去我們籠統稱之爲豆的銅器，器形有多種，器名有豆、簋（匱、鋪、甫）、斚諸稱<sup>⑫</sup>。現在“盂”可以說是已發現的第四種名稱<sup>⑬</sup>，它爲豆類銅器的研究增添了新資料；並且因器形與漢代的甗相似，還爲甗的出現和演變提供了研究綫索。這一問題，本文不準備詳加論列。

這裏試就這批銅器的年代提出我們的認識。

單純從器形考慮，這批銅器給人的印象似乎可以晚到漢代。但這些器形經歷的時間比較長，正像商周之際、西周東周之際的銅器是跨越不同時代的。要確定年代，不能單靠器形比附，還要參照銘文來校正。根據銘文並結合出土地點分析，我們認爲這批銅器的年代是不能晚於戰國時期的。

郢陵君三器，從銘文內容看，是一位楚王子所作。豆之一的盤底銘文說明銅器是由“郢鄧廣”監造，這個府無疑是楚國的官署。而銘文中的“𡈼朱”也是楚國的幣名。就字體而論，三器銘文當屬於戰國楚文字。

比較三器銘文的字體和辭例，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壽縣朱家集出土鬲肯、鬲忒諸器。它們不僅字體接近，如王、子、金、歲、嘗、目等字的寫法所顯示，而且有相同的辭例，如“歲嘗”。楚王鬲肯、鬲忒，經近人考訂實即史載楚考烈王熊完（前 262 ~ 238 年）和楚幽王熊悍（前 237 ~ 228 年）。這兩個王都是戰國最後期的楚王。史稱楚考烈王時，楚勢益衰，於二十二年（前 241 年）避秦東徙壽春，命其地曰郢。鬲肯、鬲忒諸器即徙都壽春後所遺。幽王之後只有五年，楚即被秦所滅。我們分析這三器的年代下限雖不晚於戰國，但也並不會比這一段時間早多少。

這批銅器發現於今無錫市西北不遠<sup>⑭</sup>。無錫一帶在春秋時曾是吳國的中心地區，入戰國而爲越地，只是到楚懷王二十三年（前 306 年）楚滅越，始被楚國佔領。戰國後期著名的四大封君之一，楚考烈王時代的名相春申君，其封地在所謂“吳故墟”，也就是今天的無錫一帶。楚器出於越地的這一帶，也使人考慮，這批銅器的時代上限不應早於楚滅越的公元前 306 年。也就是說，這批銅器大約是作於公元前 306 ~ 223 年的八十四年間，而且比較大的可能是在這一段時間的靠後，即在楚徙都壽春後的十八年間。

本稿的寫成多承師友指教，器物的去銹、照相、透視和拓墨也得到許多同志的協助，均此致謝。

## 註 釋

- ① 這批銅器，銘文完好的只有鑒。兩件豆部分銘文掩在銹底下，有些經去銹露出，還有一些因不能去銹，只能藉助於 X 光透視。這些工作主要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技術室、照像室以及北京隆福醫院的同志們協助完成的。
-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信陽楚墓出土文物圖錄》圖一四九、一五〇、一五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 ③ 攸字，或讀為《國語·周語》“修其簠簋”的修，是置備之義。
- ④ 《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圖版一七八，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1955 年。
- ⑤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 年第 5 期第 53 頁圖二五。
- ⑥ 楊子範《山東臨淄出土的銅器》，《考古通訊》1958 年第 6 期；《山東出土文物選集》圖一一二，文物出版社 1959 年。
- ⑦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圖版拾叁：1、2，科學出版社 1959 年。
- ⑧ 𡗗字，各書所無，惟《古文四聲韻》卷三收為“在”字。我們分析夏氏並非別有所見，他所謂“在”字的這個字，應即《說文》“聖”字。聖字在《說文》中的解釋是“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聖，從土從又，讀若兔窟”，是個方言字。  
《說文》所收“怪”字從之。怪，後世俗體作𡗗，夏氏取半邊為讀，遂以為“聖”與“在”可以相等。𡗗與聖字形相近，但並不一定是一個字。
- ⑨ 攴旁的這兩種不同寫法，在隸書和楷書中仍有保留，攴即後世隸定為攴者，𠂇即後世隸定為攴者。
- ⑩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瀏陽縣北嶺發現青銅器》，《考古》1965 年第 7 期，374 頁圖一。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云夢睡虎地十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 年第 6 期圖版伍：1。
- ⑪ 《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圖版拾陸：1、2、3，圖版拾柒：2，科學出版社 1956 年。
- ⑫ 有自銘的銅豆僅見於西周後期以來。現有材料是：①銘豆，有兩例，一為西周豆，材料未發表，器形同《商周彝器通考》下圖 397；一為戰國豆，即鑄客豆。②銘簠等，發現較多，春秋戰國皆有，最早一例為微伯癸簠，唐蘭先生定為簠，謂今稱簠者應改名為瑚。③銘斚，兩例，一件未發表，一件為上官斚（器失，據前器應為春秋時常見之蓋豆）。
- ⑬ 盂，易使人想到古書中的榼。日本林巳奈夫曾據出土實物的自銘證實漢代的榼為一種扁壺（見所著《漢代の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 年）。金文《江陵鳳凰山八號墓竹簡試釋》（《文物》1976 年第 6 期）亦認為該墓出土的扁壺應即同出遺冊上的“二斗榼一”，均與此不類。
- ⑭ 按此出土地有可能距王子申封地不遠。鄖陵之鄖，字從我音，乃義字所從，古讀與義同。其封地或與距此不遠的宜興縣（古名義興縣）東的義山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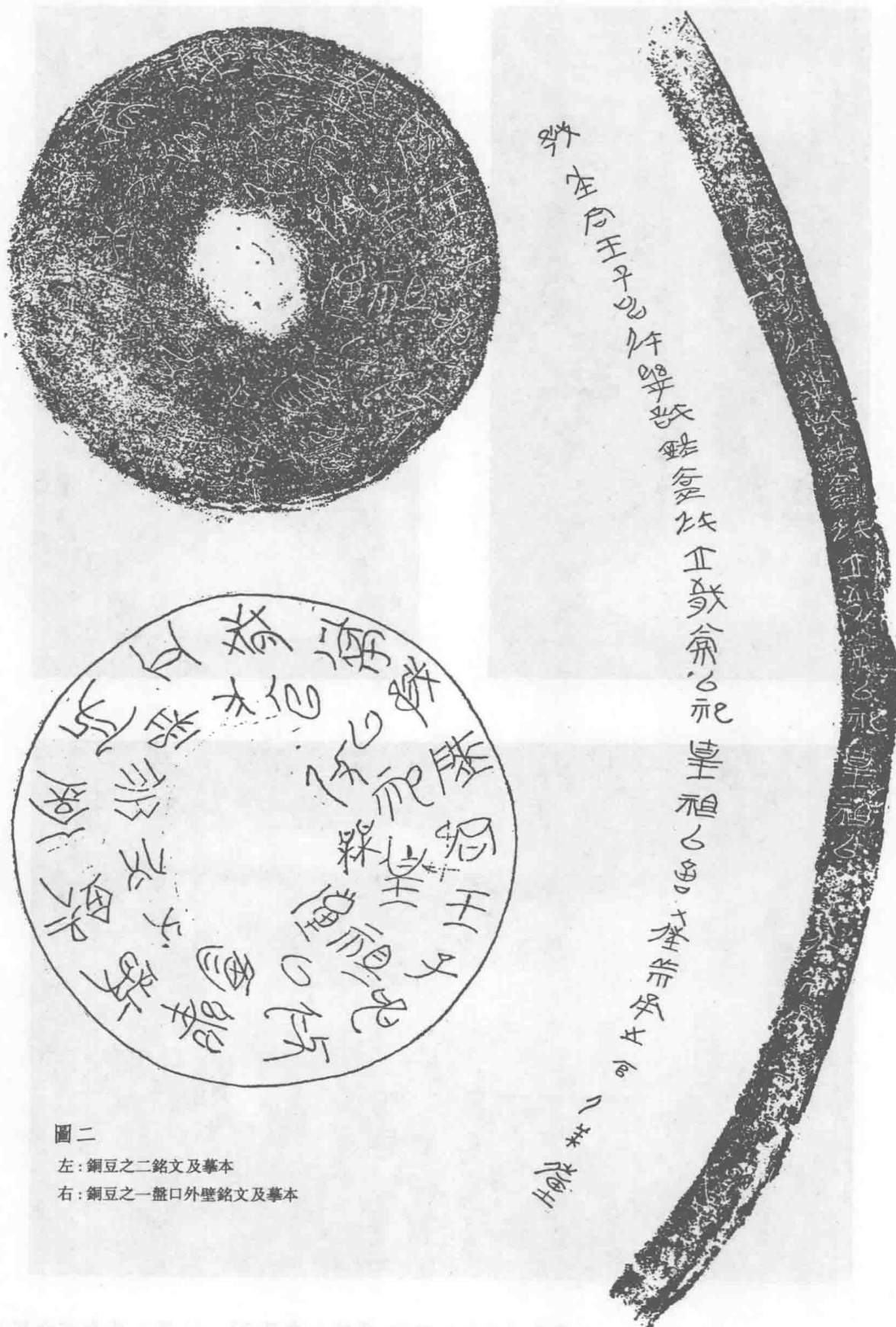


圖一

左：銅鑒銘文及摹本

右上：銅豆之一盤外底銘文及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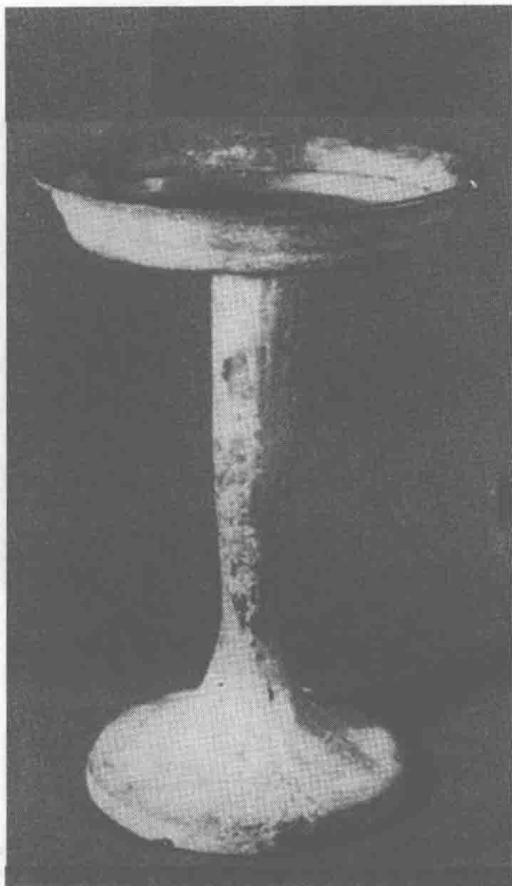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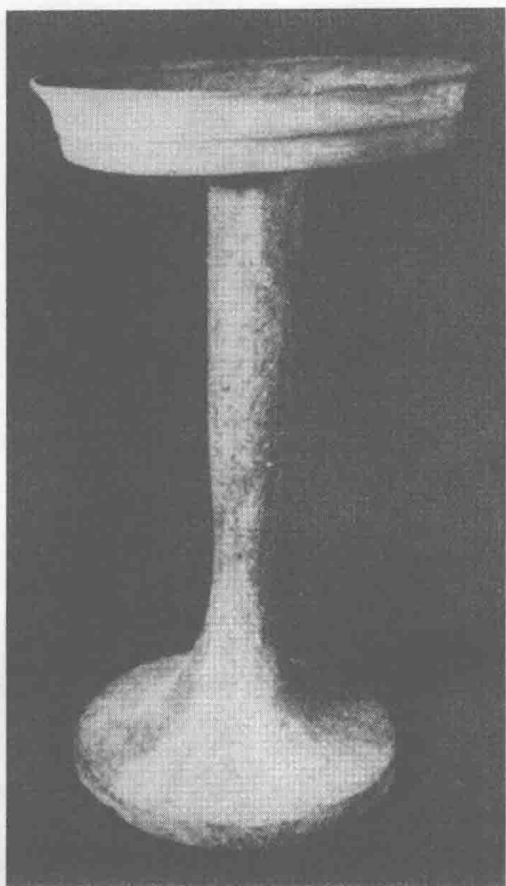


圖二

左：銅豆之二銘文及摹本

右：銅豆之一盤口外壁銘文及摹本





(原載《文物》1980年第8期第29~34頁，與李零合寫)

## 益陽出土的戣戟銘商榷

考古學報 1981 年第 4 期《湖南益陽戰國兩漢墓》報告中介紹了赫山廟 M4 出土戰國有銘銅戟一件，釋其銘為“戣作楚王戟”，而沒有加以說明。

按此戟銘，王上一字從邑從𠂔，絕非楚字，應為邾字。金文來作來、𠂔（見金文編來字條）《三體石經》來作𠂔。《汗簡》部首作𠂔。古陶文有來字作來，空首布有來字作𠂔。《玉篇》：𠂔，古來字”。是知來、𠂔、𠂔是互通的。所以戟銘王上一字可隸定為邾。

戟銘應釋為“戣作邾王戟”，然類此“某作某王器”之文例在兵器銘中未見，在其他器類銘文中也是首次出現。可有兩種理解：（一）戣乃邾王之子或孫，邾王為已故之先王，子孫為父祖作戟以志紀念。如作冊大鼎：“公來鑄武王、成王異鼎”。（二）戣乃邾王之上層。與其文義相類似的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畱章鐃，其銘云：“楚王畱章作曾侯乙宗彝”。即楚王為其下屬曾侯乙作的鐃。兩相比較，當以後種解釋較優。

此戟出土於湖南益陽，字體乃楚文化特有的藝術化了的“蚊腳書”。因此與山東之萊國，河南滎陽之時來恐非一地。（兩地可參見《漢書地理志》東萊郡、琅玕郡條，《太平寰宇記》萊州萊陽縣條等）春秋時湖南有萊山，《左傳·昭公五年》“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羅汭即汨羅，萊山亦在此附近，皆距益陽較近。此萊或可能與戟銘之邾有一定關係也未可知。

以上意見，很不成熟，提出與報告作者商榷。

（原載《考古》1982 年第 2 期 185 頁）



## 關於安徽南陵吳王光劍銘釋文

《文物》1982年第5期刊載了安徽南陵縣出土的吳王光劍，釋其銘為：“攻敵王光自作用劍以戰戍人”。按：其中“戰”、“戍”二字釋文與字形不符。劍銘“戢”應隸定為“戢”。“戢”應隸定為“戢”，即“勇”字。《說文》卷十三“勇或從戈用”。“勇人”者，《論衡·定賢》“或問於孔子曰……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其人即《論語》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勇”有“悍”義，《說文》“悍，勇也”。因此，“勇人”即驍悍勇猛之人。

“戢”字金文首見，似應讀為“當”。“戈”旁乃附加成分。《廣韻》“當，敵也。”是知當者，抵敵之謂也。

通觀全銘“吳王光自作用劍，以當勇人”，講明此劍乃是吳王光自作防身殺敵用劍。不知此釋是否妥當，供商討。

（原載《文物》1982年第8期69頁）



## 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

1980年陝西長安斗門附近出土的多友鼎是一件十分重要的銅器，其銘文是我們瞭解西周晚期歷史、地理的十分難得的資料。田醒農、雒忠如二同志在《人文雜誌》1981年第4期首先著文作了介紹。李學勤同志在1981年太原古文字年會上提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一文提出討論，事後發表於《人文雜誌》1981年第6期。筆者也曾與會發表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現寫成此文，祈望得到同志們的教正。

### 一 釋文

唯十月，用嚴𢆶（獮狁）放牒廣伐京自（師）<sup>①</sup>，  
告追于王<sup>②</sup>。命武公<sup>③</sup>：遣乃元士，羞追于  
京師”<sup>④</sup>。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  
于京師。癸未，戎伐荀<sup>⑤</sup>，衣孚（俘）<sup>⑥</sup>。多友西  
追。甲申之晨，搏於邾<sup>⑦</sup>，多友右（有）折  
首執訊，凡以公車折首二百又□又  
五人，執訊廿又三人，俘戎車百乘  
一十又七乘，衣匭（復）荀人俘<sup>⑧</sup>；或搏于  
龔<sup>⑨</sup>，折首卅又六人，執訊二人，俘車  
十乘；從至<sup>⑩</sup>，追搏于世<sup>⑪</sup>，多友或有折  
首執訊；乃𢆶<sup>⑫</sup>（逞）追，至于楊冢<sup>⑬</sup>，公車折  
首百又十又五人，執訊三人。唯俘  
車不克，以衣焚。唯馬毆（毆）盡<sup>⑭</sup>。復

奪京師之俘。多友乃獻俘、醵（馘）、訊于公。武公乃獻于王。乃曰武公曰：‘女既靜京師，釐女<sup>⑤</sup>，錫女土田。’丁酉，武公在獻官，乃命向父召（召）多友，乃徙于獻官。公親曰多友曰：‘余肇使女休，不𨔵（逆），有戌（成）<sup>⑥</sup>，使多禽（擒），女靜京師。錫女圭瓚一，湯鐘一，簋，鏞鑒百勺（鈞）’<sup>⑦</sup>。多友敢對揚公休，用作尊鼎，用俾用友，其子=孫永寶用。”

## 二 時代

多友鼎出土後，對其時代有宣王、厲王兩說。有的同志着重從該器的形制上定其時代。我認為厲宣兩王時代相連，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想從形制紋飾上找出銅器的區別是十分困難的。應該着重從其銘文內容考察，兼顧其形制紋飾等方面，這樣也許能看得更準確些。

多友鼎銘記錄的是一次周對玁狁的戰爭。開始玁狁十分猖獗，直犯京師，王都鎬京陷落，周王被逐出，情勢十分危急。其後，周王任用得力將佐，在不長的時間內趕走了玁狁，光復了京師，取得了勝利。這段史實與《詩經·小雅·六月》所記情況酷似。《六月》云：“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於出征，以匡王國。……四牡脩廣，其大有颺。薄伐玁狁，以奏膚功。……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多友鼎與《六月》二者所記皆爲周人反擊玁狁的一次車戰，玁狁入侵的範圍都包括京畿地區，周人反擊的路綫都是自鎬京向西北。特別是二者都記載了周都鎬京淪陷一事，所謂“廣伐京師”與“侵鎬及方”應該指的是同一歷史事件。《六月》之“鎬”指鎬京，亦即多友鼎之“京師”。“方”即金文中習見之“莽京”，是鎬京附近一重要城邑（筆者有《金文莽京考》一文載《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可參閱）。我們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兩處皆有明確記載，不會是巧合。《六月》所述戰事的周軍主帥是尹吉甫，多友鼎則是武公。尹吉甫與武公是一人還是兩人，一時尚難論定。《六月》毛傳曰：“宣王北伐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杜注：“道尹吉甫佐宣王北伐”。《國語·晉語》：“秦伯賦

《六月》。子余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韋注：“《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這裏《左傳》、《國語》與《毛傳》義合，《六月》爲宣王詩恐怕沒有問題。而多友鼎所記內容與《六月》相同。因此，我們認爲多友鼎也應是宣王時銅器。

這裏主張厲王說的同志提出一個問題，多友鼎中的武公、向父在斂簋、南宮柳鼎、禹鼎，叔向父禹簋上也出現過，而那幾件器傳統上都認爲是夷厲時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我們認爲過去對西周晚期銅器的斷代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有些過去認爲是夷厲時期的器，實際上應該是宣王時的器。比如克組銅器（包括大小克鼎、克鐘、克罍、克盃等十餘件器），過去多認爲是夷厲時器，郭沫若、容庚、吳其昌、董作賓、陳夢家等前輩學者皆主此說。而唐蘭先生却指出，克鐘銘云：“王在周康刺宮”。“刺宮”者，厲王之廟也。先生以著名的“康宮原則”把克鐘斷在宣王，其說十分有力。然而唐先生在給其他克組器斷代時，却信從了郭老的“克鐘克盃曆法不對”的說法，把克鼎、克盃等都斷在厲王了。郭、唐兩先生的意見是：克鐘爲“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克盃爲“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如兩器時間連續，則十八年十二月之“初吉庚寅”就會出現在“既望”之後。他們在曆法上信從王國維之說，認爲“初吉”乃月相之一，指月初的七八天。因此斷定兩器順排曆法不對，克鐘、克盃應爲兩王之物。郭老指爲夷厲兩王，唐老則指爲厲宣兩王。實際上王國維的四分一月說是有嚴重缺陷的，如西方星期制的四分一月法在中國古代從未實行過。陝西扶風出土的西周銅器東鼎銘云：“癸卯，王來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文物》1963年第2期）癸卯至丁卯正好二十四天，可證周人是用三分一月之“旬法”記時的。安徽壽縣出土的吳王光鑒：“惟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既字白期”即“既生霸”，“吉日”即“初吉”。這裏如果“既生霸”是月相，“初吉”就不可能也是月相。我曾統計過，金文中有300件左右的銅器上有“初吉”一詞，這個數字是“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總和的三倍，使用範圍大不相同。“初吉”之稱與其他三者盛行的時代也不同，所以估計“初吉”與既望、生霸、死霸不同，不是月相。既然不是月相，那麼“初吉”出現在“既望”之後，也就不奇怪了。比如靜簋（《三代》6.55）：“惟六月初吉，王在葬京，丁卯，王令靜鬲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季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剛……射於大池……”此簋六月初吉的丁卯距八月初吉的庚寅爲八十四天，兩個“初吉”必定是一在月初，一在月底，也就是說其一肯定要在既望之後出現，因此，我們認爲“初吉”不能如王國維理解的那樣必定在月初出現。“初吉”在春秋以後銅器上又稱“吉日”，很可能就是指的一種“吉利的日子”。（關於“初吉”一詞的含義，筆者有《金文初吉辨析》一文載《文物》1982年第11期，此從略）。因此，克鐘十六年九月有初吉庚寅，兩年之後，克盃十八年十二月也可以有初吉庚寅，並不矛盾。克組器中



克鐘紀年爲十六，克盨爲十八，克鼎爲二十三。鐘稱“克”，盨、鼎稱“膳夫克”，官職逐年有加。十六、十八、二十三之紀年應爲連續的。據陳夢家先生考證，厲王在位年數，《史記·周本紀》之三十七年說是靠不住的。因爲《史記》陳、衛、齊三世家所記厲王年數限死在十四與十八之間（《西周年代考》）。因此，把克盨、克鼎這些超出十八年的器放入厲王是不可靠的。克鐘克盨克鼎據傳皆出土於扶風法門寺任村，《商周彝器通考》上第297頁云：“光緒十六年，陝西扶風法門寺任村出土，大鼎一、小鼎七、盨二”。《金文分域編》克鼎條云：“光緒十六年與克鐘、仲義父鼎出土岐山法門寺。《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亦有相同記載，該組器紋飾形制一致，我們擬將這組器全部斷在宣王。

如果克組器定在宣王，那麼與此有關的器也應向它們靠攏。如過去郭沫若、唐蘭、容庚、吳其昌諸先生定爲厲王的卣攸從鼎（《三代》4.35）卣從盨（《三代》10.45）銘中“右者”爲善夫克，其紀年爲二十五、三十二，皆超出十八年，應改定爲宣王器。又上述各家以爲厲王的伊簋（《三代》9.20）因其“右者”鬻季與克鼎同，其紀年爲二十七，似也應改定爲宣王。又無彘簋（《三代》9.1）之無彘很可能即卣從盨中的內史無嬰，其“皇祖釐季”亦可能是小克鼎之“皇祖釐季”故無嬰簋也可以改定爲宣王器。

另外，過去認爲是夷厲時器的禹鼎（《錄遺》99）叔向父禹簋（《三代》9.13）敵簋（《博古圖》16.39、）南宮柳鼎（《錄遺》98）等，從其銘文內容看也都應改定爲宣王器。

綜上所述，把多友鼎斷在厲王的同志多從傳統認識出發，而我們認爲過去斷在夷厲的數量不少的器，實際應改定在宣王。多友鼎的時代也應隨之歸入宣王。

### 三 地名考訂

多友鼎上的幾個地名，有的同志認爲全在山西，有的認爲則全在陝西，二者都能找出許多同名的古代地點相比附。如何在這衆多的重出地名中辨別是非呢？齊思和先生當年曾說：“若就山川以審定地望，則較爲可信”（《西周地理考》，《燕京學報》第30期）。多友鼎本身無山川位置可資比附。但在考慮多友鼎中“京師”的位置時，我們自然會想到克鐘中的“京師”。克鐘：“王親令克遷涇東至於京師”。這裏把“京師”與“涇水”連在一起，涇水在陝西境內與渭水合流，是不會流入山西的。因此有的同志引用郭老意見，把“京師”指爲晉地（參見《兩周金文辭大系》晉姜鼎、晉公盂、克鐘銘考釋），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有的同志雖認爲京師在陝西，但認爲“京師”是指《詩

經·公劉》中的“京師之野”，在豳地一帶。認為克鐘銘應以“王親令克遼涇東”斷句，克從鎬京出發，循涇水東岸，西至於豳地之枸邑一帶的京師。我認為對克鐘的這種理解有幾個矛盾不好解釋：第一，涇水歷來認為是一條東西向的水。今地名尚有“涇陽”之稱。不見有“涇東”、“涇西”之稱。第二，西周金文中的“周”多指岐周。周原甲骨有多處記載，周原出土的牆盤亦有“舍寓于周”的記載。故克鐘：“王在周……王親令克遼涇東至于京師”。鐘銘之“周”應為岐周，即《漢書·匈奴傳》：“宣父亡走於岐下，豳人悉從宣父而邑焉，作周”之周。其地對涇水而言為西，故鐘銘可稱“遼涇東至於京師”。鎬京稱“宗周”、“京師”不見有稱“周”者。故鐘銘不能理解為克從鎬京出發，沿涇水東岸而行。第三，從語言習慣上，在“東”後斷句亦欠妥。有此三點，我以為將“京師”指為豳地是很難成立的。至於《公劉》中的“京師”確在豳地。然而那祇能是早在公劉時代的地名，武王建都鎬京，鎬京稱“京師”後，豳地之“京師”一名即應轉移。因此我們解釋克鐘這段銘文的內容是：宣王在岐周之周城親自向克下令，克由涇水上游出發，沿水而下，自西向東，到達京師。從克鼎中克受封之“溇原”等地看，其封地正在涇水上游之豳地。王國維說：“自豳至京師，自應循涇水而下”。（《觀堂集林》十八卷《克鐘克鼎考》）在這個方位上稱得上“京師”的，只有“鎬京”。《路史·國名記丙》：“鎬在長安之靈臺鄉。鎬京，宗周。漢穿昆明，鎬之遺址淪焉，即京周”。《詩經·下泉》：“念彼周京”、“念彼京周”、“念彼京師”，亦以為“周京”、“京周”、“京師”皆指鎬京。所以我們認為克鐘上的“京師”是指“鎬京”，多友鼎與克鐘時代相同，出土地相近，鼎銘之“京師”與鐘銘之“京師”乃一地，即鎬京。

多友鼎的筍，文獻記載有多個。《水經註·汾水》：古水“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春秋地名考略》荀條引《都邑志》云：荀城在絳州正平縣西十五里。上二書記載筍在今山西新絳附近。

《通典》一七九蒲州猗氏：“古郇國也”。《太平寰宇記》蒲州猗氏：“古為郇國之地”。《路史·後記五》荀條：“今猗氏西南古郇城是”。上三書記載筍在山西猗氏（即今臨猗），該地在新絳南百多里。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使公子絳如晉，晉師退，軍於郇”。杜預集解：“解縣西北有郇城”。晉人杜預所謂的解縣即今之臨晉，在今臨猗南數十里。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司馬貞索隱云：“枸，縣名，屬扶風，音荀。故周文王封其子之邑。河東亦有郇城也”。《元和郡縣志》三水縣：“枸邑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枸邑縣，屬右扶風，古郇國也”。《太平寰宇記》三水縣亦同。《廣韻》侯十九“投”注：“郇伯，周畿內侯”。上五書所記，筍在今陝西豳地之枸邑。這些同名同姓的筍歷來各家理解不一，頗有爭議。其實，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些記載彼此並不矛盾，各書皆有所本，都應是不同時代變遷着的筍國地理位

置的記載。我們正可以由此追索筍反復遷國的歷史蹤迹。本來古地多野曠無名，新遷居者可隨意定其名，而遷居者往往沿用舊名，這就給後代人留下了許多同名的地名。

根據各書記載，我們試作推論：文王封其子之筍即應在豳地柁邑，乃畿內之國，此為西周之筍。西周末年，犬戎踐周，筍亦被迫東遷：一遷至新絳，後可能迫於大國威逼，再遷至臨猗，三遷至臨晉，終被晉武公所滅。

銅器出土情況亦如此。《漢書·郊祀志》，美陽得古鼎，張敞為釋文云，今鼎出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張敞所云夷臣鼎當為西周器。一九六一年科學院考古所在張家坡發掘出筍侯盤，亦為西周晚期器。山西省博物館陳列有聞喜縣春秋大墓中出土的筍侯匜，是春秋時器。西周的筍侯銅器出於陝西，春秋的筍侯銅器出於山西，似乎也可以作為我們分析這一問題的旁證。

多友鼎乃西周器，因此銘中之筍應即陝西豳地之柁邑。而主張筍在山西的同志可能是受了文獻上記載的春秋後由陝西遷國至山西的諸筍地名的影響。

如果多友鼎中的“京師”、“筍”這兩個主要地點能肯定下來。那麼就可以說，多友鼎銘所記的歷史事件是發生在今陝西境內的了。

## 注 釋

- ① 用，因為。京自（師），鎬京。放輿，有兩說：一謂方輿，是動詞。一謂獫狁之名。此用後者。
- ② 意為有人告知：獫狁還要進一步追擊從京師出走的周王。
- ③ 武公，西周晚期周王左右之重臣。
- ④ 羞，進也。
- ⑤ 戎，獫狁。筍即荀、柁，指豳地之柁邑。
- ⑥ 衣，殷也。天亡簋“不克乞衣王祀”、“衣祀於王不顯考文王”，兩“衣”字皆讀為“殷”。衣王者殷王也。衣祀者殷祭也。“殷”有“大”意，《禮記·曾子問》“服除而後殷祭”。疏：“殷，大也。大祭謂之殷祭”。因此，“衣”亦應有“大”意。“衣俘”即“大加虜掠”之意。如弋簋：“衣搏，無異於弋身”。（文物 1976 年第 6 期）“衣”讀為“殷”，釋為“大”。
- ⑦ 邾，字不識，筍附近地名。
- ⑧ 衣復筍人俘，大量收復筍人被虜掠去的士女玉帛。
- ⑨ 襲，筍地附近地名。
- ⑩ 從至，《說文》“從，隨行也”。《左傳》桓公五年秋周鄭繻葛之戰“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楊伯峻注：“從之，謂追逐之也”。《左傳》閔公二年：“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楊伯峻注：“狄師追逐衛人也”。這裏指多友部隊跟蹤追擊獫狁而至。
- ⑪ 世，筍地附近地名。
- ⑫ 輶追，輶乃逞之繁寫，即逞追。《說文》“楚謂疾行為逞”。《廣韻》“逞，疾也”。輶追，急追。

⑬ 楊冢，筍地附近地名。

⑭ 唯俘車不克，倒裝句，即唯不克俘車。《爾雅·釋言》“克，能也”。《左傳》莊公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楊伯峻注：“克，能也。此處意為調停不果”。《詩·南山》“匪斧不克”毛傳：“克，能也”。師筍簋“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克亦能也。衣焚，大火焚燬。毆，即毆。《說文》“毆，捶擊物也”、“盡，傷痛也”。毆盡，擊至傷殘。作冊益卣：“先盡死亡”與此意近。

邾之戰，折首二百餘人，執訊 23 人，俘車 117 乘；龔之戰，折首 36 人，執訊 2 人，俘車 10 乘；楊冢之戰，折首 115 人，執訊 3 人。從交戰斬獲數量看，生俘人員輾重逐次減少，說明玁狁已被逼入絕境，寧肯戰死，焚燬毆盡車馬輾重，不願為周人生俘。因此，在楊冢決戰中“唯俘車不克”、“唯馬毆盡”，周人没能俘到戰車戰馬。

⑮ 釐，釐也。其意為嘉獎。

⑯ 唼，《玉篇》“唼，歐呼也”。此假為順逆之逆。戊，應讀為成。《說文》“成，就也。”《廣韻》“成，畢也。凡功卒業就謂之成”。作戰成功亦可謂“有成”。猷鐘云：“朕猷有成”與此義同。

⑰ 𨮒，𨮒也。

湯，𨮒也。《爾雅·釋器》“黃金謂之𨮒”。《說文》“金之美者，與玉同色”。

𨮒，不識。“一𨮒”，其意當為“一組”、“一套”。

喬，驕也。《禮記·樂記》：“齊音放辟喬志”。釋文云：“喬音驕，本或作驕”。因此鑄亦應通驕。鑒，《說文》“一曰轡首銅”。“鑄鑒”，驕銅，即上好銅料。金文賞賜每言“金”若干，幾父壺：“易幾父示賁六，僕三家，金十鈞”（文物 1961 年第 7 期）。



伯唐父鼎及銘文

（原載《考古》1983 年第 2 期 152~157 頁）

## 邵簋編鐘的重新研究

傳世有邵簋編鐘一組十三件，自晚清出土以來，頗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先後有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憲齋集古錄》）、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孫詒讓（《籀稿述林》）、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王國維（《觀堂集林》）、于省吾（《雙劍謠吉金文選》）、容庚（《善齋彝器圖錄》）、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先輩學者考證，文義已粗通，時代亦大體可定。其中尤以王國維先生的考證最為精闢，其他各家亦各有所得。然邵簋其人究竟為誰各家均無說，各家所作之釋文亦仍有不可解之處若干，且此組編鐘自問世後，諸書著錄多有混亂。因此，我以為對這組編鐘仍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本文即擬以上三項為主要内容講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於同好。

筆者於二十年前有幸考取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學研究生，得到容先生的悉心指教，今重新研讀邵簋編鐘亦受到先生所作釋文及考證的諸多啟發，故謹以拙文敬獻給容庚先生九十壽辰，作為學生向老師作的又一次學習匯報。

### 一 釋文及解說

釋文：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邵簋

曰：“余畢公之孫，邵伯之子。

余頤岡事君，余畀武。作

為余鐘，玄鏐鏞鋁。大鐘八

聿，其甗四堵。喬其龍，既壽

鬯虞。大鐘既縣，玉鏐鼂鼓。

余不敢為喬，我以享孝。樂  
我先祖，以漸眉壽。世世子孫，  
永以為寶。”

解說：

此編鐘共十三件，銘文行款皆相同，九行八十四字，另有重文二字。現將其中部分詞句解說如下（以銘文先後為序）：

初吉

初吉一詞歷來爭議較大，王國維作《生霸死霸考》（《觀堂集林》卷一），以為是月相之一，指每月一至七、八日。後世學者多崇此說。黃盛璋曾提出異議，認為初吉是初干吉日，即指每月的初一至十。（《釋初吉》歷史研究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筆者認為初吉不是月相詞語，乃是古人用占卜方式求出的一個吉日的代稱，初吉的含義就是“首善”、“大吉”的意思。（此說詳見《金文初吉辨析》、《文物》待刊稿）。

畢公之孫，即伯之子。

畢公指周初之畢公高。即伯指第一代即伯，即魏悼子呂錡。（詳見下“呂鷺其人”）古人三代以下皆可稱孫，故春秋即伯之子可稱為西周初畢公高之孫。

頤岡事君，余畧戔武。

容庚先生云：“頤岡猶言頤亢”（《善齋彝器圖錄》）其說甚是。《詩經·邶風·燕燕》“燕燕於飛，頤之頤之”。毛傳：“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此句蓋謂邵鷺常在君王之左右，諧和地服事於君王。

畧通獸，《說文》“獸，守備者”。

郭沫若云：“戔即𠂔字”。《說文》“𠂔，持也”。此句言邵鷺持以勇武，保衛君王。

玄鏐鏞鋁

此四字金文鐘銘上習見，說者各異。《說文》“黑而有赤色者為玄”。《爾雅·釋器》“黃金謂之鑾，其美者謂之鏐”。郭注：“鏐即紫磨金”。《水經註·溫水》“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故知玄鏐乃黑紅色上等銅料也。鏞乃鋁的形容詞。《詩經·豳風》“公孫碩膚”。毛傳：“膚，美也”。鋁乃金屬名，疑即錫之古稱，古代青銅的配料一為銅，一為錫。故知鏞鋁者美錫也，上好的錫料也。

大鐘八肆，其窰四堵。

肆即肆。《左傳·襄公十一年》“歌鐘二肆”注“肆，列也”。《說文》“堵，垣也。五版為一堵”。窰通窰，亦通造。造，作也。《尚書·大誥》“予造天役”。注“造，為也”。春秋兵器每言“××作造戈”。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收有襄石磬銘“自作造磬”。其義均應釋“作”“為”。此句之意即是大鐘八列，造作成四堵。也就是兩列合造成一堵。本銘句式十分規整，四字一分句，兩分句合為一整句，每整句後押韻，每整句



表達一個完整的獨立的意思。與詩經的四言詩酷似。因此，八肆與四堵的關係只能作上述理解，即指同一套編鐘的排列方式。新出曾侯乙墓編鐘復原後是三列爲一堵，是又一種排列方式。

鄭玄《周禮·小胥》注云：“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後世學者泥於鄭注，憑空算出百多件鐘爲一組來解釋本銘，這是錯誤的。以出土編鐘情況看多與鄭說不合，長臺關編鐘十三枚，邵鄧鐘十三枚，新出秦公鐘五枚，秦公罍三枚等等均與鄭說相去甚遠。商及西周乃至東周樂器的排列組合方式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着的，其數目也不可能一成不變。所以說鄭玄所云於漢代制度或許是有根據的，若以其所構擬的數目上推商周則是靠不住的。

既壽鬯虞

壽乃木名。《山海經》：“靈壽實華”。《呂氏春秋》：“壽木之華”。《大雅·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蕡合而鬱之曰鬯。”《說文》：“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句說鐘虞是用壽木作成，而且是用香酒浸過的。

玉鑑鼉鼓

鑑，字書所無。各家說解不一，有說是磬的，有說是鐃的，於銘文俱難講通。我以爲也可能是鼓槌。《楚辭·國殤》：“援玉桴兮擊鳴鼓”、“玉桴鳴鼓”與此“玉鑑鼉鼓”乃同類物。

鼉，即今之鱷魚。本所周本雄同志曾有專文論及。（《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詩經·大雅·靈臺》：“鼉鼓逢逢。”毛傳：“魚屬。”《說文》：“水蟲，似蜥蜴，長大。”容庚先生早年曾指出雙鳥饕餮紋鼓“兩面飾鼉皮紋”。（《商周彝器通考》上第512頁，下第514頁，圖980）

本銘用韻十分規整，亥、子之部；武、鋁、堵、虞、鼓魚部；孝、壽、寶幽部。凡三變韻至終了，是一首音律和諧優美的四言詩。

## 二 邵鄧其人

王國維先生云：“余謂邵即《春秋左氏傳》晉呂甥之呂也。呂甥一云瑕呂飴甥，一云陰飴生，瑕、呂、陰皆晉邑。呂甥既亡，地爲魏氏所有，此邵伯、邵鄧皆魏氏也。《史記·魏世家》晉文公命魏武子治於魏，生悼子。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於漢爲河東郡河北縣，霍於後漢爲河東永安縣。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永安縣下注引《博物記》曰有呂鄉，呂甥邑也。《元和郡縣志》河東道晉州霍邑縣下云：呂坂在縣東南十

里。有呂鄉，晉大夫呂甥之邑也。……悼子徙霍或治於呂，故遂以呂爲氏。……余謂呂錡即悼子。……錡於鄢陵之役射楚王中目，退而戰死，尤與悼之謚合也。魏氏出於畢公，此器云畢公之孫，邵伯之子，其爲呂錡後人所作彰彰明矣”。（見《觀堂集林》卷十八邵鐘跋）

王氏之說，十分精彩，時至今日，百年之後，幾乎無一字可移。我們對邵懿鐘的研究，只能以其說爲起點，無可猶豫。王氏的結論是邵懿“爲呂錡後人”，甚是。《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據王氏所考，霍之左近有呂鄉，呂坂，乃呂甥之邑。是知魏悼子徙治霍後始可稱邵伯，故悼子乃第一代魏氏之邵伯。鐘銘稱“邵伯之子”，金文之“子”字乃第二代之稱，不可他指。所以我以爲王氏之結論可以進一步推演：“邵伯之子”即悼子呂錡之子魏絳。邵懿之懿疑即黛字。黛，黑也。《楚辭·大招》：“粉白黛黑”。《說文》：“畫眉也”。絳，《說文》云：“大赤也”。是知黛、絳乃紅、黑二色，紅、黑二色多相配成文《說文》“黑而有赤色者爲玄”。故用爲一名一字，正相宜也。準魏錡、魏相可稱呂錡、呂相之例，此魏絳當然亦可稱呂絳或呂黛。

視《史記》、《魏世家》、《晉世家》及《左傳·襄公十一年》等所言，魏絳乃晉國一朝權臣，事晉悼公。悼公即位於厲公被弑晉國大亂之際，諸事多依托絳。甚至在悼公三年大會諸侯時，絳當衆僇辱悼公之弟楊干。悼公亦敢怒而不敢言。史書所載絳乃一勇武之將。用悼公的話說：“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左傳·成公十八年》：“魏絳爲司馬”。《國語·晉語七》：“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春秋時司馬乃武職也。鐘銘稱：“余頡岡事君，余畱毳武”，與史書所載恰相符合。

鐘銘稱“大鐘八肆”，以後世出土之一肆編鐘數目看，由三、五件至十餘件不等。然而無論如何計算，此八肆鐘數目亦當在數十件之上。能鑄造如此多數鐘之邵懿必爲一勢侔君王的權臣方可，此又與文獻中之魏絳情形相仿佛。

史稱魏絳喜愛音樂，君王亦以女樂賜之。《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綜合以上情況，我們大膽假設鐘銘之邵懿即文獻中晉國之名臣魏絳。其人始見於《左傳》魯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卒於晉悼公末年（約在公元前562~558年）《左傳·襄公十一年》記晉悼公賜魏絳以鄭賂之歌鐘及女樂之半。絳三辭而受之，云：“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故知於禮魏絳被列爲可以有金石之樂的大夫乃晉悼公十一年（即公元前562年）之後事。

至於其自鑄郢簋鐘十三件之事，即應當在悼公末年，即公元前 562 年至 558 年這四五年間。

由郢簋其人爲魏絳的推理，我們可以得出郢簋鐘之鑄造年代在公元前 562 ~ 558 這幾年中的結論。

### 三 郢簋鐘的著錄情況

此組編鐘之最早著錄者當推潘祖蔭所著《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其收錄郢簋鐘四件，三大一小。云：“此鐘咸豐年間河岸出土，爲向來著錄家所未見。今所得此鐘四：歌鐘三，編鐘一”。其後吳大澂云：“是鐘出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河岸中。同治初年，岸圯，出古器甚夥，長安賈人雷姓獲郢鐘大小十二器，皆同文。英蘭坡中丞榮購得其十，後歸潘伯寅師九器，大澂得其一。”（《憲齋集古錄》一卷七頁）憲齋共收郢簋鐘七件，四大三小。羅振玉所著《貞松堂集古遺文》一卷十八至二十頁收錄郢簋鐘五件，云：“此五器據予所藏拓本入錄，在吳氏七器之外。拓本皆有潘文勤印，當是滂喜齋藏器。合憲齋所錄共得十二器，不知傳世共幾器也。”按：經查對，《貞松》所錄五器中有一器與《憲齋》所錄重，因此祇能說多出四件。到方濬益著《綴遺齋彝器考釋》一書時收入郢簋鐘九件。直至《三代吉金文存》問世，纔全部著錄了十二件鐘，可能即雷姓賈人所獲之全部。後出之鄒安的《周金文存》收錄郢簋鐘十三件，較《三代》多出一件，其出處未作交待。估計乃雷姓所獲十二件之外的一件。再後之劉善齋《小校經閣金文拓本》收郢簋十四件，除自相重複一件外，多出一件，與《周金》同。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大系》收錄郢簋鐘十五件，除去自相重複之兩件外，仍爲十三件。容庚先生總結以上著錄情況云：“清咸豐間，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河岸出土，今所見凡十三器，銘文皆同。”（《商周彝器通考》499 頁）又云：“《金文大系》錄十五器，其第十四器即第三器，其第十五器疑即第十二器之未別者。《小校經閣》錄十四器，其第十四器即第四器之半。”（《善齋彝器圖錄》圖十三說明）新出《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一書云：“已見著錄者十五器，上海博物館藏其六器”，然其書只著錄其一。此組編鐘能找到下落者，上海博物館六件、《上海》著錄一件，有五件未著錄）英國大英博物館一件、臺灣《中央博物院》一件，共八件。

又近日傳聞上博收集到郢簋鐘十一件。如此說不誤，則郢簋鐘十三件全找到下落了。遵照容先生提示，筆者全面檢校了各種著錄，排出一表，以見各書對應關係。此表以《三代》爲主，各書與《三代》比較，多出《三代》的一件列爲第十三器。

邵戴鐘各書著錄對照表

編號 著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三代	1.54.2	1.54.3	1.55.1	1.55.2	1.55.3	1.55.4	1.56.1	1.56.2	1.56.3	1.56.4	1.57.1	1.57.2	
小校	1.68	1.72	1.70 1.78.2	1.71	1.69	1.76	1.74	1.75	1.73	1.78.1	1.77.2	1.77.1	1.67
周金	1.11 上	1.17	1.11 下	1.12	1.13	1.14 前	1.19	1.15 前	1.15 後	1.18	1.16 後	1.16 前	1.14 後
大系	269	274.1	270	271 276.2	272.1	272.2	276.1	273.2	274.2	275.3 276.3	275.2	275.1	273.1
善齋		1.36										1.37	
恒軒	1.1										1.2		
憲齋	1.7	1.10 前	1.9 前	1.11 前						1.10 後	1.11 後	1.9 後	
綴遺	2.4.1	2.6.1	2.4.2	2.5.1	2.5.2	2.6.2		2.7.1	2.7.2		2.8		
攀古	上1		上3		上2						上4		
貞松						1.20.1	1.19.2	1.18	1.19.3	1.19.1			

又將各著錄之書全面整理如次：

#### 邵戴鐘（一）

三代 1.54.2 攀古上 1 恒軒上 1 憲齋 1.7 綴遺 2.4.1 奇觚 9.27 周金 1.11 上 大系圖 228 錄 269 考 232 小校 1.68 通釋 35：127。

#### 邵戴鐘（二）

三代 1.54.3 憲齋 1.10 前 綴遺 2.6.1 周金 1.17 善齋 1.36 大系錄 274.1 小校 1.72 善圖 13 通考 498：13 圖 955 故宮下下 463

#### 邵戴鐘（三）

三代 1.55.1 攀古上 3 憲齋 1.9 前 綴遺 2.4.2 周金 1.11 下 大系錄 270 小校 1.70；1.78.2

#### 邵戴鐘（四）

三代 1.55.2 憲齋 1.11 前 綴遺 2.5.1 周金 1.12 小校 1.71

#### 邵戴鐘（五）

三代 1.55.3 攀古上 2 綴遺 2.5.2 周金 1.13 大系錄 272.1 小校 1.69

#### 邵戴鐘（六）

三代 1.55.4 綴遺 2.6.2 周金 1.14 前 貞松 1.20 大系錄 272.2 小校 1.76

#### 邵戴鐘（七）

三代 1.56.1 周金 1.19 貞松 1.19.2 大系錄 276.1 小校 1.74

#### 邵戴鐘（八）

三代 1.56.2 綴遺 2.7.1 周金 1.15 前 貞松 1.18 大系錄 273.2 小校 1.75

## 猷氏 II fig17

## 邵戴鐘（九）

三代 1.56.3 綴遺 2.7.2 周金 1.15 後 貞松 1.19.3 大系錄 274.2 小校 1.73

## 邵戴鐘（十）

三代 1.56.4 憲齋 1.10 後 周金 1.18 貞松 1.19.1 大系錄 275.3、276.3 小校 1.78.1 上海 80

## 邵戴鐘（十一）

三代 1.57.1 恒軒 1.2 攀古上 4 憲齋 1.11 後 綴遺 2.8 周金 1.16 後 大系錄 275.2 小校 1.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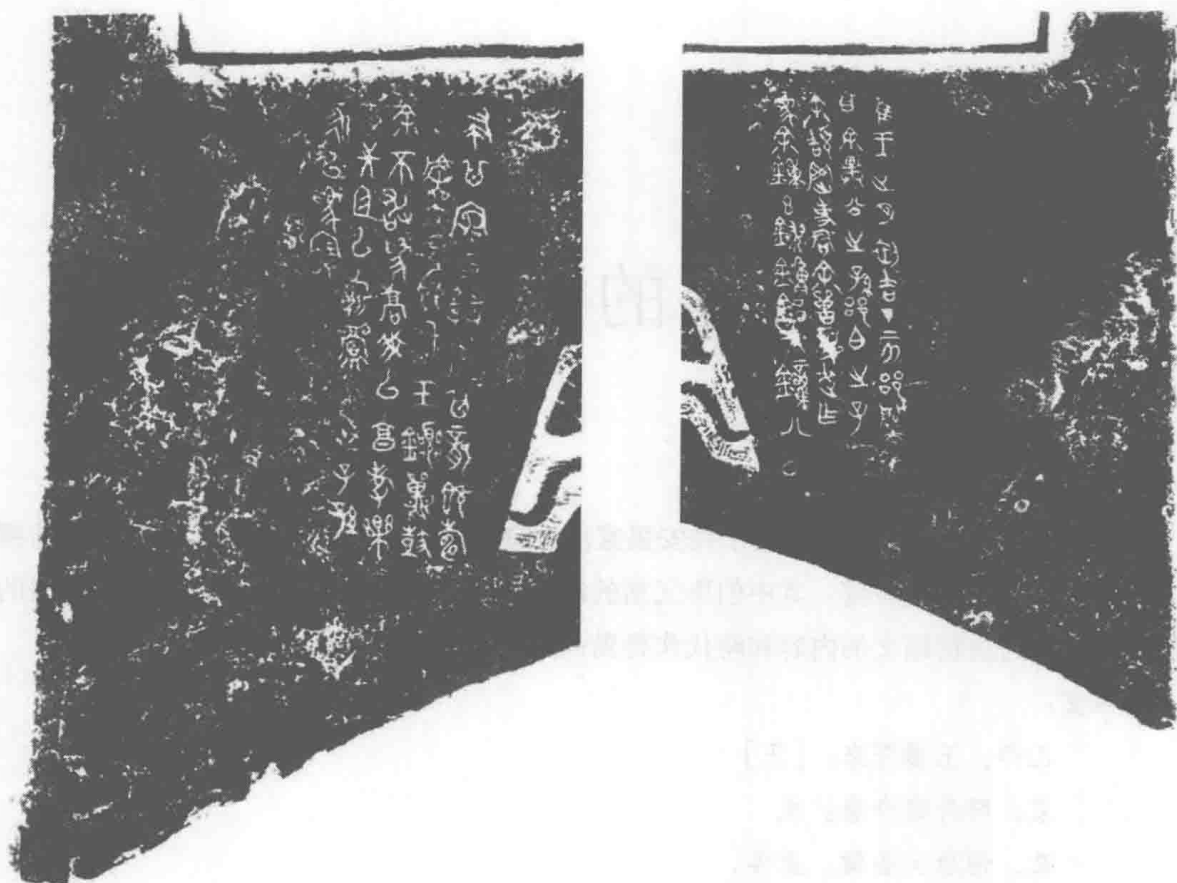
## 邵戴鐘（十二）

三代 1.57.2 憲齋 1.9 後 周金 1.16 前 善齋 1.37 大系錄 275.1 小校 1.77.1

## 邵戴鐘（十三）

周金 1.14 後 大系錄 273.1 小校 1.67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第 257~265 頁，中華書局，1985 年 10 月)

編者按：為了閱讀和排版方便，本文列表及部分文字中文獻簡稱均未加書名號。



## 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

《考古》1989年第6期發表了長安張家坡洞室墓簡報和張政烺先生對銅器銘文的釋文，讀過之後，很受啓發。其中伯唐父鼎的銘文很重要，它較詳細地記述了一次禘禮的過程。現再對這篇銘文的內容和時代作幾點補充。

釋文：

乙卯，王饗茅京。[王]

棗，辟舟臨舟龍。咸

棗，伯唐父告備。王各，

盥辟舟，臨棗白旗。

[用]射絳、虋虎、貉、白

鹿、白狼于辟池。咸

棗，[王]蔑曆，易秬鬯一卣、

貝廿朋。對揚王休，用

作□公寶尊彝。

銘文分三段，首段記時，指明事情發生於王在茅京舉行饗祭之年的乙卯日。次段記王行禘祭禮的過程：王將舉行禘祭禮，辟舟靠臨舟龍。禘祭都準備完畢後，由伯唐父報告準備就緒。王到達，乘上辟舟，於白旗下親臨禘祭。於辟池中射牲，射牛牲及虎、貉、鹿、狼等野牲。末段記賞賜和作器：禘禮完畢之後，王勉勵作器者伯唐父，賞賜他浸了香草的醴酒一卣、貨貝二十朋。伯唐父答揚王的美意，作了這件祭奠其先人某公的禮器。

銘中兩次提到的辟舟之辟作彳，辟池之辟作彳，與麥方尊璧雍之璧所從之辟相同。一從口一從○，是書寫者隨意所致，並無深意。金文中口與○每混用不別。如商尊（《陝青》2.19）中的辟字從口，同出的商卣（《陝青》2.4）則從○。辟東尊（《三代》11.24.3）辟字從口，而孟鼎、召卣、墻盤等辟字從○。在銘文中辟是辟雍之辟。《史

記·封禪書》“灋有昭明，天子辟池”。司馬貞索引云：“今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蓋司馬遷去古未遠，尚知有“辟池”之稱。《白虎通·辟雍》“辟雍，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通典》引許慎《五經異義》云：“水旋邱如璧曰辟雍”。麥方尊的辟雍也寫作璧雍。是知古代辟雍建在環水如璧的島上，故水池稱辟池，舟行辟池水中，故又稱辟舟。

“舟龍”之龍疑即壘，原指田中高起者，此處指高出水面以便登舟之地。

“告備”，《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祭之日，逆齋省饗，告時於王，告備於王。”賈公彥疏云：“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伯唐父於禘祭時向王告備，可能其職務即小宗伯之類。

“白旗”，可能就是武王伐紂所用“大白之旗”一類的旗，周代王者之旗多用白色。麥方尊銘的邢侯所乘舟上用“赤旗”，蓋赤色為諸侯所用。

“用射綏、鰲虎、貉、白鹿、白狼於辟池”，指禘祭中的射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周禮·夏官·司弓矢》：“澤射共楛質之弓矢。”<sup>①</sup>《尚書·大傳》：“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文獻中所謂“澤射”，與伯唐父鼎之射牲於辟池不必為一事，但說明古代確有這種禮儀，即將牲物置於澤或池中而射之。麥方尊於舟上作大禮，然後“王射大龔禽”，也是類似的禮儀。

綏，牛牲的代稱。《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綏，共其水稿。”鄭注：“綏，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鰲虎”指有斑紋的虎，與貉、白鹿、白狼等皆為野性。《國語·周語》、《史記·周本紀》皆記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蓋此一時期白狼白鹿為野牲之名貴者。

殷虛卜辭多有禘年、禘雨、禘生之祭，意在向先公先王先妣祈求豐收、雨水，生育。周人之禘祭亦多為祭祀祖考，如獻侯鼎（《三代》3.50.2~3）、叔卣（《錄遺》161）、孟爵（《三代》16.41），圉卣（北京琉璃河 M 253）、矢令方彝（《三代》6.56.2）、歸卣進方鼎（《文物》）1986 年第 1 期）等皆記有禘祭<sup>②</sup>。周原卜骨“貞，王其禘又大甲”（H11：84）亦為禘祭的記錄。然卜辭與金文對禘祭之禮却皆語焉不詳。伯唐父鼎銘的“告備”、“乘舟”、“臨禘白旗”、“射牲于辟池”等儀節則是第一次揭示出此一祭禮的大致過程。

此洞室墓出土有西周早中之交的陶鬲，時代明確。原簡報稱此墓時代“可能在西周穆王前期”。我認為這個分析是正確的，而且可以在伯唐父鼎銘文中找到內證。本銘以“饗祭”記年，金文中同類紀年器尚有戌嗣子鼎（《考古學報》1960 年第 1 期）、辰臣盃（《三代》14.12.2）、呂方鼎（《三代》4.22.1）、高卣蓋（《嘯堂》41.4）等。麥方尊《西清》8.33 有“王饗莽京”一句，過去將饗字誤釋為客字，而其字形與伯唐

父鼎“王饗葺京”之饗字相同，故也應改釋為饗字。沈子它簋《三代》9.38.1）“命乃鵬沈子作紂於周公宗，陟二公”。我認為“作紂”即上述諸器中的饗祭。沈子它之父新死，其神主要按昭穆祔入宗廟，其祖父、曾祖（二公）的神主也要按昭穆遞昇一級，故饗祭是一種調整宗廟次序的祭禮，且必行於其父考新死之際。王室之饗祭則必行於父王去世，新王初繼位之時<sup>③</sup>。伯唐父鼎的形制一般不會早到昭王初年，而該鼎却以饗禮紀年，故應作於昭王新死（南巡不返），穆王初繼位時，銘中之王應指穆王，這說明伯唐父鼎的時代與墓葬時代是一致的。王室饗祭行於新王初繼位時，是我新提出的銅器斷代的一個輔助標準。當然現在還只能算是一個假說，因為可資證明的材料還太少。但是，用這個新標準來衡量伯唐父鼎所得出的結論，却與考古發掘得出的結論相吻合，說明它是有一定科學性的。

### 注 釋

① 《周禮》原文作“澤共射楫質之弓矢”，恐誤。今依“大射”、“燕射”之例改為“澤射共楫質之弓矢”。

②③ 關於祫祭、饗祭的詳細考證，可參見《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發表的《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一文。



# 南陽仲冉父簋不是宣王標準器

《中原文物》1984 年第四期載文介紹了南陽古墓中出土的鬯（申）國銅器，同期發表了李學勤同志的考證文章。兩件仲冉父簋的銘文是十分重要的，對其中的幾個問題有作進一步討論的必要，本文擬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請同志們指正。

## 一 銘文釋讀中的幾個問題

### （一）語詞次序

仲冉父簋共出兩件，甲簋器、蓋同銘（見《中原文物》1984 年 4 期 15 頁圖四），乙簋器銘與上同，蓋銘則小有出入（見同期的圖五），現將兩種銘文抄錄於下：

#### 甲簋銘

仲冉父大宰南申  
嗣作其皇祖考徺王  
監伯尊簋。用享用孝，  
用易眉壽，屯右康勗，  
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乙簋蓋銘

南申伯大宰仲冉父  
嗣作其皇祖考  
徺王監伯尊簋。用  
享用孝，用易眉壽，  
屯右康勗，萬年無

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甲乙兩銘內容相同，字數相等（後者僅較前者多出一“伯”字），其不同在於修飾“仲禹父”的語詞次序。甲簋“大宰南申”置於“仲禹父”後，乙簋“南申伯大宰”置於“仲禹父”之前，語詞次序不固定是本銘的一大特色。類似這種語詞次序不固定的情況在金文中是不乏其例的，如鬲尊（《周金文存》5.11.3）銘云：

鬲易貝于王，用作父甲寶尊。

應該是王易貝於鬲，這裏顯然是將賜予者和被賜予者的位置弄顛倒了，類似的例子尚有許多，不贅述。

根據金文中這種語詞次序常常顛倒的情況來看，本簋銘中的“𠬞司”也可以是“仲禹父”的修飾語，只不過在甲乙兩銘中它都處於“仲禹父”之後，不易為人覺察而已。

經過上述分析，簋銘第一句話中“仲禹父”的修飾語次序應該是這樣的：

南申伯大宰𠬞嗣仲禹父

## （二）伯大宰

大宰，職官名。由西周的“宰”發展而來。西周“宰”的職司主要是管理王家宮廷內部事務。蔡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14.9）云：

宰習入右蔡，立中廷。王乎史兕冊令蔡。王若曰：蔡，昔先  
王既令女作宰，司王家。今余佳申  
京乃命，命女累習艱疋對各，死司王  
家外內，毋敢有不聞。嗣百工，出入  
姜氏令。

這裏宰蔡主司王室諸工匠作坊，出納傳達王后的使令。《周禮·天官》有大宰，又稱冢宰，說是百官之長，總攬百官之治。但“天官”下屬六十餘官、都是庖人、世婦之屬，多是管理王及后的衣食住行等，並沒有交待他們如何總攬百官之治，《周禮》中的太宰充其量只能是王室的大總管。這與西周金文中“宰”的職司倒是十分符合的。

從金文反映的情況看，在西周的幾百年間，宰職有權勢逐漸加重的趨勢，在周初“宰”類似於“小臣”，並不重要。而到了晚期有的宰却掌握了實權，如師鬲簋（《三代吉金文存》9.35~36，以下簡稱《三代》）中的宰凋生，據考證就是《詩經·大雅·江漢》中的召伯虎，其地位是相當高的。可以想見，這類經常活躍在王及后左右的近臣，雖本來職位不高，但他們有機會接近最高權力執掌者，有的就有可能掌握較大的權力。

西周金文中只出現“宰”，而沒有出現“大宰”，進入春秋以後，金文中先後出現了齊、魯、鼂、邛、邢等國的大宰。齊國大宰如鞫罇（《三代》1.66.2~1.68）中的齊大宰，與大攻厄、大吏等合稱“四大”。齊太宰歸父盤（《三代》17.14.1）中的歸父可

能就是齊國佐之父國歸父。邢姜太宰已簋（《社會科學戰綫》1980年3期）中的邢國大宰是專門出納姜氏令一類的官員。

“伯大宰”之“伯”有可能是伯仲之伯。金文中大師有伯仲之分。如伯大師盃（《三代》10.30）伯克壺（呂大臨《考古圖》4.40）中有“伯大師”。仲大師盃（《文物》1978年11期）中有“仲大師”。依此類推，是否“大宰”也可能有伯仲之分呢。當然這只是一種推論，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發現“仲大宰”的銅器。這裏如“伯”字連上讀，成“南申伯”用以代表“南申國”也是可以講得通的。

### （三）“𠂔司”即“有嗣”

仲禹父簋中的“嗣”字寫法較特殊，與金文中一般“嗣”字寫法不同，但它與兮甲盤（《三代》17.20.1），司工爵（《三代》16.15）中的嗣字却完全相同。兮甲盤云：

王命甲政嗣成周四方責

嗣工爵有“嗣工”二字，兩器中“嗣”字的寫法雖很特殊，但從文義上看，只能是“嗣”字。因此，我釋此字為“嗣”，而不釋為“辭”。

“𠂔司”之“𠂔”，實際是“又”字，亦即“有”字。金文中因字形相近，每每“𠂔”、“又”不分。如縣妃簋（《三代》6.55.1）“惟十又二月”之“又”就寫作“𠂔”，邾叔之伯鐘（《三代》1.19.1）中的“擇厥吉金”，彝鬲（《三代》5.30）中的“用作厥母辛尊彝”，兩器之“厥”都寫作“又”。所以我認為仲禹父簋中的“𠂔嗣”可以是“又嗣”，亦即金文中常見的“有嗣”，這是金文中的一個固定職官泛稱，是“下屬官員”的意思。

綜上所述，仲禹父是南申國伯大宰的“有嗣”，並不是南申國大宰，只不過是大宰的某個下屬官員而已，無怪乎出土器物僅一鼎兩簋一盤及幾件車馬器，隨葬品的數量、質量及規模正與其大宰的有嗣地位相當。

## 二 北申、南申和西申

西周晚期的兩件重器大克鼎（《三代》4.40~41）伊簋（《三代》9.20.2）中都提到一個叫“申季”的人：

申季右善夫克入門立中廷（大克鼎）

申季內右伊立中廷（伊簋）

按金文通例，右者往往是被右者的頂頭上司，此申季應是克及伊的上司，無疑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物，因為被右者克及伊都是西周晚期相當顯赫的人物，看一看克組十餘



件鉅製宏文的銅器，就不難想見克當年位高權重的形象。筆者在考釋多友鼎銘時曾指出：克鐘銘有“康刺宮”出現，說明克器在鑄造時，厲王已成古人，立廟受享。克組器應定在宣王時。而宣王時在周王朝內有如此重要地位的“申季”<sup>①</sup>，自然使我們聯想到宣王之舅“申伯”。申伯因其女申姜為王后，藉助姻親的威勢，居於朝中重要地位，而宣王之所以與申伯聯姻，多半也是要藉助他在西部戎狄部族中的強大勢力，這種勢力在幽王滅國時得到了證實。文獻記載，正是因為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破壞了宣王以來的合親政策，才導致申、繒、犬戎等聯合滅西周。

1975年在洛陽距王城遺址北牆約一公里許處，在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一件銅壺（《考古》1981年1期），其銘文云：

申伯彥多之行

《左傳》文公八年：“春，晉侯使解陽歸匡、戚之田於衛，且復至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境。”杜注：“申，鄭地”。即今鞏縣東，滎陽西之汜水境，虎牢即汜水左近的成臯故城。此地之申與南陽之申相距數百里，肯定不是一個申國。“申伯彥多”有可能是虎牢汜水之申伯，而出仕周者，死後葬於王城外。此申在南陽北，故南陽之申自名南申，以示區別。

1975年南陽西關出申公彭字簠，1981年又出仲禹父簠及鼎，銘中明確記為“南申”。宋程公說《春秋分記》地理釋異云：“申有二，莊六年，楚文王伐申，小國名。文八年，自申至於虎牢之境，是鄭地。”<sup>②</sup>後南申滅於楚，淪為楚地。曾侯乙墓編鐘乙組下1:2云：“妥賓之在楚也，為坪皇。其在申也，為遲則。”鐘銘之申當即指故南申國舊地。

北申自稱申，而不稱北申。這有可能說明先有北申後有南申。陳槃《春秋大事表撰異》推論說：“疑申伯舊居在是，宣王定申伯之宅，欲使之式是南國，故申伯然後遷南陽耳。”<sup>③</sup>可備一說。

文獻中尚有“西申”。古本《竹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逸周書·王會》云：“西申以鳳鳥。”<sup>④</sup>陳槃推斷西申云：“然則西申即申戎，乃申族之居西方者。中國自有申氏，則河南南陽之申是矣。本自一族，分居二地。”西申之西據蒙文通先生考定在今陝西，西申是相對東土南北二申而言，宣王元舅之申，幽王申后之申，殺幽王之申，平王所奔之申都是陝西之申。西申是申的本支。《詩經·嵩高》所述東遷之申又分為南北二申，乃另一分支。

這樣，歷史上曾存在過三個姜姓的申國：西土的西申，東土的南北二申。

### 三 仲禹父簠的時代

考訂仲禹父簠的時代，關鍵在於弄清銘文中“偃王”和“監伯”的含義。有的同

志認為簋銘的“倬王”就是周夷王燮，“監伯”是夷王之子，厲王的兄弟行，因此定此器為宣王標準器。

我不同意這樣簡單地比附，這個問題需要重新加以剖析。

傳世銅器銘文中有兩件提到監國，其一是鄧孟壺蓋（《三代》12.13）銘：

鄧孟作監曼尊壺

另一件是叔碩父鼎（《筠清館金文》4.10），其銘文是：

新官叔碩父、監姬作寶鼎

後一器《筠清館金文》和《攬古錄金文》的著錄都是摹本，考古研究所藏《猗文閣集金》（拓本集）載有清晰的拓片，現已收入《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冊2596號。上述二器的書體風格與仲禹父簋十分相似，是同時代的金文。因此二器中的監曼、監姬之監，與仲禹父簋中監伯之監，當指同一國族。鄧孟壺是鄧孟為其嫁於監國之女監曼所作的壺。鄧國曼姓，古代女子名稱姓，故稱其為監曼。叔碩父鼎銘告訴我們，是叔碩父與其妻監姬共同作鼎。金文中有的作器者是夫妻二人，如1978年陝西武功出土的𡵓叔𡵓姬簋就是這樣（《考古》1981年2期），簋銘云：

𡵓叔𡵓姬作伯媿媿簋

𡵓叔為夫，𡵓姬為妻，𡵓姬乃姬姓女子嫁於𡵓叔者。伯媿乃二人之長女，女稱伯媿，知𡵓叔為媿姓。與此相類，叔碩父鼎中的叔碩父可能即是監伯，其妻為監姬，夫妻合作此鼎。監姬是姬姓女嫁於監國者。一般情況下，古代同姓不婚。監姬既為姬姓，其夫叔碩父（即監伯）就不應是姬姓。所以叔碩父鼎說明監國不是姬姓。

叔碩父鼎中的監國不是姬姓，仲禹父簋中的監伯也不應是姬姓。當然作為監伯父親的夷王也不會是姬姓。可西周夷王燮却一定得是姬姓。可見西周王朝的夷王與仲禹父簋中的夷王並非一人。

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諸小國稱王者在金文中時有所見。如呂王（呂王鬲《三代》5.30、呂王壺《三代》12.12）、昆疇王（昆疇王鐘《三代》1.7.2）幾王（𡵓伯簋《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54）、釐王（𡵓伯貳簋《三代》9.27）、矢王（矢王尊《三代》11.19）、賈王（賈王卣《三代》13.21）等等不一而足。仲禹父簋中的夷王想必也是這一類小王中的一個。

金文和文獻中都沒有交待監國的地望，但鄧孟壺蓋、叔碩父鼎和兩件仲禹父簋却證實了監國的客觀存在。我推測這個監國可能是文獻中的“濫”國。《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邾分二國，即邾和小邾（又稱“倪”）世多知之。邾分三國，尚曾分出一“濫國”，則世人多不知。已故王獻唐先生首先提出了這個看法，他在《春秋邾分三國考》中指出：“邾之先，自邾子俠受封，五世至儀父顏，當周宣王時，封其子肥於鄉，為小邾。身後子夏父立，別分叔術於濫。”“夷父顏後以有罪為周王所

誅，立叔術爲邾君。周王死，叔術讓國於夷父之子夏父，別居邾南濫地，自爲一國，初亦無名，魯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濫奔魯，始著春秋。”此事《公羊傳》、《國語》均有詳細記載，據王獻唐考定“濫城在今滕縣東南六十里，陶山北。”

《莊子·則陽》云：“衛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無錫前洲出土的邾陵君鑒，近年又發現“王郢姬之濫”五字（《江漢考古》1987年1期）。濫即監，《墨子·節葬》、《呂氏春秋·節喪》都有“壺濫”即“壺監”。信陽長臺關出土楚簡遺冊有“二方濫”即“二方監”。可見監與濫通，金文中的監國即文獻的濫國，是完全講得通的，是很有可能的。

仲再父簋蓋及腹各飾竊曲紋一道，其餘部分飾瓦楞紋，圈足飾垂鱗紋，兩耳獸首垂珥。此類形制花紋的簋在西周晚期盛行，延至春秋早期也時有出現，比如魯伯大父作季姬媯簋（《文物》1973年1期64頁，山東歷城出土）、魯伯大父作仲姬俞簋（《善齊吉金錄》8.68）、魯伯大父作孟口姜簋（臺灣《故宮銅器圖錄》下下180）、鮒公子簋（臺灣《故宮銅器圖錄》下下181）、邾髡簋（《善齊吉金圖錄》8.73）、杞伯每氏簋（《十二家吉金圖錄》居14）等這些春秋早期銅器的花紋形制與仲再父簋都十分相似。

仲再父簋中有“大宰”一官出現，據我所知，現有的幾件有“大宰”的銅器，無一例外，都是春秋銅器。如齊大宰歸父盤，此歸父即齊國佐之父國歸父，乃春秋前期齊大夫。鞫罍中的鞫是鮑叔之孫，是春秋中期人物。其他如魯大宰原父簋（《三代》8.3）、鼂大宰鐘（《三代》1.15）、鼂大宰簋（《三代》10.24）、邢姜大宰已簋、邛（江）大宰壺（日本梅原末治《青山莊清賞》39）等都是春秋器。“大宰”一官是東遷以後，各國紛紛設立起來的。因此，此一官名在金文中有斷代的參考價值。

考察該簋的年代，當然更應該參考濫國歷史。如上所云，濫國大約在宣王死去不久從邾國分出。夷父顏是宣王時的邾君，因有罪王室，爲宣王所誅。宣王立大夫叔術爲邾君。宣王死，幽王立，叔術因所依附的宣王已死，恐國人不服，自動讓國於夷父顏之子夏父，自居濫地。是知濫國初立應在幽王時。這樣看來，仲再父簋中的監伯即使是第一代監君，也不得早於幽王初年。而仲再父乃監伯之子，作器時監伯已故去而稱“考”，自應晚於幽王而入於春秋初年爲宜，因爲幽王在位時間並不長。

根據以上分析，我認爲仲再父簋不是宣王標準器，而是一件春秋早期的銅器。

## 註 釋

① 參見《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考古》1983年2期。文中使用的“康宮原則”乃容庚、唐蘭等前輩學者所發明。

② 宋·程公說：四庫薈要本《春秋分記》35卷。

③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第二冊 153 頁。

④ 《逸周書·王會解》七卷第五十九。



仲禹父簋



仲禹父簋蓋銘文

仲禹父簋器銘文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 390~397 頁，中華書局，1992 年 8 月)

## 燕侯克壘盃銘考

1986年冬，北京郊區琉璃河1193號大墓出土燕侯克壘盃，對其銘文，諸家多有考釋，筆者也曾參加筆談，意猶未盡，想再談幾點意見。

釋文：

王曰：大保，唯乃明（盟），乃鬯享

于乃辟。余大對（封）。乃享。

令克侯于匱。事（割）羌豸

獻（祖）于御微。克壘〔來〕

匱，入土眾厥（有）司，

用作寶尊彝。

銘中的“對”可讀作“封”，“大對”就是“大封”。在金文中奉、對、封三字皆像以手植樹於地之形，可能皆由樹藝之藝字分化而成。甲骨文中的“東對”、“西對”應讀作“東封”、“西封”。散氏盤的“一奉”、“二奉”也應讀作“一封”、“二封”。1984年河南平頂山出土的封虎鼎之封字像雙手植木於地之“奉”字。六年召伯虎簋“對揚朕宗君其休”、中觶“中對王休”，兩器中的“對”字都寫作人植樹木於地之“封”，與六年召伯虎簋“余典勿敢封”之封字類似。這三個字，在金文中每相混用。文獻中也不乏混用之例。如：《荀子·正論》“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菲，對履……”郝懿行曰：“對履，《慎子》作履封，對當作封”。王先謙《集解》亦云：“對當爲封”。說明在荀子的時代，對、封仍有時混用。如上述分析能够成立，那就是金文中首次出現大封禮的記載。

“唯乃盟，乃鬯享于乃辟”。句中三“乃”字都是代詞，相當現代漢語“你的”。下面的“乃享”之“乃”是副詞，相當現代漢語的“於是”。鄂侯御方鼎：“鄂侯御方納壺于王，乃裸之。”“王休宴，乃射”。兩“乃”字用法與後句相同。金文通例宴饗生人用“鄉”，祭饗鬼神用“享”。武王是太保奭的辟君，故銘中的“享于乃辟”“乃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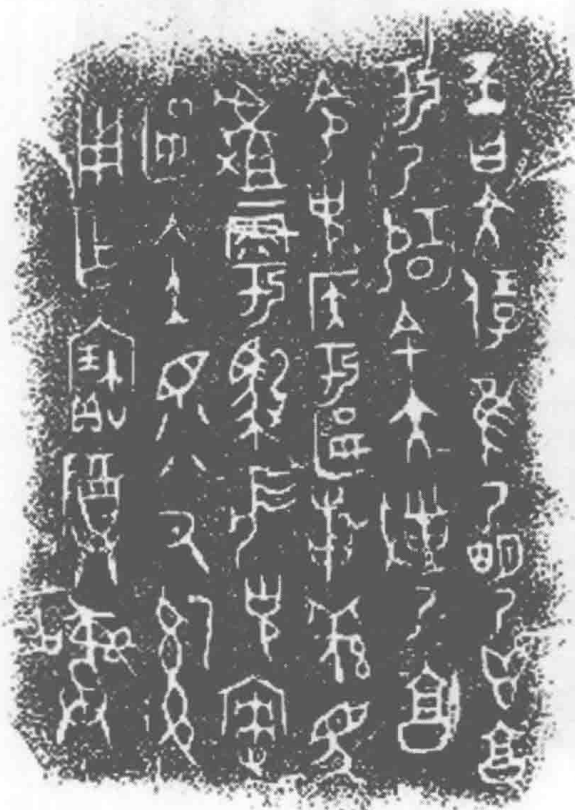
都是講享祀先辟武王。

“命克侯於燕”是封建諸侯的述辭。

“剗羌豸，祖於御微”是燕侯克赴封前殺牲祖祭道神。《詩經·大雅·韓奕》記周宣王錫命韓侯，有“韓侯出祖，出宿於屠”句，疏云：“《烝民》有‘仲山甫出祖’，仲山甫爲二伯，韓侯爲侯伯，故兩詩皆有出祖祭道神事。”韓侯、仲山甫受封爲侯伯，赴任時有祖祭道神的儀注，本銘爲克受封爲燕侯，殺牲祖道的儀注是一樣的。

“入土眾有司”，指燕侯克受納裂土及燕地官吏民衆。《尚書·禹貢》：“徐州厥貢唯五色土。”《逸周書·作洛》：“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壘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這種裂土封建的制度確曾行於周初，後世沿用，作社稷壇，成爲國家象徵的標誌。

1193 號大墓有四條墓道，其規模已具備諸侯墓葬條件，墓中所出長銘重器的器主燕侯克有可能就是墓主。據《史記·周本紀》和《燕召公世家》記載，“封召公奭於燕”，“封召公於北燕”。武王所封第一代燕侯應是召公奭，所以燕侯克最早也只能是第二代燕侯。本銘記錄的是燕侯克在成王時嗣封爲燕侯的典禮，有召公到場，故銘中有成王對太保說話的口氣。其時，武王已受享稱辟，銘中的時王必是成王。







(原載《遠望集·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建所40週年紀念文集302頁，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12月)

## 幽公考

保利藝術博物館 2002 年入藏的幽公盃無疑是近年來發現的一件十分重要的青銅器，其銘文的價值與大部分認字問題都已被李學勤、裘錫圭等先生講清楚了<sup>①</sup>，本文擬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對其斷句、銘文的哲學內涵作一些補充考證，進而對幽公其人作出推測。

### 一 釋文

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迺  
差方設征。降民監德，迺自  
作配饗。民成父母生，我王  
作臣，厥貴唯德。民好明德，  
顧在天下，用厥昭好。益敬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恤明。  
經齊好祀，無愧心好德，婚  
媾亦唯協。天釐用考神，復  
用髮祿，永御於寧。幽公曰：  
民唯克用，茲德亡悔。

### 二 釋字

專土：敷土，安排下土，重整河山。

隨山：順隨山勢。蓋疏浚河流必須根據山勢走向<sup>②</sup>。

差方設征：即《禹貢》之區分九州方位，並根據九州的地理及土質，確定貢賦。其中“執”與“設”音近互通<sup>③</sup>。

配饗：《禮記·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古有以祖神配天享祀之禮，周人自以為夏人的後裔，所以其祖神可以追溯到夏的開國君王大禹王，這裏是指祭天時以大禹配饗。

民：指貴族，三代一統，皆是貴族政治<sup>④</sup>。“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是說：這些民皆為父母肉胎所生的凡人。“我王作臣”即“作我王臣”，金文每有賓語提前的句式。如息伯卣蓋：“息伯賜貝於姜，用作父乙寶尊彝”<sup>⑤</sup>，銘文是說“王姜賞賜息伯貝，息伯因有榮寵而為父乙作器”，可是該銘中的賓語“息伯”卻提到前面去了。又比如鬲尊：“鬲賜貝於王，用作父甲寶尊彝”<sup>⑥</sup>，顯然是王賜貝於鬲，這裏又把被賜予者鬲提到前面去了。

洙：即𨾏，讀為貴<sup>⑦</sup>。

顧：此字實際並未認出，暫按李學勤說。

敬：此字字跡不清，暫釋為此，將來或可藉助 X 光得到更清晰的筆畫，再重作考釋。

慄：即忤。《說文》“憂也”。

好祀：求子嗣的祭祀，在西周時可能就是指祭祀“高禖”。

𦣻：字左從心，右從鬼，即愧字。無愧心，後代文獻《皇極經世》有“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可資比照。這裏指對兩姓好合之德有誠心的向往<sup>⑧</sup>。

釐：《說文》“家福也”。揚雄《甘泉賦》“逆釐三神”，注：“釐，福也”。

髮祿：金文暇詞之一。史牆盤云“繁髮多釐”，形容祖神降賜的福祿猶如頭髮一樣多。

𦣻：𦣻與𦣻音近，字形相似，𦣻與𦣻所從之“火”與“山”在早期文字中也每混用無別，到晚期文字中弄混了的可能性就更大。金文中的字被後世典籍誤解為另外一個字的例子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早期金文的𦣻字，因為中間加個心，就被後世誤解為“寧”字，《尚書》中的“寧王遺我大寶龜”等許多“寧”字，就是這樣弄錯的。金文中不見𦣻字，後世文獻中的𦣻在金文中寫作𦣻是合理的，它是這篇銘文中最為關鍵的一個字。

裘錫圭先生認為該字應讀為𦣻字，但未加深述。李學勤先生將此字讀為遂字，並指為山東遂國之遂，字形與字音或可講出點道理，但金文中的𦣻、𦣻等地應在陝西，不太可能遠到山東去。靜簋中的“𦣻𦣻師邦周”應理解為“𦣻、𦣻師與邦周”，這是三個以

地爲氏的人名，與前面銘文所說的王、吳來、呂錫編成三組，作“耦射”。趯簋“鬯師塚司馬”、善鼎“佐鬯侯監鬯師戌”中的鬯、鬯，以及裘衛盃“鬯趯”、五祀衛鼎“鬯襍”中的鬯，皆應是陝西的地名和以地爲氏的人名，銅器也大都出在陝西，鬯字所指，應該就是後世文獻中的幽地，講成山東的遂是很困難的。至於把“鬯師塚司馬”、“監鬯師戌”中的鬯，講成鄉遂的遂，那就更令人難以理解，陝西安康縣王家壩 1986 年出土的史密簋有“齊師族徒述人”和“師俗率齊師述人”兩句<sup>⑨</sup>，大家都認爲所謂“述人”就是“遂人”，這個“遂人”之“遂”，就是《周禮》所說的鄉遂之遂，說明鄉遂之遂，金文本有其字，有什麼必要另造一個鬯作遂字呢？金文“述”多讀作“遂”，如：趯盃：“君在雍即宮，命趯使於述（遂）土”<sup>⑩</sup>；小臣述簋：“伯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唯十又二月，遣自口師，述（遂）東陟伐海眉……”<sup>⑪</sup>；中山王方壺：“燕故君子儉，新君子之，不用禮義，不顧逆順，故邦亡身死，曾無一夫之救，述（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體”<sup>⑫</sup>。看來，在金文中，相當於文獻中的“遂”字，不管是實詞或虛詞，一般都用“述”字表示，不會用鬯字來表示。所以，我認爲鬯字讀爲幽，只能說很有可能，讀爲遂肯定是錯的。

### 三 意譯

天神（主語）命禹重新安排下土，禹（主語）順隨山勢，疏浚河流，於是根據土質優劣，劃分區域，制定了征收貢賦的標準。

天（主語）降賜體察民意，監視時王之德，於是貴族（主語）在祭天的時候就自己把先王大禹當作與天配饗的對象。

貴族（主語）都是父母所生的凡人，今作王的臣民，他們所重視的只有德。

貴族們（主語）喜歡王具有明察之德，因爲這樣纔可以瞭解天下發生之事，用以充分昭顯王的善政。

貴族們（主語）更加敬重王的醇美溫良之德，因爲它可以使人安康而無不得到勉勵，孝敬父母，友于兄弟，憂思而明達事理。

貴族們（主語）精心認真對待高禘之祀，作到誠心的嚮往“兩姓和會之德”，這樣婚姻也能達到和諧。

天神（主語）在天上福用先考父王（穆王），並降賜給地上的民衆像頭髮一樣多的福祿，使下土永遠得到安寧。

幽公說：“貴族們只要能夠遵循這些原則，我有周的這個德政就無所不通達。”

## 四 哲理

周人的宗教觀念裏，地上與天上存在兩個類似的王朝，地上的王死了，如其德行好，即可到天上朝廷裏做神；反之，如地上的王胡作非爲，德行很壞，小則要遭天譴，大則可能被廢掉，另覓德行好的人做王。爲此，天神甚至於不惜改朝換代，《大雅·文王》“天命靡常”，商湯可以革夏桀的命、周武可以革商紂的命，都是合理的。馘狄鐘：“先王其嚴在帝左右”<sup>⑬</sup>，《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邢侯簋：“克奔走上下帝”<sup>⑭</sup>。考神即指死去的父王在天所作之神，本銘指穆王，他們在帝廷作神，專司交通地、天之間。金文中的天是至上神，他可以禍福人間，與金文常見的祖神不同，祖神對人間只福不禍<sup>⑮</sup>。

四德：“德”指人應遵循的規範的行爲。

第一，監德：監，《爾雅·釋詁》“視也。”天亡簋有“文王監在上”句。《書·太甲》“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是指察視之德。“降民監德”即“天降賜監視時王之行爲的德”，天監視時王的德行，主要通過觀察民情。

第二，明德：詳察世間一切事理之德。晉姜鼎“余不暇妄寧，經雍明德”。《左傳·昭公元年》“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第三，懿德：醇美溫良之德，師趯鼎“皇辟懿德”，史牆盤、癸鐘“上帝降懿德”。《詩·周頌》“我求懿德”。

第四，好德：兩姓婚姻和會之德。《洪範》“五福……四曰攸好德。”

王者的最高行爲典範是大禹，爲王者應知道天曾“降民監德”，天可以通過觀察民意，監視時王的所作所爲，民可以在祭天時配享大禹，通過大禹與天相通。王者行爲要檢點，以免遭天譴。民（指貴族）最重視的是監、明、懿、好四德，爲王者也應該體察這種民意。另一方面，作爲貴族來說，應該遵循四德的要求，體察“監德”、喜好“明德”、敬重“懿德”、無愧心於“好德”，孝敬父母，友于兄弟，憂思而明達事理，精心認真對待高禘之祭祀，婚媾和諧，繁衍子孫。王與民兩方面德行結合，構成了四德合一的德政體系，這就是周人在西周中期所闡釋的德的完整內容，也是本篇銘文的主旨所在。銘文提出了“四德”的觀念，貫穿着“重民敬德”的思想。“德”是西周人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提出的一個新的哲學概念，在周初，它解釋了商亡周興的原因，成爲對付殷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其後，它又隨着周王朝的發展，逐步完善，成爲治理國家的一整套哲學思想，本銘即體現了周人不斷豐富和完善這個德政體系的過程。

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sup>⑯</sup>“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

哉！吾從周。”<sup>②</sup>春秋以後發展起來的儒家，以恢復周禮為己任，在哲學上他們全面繼承了西周的德政體系，試將他們所宣揚的仁、義、禮、智、忠、孝等思想與西周的“四德”相對照，就不難發現其中的淵源關係。

## 五 幽公其人

幽王盃云：“幽王作姬姊盃。”<sup>③</sup>《爾雅·釋親》“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銘文是說幽王為其姐姐作盃，類似的為姊作器者尚有兩器，一件是公仲涉簋，云：“公仲涉作公姊寶簋，其萬年用”<sup>④</sup>；另一件是季公父簋，云：“季公父作仲姊嬭姬媵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實用。”<sup>⑤</sup>可見為親姊作器，金文中不乏例證。幽王既為一姬姓的姐姐作器，此器銘中的幽王也應是姬姓，姬姓而稱王者，就不排除可能是西周十二王之一的稱呼。我們還注意到近年著錄了同銘的兩件幽王鬲，銘為“幽王作姜氏齋”<sup>⑥</sup>，發現於陝西眉縣，是說幽王為其夫人姜氏所作器。1974年在眉縣東面陝西藍屋縣城關的一個墓葬裏出土了王作姜氏簋，器、蓋同銘為“王作姜氏尊簋”<sup>⑦</sup>；保利藝術博物館近年也收集到一件王作姜氏簋，銘文內容以及行款字體與藍屋縣所出完全一樣，可能是同一墓中之物。<sup>⑧</sup>幽王的夫人稱姜氏，此王的夫人也稱姜氏，銅器的時代又很接近，因此，我懷疑簋銘中的王，極有可能就是眉縣發現的幽王鬲中的幽王，如這個懷疑可能成立的話，那就說明“幽王”有時也可省稱為“王”，與其他周王的稱呼無異。而這些銅器與幽公盃、幽王盃形體紋飾與銘文風格非常相似，都有可能是幽王一人所作。

史書西周中期的記載十分簡略，但有一點諸書皆同，即共、懿、孝三王期間，曾經發生一次超乎尋常的繼位次序混亂，即懿王死後，沒有把王位傳給其子，王位為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父孝王辟方取得，這在嚴格按“父死子繼”的原則傳位的西周王朝來說，是唯一特例。西周初年周公總結了殷人亡國的教訓，他看到殷人以“兄終弟及為主”的傳位法，弊病在於衆多兄弟都有得到王權的企盼，容易形成爭奪的局面。因而為少年的成王制訂了繼位“傳子不傳兄弟”的治國大法，他還以身作則，在成王年長之後，退居臣位，讓成王主政。此後，康、昭、穆、恭、懿莫不遵循不怠，唯獨懿王之後，發生了變故，而這場變故並非由於懿王無子引起，因為史載孝王之後的夷王，就是懿王的親子。西周中期諸王，在位時間都不長，那麼懿王稱王之末年，即將得到王位的孝王辟方稱什麼呢？我認為不排除此時的辟方稱幽公的可能，因為幽是周人發祥之地的稱呼，不可能容許外姓人插足而稱公、稱王，極有可能為周王族之王公貴戚中掌實權者所盤踞。通觀西周金文，周雖在洛陽設立東都，但許多重大



祭祀與冊命典禮仍在其老家宗周一帶舉行，金文記載豳地駐有重兵（豳師）把守，正說明豳地應為周王族所直接控制之地。今本《竹書紀年》云：“懿王之世，興起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於是諸侯攜德。”著名的懿王標準器匡卣<sup>②</sup>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銘文記載懿王在射廬，舉行捕兔的遊戲，匡因為捕到了兩個小兔子，因而受到了懿王的嘉獎，銘文活畫出懿王逸於淫樂，不務正業的形象。面對這樣一個懦弱無能、舉措無方的侄子為王，豳公辟方可能覬覦王位很久了。豳公取得王位之後，稱為孝王，但不排除其稱豳王。文獻記載厲王曾稱“汾王”，今本《竹書紀年》記共和時事，云：“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於大陽，兆曰厲王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靜，共和遂歸國。”“厲王名胡”。原注：“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我想，既然厲王因居於汾水而可以稱為汾王，那麼孝王為甚麼不可以因為居於豳地而稱為豳王呢？據王國維考證，西周時王之號是生稱的，即文、武、成、康、昭、穆皆為其生時的稱號，並非死諡。辟方之所以自稱孝王者，蓋西周之世，淪及恭、懿之時，已積弱不堪，以至於懿王在宗周待不下去，曾一度遷都到犬丘。辟方欲以恢復父考穆王盛世為己任，如孔子所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故自命為孝王。本銘中所強調的“天釐用考神”，對辟方而言，考神就是穆王，可能也含有這個意思在內。

還有兩個問題應該討論一下：一是王國維曾寫過《古諸侯稱王說》<sup>③</sup>，他的結論是：“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他舉了兩個例證，泉伯簋“用作朕皇考釐王寶尊簋”<sup>④</sup>、乖伯簋“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sup>⑤</sup>，他指出兩件簋中的“釐王”和“幾王”是諸侯國內自稱，他的意見和他所舉的例證無疑都是對的。類似的例證還可以補充一個，仲禹父簋“作其皇祖考遲王、監伯尊簋”<sup>⑥</sup>，這個“遲王”不是姬姓，也屬諸侯國內稱王之例，肯定也不是西周十二王之一，我在九十年代曾寫專文《南陽仲禹父簋不是宣王標準器》討論過這件器，此不贅述<sup>⑦</sup>。

但我想，不能把王氏的話反過來，說“金文中凡是稱某王者，都是諸侯在其國的自稱”，王氏文中自己也並沒有這個意思。金文中作器者自稱某王的，除文獻中習見的文、武、成、昭、穆、恭、懿、夷等之外，出現過矢王（矢王方鼎<sup>⑧</sup>、矢王簋<sup>⑨</sup>、散氏盤<sup>⑩</sup>）、昆侖王（昆侖王鐘<sup>⑪</sup>）、呂王（呂王鬲<sup>⑫</sup>、呂王壺<sup>⑬</sup>）；買王（買王觚<sup>⑭</sup>、買王卣<sup>⑮</sup>）；和豳王（豳王盃、兩件豳王鬲）等，其中那些是諸侯自稱，那些是西周十二王之一的別稱，恐怕還得作具體分析。

第二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史載周人逾梁山、渡漆沮，方才止於岐下，豳地遠在今旬邑一帶，何以銅器卻出現在眉縣？我想這可能是地名“僑置”的結果，商王盤庚以前多次遷都，歷史上就有過多個“亳”地。西周時後來把眉縣、盤屋一帶稱為豳地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倒是有一個現象值得考古工作者注意，近年來，明確標明“王作”的銅器，出在扶風、盩厔一帶，比如1994年底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出土的王盂，僅殘存的圈足就有17公斤，大有王者氣度，上有銘文：“王作莽京中寢浸孟”<sup>③</sup>，盩厔縣又出土銘為“王作姜氏尊簋”的銅器，保利藝術博物館近年也收集到一件王作姜氏簋與盩厔縣所出完全一樣，應是同一墓中之物。另一件收集的“王作蠶彝。左守”鼎<sup>④</sup>估計也可能出在附近。幽王鬲一對則在眉縣發現。西周王陵區始終沒有找到，是否這些王器的出土地點，會給我們一些新的啓示呢？

這篇銘文裏出現的客體名有八個：“天”指至高無上的神；“禹”指我國夏代第一位王者；“民”指貴族；“父母”指生育貴族的人；“我王”指其時在位的王者，即懿王；“臣”指貴族相對於王的身份；“考神”指居於天廷的父王神靈，即穆王；“幽公”指作器者。我想，讀懂這篇銘文的關鍵，一是弄清各客體的含意，二是弄清各句話的主語。幽公的名字說明他此時還不是王者，那麼他的客觀身份就應該是貴族“民”中的一員，但從整篇銘文看，他並沒有把自己歸入貴族的隊伍中去，他說應以大禹配饗於天，告戒時王要重民敬德，號召一切貴族要尊崇四德等。銘文的口氣，既教訓一般貴族，也教訓在位的時王（我王），完全是一個自命不凡的第三者的樣子，與其語氣最接近的恐怕應該是五祀𩇑鐘、𩇑簋中厲王胡的口氣。對這種情況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一個即將登極的王者，或說是一位要篡位的王叔，在作行將施政的政治宣言。有了這樣的認識，金文中出現的幽公、幽王等稱呼及本銘的語氣風格之與衆不同，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如果上述分析可信，那麼幽公盬的時代就是明確的，應為懿王時的銅器（孝王將要即位之時），而幽王鬲、幽王盃就應該是孝王銅器了。

當然，銘文本身並不能說明幽公、幽王就一定是孝王，我這裏說的也只是有這種可能，所論證的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種推測而已。希望同仁諸位，不吝指正。

## 注 釋

① 《中國歷史文物》2002·6（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② 隨，見李學勤文，《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6期。

③ 差，見李學勤文，《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6期；設，見裘錫圭文，《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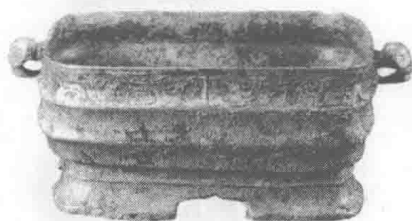
④ 民，這裏“民”所代表的貴族，包括各個階層的大小貴族，但不應包括奴隸和“禮不下”的“庶人”。

⑤ 息伯卣蓋《殷周金文集成》5385（以下簡稱《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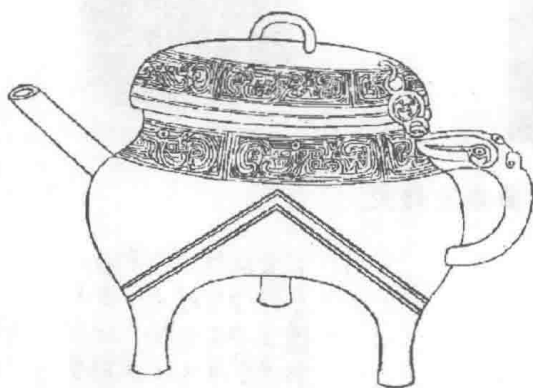
⑥ 鬲尊《集成》5956。

- ⑦ 賁，《中國歷史文物》2002·6 李學勤文。
- ⑧ 愧，此字字形的解釋並不好，通常金文中的心與鬼與本銘均有一定差距，一時還想不出更好的解釋，權且釋為愧字。
- ⑨ 史密簋《文物》1989 年 7 期。
- ⑩ 越孟《集成》10321。
- ⑪ 小臣迷簋《集成》4238；4239。
- ⑫ 中山王方壺《集成》9735。
- ⑬ 鞞狄鐘《集成》1、49。
- ⑭ 邢侯簋《集成》4241。
- ⑮ 見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 年 4 期。
- ⑯ 天亡簋《集成》。
- ⑰ 晉姜鼎《集成》2826。
- ⑱ 師鬲鼎《集成》2830。
- ⑲ 史牆盤《集成》10175。
- ⑳ 癸鐘《集成》251。
- ㉑ 《論語·為政》。
- ㉒ 《論語·八佾》。
- ㉓ 幽王盃，據《集成》9411 所載，此器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長安獲古編》和《恒軒吉金圖錄》都有線描器形公佈，器也應該作於西周中期，與幽公盃的年代接近。
- ㉔ 公仲涉簋《保利藏金續》120 頁。
- ㉕ 季公父簋《集成》4572。
- ㉖ 幽王鬲《考古與文物》1990 年 5 期。
- ㉗ 王作姜氏簋《文物》1975 年 7 期 91 頁；《集成》3570。
- ㉘ 王作姜氏簋《文物》1999 年 9 期。
- ㉙ 匡卣《集成》5423。
- ㉚ 《古諸侯稱王說》，《觀堂集林》別集。
- ㉛ 魯伯簋《集成》4302。
- ㉜ 乖伯簋《集成》4331。
- ㉝ 仲再父簋《集成》4188、4189。
- ㉞ 劉雨：《南陽仲再父簋不是宣王標準器》，《古文字研究》18 輯 1992 年 8 期。
- ㉟ 矢王方鼎《集成》2149。
- ㊱ 矢王簋《集成》3871。
- ㊲ 散氏盤《集成》10176。
- ㊳ 昆侖王鐘《集成》46。
- ㊴ 呂王鬲《集成》635。
- ㊵ 呂王壺《集成》96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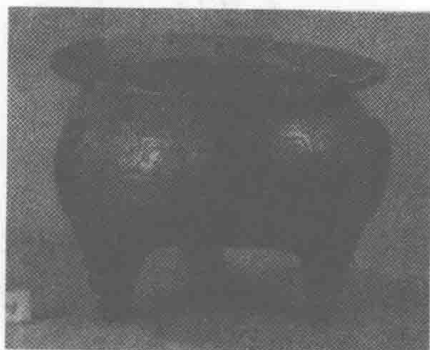
- ④① 買王觚《集成》7275。
- ④② 買王卣《集成》5252。
- ④③ 王孟《考古與文物》1998年1期。
- ④④ 王鼎《保利藏金續》99頁。



幽公盥及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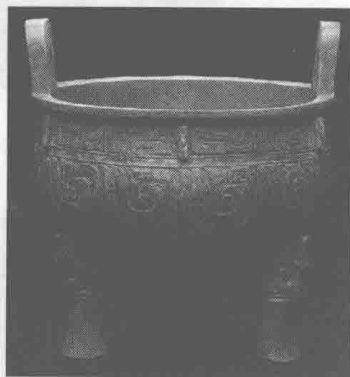
幽王盃及銘文



幽王鬲及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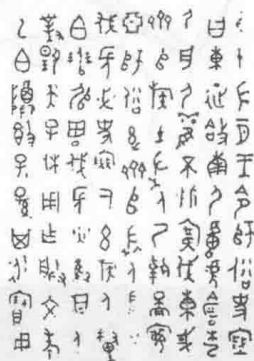


王作姜氏簋及銘文



王作左守鼎銘文拓片

王作鬯彝鼎及銘文



史密簋及銘文

(原載《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97~106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編輯,2003年10月。據2002年3月1日美國達慕思大學幽公盟研討會發言稿整理)

## 師盨鐘和姬寔母豆

《文物》1994年2期公佈了新發現的師盨鐘，據報導該鐘1992年9月出土於陝西扶風縣召公鄉巨良海家村，現藏扶風縣博物館。鐘已殘，通高64.7釐米，重35公斤。鐘旋上飾竊曲紋，其側旁及正面飾重環紋，篆間飾斜角變形夔紋，右鼓有一鳥紋，形制紋飾有西周中晚期特徵。

鉦間鑄銘文40餘字，我為其試作釋文如下：

師盨自作朕皇祖太公、墉公、封公

魯、仲貳、官伯、孝公、朕烈考靜□（公）

寶𩇑鐘，用喜侃前□□（文人），□（綰）

綽永命，義孫子……。 （圖三、四）

銘文的後部雖有少數字殘失，但主要内容不缺。師盨在銘文中縷敘其先人世系，共記述了七代祖考名號。該鐘銘文恰與宋代呂大臨所著《考古圖》卷五·十五（《集成》4693）收錄的姬寔母豆銘文相似<sup>①</sup>，最早發現這一點的是吳鎮鋒先生，他在所著《商周金文資料通鑒》（電子版）05833姬寔母豆的備註中指出：“1992年9月陝西扶風縣召公鄉巨浪海家村出土的師盨鐘，所列諸公與此豆基本相同。”

《考古圖》稱姬寔母豆為“齊豆”，所作釋文為：

姬寔母作太公鄩公□公魯

中覽伯孝公靜公豆用𩇑

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圖一、二）

並記載此豆“熙寧中（宋神宗1068~1077年）得於扶風”，與師盨鐘所出地相同。想不到兩件銘文內容相近的青銅器，相隔近千年，却在同一地區出土。豆銘與鐘銘所記除作器者不同外，所祀七代先祖考名號幾乎完全一樣。《考古圖》考證說：“蔡博士云：按齊世家言，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鄩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自呂伋十四世矣。餘文不可考，然知為齊豆無疑。”



宋代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五·十一也著錄了這件器<sup>②</sup>，改稱其爲“姬寔豆”，並多釋出“郭”“祈”兩字，釋文爲：

姬寔母作太公郭公□公魯

仲覽伯孝公靜公豆用祈

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對銘文內容，薛氏則引用了《考古圖》蔡博士的話，未作新的考證。

宋人兩書所作釋文多數是正確的，我略加修正，並加標點，重作釋文如下：

姬寔母作太公、墉公、□公魯、

仲畎、省伯、孝公、靜公豆，用祈

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對於豆銘所列世系，宋代以後再沒見到有人作進一步考證。直至1936年吳其昌先生著《金文世族譜》，對銘文所述世系纔作了新的考證<sup>③</sup>，他將其附會於《史記·陳杞世家》，列入第十篇媯姓譜的陳國，所作圖表（圖五）：

金文姬姓女名往往稱“姬某母”，如姬莽母（《集成》546）、姬趁母（《集成》628~629）、姬大母（《集成》709）、姬原母（《集成》3860）等，女名“姬某母”表示該女爲姬姓。如曹公簠“曹公媯孟姬忝母匡簠”（《集成》4593），曹爲姬姓，出嫁的大女兒稱“孟姬忝母”，其名中“孟”爲排行，“姬”爲姓，“忝母”爲女名。又比如魯侯鼎“魯侯作姬蓼媯鼎”，魯爲姬姓，出嫁的女兒稱“姬蓼”，其名中“姬”爲姓，“蓼”爲女名。由此可見，姬寔母豆銘文說明作器者爲一姬姓女子，名字爲寔母。師寔鐘的作器者師寔，是一職官爲師，其名爲寔的男子。銘文中師寔與姬寔母所崇祀的先祖相同，二者應有較密切的關係，且二人父考同爲靜公，應屬同代，不可能是父女或母子的隔代關係，只能是夫妻或兄妹、姊弟關係。

這裏會產生一個疑問：西周時代女性是否可能獨立祭奠祖考？如若不能，即可以考慮二人是夫妻關係，夫妻分別作器，同祀夫之祖考。然而金文資料表明，西周時女性獨自作器祭奠先人是一種並不鮮見的現象。如：

伯姜鼎

……伯姜對揚天子休，用作寶尊彝，用夙夜盟享於邵伯日庚，天子萬年，百世孫孫子子受厥純魯，伯姜日受天子魯休（《集成》2791）

謙姬簋

謙姬作父庚尊簋，用作厥後御，孫子其萬年永寶。（《集成》3978）

孟姬卣簋

孟姬卣自作饋簋，其用追孝于其辟君武公，孟姬其子孫永寶。（《集成》4071）

號姜簋蓋

號姜作寶尊簋，用祈追孝于皇考惠仲……（《集成》4182）

在這幾件西周青銅器中，伯姜、濂姬、孟姬涓、號姜皆為女性，銘文記錄了她們自作青銅禮器，祭奠祖考的實況。不僅如此，西周金文還有為女性“作宗室”和將女性“列於宗室”的記載，如：

#### 尹姑鬲

穆公作尹姑宗室于繇林。唯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忘穆公聖葬明，弼事先王，格于尹姑宗室繇林。君蔑尹姑曆，賜玉五品，馬四匹，拜稽首，對揚天君休，用作寶齋。（《集成》754）

#### 強伯鼎

邢姬暱亦列祖考姜公宗室，有孝祀孝祭，強伯作邢姬用鼎簋。”（《集成》2676）

《詩·召南·採蘋》“於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金文中的“宗室”與文獻所指相似，亦指“宗廟”，如：

#### 仲殷父簋

仲殷父鑄簋，用朝夕享孝宗室……（《集成》03964）

#### 猷簋

……肆余以饌士獻民，再盥先王宗室……（《集成》04317）

#### 齡史戾壺

齡史戾作寶壺，用禋祀于茲宗室……（《集成》09718）

#### 晉侯燹馬方壺

……晉侯燹馬既為寶盂，則作尊壺，用尊于宗室，用享用孝，用祈壽老……

（《近出》971）

上述有姑、姬兩姓女子分別“作宗室”和“列於宗室”的記載，說明當時女性在宗廟祭祀等宗族活動中，並不完全依附於男性，她們有的地位相對較高，有一定獨立性。所以豆銘記載，姬寔母自作器祭奠姬姓先人，在當時來說，是合乎情理的。

根據西周同姓不婚的原則，姬寔母與師盥如為夫妻關係，則師盥必非姬姓。姓不同的人，其祖考世系亦必不同，師盥只能與姬寔母同是姬姓，纔可以同祀一系祖考，這樣，二人是夫妻關係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可以肯定，二人是兄妹或姊弟關係，同為姬姓，分別作器，祭奠同一系祖考。

兩器銘文的問題是，這一系的祖考是否如《考古圖》引用蔡博士的話所說，因為銘文所記祖先有太公、孝公出現，與《史記·齊太公世家》相合，就必是“齊豆無疑”。或如吳其昌先生所作，因為有孝公與銘文相同、相公與銘文相似，遂將其視為媯姓，歸入陳世家。

按《史記·齊太公世家》所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其後經獻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釐公、襄公、桓公九代始至孝公。按齊國世系，齊孝公爲齊桓公太子昭之號，是宋襄公敗齊四公子師而擁立之齊君，此時太公至呂伋已有百餘年，自呂伋下數，又有十餘世，時已進入春秋後近百年。而兩件出土青銅器的銘文記載太公以下五世即至孝公，銅器形制所標示的時代是西周中晚期，蔡博士的說法所屬時代顯然偏晚，與器物形制不符。且《齊太公世家》丁公至孝公中間的十餘世，與銘文皆無法應合，可見《齊太公世家》之太公、孝公與豆銘之太公、孝公不可能是一人。再有，姬寔母豆銘文說明作器者爲姬姓，而齊世家爲姜姓，姬姓的後人也不太可能把姜姓的齊國祖先視爲自家的世系加以祭祀。因此，蔡博士的話是不可取的。

吳其昌先生所列世系表顯然是想用《史記·陳杞世家》來與銘文對應，《陳杞世家》：“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姓媯氏……至於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吳先生改胡公爲太公，□公爲申公，省伯爲相公，靜公爲慎公，又把姬寔母配給幽公，整個世系表中，僅一個孝公可以勉強對應，其餘都無法應合。而且關鍵在於姬寔母是姬姓，不可能把媯姓的陳國祖先視爲自己的先人世系加以祭祀。因此，吳先生將豆銘世系歸入陳國的世族譜，也是不能成立的。

我以爲，若解開銘文所述世系內容的謎團，當從姬姓諸世家中另外尋找。《史記·管蔡世家》附記了曹世家的世系：“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於彘。”《管蔡世家》曹國世系所述諸伯名與兩器銘文所述世系中的諸公、伯名基本相同，只是多數爵稱有別。《管蔡世家》所記西周曹國除仲君之外，如太伯、宮伯、孝伯、夷伯等皆以“伯”稱，遲至春秋之後纔有公稱，如穆公、桓公、莊公、釐公、昭公、共公、文公……等。其末代之君稱曹伯陽，復回歸以“伯”稱。

文獻中諸侯的爵稱，每因資料來源不同而致記載有別，如《管蔡世家》記周宣王時的曹戴伯子爲“惠伯”，而同爲《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却稱其爲“曹惠公”。又如《春秋》記昭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左傳》卻記“三月，曹平公卒。”楊伯峻先生考證說“經之曹伯須即曹平公”<sup>④</sup>《經》稱“伯”，而《傳》稱“公”。金文曹器有曹公簠（《集成》4593）、曹公盤（《集成》10144）、曹公子沱戈（《集成》11120）稱曹公，另有曹伯狄簠（《集成》4019）稱曹伯，皆爲春秋時代的器

物，或稱公或稱伯亦無定說。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其爵稱為公為伯都是可能的，因此可以不必泥於太史公為曹國所定的爵稱，其爵稱的真實情況，倒是師盂鐘和姬寔母豆所記是第一手材料，可能更可靠一些。

《管蔡世家》所記曹國諸伯名與兩器銘文所述諸公、伯名大體是相對應的，《管蔡世家》叔振鐸“子太伯脾”，對應鐘銘之“皇祖太公”和豆銘之“太公”，太伯“子仲君平”對應兩器銘之“仲叟”，可能《管蔡世家》仲君是仲叟之誤。仲君平“子宮伯侯”對應鐘銘之“宮伯”，和豆銘之“省伯”，可能宋人著錄之豆銘摹寫有誤，應以《管蔡世家》及鐘銘之“宮伯”為正。宮伯侯“子孝伯雲”對應兩器銘文的“孝公”。孝伯雲“子夷伯喜”與兩器銘之“靜公”世系位置對應，然“夷”與“靜”字形相距甚遠，不太可能是字形誤記，我懷疑是《管蔡世家》漏掉了靜公一世，夷伯應是靜公的下一代。據《史記·三代世表》所記，曹叔振鐸與成王同時，太伯與昭王同時，仲君與穆王同時，宮伯與共王同時，孝伯與懿王同時。兩器銘文中的“靜公”應相當於西周孝王、夷王時代，他的下一代師盂和姬寔母應與夷伯喜同時，與其為兄弟姊妹行，約相當於西周夷王、厲王時代，這樣纔與《管蔡世家》稱“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於彘”相合，這與器物所表現的時代也是相符的。更重要的是曹為姬姓，與鐘、豆作器者的姓相同，這是斷定兩器銘所述為曹世系的先決條件。

還有一個問題，較之《管蔡世家》所記，兩器銘文中所記曹國世系，在太公以下，多出墉公和封公魯兩世，在《史記·三代世表》中，西周成王與曹叔振鐸同時，昭王與太伯同時，中間康王一世，曹國為空白，而同時的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燕各國皆有公侯名對應。這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認為曹叔振鐸比召公還長壽，歷文、武、成、康四世，在整個康王時代都在世稱曹公，《三代世表》中康王一世的空白，表示叔振鐸延至康王末年仍一直在世。這沒有文獻根據，似乎不太可能；二是太史公《史記》所依賴的曹國世系資料是斷續不全的，他不清楚相當於西周康王一世曹國是那個曹公當政，這倒是很有可能的。根據兩器銘文所述，叔振鐸子太伯脾（太公）應居於康王世，而康王一世據小孟鼎（《集成》2839）銘文記載至少二十五年以上，其後的昭王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在位十九年而“南巡不返”，穆王在位是西周諸王中最長的，有四十餘年與五十餘年等說法，在這康、昭起碼四十餘年的時間中，加上部分穆王早期的若干年，還應該再安排曹墉公和曹封公兩世，這樣才比較合理。至於第五代曹公仲叟平，既不稱公也不稱伯，名中尚有排行的稱謂“仲”，則不排除他與封公為一世，是封公之弟的可能。應該承認，是姬寔母豆和師盂鐘銘文記載的墉公和封公兩代曹公，補足了《管蔡世家》所記曹國早期世系的缺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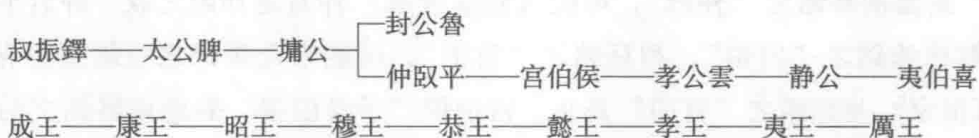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的話，那就說明《管蔡世家》在敘述曹國世系時有幾點缺陷：一是錯將西周曹國各代爵稱一律定為“伯”，實際應如兩器銘文所示，西周曹國爵

稱多數爲“公”，個別爲“伯”。

二是排列世系有遺漏，據兩器銘文所示，太公以下漏掉了墉公和封公，孝公以下漏掉了靜公。

三是個別世系名字錯記，如將“仲馭”錯記爲“仲君”。

綜上所述，經過青銅器銘文校正的西周曹國世系應爲：



據《管蔡世家》記載“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曹地所在，《史記集解》引宋忠曰：“濟陰定陶縣。”說明曹國的初封地應在山東定陶一帶。而記載曹國世系的銅器卻兩次出在陝西扶風，今岐山扶風一帶有西周的“周”都所在，那裏始終是西周的政治中心地之一，可能當時曾有一些周王室的宗親采邑環佈四圍，兩件銅器大概即出土於曹國的采邑之內。

《史記索引》解釋《史記》列《管蔡世家》而不列《曹世家》的緣由說：“叔振鐸，其後爲曹，有系家言，則曹亦合題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微小而少事跡，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不僅文獻記載的曹國史料稀少，青銅器中可定爲曹國的銘文亦不多見，僅有的幾篇曹國銘文，皆出現在東周銅器上。這次師盨鐘銘文的出土及其與宋代早年出土的姬寗母豆銘文的對讀合證，修正補充了文獻的記載，使我們對曹國的西周世系有了更正確的瞭解。

如果本篇考證的文字尚可以成立的話，另外一個意外收穫，就是我們發現了兩件可以確認的西周晚期曹國青銅器——師盨鐘和姬寗母豆。

## 注 釋

- ① 宋·呂大臨：《考古圖》，本文用乾隆十八年（1753年）黃晟亦政堂修補明代保古堂本。
- ②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明崇禎六年（1633年）朱謀聖翻刻吳江史鑒本，1935年于省吾據之影印，中華書局1986年據于本再影印。本文用1986年中華書局本。
- ③ 吳其昌《金文世族譜》，本文用199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
- ④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文用199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修訂本》十八·二1394頁。

注：本文引用《殷周金文集成》簡稱爲《集成》，引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簡稱爲《近出》。



圖一 姬寗母豆

此豆中匕大公會公  
 中喜日美月八〇福八〇豆申  
 質如壽言礼合中福八〇

圖二 姬寗母豆銘文



圖三 師室鐘



圖四 師室鐘銘文





# 綜合論述



## 金文薺京考

金文中的薺（或薺京）共二十四見，其具體所指各家意見分歧很大，各種意見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認為薺京即鎬京。此說吳大澂首倡<sup>①</sup>，羅振玉、丁山、容庚，朱芳圃、陳夢家諸學者發揚之<sup>②</sup>；二是認為薺京即豐京。此說郭沫若先生首倡<sup>③</sup>，黃盛璋等發揚之<sup>④</sup>；三是認為薺京是豐、鎬以外某地。王國維指為埔坂，唐蘭指為豳地，溫庭敬指為範宮，方濬益指為方<sup>⑤</sup>。以上意見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特別是建國以來，學者多排除第三類意見，認為薺京非鎬即豐，直到最近還有主張薺京是鎬京的文章問世<sup>⑥</sup>。然而我以為從字形上講，薺與豐、鎬是絕不能通的。這是討論薺京所屬的基點，金文中的薺京應從豐鎬以外去尋找。試論述之：

### 一 薺京不是豐京

文獻中豐或作鄽，或稱之為豐京、豐邑。其地當以豐水得名，從不見寫作薺或類似的字。金文和玉器銘中有豐邑，與文獻所載相合：

《陶齋古玉圖》收錄一件陝西寶雞出土的玉刀，其銘云：

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大保省南國……

作冊魑卣<sup>⑦</sup>

季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豐，賞作冊魑馬。

小臣宅簋<sup>⑧</sup>

惟五月壬辰，同公在豐，令宅使伯懋父。

以上三器皆為西周前期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此時周都已遷至鎬京。然王及公侯大臣在舊都的活動仍很頻繁。

近年陝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衛盃<sup>⑨</sup>銘云：

惟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再旂於豐……

宋人的《嘯堂集古錄》收了一件癸鼎，其銘云：

惟三年四月庚午，王在豐。王乎號叔召癸，錫駒兩。

此鼎與 1976 年陝西扶風莊白村出土的一組癸器當為同時同人所作。裘衛盃與癸鼎皆為西周中期物。

1961 年陝西張家坡出土了四件同銘的簋<sup>⑩</sup>，時代為西周晚期，作器者為師旂。其銘云：

王乎作冊尹克冊命師旂曰：備於大左，官司豐還，左右師氏。

以免簋“司鄭還敵”例之，“豐還”當即豐邑之“還”。

上述九件器物都談到豐。從器物出土地看，除作冊魅卣傳說出在洛陽、小臣宅簋出土地不詳外，其餘如張家坡、寶鷄、岐山、扶風皆距豐邑較近。從其時代看，由西周初到西周中晚期，貫穿整個西周。從其所載內容看，記錄了周王在此地再旂理事，處理臣下的土地糾紛；命太保省視南國；舉行頒賞典禮。也記錄了臣下在此舉行頒賞典禮，派使者出使其他封邑等，均與文獻中的豐京十分相像。下面我們看看文獻中豐邑的情況：

《史記·周本紀》云：“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華、原、豐、郇，文之昭也。”

是知豐本崇侯之地，文王伐之，作邑立都於此。後武王遷鎬，乃封其兄弟駐守此地，世為豐侯。

《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

《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又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豐刑。”

是知成康之世王室的許多重要活動仍在豐地進行。

《史記·秦本紀》云：“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

《路史·國名記》云：“秦襄公以弟繆嬴為豐王妻。地蓋豐水之西，一作酆。”襄公幽王時人，此時豐地之主稱王，說明豐地已易主而非姬周後人了。清人周廣業云：“豐王疑是戎王之號，薦居岐豐，因稱豐王，與亳王一例。”（轉引自《史記會注考證》）襄公是秦始建國之君，在其繼位之年就與豐王聯姻，說明此豐王是西周末年西土一相當重要的勢力。傳世有豐王斧、豐王銅泡等多件（豐王或省作豐），大概就是此時此地的東西<sup>⑪</sup>。

從文獻上看，豐京在武王以後雖不作都城了，但仍是周王十分重視的地方，派親兄弟把守，王也經常在此地活動。直到西周末年勢力日衰，此地易主，新君稱王，且與秦人交通婚媾。這些情況與金文反映的情況是一致的。

金文中又有豐方鼎<sup>⑫</sup>，其銘云：

惟周公于征伐東夷、豐伯、專古。咸戔。

此豐伯與東夷、薄姑並列，當為東土之豐（在今山東境內）西周晚期器有豐伯車父簋，出在濟寧<sup>⑬</sup>。準此陳夢家推斷在曲阜西南應有一古豐國<sup>⑭</sup>。

又有一輔伯□父鼎<sup>⑮</sup>，其銘云：

輔伯□父作豐孟嬭媵鼎。

此鼎言輔伯嫁女孟嬭為豐國之婦。《國語·鄭語》云：“鄔、鄩、路、偃陽”。《左傳》之“偃陽”，《公羊》作“傅陽”。《漢書人表考》云：“故偃陽國，莽曰輔陽。”因知此偃姓之偃陽可能就是金文中的嬭姓之輔國。（在山東嶧縣境內）。豐、輔兩國同在山東，互為婚姻。此豐也應是山東之豐，而非陝西澧西之豐。

1976年陝西臨潼出土一件盃，其銘云：“王作豐妊單寶盤盃”。<sup>⑯</sup>此周王為其妻妊姓豐國之女而作的銅器，是知又有一妊姓之豐。

這樣看來豐可能不止一個，但細審其地望、性質，除澧西之豐外，無一能適合上述玉刀銘等九件器物銘文。因此，我們認為文獻中的豐京在金文中已找到，即上述九件器物上之豐，而不是葦京。我們實在想不出周人何以要另造一葦字來代替豐。地名作為一種專有名詞是比較保守的，特別是像豐這樣重要的都城，我們在考慮它音轉成其他字時，我想應當十分慎重才行，一定要從其本身找到可靠的證明才能講這樣的話。所以在討論金文中葦京所屬時，我們首先排除了它是豐京的可能性。

## 二 葦京不是鎬京

文獻中的鎬京當以澇水得名，古人以水名地，因水名邑屢見不鮮。澇水河床至今猶可見，澇水、澇池史不絕書，也不見有寫作葦或類似的字的。葦與鎬形音義無一可通。因此，如找不到什麼演變的痕跡，僅以文獻中鎬京的記載與金文葦京的記載情況類似是很難斷定二者為一地的。那麼金文中的鎬京應作什麼呢？我認為金文中的宗周就是文獻中的鎬京。（這一點許多人都談過，下面還要提到，此從略）金文和周原甲骨中有地名曰葦，即是文獻中的鎬京。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德方鼎銘云：

惟三月，王在

成周。玆珽

福，自葦。咸，

王錫德貝廿朋。

用作寶尊彝



德鼎等四德器字體返古，如易作𣎵，周作𣎵，福作𣎵（此字與甲骨文同，與一般金文不同）。鎬字寫作𣎵，亦為其字體返古的另一例證。𣎵字的𣎵乃羨劃，金文有伯六替鼎<sup>⑩</sup>，其銘云：

伯六替作旃寶𣎵盞。

其尊字就有類似的𣎵為羨劃。又有 劫尊<sup>⑪</sup>，其銘云：

作朕蒿祖寶𣎵彝。

其高祖之高亦加<sup>++</sup>為羨劃。高寫作蒿在文獻中也不乏其例。如《公羊傳·桓十五》“公會齊侯於郕。”《穀梁傳·桓十五》作“公會齊侯於蒿。”這很可能是當時的一種裝飾性筆法。在這裏，鎬京之鎬金文寫作高（蒿、𣎵），正如賞賜之賜文獻中作錫，金文寫作易一樣，是可以成立的。

德方鼎銘文大意是：時王在成周（東都洛邑），無法參加在西都鎬京祭武王的大典，典禮完畢由德至成周“致福”於王。德因此受賞，作鼎以志紀念。這裏有一點需注意到，就是文獻中有不止一個高或郕，如《左傳·哀四》“國夏伐晉，取刑、任、欒、郕”。此齊伐晉取郕之郕，《路史·國名紀己》云：“趙之高邑有古柏鄉城，故郕也。光武即位，改曰高邑。”此城春秋稱郕，戰國稱柏鄉，漢稱高邑。這是晉地之高。《路史·國名紀甲》云“高，故高城，在齊之禹城。”這是齊之高。然而，對武王的祭祀典禮，當然以在“武王成之”的鎬京舉行為宜，不會跑到山東或山西一個不相干的地方去搞。所以說，盡管文獻記載有幾個高，德方鼎上之𣎵就是鎬京之鎬是沒有問題的。能證明這點的尚有一斧（又名鐻）<sup>⑫</sup>，其銘云：

獻嗣土北征𣎵𣎵。

此司徒北征之𣎵當即鎬京之鎬。末一字不識，唐蘭先生云：“𣎵蓋器名斧屬（俗謂之鐻，容君摹有其形，甚大而有兩耳），謂司徒北征𣎵所作也。”<sup>⑬</sup>在《陝西青銅器圖釋序》中唐先生又云：“清末吳大澂所藏的司徒甫（註：應釋甫，掘土工具。詳唐蘭《中國古代社會使用青銅農器問題的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總二期）裏的司徒就是南仲，銘文說‘獻司徒北征𣎵甫，𣎵就是鎬京。’陳夢家先生在《西周銅器斷代》中釋為‘獻司土北征𣎵、盧。’以為𣎵、盧乃兩個地名<sup>⑭</sup>。

岐山鳳雛遺址內出土的甲骨有兩片提到𣎵<sup>⑮</sup>，其辭云：

祠自蒿於𣎵。（卜甲二十號）

祠自蒿於周。（卜甲一百十七號）

祠者祀也，祭也。金文中有趙孟疥壺銘云：“以為祠器。”《風俗通義·祀典》云：“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可見這兩片甲骨所記乃祭祀之事。甲骨上“自蒿”一辭應與德方鼎上之“自蒿”同意，蒿即𣎵，亦即鎬。“自蒿”者“從蒿而來”之謂也。即某一祀典在鎬京舉行，時王不在鎬京，而在𣎵、周二地接受自蒿而來的臣下的致福。

此周即金文中之周，乃岐周。此蒿即爲鎬京無疑。卜辭簡約，須藉助德鼎銘方能讀通。

所以，我以爲文獻中的鎬京在出土的甲骨和金文中也已經找到，盡管數量不多，只有四件，但其確爲鎬京則是無疑的。可是爲什麼一代周都的名號只在四件器物上留下痕跡呢？上面已經講過，這是由於在一般情況下當時的人們都稱鎬京爲宗周的緣故，而金文中言及宗周的銅器却是較多的。當時的人們只是在某種偶然的情況下才使用蒿或薺這個原有的名字。比如德方鼎就是由於作器者愛寫古僻字的原因所致；司徒斧則可能是由於當時周都鎬京遭到猙獰的嚴重破壞，已面目全非，故又稱其原來名字；而兩片周原甲骨上所記乃武王之前的祀典，其時蒿地還不是都城，因此尚未被人們稱爲宗周，只能稱其爲蒿。

因此，我們在討論金文中薺京所屬時，也排除了它是鎬京的可能性。

### 三 薺京也不是其他西周都城

上面我們排除了薺京是豐京和鎬京的可能性，爲了徹底弄清薺京所屬，我們還必須看看它與其他西周諸都的關係。西周金文甲骨文中記有周都地名者共有二百多件器物：記“周”者一百多件；記“成周”者六十多件；記“宗周”者近四十件；記“薺京”者二十四件；記“豐”者九件；記“王”者兩件。我們先將其中六件銅器銘文的内容分析一下：

#### 第一，臣辰盃<sup>②</sup>

惟王大餽於宗周出饗薺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眾史寅寢于成周。

#### 第二，小臣傳簋<sup>③</sup>

王在薺京令師田父殷成周年。

#### 第三，應侯見工鐘<sup>④</sup>

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

#### 第四，善夫克鼎<sup>⑤</sup>

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適正八師之年。

#### 第五，史頌簋<sup>⑥</sup>

王在宗周，令史頌徂蘇溷友里君百姓謁整于成周。

#### 第六，召壺<sup>⑦</sup>

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師。

上述六器中，第一、第四、第五宗周與成周對舉；第一、第二薺京與成周對舉；第三周與成周對舉。可見宗周、薺京、周皆與成周相對，並非一地。其中第四、第六又有

成周八師之稱，八師乃周初設置的專司鎮壓遷至洛邑的殷遺民的軍隊，當然這支軍隊應設在洛陽附近。而金文稱這支軍隊為成周八師，可見成周是洛邑的代稱。這樣看來，成周與其他周都相對，乃東土之都，其中第一、第二兩銘中莽京與成周對舉，當然可以證明莽京不是東土之成周。王城，是成周附近一都城，自然也不會是莽京（這一點陳夢家在《斷代》一書中已講得很清楚，此亦不復贅言）。至於文獻中有時也稱成周、王城為宗周和周，那多是春秋戰國以後人搞混了的。王國維曾說：“凡稱鎬京曰宗周，洛邑曰成周。《穆天子傳》云：‘自宗周灋水以西。稱洛邑為宗周，不知其六國後人語。’孫星衍也說：‘周之東遷，無復西都，亦名東都王城為宗周。’這種隨政治形勢的變化地名也跟着搬家的現象，在歷史地理研究中是常常要碰上的問題。”

排除了豐鎬和成周王城以後，在金文中，西周諸都就只剩下“周”與“宗周”了。在文獻中宗周指鎬京，《詩·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陳奐疏云：“《王風譜》始云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詩·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傳云：“宗周，鎬京也。”《書·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孫星衍疏亦引證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帝王世紀》云：“武王自豐居鎬，諸侯宗之，是謂宗周。”宗周作為地名在金文中共出現近四十次。其中西周早期和晚期各十餘件，中期則只有四、五件。早期不見有宮廟的記載。中期、晚期各有一件言及宮廟。金文臣辰盃、臣辰尊和麥方尊中都出現了宗周和莽京。臣辰盃、臣辰尊銘云：“佳王大龠於宗周出饗莽京年。”麥方尊銘云：“侯見於宗周，亡述，迨王饗莽京，彫祀。”這裏宗周與莽京對舉，可見並非一地。因此，我們可以說莽京與宗周不是一地，金文中的宗周是鎬京。文獻中周指岐周。《詩·江漢》“錫山土田，於周受命。”鄭箋云：“周，岐周也。”《詩·緜》：“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毛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鄭箋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水經注·渭水篇》云：“漆沮水南流與杜水合，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後漢書·郡國志》云：“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有周城。”《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

這裏各種文獻對周的具體地理方位所指雖互有出入，但都指的是岐周則是共同的。周作為地名記錄在百多件銅器甲骨上，其重要性可想而知。這百多件器物的時代又有不同，西周晚期者五、六十件，中期三十餘件，周初只有不足十件。早期其文辭多為“在周”、“于周”、“各周廟”、“各周宮”等。中期出現康宮，稱“康宮”、“康寢”、“康廟”，又有省稱“康”者，又稱“新宮”、“康宮新宮”等。另外，有“駒宮”、“般宮”、“師汙父宮”、“師司馬宮”、“師量宮”、“成宮”、“成大室”、“穆王大室”等大量宮殿廟堂建築。至晚期，除稱“大室”、“圖室”、“師臬宮”者外，皆為康宮及康宮中之昭、穆、夷、厲諸王宮廟。根據唐蘭先生關於康宮問題的論述，則西周有六王之廟皆在周。近年來，在岐山鳳雛村出土一批甲骨，其中有兩片言及周，一片為“周邑”，

一片爲“祠自蒿於周。”<sup>②</sup>在岐周出土帶有周和周邑的甲骨刻辭，這也不能不使我們想到金文中之“周”就是岐周<sup>③</sup>。同時在這片甲骨上，蒿與周對舉，證明周與鎬京不是一地。克鐘銘：“王在周……王親命克遘涇東至於京師。”順涇水而下，東行之涇渭交匯之處，即爲鎬京，可見鎬京除宗周外，也可以稱爲京師<sup>④</sup>。在這裏周與京師對舉，周又在京師之西，其地非岐周莫屬。根據文獻記載，周人自古公以來，在周原經營三代人，至文、武時才遷都至豐、鎬。據金文所載，後世周王的宗廟宮室多數仍在周，王公貴族的家廟居室也多在周。因此，周王經常要返回老家去舉行各種祭祀、賞賜、冊命等典禮。

近年來，周原考古收穫頗大，不斷發現大規模的建築遺址，各種作坊、料場，銅器甲骨也不斷出土，根據陳全方同志統計，銅器自漢以來出土已近千件，王室重器、諸侯所作之器，長銘鉅製，層出不窮。而且從遺址地層關係上看，從周初至周代晚期貫穿始終。這些都說明周是周人東遷之前始終沒有放棄的根據地。金文中的記載與田野考古實踐是一致的，周應是岐周。金文中有高卣蓋銘云：“王初饗旁，唯還在周。”這裏旁就是莽京，旁與周對舉，證明莽京也不是周。甲骨與金文都有材料證明莽京與周是兩個地方。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莽京與所有西周諸都皆非一地，而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城邑。

#### 四 莽京是鎬京附近的“方”

上面三節我們分別排除了莽京是西周諸都的可能性，那麼金文中的莽京到底是指那裏呢？金文中言及莽京之器二十四件，屬西周早期和中期者各十餘件，晚期只一件。西周早期及中期前半多稱莽京，中期後半及晚期多稱莽，不稱京。從其內容看，有四件器上記載此地有辟雍大池<sup>⑤</sup>，這裏經常舉行饗射禮，王及公侯大臣在大池裏泛舟、捕魚、射雁等，以游宴的形式開展各種政治活動。這在金文中是莽京獨有的，其他周都不見這類記載。周王常在此地舉行賞賜冊命典禮，周王在這裏下令臣下“殷於成周”（如小臣傳簋、臣辰盃、臣辰尊等器）。此地還是王“饗禮”所行之地（如臣辰盃、臣辰尊、高卣蓋等所記）。西周中期以後，莽京中出現了莽宮（卯簋蓋）、莽官（戒鬲）、莽畺官（楚簋）、學宮（靜簋）、濕宮（史懋壺）、上官（饒匜）、大室（師察簋）等宮室建築名稱。其中除大室外皆爲莽京獨有之宮室名稱，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莽京是獨立於諸周都之外的城邑。其中卯簋蓋之莽官即戒鬲上之莽官（官即宮），可能是莽京城內之主要宮室。莽畺官之畺即鄙字，《齊語》：“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注：“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鞬鐻銘云：“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

與鄆之民人都鄙”（《三代》1.68）。這說明城邑之內稱“國”，稱“都”，邑之外稱“郊”稱“鄙”。莽鄙官者，莽京城外之宮室也。這個解釋如能成立，則可以幫助我們講通楚簋銘。楚簋冊命辭中有“司莽鬲官內師舟”一句十分費解，簡報中此句末斷句，按此解則應讀為“司莽鄙宮、內師舟。”與卯簋蓋“令女死司莽宮、莽人”同例。

關於莽京的地理位置，討論莽京的各家都注意到了麥方尊銘中透露的信息，麥方尊中的“侯”第一天在宗周，第二天即與王泛舟於莽京的辟雍大池。因而推知，莽京距宗周（即鎬京）不足一日的路程。以古人的交通條件至多超不出幾十里的路程。古人行軍三十里為一舍，即一日的路程。姑且以三十里為暫定範圍吧。那就是說莽京應在宗周（即鎬京）周圍不遠的某個地方。最先藉助文獻擬測莽京位置當推清人方濬益，他在《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中精闢地寫道：“‘莽’字銘文中習見。阮文達公釋為旁之繁文，古邦字異文。濬益按：莽從𠂔、從△、從方，當為方之繁文。《詩經·出車》‘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又‘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傳曰：‘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六月》‘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箋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箋蓋承《出車》毛傳之辭，泛言北方地名，而不能詳其所在。竊謂鎬即鎬京，方即此莽京，方、莽古今字也。”<sup>③</sup>方濬益說的是很對的，但卻沒有進一步講清莽京是距鎬京十分近的一個城邑。也沒有肯定鎬、方的位置在灃東長安附近。

《六月》“侵鎬及方”之鎬、方的具體所指，古人向有爭議。魏王肅首先提出鎬即鎬京之說。此說與鄭玄不合，魏王基為此著《毛詩駁》一卷。清人馬國翰為其輯本作序云“傳稱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議，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玉函山房輯逸書）唐蘭先生早年作《莽京新考》指出：“鎬及方之所以稱鎬京或莽京者，總言之為京或京師。析言之，為高及方，是蓋其子邑也。”但當時他把二者皆指為豳地，唐先生晚年在所寫《陝西青銅器圖釋序》中談到司徒斧時就沒有再強調豳地說。而說：“鎬就是鎬京，《詩經》說‘侵鎬及方’，可見鎬跟方是在一起的，司徒北征鎬，顯然就是司徒南仲往城於方這回事情了。”唐先生在這裏強調指出鎬、方是相距很近的兩個城邑。把唐先生前後兩次論述聯繫起來，再加上方濬益的意見，問題就接近於搞清楚了。

根據金文和文獻材料所言，《六月》、《出車》描述的皆為宣王初年之事，其時獫狁為患十分嚴重。《漢書·西域傳》云：“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也。”《六月》所謂“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獫狁匪茹，整居焦獲。”焦獲在涇水下游，距鎬京百餘里，涉渭之後，一日可達。當時的鎬與方經常遭到獫狁的騷擾和破壞。所謂“靡室靡家，獫狁之故。”即此之謂也。“侵鎬及方”，侵者，《春秋胡安國傳》云：“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及者，保卣銘“王令保及殷東國”之及。既“侵”又“及”，此時的鎬、方已不勝其擾。可能周師已被驅至鎬、方以南。中興之主宣王受命於危難之秋，很



有作為。兩次出征，徹底擊潰了獫狁對都城的進犯和威脅。首次出征命南仲由鎬京南部某地出師，結果是城方而還。此次出征因在鎬、方之南，故可稱北征。第二次出征主帥是尹吉甫，擴大了第一次的戰果，直將獫狁驅至太原以北。

如果把“侵鎬及方”的鎬定為鎬京，那麼其附近之方就應該是金文中的莽京。莽京之莽在新出的楚簋中作𠂔，在高卣蓋中又作旁，在散簋中有“長榜截首百”一辭，其榜字作𠂔。此字如除去木旁，可看出“旁”就等於“莽”。金文中的旁、𠂔、莽在文獻中都是方，這也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們認為，莽就是文獻中“侵鎬及方”的方，其地在距鎬京幾十里的範圍內，我們期待着考古工作者對莽京的發現。

本來這個問題在方濬益和唐蘭先生那裏是一個接近於解決了的問題。特別是唐蘭先生早年就力排衆議，指出莽京不是豐，也不是鎬。雖然錯指了邠地，但在晚年已作了更正。不知為什麼建國以來，莽京是豐京或鎬京的議論甚為廣泛，直至去年仍有人著文論述莽京是鎬京，以致淹沒了正確意見。本文的寫作不敢說發表了什麼新鮮的意見，只是以金文為主要材料在指出莽京不是豐京、鎬京和其他諸周都上進一步作了些考證。本文寫作的另一個用意則是想通過這篇小文引起同志們的回顧，使過去曾經有過的正確意見發揚光大起來。

## 注 釋

- ① 《見憲齋集古錄》8.13；11.6及《說文古籀補》附錄11。
- ② 見羅振玉：《遼居乙稿》27，丁山文見《歷史語言研究所刊》集第五本一分冊；容庚：《金文編》鎬字條下；朱芳圃：《古文字釋叢》135～137；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1955年，10期。
- ③ 見《金文叢考》及《兩周金文辭大系》。
- ④ 見《歷史研究》1956年10期。
- ⑤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二；唐蘭文見《史學論叢》第一期，北大潛社，1934年；溫廷敬文見《史學專刊》一卷四期，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1936年，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3、7。
- ⑥ 見《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1期
- ⑦ 《商周金文錄遺》287.1～2。
- ⑧ 《三代吉金文存》6.45.1。
- ⑨ 《文物》1976年5期。
- ⑩ 《考古學報》1962年1期。
- ⑪ 河南浚縣曾出土衛自銅泡，其地則衛地。故可推知豐王銅泡及豐王斧上之豐亦應為地名，這些東西可能也出在莽京附近，惜未見有出土記載的報導，無從查對了。豐王斧見《三代》



20.49.4, 豐王銅泡見《三代》18.33.2, 18.34.1, 其中18.33.2銅泡上書陽文四字, 一合書之“豐王”, 一分書之“豐王”。又考古所藏一豐王銅泡拓本, 二字分書。

⑫⑭ 《西周銅器斷代》(一), 《考古學報》, 1955年5期。

⑬ 《據古錄金文》23.48。

⑮ 《貞松堂集古遺文》3.7。

⑯ 《文物》1977年8期。

⑰ 《三代吉金文存》3.16。

⑱ 《商周彝器通考》上395頁。

⑲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9、93、1, 另見本文附圖。

⑳ 《莽京新考》, 《史學論叢》, 第一冊, 北大潛社。

㉑ 我以為末一字釋甫(斧)、釋盧, 於字形均有未安、姑存疑。

㉒ 《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㉓ 《三代吉金文存》14.12。

㉔ 《三代吉金文存》8.52.1。

㉕ 《文物》1975年10期。

㉖ 《三代吉金文存》4.30。

㉗ 《三代吉金文存》9.7。

㉘ 《三代吉金文存》12.29。

㉙ 《古文字研究》(一)

③⑩ 關於這一點, 周原的考古工作者如陳全方、尹盛平等同志也持同樣意見。陳全方同志有專文論及此, 如《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 1979年10期。

③⑪ 由克鐘銘可以看出, 在西周時岐周至鎬京之間交通除陸路外, 很可能還有一條水路。但彼時水上船楫構造及運載能力如何, 尚缺乏考古學上的證實。

③⑫ 麥方尊: “在辟雍, 王乘於舟, 爲大豐。”

井口鼎: “王𩇑於大池。”

適盞: “穆王在莽京, 乎漣於大池。”

靜簋: “王以吳來、呂剗卿幽盞自邦周射於大池。”

③⑬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3、7。

(原載《考古與文物》1982年3期69~75頁)

## “乾隆四鑒”的作者、 版本及其學術價值

《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以下簡稱《西清》、《寧壽》、《西甲》、《西乙》）四部收錄青銅器的專書是由乾隆皇帝主持編纂的，都作於乾隆年間，四書各自獨立，書名都有一“鑒”字，所以我們簡稱其為“乾隆四鑒”<sup>①</sup>。對這四部書，已故古文字學家容庚先生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作了很深入的研究，1929年寫出了《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後又發表了《清代吉金書籍述評》<sup>②</sup>全面細緻地整理了四書中的銅器和銘文。《存佚表》發表後，1941年容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對表中所列四十三件器的真、疑、偽作了改正。到六十年代先生又準備進一步修定《存佚表》。他說：“1929年我曾撰《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一文登於《燕京學報》第5期，以後復有所修正。關於《古鑒》、《鑒古》、《續鑒》等四種書的真偽問題，將另撰文論之”。隨着科學考古工作的進展，出土的青銅器日益增多，人們的認識也逐步深入，容先生也在這種形勢下不斷修正過去的認識。但重修《存佚表》牽涉到對千餘件有銘銅器的重新研究，費時費工，先生在世時一直未能抽出時間完成之。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編輯《殷周金文集成》，對傳世金文資料作了全面的清理。筆者在參加編寫工作期間，在容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對“四鑒”再次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整理<sup>③</sup>，現將其中的幾個問題簡述如下：

宋徐鉉奉御札賦茱萸詩云：“長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青蚪蚴蟠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集解引郭璞注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sup>④</sup>後因以稱宮禁燕閒之地為“西清”，清宮南書房亦稱“西清”。

乾隆皇帝說：“惟尊彝鼎鼐歷世恒遠，……可見三代以上規模氣象，故嗜古之士亟有取焉。”又說：“以遊藝之餘功，寄鑒古之遠思，亦足稱昇平雅尚云。”<sup>⑤</sup>這就是《西清古鑒》和《續鑒》書名的由來。“寧壽”是乾隆晚年擴建的一套宮殿區的總稱，用以

備歸政尊養之用，乾隆六十年歸政於嘉慶後，成為他作太上皇的謙居之地。《寧壽鑒古》之“寧壽”即取義於此。

## 一 成書的時間

《西清》一書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七日發佈上諭，十六年（1751年）夏五月編成，奉旨由內府刻版，至二十年（1755年）刊印成書。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收入《四庫全書》<sup>⑥</sup>。

《西甲》一書的成書時間載在其跋語中，跋語云：“《西清古鑒》書成越三十年，諭纂內府續得諸器為《西清續鑒》未歲事，載越十三年，命臣等校補繕續全帙既具。”“是編成於乾隆癸丑（1793年）小春”。據此可知《西甲》始編於乾隆十六年後三十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成於乾隆四十六年後十三年，即乾隆五十八年。

《西乙》全書無序跋，其成書時間在《西甲》跋語中有交待，云：“其藏之盛京者釐為乙編”。兩書的“說解考釋”中沒有發現互相徵引的語句，因此可以認為《西乙》與《西甲》是同時編輯的，同是《西清古鑒》的續編，只是因為所收銅器藏地不同，分成甲乙兩書而已。《西乙》的成書時間也應是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

《寧壽》一書亦無序跋，其成書時間可由《寧壽》和上述“二鑒”的“說解考釋”語詞推知其上下限。《寧壽》一書多次徵引《西清》，如周獸環鍍（12.38）云：“考《博古圖》及《西清古鑒》所載皆似釜而口斂”。可知《寧壽》編寫過程中《西清》已成書，《寧壽》成書的上限是《西清》成書的乾隆十六年。《西甲》、《西乙》的說解考釋中多處徵引《寧壽》，如《西甲》伯和鼎（1.9）、執物壺（8.44）、大吉洗（15.24）、《西乙》周伯鼎（1.37）、周公作文王鼎（1.4）均云：“說見《寧壽鑒古》”。《西乙》周召仲尊（5.7）云：“與《寧壽鑒古》召仲壺同”。由上述徵引例證看，《寧壽》一書編輯的時間下限是在《西甲》、《西乙》開始編寫之前，即乾隆四十六年之前。這樣從《寧壽》及《西甲》、《西乙》的內證考察，可以斷定《寧壽》是在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六年這三十年間編成的。

再考慮到此書既名之曰《寧壽鑒古》，極有可能其取名與寧壽宮的擴建工程有關。寧壽宮的擴建工程很大，占地約當內廷宮殿的四分之一，規模俱仿內廷各正宮正殿，自乾隆三十五年燙樣，三十七年興工，至四十一年完工。是乾隆着意經營的一件大事，用以備歸政後永定此地謙居，因以《寧壽鑒古》一書記志此事。這樣看來，《寧壽》一書的上限還可以下延到寧壽宮竣工之時，即乾隆四十一年。也就是說此書編纂是在乾隆四十一至四十六這五、六年之間<sup>⑦</sup>。

容庚先生曾據《耆獻類徵》105：1的記載推斷《寧壽》的編輯時間，他說：“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常據趙秉冲摹本或拓本編入，而其摹本或拓本又常見於《鑒古》和《續鑒甲乙編》三書，可知趙氏曾參加三書摹篆的工作。乾隆四十四年，奉旨繕寫篆字監生趙秉冲著照從前陳孝泳、楊瑞蓮之例，在懋勤殿行走。此書的編纂約在此時<sup>⑧</sup>”。陳、楊為《西清》的摹篆者，此時已死去或老邁不能用<sup>⑨</sup>，故在乾隆四十一年換上趙秉冲承續其事，此事亦可從另一側面證實我們上面的推論。

## 二 作者

這四部書是由乾隆皇帝直接主持編纂的，從乾隆十四年發佈的“上諭”看，該書的宗旨、編輯方法、人事安排均由皇帝欽定。而且“每一卷書成，輒恭呈點定”，“是編告竣，奉旨付剞劂氏”<sup>⑩</sup>，從編輯到出版都是奉旨行事，諸編纂官要對皇帝負責。為監督此事的進行，特派兩親王作“監理”：允祿是聖祖十六子，精數學通樂律，曾掌管樂部<sup>⑪</sup>，弘瞻是世宗第六子，善詩詞，雅好藏書<sup>⑫</sup>。由這樣兩位親王監理其事，當然就更加重了此書欽定官辦的色彩。“四鑒”的編纂前後延續數十年，動用宮中數千件國寶重器，從繪圖摹篆到釋文、說解、考證，僅書前列名者就有三十五人之多，工程可謂浩大。這些都決定了“四鑒”的編成，只能是一個集體勞動的成果，而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著作；加之在那個時代，該書既名之曰《欽定西清古鑒》，當然一切功勞得歸於皇帝。諸編纂官是為皇帝辦事，何人敢承當這“主編”的頭銜。因此我們對作者的考訂，也只能就其列名諸大臣的情況作些籠統的分析而已，也無法確指誰是某鑒的作者。

《西清》一書共設編纂官十一名，三名尚書：梁詩正、蔣溥、汪由敦。八名侍郎：嵇璜、裘曰修、金德英、觀保、于敏中、董邦達、王際華、錢維城。查《清史稿》各傳無一言及編輯《西清古鑒》者。《汪由敦傳》言其曾“纂修明史”、“撰擬諭旨”，並為書家。“上賦懷舊詩列五詞臣中，稱其書比張照云。”<sup>⑬</sup>《于敏中傳》言其曾撰《西清硯譜》、任四庫書館正總裁，國史館、三通館正總裁等<sup>⑭</sup>。《董邦達傳》言其“工山水，蒼逸古厚。”<sup>⑮</sup>《錢維城傳》言其“工文翰，畫山水幽深沈厚<sup>⑯</sup>”。從以上情況看，有善編纂者，善繪畫者，善書法者，皆為纂輯此類書所需之學問，故知《西清》編纂諸官的選定是考慮了各人的特長的，並非全是掛名虛領其事。查方誌中載此事者有裘曰修、董邦達傳。裘氏傳云：“與纂《西清古鑒》、《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諸書。”<sup>⑰</sup>董氏傳云：“時方修《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鑒》諸書，以邦達博學嗜古，命入內廷襄事。”“及通藉供奉南齋，得縱覽內廷秘庫皮藏，更契神妙，直逼宋元人之室。又善篆隸書，雖寸縑尺楮經進，必邀睿題。”<sup>⑱</sup>有可能裘曰修、董邦達二人在

編纂諸官中是起作用較大者。

《西甲》跋語中列名大臣有七人：王杰、董誥、彭元瑞、金士松、玉保、瑚圖禮、那彥成。《西乙》為《續鑒》之“乙編”，與《西甲》為同時之書，故其編纂者應同為上述七人。上述七人《清史稿》、各地方誌皆有傳，然各傳皆無談及編纂《續鑒》者。《董誥傳》言其乃董邦達子，曾纂修《皇朝禮器圖》、《滿洲源流考》、充國史三通館協修、《四庫全書》副總裁，實錄館正總裁，大清會典館正總裁，曾接辦《四庫全書薈要》、並曾入懋勤殿寫金字經<sup>①</sup>。《金士松傳》言其曾校勘石經<sup>②</sup>。惟《彭元瑞傳》言其事最詳，云：“元瑞以文學被知遇，內廷著錄藏書及書畫彝鼎，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鑒》、《寧壽鑒古》、《天祿琳琅》諸書，元瑞無役不與。”<sup>③</sup>玉保與那彥成二傳言其一生征戰，沒有談及編書事<sup>④</sup>，估計可能是掛名不作實事的。

彭元瑞出於董邦達的門下，董邦達卒，“其門下士彭元瑞為撰行狀子”<sup>⑤</sup>。而其傳言其曾參與《西清古鑒》和《寧壽鑒古》的編寫工作，估計《西甲》、《西乙》和《寧壽》三書的編輯過程中他是始終與其事的，是七人中較主要的。

《寧壽》一書的作者，《清史稿》及各地方誌中絕少提及此事，該書無序跋、無撰人姓名。惟彭元瑞傳提及曾參與編纂此書，這是今天可以見到的惟一的有關《寧壽》作者的材料。彭氏為《西甲》跋中列名七人之一，《寧壽》與《西甲》、《西乙》編纂時間相距不遠，估計《寧壽》一書也是由上述七人負責編纂，而彭氏是其中較主要者。

綜上所述，《乾隆四鑒》已知共設編纂官十八名，《西清》十一名，《寧壽》、《西甲》、《西乙》七名。《西清》以董邦達，裘曰修起主要作用，其他《三鑒》以董誥、彭元瑞起主要作用。董誥是邦達子，元瑞亦為邦達之門下士，“四鑒”的編纂者是有其連續性的。

### 三 版本

（一）《西清》一書所知有七種本子，其中五種刊本，兩種抄本。簡介如下

1. 內府武英殿刊本，又稱“內府本”或“殿本”。

乾隆二十年（1755年）木刻印刷<sup>⑥</sup>，版框高29.5釐米，“上諭”後鈐印為紅色。此本最大，開花紙初印，寬大乾淨，最存原著之真，是諸刊本中之最佳者。

2. 邁宋書館在日本銅鑄本，又稱“日本銅版本”。

光緒十四年（1888年）銅版影印，銘文周圍可見清晰之銅網紋。版框高29.3釐米，銘文，圖像皆略小於殿本，印刷極精，其圖像之清晰度往往優於殿本，然其銘文則

有走失精神處。如戈且辛鼎（商祖辛鼎）（1、13）之“戈”字經改版發生錯誤。銘文普遍較殿本之筆畫細，個別印刷不精之處銘文則呈雙鉤狀。

### 3. 鴻文書局本。

光緒十四年（1888年）刻石縮小影印，版框高18.2釐米。據殿本影印，然銘、圖多處改版，改動處多有錯誤，如周般匜（32.11）將“父己”改成“父巳”。是諸本中之較差者。

### 4. 集成圖書公司本。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刻石縮小影印，自稱“仿殿本”，經細校知其為縮印日本銅版本，其優劣均與日本銅版本等。此書首四頁上論套紅色，序、與跋相接，跋之後多出“《西清古鑒》恭校姓氏：慈谿孫雷、吳縣馬鉞、元和王肇鏐、慈谿凌志”二十五字。版框高18.5釐米。

### 5. 雲華居廬本。

1926年石刻影印，縮得更小。

以上五種為刊本。

### 6. 《四庫全書》本。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仿殿本摹寫謄錄而成。由於參與摹寫謄錄諸書胥缺乏專門知識，書中多有錯誤，如周司寇匜（32、1~2）誤將“匜”寫作“盤”，釋文的“永作祜”誤寫成“永作祐”<sup>⑤</sup>。諸如此類錯誤比比皆是，遠不如殿本之規正，為諸本中之最差者。

###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彩繪殘本。

考古所圖書室1956年由上海古舊書店購進。經折裝四冊，版框高17.8釐米，無版心，無頁數。經與殿本校核，知為《西清》第三十二卷的全部（缺目錄），各器次序、楷書筆畫，摹篆均與殿本小有出入。圖像用工筆彩繪，有兩器用描金，是對照實物臨寫而成，銅器之色彩，銹斑、質地均能如實表現出來，立體感極強。與殿本之圖視角不同，形制、花紋與殿本之綫圖比較亦小有出入。

在各冊首尾分別鈐有“重華宮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大寶方印各一，“八徵耄念之寶”，大小方印各一，“古希天子”、“乾隆御覽之寶”小印各一。經故宮博物院專家鑒定，“重華宮”及“五福五代堂”兩方大寶均為故宮博物院現藏之印，一為白玉，一為青玉。因此，此本為原乾隆年間宮中之物是沒有問題的<sup>⑥</sup>。從我們實地對校看，雖此本與殿本之圖視角不同，畫面小異。但花紋、形制基本相同，是對照實物再次臨寫而成，器藏內府，非外人所能見，此本之圖只能出自宮中畫院供奉之手是不容置疑的。

從此殘本可推知，乾隆年間除刊印了殿本《西清》而外，還專門另外手寫彩繪了相同的一部《西清》，這是以前人們所不知道的。因為此本無題跋，查各種史料均無記



載，此本與殿本那個成書在先，恐已難作出明確答復。上述六印中的“古希天子”印作於乾隆七十歲時，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而“八徵耄念之寶”則作於其八十歲前夕，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二月時<sup>②</sup>。我們推想既加了這麼晚的印，極有可能此本出在殿本之後。

以上兩種為寫本。綜合上述七種本子看，當以考古所彩繪本為最佳，惜只殘存一卷，無法睹其全貌。通常使用只能以“殿本”為最理想的版本了。

### （二）《寧壽》一書，存世有兩種本子

一為清寧壽宮內府寫本，一為1913年縮印本。“寧壽宮寫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十六冊兩函，版框高29.5釐米，每卷首頁鈐“寧壽宮寶”大寶方印一，“乾隆御覽之寶”、“古希天子”小印各一，每卷末頁鈐“養性殿寶”、“古希天子”印各一。1913年縮印本即據此寫本由商務印書館石刻縮小影印，版框高17.3釐米，影印精良。

### （三）《西甲》亦有兩個本子

一為清寧壽宮內府寫本，一為宣統三年（1911年）縮印本。寧壽宮寫本現已不知下落，其詳不可得知，估計版框尺寸約與《寧壽》寫本同。估計用印與《寧壽》寫本可能全同。

宣統三年縮印本，即據此寫本由商務印書館石刻縮小影印，版框高17.3釐米，影印精良。

### （四）《西乙》亦有兩個本子

一為清寧壽宮內府寫本，一為1931年縮印本。寧壽宮寫本現已下落不明，其詳亦不可知。此寫本用印與上三書不同，只在每卷首頁與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方印一。版框估計與《寧壽》寫本同。

1931年縮印本即據此本由原北平古物陳列所刻石縮小影印，版框高17.3釐米，影印精良。

## 四 學術價值

《西清》收銅器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其中有銘銅器五百八十五件；《寧壽》收銅器七百零一件，其中有銘者一百四十四件；《西甲》收銅器九百四十四件（另附錄唐以後雜器三十一件），其中有銘銅器二百五十七件；《西乙》收銅器九百件，其中有銘銅器

一百九十二件。“四鑒”共收錄銅器四千零七十四件（另附錄三十一件），其中有銘銅器沒有發現重出者，共計一千一百七十八件（有銘銅鏡一百一十四件未計算在內）。

青銅器和金文的研究在宋代曾有過很大的發展，出版了如《考古圖》、《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等資料書，也出現了如呂大臨、薛尚功、王厚之、王俅、趙明誠等一批著名的金石學家。可是元明兩代這一學科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寂寞無聞。至“乾隆四鑒”出纔打破了這種沉悶的局面。“四鑒”以皇室之力，將宮中所藏的大部分銅器，著錄於書，公之於世，這在當時極大地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嘉慶年間有錢坫，阮元；道光、咸豐以後有劉喜海、曹載奎、吳榮光，吳雲、潘祖蔭、張廷濟、吳大澂、徐同柏、劉心源、吳式芬、方濬益等私家著述，一時間形成了新的高潮。

“四鑒”不僅在當時推動了金石學的發展，其中保存的珍貴資料，時至今日仍是十分難得、無可替代的，現擇其重要者揭之於次：

第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臨江出土一組者盞編鐘，同出十一件，大小相次，除最小一件無銘外，餘十件記“攻敝王皮戣之子者盞”事，是一組吳國銅樂器，《西甲》17.1~18收錄了全部十二件銅器。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特令補鑄一件，並勒銘於器云：“考其制為周鍾，應十二律而缺其一，爰命內府鑄成此鐘，用備全律。”這組編鐘流傳至今者尚有四件：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臺北故宮和“中央博物院”各存其一。而其餘七件則不知下落，只有《西甲》為我們保存了這批完整的資料。

第二，《西清》和《西乙》還收錄了四件宋代的大晟編鐘：大和黃鐘清鍾（《西清》36.1）、大和應鐘鍾（《西清》36.3）、大和夷則鍾（《西乙》17.19）、□□蕤賓鍾（《西乙》17.17）。四鍾原為宋徽宗所製“大晟樂”裏的樂器。器上之“大和”原刻乃“大晟”二字，後靖康之亂這批樂器落入金人之手，皇統元年（1141年）再次利用時則刮去“大晟”改刻“大和”，《西乙》17.17那件是刮去“大晟”而尚未補刻“大和”二字者。傳世已經著錄的“大晟”編鐘有十餘件，這四件未見他書著錄。這些樂器對研究宋代的樂制和音樂史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料<sup>⑧</sup>。

第三，《西清》3.39收錄一件庚嬴鼎（周丁子鼎），首記“惟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年、月、日、月相俱全，是研究西周曆法的重要資料。庚嬴似為西周早期一位很有地位的女性，尚有一庚嬴卣（《三代》13.45），記王在庚嬴宮賜庚嬴貝及丹之事，作器者與此殆為一人。此鼎銘文及圖像未見他書著錄（《兩周金文辭大系》襲用了《西清》的銘文摹本及綫圖，《雙劍謠吉金文選》據《西清》對此鼎作了釋文）。

第四，《西清》2.19著錄一件大鼎（周己伯鼎二），八十一字，銘文十分重要。傳世大鼎有三件，此其一。傳世尚有大簋蓋兩件（《三代》9.25.2，9.26.1），大簋一件（《三代》8.44.3），與此為同人所作之器。此鼎未見他書收錄。

第五，《西甲》14.2收錄一件號□子組鬲（周子縣鬲），此與傳世的號季氏子組壺

(《三代》12.16.3)、號季子組簋(《三代》8.7.2, 8.8.1, 8.8.2)可能是同組之器,此兩未見他書收錄。

第六,《西甲》12.44收錄一件走簋(周徒敦),爲他書所未錄(《大系》及《斷代》皆據此而作),此簋銘記年、月、日、月相俱全,且出現司馬井伯等人物,是件十分重要的銅器。銘中所記之作器者“走”,與宋代著錄的五件走鐘(周寶和鐘)之“走”可能是一個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49)。

第七,《西清》13.12收錄一件班簋(毛伯彝),銘文長達一百九十五字,內容記王令毛伯伐東國事。此簋的器形從未見於他書著錄,1972年在北京收集到其殘片,在修復此器的過程中得力於《西清》保留的器形作爲參照。

第八,《西甲》13.1收錄一件吳王御士尹氏叔姪簋(周叔綏簋),此簋未見他書著錄。1957年5月北京海淀區東北旺村也收集到一件銅簋,銘文與此全同(見《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5期),應爲一器。

第九,《西清》8.43著錄一件小子生尊(周內事尊),記王南征事,銘四十字,器已不知去向,惟《西清》保存了此尊的銘文及器形。

第十,《西清》8.33著錄一件麥尊(周邢侯尊),銘文長達一百六十三字,詳記王在辟雍乘舟射大龔禽舉行“大豐”典禮之事,此器銘文及圖像均未見他書著錄(《大系》據此翻製,《雙劍謠吉金文選》、《吉金文錄》皆據此而作釋文)。同人所作之器尚有鼎(《錄遺》91)、盃(《三代》14、11、4)、方彝(《西清》13、10)。其中麥方彝(周邢侯方彝)亦爲《西清》單獨著錄者。

第十一,《西清》19.8著錄一件呂行壺(周伯恭壺),記伯懋父北征事,未見他書著錄。

第十二,《西甲》16.9收錄一件庠壺(周齊侯鍾),銘文長達二百餘字,十分重要。後《商周金文錄遺》公佈了拓片,但器形只有依靠《西甲》的記載,別無他書著錄。

第十三,《西清》23.45收錄一件貝佳易觚(周貝觚),銘文十字,是觚中銘文較長者,未見他書著錄其器形。

第十四,《西清》32、16著錄一件奄鬯(周子孫匜),這件器形制類似龍山文化的陶鬯,因之被引用爲早期銅器的代表<sup>⑨</sup>。對這件器的真偽是有爭議的。筆者認爲此器本身不僞,因爲作僞者總要仿照不僞的來造,特別是乾隆年間的僞器多水平不高,往往可一眼看出其作僞的痕跡。此器形制特異,銅器中未見有第二件與此相類者,估計此器不會是僞作的。但其銘文却十分可疑,查帶奄族氏銘文的銅器多達百件左右,絕大多數爲西周早期或殷墟晚期的銅器,尚未發現一件可以早到殷墟中期以前者,而這件銅鬯顯然早於殷墟時期,所以我們認爲這件銅鬯上的銘文極有可能是僞刻的。若拋開銘文,這件

《西清》記錄下的銅禮器無疑是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最早的一件，這是十分有意義的。

上述十餘件器是就其銘文較重要者，類似的尚有許多。在一千一百七十八件有銘銅器中，器已不存，各家均未著錄，而銘文、形制賴“四鑒”得以保存至今者，總計有七百八十件，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因此“四鑒”保存資料之功是不可低估的。

“四鑒”在體例上基本上繼承了宋以來銅器圖錄的優良傳統，諸如詳記器物尺寸、重量、容量、器形由畫院供奉精描細繪，尤其是從考古所殘本看，銹斑、顏色均畢肖原物，較準確地保存了這批數量可觀的銅器的真實面貌。“四鑒”的銘文的摹本基本是可靠的，比如班簋的摹本與新收集到的班簋拓片對照，就出入不大。這些摹本雖不如拓本之真確可靠，但比之宋代的《考古圖》、《博古圖》等書幾經後世翻刻的摹本還是要準確得多。

“四鑒”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收錄偽器過多，經我們初步整理僅一千一百七十八件，有銘銅器中偽器就有三百二十件，疑偽之器七十三件，合計三百九十三件。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仿宋代著錄之器而偽作者有一百一十三件，如仿錄旁仲駒父簋（《博古圖》16.33）而作的偽器就有二十多件，仿周公作文王鼎（《博古圖》2.3）而偽作的器有十多件，看來仿宋代著錄之器而作偽是此一時期作偽的一大特色，因此，“四鑒”中凡與宋代已著錄之器相合者，基本上都是偽器。另外“四鑒”中凡言“錯金銀”者多屬偽器，在有銘銅器中約有二十多件這類偽器。還有許多銅器的銘文內容與器形之時代有顯著差別，有的銘文內容生編硬造，多數偽器偽銘並不難辨別。這樣看來，“四鑒”在編輯過程中，只是將宮中之器逐個取出照摹照畫而已，沒有作辨偽的工作。

“四鑒”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斷代籠統而多錯誤。其斷代意見冠於每器名之首，只有“商”、“周”、“漢”等字，十分籠統而模糊，而且錯誤很多。據我們統計，“四鑒”一千一百七十八器中將殷器誤斷為“周”的有二百五十九件，誤將周器斷為“商”的有三十六件。四件大晟編鐘及帝尊（周犧尊一，《西清》9.27）等五件器是宋代銅器，“四鑒”統斷為“周”器。易兒鼎（《西清》7.3）、之左鼎（《西乙》4.23）、廿七年寧鉶（《西乙》16.35）等五件戰國器被斷為“漢器”。上述“偽”及“疑偽”器三百九十三件自然其斷代也一律是錯的。這樣，“四鑒”一千一百七十八件有銘銅器中，斷代錯誤者達六百九十八件之多，接近總數的五分之三。可以看出，“四鑒”的作者們還不具備銅器斷代的知識，所定時代基本是不可信的。

“四鑒”存在的第三個問題是釋文及考證水平很低。由於辨偽工作沒做，以及斷代存在嚴重的錯誤，加上編纂諸官中沒有古文字學的專家，稍難辨認的古文字一概不識，這樣作出的釋文必然錯誤甚多，據此釋文再作考證，牽強附會，就更加錯誤了。其釋文及考證以今天的水準看，簡直沒有什麼可取之處。因此，我們讀“四鑒”，不理會其釋文及考證是完全可以的。

總的看起來，在辨偽、斷代、釋文、考證四個方面，“四鑒”尚未達到宋代人的水平<sup>①</sup>，這是因為宋代是我國歷史上古器物學、古文字學十分發達的時期，參與編纂各圖錄者多是當代著名的學者。而“四鑒”所選用的十八位編纂官，多數是當朝宰輔，學問一道在他們已是末節。

清王朝經過了順治、康熙、雍正幾代經營之後，國力鼎盛。乾隆是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在八旬大壽時曾得意地說：“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才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才得三，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其二則余所鄙也，即元世祖亦未如余之五代同堂……”云云<sup>②</sup>，他要炫耀其文治武功，要作中國歷史第一人，因此凡前代有的盛事他都要做。宋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圖》，極一時之勝。乾隆皇帝思仿效之，且欲過之，因而大興是役。但是，在我們看來，一部好的資料書，是要在較高的研究水平指導下，才能編得好，而這正是“四鑒”的作者們所缺少的。然而乾隆皇帝組織編纂“四鑒”，假朝廷之威力，萃天府之吉金，為後世留下如此珍貴的資料，其維系祖國文化之功是應該充分肯定的。對這四部金文書歷史地加以整理研究，作出公允的評價，這對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注：考古所彩繪本《西清古鑒》（殘本）上的六方鈐印承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先生鑒定，特致謝意。

## 注 釋

- ① 過去一般稱其為“西清四鑒”，而“西清”二字在這裏並非“清代”的別稱，故我們改稱“乾隆四鑒”。
- ② 容庚：《清代吉金書籍述評》，《學術研究》，1962年2期。
- ③ 筆者應中華書局之約，編寫了《乾隆四鑒金文綜理表》一書，對“四鑒”中千餘件銅器逐個作了辨偽、斷代、釋文、檢索著錄等項工作，本文即據上書的前言部分改寫而成。
- ④ 見《史記·司馬相如傳》，即昭明太子《文選》《上林賦》中句。
- ⑤ 《西清古鑒》前引乾隆皇帝諭旨。
- ⑥ 見文津閣《四庫全書》《西清古鑒》紀昀等校記。
- ⑦ 乾隆御筆寧壽宮銘云：“小子踐祚，茲歷卅載……歸政理得，適新是宮”。
- ⑧ 《清代吉金書籍述評》。
- ⑨ 陳孝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生，乾隆四十四年卒（1779年）。見嘉慶《松江府志》60：2。楊瑞蓮，見《翼馴稗編》2：43、（轉引自容庚《清代吉金書籍述評》註文）。
- ⑩ 《西清古鑒》序·跋。
- ⑪ 《清史稿》卷二一九列傳六《允祿傳》。



- ⑫ 《清史稿》卷二二〇列傳七《弘瞻傳》。
- ⑬ 《清史稿》卷三〇二列傳八九《汪由敦傳》。
- ⑭ 《清史稿》卷三一九列傳一〇六《于敏中傳》。
- ⑮ 《清史稿》卷三〇五列傳九二《董邦達傳》。
- ⑯ 《清史稿》卷三〇五列傳九二《錢維城傳》。
- ⑰ 光緒六年刊本《江西通志》卷一四一，及同治十二年刊本《南昌府志》卷三九《裘曰修傳》。
- ⑱ 光緒二十八年刊本《富陽縣志》卷一九《董邦達傳》。
- ⑲ 《清史稿》卷三四〇列傳一二七《董誥傳》；光緒二十八年刊本《富陽縣志》卷一九《董誥傳》。
- ⑳ 《清史稿》卷三五一一列傳一三八《金士松傳》。
- ㉑ 《清史稿》卷三二〇列傳一〇七《彭元瑞傳》。
- ㉒ 《清史稿》卷三六七列傳一五四《那彥成傳》；《清史稿》卷三一四列傳一〇一《玉保傳》。
- ㉓ 光緒二十八年刊本《富陽縣志》卷一九《董邦達傳》。
- ㉔ 《故宮所藏殿板書目》，1933年3月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排印。
- ㉕ 見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西清古鑒》三十二卷。
- ㉖ 楊伯達先生於1985年1月鑒定。
- ㉗ 《十朝東華錄》乾隆110云：“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二月辛未，上以來年八旬萬壽，命鑄八徵耄念之寶”。《御製記》曰：“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鑄古稀天子之寶，而即繼之日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天眷佑，幸無大隕越於茲，又浹旬矣，思有以付八旬開表之慶，鑄為璽，以殿諸御筆，蓋莫若《洪範》八徵之念……萬民恒在懷庶徵之八可不念乎！”
- ㉘ 李文信：《上京款大晟南呂編鐘》，《文物》1963年5期；陳夢家：《宋大晟編鐘考述》，《文物》1964年2期；鄭紹宗：《大和南呂中聲鐘》，《文物》1983年11期。
- ㉙ 安志敏：《中國早期銅器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81年3期；高廣仁，邵望平《史前陶器初探》，《考古學報》1981年4期。
- ㉚ 容庚先生在《清代吉金書籍述評》中，將《西清古鑒》與《博古圖》在繪圖、銘文、考釋、鑒別、排比五個方面作了詳細對比，讀者可參看，此不贅言。
- ㉛ 《十朝東華錄》乾隆一一〇，鑄八徵耄念之寶《御製記》。

（原載《中國考古研究》200～20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輯，文物出版社，1986年8月）



## 一九八八年甲骨金文研究

1988年甲骨、金文方面新發表的重要資料不多，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傾向於歷史的回顧、探討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和系統地整理舊有資料。

曾憲通對三十多年來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果作了扼要的概括（《中國語文》1期）。唐鈺明則從語法角度總結了這方面的狀況（《中山大學學報》4期）。

### 一

本年度共出版甲骨學專著四部，報導和論文三十餘篇。

姚孝遂、肖丁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中華書局），是一部大型甲骨文資料匯編。該書收入《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國所藏甲骨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懷特氏所藏甲骨文字集》等書中的甲骨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六片，去掉重出者實收約五萬片左右，是目前最完整的甲骨文資料匯編。書分上下兩冊，計一千一百六十二頁。書的體例是將卜辭分條摹寫列上，釋文對應於下。釋文除刪節號外不加標點，也不作註釋。該書的執筆者是何琳儀、吳振武、黃錫全、曹錦炎、湯余惠、劉釗六位青年學者，他們曾就學於著名古文字學家于省吾門下，受過系統的甲骨學訓練，因而釋文水平較高，能反映出甲骨學已有的研究成果，並能注意辨偽工作。本書的另一特點是力求通俗化，釋文用字盡量採用文獻中的對應字。這就為歷史、語言、考古以及其他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方便，使即或並不深通甲骨學的人也可以利用這批資料，大大擴展了這批資料的社會效益。

趙誠編著的《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中華書局）是一部具有可讀性的甲骨文詞典，體例新穎，頗便於初學者閱讀使用。該書共選甲骨文詞目兩千餘條，按內容分為二十六類，逐詞解釋每字的形、音、義，字詞的解釋能注意吸取前人和當代學

者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學術性和通俗性兼備的詞典。

劉一曼、郭振祿、徐自強編著的《甲骨文書籍提要》（書目文獻出版社）共收書二百三十七部，按著錄、考釋、研究、匯集、其他五項分類，每類中的書目按出版先後為序排列。除對每書的作者、版本、內容等加以介紹外，還附以簡短的評述，書後附編年簡目、著者索引、通用簡稱等，是一部切合實用的甲骨學工具書。

胡厚宣編集的《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四川辭書出版社）收錄了蘇聯國立愛米塔什博物館、聯邦德國西柏林民俗博物館、日本天理大學參考館三單位所藏及美國所見甲骨五百八十二片，用摹本五百七十六幅。

胡厚宣《國內四個文物商店所見甲骨》一文（《殷都學刊》3期），選擇介紹了北京（三片）、天津（四片）、廣東（三片）、雲南（五十片）四家文物商店新收集的六十片甲骨。並附以照片和摹本，這批甲骨多係私人收藏，寄售於上述文物商店，有的隨後又流散。該文保存了這批寶貴的資料。

運用甲骨文資料考察商史和商代典章制度，楊昇南提出商代統治者大量殺人祭祖是爲了獻人性於祖先，以擴充其在另一個世界中的奴隸隊伍；根據卜辭記載和考古發掘所見人性，他們的身份應是奴隸而不是俘虜（《歷史研究》1期）。徐喜辰對殷代的兵源和軍隊編制，田獵與軍事訓練的關係，以及戰時的後勤補給等問題，進行了論述（《吉林大學學報》1期）。再有黎虎討論了殷代的外交制度（《歷史研究》5期），鄭慧討論了殷代的婚姻制度（《史學月刊》6期）。

有一些文章利用甲骨文資料討論商代的方國地理問題。其中，張亞初提出甲骨文中的“叟”即蜀，蜀叟與商王朝之間曾有過十分密切的關係，並以此來解釋四川廣漢三星堆遺物中表現出的兩種文化特徵（《文博》4期）。連劭名（《文物》11期）、葉文寬（《殷都學刊》4期）二文，分別對殷人的方土觀念進行了探討，連文認爲甲骨文中的四方風名與八卦的四仲神名相合。

又有一些文章利用甲骨文資料討論商代的農業問題。趙錫元指出，我國是水稻原產地之一，考古發掘和古文獻都證實我國黃河流域早有水稻的種植。他認爲過去學者們將甲骨文中的“𥽿”誤認爲稻，將“秠”誤認爲野生旱稻是錯誤的。商代已大量種植水稻，過去被釋作“黍”的“沃”實爲稻字初文（《吉林大學學報》1期）。

周原甲骨出土後，圍繞商王宗廟名、受祭商王名和周方伯名等，學者們展開了熱烈討論，引起爭議的主要問題是這批甲骨的族屬問題，即這批甲骨是周人的還是殷人的？王宇信重申在《西周甲骨探論》一書的觀點，認爲周原甲骨是商人的廟祭甲骨。並根據古代禮制和宗法制度分析周人不可能在周原爲商王立廟祭祀商先王，周文王也不可能進入殷都對商王祭卜。但是這些甲骨爲什麼在周原出土呢？文章認爲是周人克商之後把商朝檔案庫中有關伐周的廟祭甲骨作爲戰利品劫回周原（《中國史研究》1期）。爲了

申述同一論點，王宇信還寫有三文（《史學月刊》1期、《考古與文物》2期、《文物》6期）。李學勤認為從周原卜辭看，這幾片卜甲是周人的，不是商人所卜。參照文獻，這很可能就是記錄命文王為西伯之事，因而周人卜官也參預其禮，並將所卜之龜携回周原（《人文雜誌》2期）。

## 二

本年度新公佈的有銘銅器共七十餘件，以江蘇丹徒北山頂土墩墓出土的銅器為最重要。《東南文化》3、4期合刊發表了該墓的發掘簡報，墓中出土十五件有銘春秋銅器。其中十二件編鐘具相同的銘文七十二字，人名字皆用國名，十分奇特。一些銘文透露出春秋時代江南諸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新發表的殷代金文資料，有安陽大司空村殷墓中出土的一批銅器（《考古》10期），屬殷墟二期。安陽郭家莊殷墓中出有簋銘與鼎銘（《考古》10期）。殷代的弄器除流散美國的王作□弄卣外（《美集錄》R188），極為少見，此簋自銘“弄彝”更屬僅見。《中原文物》1期報導了河南信陽羅山縣蟒張殷代晚期墓中出土的四件“息”字銅器，加上該墓地前兩次出土的二十三件息字族名銅器，共計二十七件。這對古息國地望的確定又增加了新的證據。《文博》3期介紹了河南新鄉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銅器，其中一件安陽出土的鼎銘文為族名，此鼎口部下方紋飾是一陽文，通常被稱作簡化饗饗紋，有同類紋飾的銅器多出於陝西部分地區和安陽，但極少有帶銘文者，此器銘文值得重視。

新發表的西周早期金文有山西省博物館收集的康生豆（《考古》7期），此豆有鑿，盤底有繫鈴殘鈕，銘為“康生作文考癸公寶尊彝”，這種西周早期的豆而有銘文的是極為少見的，值得注意。寶雞紙坊頭西周墓出土的強伯和矢伯銅器（《文物》3期），銘文字體工整，是強伯最早一代，據發掘者稱此地與隔渭水對岸的茹家莊、竹園溝同為強伯家族墓地。此外還有《中國文物報》9月23日報導河北遷安縣小山東莊村墓中出土的燕侯簋等。

西周晚期金文新發表的資料，有河南商水縣練集鄉出土的一件簠，其銘云：“原氏仲作淪母、□母、家母媵簠”（《考古》8期），記錄了原仲為其三個女兒所作媵器，三女同媵一簠，這在金文中尚屬罕見。另外，《中國文物報》1月1日報導湖北襄樊宜城縣朱市鄉出土蔡大善夫趨簠，作器者職官為“大膳夫”，在金文中也是首次出現。《中原文物》3期報導了河南禹縣吳灣西周墓出土諫簠、諫盃各一件，銘皆八字。

春秋戰國金文新資料除北山土墩墓銅器外，《文物》9期報導江蘇盱眙出土一匱，

銘云“工盧季生作其口會匪”，應是春秋晚期吳國銅器。陳萬千介紹湖北谷城春秋墓出土的一壘，銘有“惟正月初冬吉”一句，“初冬吉”為首次出現，它與金文中習見的“初吉”是什麼關係？待考（《考古與文物》3期）。《考古學報》4期報導湖北當陽縣河溶鎮春秋晚期楚墓中出土王孫靈簠。《文物》3期報導山西侯馬上馬村墓中出土吳叔徒戈，《中國文物報》4月22日報導湖北荊門市子陵崗墓中出土越王州句劍等，也都是春秋時代的銅器。

新出戰國金文多是刻在兵器上的，如《考古》7期報導山西太原電解銅廠揀選出的武陽左戈和二十七年安陽令戈，《文物》3期報導河北臨城縣東柏暢村窖藏的戰國兵器有燕王喜矛、二年邢令戈和柏人戈等。《中原文物》3期報導河南宜陽縣韓城鄉宜陽故城出土口陽戈。此外，還有《湖南考古輯刊》第4輯報導湖南桃源縣三叉港鄉三元村出土的戰國鼎和鳥書劍，湘潭縣易俗河墓葬出土的鳥書劍等。

本年度出版金文研究專著六部，較重要的論文二十多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大型金文集錄《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本年出版了第2、6、8三冊。第2冊的內容為鐘鐃類銘文之二，主要收錄曾侯乙墓所出六十五件編鐘（鐃）銘文的原大照片、拓片和摹本，以及第1冊未及收錄的若干新近出土的鐘鐃銘文。另外，還收錄了饒、鈴、鐸、鉦、鉦、句鑊等共七十件，其中十一件是過去不曾見於著錄的。第6冊至8冊的內容為簠類銅器的銘文，第6冊收錄一至十字的銘文，第7冊收錄十一至二十九字的銘文，第8冊收錄三十字以上的銘文，三冊共收簠銘一千四百三十件，其中二百零六件是首次公佈的新資料。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全書五冊。前已出版的第1、2兩冊，為九百二十五件商周時期重要銅器銘文的原大拓本，新出版的第3冊為五百三十三件商代和西周銅器銘文的釋文和註釋。所作釋文和註釋，能廣採各家所長並參以己見。為便於翻檢，又將所釋銅器銘文的拓本，全部縮小製版插入本冊。書末另附根據天文學研究成果和青銅器銘文內容重新推定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年曆表》，以供參考。此書收錄了商周時期銅器銘文中比較重要的資料，是一部重要的金文著作。金文選編之書，還有洪家義編寫的《金文選註釋》（江蘇省教育出版社），收錄重要銘文六十篇。

新出研究金文的論文有的是綜論性的，如吳鎮烽為紀念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週年，全面介紹了陝西青銅器的出土收藏情況，並論述了陝西地區銅器的特點、銘文內容和研究狀況（《考古與文物》5、6期）。文中還附有解放後窖藏統計表和解放後銅器墓統計表，文章指出解放後陝西境內出土有銘商周銅器一千餘件，占全國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三以上，而且歷來長銘重器多出於此，百字以上銅器有七十二件，五十字以上銅器一百五十四件。作者詳盡佔有陝西出土銅器資料，因而能全面總結陝西銅器研究的狀況，是瞭解陝西金文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章。

何幼琦批評了金文學界曆法斷代的方法，對吳其昌、張汝舟、榮孟源、劉啓益、馬承源、謝元震諸家的工作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認為是“有失無得”（《江漢論壇》10期）。該文是作者全面批評金文傳統斷代方法的第四篇文章。前此還發表了三篇（《西北大學學報》1984年2期、《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2期、《江漢論壇》1987年4期）。其中，1984年一篇是正面闡述作者的觀點，1985年一篇是批駁唐蘭的“康宮原則”，認為此種斷代法不能成立。1987年一篇認為王國維、郭沫若的標準器斷代法是“失多於得”。這幾篇文章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有關研究者注意。

綜論性的論文有：曹淑琴探討商代中期有銘銅器一文（《考古》3期），認為可判定為二里崗期的銘文銅器有十四件，殷墟一期的銘文銅器有七件，逐件討論，提出自己的看法。朱鳳瀚從周原出土青銅器看西周貴族家族一文（《南開學報》4期），分析了陝西周原出土的十四批窖藏和墓葬銅器銘文，指出銘文中表現出的世族制度是西周社會貴族家族的普遍存在形式，而這種世族制度與族長世官制度又是密不可分的。並運用周原出土窖藏銅器資料結合其他考古資料對西周貴族聚居形態進行了探討，指出貴族家族居址通常選在宗周王畿範圍以內，而與其封土不在一處，這就是金文中“邦”與“家”的具體所指不同之處。馮卓慧、胡留元對西周金文中的司寇的建置、職掌、官司組織、侯國司寇等作了分析，並圖示了金文中的司法機構（《考古與文物》2期）。

張志康、謝介民認為金文中卿事寮、大史寮之寮是僚友而非官署機構，卿事寮指武王時的“亂臣十人”，大史寮即《尚書·酒誥》中的“太史友”（《學術月刊》2期）。何光岳考證曾國（《長沙水電師院學報》1期）、應國（《江漢考古》2期）的論文，前者認為曾有姒、姬兩姓，兩曾國在歷史上都有遷徙的記載，山東新出土的上曾太子般殷鼎應是姒姓，隨縣曾侯乙墓的曾侯應是姬姓，但由於兩曾國交替更遷，傳世曾國銅器多數尚難以區分其姓別。後者歷述了應國從周初分封立國，後移封河南葉縣，又遷移到平頂山市郊，各個時期都有相應的銅器佐證。顧頡剛遺著（《文史》29輯）以金文為基本資料，而且信從唐蘭的“康宮”之說，將原屬周公時代的幾件銅器歸入康昭時代，認為在康王後期東夷曾經大反，康王命伯懋父東征北伐。楊善群把周公東征分為奔楚、克殷、南伐、東進、北征幾個階段。奔楚是周公為東征作準備，克殷是平定武庚與管蔡的叛亂，南伐主要是伐虎方、楚、畎。東進是討伐奄、薄姑，北征是征“方”。共歷時兩年半。文章沿用舊有的銅器斷代，而沒有採納唐蘭的新說（《中國史研究》3期）。

討論西周早期金文的論文，蔡運章推測金文中的“匭師”即今之“偃師”（《中原文物》4期）。朱楨、王健認為康侯簋中的沫司土遯不是文王子霍叔，也不是陶叔或季戴，周初三監沒有霍叔在內，是管蔡和武庚，限於材料，沫司土的身份尚無法確指（《殷都學刊》3期）。劉建國認為宜侯矢簋是中原銅器流於南方者（《東南文化》3期）。



討論春秋金文的論文，劉彬徽認為上郡府簠不是都器，而應是楚器（《中原文物》3期）。黃盛璋從新出鄴國銅器銘知其國族為嬴姓，該國春秋早期猶存，後為楚滅，地人為楚，成為楚貴族。曾侯乙墓遣冊中記有鄴國師助贈車馬，則說明至戰國中期楚仍封被滅鄴君後代承襲君位（《江漢考古》1期）。劉翔注意到黃君孟銅器記自作器時稱“黃君”，而為其夫人作器時稱“黃子”，前者是其身份，後者是其爵稱（《江漢考古》4期）。

討論戰國金文的文章，黃盛璋注意到《殷周金文集成》第5冊廿三年栳朝鼎是一件新發表的資料，銘中有“享陵”出現，此鼎銘的出現為楊寬、楊鴻勛反復爭論的享陵問題提供了有利於楊鴻勛的證據（《文物》11期）。黃盛璋的另一篇論文對解放後新出秦兵器若干考究不明者提出看法，對秦兵器的分國、斷代、制度、歷史、地理等作了有規律的闡述（《文博》6期）。

《江漢考古》4期發表的何琳儀、李零的兩篇文章，是深入討論湖南省博物館近年所獲銅量器銘文的論文。何文重點考釋銘中關鍵字詞如郊郢、羅、享月、七月等，並將銅量所載職官隸屬關係列表說明。李文釋量銘首字為燕，首句是以客使聘問楚王於紀郢之歲來紀年。並認為此器對楚國度量衡制度研究很有意義，過去發現兩種楚量，一種相當其半，自名為“筭”。一種相當其十分之一。此銅量自名為“荊”，與上兩種可配合使用，形成一組十進位升斗系列。李學勤考釋桃源三元村鼎銘為“中陽，王鼎”，從鼎式看，此王可能是楚王，墓主或即在中陽為王服役之人（《江漢考古》2期）。

（原載《考古學年鑑1989年》，93～99頁，中國考古學會編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



## 一九九〇年金文研究

本年度新發表的殷周有銘青銅器共 100 件左右，其中殷代 10 餘件，西周 70 餘件，東周 10 餘件，多數是字數較少的銅器。

西安市文物中心公佈了他們收藏的 63 件有銘文的青銅器，是最大的一宗，其中西安東郊老牛坡商代遺址出土的父癸豆，是殷代銅豆，為目前所見有銘文的銅豆中較早的一件（《考古與文物》5 期）。陝西麟游縣九成宮鎮出土一坑窖藏銅器，附近有早周遺址和西周墓葬，8 件有銘文銅器屬殷末或周初，銘文都是族名加日干父名，而且 8 件器上的族名無一相同，可以肯定不是一個家族的窖藏，這些不同家族間的關係應該怎樣理解？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考古》10 期）。寶雞市打擊走私文物收繳上來的一個銅爵有銘文 5 字，鑿內族名為“𠂔”，鑿左側有“作祖丁”3 字，柱上有一奇字，為一個由數字構成的符號，應讀為“八六一七六一七”，由七個數組成。若“A”可釋為六，那就是“八六七六七”，由 5 個數組成（《考古與文物》4 期）。張政烺曾考證這類由數字組成的符號是占筮符號，通常由 3 個數或 6 個數組成，即相當於《周易》的單卦和重卦，偶爾也見由 4 個數組成的。像這件爵上由 7 個數或 5 個數組成的却是第一次出現。這件爵上已有族名，那個由數字組成的符號就不應該再理解為族名，這件器名的出現為“占筮符號族名說”提出了反證，與此類似的中方鼎（《博古圖》2.17）、莒伯簋（《三代吉金文存》6.39）、史游父鼎（《三代吉金文存》3.18）、召仲卣（《西清古鑒》15.33）等銅器上的數字符號都應該理解為占筮記錄，而不是用作族名或人名。過去沒有族名和占筮符號同在一件器物上出現的先例，故人們疑心占筮符號就是族名。現在，這件爵銘的出現，提示我們應該重新認識銅器上標出占筮符號的含義。

西安文物商店收購的一件僕卣是銘文較長的一件西周早期銅器：“壬寅，州子曰：僕，余賜帛、囊貝，蔑曆女王休二朋，用作父辛尊。北單戈册册”（《考古與文物》5 期），州子受到王賞賜的帛和一囊貝，他將其中二朋貝轉賜給僕。“北單”為殷都附近地名。僕的族名“北單戈册册”，“北單戈”為殷代晚期盛行的族名，說明僕家族入西

周後仕於周爲作冊。該銘文僕字寫法與甲骨文相同，而異於西周金文，這也說明作器者還保留着殷人的書寫習慣。陝西淳化縣鐵王鄉西周墓中出土一鬲，銘爲“𠄎事正作寶彝”（《考古與文物》1期）。“𠄎事正”是一新出現的西周早期官名。陝西禮泉縣徵集到一件尊，銘爲“臣辰𠄎父乙”（《考古與文物》5期），作者以爲商器，同銘之器成組出於洛陽馬坡（見《美帝國主義劫掠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A331），皆爲西周早期器，估計此尊也應是西周早期器。

西周中期銅器新發表的有陝西長安縣張家坡出土的井叔方彝（《考古》6期）、岐山縣丁童村出土的矢叔簋（《考古與文物》1期）、西安徵集的鄧公鼎和庸伯鼎蓋（《考古與文物》5期）等，反映出西周中期邢、矢、鄧、庸諸國在陝西活動的情況。

西周晚期新發表的銅器有河南永城出土的鄭伯作宋孟姬匜（《中原文物》1期），永城原爲宋地，該匜對我們瞭解西周晚期宋鄭兩國的關係將會有所幫助。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一壺，銘爲“𠄎父丙”、馬王村出土一坑窖藏，有三鼎一壺，銘中皆有一相同的族名（《考古與文物》5期），在銅器上標寫族名的習俗盛行於殷末周初，西周中期銅器上已不多見，這幾件西周晚期器銘中的族名，對研究金文族名演變的歷史將是有意義的。

春秋時期較重要的銅器有陝西隴縣邊家莊13號墓出土的戈，戈銘有“宜”字標記（《考古與文物》3期），附近發現春秋早期陶片，地層明確，是目前發現最早的有銘秦戈，比傳世的秦子戈、矛都要早。山西榆社出土有吳王劍（《文物》2期），山東新泰縣發表了淳于公戈（《中國文物報》3月1日），李學勤介紹了在紐約克里斯蒂拍賣行看到的楚共王盍審所作的盞孟（《中國文物報》5月31日）。安徽壽縣發現一件春秋早期的簋，蓋上刻有一符號，是否文字，難以斷定（《文物》11期）。

戰國銅器較重要者有山東莒縣出土於原齊國故地的十年汧陽令戟（《文物》7期）、內蒙伊克昭盟出土的秦昭王十五年上郡守壽戟等。

本年度共發表金文研究論文50餘篇，較重要的研究殷或西周金文的論文有：張長壽根據1983~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長安灃西的發掘資料撰寫了一組論文，其一發表在《文物》7期，介紹了井叔家族墓地出土的井叔鐘、鼎、方彝、杯、達盨蓋等，結合傳世井叔銅器，排出井叔家族世系，並指出因爲這批銅器有確切的出土坑位和伴出器物，所以在西周中期銅器斷代上有重要意義。他的另一篇論文發表在第八次（太倉）古文字討論會上，該文根據達盨蓋銘文的年、月、月相、日的記載以及考古發掘大體擬定的王世，與傳世同時代的智鼎、趯觶等所記年月相比勘，再用得出的結論與現有的諸家擬定的西周金文曆譜對比，發現無一相合，而將馬承源曆譜中孝王元年移後一或二年則可相合。大家知道，現有諸家擬定的西周金文曆譜都處於假說階段，張長壽用考古發掘的新材料修正某種假說，使之趨於完善，應該說是使以往的研究擺脫困境的

一種嘗試，值得研究金文曆法學者們的重視。

殷璋璋對京郊琉璃河 1193 號大墓出土器物進行了分析，認為“燕侯舞錫”之舞就是文獻所說的召公之名奭，因而提出新出壺、盃的器主和墓主都是召公奭（《考古》1 期）。殷璋璋、曹淑琴還合寫了兩篇研究金文族名的文章，認為金文中的“光”、“丙”為殷代兩國族名，後成為西周的諸侯國（《考古》5、7 期）。劉雨認為長安張家坡新出的伯唐父鼎銘文記錄了西周王室的一次禘禮，對該禮儀注作了擬測，並結合銘中所記饗禮，定此器為穆王初年之器（《考古》8 期）。陝西社科院歷史所王雷生寫了研究師同鼎的文章，對該鼎的斷代、列鼎及疑難辭語作了解釋，提出了與李學勤不同的看法（《考古與文物》2 期）。曹錦炎對宜侯矢簋進行了討論，他同意日本學者白川靜的意見，認為過去稱作器者為虞侯是錯誤的，應為虎侯，即甲骨文中的虎方。該器不是吳器，與虞侯周章無關（《東南文化》5 期）。原著錄於巴納、張光裕《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匯編》156 號的鮮簋（該書誤作盤）銘文很重要，李學勤、艾蘭在《中國文物報》2 月 22 日公佈了該器的照片，並交代其現藏英國倫敦斯肯納齊商行，考證其作於穆王三十四年，該器王年、月、月相、日齊全，對研究西周曆法意義重大。此外，尚有張頌考釋山西曲沃所出常孳方鼎（《文物季刊》1 期）、張玉春考釋周初的天亡簋（《東北師範大學學報》4 期）、張震澤考釋匭侯盃（《遼海文物學刊》1 期）以及馬承源討論的西周金文中有關貯字辭語的文章（《上海博物館集刊》5 輯）等等。

研究春秋戰國銅器的論文有甌燕的懷疑樂書缶的文章，作者認為從形制看，該器應是戰國時楚國的莫缶，不是晉器。又認為錯金長銘只能產生在戰國時期，而不應出現在春秋中期。因此，這件器不可能是晉國著名執政樂書所作，不排除是古董商人偽造的可能性。按該器為容庚先生早年收藏，後捐獻給國家，一直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甌燕的懷疑值得討論。鎮江博物館劉興著文討論江蘇六合程橋出土的編鐘，認為鐘銘之“攻敵中終歲”應是吳王闔廬太子終參（《東南文化》4 期）。曹錦炎考釋了 1985 年山西榆社新出劍銘，認為此劍是吳王諸樊之弟吳季子之劍。因吳季子掛劍的故事饒有趣味，後世多事之人每附會其事。自清代以來，有多件偽造的吳季子劍傳世。這次出土了真劍，堪稱出土文物中一段佳話（《東南文化》4 期）。王輝和陳平發表了討論秦子戈矛銘文的論文，二人針對器主和宜地所指展開了爭論（《考古與文物》1 期）。

陳平和楊震還合寫了內蒙伊盟出土的十五年上郡守壽戈的考釋文章，他們排列已著錄的 12 件上郡守戈銘，指出秦戈有“冶工”出現，黃盛璋區分三晉與秦兵器的標準有修正的必要（《考古》6 期）。王貽樑考釋燕國兵器中的“作某萃鋸”之某為“七”字，與《穆天子傳》中的“七萃之士”互證，認為“七萃”應是燕王近衛部隊的名稱（《考古》2 期）。

本年度新出金文專著有吳鎮烽編纂的《陝西金文匯編》上下冊，該書拓本分

1949 ~ 1985年出土和徵集品、傳世品和補遺三部分，共收錄陝西出土的殷周有銘青銅器1037件，後附釋文和作者寫的兩篇研究陝西銅器的論文，其一《陝西西周銅器分期與斷代研究》、其二《陝西商周青銅器的出土與研究》。作者多年從事陝西金文研究，因而此書雖屬資料匯編性質，但也體現了作者的研究水平。另外本年度還出版了侯志義的《西周金文選編》和曹錦炎的《商周金文選》，是兩部從不同角度選編的金文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本年度又出版3冊，前此已出版的有鐘鐃等樂器（1、2冊），3字以上的鼎（4、5冊）和簋（6~8冊），新出版的第3冊為鬲、甗和1、2字的鼎，第9冊為盨、簠、敦、豆，第10冊為卣，至此1~10冊已出齊。該書共18冊，尚有8冊正在印製中。上海博物館馬承源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又出版了第4冊，內容為東周青銅器銘文釋文及註釋。

（原載《考古學年鑑1991年》103~107頁，中國考古學會編輯，文物出版社，1992年8月）

# 一代大師

## ——紀念唐蘭先生誕辰百年

1923年王國維為《殷虛文字類編》所作的序言中曾寫道：“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余所見得四人焉，曰嘉興唐立庵友蘭……嘗據古書古器以校《說文解字》……”

唐蘭先生先後在當時的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著名學府任教，曾代顧頡剛先生講《尚書》，並教授《詩經》、“三禮”和文字學。

抗戰爆發，他不甘心做亡國奴，隻身逃離北平，長途跋涉，歷盡艱險，繞道河內，到達昆明，就教於西南聯大。他開設的《說文解字》、《甲骨文》、《古文字學》等膾炙人口的課程，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學子的治學道路。據朱德熙先生講：“有的同學凡是唐蘭先生開的課一律都聽，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唐先生一生留下了數百萬字的學術著作。他在1935年發表的《古文字學導論》和1949年發表的《中國文字學》兩書，是我國現代意義上的最早、最完整的文字學理論著作。它們回答了我國文字學的範圍、歷史、起源、演變、收集、整理、研究、應用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在孫詒讓“偏旁分析法”的基礎上，又提出了集“對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歷史考證法”四位一體的綜合研究古文字的方法。唐先生講古文字課時，對自己的發明非常自信，說：“他們是小手工作坊，一個字一個字地認，我是機械化生產，一認就一串字。”唐先生用他建立的理論體系作指導，解決了不少十分難認的古文字的識讀問題，證明了他建立的方法論是有科學根據的。這正如朱德熙先生所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研究古文字是一件時髦的事，考釋甲骨金文的文章發表的很多。不過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沒有多少根據的胡猜。在甲骨方面發表過不少論著的葉玉森自己就承認考釋甲骨文字猶如射覆。立庵先生寫《古文字學導論》就是為了權陷廓清這種不科學的學風，力圖把古文字的研究建立在扎扎实實的科學基礎上。”他提出的中國古代文字構成“三書說”理論，是對東漢許慎以來的“六書說”的重大挑戰。



唐蘭先生的學術生涯，早期以甲骨文研究見長，在1934年他以北大講義為基礎寫的《殷虛文字記》一書，考釋出甲骨文74個字，其中對“屯”、“秋”、“羽”、“婦”等許多字的考釋已成為定論。1939年他發表的《天壤閣甲骨文存》一書，對王懿榮舊藏甲骨作了分項整理排列，同時也對卜辭作了一系列精闢的考證，如他對“惠”、“尋”等字的考證已被學術界所肯定。

他在晚年用力最勤、成績最大的是對先秦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他對銅器斷代研究曾有過兩個重要發現，早在1936年他寫了《周王猷鐘考》，考證現藏臺北故宮的宗周鐘的作器者“猷”，就是文獻所說的“周厲王胡”。當時的學者多認為宗周鐘是西周早期器，對他的意見並不以為然。在他去世前不久的1978年，陝西扶風縣齊村出土了著名的猷簋，1981年扶風莊白村又出土了五祀猷鐘，器物形制是西周晚期的，證實了四十多年前他的意見是非常有預見性的。

銅器斷代研究最早有王國維的“時王生稱說”，其後有郭沫若的“標準器斷代法”，郭老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一出，用金文進行銅器斷代的方法，從理論上說已建立起來。但是，郭老串聯的有銘西周銅器，放在成王時的明顯偏多，於理不合。如何改進郭老的斷代體系呢？1962年唐蘭先生發表了《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長文，指出西周金文中出現的“康宮”就是“康王之廟”。因此，凡記有“康宮”的銅器，其時代不得早於昭王。這就把郭老斷在成王時的令組器（方彝、尊、簋）、中組器（三鼎、一尊、一甗）、景尊、景卣、遣尊、遣卣，斷在康王時的麥組四器（尊、方彝、鼎、盃）等全都移到昭王，並與文獻所記昭王南巡的史實聯繫起來。又由於唐蘭認為“康宮”裏有“昭宮”、“穆宮”、“夷宮”、“厲宮”等，是昭、穆、夷、厲諸王的宗廟。因此，依此類推，凡記有上述諸宮的銅器，必是上述諸王之後的銅器。這樣，郭沫若原定在共王時的頌組器（鼎、簋、壺）就改定在厲王，原定在夷王時的克鐘就應改在宣王時等。此次夏商周斷代工程對陝西新出吳虎鼎的斷代處理，就使用了唐蘭先生的“康宮斷代原則”。唐蘭在六十年代提出的“康宮”斷代原則，目前找不到反證，並不斷被後出的銅器所肯定，已逐漸為多數學界中人所接受。

唐蘭對金文研究的另一貢獻，是他用金文資料系統地研究西周史。1986年由他的兒子唐復年整理發表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是一部總結他一生金文研究的力作，書中共引用了西周金文資料350件，計劃通過對全部西周金文的研究，結合文獻記載，重寫《西周史》。這一研究是建立在他的“康宮原則”斷代體系基礎上的，書稿作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他佔有了截止到七十年代末為止的新的金文資料，所以，可以說他的這一研究代表了這一學科在七十年代的最高水平。1995年故宮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唐蘭先生金文論集》，收集了他發表的金文論文45篇，他的學生張政烺先生在序言中寫道：“先生開始考釋金文在三十年代，初極認真，曾自謂以孫詒讓為榜樣，檢



查成績，實過之而無不及……然先生畢生精心之作，則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也。”給以了極高的評價。

唐先生在自己全新的文字理論指導下，對甲骨文、金文開展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多有創見。晚年又對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帛書、竹書，以及山西侯馬晉國盟書作了精闢的考證。

唐先生大半生站在講臺上，教書育人，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質人才，著名學者朱德熙、周一良、張政烺皆出自其門下。

唐先生治學嚴謹，涉獵廣泛，在考古學、音韻學、石刻、古代書畫等學術領域都作過很深入的研究，流傳下許多著作。

唐先生的一生與故宮有着不解之緣，早在1936年，他就在當時的院長馬衡先生的引薦下，做過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建國以後，於1951年受聘為故宮博物院設計員。1952年調到故宮後，他被聘為研究員，擔任陳列部主任、美術史部主任、副院長等職，並一直任故宮學術委員會主任至1979年去世。故宮學術研究的框架，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建立起來的。

故宮收藏先秦青銅器數以萬計，多數經唐先生悉心研究，1999年10月故宮博物院重新改陳的青銅器館，就是追隨唐先生的學術思想而設計的。館中銅器的斷代，貫徹了先生的康宮原則，在上百件有銘文的資料中，凡唐先生考釋過的銘文，一律使用唐先生的釋文。唐先生生前做了許多金文的白話翻譯工作，開始我們對此並不理解，以為大學者寫通俗作品，是一種精力上的浪費。可是當我們自己在編寫青銅器館的《改陳大綱》時，才恍然大悟，原來先生是在為廣大的故宮觀眾着想，讓艱深的青銅器銘文所記載的三千年前的歷史故事，為廣大觀眾看懂，除此之外，別無他途。於是，我們一方面把唐先生已做過的白話翻譯全文公之於眾，同時對大多數銘文較長的銅器，除作了釋文以外，也仿效唐先生的做法，寫了白話翻譯，受到廣大觀眾好評。

（原載《中國文物報》2001年2月14日第5版）

## 近出殷周金文綜述

《殷周金文集成》一書是收集古今中外殷周金文資料較為齊備的一部大型資料匯編，全書 18 冊，收器 11983 件（已除去中間空號）。第 1 冊 1984 年出版，收器截止於 1983 年，第 16 冊 1994 年出版，收器截止於 1988 年。該書各冊收器截止時間距今都已十餘年，這期間又出土和發現同類資料千餘件，現已由筆者和盧岩女士編輯成《近出殷周金文集錄》，該書正編收殷代金文 416 件，西周金文 500 件，東周金文 342 件，合計 1258 件。這部分新資料中有許多是非常重要的，現按器物時代先後擇要綜述如下：

1973 年 6 月，山東兗州縣李官村出土剡氏卣、爵各一件<sup>①</sup>，卣銘“剡册父癸”，爵銘“剡父癸”。器物出土於山東兗州地區，位於周初魯國封地之內。因此，發掘報告作者據《左傳·定公四年》“分魯公……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析，銘文所反映的可能即周初分給魯國的殷民索氏。河南羅山縣天湖地區多次成批出土帶“息”字銘文的鼎、尊、爵、觚、戈等 20 餘件<sup>②</sup>，羅山地區距古代的息國所在地不遠，該文作者分析銅器上的“息”字應指古息國。這兩批銅器的出土再一次證明，金文中大量出現的“族名銘文”，象“須句”、“無終”、“孤竹”一樣，其中有一些記錄的是古國名。

1991 年 11 月，陝西岐山縣北郭鄉農民取土時發現銅卣一件，鑒內銘“亞卣其”<sup>③</sup>三字，“卣其”是帝辛時貴族，3 件長銘文的卣現藏故宮。該卣形制為商代晚期，“卣其”二字又與 3 件卣銘中之人名一致，應為同人所作。這說明故宮所藏 3 件卣其卣，作器者確有其人，該器的出現為辨別故宮藏卣其卣之真偽問題增添了一正面證據。

陝西寶雞收集到一件西周早期的爵，鑒內銘“𠄎”，柱上銘“𠄎”，口內銘“作祖丁”三字<sup>④</sup>。“𠄎”是作器者的族名。柱上的銘文是一組數字，即後來由張政烺先生考證出來的八卦符號，可讀為“八六七六七”。其中“六”寫作“Δ”，為它處所未見，且共五位數字，亦不合“三”、“六”之常數，可能是一種特殊的占筮術記錄。

1994 年 12 月，陝西扶風縣法門鎮出土一件西周早期大型孟的殘底<sup>⑤</sup>，有銘文“王

作莽京中寢浸盂”。據羅西章先生稱，該盂圈足直徑達44.6厘米，重17公斤。有如此巨大之底部，估計盂全器可能重達百公斤左右，實為罕見。銘文稱周王自作，可見該盂必為周初王室宮寢之物。西周以來，出土器物雖多，但能確定為王室之器者，除晚期厲王胡的鐘、簋之外，並不多見。羅先生指出，此盂的出土對揭開莽京之謎並瞭解西周早期王室的氣度風格大有裨益。

1964年10月，山東龍口市（黃縣）蘆頭鎮出土一件西周早期鼎<sup>⑥</sup>，上有“句監作寶尊彝”六字。“句監”應是指稱句地之監國者，猶應地之監國者稱“應監”（應監甗，《殷周金文集成》883），榮地之監國者稱“榮監”（叔趙父鬲，《考古與文物》1982年4期）。蓋西周初年在各諸侯國都設了監國者。仲幾父簋（《集成》3754）銘云：“仲幾父使幾使於諸侯、諸監。”可見，凡封諸侯之地，同時也設監國者。西周初年，周王分封諸侯，用以藩屏宗周。這種政治統治制度很容易造成諸侯割據的局面，為保證中央政令在諸侯國得以貫徹執行，周初在實行分封制度的同時，也普遍建立了嚴格的監國制度。山東句地可能就在荷澤北面的“句瀆”一帶。《左傳·桓公十二年》稱“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杜注》“即穀丘也”。句國地並不大，連這樣規模的小國都要設監，可見周初監國制度之嚴。文獻記載西周史跡過於簡略，好像為了對付殷遺，只是在朝歌地區周圍設了管、蔡、衛“三監”，而西周早期建立普遍的嚴格監國制度這樣重大的政治措施，史書却付缺如，是西周金文記載為後世留下了這一珍貴的史料。

北京琉璃河1193號大型墓葬出土燕侯克壺、盃<sup>⑦</sup>，銘記周初召公之子第二代燕侯克受封的大封典禮以及克赴封上任、殺牲祖祭道神事<sup>⑧</sup>。周初封建諸侯，“大封禮”的儀注典籍失傳，賴此銘得以部分保存下來。

1993年初，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一件柞伯簋<sup>⑨</sup>，釋文如下：

惟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

在周。王命南宮率王多

士，師魯父率小臣。王夷

赤金十版，王曰：“小子、小臣，

敬有佑，獲則取。”柞伯十

稱弓，無廢矢。王則畀柞

伯赤金十版，誕賜稅見。

柞伯用作周公寶尊彝。

本銘是繼義盃蓋銘記錄了“大射儀”之後又一次明確記錄大射儀的銅器，說明《儀禮》所記“大射儀”確為西周曾實行過的“周禮”之一。此銘也是周王舉行的射禮，與義盃蓋銘所記相同，可能只有周王舉行的射禮方可以稱為“大射儀”。柞伯是銘

中多士小子的一員，參加周王舉行“大射儀”的“比耦而射”。他十發矢皆中靶的，“唱獲”最多，得第一名，因而被賜以十版金餅。周王在射前懸賞赤金十版，且獨畀柞伯一人，這些有關大射儀的具體儀節都是文獻中所未見的。

陝西長安縣張家坡西周洞室墓出土的伯唐父鼎<sup>⑩</sup>，應為西周穆王時器，銘文稱：

乙卯，王饗莽京，王  
 臚，辟舟臨舟龍。咸  
 臚，伯唐父告備。王格，  
 乘辟舟，臨臚白旗。  
 用射絳、釐虎、貉、白  
 鹿、白狼于辟池。咸  
 臚，王蔑曆，賜秬鬯一卣、  
 貝廿朋。對揚王休，用  
 作□公寶尊彝。

大意是說，在莽京，王行饗祭那一年的乙卯日，王將舉行臚祭禮，辟雍之舟靠臨船塢。臚祭禮準備好後，伯唐父向周王報告準備完畢。王到達，乘上辟雍之舟，在白旗下舉行臚祭。在辟雍的池水裏行射牲禮，所射有牛牲、帶斑紋的虎、貉和白鹿、白狼。臚祭禮舉行完畢，周王勉勵伯唐父，賞賜他一卣浸過香草的酒和十串貝。為宣揚周王的美意，作了這件紀念先輩□公置於宗廟的寶貴彝器。

《史記·周本紀》和《國語·周語》都有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的記載，蓋彼時白狼白鹿為名貴的野牲，為穆王所鍾愛。伯唐父鼎是穆王早期器，果然也有王射白狼白鹿的記載，這也許並非巧合<sup>⑪</sup>。

1998年第5期《文物》雜誌公佈了收藏於日本出光美術館的靜方鼎<sup>⑫</sup>，綜合諸家考釋，釋文如下：

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命  
 師中眾靜省南國相，  
 藝應。八月初吉庚申至，告  
 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  
 周大室，命靜曰：“司汝采，司  
 在曾、鄂師。”王曰：“靜，賜汝鬯、  
 市、采畢。曰用事。”靜  
 揚天子休，用作父丁  
 寶尊彝。

該鼎有師中奉命省南國藝應的記載，學者將其與昭王時的中方鼎、中甗等記昭王南

巡的器聯繫起來。該銘記賞賜銘文中有賜“采罍”的記載，殷末銅器有小子罍簋（《殷周金文集成》4318），銘云“命伐人方罍”。“罍”是地名，此處所賜采地可能即殷之罍地。

1996年8月，陝西丹鳳縣西河鄉出土一件西周中期的虎簋蓋<sup>13</sup>，有銘文161字，綜合各家考釋，釋文如下：

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  
新宮，格于大室。密叔入佑虎即  
位，王呼內史曰：“册命虎。曰：勗乃  
祖考事先王，司虎臣。今命汝，曰：  
“更厥祖考足師戲，司走馬御人  
眾五邑走馬御人，汝毋敢不善  
于乃政。賜汝載市、幽黃、玄衣、澆  
純、鑾、旗五日，用事。”虎敢拜，稽首，  
對揚天子不忒魯休。虎曰：“丕顯  
朕烈祖考善明，克事先王。肆天  
子弗忘厥孫子，付厥尚官，天子  
其萬年申茲命。”虎用作文考日庚  
尊簋，子孫其永寶，用夙夕享於宗。

該簋蓋作器者虎之文考為日庚，元年師虎簋中師虎的烈考也是日庚，二簋銘中之作器者皆名虎，應為同一個人。其祖考所司“虎臣”與“左右戲繁荊”亦當同為王之近衛部隊。師虎所司為左右戲繁荊，虎之所司除“更厥祖考足師戲”外，又增加“司走馬御人眾五邑走馬御人”的任命。可見虎簋所記册命較之師虎簋所記册命有所增加，按理說虎簋應晚作於師虎簋。因此，如果元年師虎簋是恭王元年的話，虎簋就應為恭王三十年。然而，茲事體大，西周中期恭、懿、孝三王若有一王在位30年以上的話，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西周年表》就需要重新安排。

1986年陝西安康縣出土史密簋<sup>14</sup>，器屬西周中期，銘文90字，綜合各家意見，釋文如下：

惟十又二月，王命師俗、史密  
曰：“東征。斂南夷：盧、虎、會、杞  
夷、舟夷，觀，不陟，廣伐東國。”  
齊師族徒乃執鬲、寬、  
亞，師俗率齊師遂人左□  
伐長必，史密右率族人、釐

伯、夔眉、周伐長必，獲百人。

對揚天子休，用作朕文考

乙伯尊簋，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銘文大意是說：周王命師俗和史密東征，會合南夷盧、虎、會的武裝以及杞夷、舟夷的部族武裝，炫耀武力，進行“觀兵”，然後大踏步前進，攻伐東部敵人。當地駐軍齊師族徒以及遂人的隊伍已先期俘獲了敵方的皐、寬、亞三個酋首。師俗率齊師遂人部隊從左路進攻敵軍長必，史密率領家族武裝以及釐伯、夔眉、周的隊伍從右路進攻長必，俘獲百人，取得勝利。

銘中的“觀”是西周金文中的特殊軍事術語，指“觀兵”。效卣“王觀於嘗”也是指觀兵於嘗地（《殷周金文集成》5433）。《周本紀》記武王伐紂，有“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古之“觀兵”是進行軍事威脅的一種戰爭手段，企圖以不戰而屈敵人之兵。“不陟”即班簋“否畀屯陟”之省，意指“大踏步地前進”<sup>⑮</sup>。

該銘中兩次提到齊師中有“遂人”部隊，值得注意。過去有的學者認為，西周有一套完整的鄉遂制度，軍隊的編制完全是和鄉黨組織結合起來的，六軍就是由六鄉的居民編制而成，鄉之居民又稱士和國人，只有他們在戰爭時才有資格參加軍隊。而遂野之氓沒有資格當戰士，在戰時只是充當糧草輜重的供應者而已<sup>⑯</sup>。這種觀點顯然是用希臘古代曾實行過的“軍事民主制”來套合《周禮》的鄉遂制度而得出的結論。根據史密簋所記述的情況看，這並不符合我國西周時代的歷史實際，起碼從西周中期開始，“遂野之氓”也在遂人的帶領下組成主力部隊參加戰鬥。

1984年11月，陝西耀縣丁家溝出土兩件殷簋<sup>⑰</sup>，屬西周中期，兩器同銘，各80字，釋文如下：

惟王二月既生霸丁丑，王

在周新宮，王格大室，即位。

士戍佑殷立中廷，北向。王

呼內史言命殷，賜市、朱黃。

王若曰：“殷，命汝更乃祖考

友，司東鄙五邑。”殷拜，稽首。

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寶簋。

其萬年寶用，孫孫子子其永寶。

此銘中周王命殷所司“東鄙五邑”。金文中曾多次出現以“五邑”為名的職官<sup>⑱</sup>。“五邑”是一個特殊行政單位，金文中有走馬、佃人、祝等職官，但却同時設有以“五



邑”為單位的同名官職。從殷簋銘的“東鄙五邑”看，此五邑應在東土某地，其餘內容則不可得知。

1997年8月陝西扶風縣大同村出土宰獸簋<sup>19</sup>，銘文129字，釋文如下：

惟六年二月初吉甲戌，王  
在周師象宮。旦，王格大室，  
即位。司土榮伯佑宰獸入  
門立中廷，北向。王呼內史  
尹仲冊命宰獸曰：“昔先王  
既命汝，今余唯或申京乃命，  
更乃祖考事。飢司康官王  
家臣妾僕傭，外內毋敢無  
聞知。賜汝赤市、幽亢、攸勒，用事。”獸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命，用作朕烈祖幽仲益姜寶  
簋簋。獸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銘有榮伯、師象宮等，皆西周中期人名地名，器應屬西周中期。王之宰官為王室的大管家，於此銘得以進一步證實。銘文記錄一次隆重的周王室的冊命典禮，在典禮上，王對宰獸增加任命，除繼續其父祖的職務外，另要求他管理康宮裏王家臣妾僕傭的出入事宜。

1992年，陝西長安縣里河引水工地出土吳虎鼎<sup>20</sup>，有銘文164字，綜合各家意見，釋文如下：

惟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  
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官夷  
官，道入佑吳虎，王命膳夫  
豐生、司工雍毅申厲王命：  
取吳葢舊疆付吳虎。厥北疆  
密人眾疆，厥東疆官人眾  
疆，厥南疆畢人眾疆，厥西  
疆莽姜眾疆。厥俱履封：豐  
生、雍毅、伯道、內司土寺臬。  
吳虎拜，稽首，天子休。賓膳  
夫豐生璋、馬匹；賓司工雍  
毅璋、馬匹；賓內司土寺臬

復、瑗。書尹：友守、史西。賓史

韋兩。虎拜，稽首，敢對

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

祖考庚孟尊鼎，其子孫永寶。

這是一篇轉賜土地的銘文。周王將原屬吳蓋的土地轉賜給吳虎，重申厲王之成命，標出四至，派員踏查封地，吳虎按有關禮節賓送有關官員皮幣。該銘有“王在周康宮夷宮”句，限定此器時代的上限不得超過夷王，又有“王命膳夫豐生、司工雍毅申厲王命”句，可判定此器施命於膳夫、司工之王必為厲王后之宣王、幽王中之一，而幽王在位不足18年，因而此王只能是宣王。這再一次證明由唐蘭先生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加以論證的“康宮原則”是西周銅器斷代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

這一階段公佈的一批長銘文編鐘資料值得重視。晉侯蘇編鐘是山西曲沃北趙村晉侯墓地出土的一組編鐘，其中14枚流散香港，1992年12月為上海博物館搶救回來，另2枚出土於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博物館聯合發掘的8號墓。編鐘分兩組，各8枚。銘文為刻款，共計339字，另有重文9字，合文7字<sup>②</sup>。綜合各家意見，釋文如下：

惟王卅又三年，王親適

省東國、南國。正月既生

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

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

既死霸壬寅，王僨往東。

三月方死霸，王至于葦，

分行。王親命晉侯蘇：率

乃師，左復，觀。

北復，□，伐夙夷。晉

侯蘇折首百又廿，執

訊廿又三夫，王至于

勳城，王親遠省師。王

至晉侯蘇師，王降自車，立南向。

親命晉侯蘇：自西北

敦伐勳城。晉侯率

厥亞旅、小子、或人先陷

入，折首百，執訊

十又一夫。王至，

淖淖烈烈，夷出奔。

王命晉侯蘇

率大室小臣

車僕從

逋逐之。晉侯折首百又

一十，執訊廿夫，大室小臣

車僕折首百又五十，執訊

六十夫。王唯返，歸在成周。公族整師，

宮。六月初吉戊寅，旦，王

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

曰：召晉侯蘇。入門，立中

廷。王親賜駒四匹。蘇拜，稽首，受駒以

出。返入，拜，稽首。丁亥，旦，

王郤於邑伐官。庚寅，旦，

王格大室，司工揚父入

佑晉侯蘇，王親賁晉侯蘇秬鬯、

弓、矢百、馬四匹。蘇敢揚

天子丕顯魯休，用作

元和錫鐘，用邵格

前文人，前文人其嚴在

上，翼在下，

數數彙彙，降余多

福。蘇其萬

年無疆，子子孫孫

永寶茲鐘。

銘文記載了在西周晚期某王三十三年，晉侯蘇奉王命討伐山東的夙夷，折首執訊，大獲全勝，周王勞師，並兩次嘉獎賞賜晉侯的史實。銘文除記載了這次重要的史書無載的戰爭之外，還為我們留下了兩項難得的記錄：一是記錄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個記時詞語。在一件器上有這麼完整的時間記錄，前所未有的，是我們探討西周曆法的重要材料。二是全篇銘文用利器刻出，且筆劃流暢規正，為我們研究西周晚期的冶金工藝提供了一個新的材料。

近年山西侯馬地區出土大批十分重要的青銅器，部分銅器被盜出境外，令人十分痛心。所幸經過各方努力，有的已被搶救並得到妥善保護。子犯編鐘就是其中一例。子犯編鐘一套兩組共計 16 枚，有關資料已在臺北《故宮文物月刊》<sup>②</sup>上發表，

本文不再贅述。銘文記錄了春秋時期晉文公在其舅父子犯的輔佐下出亡、復國，並經過城濮之戰大敗楚國、稱霸諸侯的歷程，印證了《左傳》所記“晉公子重耳出亡”的故事。

此外，陝西周原地區新出土的楚公冢鐘（《集錄》3）、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收集的戎生編鐘（《集錄》27—34）、三門峽出土的虢季編鐘（《集錄》86—93）、陝西眉縣出土的逯編鐘（《集錄》106—109）、江蘇丹徒出土的逯邲編鐘、編搏（《集錄》94—96）、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26件一套的王孫誥編鐘（《集錄》60—85）和黹編鐘（《集錄》51—59）、編搏（《集錄》98—105）等，除了其銘文十分重要外，它們對音樂史研究的價值也不容低估。

在新發現的春秋時期青銅器中還陸續出現了一些新的記時資料。如湖北谷城出土的麇兒壘記有“唯正月初、冬吉”<sup>②</sup>，可證明此時記時詞語中，在正月裏有“初吉”和“終吉”兩個“吉日”。張政烺先生早在數年前就對筆者指出該器對研究“初吉”的重要性。另外，湖北襄樊出土的鄭臧公之孫鼎（《集錄》355）記有“唯正六月吉日唯巳”，河南南陽出土的應侯之孫丁兒鼎蓋（《集錄》351）記有“唯正七月壬午”，等等。筆者曾撰《殷周金文中的閏月》一文，收集了10件帶有“正某月”的金文資料，考慮到“閏”字是戰國晚期才出現的新字，故推測“正某月”就是後世的“閏某月”。上述材料正是對該文的補充。該文發表後，有人提出反駁意見，並提出“正某月”也可能是“周王曆法的某月”的看法。此次本書收進的材料裏有山東臨淄出土的梁伯可忌豆<sup>③</sup>，銘記有“唯王正九月，辰在丁亥”一句，“王正九月”似不宜還講作“周王曆法的九月”，因為在衆多的載有記時詞語的銅器中，唯此一器記“王正”九月，無疑應該理解為“周王曆法的閏九月”。上述材料說明，從西周晚期開始，周王室的曆法中曾實行過帶有過渡性的“二月置閏”的“閏法”，大概進入東周以後，人們就掌握了“無中氣置閏”的規律，一律在年中“無中氣的月份”置閏了。這些新的資料為我們進一步探討兩周時代的曆法，特別是閏法，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資料。

總之，《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一書收進了《殷周金文集成》編成以後截止到1999年5月底出土和發現的全部殷周金文資料。正編收器1258件，附錄收器92件，合計1350件。該書體例，每器除銘文拓本及其說明外，還列有供學者參考的器形圖片和銘文釋文，書後附人名、官名、地名、族名索引和時代分期、著錄、出土地、現藏地等列表。這些資料的公佈將對先秦史的研究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 注 釋

① 郭克煜、孫華鐸、梁方建、楊朝明：《索氏器的發現及其重要意義》，《文物》1990年第7

- 期；《近出殷周金文集錄》581、889（以下簡稱《集錄》）。
- ② 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集錄》173、174、175、230、235、613、614、639、735、736、737、742、784、785、786、822、823、824、825、890、1067等。
- ③ 龐文龍、劉少敏：《岐山縣北郭鄉樊村新出土青銅器等文物》，《文物》1992年第6期；《集錄》925。
- ④ 《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4期；《集錄》905。
- ⑤ 羅西章：《西周王孟考》，《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1期；《集錄》1024。
- ⑥ 李步青、林仙庭：《山東龍口市出土西周銅鼎》，《文物》1991年第5期；《集錄》297。
- ⑦ 《考古》1990年第1期；《集錄》987、942。
- ⑧ 拙作：《燕侯克壘盃銘考》，《遠望集》（上）頁302，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
- ⑨ 王龍正、姜濤、袁俊杰：《新發現的柞伯簋及其銘文考釋》；李學勤：《柞伯簋銘考釋》，《文物》1998年第9期；《集錄》486。
- 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灋西發掘隊：《長安張家坡 M183 西周洞室墓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第6期；《集錄》356。
- ⑪ 拙作：《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考古》1990年第8期。
- ⑫ 徐天進：《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靜方鼎》；張懋鎔：《靜方鼎小考》；王占奎：《關於靜方鼎的幾點看法》；《集錄》357。
- ⑬ 王翰章、陳良和、李保林：《虎簋蓋銘簡釋》，《考古與文物》編輯部：《虎簋蓋銘座談紀要》，《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3期；《集錄》491。
- ⑭ 張懋鎔、趙榮、鄭東濤：《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義》，《文物》1989年第7期；《集錄》489。
- ⑮ 拙作：《西周金文中的軍事》，載《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 ⑯ 楊寬：《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八自”和鄉遂制度的關係》，《考古》1964年第8期。
- ⑰ 呼林貴、薛東星：《耀縣丁家溝出土西周窖藏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4期；《集錄》487、488。
- ⑱ 如虎簋蓋“五邑走馬御人”，《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3期；元年師兑簋“五邑走馬”，《殷周金文集成》4275；柞鐘“五邑佃人”，《殷周金文集成》133—139；救簋“五邑守堰”，《文物》1979年第2期；鄭簋“五邑祝”，《殷周金文集成》4297。
- ⑲ 羅西章：《宰獸簋銘略考》，《文物》1998年第8期；《集錄》490。
- ⑳ 穆曉軍：《陝西長安縣出土西周吳虎鼎》；李學勤：《吳虎鼎考釋》；張培瑜、周曉陸：《吳虎鼎銘記時討論》；《考古與文物》編輯部：《吳虎鼎銘座談紀要》，《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集錄》364。
- ㉑ 馬承源：《晉侯穌編鐘》，《上海博物館集刊》1996年第7期；《集錄》35～50。
- ㉒ 張光遠：《春秋晉文稱霸“子犯和鐘”初釋》；裘錫圭：《也談子犯編鐘》，《故宮文物月刊》





## 金文研究中的三個難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古文字學應該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二者關係十分密切。19世紀初，由法國學者商博良破譯古代埃及羅塞塔（Rosetta）石碑銘刻而形成的“埃及學”是近代考古學的開始。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文字資料，是最可寶貴的，它所傳達的歷史和文化信息的重要性，是任何其他資料所無法比擬的。

各地區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大都經歷了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我國青銅文化有別於世界其他民族青銅文化的特徵有兩個：一是有成組合的青銅禮器體系；二是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中國文字的起源，目前還找不到石器時代的有力根據。成體系的文字有金文和甲骨文，都出現在青銅時代。最早的金文資料出現在二里崗時期，早於商代晚期殷墟出現的甲骨文。早期金文的字體構形和詞語組合也都較甲骨文更原始。

早在漢代，就有學者開始對金文進行整理和考釋。許慎的《說文·序》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古文。”至宋代，有一批著名的學者注意對金文進行研究，他們的學術成果為這一學科打下了基礎。清代晚期以來，特別是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銘刻資料出土增多，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者出現，他們汲取了現代考古學的方法和經驗，對青銅器和金文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金文中的許多問題都已得到基本解決。存流至今仍未解決的一些問題，都是難度較大的問題，現就其中較重要者試舉三例加以說明。

### 一 特殊銘刻

現已知著有金文的青銅器約一萬三千件，其中有半數以上的銅器，僅銘有一兩個象形性很强的字。郭沫若稱其為“族徽”、“族氏”（《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陳夢家稱其為“族名”（《西周銅器斷代》），張振林有“家族標記說”（《對族氏符號和短銘的理

解》，中國古文字年會論文1990），吳其昌有“私名說”（《金文氏族譜》），日人白川靜有“特殊集團說”（《金文通釋》），林已奈夫有“旗上之物說”（《殷周時代的圖像記號》）等等，諸說皆能言之成理，各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部分器物上銘刻的內容，但終難以偏概全。因為這部分材料內容比較複雜，我們不妨暫稱其為金文中的“特殊銘刻”。

其實，早在宋代對金文中的“特殊銘刻”就有一定認識。如《考古圖》4·36木父己卣，釋文云：“木者，恐氏族也。”這類銘文雖少有文例比附，但多數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同形的字，而分析甲骨文中這些同形字的性質，則多是一些方國名、地名和人名。因此有理由推測，這些“特殊銘刻”中應該有一大部分是古代方國（地區）、家族以及個人的名號。殷周金文“特殊銘刻”中的古代方國名，被成功解讀的有三個例證：第一，郭沫若釋“𠄎”為“須句”（《金文餘釋之餘·釋須句》，後收入《金文叢考》）。第二，裘錫圭釋“𠄎”為“無終”（中國古文字學會年會論文，1990）。第三，遼寧喀左曾出土一壘，上有銘文“父丁、𠄎、亞兗”六字，唐蘭考其出土地為古“孤竹國”，其後李學勤考出其中“𠄎”就是“孤竹”兩字。上述三位學者將古代方國名與金文特殊銘刻聯繫起來的做法，為我們提示了一個研究的方向，即在研究金文特殊銘刻時，首先應全力找出古代方國的名稱，然後再分析銘文中的其他內容。依此類推，古方國名如“息”、“斟尋”、“房子”、“北子”等，也可以在銅器中找到相應的銘刻。

“特殊銘刻”中還有一些可以肯定為某貴族的家族名者，如“木羊冊”是微史家族的族名等。因此我們推測在“父丁、𠄎、亞兗”壘中“亞兗”應是孤竹國的一家族名。在“亞襄孤竹”方壘（《集成》9793）中，“亞襄”應是孤竹國的另一個家族名。而在“亞襄孤竹廼”鼎（《集成》2033）中，已知“孤竹”是方國名，“亞襄”可能是孤竹國中某家族的族名，“廼”就可能是“亞襄”家族的一個成員的私名。而“亞襄孤竹父丁室”卣（《集成》5271）的“室”有可能是“亞襄”家族中另一成員的私名。上述情況說明，金文特殊銘刻記錄古代方國、家族以及個人私名時，用詞簡短，且只用名詞。就是這些名詞也經常省略一部分，如“亞襄竹室”鼎（《集成》2362）將“孤竹”省為“竹”，“亞襄室”鼎（《集成》2427）將“孤竹”全省略，而《集成》386、1423、6986、7793、7794、11444六件器，只著家族名“亞襄”兩字，其餘內容則全部省略。

根據上述分析，在一件銅器上字數較多的族名金文，一般是分出方國、家族、私名等幾個層次的。其構成特點有三：一是只羅列名詞，不夾雜其他詞類和語法成分；二是某些方國名常以拼合得十分巧妙的合文形式出現；三是經常省減某些成分。這些特徵的形成，一方面因為國或族名稱是一種特殊的詞語組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該文字體系當時尚處於較為原始階段的狀況。這些族名銅器的時代，有的可以早到二里崗期，如1981年內蒙敖包村出土的𠄎卣（《內蒙古文物與考古》2期）。但多數屬商代晚期到

西周早期這段時間，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也還有少數殘存。

此外，也有一小部分特殊銘刻，其內容經考證，是表示該銅器的方位、功能，或是八卦符號等，並不屬於上述範圍。所以，對待特殊銘刻應持謹慎的態度，要作具體分析，不能一見到銅器上有字，就斷定是某族的族名（劉雨《殷周青銅器上的特殊銘刻》，《故宮月刊》1999.4）。

因為這類銘文沒有上下文例可以比附，多數傳世品又沒有明確的伴出資料可以查考，加之大家的認識和注意力還沒有集中。因此，至今得以確切考證的古國名，為數尚少。對家族名和私名的認識，也只有些零星的考釋成果。我認為對族名金文的研究，若想深入下去，首先應將非族名金文除外，然後，盡可能找到器物的出土記錄，弄清它和其他同出器物的關係，判定時代，以出土地點為綫索，結合甲骨文和文獻記載，搞清該族名與出土地的歷史淵源關係。族名金文反映了商周時期社會組織結構的真實狀況，對商周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這部分資料也是探索我國文字起源和文明起源的重要綫索。

## 二 月相詞語

西周金文中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記時詞語，其中“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是西周時期特有的記時詞語，商代和春秋以後都基本上不見這類記時詞語。“初吉”一詞，商代銅器銘文中不見，主要出現在西周金文中，但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裏，仍有少量記錄。上述記時銘文是我們考察西周曆法和年代的珍貴資料。王國維作《生霸死霸考》（《觀堂集林》），認為西周金文記時，是由上述四個月相詞語四分一月的。這個說法影響很大，近世研究金文的著名學者如郭沫若、容庚、唐蘭等都信從他的說法，稱其為月相“四分說”。後來又有學者根據《尚書》、《詩經》等部分篇章的記時詞語分析，提出“定點說”，即將上述四個記時詞語安排為每月四個時間段的四個固定日子。其實“定點說”只是比“四分說”縮小了時間的範圍，二者並無根本的不同。兩說有一個共同的困難，即一旦將金文中年、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俱全的銘文（算上初吉共63件）放入他們擬訂的曆譜中，都有10件左右不合。例外的銘文如此之多，其理論的可靠性，即令人懷疑。再後，有的學者意識到問題可能出在對“初吉”的認識上，“初吉”雖然經常與其他三個月相詞語同時出現，但並無法證明它也是月相詞語。於是有人提出初吉不是月相，而是“初干吉日”，即指每月的第一個“十日”。《夏商周斷代工程結論》就基本採納了這個意見，但《結論》本身顯示，將依此作出的金文曆譜與上述四要素俱全的63件銘文對勘，有8件銘文不合。這個結

果並不比“四分說”和“定點說”好多少，也很難令人信服。

我在80年代初提出金文“初吉”既不是月相，也不是“初干吉日”，而可能是古人通過卜或筮占諏吉日的結果（《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年11期）。用以證明這一想法的材料主要是穆王時的靜簋（《集成》4273）：

惟六月初吉，王在薳京，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官。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孚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剛、卿齒、荪師、邦周射於大池。靜學（教）無斁，王賜靜鞶褱。靜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母外姑尊簋，子子孫孫其萬年用。

在一件器中記兩個初吉，這是惟一的一篇銘文。一在六月，一在八月，兩干支日丁卯與庚寅相距僅84天，如果連續計算，靜簋所記兩初吉必然是一在月初，一在月尾，也就是說該器證明初吉也可以出現在月尾。還有人看到靜簋的“六月初吉”和“丁卯”之間插有記地詞語“王在薳京”，就將“丁卯”指屬七月，然金文通例是，在記時詞語間插入記地詞語，並不影響記時詞語的連屬性。比如：叔專父盃（《集成》4454）“惟王元年，王在成周，六月初吉丁亥，叔專父作鄭季寶鐘六……”，師晨鼎（《集成》2817）“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師眾宮，旦，王格大室”。上述盃銘是在記時詞語年和月之間插入記地詞語，鼎銘是在記時詞語干支日和時刻之間插入記地詞語。沒有人會認為盃銘的六月不連屬於元年，也沒有人會認為鼎銘的平旦時刻不發生在甲戌日。依此成例，靜簋的記時詞語“六月初吉”和“丁卯”間插入記地詞語也沒有理由把“丁卯”變成屬於銘文中並沒有的七月（《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年11期）。

當然，該年如果出現閏六月或閏七月，情況就可能不一樣。因此，我又對西周的置閏情況作了考察，在1993年寫成《西周金文中的閏月》一文，通過對金文材料的分析查明，西周在穆王前後是年終置閏，六、七月份不可能有閏月（《香港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3頁）。

能說明初吉性質的還有兩件師兑簋：

元年師兑簋（《集成》4274）：

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廟，即位。同仲佑師兑入門立中廷。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兑，足師和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賜汝乃祖市、五黃、赤烏……

三年師兑簋（《集成》4318）：

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大廟，即位。嗇伯佑師兑入門，立中廷。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兑，余既命汝足師和父司左右走馬，今余惟申京乃命。命汝毆司走馬。賜汝秬鬯一卣，金車：鞶褱、朱號、鞞、虎冪、熏里、右鞞、畫轉、

畫轡、金甬，馬四匹，攸勒……

兩簋爲同一人所作，內容連貫，相距僅一年多，連續計算，兩初吉相距 14 日，必有一初吉出現在月中，這說明初吉不是月相也不是初干吉日。目前，我們在找到新的證據前，只能把它理解爲“每個月的第一個吉日”。這樣的吉日，當然多數發生在每月的月初，但也不排除有少數可能發生在月中或月尾，如靜簋和兩件師兌簋所證明的那樣（《再論金文“初吉”》《中國文物報》1997.4.20）

通過上述論證，我認爲“初吉”的性質已經清楚。而且，金文曆譜排譜的實踐也說明，只要你把記錄年月日和初吉的 29 件銅器銘文排入譜中，必然導致有 10 件器左右不合譜，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組織人力作了多次試驗，無法擺脫這個怪圈，這無論如何也難於用“金文寫錯了”來解釋。初吉除外之後，王國維的“四分說”以及後來的“定點說”、“初干吉日說”等建立在初吉必限定在月初的理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是描寫月相的詞語，大家都沒有異議。“霸”爲月之光亮部分，“望”爲日月相望，這樣的理解，也基本可以爲衆人認同。但它們各佔據每月的哪一段時間，却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目前還都缺乏充分的論證。

西周有記年金文九十餘件，如果王世可以考定，用這些資料可以推出西周各王的最低金文王年。又有年、月、月相（指“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干支日四項俱全的金文 34 件，這些資料可以檢驗按銅器銘文所安排的王年和絕對時間是否恰當。陳夢家《西周年代考》指出：“《竹書紀年》和金文記年是復原西周年代的主要材料。”據《竹書紀年》所載武王伐紂應在公元前 1027 年，西周積年爲 257 年。根據現代天文學觀察，《竹書紀年》所記“懿王元年天再旦”是一次正確的古代日食觀測，這樣懿王元年即可定在公元前 899 年。而且，以上幾個年代定點，都與相應的考古地層標本碳 14 測定的年代接近。又據《史記》載共和元年爲公元前 841 年，此後宣王、幽王的年代都是已知王年。根據以上各定點，利用現代古天文學史知識推算，可以排出一個合理的《西周金文曆譜》，使 34 件有銘銅器成爲標準器，再附以銘文的內部聯繫和以考古類型學原理分析科學發掘品在器形、紋飾等方面的經驗，將可能基本解決西周金文的斷代問題。一個與所擬《西周金文曆譜》相容的《西周王年表》，也將得到大家承認。

### 三 越國金文

進入春秋以來，諸侯力政，金文字體在各國呈現出地方特色。楚、蔡、吳、越等南方諸國開始流行一種鳥蟲書，將畫作鳥或蟲的筆劃插入字體中，有時作實畫，有時作篆劃，撲朔迷離，在豐富的藝術想像中，爲後世識別這些文字製造了很大的麻煩。早年容



庚先生作《鳥書考》，開始注意對這類文字的研究，大部分楚、蔡、吳、宋等國鳥蟲書文字已得到正確的釋讀，惟獨對越國的這類美術字，毫無辦法，遂被稱為“奇字”。這類字主要銘刻在越國的兵器和樂器上，兵器上的字，多較為簡短，有時在劍柄端一周文字中，還每隔一字插入一個類似於字的符號，叫人琢磨不透。樂器上的文字則較長，有的還記錄一些歷史事件。比如“能原罇”，傳世兩件，一在北京故宮，一在臺北故宮，長期以來被稱為“奇字鐘”。因係故宮藏品，我們在1999年第4期《故宮月刊》上曾組織討論，其中曹錦炎細心分析銘文筆劃的虛實及走向，釋出了罇銘的大部分文字，認為其內容是記述邾、莒兩國發生糾紛，越國出面調停，在越國的主持下，三國訂立盟誓的過程。這是對這類文字釋讀首次取得的突破。可是，李學勤却認為，盡管可以釋出這些文字，但它們只起註音的作用，像《吳越春秋》所記“越人歌”那樣，並不能用它字面上的意義來釋讀銘文篇章的文意（《論“能原罇”》，《故宮月刊》1999年4期）。

類似的銘文還有現藏故宮的“之利殘片”等，目前尚未得到很好的考釋。一些劍柄上的文字，形體也十分奇怪，考釋者往往用聲音上的近似揣測其所代表的王名字，但依通常的筆劃分析所釋出的王名字與文獻所記王名字，出入較大，這種現象是否即如李學勤所說，當時有的越國文字只起註音作用呢？當然，說這些越國文字是註音字，也只是一種揣測，也很難加以證明。總之，越國文字的釋讀，難點尚多。到目前為止，成篇的可資對比參照的銘文僅有少數幾篇。因此，越國文字問題的最後解決，仍有待於地下更多資料的出土。

我國宋代以來的傳統金石學，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前身，他們對古代器物 and 銘刻所作的大量考據工作，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金文研究在本世紀之前，就從屬於傳統金石學。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之後，它在釋讀考古發掘出土的銘刻資料，進而解釋考古遺跡的歷史內涵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已成為現代考古工作的有力手段。因此，它本身存在的諸多問題，如本文所提到的三個難題，也要依賴考古學的不斷進步來求得解決。反過來，古文字學的進步，如金文族名等的研究，也將促進考古學諸如文明起源等問題的解決。

（本文系作者參加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屆年會提交的論文，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73~77頁，中華書局，2002年6月）



## 商和西周金文中的玉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巢湖的玉器討論會，對玉器毫無研究的我匆促上陣，介紹了金文資料中有關玉器的一些記載。事後，著名的玉器專家楊伯達先生鼓勵我把講的內容寫下來，我只好從命提筆寫了下面的內容。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文獻記載和出土文字資料較多，金文中僅春秋晚期的洹子孟姜壺（集成 9729、9730）、郕簋編鐘（集成 225 ~ 237）等個別銅器上的銘文記載了一些有關玉器的內容，已非重點。因而我着重把商和西周金文中有關玉器的資料羅列出來，供研究玉器的學者們參考，以了結這一段金玉良緣。本文《附錄》列舉了 36 條金文資料，其中 2 條屬商代晚期，其餘 34 條則屬西周時期。這當然不是資料的全部，金文用詞十分簡練，有一些資料歧義較多，難以判斷其是否確為玉器，本文凡遇此類資料則一律割愛。

我這裏談到玉器的內容肯定多數是外行話，還請諸位玉器專家多多批評指正。

### 一 種類

#### （一）璋

在本文《附錄》中，列舉商和西周金文中記錄璋的銅器有：1 鳧簋、7 庚嬴鼎、13 鮮簋、18 卯簋蓋、19 師遽方彝、20 競卣、21 大矢始鼎、22 甫簋、23 裘衛盃、24 頌鼎、25 史頌鼎、27 大簋蓋、28 五年琿生簋、32 吳虎鼎、35 膳夫山鼎等共計 15 件銅器。金文的“璋”一律寫作“章”，“玉”旁係文字繁化後加上去的形旁，“璋”是後起字。金文又有“𠄎璋”，如大簋蓋。“𠄎”有大的意思，“𠄎璋”大概就是“大璋”。“𠄎璋”兩字又有時合寫作“𠄎”，如庚嬴鼎、鮮簋等。也有的銘文則直稱“大璋”，如五年琿生簋“余惠君氏大璋”。從金文的記載看，“大璋”、“𠄎璋”顯然在規格上高

於一般的璋。如大簋蓋有一段話：“王令膳夫豕曰趨嬰曰：‘余既賜大乃里。’嬰賓豕璋、帛束。嬰令豕曰天子：‘余不敢吝。’豕以嬰履大賜里。大賓豕琕璋、馬兩；賓嬰琕璋、帛束。”王命膳夫豕向趨嬰傳達王命，將原屬於趨嬰的邑里轉賜給大，這時趨嬰賓送給傳達王命的豕的是一般的璋，而當大得到這個邑里之後，賓送給豕和趨嬰的却是“琕璋”，大是受益者，自然賓送的規格要高一些。《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玉人》等都記有“大璋”，說明《周禮》一書的記載是有所本的。但殷周金文中的璋到底指出土或傳世的哪種玉器？具體形制如何？金文本身並沒有明確的說明。師遽方彝有“賜師遽珣圭一、環（環）璋四”句。如果理解為珣字是形容圭的，環（環）字是形容璋的，則說明西周玉璋的形制有圓形的部分，這是金文透露的一絲信息，與傳統文獻對玉璋形制的描述大相徑庭，筆者難以肯定，謹錄以備玉器專家研究思考。

西周中晚期金文所記冊命典禮的結束部分，往往有一個重要的儀注叫“反入覲璋”，如頌鼎和膳夫山鼎所記，即周王對某貴族冊命以後，該貴族例需接受“命冊”，佩冊以出，然後再返回，向周王獻上專門用於覲見的璋，這種璋金文稱為“覲璋”，它是西周中晚期冊命禮中，被冊命者必備的貢品。從裘衛盃銘文的內容看，矩伯不惜破費大量的田地去和裘衛交換這種“覲璋”，可能也是準備在冊命禮中使用。

## （二）瓚

在本文《附錄》中，銘記“瓚”的銅器有：3 子黃尊、5 宜侯矢簋、6 榮簋、18 卯簋蓋、33 多友鼎、34 敵簋、36 毛公鼎。《詩經·大雅·旱麓》：“瑟彼玉瓚。”毛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正義：“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瓚是一種挹注祭祀醴酒的玉柄勺子，是裸祭等祭禮中的重要祭器，毛公鼎稱其為“裸圭瓚寶”，指明其為裸祭禮器的特性。在王的賞賜物中總是列於首位，且僅賜一件，凡賞賜物中有瓚，就表示王賜予該貴族祭祀的權利，所以它是一種有特殊意義的賞賜品。“瓚”在西周晚期銅器如多友鼎、敵簋、毛公鼎中又稱“圭瓚”，《詩經·大雅·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毛傳曰：“九命錫圭瓚秬鬯。”“圭瓚”與《詩經·大雅·旱麓》“瑟彼玉瓚”傳文所稱相同，蓋指對某貴族初命、再命等不會賜以圭瓚，只有接受多次冊命後，纔會賜以圭瓚，是規格較高的賞賜。

## （三）圭

《附錄》19 師遽方彝有“賜師遽珣圭一，環（環）章（璋）四”句。珣，也是玉之一種，其制不詳，用其形容圭的形制或質料，其意亦不詳。《附錄》28 五年琿生簋有“琿生則覲圭”句。圭，《說文》：“瑞玉也，上圓下方。”五年琿生簋所言之圭，是用於覲見的，如同上面所說的“覲璋”性質一樣。金文的“覲”字寫作“堇”，可以隸

定爲“覲”，也可以隸定爲“瑾”，在頌鼎和膳夫山鼎“反入堇璋”句中的“堇”，隸定爲“瑾”字，亦可講通。但一般說某貴族在接受冊命之後，向王獻上的玉器，當爲一件較貴重的玉器爲宜。而在五年琯生簋中“堇”作爲動詞使用，則只能隸定爲“覲”，若隸定爲“瑾”則不通。雙方鼎有“雙堇（覲）於王”句（《集成》2579）。《附錄》31 戾敖簋蓋有“戾敖覲，用豹皮于史孟”句。亦將“堇”字用爲“覲”。通觀金文，尚未發現“堇”字用爲“瑾”者。

#### （四）璧

《附錄》29 六年琯生簋有“伯氏則報璧琯生”句，《附錄》引戾敖簋蓋有“戾敖用報用璧”句。《爾雅·釋器》“肉倍好爲之璧。”《附錄》32 吳虎鼎有“賓內司土寺率璧”句，蓋指玉器之外圓倍於中孔者爲璧。

#### （五）環

《附錄》11 嗣鼎有“賜環……”句。《附錄》30 番生簋有“賜……玉環、玉琮”句。《附錄》36 毛公鼎有“……賜……玉環、玉琮……”句。《說文》：“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蓋指玉器之中孔與外圓同寬者爲環。

#### （六）璜

《附錄》15 縣妃簋有“賜汝……周（雕）玉黃（璜）”句。《附錄》28 五年琯生簋有：“報婦氏帛束、璜”句。《說文》：“璜，半璧也。”

#### （七）玕

《附錄》4 獻鬯卣有“子賜獻鬯玕一”句。《說文》：“玕，石之似玉者。”《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醫無閭”爲山名，是遼寧陰山山脈松嶺之峰，據云山中所產美石即有珣、玕、琪等。

#### （八）琮

《附錄》14 守宮盤有“賜守宮……琮朋”句。《說文》：“琮，璫玉也。”《玉篇》：“崑山出璫玉也。”“朋”是古代貨幣的計量單位，估計琮朋可能是珠狀玉而成串聯者，或將玉雕成貝狀而成串聯者。崑山，當指崑崙山，自古崑山以產玉而聞名於世。

#### （九）琥

《附錄》23 裘衛盃有“矩或取赤虎（琥）兩”句。《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

紋”。《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所謂雙琥，與環、璧同賜，顯然並非兵符。出土和傳世的秦及先秦虎兵符，皆銅製，如杜虎符（《集成》12109）、新郢虎符（《集成》12108）、陽陵虎符（《秦金石刻辭》卷一）、東郡虎符（《長城那方》德國多特蒙德1990）、南郡虎符（我在早年參觀河南省博物館時曾筆錄過該虎符）、櫟陽虎符（英國富士比拍賣行1941年拍賣品）、王命車駐虎節（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等，不見有玉虎符。從裘衛盃銘文內容看，講的是用土田交換赤色玉琥，兵符豈可隨便賞賜交換，因此金文中的玉琥，與兵符無干。據賈峨先生云，陝西寶雞茹家莊一號墓、光山寶相寺黃君墓、浙川下寺楚墓、平山中山王墓等均出土了虎形玉器，器上皆有穿孔，應為飾物，有的成為構成“雜佩”的組件。

#### （十）珣

《附錄》19 師遽方彝有“賜師遽珣圭一，環（環）章（璋）四”句。珣為何物，其制不詳。

#### （十一）瑞和珉

《附錄》2 六祀卣其卣有“卣其賜作冊玼（瑞）一、珉一”句，《說文》：“瑞，以玉為信也。”指可作為憑信的玉。“玼”字是否能釋為“瑞”尚難肯定，若可釋為“瑞”，則說明“瑞”也是一種玉器。《說文》：“珉，石之似玉者。”六祀卣其卣的作器者是作冊玼，他的族徽是亞獫狁，職務是史官“作冊”。卣其的族徽也是亞獫狁，可見他們是同一家族的。瑞和珉是卣其賞給作冊玼的賜品。

#### （十二）聃琅

《附錄》3 子黃尊有子黃向周王獻“聃琅九”的記載，《說文》：“聃，耳垂也。”《說文》：“琅玕，似珠者。”聃琅估計是用珠玉作成的耳飾。

#### （十三）琲琮

《附錄》10 小臣傳簋有“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琲琮）”句；鬯鼎有“賜金一鈞、非余（琲琮）”句；番生簋有“賜……玉環、玉琮”句。《附錄》36 毛公鼎有“…賜汝……玉環、玉琮……”句。《說文》：“琲，珠五百枚也。”左思《吳都賦》“珠琲闌干”注：“琲，貫也，珠十貫為一琲。”《集韻》“琮，美玉。”琲琮，可能指精美的玉珠串。金文中的“令”字有賞賜意。三器所言玉器都是賞賜物品。

#### （十四）佩

《附錄》8 寓鼎有“寓獻佩於王后”句；《附錄》17 癸簋有“王對癸懋，賜佩”

句。這裏，寓向周王后所獻的佩、王賜給癸的佩，可能即《詩經·女曰鷄鳴》的“雜佩以贈之”、“雜佩以問之”、“雜佩以報之”的“雜佩”，亦即考古發掘中多次出土的“組玉佩”。《附錄》9 戎卣、尊銘有“戎佩玉人”句，據賈峨先生考證，作為佩飾的玉人，最早當屬曲沃北趙晉侯墓地 8 號墓出土於墓主腰間的玉人，該玉人為一組玉佩中的一件。其後，有河南三門峽上村嶺、浙川下寺、固始侯古堆、隨縣曾侯乙、平山中山王以及廣州南越王等墓葬中都先後出土過帶鑽孔的佩玉人。（賈峨《兩周“雜佩”的初步研究》，收入楊伯達主編的《傳世古玉辨偽與鑒考》頁 125～180，紫禁城出版社，1998 年）。

## 二 量詞

金文中的玉器數量一般用數字表示，置於玉器名之後，如《附錄》19 師遽方彝“賜師遽珣圭一，環（環）章（璋）四”、《附錄》3 子黃尊“玼琅九”、《附錄》22 甫簋“師黃寶甫璋一”等。也有部分玉器以專用的量詞表示，一般數詞置於量詞之前。如：

### （一）珏與穀

《附錄》18 卯簋蓋有“賜汝……璋四穀”句；《附錄》26 鄂侯御方鼎有“王賜御〔方璋〕五穀”句。可證璋可以稱穀，蓋“穀”與“珏”皆指成對的玉器。《左傳·僖公十八年》“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公，皆十穀。”注：“雙玉曰穀。”《附錄》1 卣簋有“王賜卣幽玉十丰（珏）璋”句。“丰”字不識，或釋爲珏，《說文》：“二玉相合爲一珏……穀，珏或從穀。”金文量詞一般後置，此句中量詞“珏”置於璋之前，屬特例。

### （二）朋

《附錄》14 守宮盤有“賜守宮……琮朋”句，一般金文朋以計貝，蓋指兩串或若干串貝。本銘中琮亦以朋計，估計琮可能是珠狀玉而成串聯者，或將玉雕成貝狀而成串聯者。

### （三）品

《附錄》12 尹姑鬲有“賜玉五品”句，《附錄》13 鮮簋有“裸玉三品”句。金文中不止玉器稱品，凡以類相從之物皆可稱品，稱“幾品”即表示“幾種”之意。

### 三 用玉

#### (一) 賞賜

金文中出現的玉器多數是賞賜品，如《附錄》1 鳶簋：記商王賞賜給鳶幽地的玉璋十對；2 六祀卣其卣：記卣其賞賜其同族史官作冊紆瑞、珏各一件；3 子黃尊：王賞子黃玉瓚一件；4 獻鬯卣：記子賞賜獻鬯玕一件；5 宜侯矢簋：記周王賞賜宜侯矢玉瓚一件；6 榮簋：記周王賞賜榮玉瓚一件；7 庚嬴鼎：記王賞賜庚嬴琕璋一件；10 小臣傳簋：記師田父賞賜小臣傳琕琰一件；11 鬲鼎：記濂公賞賜鬲玉環；12 尹姑鬲：記天君賞賜尹姑五種玉；13 鮮簋：記鮮被周王賜予王裸祭用的大璋一件，另有裸祭用的玉器三種；14 守宮盤：記周師賞賜守宮一串玉珠；15 縣妃簋：記伯犀父賞賜縣妃雕有花紋的玉璜；16 鬲鼎：記內史賞賜鬲一串玉珠；17 癸簋：記周王賞賜癸一件玉佩；18 卯簋蓋：記榮伯賞賜卯玉勺一隻、玉璋四對；19 師遽方彝：記王賞賜師遽珏圭一，環璋四；20 竟卣：記伯犀父賞賜競璋；21 大矢始鼎：記王賞賜大矢始玉璋；26 鄂侯御方鼎：記王賞賜御方璋五穀；30 番生簋：記王賞賜番生玉環、玉琰等玉器；33 多友鼎：記武公賞賜多友一件圭瓚；34 敵簋：記王賞賜敵圭瓚；36 毛公鼎：記王賞賜毛公裸祭用的寶物玉勺子一件，還有玉環、玉琰各一件……。

#### (二) 覲見

在金文中用於覲見的玉器有覲璋和覲圭兩種。如《附錄》23 裘衛盃：記矩伯以田地與裘衛交換覲見用的玉璋。《儀禮·覲禮》的儀注有郊勞、致館、覲見、將幣、賞賜等等。《周禮·小行人》記載贊幣的配合是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綉、璜黼等。裘衛盃所記矩伯與裘衛交換的覲璋、赤琥、鞶鹿、鞶韜等，都是在覲見禮中進行“將幣”時，要獻上的玉幣和皮幣。24 頌鼎：記頌在冊命禮中向周王獻納覲璋。35 膳夫山鼎：記膳夫山在冊命禮中向周王獻納覲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說明此種覲見禮遲至春秋時仍在執行。28 五年琯生簋：記琯生向召伯虎獻納覲圭，是下級貴族向上級貴族獻納的贊幣。

#### (三) 貢獻

金文記有貴族向王或王后貢獻玉器。如《附錄》：3 子黃尊：記子黃在王家宗廟裏朝見周王，向周王貢獻玉耳環九具。8 寓鼎：記寓向王后貢獻一件玉佩。28 五年琯生



簋：記琯生向王后貢獻大璋。

#### (四) 賓贈

王派使者出使或視察某地，接受使者的當地貴族，例需向使者賄贈禮品，在金文中稱“賓”。如《附錄》22 蒍簋：記王命蒍和叔絳父去給吳姬送一套餐具，吳姬之夫師黃賓贈使者蒍一件玉璋。25 史頌鼎：記王命史頌去蘇地視察，蘇地酋首賓贈使者史頌玉璋。27 大簋蓋：記王令膳夫豕向趯嬰傳達將其領地趯嬰里轉賜給大的決定。趯嬰賓贈使者豕一件玉璋。大在得到邑里之後，賓贈王的使者豕大璋一件，賓贈趯嬰大璋一件。32 吳虎鼎：記周宣王命膳夫豐生和司土雍毅重申厲王生前曾發佈過的命令，將吳蓋舊有疆界的土田交付吳虎，吳虎賓贈膳夫豐生和司工雍毅玉璋，賓贈內司土寺鞶璧。

#### (五) 報答

禮尚往來，金文中記錄了一些受惠於人的貴族，往往要向施惠者還報玉器以表示感謝。如《附錄》28 五年琯生簋：記琯生報答傳達王后之命的王后女官婦氏一件玉璜。《附錄》29 六年琯生簋：記琯生將部分附庸土田獻於召伯虎，召伯虎則還報琯生玉璧。31 夙敖簋蓋：記子牙父賜魯夙敖十鈞青銅料，夙敖則用璧報答子牙父。看來在西周晚期，用作還報之禮的玉器，主要是玉璧與玉璜。

#### (六) 佩帶

金文中記錄了一些玉器是用作佩飾的，如《附錄》9 戎卣、尊：記作器者戎佩戴玉人。8 寓鼎：記寓向王后貢獻一件玉佩。17 癉簋：記王為報答癉的盛德，賞賜他一件玉佩。

#### (七) 祭祀

金文中有一些器銘記有賞賜“瓚”或“圭瓚”的，瓚是一種挹注祭祀醴酒的玉柄勺子，是裸祭等祭禮中的重要祭器。賞賜“瓚”或“圭瓚”，就意味賜予該貴族祭祀的權利。如《附錄》3 子黃尊、5 宜侯矢簋、6 榮簋、18 卯簋蓋、33 多友鼎、34 散簋、36 毛公鼎等七件器記錄了“瓚”的賞賜。7 庚嬴鼎：記王賞賜庚嬴一件用於裸祭的大璋。13 鮮簋：記鮮被賜予王裸祭用的大璋一件，另賜裸祭用的玉器三種。

### 四 產地

金文中有些玉器名與文獻記載結合考察，可以瞭解其產地的信息。

### (一)《附錄》1 崑簋

記商王賞賜崑幽地的玉璋十丰（穀），幽地在陝西柁邑縣，幽字的字形尚有爭議，但其是某地名則是肯定的。

### (二)《附錄》4 獻鬯卣有“子賜獻鬯玕一”句

《說文》：“玕，石之似玉者。”《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醫無閭”為山名，是遼寧陰山山脈松嶺之峰，山中所產美石即有珣、玕、琪等，玕是所產玉料之一。

### (三)《附錄》14 守宮盤有“賜守宮……琰朋”句

《說文》“琰，璵玉也。”《玉篇》“崑山出璵玉也。”崑山，當指崑崙山，自古崑山以產玉而聞名於世。

## 五 價值

《附錄》23 裘衛盃銘記錄了一次用田地交換玉器的事件，反映了西周中期玉器的實際價值。該銘記矩伯與裘衛交換一件覲見用的玉璋，玉璋的價值是八十朋貨貝，折合成田是十田。矩伯又與裘衛交換了一對紅色玉琥、一對皮披肩和一件皮圍裙，玉琥與兩件皮貨的價值是二十朋貨貝，折合成田是三田。田是指經過開墾的土地，一田大約相當一夫所種的土地，如以一田百畝計，十田千畝，是相當大的一片田地。又終西周一世，超過百朋的賞賜為數極少，所以八十朋貨貝在當時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因為當時商品經濟尚不發達，交換的程序是先用等價物貨貝的數目來表示玉器的價值，然後把貨貝折合成田地的數目，再完成實物交換。一對紅色玉琥的價值相比覲璋就小得多，加上一對皮披肩和一件皮圍裙纔值二十朋貝，折合三田。

## 六 功能

《附錄》9 戎卣、尊記：“戎佩玉人，佑宗彝將。”大意是作器者戎佩帶玉人，用來保佑宗廟彝器煮食祭品。可見當時的人已經有了“玉器可以闢邪，保佑佩帶者平安”等作用。

## 附錄

爲便於讀者與拓本對照，本附錄中的釋文皆依原行款書寫。多數難識字直接用文獻典籍中通用字隸寫，少數在（）號內隸寫出相應的字。個別難寫難認的人名地名等，與本文主旨關係不大者以“□”表示。銘文不清晰，以意補寫的字，用[]號表示。

1. 鳶簋 商代晚期 《殷周金文集成》3940（以下稱《集成》）現藏故宮博物院

釋文：

乙亥，王賜鳶

幽玉十丰（珏）章（璋），

用作祖丁彝。亞舟。

釋意：在乙亥這天，商王賞賜鳶幽地的玉璋十丰（斲），因而作了這件紀念祖父丁的彝器。鳶的族徽是“亞舟”。

2. 六祀卣其卣 商代末年帝辛時器《集成》5414 現藏故宮博物院

釋文：

乙亥，卣其賜作

冊野圭（瑞）一、珏一，用作

祖癸尊彝。在六

月，惟王六祀，翌日。亞獫狁。

釋意：在商紂王的六年，舉行翌日祭祀的六月，在乙亥這一日，卣其賞賜其下屬野，野的職務是史官作冊，賞他一個玉瑞、一個玉珏。因而作了這件紀念祖父癸的置於宗廟的彝器。族徽亞獫狁。

3. 子黃尊 西周早期 《集成》6000 1965年陝西長安縣大原村出土

現藏西安市文管會

釋文：

乙卯，子見在

大室。白□□

玨琅九、虫（侑）百

牢。王賞子黃

瓚一、貝百朋。子

光賞姒貝，

用作己寶□。龔。

釋意：在乙卯這天，子黃在王家宗廟的大室裏朝見周王。獻上玉耳環九具、祭牲百牢。周王賞賜子黃一件玉瓚、一百串貨貝。子黃又光賞一個叫姁員的人。因而做了這件寶貴的彝器，以紀念祭名爲己的先輩。子黃的族徽是𠄎。

#### 4. 獻鬯卣 西周早期《集成》5373

釋文：

子賜獻鬯

玕一。獻鬯

用作丁師彝。

釋意：子賞賜獻鬯一件玉玕，獻鬯因而作了這件紀念先人丁師的彝器。

#### 5. 宜侯矢簋 西周康王時器 《集成》4320 1954年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 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釋文：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

成王伐商圖，誕省東國圖。

王蒞于宜，入土，大饗。王命

虞侯矢曰：“遷侯于宜。賜□

鬯一卣。賞瓚一、搏彤弓一、彤矢百、

旅弓十、旅矢千。賜土：厥川

三百□，厥□百又二十，厥宅邑三十

又五，厥□百又四十。賜在宜

王人□□又七姓，賜奠七伯，

厥廬□又五十夫，賜宜庶人

六百又□□六夫。”宜侯矢揚

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釋意：在四月丁未這天，周康王察視當年武王伐商、成王東征的地圖，順便又察視了東方諸國地圖。王親臨宜地，頒賜胙土，舉行大饗典禮。王對虞侯矢說道：“遷於宜地作宜侯。賜你浸了香草的酒一卣，賞你祭祀用的玉勺子一件及搏鬥用的紅色弓一件、紅色矢百支、黑弓十件、黑矢千支。賜你土地：川地三百多……宅邑地三十五……賞賜宜地的屬於原商王的貴族十七姓，賞賜商人稱伯的地方長官七位，奴隸一千零五十人，賞賜宜地庶人六百多。”宜侯矢爲答謝並稱揚康王的美意，作了這件祭奠先父虞公父丁的彝器。

#### 6. 榮簋 西周早期 《集成》4121 現藏故宮博物院

釋文：

惟正月甲申，榮

格。王休賜厥臣

父榮瓚、王裸

貝百朋。對揚天子

休，用作寶尊彝。

釋意：在正月甲申這天，榮到達了這裏。周王褒獎並賞賜叔父大臣榮祭祀用的玉勺子一件和王用於裸祭的貝一百串。爲答謝天子的美意，榮作了這件用於祭祀的寶貴彝器。

#### 7. 庚嬴鼎 西周早期 《集成》2748

釋文：

惟二十又二年四

月既望己酉，王

客（格）珣官，衣事。丁

巳，王蔑庚嬴曆，

賜裸輶（輶璋）、貝十朋。對

王休，用作寶鼎。

釋意：在某周王二十二年四月，月相爲日月相望之後，在己酉日這一天，王到達珣官，舉行大的祭典。八天後的丁巳日，王勉勵和獎賞庚嬴，賜她裸祭用的大璋一件、貝十串。爲答謝王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寶鼎。

#### 8. 寓鼎 西周早期 《集成》2718 現藏故宮博物院

釋文：

惟十又二月丁丑，寓

獻佩於王后，王后賜寓

曼絲。對揚王

后休，用作父壬寶尊鼎。

釋意：在十二月丁丑這天，寓向王后獻上了一件玉珮，王后賞賜寓美絲。爲答謝王后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祭奠先父壬的寶貴彝器。

#### 9. 戎卣、尊 西周早期 《集成》5324、5916

1981年陝西長安縣花園村15號墓出土 現藏陝西省文管會

釋文：

戎佩玉人，

佑宗彝將。

釋意：作器者戎佩帶玉人，用來保佑宗廟彝器煮食祭品。

#### 10. 小臣傳簋 西周早期 《集成》4206

釋文：

惟五月既望甲子，王〔在莽〕

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年，

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琲琮），傳

□朕考𠄎（恤工），師田父令余

□□官，伯俎父賞小臣傳□，

〔揚〕伯休，用作朕考日甲寶。

釋意：周王在莽京，在王命師田父去成周發佈政令的那一年，五月份，日月相望後的甲子那一天，師田父賜予小臣傳精美的玉珠一串。小臣傳繼續進行先父的工程，師田父命我管理某官，伯□父賞小臣傳。爲報答宣揚伯□父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紀念先父日甲的寶貴彝器。

11. 嗣鼎 西周早期 《集成》2659 1929 年洛陽出土

現藏故宮博物院

釋文：

王初□于成

周，濂公蔑嗣

歷。賜環□□□，

嗣揚公休，用作父

辛尊彝。𠄎

釋意：在周王初建成周（洛陽）的時候，濂公勉勵嗣，賜他玉環等物品，嗣爲宣揚濂公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祭奠先父辛的彝器。嗣的族徽是𠄎。

12. 尹姑鬲 西周中期 《集成》754

釋文：

穆公作尹姑宗室于

繇林。唯六月既生霸

乙卯，休天君弗望（忘）穆

公聖葬明，𡗗事先王，

格於尹姑宗室繇林。

君蔑尹姑曆，賜玉五

品、馬四匹。拜，稽首。對揚

天君休，用作寶齋。

釋意：尹姑之夫穆公在繇林爲尹姑家族建立宗廟。在六月上半月的乙卯日，偉大的王太后不忘當年穆公理智光明，輔佐先王，親臨尹姑家族的宗廟繇林。王太后勉勵尹姑，賜玉五種、馬四匹。尹姑拜，叩頭。爲答謝太后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寶鼎。



## 13. 鮮簋 西周中期（穆王）《集成》10166（誤作盤）

釋文：

惟王三十又四祀，唯五月  
既望戊午，王在莽京，禘  
于昭王。鮮蔑曆，裸王軌、  
裸玉三品、貝二十朋。對王  
休，用作子孫其永寶。

釋意：在周穆王三十四年五月，日月相望後的戊午日，穆王在莽京，禘祭昭王。鮮受到勉勵，被賜予王裸祭用的大璋一件，裸祭用的玉器三種、貝二十串。為答謝穆王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後世子孫永遠實用的彝器。

## 14. 守宮盤 西周中期 《集成》10168

釋文：

惟正月既生霸乙未，王  
在周。周師光守宮，使裸。周  
師丕飭，賜守宮絲束、苴  
幕五、苴幕二、馬匹、毳布  
三、團蓬三、琫朋。守宮對  
揚周師釐，用作祖乙尊。  
其百世子子孫孫永寶用，勿墜。

釋意：在正月上半月的乙未日，周王在周地。周地的長官周師光寵守宮，使他參加裸祭。周師很偉大，賞賜守宮一束絲、五張麻席、兩張麻幕布、一匹馬、三張毛地毯、三張可以翻卷的皮席、一串玉珠。守宮為答謝周師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紀念先祖乙的宗廟彝器。守宮後人世世代代子子孫孫永遠實用這件彝器，不要失掉。

## 15. 縣妃簋 西周中期 《集成》4269 現藏臺北中央博物院

釋文：

惟十又三月既望，辰在壬午，伯犀  
父休於縣妃曰：“獻乃任縣伯  
室。賜汝婦爵、𠄎之戈、周（雕）玉  
黃（璜）。” □縣妃敏揚伯犀父休，曰：  
“休伯哭𠄎卹縣伯室，賜君我，  
唯賜壽。我不能不𠄎縣伯  
萬年保。肆敢□於彝。曰：  
其自今日，孫孫子子毋敢望（忘）伯休。”

釋意：在閏十二月，日月相望後的壬午日，伯犀父誇獎縣妃說：“你能忠實的主持縣伯家族的內政。賜你命婦的爵位、畝地之戈、雕有花紋的玉璜。”縣妃稱揚伯犀父的美意，說：“偉大的伯犀父關心體恤縣伯家族，賜我家君的地位，這就等於賜我長壽。我不能不與我的丈夫縣伯萬年保有這一切。因此，我要在鑄造的彝器上，銘刻這樣的話：從今日起，子子孫孫不要忘記伯犀父的好處。”

16. 𠄎鼎 西周中期 《集成》2696 現藏故宮博物院

釋文：

內史令𠄎事，

賜金一鈞、非余（琲琮）。

曰：“內史龔朕

天君。”其萬年

用為考寶尊。

釋意：內史命𠄎去覲見天君太后，告訴她：“內史仍然效忠於我的太后。”

內史賞賜𠄎三十斤青銅料和一串玉珠。𠄎作這個鼎，萬年永用祭奠先父。

17. 癸簋 西周中期 《集成》4170—4177（八件同銘）

1976年陝西扶風縣莊白一號窖藏 現藏扶風縣周原文管所

釋文：

癸曰：“觀皇祖考司

威儀，用辟先王，不

敢弗帥用夙夕。”王

對癸懋，賜佩。作祖

考簋，其昇祀大神，大神

綏多福，癸萬年寶。

釋意：癸說：“偉大光榮的先父先祖，以堂堂威儀輔弼先王。我不敢不日夜仿效先輩的作為。”王為報答癸的盛德，賞賜他一件玉珮。癸作祭奠先輩父祖的簋，用它來昇祀祖先大神，大神降賜眾多福佑，癸萬年永寶此簋。

18. 卯簋蓋 西周中期 《集成》4327

釋文：

惟十又一月既生霸

丁亥，榮季入佑卯，立中廷。榮

伯呼令卯曰：畝（載）乃先祖考死司

榮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

司荈人。不淑取我家窠，用喪。今

余非敢夢先公有進逸，余懋稱  
先公官。今余唯令汝死司葬官、  
葬人。汝毋敢不善，賜汝瓚、章（璋）四穀、  
宗彝一肆寶。賜汝馬十四、牛十。賜于作  
一田、賜于宥一田、賜于隊一田、賜于戲一田。卯拜  
手、首手，敢對揚榮伯休，用作寶尊  
簋。卯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釋意：在十一月上半月丁亥這一天，榮季進入榮家宗廟，助佑卯，立於宗廟庭院中央，榮伯宣佈任命說：“從前你的先祖們主管榮公家政，過去你的祖父也曾命令你父親主管葬地人員。不幸啊，上天取走了我家的光榮，我的父親榮公去世。今天我不敢夢想比先公還有發展，我榮幸的被任命繼承了先公的官職。今天我命你主管葬地的宮室和人員，你不能不善待其事。賜你玉勺一隻、玉璋四對、宗廟用青銅彝器一套。賜你馬十四、牛十頭。賜於作地一田、賜於宥地一田、隊地一田、戲地一田。”卯以手相拜，以頭至手相拜。為答謝和宣揚榮公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置於宗廟的寶簋，卯的子孫後代萬年永遠寶用它。

#### 19. 師遽方彝 西周中期 《集成》9897

現藏上海博物館

釋文：

惟正月既生霸丁酉，  
王在周康寢，饗醴。師  
遽蔑曆，侑。王呼宰利，  
賜師遽珣圭一，環（環）章（璋）  
四。師遽拜，稽首。敢對  
揚天子丕顯休，用作  
文祖它公寶尊彝。用  
介萬年亡（無）疆，百世孫子永寶。

釋意：在正月上半月的丁酉日，周王在周地康王廟的寢宮，舉行大饗典禮。師遽受到勉勵並被尊為典禮的佑者。王呼大臣宰利，賞賜師遽珣圭一件，環璋四件。師遽以手相拜，叩頭。為答謝和宣揚天子非常顯赫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祭奠有文才的祖父它公的寶貴彝器，用以祈求師遽家族萬年無疆，後世子孫永遠寶藏。

#### 20. 競卣 西周中期 《集成》5425 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

釋文：

惟伯犀父以成師  
即東，命戍南夷。正

月既生霸辛丑，在  
 坏，伯犀父皇競，格  
 于館。競蔑曆，賞競  
 章（璋）。對揚伯休，用作  
 父乙寶尊彝，子孫  
 永寶。

釋意：伯犀父指揮成周洛陽的軍隊向東進發，奉命去抵禦南方的夷人部隊。在正月上半月的辛丑日，在坏地，伯犀父給競以榮寵。到了館舍，競受到勉勵，賞賜競璋。爲了答謝和宣揚伯犀父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祭奠先父乙的寶彝，子孫後代，永以爲寶。

21. 大矢始鼎 西周中期 《集成》2792

釋文：

惟三月初吉庚寅，  
 王在和宮，大矢始  
 賜友[曰]𡗗。王在華  
 宮，[宴]。王在邦官，始  
 獻功。賜□、賜章（璋）。王  
 在邦，[賜]始友曰考、曰  
 攸。大矢始敢對  
 揚天子休，用作文  
 考日己寶鼎。孫孫子子  
 永寶用。

釋意：在三月的第一個吉日庚寅這一天，王在和宮，王賞賜給大矢始一個僚友叫𡗗。王在華宮的時候，舉行宴會。王在邦宮的時候，大矢始向王匯報工程進展情況，王賜給他□和璋。王在邦地的時候，又賜給他兩個僚友，一個叫考，一個叫攸。大矢始爲答謝和宣揚天子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祭奠有文彩的先父日己的寶鼎。子孫後代，永遠實用此鼎。

22. 芮簋 西周中期《集成》4195 現藏上海博物館

釋文：

惟六月既生霸辛巳，王  
 命芮眾叔隸父歸（饋）吳姬  
 饗器。師黃賓芮章（璋）一、馬  
 兩。吳姬賓帛束。芮對揚  
 天子休，用作尊簋。季姜。

釋意：在六月上半月辛巳這一天，王命芮和叔隸父去給吳姬送一套餐具，吳姬之夫

師黃賄贈芮一件璋和一對馬。吳姬賄贈芮一匹帛。芮爲答謝和宣揚周天子的美意，因而作了祭奠亡母季姜的簋。

23. 裘衛盃 西周中期 《集成》9456 1975 年陝西岐山縣董家村一號窖藏出土  
現藏岐山縣博物館

釋文：

惟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  
王稱旗於豐，矩伯庶人取  
董（覲）章（璋）于裘衛，才八十朋，厥貯  
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琥）  
兩、鹿棗兩、棗斡一，才二十朋，其  
舍田三田。裘衛廼誓告於  
伯邑父、榮伯、定伯、隰伯、單  
伯，伯邑父、榮伯、定伯、隰伯、單  
伯廼令參有司：司土微邑、司  
馬單旃、司工邑人服、眾  
受（授）田幽趙、衛小子繇逆  
者（諸）其鄉。衛用作朕文考惠  
孟寶盤，衛其萬年永寶用。

釋意：在三年三月上半月的壬寅這一天，周王在豐地建旗議事，矩伯的下屬庶人從裘衛那裏拿了覲見用的玉璋，交換的價值是八十朋貨貝，折合成田是十田。矩伯又從裘衛那裏拿了一對紅色玉琥、一對皮披肩和一件皮圍裙，交換的價值是二十朋貨貝，折合成田是三田。交易協議達成後，因涉及以土地抵充貨貝的價值，裘衛將交易內容誓告於執政大臣伯邑父、榮伯、定伯、隰伯、單伯等，於是諸執政大臣就命令執行交換協議，命令任地方行政長官的參有司即司土微邑、司馬單旃、司工邑人服以及授田官幽趙、裘衛家的小子繇等，到場執行協議，交割田地，同時將交換的玉器和皮具也從鄉裏迎送出來，完成交換。裘衛因而作了這件紀念有文彩的先父惠孟的寶盤，裘衛家萬年永寶用之。

24. 頌鼎 西周晚期（頌組器共有八簋、三鼎、二壺，銘文基本相同。三鼎：《集成》2827 藏北京故宮、2828 藏臺北故宮、2829 藏上海博物館。）

釋文：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王在周康昭宮。旦，王格大  
室，即位。宰引佑頌入門立  
中廷。尹氏授王命書，王呼史

號生冊命頌。王曰：“頌，令汝官  
司成周貯二十家，監司新造貯  
用官御。賜汝玄衣黼純、赤市朱  
黃、鑾、旗、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  
命冊，佩以出，返入董（覲）章（璋）。頌敢對  
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  
考龔叔、皇母龔妣寶尊  
鼎。用追孝祈介康□、純佑、  
通祿、永命。頌其萬年眉壽，  
峻臣天子靈終。子子孫孫寶用。

釋意：在某周王三年五月下半月的甲戌日，周王在周地的康王廟中的昭王廟裏。太陽剛出來，王到達昭王廟的正殿大室，就位。大臣宰引助佑頌進入廟門，站立在廷院的中央。史官之長尹氏將擬定好的冊命書交給周王，王招呼史官號生向頌宣讀冊命書。王的冊命書說：“頌，命你領導成周地區市廛管理員二十家，監督管理新建的市廛及宮中所用物品。賜你的官服有綉了邊沿的黑色上衣和綴有深紅色帶子的紅色圍裙，賜你的車馬器有鑾鈴、旗幟和皮馬嚼子，執行任務。”頌以手相拜，叩頭。接受冊命書，佩帶以出，然後返回，獻納覲見周王專用的玉璋。頌爲了答謝和宣揚天子巨大顯赫厚重的美意，因而作了祭奠我偉大的先父龔叔和偉大的先母龔妣寶鼎。用來追念盡孝，祈求給以我健康、福佑、官運亨通、長命。頌祈求能够萬年長壽，永遠作天子的臣下，得善終，頌的子子孫孫能够永遠實用此鼎。

25. 史頌鼎 西周晚期（史頌組器有二鼎、八簋、一簋、一盤、一匜，銘文相同。）  
二鼎：《集成》2787、2788 著錄

現藏上海博物館

釋文：

惟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  
周。命史頌省蘇濶友、里君、  
百生（姓），帥壻盤于成周，休有  
成事，蘇賓章（璋）、馬四匹、吉金，用  
作蕭彝。頌其萬年無疆，日  
揚天子覲命，子子孫孫永寶用。

釋意：在某周王三年五月丁巳這一天，周王在西土的都城宗周地區。命令史官頌去視察蘇國，存問蘇國官吏僚友以及城鎮閭里的里君和地方一切宗姓首領，並將他們聚集於東都成周加以督導，工作進行得很有成效，蘇國國君賄贈史官頌一件玉璋、四匹馬和一些上等的銅料，因而作了蒸煮祭品的彝器。史官頌萬壽無疆，日日稱贊天子光輝的使



命，子子孫孫永寶用此鼎。

26. 鄂侯御方鼎 西周晚期 《集成》2810 現藏上海博物館

釋文：

王南征，伐角、遘。唯還

自征，在坏，鄂侯御方

納壺於王，王乃裸之，御

方侑王。王休宴，乃射。御

方卿（合）王射，御方休闌，

王揚，咸飲。王親賜御

[方璋] 五穀、馬四匹、矢五

[束]。御方拜手、稽首，

敢〔對揚〕天子丕顯休釐，

[用] 作尊鼎，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釋意：周王南征，討伐角、遘。在從征途返還時，在坏地，鄂侯御方向周王獻上一壺醴酒，王即以此酒舉行裸祭，在裸祭禮中，御方成為周王的侑者。在王的宴會結束時，舉行大射禮。御方與周王一起進行耦射，御方的矢止於侯框，王的矢從侯框的上方飛過，按射禮的規定，二人都飲了罰酒。周王賜御方五穀璋、四匹馬、五捆矢。御方以手相拜，叩頭。為答謝和宣揚天子給予的偉大顯赫的好處，因而作了這件置於宗廟的鼎，鄂侯御方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27. 大簋蓋 西周晚期 《集成》4298 現藏瑞典王宮、4299 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釋文：

惟十又二年三月既

生霸丁亥，王在歸偃宮，王

呼吳師召大賜趯嬰里。王令

膳夫豕曰趯嬰曰：“余既賜大

乃里。”嬰賓豕章（璋）、帛束。嬰令豕曰

天子：“余不敢吝。”豕以嬰履大賜

里。大賓豕鬯章（璋）、馬兩；賓嬰鬯

章（璋）、帛束。大拜，稽首。敢對揚天

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烈

伯尊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釋意：在某周王十二年三月上半月丁亥這一天，王在歸偃宮，王呼吳師召大，將趯

嬰里賞賜給他。王令膳夫豕對趯嬰說：“我將你的領地趯嬰里已經賞賜給大。”嬰賓贈豕一件玉璋和一束帛。嬰請豕回報天子說：“對將原屬我的邑里賜給大這件事，我不敢吝嗇。”豕與趯嬰、大經過踏查後，將趯嬰里賜予大。大賓贈王的使者豕大璋一件、馬兩匹；賓贈趯嬰大璋一件、帛一束。大以手相拜，叩頭，為答謝和宣揚天子的偉大顯赫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祭奠我光輝的先父烈伯的簋，大的子子孫孫將永遠實用此簋。

28. 五年珣生簋 西周晚期 《集成》4292 現藏美國紐約

釋文：

惟五年正月己丑，珣生有事，召來合（答）事。余獻婦氏以壺。告曰：“以君氏命曰：余老止公僕庸（附庸）土田多諫，弋（亦）伯氏縱許。公宕其參，汝則宕其貳；公宕其貳，汝則宕其一。”余惠於君氏大章（璋），報婦氏帛束、黃（璜）。召伯虎曰：“余既訊□我考我母命，余弗敢亂，余或至（致）我考我母命。”珣生則覲圭。

釋意：在周宣王五年正月己丑這一天，珣生向王后提出訴訟，召伯虎前來答辯。珣生向王后的女官婦氏獻上一壺。告訴她說：“王后曾頒佈命令說：我的管家止公的附庸土田多有爭議，這是召伯虎縱容手下人員的結果。現判決如下：關於有爭議的附庸土田，珣生取其參，召伯虎則取其貳；珣生取其貳，召伯虎則取其一。”我惠贈王后大璋，還報王后的女官婦氏帛一束、璜一件。召伯虎說：“我去世的父母對此事已有成命，我不敢私自變亂，若需要改變，我須向我去世的父母之靈重新請示。”珣生向召伯虎獻上覲見用的玉圭。

29. 六年珣生簋 西周晚期 《集成》4293

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釋文：

惟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菱。  
召伯虎告曰：“余告慶。”曰：“公厥稟貝，用獄諫。為伯有祗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  
余告慶。余以邑訊有司，余

典勿敢封。今余既訊，有司  
曰：「戾命。」今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伯氏則報璧琀生。對揚朕  
宗君其休，用作朕烈祖召  
公嘗簋。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  
享于宗。

釋意：（接五年簋銘文）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在周宣王六年四月甲子這一天，周宣王在周都葦京。召伯虎向周王報告說：“我向王報喜。”說：“止公琀生獻出其貨貝，纔解除了他的官司。我召伯虎敬慎其事，因而有成。這也是我先父幽伯、先母幽姜的成命所在，我報喜。我曾以邑里（即指所謂“附庸土田”）訊問有關官員，我對有爭議的邑里登記在冊，而不敢封樹。今天我又詢問有關官員，他們告訴我，已實現了先父母的成命。”我琀生既已將部分附庸土田登記在冊，並將其中的一部分按王后的判決獻於召伯虎，召伯虎則還報琀生玉璧。琀生為答謝和宣揚我的宗君召伯虎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嘗祭我的烈祖召公的簋。琀生其萬年子子孫孫寶藏此簋，用於宗廟祭享。

### 30. 番生簋 西周晚期 《集成》4326

現藏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美術陳列館

釋文：

丕顯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嚴  
在上，廣啓厥孫子于下，勗于大服。  
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丕杯元  
德，用申恪大命，屏障王位，虔夙夜溥  
求丕潛德，用諫四方，柔遠能邇。王  
命鞮司公族、卿事、太史僚，取徵二十  
鈞。賜朱市恩黃、鞞韃、玉環、玉琮。車  
電軫、鞞縶、朱鞞鞞、虎鞞熏裏、  
錯衡、佑軛、畫轉、畫輶、金童、金象、  
金簠、魚簠、朱旗旛、金芳、二鈴。番  
生敢對天子休，用作簋，永寶。

釋意：偉大光榮的先父祖，能够謹修其德，莊重的居於上天，廣泛關懷着他居於下界的子孫後代，使他們能够主持朝廷大政。番生不敢不遵循做法光榮的先父祖們醇厚偉大的美德，用以謹守大命，屏障王位，恭敬的日夜修煉偉大潛在的德。用以勸勉四方酋首，使遠近的部族皆能得到安寧。王命番生總管公族事物、行政機構卿事僚和太史僚，並主持兩造訴訟費達到二十鈞以上的訴訟。賞賜的官員命服有紅色的圍裙和青色的帶子，有皮佩綬

帶的刀鞘、環、琮等玉器。車馬器有架於軸上的軫、交叉纏有絲織物的車廂邊筐、車軾上的紅色皮包裹、車廂前方的虎紋黑裏的蓋布、交錯文飾的衡木、置於馬頸上部的軛、置於車轡和車軸上的皮固定件與轡、車輪上的銅箍件童與豕、銅的車廂圍籃、盛矢的匣、紅色的旗幟、青銅的旗杆、兩個鈴。番生爲了答謝和顯揚天子的美意，因而作簋，永遠實用它。

31. 戾敖簋蓋 西周晚期 《集成》4213

現藏故宮博物院

釋文：

戎獻金於子牙父百車，而

賜魯戾敖金十鈞，賜

不諱，戾敖用報用璧。用

召詣其佑子歆史孟，

戾敖覲，用豹皮于史孟。

用作寶簋，戾敖其子子孫孫永寶。

釋意：戎向子牙父獻百車青銅料，子牙父賜魯戾敖十鈞青銅料，賞賜是公開進行的，戾敖用璧報答子牙父。因而訪問佑者子歆史孟，戾敖覲見子牙父是由史孟促成其事，因而獻豹皮於史孟。作了這件寶簋，戾敖的子子孫孫永寶此簋。

32. 吳虎鼎 西周晚期（宣王） 1992年陝西長安縣出土

釋文：

惟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

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宮夷

官。道入佑吳虎，王令膳夫

豐生、司工雍毅申刺（厲）王命，付

吳蒞舊疆付吳虎。厥北疆涵

人眾疆，厥東疆官人眾

疆，厥南疆畢人眾疆，厥西

疆荅姜眾疆。厥俱履封：豐

生、雍毅、伯道、內司土寺衆。

吳虎拜、稽首，天子休。賓膳

夫豐生章（璋）、馬匹、賓司工雍

毅章（璋）、馬匹，賓內司土寺衆

璧。□書尹友守史西賓史

□□□。虎拜手、稽首，敢對

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

祖考庚孟尊鼎，其子孫永寶。

釋意：在十八年十三月上半月的丙戌日，周王在康王廟中的夷王廟。道作為吳虎的佑者進入夷王廟，王命膳夫豐生和司工雍毅重申厲王生前曾發佈過的命令：將吳蓋舊有疆界的土田交付吳虎。其四至邊界是：北與涵人疆界接壤，東與官人疆界接壤，南與畢人疆界接壤，西與葦姜疆界接壤。參加踏查田土的官員有：豐生、雍毅、伯道、內司土寺率等。吳虎以手相拜、叩頭，感謝天子的美意。賓贈膳夫豐生玉璋、馬匹、賓贈司工雍毅玉璋、馬匹，賓贈內司土寺率玉璧。制定文書的人員有尹友守史西、賓史□□等。虎以手相拜、叩頭，為了報答和宣揚天子偉大顯赫淳厚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祭奠我光榮的先祖考庚孟的鼎，吳虎的子孫永遠實用此鼎。

33. 多友鼎 西周晚期 《集成》2835 1980年陝西長安縣門門鄉下泉村出土  
現藏陝西省博物館

釋文：

惟十月，用玁狁方興，廣伐京師。

告追于王，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

京師。”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

于京師。癸未，戎伐郇，俘。多友乃

追，甲申之辰，搏于□，多友有折

首執訊。凡以公車折首二百又□又

五人，執訊二十又三人，俘戎車百乘

一十又七乘，衣復郇人俘。或搏于

龔，折首三十又六人，執訊二人，俘車

十乘。從至，追搏于世，多友或有折

首執訊。乃轍追，至于楊冢，公車折

首百又十又五人，執訊三人。唯俘

車不克，以衣焚，唯馬馭盡。復

奪京師之俘。多友廼獻俘、馘、訊

于公。武公廼獻于王。王廼曰武公曰：“汝既

靜（靖）京師，釐汝，賜汝土田。”丁酉，武公

在獻官，廼命向父召多友，廼誕

于獻官。公親曰多友曰：“余肇使

汝休，不逆，有成事，多擒，汝靜（靖）京

師。賜汝圭瓚一、湯（錫）鐘一肆、鐻

簋百鈞。”多友敢對揚公休，用作尊

鼎，用朋用友，其子子孫永寶用。

釋意：在十月，玁狁正起兵，深入攻打京師地區。報警於王，王命武公說：“派遣你手下的受過冊命的官員，進迫於京師地區。”武公按王的旨意命元士多友率領官府的兵車進迫於京師地區。在癸未這一天，戎攻打郇地，大肆俘虜掠奪。多友進行追擊，在甲申這一天，交戰搏鬥於□地，多友有斬殺擒獲。共以官府的兵車斬殺二百□十五人，擒獲玁狁酋首二十三人，俘獲戎人的戰車一百一十七乘，大量解救了被玁狁俘去的郇人。又交戰搏鬥於龔地，斬殺三十六人，擒獲玁狁酋首二人，俘獲兵車十乘。跟隨而至，追擊搏鬥於世地，多友又有斬殺擒獲。乃以兵車迅速追擊，至於楊豕地帶，官府的兵車斬殺一百一十五人，擒獲玁狁酋首三人。只是沒有能俘獲戰車，因為玁狁用大火將戰車焚燒，將馬也趕殺淨盡。又奪回在京師的被俘去的人和物。於是多友向武公獻俘虜、被斬殺的首級、和擒獲的玁狁酋首。武公把多友所獻轉獻於周王。周王於是對武公說：“你既已平定了京師地區，應該嘉獎你，賞賜你土地和田產。”在丁酉這一天，武公在獻宮，就命令向父向多友發出招見令，多友於是到達獻宮。武公親自對多友說：“我使你得到美差，你没有辜負我的任命，事情辦得很順利，獲得成功，你能有很多擒獲，是你平定了京師地區。我賞賜你一件圭瓚、精美的青銅鐘一排、青銅料一百鈞。”多友爲了答謝和宣揚武公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置於宗廟的鼎，用來與親朋僚友共同祭祀，多友的子孫後代永遠寶用此鼎。

#### 34. 敵簋 西周晚期 《集成》4323

釋文：

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  
遫、殳內伐溟昴、參泉、裕敏、  
陰陽洛。王命敵追御於上洛  
焞谷，至於伊，班。長榜截首百，  
執訊四十，奪俘人四百，獻於榮  
伯之所。於焞衣諱，復付厥  
君。唯王十又一月，王格於成周  
大廟，武公入佑敵告擒：敵  
百、訊四十。王蔑敵曆，使尹氏  
授釐敵圭瓚、□貝五十朋。賜  
田于敵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敵  
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尊簋。  
敵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釋意：在某周王的十月，王在東都成周，南淮夷遫、殳兩部入侵周領土的溟昴、參泉、裕敏、陰陽洛地區。王命敵奔追抵禦於上洛焞谷（今陝西商縣一帶），至於伊川，



班師。用長榜斬首一百，活捉酋首四十人，搶奪俘獲焜地人員四百，將這些俘獲都獻於榮伯之處。榮伯於焜地大講攻心戰術，將搶奪的焜谷四百人交還焜地之君。到十一月，王到達東都成周的太廟，武公入廟，輔佐敵向周王獻俘：共獻敵人首級一百、活捉的酋首四十人。（獻納的斬獲中果然不見搶奪的焜谷四百人）王勉勵敵，並使尹氏授予敵圭瓚和□地之貝五十朋。賞賜耕地於敵地五十田，於旱地五十田。敵敢答謝和宣揚天子的美意，因而作了這件置於宗廟的簋。敵其萬年子子孫孫永遠實用此簋。

35. 膳夫山鼎 西周晚期《集成》2825 1949年前陝西岐山縣出土

現藏陝西省博物館

釋文：

惟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  
戌，王在周，格圖室。南宮乎  
入佑膳夫山，入門立中廷  
北向，王呼史軫冊命山。王  
曰：“山，令女官司飲獻人于  
臯，用作憲司貯，毋敢不善。  
賜女玄衣黼純、赤市朱黃，  
鑾、旗。”山拜、稽首，受冊，佩以  
出，反入覲璋。山敢對揚天  
子休命，用作朕皇考叔碩  
父尊鼎，用祈介眉壽、綽  
綽、永命、靈終，子子孫孫永寶用。

釋意：在三十七年正月第一個吉日庚戌這一天，王在周地，到達圖室。佑者南宮乎輔助膳夫山，進入圖室門，立於廷中位置，面向北。王命史官軫冊命膳夫山。王說：“山，命你管理飲獻人於臯地，同時管理王室倉廩，你不敢不善待你的職事。賞賜你黑色的鑲着花邊的官服上衣，紅色的圍裙和大紅的帶子，鑾鈴、旗子。”膳夫山以手相拜、叩頭，接受命冊，攜帶出來，再返回去獻納覲璋。膳夫山爲了宣揚和答謝天子美好的冊命，因而做了祭奠偉大的先父叔碩父的鼎，用來祈求長壽、寬鬆、長命、得善終，我的子子孫孫要永遠實用此鼎。

36. 毛公鼎 《集成》2841 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 現藏臺北故宮

釋文：（全文略）

……賜汝秬鬯一卣、裸圭瓚寶、……玉環、玉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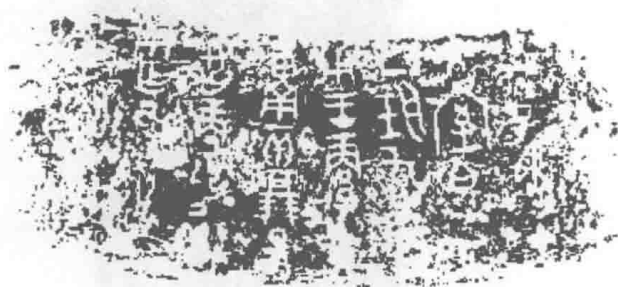
釋意：賞賜你浸了香草的酒一卣、裸祭用的寶物玉勺子一件……還有玉環、玉琮各一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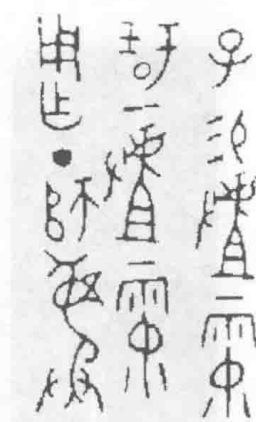
武丁卣銘文



武丁卣其卣銘文



武丁卣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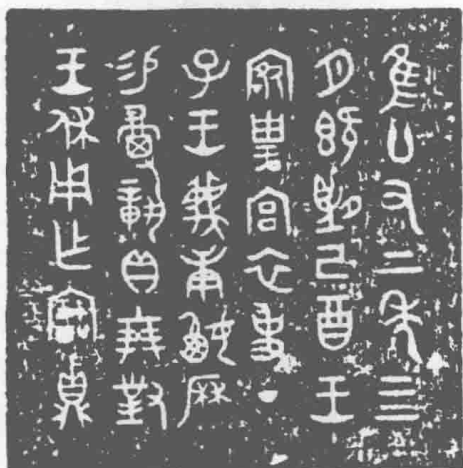
武丁卣銘文



武丁卣銘文



武丁卣銘文



庚嬴鼎銘文



寓鼎銘文



戎卣、尊銘文



小臣傅簋銘文



嗣鼎銘文



尹姑鬲銘文



鮮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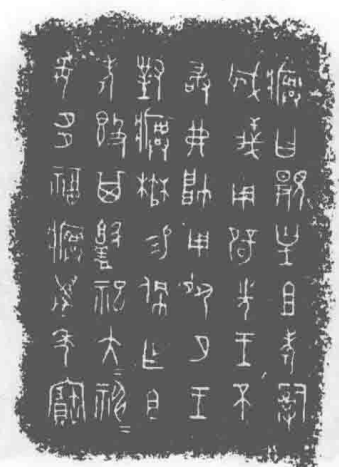
守官盤銘文



縣妃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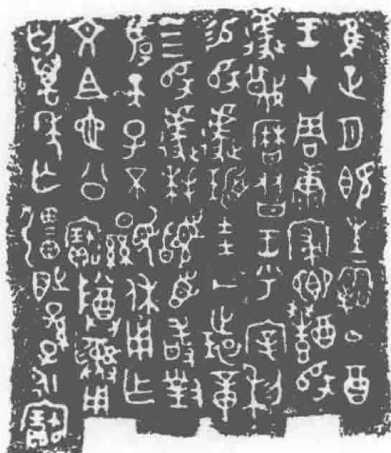
帶鼎



癸簋銘文



卯簋蓋銘文



師遽方彝銘文



咼卣銘文

王十卣宮大夫誠  
 卣羽 缺王十筆  
 宮卣王十卣宮誠  
 叙工卣 卣帝王  
 十卣卣羽目去日  
 卣大矢誠 卣勤  
 陽天子休用止父  
 夫是卣果是是  
 永卣用

大矢始鼎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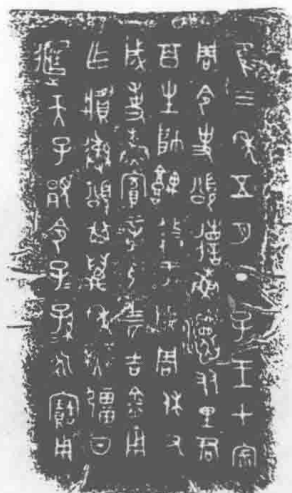
萑簋銘文



表衡盃銘文



頌鼎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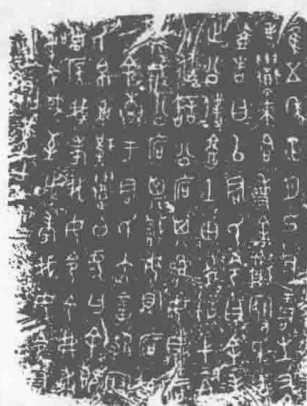
史頌鼎銘文



鄂侯御方鼎銘文



大簋蓋銘文



五年琯生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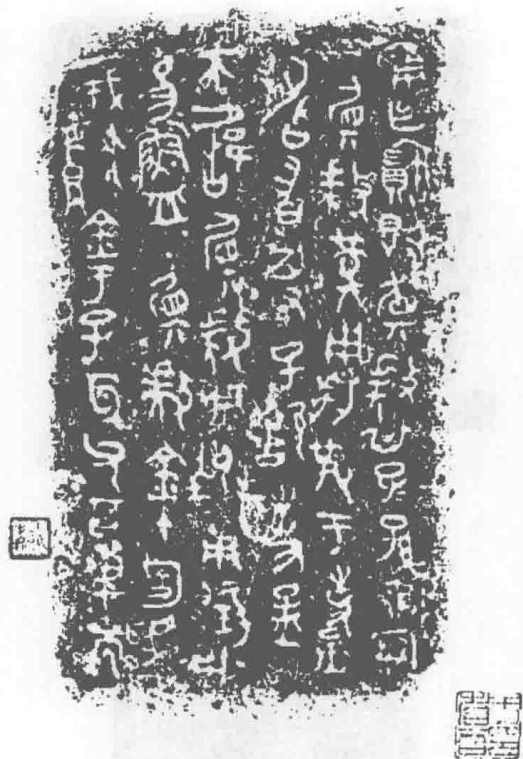


六年琯生簋銘文



番生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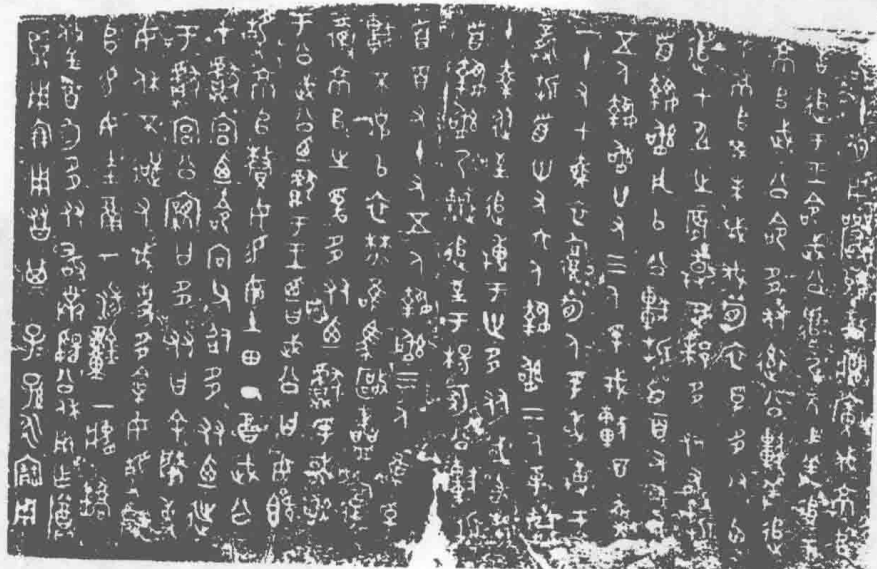




廬敖簋蓋銘文



吳虎鼎銘文




多友鼎銘文



## 西周的監察制度

周人在奪得政權以後，爲對付殷遺民和四周叛服不定的異族，也爲了擴張領土的需要，決定實行分封諸侯的統治辦法，以後歷代周王也一直沿用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藩屏宗周，拓土辟疆。但這種政治統治制度很容易造成諸侯割據的局面，如不附以其他控制手段，後果可能與封建的初衷大相徑庭。文獻記載周初曾設管、蔡、衛三監，以監殷民。《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史記·周本紀》“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蓋周初在中原地區，部分封侯設監的舉措，意在監視殷遺。但是這種封侯設監的監察制度，後來被證明是失敗的，因爲管、蔡不但沒有起到監視殷遺的作用，反倒去配合殷紂王子祿父造了成王、周公的反，使得新生的西周王朝，被迫進行二次東征，用了三年的時間纔平定了叛亂。這一事件說明，就是親兄弟的封國，也未必可靠。爲保證國家的統一，使得中央政令在諸侯國貫徹執行，在實行分封制度的同時，周人決定實行監國制度，即由中央派要員，長駐各諸侯國，隨時向中央報告地方動向，這樣纔能既利用諸侯國的力量屏障腹心地帶，拓展領土，又防止發生諸侯坐大，難以控制的弊病。

西周還建立了在諸侯國嗣繼祖考土地爵稱時，須經過王室重新冊命的制度，西周金文中記錄的冊命典禮，有一些就是王室對諸侯國君後代的嗣封任命，如大孟鼎記孟因嗣繼其祖南公部分封地而接受周王冊命<sup>①</sup>，伯晨鼎記伯晨因嗣繼其祖考作桓侯而接受周王的冊命<sup>②</sup>等。文獻和金文中還有諸侯國的重要執政官員也需王室任命的記錄，如《禮記·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等。豆閉簋“王格于師戲大室，邢伯入佑豆閉。王呼內史冊命豆閉。王曰：閉，賜汝戩衣、市、鑾旗，用侖乃祖考事，司窆俞邦君司馬、弓矢……”<sup>③</sup>該銘說明兩個問題，一是諸侯邦君的司

馬、司弓矢這些軍事長官要由王室任命；二是周雖實行“世官世祿”制度，但繼承祖考職事，也要由王室任命。<sup>④</sup>這些措施對於維護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西周頻繁舉行的射、饗、燕、見等禮儀，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考察、牽制諸侯的作用。<sup>⑤</sup>

本來早期文獻對西周的監察制度的記錄是清楚的，比如《周禮·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只是後來的註釋諸家，對古禮的內容已不甚了然，作出許多錯誤的揣測。《周禮》的“立其監”，應該是指在諸侯國內設監，被監察的對象就是各諸侯國的國君，但到了漢代的鄭玄作《注》時，卻說是“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到了唐代賈公彥作《疏》時則進一步說：“立其監者，每一國中立一諸侯，使各監一國。”這說明後世註釋家不知道西周在各諸侯國設監的實際情況，他們只知有文獻記載的對付殷遺民的“管蔡衛三監”這種監察形式，以為《周禮》所記，也是管蔡衛式的監察制度，這就把西周實際實行的監察制度所監察的對象完全弄錯了。

金文對西周實行的在諸侯國設監這一重要監察制度，有不少明確的記載：

第一，應監甗“應監作寶尊彝”<sup>⑥</sup>該器1958年出土於江西余干縣的黃金阜，時因中學修球場平土，在距地表50釐米處發現，據寫發掘報告的朱心持說：“於其四周及以下，並未發現其他共存器物。”因而推測：“該器係在別處早年出土的，因三款足有一足曾斷，經過焊接。此器經過家藏，可能在某個時候，物主須暫時離開黃金阜，攜帶不便，又埋於地下。”郭沫若先生曾著文指出“作器者自稱應監，監可能是應侯或者應公之名，也可能是中央派往應國的監國者。”郭老還指出：“邳、晉、應、韓，武之穆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據杜預注：應國在今父城縣西南，故國在今河南寶豐縣西南。”<sup>⑦</sup>1993年果然在寶豐縣西南平頂山地區發現了應國墓地，出土了包括有長篇銘文銅器在內的大量應國文物。<sup>⑧</sup>

第二，句監鼎“句監作寶尊彝”<sup>⑨</sup>1964年10月，山東龍口市（黃縣）蘆頭鎮出土<sup>⑩</sup>。“句監”應為指稱句地之監國者，山東句地可能就在荷澤北面的“句瀆”一帶。《左傳·桓公十二年》“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杜注》“即穀丘也”。

第三，管監引鼎“管監引作父己寶尊彝。”<sup>⑪</sup>此地名字與利簋銘“辛未，王在囂師，賜有事利金”的“囂師”為一地，于省吾先生考為“管”，即今之鄭州。于先生云：“囂、鬲、囂或東均應讀為管蔡之管。古文無管字，管為後起的借字。從間從東，古字通，《荀子·修身》的‘東，理也’，楊注謂‘間與簡同’。《詩·溱洧》‘士與女方秉蘭兮’毛傳謂‘蘭，蘭也’。按齊詩蘭作菅。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聲類》訓葢為蘭，並謂‘葢又作菅蘭二形’。按從東從間從官之字同屬見紐，又係疊韻，

故知鬲、鬲、鬲或東爲管之初文。後世管字通行而古文遂廢而不用”。“管爲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謂在‘鄭州管縣’。《周書·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以後，均言‘王在管’，可以參證。”<sup>⑫</sup>

于先生的考證是很有說服力的。這件器銘的出現，解決了郭老對應監甗猶豫不決的問題，即監可能是應侯或者應公之名，也可能是中央派往應國的監國者。該鼎作器者的名字叫“管監引”，顯然應該理解爲管地之監國者稱“管監”，其私名爲“引”，“管監引”一名是由“地名+官名+私名”組成，猶金文習見之“微師耳”<sup>⑬</sup>、“魯太宰原父”<sup>⑭</sup>、“盪司土幽”<sup>⑮</sup>、“虞司寇伯吹”<sup>⑯</sup>等人名的構成是一樣的。結合上述諸器作器者名看，“監”字不可能是人名，只能是官名。

第四，叔趙父甗“叔趙父作旅甗。榮監”，銘文中的叔趙父是榮地之監國者，故稱“榮監”。<sup>⑰</sup>該器1981年出土於陝西扶風縣南陽鄉溝原村的一個灰坑。該器作器者名爲叔趙父，此器“榮監”兩字與“叔趙父作旅甗”六個字分開兩處，榮監之監字，就更不可能是人名了。

榮地有可能就是榮伯所封之地，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其地在豐京附近：“據此器可知榮之封邑在豐京鄰近，故其臣屬既得死司榮公室，又得死司莽宮莽人也。莽宮即豐京之宮，莽人即豐京之人。”<sup>⑱</sup>郭老認爲“莽京即豐京”，他的結論也是基於他的這一地理認知而得出的。目前，學術界對莽京的確切所指及具體位置尚有爭議，但是其地在宗周附近則是大家的共識。“榮監”可能即是周王室派往榮伯封國的監國者。

看來，西周王室在平定管蔡之亂後，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確定在各諸侯國普遍設監，派駐中央代表。

仲幾父簋<sup>⑲</sup>云：“仲幾父史幾使於諸侯、諸監，用厥賓做丁寶簋。”銘文是說：仲幾父史幾出使各諸侯國並訪問各國的監國，用諸侯、諸監在被訪問時所賓贈的禮品做了這件紀念先人丁的寶簋。可見，在仲幾父的時代，監國制度已十分普及，可能凡封諸侯之地，同時也設立了監國者，在銘文中，諸侯與諸監的地位是平列的。

又善鼎云：“今余唯肇申先王命，命女佐胥纂侯監幽師戍。”<sup>⑳</sup>“幽師”當是駐守幽地的軍隊，這條銘文資料說明西周在軍隊中也設立了監察機構，這可能就是中國後世“監軍制度”的濫觴。史載齊景公曾使穰苴將兵防燕、晉，苴請以君之寵臣監軍，公使莊賈往。漢武帝時曾設“監軍使者”，東漢、魏、晉也都沿襲此制度。隋末曾以御史作監軍，唐開元中開始以宦官爲監軍，以迄唐末。至明代，復以御史爲監軍，清代則廢棄不用。

其實，這種監國制度，可以一直追溯到殷代，甲骨卜辭有：

“惟𠄎𠄎令監凡。”“癸丑卜，惟𠄎口監凡。”（合集27740）

“惟𠄎戍令監凡。”“惟𠄎𠄎令監凡。”（合集27742）

“凡”為地名，“監凡”可能就是指在凡地設監。這說明周人的監國制度也可能是向商人學的。不過，甲骨文中的有關材料並不充分，用來論述監國制度，還嫌太少。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瞭解到，西周王朝雖然實行了一種看似分散，難以管理的封建諸侯的統治辦法，但是，在經歷了周初的挫折之後，他們總結經驗，相應建立了一套嚴格控制諸侯的監國制度，再附以其他一系列控制措施，確保了中央集權制度的實施。這種統治雖不像秦以後實行的郡縣制度那樣可以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的集權管理，但也絕非如希臘羅馬城邦國家時代那樣，施行帶有一定軍事民主性質的統治辦法。我國有一些史學家在看到考古發掘中不斷出土的三代古城遺址和一些聚落分佈，類似於西方古史中的城邦國家，就想用希臘羅馬的制度來套合中國上古三代的制度，認為中國也曾有過類似的城邦國家時代。這實際是一種誤解，通過上述分析，可以斷言，起碼在西周時代，沒有實行過甚麼民主政治。對我國西周實行的這種“封建諸侯，嚴格監國”的獨特的中央集權制度，秦以後並未完全消失，而是與郡縣制度結合到一起，互為表裏，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特有的一種國家管理形式。

## 注 釋

- ① 大孟鼎，《殷周金文集成》2837（下簡稱《集成》）。
- ② 伯晨鼎，《集成》2816。
- ③ 豆閉簋，《集成》4276。
- ④ 參見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的綜合研究》13頁“諸侯司馬”。
- ⑤ 參見劉雨作《西周金文中的周禮》《燕京學報》新三期1997年。
- ⑥ 應監甗，《殷周金文集成》883 西周早期器。
- ⑦ 《釋應監甗》《考古學報》1960年1期。
- ⑧ 《文物》1998年9期。
- ⑨ 句監鼎《近出殷周金文集錄》297 西周早期器。
- ⑩ 《山東龍口市出土西周銅鼎》李步青、林仙庭《文物》1991年5期。
- ⑪ 管監引鼎，《集成》2367 西周中期器。
- ⑫ 《利簋銘文考釋》《考古》1977年8期。
- ⑬ 微師耳尊，《集成》，6007。
- ⑭ 魯太宰原父簋，《集成》3987。
- ⑮ 盞司土幽尊，《集成》5917。
- ⑯ 虞司寇伯吹壺，《集成》9694。
- ⑰ 叔趙父卣，《集成》11719 西周晚期器。



⑮ 《兩周金文辭大係》《卯簋考》。

⑯ 仲幾父簋，《集成》3954 西周晚期器。

⑰ 善鼎，《集成》2820。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 170~173 頁，中華書局，2004 年 10 月）

## 參考書目

- ①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②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③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④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⑤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⑥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⑦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⑧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⑨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⑩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⑪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⑫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⑬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⑭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⑮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⑯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⑰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⑱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⑲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⑳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㉑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㉒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㉓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㉔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㉕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㉖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㉗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㉘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㉙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㉚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㉛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㉜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㉝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㉞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㉟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㊱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㊲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㊳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㊴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㊵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㊶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㊷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㊸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㊹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㊺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㊻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㊼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㊽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㊾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㊿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1983 年。

# 金文斷代法研究

(2003年4月23日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的演講稿)

## 一 金文斷代法發展的歷史回顧

金文成為史料的關鍵在於明確其時代，近代學者在金文斷代研究方面，從方法論上看，有過兩次重大的進步。一次是由王國維提出，由郭沫若加以論證和實踐的“標準器斷代法”的發現。王國維在考釋遽簋時指出：“此敦稱穆王者三，余謂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滿也。何以生稱穆王？曰：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諡也。”（《遽簋跋》收在《觀堂集林》18卷895頁中華書局1959年）千百年來，史書上記載的歷代帝王稱號，都是死後追封的“諡號”，後世還有專門規定諡號內容的“諡法”，但卻很少有人注意“諡法”起源的時代問題，都以為這是“古已有之”的。王氏提出西周前期各王之號皆為生稱，明確了“諡法”起源晚於西周前期，他的一句話點破了千古之迷，人們稱其發現為“西周時王生稱說”。按照這一原則，有一批銅器的時代就可以明確：如利簋有“珷征商，唯甲子朝”一句，即可定其為武王時器（4131）；獻侯鼎有“唯成王大禱在宗周”句，可定其為成王時器（《集成》9455）；長由盃有“穆王在下減应，穆王饗醴”句（《集成》9455）、遽簋有“穆王在莽京……穆王親賜遽……敢對揚穆王休……”等句（《集成》4207），可定兩器在穆王時；趙曹鼎有“恭王在周新宮”句（《集成》2784），可定其在恭王時；匡卣有“懿王在射廬”句（《集成》5423），可定其為懿王時器。這些器中銘文記錄的都是時王的具體活動，而非該王死後對其生前活動的追述，這一點已被後世不斷進行的科學考古實踐所證實。

王國維雖敏銳的觀察到了西周金文中存在的這一“時王生稱”現象，但他並沒有展開論述，也沒有據此原則實際去解決金文中的斷代問題。對大量金文資料進行具體分析的是郭沫若，他首先根據“西周時王生稱”原則，找出一批可以肯定王世的銅器，

作為“標準器”，然後把與其形制紋飾特徵類似，語句言辭內容相近的銅器聚攏在一起，形成了一組組內容彼此關聯的銅器羣，當將東、西周各 250 件長銘銅器編成互相聯繫的系列的時候，他寫出了著名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歸納出最重要的金文斷代方法——“標準器斷代法”。陳夢家又將此法加以完善，將考古學研究成果引入銅器斷代，寫出《西周銅器斷代》一書。這樣，由於時代明確了，大部分長銘文銅器所記述的內容，就變成了第一手的史料，為先秦史研究開闢了廣闊的前景。這實在是既簡單又明確的斷代方法，時至今日，此法仍是金文斷代的主要方法。

任何一種學術理論在使用中都會出現某種局限性，研究銅器的學者多數感到，郭、陳二氏將過多的銅器與成王的活動聯繫在一起，形成銅器分佈的不合理局面。但是，要想突破這個體系形成中的局限，必須找出新的方法論上的根據，纔能令人信服的對理論加以補充和修正。唐蘭經過長時間醞釀，在《考古學報》1962 年 1 期發表了長篇論文《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指出金文中的“康宮”就是康王之廟，凡記有“康宮”的銅器，應為康王身後之器。用這一“康宮原則”，他將郭、陳過去定為成王時期的一批銅器，如令簋（《集成》4300）、令尊（《集成》6016）、令方彝（《集成》9901）、鬯尊（《集成》5989）、鬯卣（《集成》5407）、遣尊（《集成》5992）、遣卣（《集成》5402）、中方鼎一（《集成》2785）、中方鼎二（《集成》2751）等一批銅器，改定為昭王，與“昭王南巡”的記載聯繫起來。根據這一原則，他還提出康宮中的“夷宮”、“厲宮”應為夷王和厲王之廟，凡記有二宮名的銅器，同樣應該是二王身後之器，鬲比鼎有“王在周康宮夷大室”（《集成》2818）此鼎有“王在周康宮夷宮”句（《集成》2821），兩器應做於厲王時。克鐘有“王在周康宮厲宮”句，應做於宣王時。唐蘭“康宮原則”發表之後，大量出土的經科學發掘的考古學時代明確的有銘文銅器，皆與之相容，沒有發現反證。特別是扶風莊白等地出土的窖藏銅器，往往是同一家族幾代人的銅器埋在一起，時代梯次相接，被形容是一把檢驗銅器斷代的標尺，“康宮原則”經受住了這些新出銅器的考驗，逐漸被多數學者所接受，這是近年來我國銅器斷代學上的第二次重要進步。

## 二 金文饗祭的涵義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唐蘭“康宮原則”發表之後，考古學標型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比如銅器紋飾斷代方面發表了陳公柔、張長壽對鳥紋和獸面紋的研究成果，中原和各地地方分地區的銅器形制、組合的綜合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有的用陶器斷代研究的成果來幫助同時代銅器的斷代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科技考古的金相學研究、鑄

造學研究也有一些論文和著作發表。

金文的斷代研究則顯得很沉寂，停滯不前，幾乎沒有甚麼重要的論文發表。

我在用金文資料研究西周禮制時，發現金文的“饗祭”有一定斷代意義，現向大家作一簡要介紹：

在殷及西周金文中，記“饗祭”的銅器有如下六件：

戊嗣子鼎（《集成》2708）

王賞戊嗣子貝卅朋，在闡牢，用作父癸寶□，唯王饗闡大室，在九月。犬魚。

高卣蓋（《集成》5431）

唯十又二月，王初饗旁，唯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

臣辰盃（《集成》9454）

唯王大禽於宗周，誕饗莽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命士上眾史寅殷于成周，替百姓豚眾賞卣鬯貝……

麥方尊（《集成》6015）

王命辟邢侯出坏，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尤。會王饗莽京，酺祀，雩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為大禮。王射大龔禽，侯乘于赤旗舟從。死咸時，王以侯內于寢，侯賜玄雕戈。雩王在啟，祀月，侯賜者甥臣二百家，用王乘車馬金勒、冂、衣、市、烏……

呂方鼎（《集成》2754）

在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饗于大室，呂誕于大室。王賜呂獸三卣、貝卅朋……

伯唐父鼎（《考古》1989年6期）

乙卯，王饗莽京。王祿，辟舟臨舟龍。咸祿，伯唐父告備。王格，乘辟舟，臨祿白旗。用射絳、釐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咸祿，王蔑曆，賜秬鬯一卣，貝卅朋。對揚王休，用作□公寶尊彝。

上述各器中的饗字，很不好講，各大家雖都有考釋，然而卻沒有令人滿意的通解。郭沫若考為“館”字，云：“由二器之詞旨與文字之結構以推之，當是古之館字，從食宛，宛亦聲也。”（《金文叢考》324頁《臣辰盃考釋》）陳夢家考為“居”字，云：“疑為居字，字從亼從食，從尸得聲。後者《說文》以為即《詩》我姑酌彼金罍之姑。”（《西周銅器斷代二》《土上盃考釋》1955年12月《考古學報》第十冊）于省吾認為即甲骨文之智字，云：“甲骨文智祭同於周人饗祭，但不知其詳。”（《甲骨文釋林》40頁《釋智》中華書局1979年6月）唐蘭考為“裸”字，云：“當讀為裸。《說文》裸，灌祭也。《詩·文王》裸將於京，即饗莽京之事。《書·洛誥》王入太室裸，即饗於大室。”（《西周青銅器分代史徵》133頁中華書局1986年）

戊嗣子鼎出土於安陽後崗之圓坑葬中，一般認為是殷代帝辛時銅器，銘記饗祭行於

闡大室，闡爲朝歌附近一都邑，商王常在此地舉行大的祭禮。高卣蓋銘記饗祭行於“旁”地，“旁”即“莽京”。臣辰盃、麥方尊、伯唐父鼎皆云饗祭行於莽京。莽京爲距豐、鎬不遠處的又一周都，內有辟雍大池、天室等宗廟建築，周王經常於此地舉行各種大的祭祀活動。呂方鼎只講饗祭於大室，但據上述內容推測，此大室也可能就是莽京的大室，蓋周王室的饗祭必於宗廟所在的莽京舉行。這樣看來，饗祭應是周王室祭祀祖先的重要典禮。郭、陳釋“館”釋“居”未能體現祭祖禮的內容，不能成立。唐蘭釋“裸”，雖合於祭禮，但金文已有“裸”字，寫作“𦛳”，此字如也釋爲“裸”，則嫌重複。于省吾釋爲甲骨文之“智”，又“不知其詳”，其說也難以利用，且殷金文中明有“饗”字在，“智”與“饗”的關係也不容易講清楚。可見，已有的各種說法沒有弄清“饗祭”的確切含義，而上述六件器的銘文本身，又沒有交代“饗祭”的內容，因此，要想弄清“饗祭”，最好能找到一件對“饗祭”有具體敘述的器銘。經過對長銘金文的排查，我發現沈子它簋蓋（《集成》4330）的銘文對弄清“饗祭”的含義很有幫助，值得認真注意。現將其拓本及釋文簡單介紹如下：

釋文：

它曰：拜，稽首。敢𠄎昭告朕𦛳考，命乃鵬沈子作統於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統，休同公克成綏𦛳考以于顯顯受命。嗚呼！惟考肇念自先王先公乃妹克衣，告烈成功，獻𦛳考克湍克。乃沈子其靜懷多公能福。嗚呼！乃沈子妹克蔑，見厭於公休。沈子肇斂狃貯蓄，作茲簋。用飗饗己公，用格多公。其𦛳哀，乃沈子它惟福，用永靈命，用綏公惟壽。它用懷佐我多弟子我孫，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

細心揣摩沈子它簋銘，知其爲一篇由沈子它代新死之父（𦛳考，應讀爲“寶考”）向宗廟中諸先公（多公）作祭禱之辭。沈子它是周公旦的後人，接受寶考之冥命，作統（饗祭）於周公宗廟。陟者昇也，“陟二公”即將曾祖、祖父二公（即下文的己公公）之神主，按昭穆遞昇一級，以使寶考的新神主祔入宗廟。因此需沈子它代寶考向諸先公禱告此事。禱辭中沈子它稱“不敢不統”，因爲休同公（指其祖父）曾使寶考“以于顯顯受命”。沈子它在禱辭中兩次大發感慨：第一次說：我死去的父考深深的懷念先公先王克殷的偉大功烈，我沈子它也靜享先公大福。第二次說：我沈子它不被先公嫌棄，得到勉勵和休美，因此我盡搜積蓄，作這個簋，用給死去的曾祖己公饌食享用，用致諸先公來一同享用。因爲我貢獻了哀思，一定會得到諸先公給予的福份、長命、年壽。沈子它並祈禱其多弟子及孫輩能以他爲榜樣，教導他們的後代。

沈子它簋中的“統祭”即上述六器中的“饗祭”，從音訓上講沒有甚麼問題。同是饗祭何以用不同的字呢？這可能與祭禮的規格有關，上述六器所記都是王室祭禮，而沈

子它簋所記爲一貴族的家祭，稱呼上應有所區別。據沈子它簋的內容看，烝（饗）祭是新死之父祔入宗廟的祭禮，也就是在宗廟裏立新死父考神主靈牌的祭禮，是生死大典，所以成嗣子鼎和臣辰盃中用爲“大事記年”，高卣蓋、麥方尊、呂方鼎、伯唐父鼎、沈子它簋諸器皆不標年份，可能在當時人看來，記王室此等大典即等於紀年，無須再贅記年份。

### 三 西周諸王元年推測

西周諸王元年安排在何時，史載不詳，然西周典章制度多存於魯國，即位、改元皆國之大典，估計魯國所行即西周之制度，由魯《春秋》當可推知其大概。現排列《春秋》魯公即位、改元情況，以推測西周諸王元年的可能時間。

隱公名息姑，惠公庶子。《春秋》稱“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不書即位，攝也。”“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爲其弟所殺。

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春秋》“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弑兄自立。“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冬十又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春秋》“莊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君弑，子不言即位。”《春秋》“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春秋》“閔公元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爲慶父所殺。

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春秋》“僖公元年，春王正月……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於小寢。”

文公名典，僖公之子。《春秋》“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公羊》：“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穀梁》：“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春秋》“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春秋》“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十有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春秋》“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十有八年……八月……己丑，公薨於路寢。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春秋》“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十有一



年……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冬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公名濞，襄公之子。《春秋》“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十有二年……十有二年己未，公薨於乾侯。”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九月丁巳，葬我君丁公。雨，不克葬。戊午，下昃，乃克葬。”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春秋》“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魯十二公，有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哀等十一公皆即位於“元年春王正月”，僅定公即位於元年之夏六月，蓋無一例外，皆即位於元年，即老王死後的第一年，看來這是一個很嚴格的規定。《春秋會要》云“孔氏穎達曰：諸侯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改元正位。”（姚彥渠著 中華書局 1955 年）公薨之年為老王末年，次年為新公元年，即位一定選在老王死後的第一年。春秋魯諸公如此，西周諸王大致也如此。

#### 四 “饗祭”行於新王即位元年

從上述引文內容觀察，魯國諸公為死去的老公立神主並將新神主祔入宗廟的祭典，一般都在即位之年舉行，故《春秋》皆略而不書，只有文公將這一大典拖後至即位的第二年舉行，《春秋》微言大義，加以撻罰，責以延遲。《公羊》、《穀梁》注意到《春秋》這一微言大義，遂加以評論。《春秋》“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公羊》：“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穀梁》：“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據《穀梁》所言，這一祔祭之禮，不早於“虞”，不晚於“練”，應該在喪禮的“卒哭”以後，由喪祭轉為吉祭時進行。《禮記·檀弓》“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說文》“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我們所說的“饗祭”，就是王室的“祔祭”，可能正因為此祭中有合食之禮，故饗字從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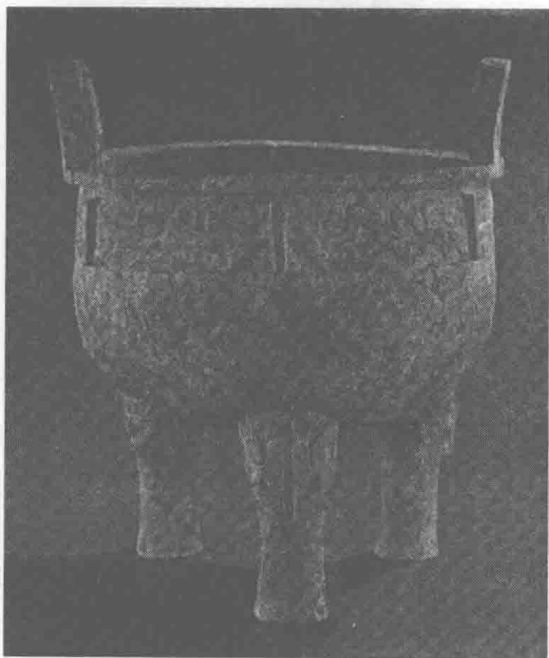
西周的典章大法，如“父死子繼傳位法”等，是周公旦輔佐成王時制定的，魯國曾被特許使用西周王室的禮樂，是保存西周禮樂典章制度最為完整的國家，因此後人稱“周禮盡在魯”，以至後世吳公子季札，漢司馬遷都有到魯國習禮觀樂，贊美古禮的記載。因此，“饗祭”行於新王即位元年，這個在魯國實行的制度，我們相信也會是西周

王室所實行過的制度。

這樣我們就又找到一個判斷金文時代的標準，即凡記錄“饗祭”的銅器銘文，該銅器必作於某王的元年，如能綜合其他條件，將該銅器的王世確定，就會得到一批新的標準器。如戊嗣子鼎可能做於商王帝辛元年九月丙午日，高卣蓋可能做於康王元年十二月庚申日，臣辰盃可能做於昭王元年五月既望辛酉日，麥方尊可能做於昭王元年二月，呂方鼎可能做於穆王元年五月既死霸壬戌日，伯唐父鼎可能做於穆王元年某月的乙卯日等。

大家知道，排金文曆譜時，元年器是非常重要的，如此說得以成立，則可以多出六件元年器。又金文中西周前期的年、月、月相、日四要素俱全的器很少，本文所論述的六件器中有臣辰盃和呂方鼎銘文具備月、月相、干支日三要素，唯缺王年，如此說得以成立，定位元年，就又可多出兩件西周前期的四要素俱全的標準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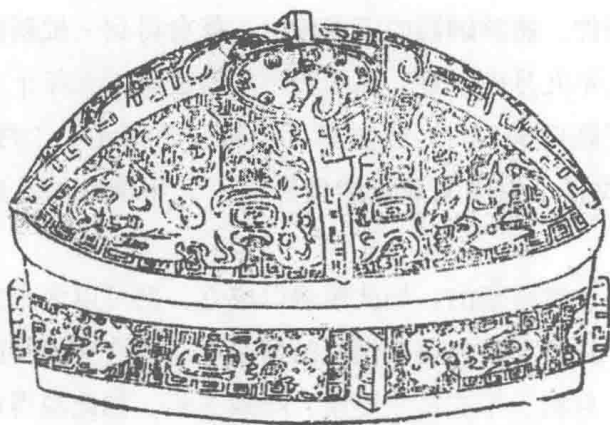
本文的結論是我在研究金文曆譜時發現的，曾提交給“夏商周斷代工程”，北大考古系也曾有人提出要對其進行討論，後來祇在《中原文物》上看到一篇討論文章，可見這篇論文的觀點還沒有引起學者們的注意，當然在整個金文斷代體系中，我的發現只能算是一個大系統的補丁，且現在離下定論還很遠，因為論證還是很初步的，但是它可以說明我們正在對金文斷代的方法作着努力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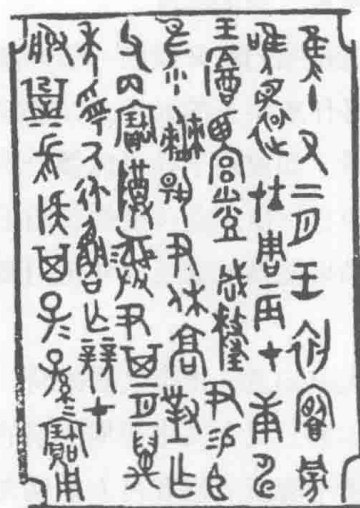
戊嗣子鼎



戊嗣子鼎銘文



高卣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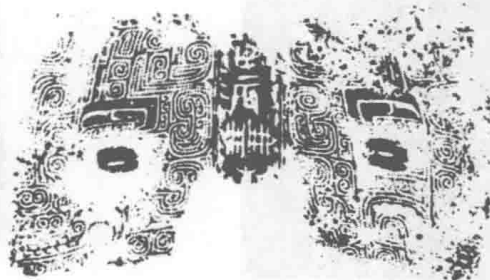
高卣蓋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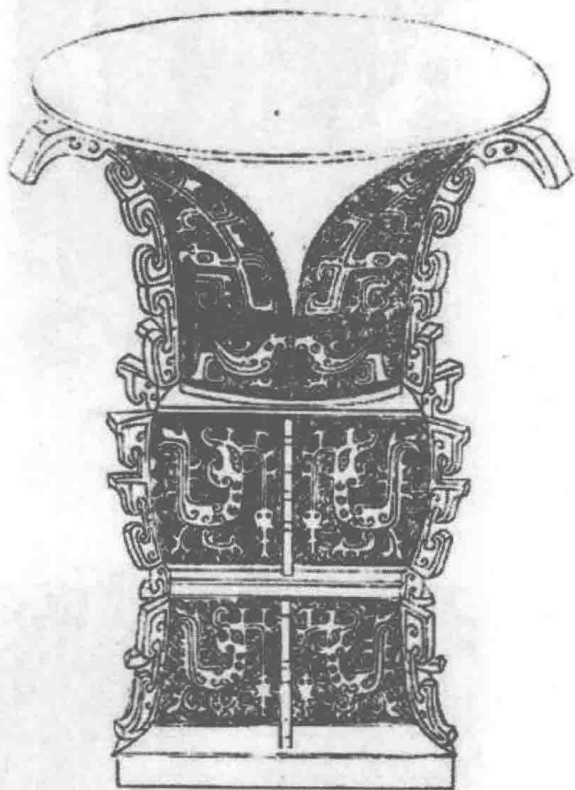
臣辰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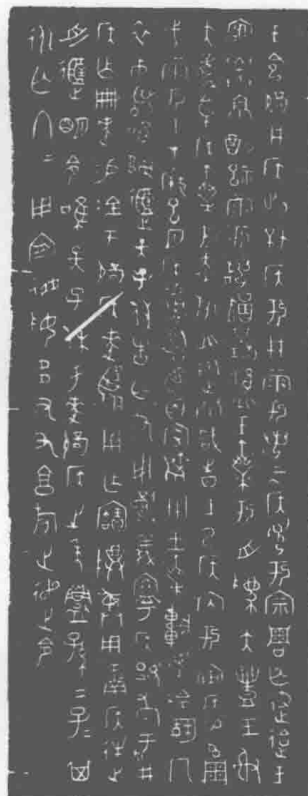
臣辰盃蓋銘文



臣辰盃圖



麥方尊圖



麥方尊銘文



呂方鼎



呂方鼎銘文



伯唐父鼎



伯唐父鼎銘文



沈子它簋蓋



沈子它簋蓋銘文

（《金文中的饗祭》一文原發表在《故宮院刊》1998年4期，因其內容與此篇多有重複，故刪去不用。本文為作者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的演講稿）

## 金文中的王稱

### 一 金文王稱的研究

關於金文中的王稱，早年王國維先生寫過《古諸侯稱王說》，文中說：“世疑文王受命稱王，不知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楚〔雨按：應爲越〕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苟知此，則無怪乎文王受命稱王而仍服侍殷矣。”爲證明這一說法，王氏文中舉出幾件銅器銘文爲例：“矢王鼎云‘矢王作寶尊’，散氏盤云‘乃爲圖矢王於豆新宮東廷’。而矢伯彝則稱矢伯，是矢以伯而稱王者也。泉伯貳敦蓋云‘王若曰：泉伯貳，□自乃祖考有勞於周邦’。又云‘貳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釐王寶尊簋。’此釐王者，泉伯之父，泉伯祖考有勞於周邦，則其父釐王非周之僖王可知，是亦以伯而稱王者也。乖伯敦云‘王命仲到歸乖伯裘。王若曰：乖伯，朕丕顯祖文武應受大命，乃祖克□先生〔雨按：應爲王〕翼自他邦，有□於大命。我亦弗望（假爲忘字）享邦。賜女□裘。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小□邦。歸予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敦’乖伯之祖，自文武時已爲周屬，則亦非周之支庶，其父武乖幾王，亦以伯而稱王者也。而泉伯乖伯二器，皆紀天子錫命以爲宗器，則非不臣之國。”<sup>①</sup>王氏此文在於說明後世儒者將周初文武稱王視爲僭竊是錯誤的，這一目的是達到了，可是它同時形成了一個普遍性的原則，即任何一個古諸侯都可以在國內自封爲王，這卻是一個並不嚴謹的結論，它可以導致一些新的問題出來。

比如陳槃先生談到晉國的爵稱時說：“寓言、紀傳之書，於晉亦或稱王。《莊子·齊物論》：‘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案爲獻公）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越絕書·外傳·紀寶劍》：‘歐冶子、干



將……作爲鐵劍三枚……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因而陳先生得出結論：“今案古者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sup>②</sup>他依據寓言、故事之類的記載，從而認定像晉、鄭這樣的周王支脈的姬姓大國曾經稱王，顯然是不夠嚴謹的，這明顯是受到王氏上述說法影響的結果。

針對上述情況，張政烺先生作《矢王簋蓋跋——評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他指出：“稱王在古代是一件嚴重的事情，絕非兒戲，如果把《古諸侯稱王說》當作原則，任意推測，就會演繹出許多錯誤了。”他通過對矢王、呂王、泉伯、乖伯等所屬姓氏國別的分析，得出結論：“周時稱王者皆異姓之國，處邊遠之地，其與周之關係若即若離，時親時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諸侯。文王受命稱王，其子孫分封天下，絕無稱王之事。周之同姓而稱王者只一吳王。”<sup>③</sup>王國維先生早年曾提出金文中出現的文、武、成、康、昭、穆、共、懿等王稱皆爲“時王生稱”<sup>④</sup>，此說實際上奠定了後來郭沫若先生的金文“標準器斷代法”的基礎。《古諸侯稱王說》又敏銳地指出，金文中有古諸侯稱王的情況存在。張政烺先生對王氏的結論加以修正，使之成爲一種有限制的理論，更符合金文內容的實際。兩位前輩學者從大處着眼的學術分析，對金文的整體研究是有很大推動作用的。但是，金文中的王稱比較複雜，尚有兩位先生的理論難以解釋的問題，本文想藉機全面檢討一下金文王稱中的各種可能性。

## 二 晚商金文中的王稱

金文中的王稱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有不同的，首先我們試羅列銘文較長的晚商金文，以觀察商代王稱的一般情況。

卽鬲、簋：王光賞卽貝。（《集成》741、3990）

雙鼎：雙覲於王。（《集成》2579）

斲方鼎：戊寅，王曰：斲，隳馬彤，賜貝。（《集成》2594）

豐鼎：王賞宗庚豐貝二朋（《集成》2625）

小臣缶鼎：王賜小臣缶馮積五年。（《集成》2653）

宜子鼎：丁卯，王令宜子會西方於眚，唯反，王賞戊甬貝二朋。（《集成》2694）

戊嗣子鼎：王賞戊嗣子貝廿朋。（《集成》2708）

尹光鼎：王饗酒。（《集成》2709）

寢蓐鼎：王令寢蓐省北田四品。（《集成》2710）

作冊豐鼎：王忒於作冊般新宗，王賞作冊豐貝。（《集成》2711）

卣簋：己亥，王賜卣卣玉十珌璋。（《集成》3940）

聽簋：辛巳，王飲多亞。（《集成》3975）

肆簋：在十月一，唯王廿祀。（《集成》4144）

癸卣：丙寅，王賜癸貝朋。（《集成》5367）

小臣姁卣：王賜小臣姁，賜在寢。（《集成》5378-5379）

御卣：辛巳，王賜御八貝一具。（《集成》5380）

二祀卣其卣：王令卣其貺麗……唯王二祀。（《集成》5412）

四祀卣其卣：乙巳，王曰：尊文武帝乙宜……王在桮……唯王四祀。（《集成》5413）

六祀卣其卣：唯王六祀。（《集成》5414）

小臣俞犀尊：丁巳，王省夔京，王賜小臣俞夔貝。唯王來征人方。（《集成》5990）

子黃尊：王賞子黃瓚一、貝百朋。（《集成》6000）

姁卣爵：乙未，王賞姁卣，在寢。（《集成》9098）

簋亞嚳角：丙申，王賜簋亞嚳奚貝。（《集成》9102）

宰桴角：庚申，王在闌，王格……唯王廿祀。（《集成》9105）

小臣邑卣：癸巳，王賜小臣邑貝十朋……唯王六祀。（《集成》9249）

王又母釁兕觥、方彝：王侑母釁。（《集成》9287、《故宮》70）

趨方彝蓋：癸未，王在圃，觀京。王賞趨貝。（《集成》9890）

王方鼎蓋：王作妣弄。（《集成》10347）

亞魚鼎：壬申，王賜亞魚貝……唯王七祀。（《考古》1984年9期）

寢魚簋、爵：辛卯，王賜寢魚貝。（《考古》1984年9期）

寢孳鼎：甲子，王賜寢孳……唯王廿祀。（《曲村》348頁）

通觀上述例證，商代金文在記述王的活動時，徑稱“王”如何如何行事，王字前不加任何修飾詞語，沒有發現稱為“某王”者。<sup>⑤</sup>

### 三 西周金文中的王稱

（一）西周金文中王稱出現多樣化的傾向，王的修飾詞語增多，其中一種修飾詞語很像後世的諡法用詞，如：

#### 1. 西周早期

利簋：珣征商，唯甲子朝（《集成》4131）

天亡簋：……衣祀於王丕顯考文王，使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省，丕隸王作廢，丕克乞衣王祀……（《集成》4261）

周公方鼎：周公作文王尊彝。（《集成》2268）

大孟鼎：惟九月，王在宗周，令孟。王若曰：孟，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珣王嗣玟作邦，闢厥匿，匍有四方……（《集成》2837）

小孟鼎：……用牲禘周王、珣王、成王……（《集成》2839）

成王方鼎：成王尊。（《集成》1734）

何尊：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稱珣王豐裸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速玟王，肆文王受茲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集成》6014）

獻侯鼎：唯成王大率宗周，賞獻侯顓貝……。 （《集成》2626）

作冊大方鼎：公來鑄武王、成王禘鼎。（《集成》2758）

## 2. 西周中期

鮮簋：惟王卅又四祀，惟五月既望戊午，王在葦京，禘於瑯王……（《集成》10166）

刺鼎：惟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禘，用牡於大室，禘昭王……（《集成》2776）

班簋：……毓文王王姁聖孫陞於大服，廣成厥功，文王孫亡弗懷型……（《集成》4341）

遼簋：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葦京，呼漁於大池。王饗酒，遼御，亡遣，穆穆王親賜遼犇。遼拜首、稽首，敢對揚穆王休……（《集成》4207）

召鼎：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集成》2838）

長由盃：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應，穆王饗醴，即邢伯大祝射，穆穆王蔑長由速即邢伯……（《集成》9455）

師鬲鼎：惟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王曰：師鬲，女克蓋乃身，臣朕皇考穆穆王……（《集成》2830）

五祀衛鼎：……厲曰：余執恭王卹功於昭大室東……（《集成》2832）

史牆盤：曰古文王，初盤合於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撫有上下，會受萬邦。緡圉武王，遼征四方，撻殷峻民，永丕恐狄，盧兕伐夷童。憲聖成王，左右綏綏剛鯨，用肇徹周邦。淵哲康王，分尹億疆。宏魯昭王，廣猷楚荊，唯寡南行。祇顓穆王，型帥宇誨……（《集成》10175）

## 3. 西周晚期

大克鼎：克曰：穆穆朕文祖師華父，聰□厥心，寧靜於猷，淑哲厥德，肆克彝保厥辟恭王，諫辭王家……（《集成》2836）

逯盤：逯曰：丕顯朕皇高祖單公赳赳克明厥德，夾召文王武王撻殷，膺受大魯命，匍有四方，並宅厥疆土，用配上帝。季朕皇高祖公叔克速匹成王，成受大命，方狄丕享，用奠四國萬邦。季朕皇高祖新室仲，克幽明厥心，柔遠能邇，會召康王，方懷不廷。季朕皇高祖惠仲蓋父盤和于政，又成子猷，用會昭王穆王，盪政四方，撲伐荊楚。

季朕皇高祖零伯彝明厥心，不墜服，用辟恭王、懿王。季朕皇亞祖懿仲敷諫諫，克匍保厥辟孝王夷王，有成於周邦。季朕皇考彝叔穆穆趯趯，和匍於政，明隳於德，享辟厲王……（《文物》2003年6期）

西周早期的文王、武王、昭王，金文有時復寫作玟王、珷王、瑯王，或以玟、珷代稱文王、武王，這些都成為三王的專用名詞。這種復寫的王稱，目前發現的僅限於西周早期，進入西周中期之後，就消失了。其餘各王的生稱，與《周本紀》中的次序和用字幾乎完全相同，這證明太史公運用史料是十分嚴謹和準確的。以上各王稱，學者間稱為“時王生稱。”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銘文中的王稱，表面上看像是“時王生稱”，甚至連用字都與“時王生稱”是相同的，但是如果細加考索就可以發現，它與一般的“時王生稱”不同，這一點很容易被誤解。如：

效父簋：“休王賜效父呂三，用作厥寶尊彝。五八六。”（《集成》3822~3823）

翳父方鼎：“休王賜翳父貝，用作厥寶尊彝。”（《集成》2453~2455）

這幾件器都是西周早期的銅器，因為銘中的休王近似孝王，開始郭老就把這幾件器列入西周中期的孝王，後來在再版《大系》時，他在眉批中更正道：“翳父簋與效父簋，先以誤解休王為孝王，故以列於孝世。今案殊不確，器制與字體均有古意，當在孝王之前”。<sup>⑥</sup>《詩·商頌·長發》“何天之休”箋：“休，美也。”因此，休王者，美王也。此休王應指對西周早期某王所加的讚美的稱呼。

猷鐘（宗周鐘）“王肇適省文武，勤疆土，南國戾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戾子迺遣間來逆昭王，南夷東夷俱見，廿又六邦。”（《集成》260）

郭沫若先生說：“此鐘余以為乃昭王所作，銘中之‘戾子迺遣間來逆邵王’即昭王，邵乃生號，非死諡”<sup>⑦</sup>。郭老將此器定為昭王標準器，是弄錯了，西周早期有銘文的鐘是很少見的，該器經唐蘭先生考證，作器者猷就是西周晚期的厲王胡，此器應為厲王時器。<sup>⑧</sup>1978年和1981年陝西扶風先後出土的西周晚期的猷簋（集成4317）、五祀猷鐘（《集成》358）證實了唐先生的考證。

《說文》“邵，高也。”邵王者，偉大的王也。此昭王只能認為是對西周晚期周厲王的一種讚美的稱呼，並非西周早期昭王的生稱。銘中的王、昭王、猷都是指的周厲王，王與猷是周厲王的自稱，昭王是南夷、東夷廿又六邦對他的尊稱。

又如無惠鼎：“……王呼史麥冊命無惠曰：官司穆王逋（偵）側虎臣……”（《集成》2814）

此器腹飾盛行於西周晚期的鱗紋，銘中有活躍於西周晚期的司徒南仲、史麥等人物，也應是西周晚期的銅器，故知銘中的穆王，不是西周中期的穆王。《爾雅·釋詁》“穆穆，美也。”疏：“語言容止之美盛。”因此這裏的穆王，也只是對西周晚期某周王的

讚美的稱呼而已。

這說明在西周諸王稱中，有一種加在王之前的詞，僅表讚美之意，並非生稱，我們將這類對王的稱呼姑名其為“時王美稱”。

(二) 金文中除上述“時王生稱”和“時王美稱”以外，還有一些王稱，情況較複雜，也最有探討的必要，現按時代先後排列，試作分析如下：

### 1. 西周早期

#### (1) 周王

小孟鼎：……用牲禘周王、玟王、成王……（《集成》2839）

這裏排在玟王、成王前面的“周王”應該就是文王，考釋諸家皆無異言。《大雅·文王》毛傳“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以周為根據地，先後斷虞芮之訟、伐邶、伐密須、伐犬夷、伐耆、伐崇等，經營四方。文王建設了周，並在此成功地進行了滅商的準備，故文王又別稱周王，該銘是西周金文時王“生稱”之外還有“別稱”的有力證據。

#### (2) 成周王

成周王鈴“成周王鈴”。（《集成》416-417）

該銘只有四字，分鑄於兩件鈴上，一件銘為陰文，作“王成周鈴”、一件銘為陽文，作“成周王鈴”，僅此兩見，銘文讀法當從陽文者。從字面上看，可以理解為“某周王在成周所作之鈴”，或“成周王室用鈴”，當然也可以理解為“成周王做的鈴”。與其銘文相似的如買王罍觚“買王罍尊彝”（《集成》7275~7276），而與觚銘文相同的買王罍卣作“買王罍作尊彝”（《集成》5252），多一“作”字，說明“買王罍尊彝”就是“買王罍作的尊彝”。又如1978年湖南溆浦縣出土的一件鼎，銘為“中賁王鼎”（《集成》1933）、1985年湖南桃源縣出土的鼎，銘文為“合易王鼎”（《近出》314）。那兩件鼎銘文的讀法沒有歧義，只能理解成“合易王做的鼎”、“中賁王做的鼎”。“成周”為西周初年成王所建新城之名，即今之洛陽。後一種理解則說明西周早期曾有一“成周王”存在，當然，成王建都洛陽以後，不可能再把它交給一個什麼自稱為成周王的人去管理。那麼如何理解後一種可能呢？我們可以作兩種推測，一是成王建都之前，洛陽一帶就曾有一個名叫成周的邦國存在，該國國君自稱“成周王”，成王建都就以這個邦國之名為名。這樣兩件鈴可以理解為是成王建都之前，那個國君成周王的樂器。二是成王遷於東都成周，居於中國，統治從未有過的遼闊領土，遂以此都城為榮，循文王稱周王之例，用其為號，立別號為“成周王”。此說雖無文獻根據，但從金文內容看，不否定有這種可能性存在，並較之前說更有說服力。

#### (3) 豐王

豐王銅泡、斧：“豐王”。（《集成》11848~11850；11774）

張政烺先生考證說：“《史記·秦本紀》‘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下文又有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這個豐大約在今寶雞市以南，渭水南岸不很遠的地方……一九七六年三月臨潼與陳侯簋同坑出土的有王作豐妊盃：‘王作豐妊單寶盤盃……’周金文中直言王者皆指周王，乃姬姓天下之大宗……豐妊蓋妊姓女子出自豐國，因此揣測豐王或是妊姓。”

三件豐王銅泡和一件豐王斧銘文都十分簡單，只錄“豐王”二字，此二字有兩件銅泡分書爲“豐王”，另一件豐王銅泡和豐王斧則合書爲“璽”，與文王、武王、昭王有時也合書爲玟、珣、瑯一樣。幾件豐王銅器都是傳世品，沒有明確的出土地點可尋。1971年夏，陝西西安市長安區馬王鎮車馬坑出土一件當盧，背面鑄陽文“豐師”二字，（《文物》2002年12期）《廣雅》云：“澧水，源出鄠縣南山豐谷，北流經長安城西”。此當盧出土地近豐水，“豐師”之地當是因水得名。豐師當盧與豐王銅泡和斧的時代相同，所指當爲一事，可能地名豐師，國名豐國，其君則稱豐王。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二十七引孫之騷《考訂竹書》云：“武王既遷鎬京，乃封其弟於豐。”《姓纂一志》、《通志·氏族略二》也都說是“文王第十七子。”可能文王第十七子立國之豐，即文王、武王所都之豐，說明此豐國，初建時爲姬姓，其地在今鄠縣境。

作冊魑卣：“公太史在豐”，（《集成》5432）

小臣宅簋：“同公在豐”，（《集成》4201）

太保玉戈銘：“王在豐”（《考古與文物》1986年1期）

上述三件器時代亦爲西周早期，當指同一地，即豐京、鎬京之豐。

懽季遽父卣、尊“懽季遽父作豐姬寶尊彝”（《集成》5357-8、5947）

大祝追鼎“伯太祝追作豐叔姬鬯彝”（《上博》8期132頁）

懽季遽父卣、尊於1972年陝西扶風劉家村墓葬出土，時代屬西周早期。大祝追鼎是徵集品，時代屬西周晚期。兩器銘中女名前無“媵”字，皆不像是嫁女之器，銘中的女名“豐姬”、“豐叔姬”有可能是作器者的婦或母，其名係由母氏的姓與氏構成，兩器中的女名說明豐國或有可能爲姬姓。

豐方鼎“惟周公于征伐東夷，豐伯、薄姑，咸伐”（《集成》2739）該鼎銘之豐伯國地近薄姑，屬東夷之一部，當爲東土的豐國。又有兩件豐伯兵器出土於洛陽，似乎也透露出東土有個豐國的信息。

豐伯戈“豐伯作戈”（《集成》11014）

豐伯劍“豐伯”（《集成》11572）

此東土的豐國，爵稱爲伯，其姓不詳。

西周晚期還有兩件扶風出土的銅器，說明還有一個豐邢氏國存在：

犀卣“犀作卣，子子孫孫永寶用。豐邢。”（《集成》919）



豐邢叔簋“豐邢叔作伯姬尊簋”（《集成》3923）

此豐邢氏國，地當在西土，其姓也不詳。

這些說明，歷史上不止有一個豐國存在，張先生文中所舉《秦本紀》“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之豐王，以及王作豐妊盃中的妊姓豐國，皆爲西周晚期之事，與西周早期可能是姬姓的豐王之豐國，時代相去較遠，恐並非一事。

在寶雞竹園溝曾出土一件西周早期的豐公鼎，銘爲“豐公□作尊彝”（《集成》2152）時代和出土地均與豐王銅器相近，其中豐公與豐王的關係耐人尋味。此“豐王”是姬姓，且其王稱寫法與西周早期其他諸王稱復寫的寫法相合，所以不排除其是西周早期某周王的別稱的可能性。大概西周早期某周王先在豐地作豐公，後即位稱王，因不忘其出身之地，遂別稱豐王。

#### （4）買王

買王罍觚“買王罍尊彝”。（《集成》7275~7276）

買王罍卣“買王罍作尊彝”（《集成》5252）

#### （5）矢王

矢王鼎蓋、觶“矢王作寶尊彝”。（《集成》2149；6452）

### 2. 西周中期

#### （1）矢王

同卣：惟十又二月，矢王賜同金車、弓矢。同對揚王休，用作父戊寶尊彝。（《集成》5398）

矢王簋蓋：矢王作鄭姜尊簋……（《集成》3871）

#### （2）幽王

幽王盃：幽王作姬姊盃。（《集成》9411）

幽王鬲：幽王作姜氏齋。（《近出》125~6）

2002年保利藝術博物館入藏了一件重要銅器幽公盥（《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5期）

銘文內容十分奇特，爲以前所未見，銘文中幽公說話的口氣很大，既教訓一般民眾，也訓導時王，幽公到底是個甚麼人？一時成了謎。我曾撰《幽公考》一文，對其身份加以猜測，現將該文考證“幽公其人”的內容摘要於下：

《爾雅·釋親》“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金文中往往有爲親姊作器者，如：

公仲涉簋“公仲涉作公姊寶簋，其萬年用。”（《保利藏金續》120頁）

季公父簋“季公父作仲姊嬭姬媵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集成》4572）

幽王盃銘中的女名爲“姬姊”，其中“姬”應該是該女的姓，沒有問題，姓後的“姊”字按一般先秦女子命名的規律，即應爲其名字，但認爲該女以親屬稱謂詞作女名，在解釋上，有一定困難。因此我猜想，由於金文句子中，詞序每不固定，是否可能“姬姊”是

“姊姬”之倒，那樣，幽王盃銘“幽王作姊姬盃”就表明幽王是爲一姬姓的姐姐作器，器銘中的幽王自然也應是姬姓。近年在陝西眉縣發現同銘的兩件幽王鬲，銘爲“幽王作姜氏齋”，是說幽王爲其夫人姜氏作器。1974年在眉縣東面陝西藍田縣城關的墓葬裏出土了王作姜氏簋，器、蓋同銘爲“王作姜氏尊簋”。（《集成》3570）保利藝術博物館近年也收集到一件王作姜氏簋，銘文內容以及行款字體與藍田縣所出完全一樣，可能是同一墓中之物。（《近出》429）幽王的夫人稱姜氏，此王的夫人也稱姜氏，銅器的時代和出土地又很接近。因此，有理由懷疑簋銘中的王，極有可能就是眉縣發現的幽王鬲中的幽王，如這個懷疑可能成立的話，那就說明“幽王”有時也可省稱爲“王”，與其他周王的稱呼無異。而這些銅器與幽公盥、幽王盃形體紋飾與銘文風格也比較接近，都有可能是幽王一人所作。

史書西周中期的記載十分簡略，但有一點諸書皆同，即共、懿、孝三王期間，曾經發生一次超乎尋常的繼位次序混亂，即懿王死後，沒有把王位傳給其子，王位爲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父孝王辟方取得，這在嚴格按“父死子繼”的原則傳位的西周王朝來說，是唯一特例。西周初年周公總結了殷人亡國的教訓，他看到殷人以“兄終弟及爲主”的傳位法，弊病在於衆多兄弟都有得到王權的企盼，容易形成爭奪的局面。因而爲少年的成王制訂了繼位“傳子不傳兄弟”的傳國大法，他還以身作則，在成王年長之後，退居臣位，讓成王主政。此後，康、昭、穆、恭、懿莫不遵循不待，唯獨懿王之後，發生了變故，而這場變故並非由於懿王無子引起，因爲史載孝王之後的夷王，就是懿王的親子。西周中期諸王，在位時間都不長，那麼懿王稱王之末年，即將得到王位的孝王辟方稱什麼呢？我認爲不排除此時的辟方稱幽公的可能，因爲幽是周人發祥之地，不可能容許外姓人插足而稱公、稱王，極有可能爲周王族之王公貴戚中掌實權者所盤踞。通觀西周金文，周雖在洛陽設立東都，但許多重大祭祀與冊命典禮仍在其老家宗周一帶舉行，金文記載幽地駐有重兵（幽師）把守，正說明幽地應爲周王族所直接控制之地。《竹書紀年》（今本）云：“懿王之世，興起無節，號令不時，挾壺氏不能共其職，於是諸侯攜德。”著名的懿王標準器匡卣（《集成》5423）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銘文記載懿王在射廬，舉行捕兔的遊戲，匡因爲捕到了兩個小兔子，因而受到了懿王的嘉獎，銘文活畫出懿王逸於淫樂，不務正業的形象。面對這樣一個懦弱無能、舉措無方的侄子爲王，幽公辟方可能覬覦王位很久了。幽公取得王位之後，稱爲孝王，但不排除其別稱幽王。文獻記載厲王曾稱“汾王”，《竹書紀年》（今本）記共和時事，云：“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於大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靜，共和遂歸國。”“厲王名胡”，原注：“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我想，既然厲王因居於汾水而可以別稱爲汾王，那麼孝王爲甚麼不可以因爲曾居於幽地，作過幽公，而稱爲幽王呢？據王國維考證，西周時王之號是生稱的，辟方之所以自稱孝王者，蓋西周之世，淪及恭、懿之時，已積弱不堪，以至於懿王在宗周待不下去，一度被迫遷都到犬丘。辟方

欲以恢復父考穆王盛世爲己任，如孔子所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故自命爲孝王。幽公盨中所強調的“天釐用考神”，對辟方而言，考神就是穆王，可能也含有這個意思在內。

### （3）畢王

望簋：惟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宮新宮，旦，王各大室，即位。宰匭父佑望，入門，立中廷，北向。王呼史年冊命望：死司畢王家。賜女……用作朕皇祖伯甲父寶簋……（《集成》4272）

郭老解釋銘文說“死司畢王家，言夷司在畢之先王宗廟，與伊簋官司康宮王臣妾百工語例相同。”<sup>⑨</sup>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六）》錄有望簋，所釋同《大系》；于省吾《雙劍謠吉金文選》、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亦僅有錄文，並無考證。白川靜《金文通釋》第九輯“爲命其地之宮室死司之事，畢爲周之同宗，《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中列爲‘文之昭’之一，亦見於《魏世家》中。蓋爲王族之一，而掌管王陵之地之畢者也。”這實際也只是演繹《大系》的說法，並無新的意見。郭老實際是把“畢王家”解釋爲“畢地的王室宗廟”，通觀金文，沒有用“家”來記宗廟的先例，金文本有廟字，寫作“宗廟”（乖伯簋《集成》4331）、“周廟”（塋方鼎《集成》2739、無惠鼎，《集成》2814、小孟鼎，《集成》2839、盞方尊，《集成》6013、虢季子白盤，《集成》10173、三十三年逯鼎，《文物》2003年6期）、“康廟”（南宮柳鼎，《集成》2805、元年師兌簋，《集成》4247）、“穆廟”（大克鼎，《集成》2836）、“享廟”（師秦公鼎《集成》2747）、“大廟”（逆鐘，《集成》60、免簋，《集成》4240、趯簋，《集成》4266、同簋，《集成》4270、三年師兌簋，《集成》4318、敵簋，《集成》4323、）等，也有時用康宮、京宮等記康王之廟和諸先王之廟，卻從不見可以把“家”釋成“廟”的，“王家”也絕沒有釋成“王室宗廟”的先例。因此，望簋的“死司畢王家”與伊簋的“官司康宮王臣妾百工”語例，並不具備可比性。

大克鼎“……肆克恭保厥辟共王，諫辭王家，惠於萬民……”（《集成》2836）

蔡簋“……昔先王既命女作宰，司王家。今余唯申京乃命，令女累習，黜疋對各，從司王家外內，毋敢有不聞……”（《集成》4340）

毛公鼎“王曰：父盾，今余唯肇經先王命，命女辭我邦我家內外……王曰：父盾，今余唯申先王命，命女極一方，弘我邦我家……”（《集成》2841）

上述銘文中的“王家”、“我家”等，皆指“時王之家”，與宗廟無干。所以望簋中的“畢王家”即“王在周康宮新宮，旦，王各大室，即位”的“時王”之家。一般認爲望簋是西周中期器，可是文獻記載，西周中期有穆王、恭王、孝王、懿王等生稱的王名，並無稱畢王者，因而我們猜測“畢王”有可能是西周中期某王的別稱。有的先生認爲望簋是懿王時期的器，果如此，則畢王就有可能是懿王的別稱。《漢書·匈奴

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翟交侵，暴虐中國。”《帝王世紀》“周懿王自鎬徙都犬丘”《竹書紀年》（今本）“七年西戎侵鎬，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遷於槐里。”《漢書·地理誌》“右扶風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犬丘近畢，又文武周公皆葬於畢，循厲王別稱汾王、孝王可能別稱幽王之例，或懿王又別稱畢王，亦未可知。

#### （4）買王

任鼎“惟王正月，王在氐。任蔑曆，使獻爲於王，鼎盞，買王使孟聯父蔑曆，賜胙牲大牢……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厥皇文考寶鬯彝，其萬無疆，用格大神。”（《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2期）

此鼎銘若如《任鼎銘文考釋》作者所考，（見同刊）將句子斷在買字後，整篇銘文難於講通，若買字連下讀，讀爲“買王”，則大意可通，且與西周早期買王眾觚、卣之買王相合，他們應同是一國之君王，只是本銘之買王時代晚於前買王而已，就像矢王存在於西周早中晚各個時期一樣，此買王存在於西周早期和中期，亦不足爲奇。鼎銘大意是：買王使任向在氐的周王貢獻，任受到周王“蔑曆”，事情辦理完畢之後，買王又使其下屬孟聯父“蔑曆”他，並賞賜他醴酒犧牲等。從買王需向周王進貢等銘文內容看，其身份應是在野的異族邦君而稱王者，所以“買王”應歸入“在野王稱”一類。

#### （5）釐王

泉伯貳簋蓋：……王若曰：泉伯貳，繇自乃祖考有勲於周邦，佑辟四方，惠宏天命，女肇不墜，余賜女……泉伯貳敢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釐王寶尊簋……（《集成》4302）

泉伯的先人曾“有勲於周邦”，他本人又能承繼祖先之業，效忠周王室，去王號，服侍周王，因而受到賞賜。他稱其皇考爲釐王，稱周王爲天子，顯然他並未將皇考釐王與周王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泉伯應是異族邦君而臣服於周人者。我們也應稱釐王這一王稱爲“在野王稱”。

#### （6）師眉嬴王

師眉嬴王鼎、簋：祝人師眉嬴王爲周客，賜貝五朋，用爲寶器……。 （《集成》2705、4097）

西周時稱先王之後爲“客”，《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師眉嬴王是黃帝之後祝人之君，故作爲周之客而受到賞賜。此王稱也應歸入“在野王稱”。

#### （7）幾王

乖伯簋：……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忘小裔邦。歸芻敢對揚天子丕杯魯休，

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集成》4331）

此乖伯自稱小裔邦，稱周王為天子，稱其皇考為幾王，在乖國看來，稱王低於稱天子。乖國不見於文獻記載，可能是西周中期一異族邦國，也可以歸在“在野王稱”一類。

### 3. 西周晚期

#### （1）呂王

呂王鬲：呂王作尊鬲，子子孫孫永用享。（《集成》635）

呂王壺：呂王造作芮姬尊壺，其永寶用享。（《集成》9630）

呂為姜姓，《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本姓姜氏，”《尚書·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從金文記載看，呂國在西周晚期已經稱王，至春秋晚期仍有職鐃銘云“余呂王之孫，楚成王之盟僕男子之藝”（《近出》98~105），可見《尚書》記其“命王”及“享國”長達百年未絕，不為無據。

#### （2）昆疇王

昆疇王鐘：昆疇王貯作和鐘……（《集成》46）

#### （3）矢王

散氏盤：……厥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集成》10176）

張政烺先生由西周中期矢王簋蓋銘“矢王作鄭姜尊簋”。考證得出矢為姜姓，並說“矢王姓姜，蓋出於姜，與周不同族，則稱王是姜姓的舊俗，由承襲而來，非僭王號，也不是由於周王的錫命。”<sup>⑩</sup>其地理位置，盧連成、尹盛平曾著文《古矢國遺址墓地調查記》<sup>⑪</sup>加以確定。矢王之稱除見於西周早期矢王鼎、觶外，西周中期有矢王簋和同卣，同卣銘記矢王賞賜其下屬“金車、弓矢”等，可見西周中期的矢王，具備一定的經濟和政治實力。西周晚期著名的散氏盤中記錄矢、散土地糾紛，最後以矢王“授圖於豆新宮東廷”告終。從金文記錄看，矢以王稱，終西周一世不斷。而且，並不如王國維氏所說，古諸侯僅限於在國內稱王，在矢、散兩國交際文書中，照樣稱王不待。據以上分析，矢王應屬“在野王稱”。

#### （4）遲王

仲禹父簋（甲）：仲禹父太宰南申厥（有）司作其皇祖考遲王、監伯尊簋。（《集成》4188）

仲禹父簋（乙）：

蓋銘：仲禹父太宰南申厥（有）司作其皇祖考遲王、監伯尊簋。（《集成》4189）

器銘：南申伯太宰仲禹父厥（有）司作其皇祖考遲王、監伯尊簋。（《集成》4189）

這兩件仲禹父簋的銘文詞序不太穩定，乙簋的蓋與器銘前後次序變化較大，縱觀全銘，應讀為“南申伯太宰有司仲禹父作其皇祖考遲王、監伯尊簋。”這兩件簋是



河南南陽古墓中出土的，在1984年被報導時，同刊也發表了李學勤先生的文章《論仲禹父簋與申國》，他認為銘中的遲王就是西周晚期的夷王，並說仲禹父簋是宣王標準器（《中原文物》1984年4期），其實作器者仲禹父的地位並不高，只不過是南申國太宰的有司之一而已，堂堂周夷王的王孫怎麼會去南申國太宰的手下做個小官吏呢？從銘文內容看，遲王、監伯是仲禹父的皇祖考，這表明遲王與監伯必是同姓父子關係，如果遲王就是西周晚期的周夷王，那麼遲王、監伯得都是姬姓纔行，我們雖無法知道這裏的遲王是否姬姓，但可以考知監伯必不是姬姓。同樣是西周晚期的叔碩父鼎銘文曰：新宮叔碩父、監姬作寶鼎（《集成》2596）。西周金文往往記錄夫妻共同作器，如盧鐘：盧眾蔡姬永寶，用昭大宗。（《集成》88）、猷叔信姬鼎：猷叔信姬作寶鼎（《集成》2767）等等。依此例，叔碩父鼎銘中的叔碩父可能就是監伯，簋銘說的是監伯監姬共同做器，這裏監姬是姬姓女子嫁於監伯，該女名是由夫氏的氏名加上母氏的姓構成，根據同姓不婚的原則，此女名說明監國不應該是姬姓，同時代的仲禹父簋中的監伯也不應該是姬姓，其父遲王也就不可能是姬姓，因為周王必須是姬姓，當然這裏的遲王就根本不可能是西周的夷王了。（詳見筆者《南陽仲禹父簋不是宣王標準器》一文<sup>⑫</sup>）。上述考證說明遲王與呂王、矢王、昆侖王一樣，是一位在野之王的王稱。

## 四 春秋戰國金文中的王稱

進入春秋時期以後，王室衰微，諸侯力政，禮崩樂壞，各國紛紛自立為王。見於金文者，春秋有吳、越、楚、徐、呂、郟、申、索魚等。戰國有越、楚、徐、燕、周、秦、雍、中山、中賁、合易、巨莛等。

### （一）春秋時期

#### 1. 吳王

邞王是野戈“邞王是野作為元用（《集成》11263）”

工戲王之孫鑒“……工戲王之孫……”（《考古》2003年3期）

者減鐘“工戲王皮然之子者減擇其吉金，自作謠鐘”（《集成》193~202）

夫欽壽鼎“余以煮以烹，以伐四方，以撻工戲王”（《近出》354）

叔巢鐘“叔巢曰：余攻王之玄孫”（《考古》1999年11期）

吳王光戈、劍等“吳王光逗自作用戈”（集成11255~7、11620）

吳王光戈“攻敵王光自……”（《集成》11151）



吳王光鑑“吳王光擇其吉金”(《集成》10298~9)

蔡侯殘鐘“吳王光逗之穆曾舒金”(《集成》224、1)

攻敵王夫差戈、矛等“攻敵王夫差自作其用戈”(《集成》11288、11534)

吳王夫差鑑“吳王夫差擇厥吉金，自作御鑑”(《集成》10294~6)

配兒勾鐸“吳王□□□□犬子配兒”(《集成》426~7)

吳王孫無土鼎“吳王孫無土之廚鼎”(《集成》2359)

羅兒匜“羅兒曰：余吳王之甥”(《近出》1018)

## 2. 越王

越王矛“越王”(《集成》11451)

越王之子勾踐劍“越王之子勾踐”(《集成》11594-5)

越王太子不壽矛“於越以王旨於之太子不壽自作元用矛”(《集成》11544)

## 3. 楚王

中子化盤“中子化用保楚王”(《集成》10137)

楚王領鐘“楚王領自作鈴鐘”(《集成》53)

楚王鐘“楚王媵江仲芊南和鐘”(《集成》72)

蔡侯申組鐘“左右楚王”(《集成》210~218)

王孫誥鐘“敬事楚王”(《近出》60~84)

楚屈叔沱戈“楚王之元右王鐘”(《集成》11393)

匜戟“新命楚王□膺受天命”(《近出》1197)

## 4. 徐王

沅兒鐘“徐王庚之淑子沅兒擇其吉金。”(《集成》203)

庚兒鼎“徐王之子庚兒自作臥繁。”(《集成》2715)

徐王之子段戈“徐王之子段之元用戈”(《集成》11282)

徐王觶“徐王弟又之耑”(《集成》6506)

徐王義楚觶“徐王義楚擇余吉金，自作祭鐺。”(《集成》6513)

徐王義楚之元子劍“徐王義楚之元子柴擇其吉金，自作用劍”(《集成》11668)

宜桐孟“徐王季糧之孫宜桐作鑄臥孟”(《集成》10320)

徐王子旃鐘“徐王子旃擇其吉金，自作和鐘”(《集成》182)

甚六罍“徐王之孫尋楚馱之子甚六擇厥吉金，作鑄和鐘”(《近出》94)

## 5. 呂王

黻罍“余呂王之孫，楚成王之盟僕男子之藝”(《近出》98~105)

## 6. 郢王

郢王劍“郢王蘧自作承鐙”(《集成》11611)

《尚書·呂刑》又稱《甫刑》，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疏云：“史公‘呂’作‘甫’者，《禮記》引此經俱作《甫刑》，《孝經》引同也”又云“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證之金文，呂王之稱，見之西周晚期，而甫（郇）王之稱，則見於春秋晚期的郇王劍銘，可能呂王之子孫後居於甫，遂改稱甫（郇）王。

### 7. 申王

申王之孫叔姜簠“申王之孫叔姜自作飢簠”（《近出》521）

申文王之孫州鞶簠“申文王之孫州鞶擇其吉金，自作飢簠”（《古文字研究》第25輯189~193頁）

### 8. 塞王

塞王戟“塞王之戟”（《近出》1125）

### 9. 索魚王

索魚王戈“索魚王□□戈”（《近出》1147）

## （二）戰國時期

### 1. 楚王

楚王畚鼎、盤等“楚王畚戰獲兵銅”（《集成》2794、10158、13380等）

楚王畚鼎、盤、匜等“楚王畚作鑄匜鼎”（《集成》2623、10100等）

楚王畚章鐘“楚王畚章作曾侯乙宗彝”（《集成》83）

楚王畚章戈“楚王畚章嚴恭寅作粹戈”（《集成》11381）

楚王燈“楚王”（《集成》10400）

### 2. 越王

越王者旨於賜矛、劍、鐘等“越王者旨於賜”（《集成》11511、11512、144）

越王州勾劍“越王州勾自作用劍”（《集成》11622~11632）

越王嗣旨不光劍“越王嗣旨不光自作用攻”（《集成》11641~11642）

越王不光劍“越王不光□□□□”（《集成》11644~11650）

越王刁北古劍“越王刁北古；惟越王刁北自作元用劍”（《集成》11703）

### 3. 燕王

燕王戎人矛等“匱（燕）王戎人。”（《集成》11479、11498、11237~11239等）

燕王喜矛、劍等“燕王喜□□”（《集成》11482等）

燕王職矛等“燕王職□□”（《集成》11480、11483、11224、11110、11187、11514~11521等）

燕王職壺“唯燕王職蒞阼承祀”（《上博》8期146頁）

燕王罍矛等“燕王罍□”（《集成》11497）

#### 4. 周王

周王段戈“周王段之元用戈。”（《集成》11212）

#### 5. 徐王

自鐘“自余徐王旨後之孫”（《文物》2004年2期）

#### 6. 秦王

秦王鐘“秦王卑命競坪王之定救秦戎。”（《集成》37）

#### 7. 雍王

雍王戈“雍王其所馬”（《集成》11093）

東姬匜“宣王之孫雍王之子東姬自作會匜”（《近出》1021）

#### 8. 中山王

中山王鼎“中山王譽作鼎于銘”（《集成》2840）

中山王方壺“中山王譽命相邦調擇燕吉金，鑄爲彝壺”（《集成》9735）

#### 9. 中賁王

中賁王鼎“中賁王鼎”（《集成》1933）

#### 10. 合易王

合易王鼎“合易王鼎”（《近出》314）

#### 11. 巨荳王

巨荳王鼎“巨荳王”（《集成》2301）

## 五 結語

我們較全面的排列了各個時期金文中記錄王稱的情況，對其中一些有條件考證的銘文作了初步的檢討。得出結論如下：商代的王稱十分簡單，僅發現四祀卣其卣有“王曰：尊文武帝乙宜”一條，在追述先王時，對商王稱“帝”的，其餘大量晚商銘文中的商王一律只稱“王”。《殷本紀》“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太史公以爲殷稱帝，周貶帝號改稱王。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從甲骨、金文內容看，稱殷王爲“帝某”，並不普遍，殷人對殷王的實際稱謂仍是“王”。西周時代金文中的王稱則比較複雜，我把它歸納爲“時王生稱”、“時王美稱”、“時王別稱”“在野王稱”等四種不同類型。其中“時王生稱”爲王國維先生所發現，郭沫若先生加以推廣運用，後來成爲金文斷代的基本方法。見於金文的“時王生稱”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共十王，史牆盤一銘連敘六王，逯盤更一

銘連敘十王，可見周人對祖先譜系的重視。“時王美稱”的內容，前人已有述及，但尚未形成理論概念，本文則給以了適當的概括。見於金文的“時王美稱”有休王、昭王、穆王三種，其中昭王、穆王與生稱的時王王稱全同，須仔細考索，方能辨別出來。“在野王稱”已有王國維、張政烺兩位前輩學者作了較全面的論述，本文只是做了部分補充和修改。見於西周時期金文的“在野王稱”計有買王、矢王、釐王、師眉羸王、幾王、呂王、昆疒王、遲王等，見於春秋戰國金文的有吳王、越王、楚王、徐王、呂王、郈王、申王、塞王、索魚王、燕王、周王、秦王、雍王、中山王、中賁王、合易王、巨荳王等。這些東周在野王稱有不少是未見於文獻記載的，它們豐富了我們對東周歷史的認識。當然，時至東周已不能按“時王”和“在野”來區分王稱，這裏祇是沿用上文的稱呼而已。

本文的重點在於對“時王別稱”的提出及考證，經過梳理，筆者推測早期金文中的“周王”、“成周王”、“豐王”有可能是文王、成王和西周早期某王的別稱，西周中期金文中的“畢王”、“幽王”有可能是“懿王”和“孝王”的別稱。其中“豐王”和“幽王”尚有同時代的“豐公”和“幽公”銅器存在，可能說明諸王在稱某王之前，皆有先稱某公的可能。“時王別稱”中的周、成周、豐、畢、幽等都是西周的都城或重要駐地之名，說明當時的周王或因曾居住成長於某地，或以開發或守成某一城都為榮，於是即以該城都或駐地名稱為別號。西周王朝算上文王共有十三王，本文已考出五王可能有別稱，加之文獻別稱厲王為汾王，這樣就已知半數左右周王有別稱。說明在西周王室，這是一種較普遍的現象。“時王別稱”的概念是筆者在考釋幽公盨時悟出的，因為該盨銘文的內容太奇特，幽公的身份也十分神秘，不作如此推測，幾乎無法理解銘文內容。當然，對這個概念而言，目前我的分析還停留在十分初步的階段，文獻論據很薄弱，金文論據也不能說很堅強。這個概念提出的優點在於可以打開思路，從一個新的角度去認識金文王稱的含義，進而較好的讀通幾篇銘文的內容，但距成熟的結論還有很長的距離，希望它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 注 釋

- ① 《觀堂集林·別集一》16~17頁 中華書局1961年版。
- ②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冊一35頁、52頁。
- ③ 《矢王簠蓋跋》《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 中華書局1986年6月。
- ④ 《觀堂集林》卷十八《適簠跋》。
- ⑤ 《殷周金文集成》8309收錄一件商代的爵，此器現藏國家博物館，從器名看，《集成》作者釋其銘文為“妝王”，實際此爵的銘文並不清楚，尚無法確釋，無論如何，不太可能是“妝王”。

- ⑥ 《大系》釋文 95 頁。
- ⑦ 《大系》釋文 51 頁。
- ⑧ 《周王猷鐘考》原載《考古社刊》第六期 1937 年，後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34—44 頁，故宮博物院 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
- ⑨ 《大系》釋文 80 頁。
- ⑩ 《矢王簋蓋跋》《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 中華書局 1986 年 6 月。
- ⑪ 《文物》1982 年第 2 期。
- ⑫ 《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 中華書局 199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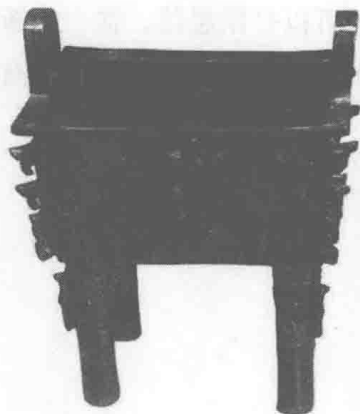
《集成》3822 圖



《集成》3822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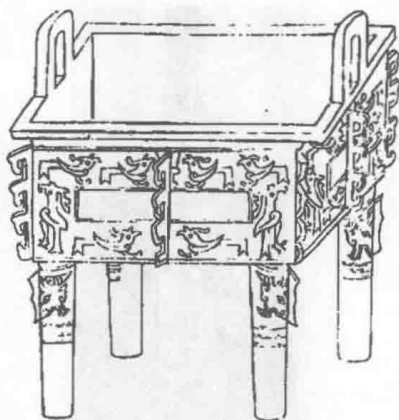
《集成》3823 銘文



《集成》2453



《集成》2453 銘文



《集成》2454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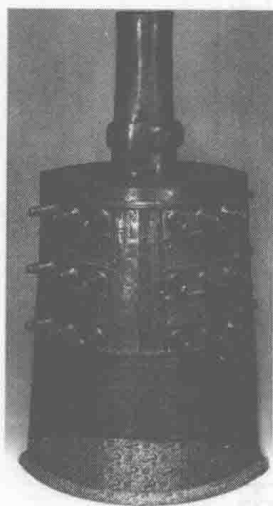
《集成》2454 銘文



《集成》2455



《集成》2455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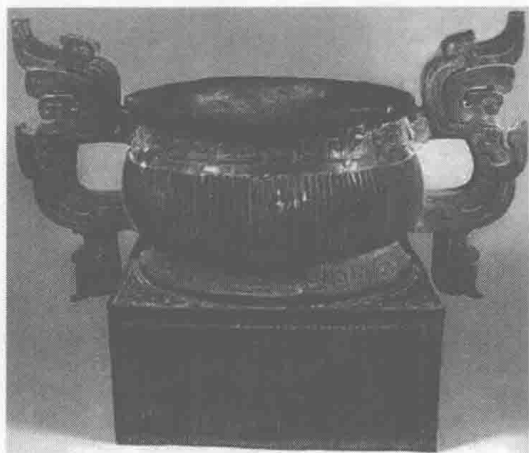
《集成》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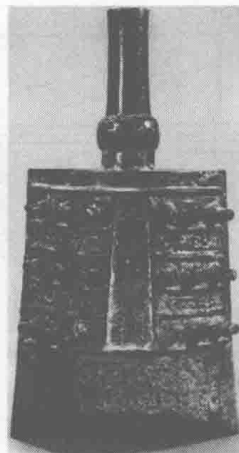
《集成》260 銘文







《集成》4317



《集成》358



《集成》2814



《集成》2814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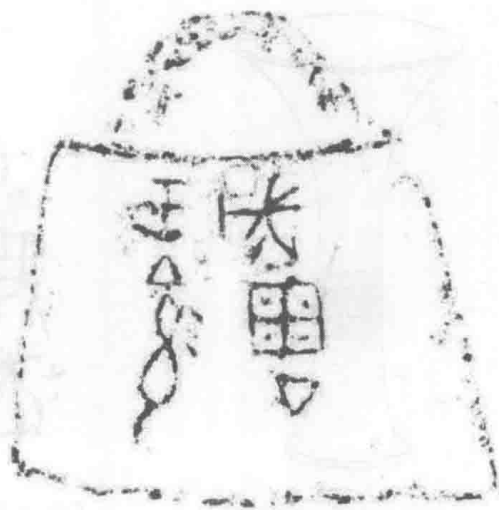
《集成》2839 銘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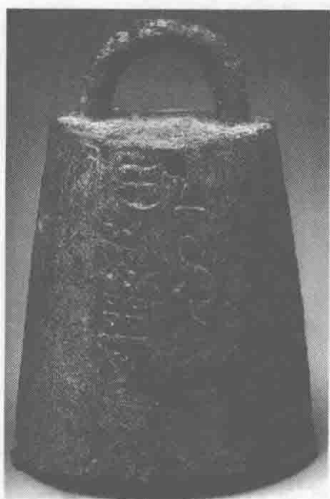
《集成》2839 銘文摹本（局部）



《集成》417（故宫博物院）



《集成》417 銘文



《集成》416（臺北故宫博物院）



《集成》416 銘文



《集成》11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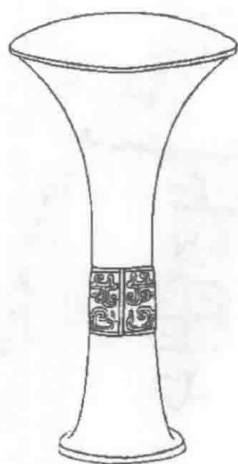
《集成》11849



《集成》1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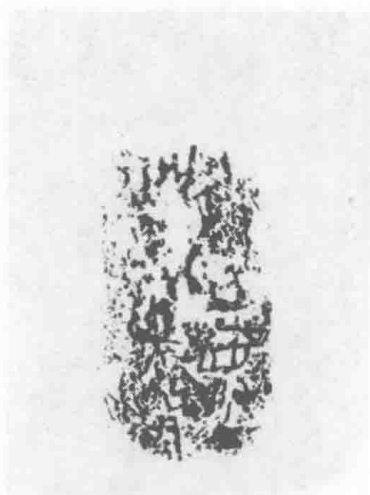
《集成》11774



《集成》7275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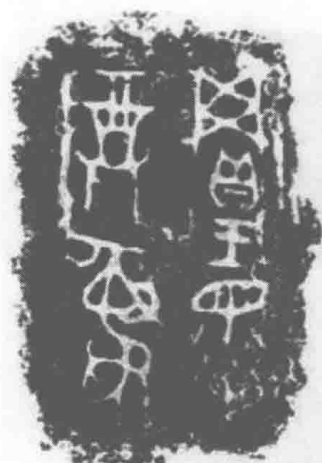
《集成》7275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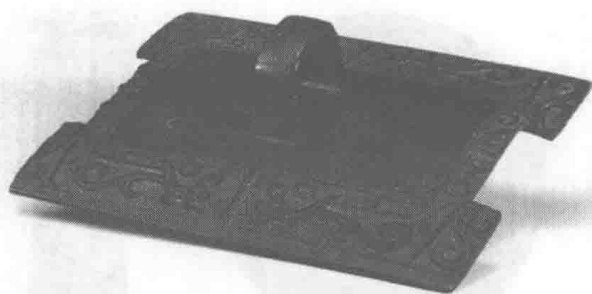
《集成》7276 銘文



《集成》5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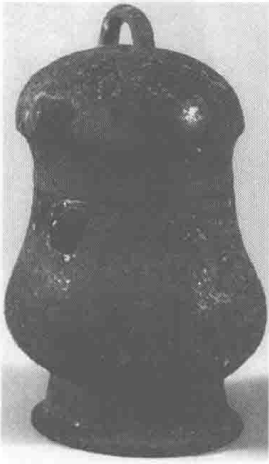
《集成》5252 銘文



《集成》2149



《集成》2149 銘文



《集成》6452



《集成》6452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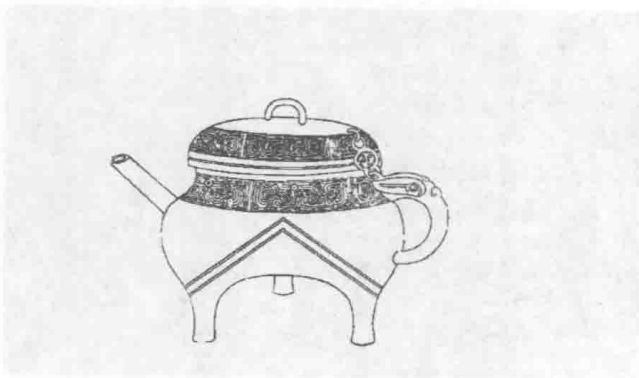
《集成》5398 銘文



《集成》3871



《集成》3871 銘文



《集成》9411 圖



《集成》9411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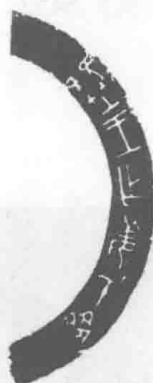
《近出》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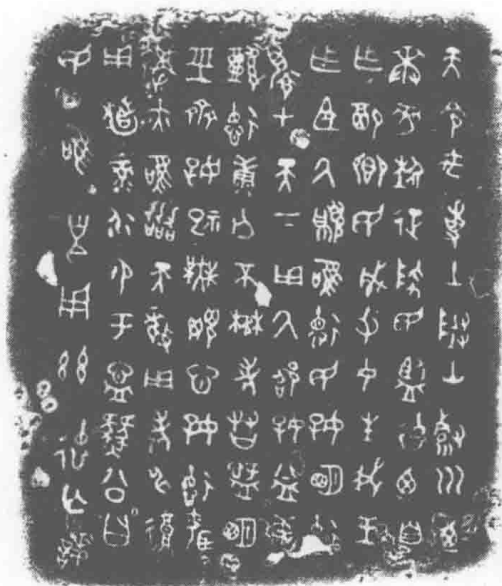
《近出》125 銘文



《近出》126



《近出》126 銘文



齒公盨銘文



齒公盨



《集成》3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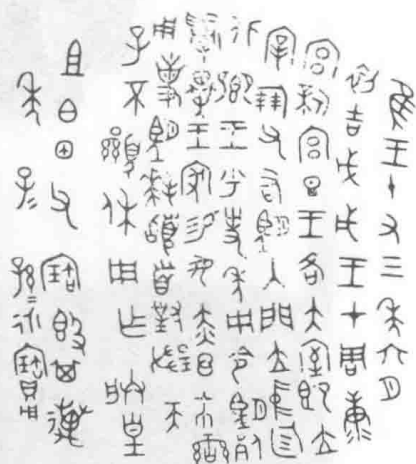
《集成》3570 銘文



《近出》429



《近出》429 銘文



《集成》4272 銘文



任鼎



任鼎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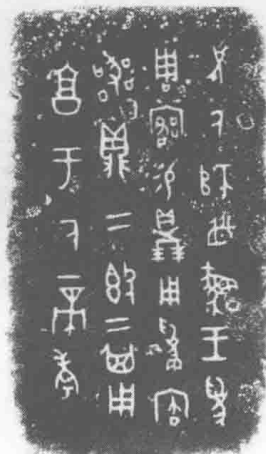




《集成》4302 銘文



《集成》2705



《集成》2705 銘文



《集成》4097



《集成》4097 銘文



《集成》4331



《集成》4331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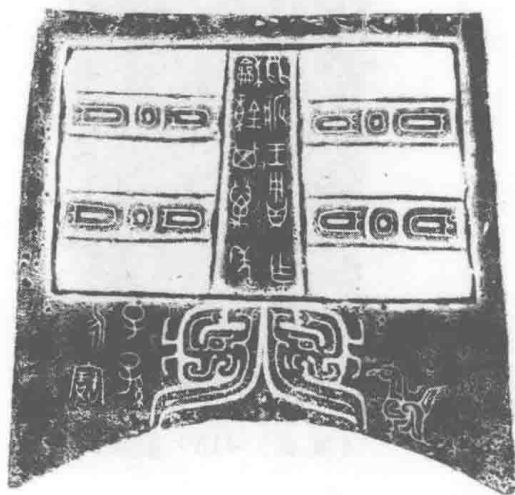
《集成》635



《集成》635 銘文



《集成》9630 銘文



《集成》46



《集成》10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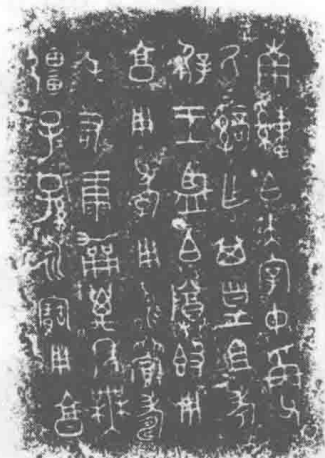
《集成》10176 銘文（局部）



《集成》4188



《集成》4188 銘文



《集成》4189 蓋銘文



《集成》4189 器銘文

# 書評及序跋



## 介紹《金文著錄簡目》

《金文著錄簡目》編者孫稚雛（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中華書局，1981年10月出版。十六開本，平裝412頁。

凡欲治一種學問，必先盡可能詳盡地佔有該領域的資料，治金文的學者也不能例外。因此一部翔實準確的金文工具書，是開展學術研究所不可缺少的。郭沫若同志在敘述其早年從事金文研究時曾說：“處理資料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表》與《說文諧聲譜》二書，余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孫編《金文著錄簡目》（下稱《簡目》）就是在郭沫若同志所說的王國維於1914年編纂的《國朝金文著錄表》的基礎上，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而編成的。王表初編引書16種，收器4295件（其中先秦器3569件）。與此同時王氏還編纂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引書11種，收器643件。1928年容庚先生重編《宋代金文著錄表》，在體例上作了較大的改進。1933年羅福頤增補王表成《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引書35種、收器5780件（其中包括漢至宋元銅器1169件，實際收入秦以前器4611件）1939年美國人福開森邀請一批中國學者，編纂《歷代著錄吉金目》一書，囊括了前此著錄的全部金文資料。

容庚先生從1934年開始即着手對羅表進行校補，六十年代初孫稚雛同志就讀於容先生門下，在容先生指導下繼續此項工作。二十年後，終於將這部凝聚着幾代人心血的重要金文工具書公諸於世了。

該書首列“例言”、“引用書目”、“分類目錄”，然後按器類逐件標出著錄情況。引書截至1979年，收器時代限於秦統一前。引書中文部分149種，日文部分31種，西文部分36種，共計216種。引書條目達三萬五千餘條，收銅器7312件（按該書體例，同銘之器未發表者則於該器下註明尚有器數。如加上這部分器，收器總數八千件左右）。該書收錄未著錄器58件，對宋、清以來著錄的沒有墨拓流傳於世的金文材料，則揀選了重要的收入。應該說古今中外已著錄的有價值的金文材料，十之八九已被作者



較準確地收入《簡目》。因此它是一部到目前為止我們能見到的較全面的金文著錄表。

編纂金文著錄表，王氏首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其後各家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皆有增補。六十年代初陳夢家先生編輯《美帝國主義劫掠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一書，對流散在美國的銅器收藏著錄情況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1962年至1973年日本學者白川靜在所著《金文通釋》一書中，對兩周較重要的銅器著錄情況作了整理；1967年日本另一位學者林已奈夫編輯了《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參照目錄》（附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目錄）；1977年香港周法高等編輯了《三代吉金文存著錄表》；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金文集成》編寫組編輯了《三十年來出土的殷周有銘銅器簡目》（油印本，按地域分類，收器1211件）。上述諸書都收進了不少新的材料，對前此的著錄情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校補。從積累資料的角度說，各書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然而解放以來出版的這些書都只收錄了部分金文資料，未能反映金文著錄的全貌。《簡目》最後出，吸收了各書的精華，收器及引用書目數皆倍於前人，特別是將1979年以前的考古文物等刊物發表的新資料包括進去，其內容可以說概括了金文學家幾代人積累的成果。它是一部比較好的金文工具書。

《簡目》編者師承容庚先生嚴謹的治學作風，其中每件器，每種著錄書大都經過較嚴格地審核。比如羅振玉所著《三代吉金文存》一書，是一部三十年代出版的十分重要的金文資料匯編，該書收羅之富、辨析之精、冠蓋群書，廣為中外學者所稱譽。孫同志初治金文即首先用力於此。在容先生指導下，曾兩度校讀此書，所撰《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未發表，曾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次年會上提出）辨析該書各種問題達208例之多。這些研究成果都注入了《簡目》，這就大大增強了《簡目》的科學性。

《簡目》的體例，吸取了前此諸表的長處，以器為單位，編排次序先以類從，緯以字數，使用起來十分方便。在體例上《簡目》也不乏創新之處，如編者對族氏銘文的處理就十分得當，全部族氏銘文皆加註於器名之首，原贅於銘末的則以“/”綫隔開，以示區別。這是以前諸表不曾做到的。目前在金文研究中，族氏銘文的研究是一個薄弱環節，而載有族氏銘文的銅器約占全部有銘銅器半數左右。如何將這部分資料利用起來，將是今後金文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十分重要的一環。編者將這類銘文特意標出，將對族氏銘文的研究提供極大的方便。

《簡目》的不足之處有三，一是尚未盡收有價值的金文資料，比如新出《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匯編》一書，收集流傳海外的有銘銅器數量頗多，亦有部分國內長期未見的資料。由於《簡目》完稿於1979年，因此編者尚未來得及引用。再有宋、清兩代摹本行世的銅器，如能放寬尺度多收一些，只要註明情況，將會為讀者帶來更多的方便。二是在體例上《簡目》沿用了以前各表的做法，“同人所作之器，文相同而字數有出入者亦以類從”。這實際上破壞了“以字數多少排列先後”的總原則，使讀

者無所適從，不便使用。如能用“重出”的辦法彌補此缺陷，可能使用起來就便當了。三是所引著錄情況，個別尚有錯漏。

儘管如此，編者以一人之力，用近二十年時間，不斷增補校改，其中艱苦，不爲此事者很難有深刻的體會。本世紀初王國維在敘述其編纂著錄表的情形時曾說：“長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其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干冊。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文字同異不過毫厘之間；摹拓先後又有工拙之別，雖再三覆勘，期於無誤，然復重遺漏，固自不免。”（《國朝金文著錄表》序）可見著錄表的編纂是一件細緻而煩瑣的工作，往往費日良多而不爲世人所重。唐蘭先生當年曾很有感慨地說：“此類工具書，非專家不能爲，即爲之亦不能適於用。然專家不暇爲此，或且不屑。我人治學，每感工具書之缺乏，職是故也。”（《理想中之商周古器物著錄表》，考古社刊第一期 31 頁）著錄表雖以目錄的形式出現，但却包含着銅器研究許多方面的知識，如銅器分類、定名、辨僞以及拓本的選擇與審定等，是一種打基礎的工作。如今《簡目》問世，爲研讀金文的同志們提供了方便。孫同志爲學術界作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書是很有用的，我們特向大家推薦這部書。

（原載《考古》1983 年 6 期 575～576 頁，署名文霏）

## 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 銘文拓本選編序

我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以悠久歷史和高度文明著稱於世。我國古代有着極為發達的青銅冶鑄業。大量的，燦若群星的青銅藝術珍品，正是我國古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體現和見證。

我國用青銅製作小件銅器的歷史，根據考古發掘的情況看，已經可以追溯到龍山文化時期。但是，青銅容器和禮器，目前僅見於相當於夏代的二里頭文化。

青銅冶鑄業的蓬勃興起，應該是商代和西周時期的事情。從漢代開始，就已經有出土商周銅器的文獻記載和實物例證。漢武帝（公元前 126 年）因為在山西省境內得到鼎而改元（《漢書·武帝紀》應劭注），解放後在漢墓中我們曾經發現了商代的青銅罍等器。宋代以後開始對銅器和銘文有所著錄（《考古圖》著錄了二百二十四器，《博古圖》收錄了八百三十九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集了五百一十一器《集古錄》和《金石錄》收有一百三十二器）。有清一代儲器更有所增加，著錄銅器銘文之風盛極一時，當時錄有銅器圖像和銘文的書籍達二十四種之多，所著錄器上千件。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歷代出土的傳世的和解放以來出土的有銘文的青銅器，見於著錄者，約在一萬件左右。這是研究我國古代歷史的極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北京圖書館自京師圖書館以來，通過幾十年的工作，從公私藏家手中收集了數量十分可觀的銘文拓本。其中僅商周至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和銘文拓本就達兩千餘紙（戰國以後的尚不計在內）。這次我們僅整理了其中的一部分。這些拓本包括了原屬公藏的：故宮博物院藏器拓本，寶蘊樓藏器拓本。原屬私藏的：濰縣陳介祺（篁齋）的拓本，廬江劉體智（善齋）拓本，浚陽端方（陶齋）拓本，北平孫壯（雪園）拓本，閩侯陳寶琛（澂秋館）拓本，上虞羅振玉（雪堂）拓本，以及黃濬（伯川）、王辰（鐵庵）、吳士芬（子苾）、陳淮生、張致和、張璋等人所藏拓片。其中數量較多的首推篁齋、善

齋、陶齋、雪園、雪堂、漱秋館和故宮博物院等幾批。

在這些拓本中，有不少是海內罕與其匹的精拓、佳拓。例如十鐘山房所傳拓的楚公冢鐘（鈐“十鐘山房藏鐘”、“海濱病史”、“簠齋”等印）、紀侯鐘、者汭鐘、獻鐘等幾件鐘；陳介甫所藏，上有羅振玉為陳淮生寫了題跋的毛公鼎拓本；從古堂徐同柏考釋，尤晉珊傳拓的晉公奭（鈐“尤晉珊手拓”印）等，都是知名的國寶重器和難得的精良佳拓。其中“晉公奭由於拓本比較清晰，比《三代》所錄（《三代》亦是尤氏所拓，但不精）為佳。根據這個拓本可以糾正舊有釋文的若干錯誤，豐王銅泡（鈐“善齋所得彝器”印）銘文中的豐王，曾見之於文獻記載。此器雖曾經有過著錄，但本館所藏拓本遠比《三代》等書清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豐王二字，一行正書，一行倒書。豐王過去釋為一字。但在我們所見的傳世的拓本中，有一件豐王銅泡，豐王二字上下分開書寫，顯然是二字。所以，釋為豐王應該是可信的。

這些拓本，有八十八件是屬於未見著錄的新拓本，或僅見摹本未見原拓的真拓本。例如，良季鼎銘文，過去就沒有著錄過。在武丁時期的卜辭中，曾記有良子向商王納貢之事。良還與商王室通婚（甲骨文稱婦娘）。良應是郎。該國族在其後數百年間淹沒無聞。由此銘文及器形可以知道，這一國族到西周中期還是存在的。傳世品中著錄過一件“戊”字罍。這一次在整理拓本的過程中，我們又發現了一件（鈐“燕鈐審定”“慈庵”等印），與傳世的已著錄的器形、紋飾和銘文完全相同，很顯然這是同人同時所鑄作的一對。從其時代看，這是武丁晚期到祖庚祖甲時的銅器。這一對罍與婦好墓所出的罍可以相媲美。由於它器形高大，製作又精美絕倫，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它很可能是當時王室的重器。如果此說可信，那麼這個，“戊”就很可能是武丁的配偶“母戊”的省稱。宗婦簠傳世著錄了六件，我們又從這批拓本中發現了兩件，可知宗婦簠製作時應在八件以上。徯鼎（鈐“器之手拓”印）是太保諸器之一，過去也未見著錄。

總觀這八十八件未見著錄的或祇見摹本的拓本，可以概括為四種情況。

第一，銘文和圖像都未見過著錄者有十二種：亞卣鼎、良季鼎、戊罍、史觚，亞醜鼎，作父乙癸爵（一）、作尊彝器座，戈、何斧、羞鉞、象牙刀、七年矛等。












第二，僅銘文未見過著錄者有二十六種：







天鼎、未父乙鼎、徯鼎、仲義父鼎（一）（二）、華季益鼎、子斐簠、猳父癸簠、宗婦簠（五）（六）、尊、卣尊、祖癸尊，作寶彝尊、祖辛父丁尊、戈壘，父己方壘、册父丁壘、觚、子觚、父丁史觚、大爵、史册戈、廿三年戈、戣斧（一）（二）。

第三，僅圖像未見過著錄者有二十五種：齊侯鐘、匱鼎、魚父乙鼎、大師人鬲鼎、鳥父癸鼎：屯鼎（一）、奄作婦姑甗、父丁鬲、甗人守鬲、毛鬲、虞司寇伯吹壺（一）（二）、何父乙卣、辛亞卣丁罍、伯憲盃、觚、鼓亭作父辛觶，戈爵、匱爵、魚爵、

亞過爵、父乙戈爵、父丁爵、戊酉爵（二）、祖癸角等。

第四，過去雖已著錄，但主要是摹本，此為原器傳拓本者，有二十五種

盞婦方鼎、戒鬲、牢犬簋、交君子壺、乙卣、遺卣、盞司土幽卣、父戊觶、父甲觶、父乙觶、父戊觶、子癸壺觶、辛爵、觥爵（一）（二）、爵、天爵、父丁爵、父己爵、父辛爵、辛父爵、册父丁爵、父乙臣辰光爵（二）、毳盤、取盧子商盤等。

更為重要和難得的是，在本館所藏拓片中，保存了大量的全形拓，如本集所選的359件拓片中，全形拓有331件，占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些拓片的發表可以補充過去祇見綫圖（器物輪廓）未見全形的器物100餘件，尤其是其中的37件還是過去所沒有見到過器形的。例如鼎、爵、魚父乙鼎、鳥父癸鼎、鼓辜作父辛觶（鈐“岑仁手拓”印）等器，過去都是僅見銘文而未見圖像。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齊侯鐘，此器過去僅見方氏《綴遺》一書著錄，但那是摹本，而且沒有器形。本館所藏此器的銘文拓本和全形拓片，無疑是十分珍貴的。另外，即之省，文獻作，屬鬼方支系，地在山西境內。傳世的三晉器並不多，本館所藏的全形拓對我們瞭解鬼方和三晉地區青銅冶鑄器的情况，是十分有價值的。此外，還有不少器形過去雖曾見於著錄，但祇是摹本，器形和紋飾往往失真，遠遠不及全形拓真實可靠。本館所藏的這一類全形拓為數甚多，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可彌補摹寫本的不足，二者可以互相補正。

我們知道，器物紋飾，是古文字研究和青銅器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我們見到了“戊”斝的全形拓，纔可判定它是武丁晚期至庚甲時期的銅器，戊可能是母戊之省。我們見到了全形拓，纔可以確定亞乳鼎（鈐“北平莊氏藏記”、“松夢齋”等印記）是先周時期周人所鑄作的銅器。應該指出，亞乳鼎是周人滅商以前頗具民族特色的形製。這種形製的鼎，傳世的極為罕見。解放後，在陝西各地，特別是周原一代，出土了不少這樣的鼎，它們都是研究先周時期周人青銅業的重要材料。亞乳鼎銘文的真偽問題尚需作進一步的研究。如果銘文可靠，那麼，這就是我們目前所知的周人的最早的一件有銘銅器。此器年代約當於殷墟文化三四期，比天亡簋，何尊要早得多。如果銘文是偽刻，那麼器形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絕對偽作不了的，至少可以說明，陝西地區在解放以前已經出土過先周銅器。郕原鐘（鈐“善齋所得彝器”印）銘文分鑄在鐘體兩面的鉦間和左右鼓這個部位。《三代》、《善齋》由於沒有見到全形拓，把這六個部位的銘文位置顛倒了；《小校》和《善圖》雖曾按銘文內容先後順序放置，但由於過去所著錄的圖像模糊不清，對這六段銘文究竟應該怎樣讀法，是不易判別的。現在，本館所藏的全形拓，就使這個問題迎刃而解了。此外，象吳王夫差鑑那樣的龐然大物，象羸靈德小鼎那樣的玲瓏小器，沒有看到器形，是很難取得深刻的印象的。如果不明器形，對這些器物的用途也就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總之，較多的數量，較精的拓本，較多的全形拓和一定數量的未見著錄的銘文，這是本館藏拓的四個主要的特點和優點。

我們爲了把這批珍貴的拓本公佈於世，以供各方面的研究，先從一千二百六十二張拓本中挑選出三百五十九件器，按照器類和其字數整理編排成冊，其餘的仍在繼續整理之中。我們選擇拓本的原則：一是選用鈐有名家收藏印鑑和有名家題跋的精拓；二是盡量收錄銘文和圖像皆全的全形拓，除未見著錄的銘文外，祇有銘文而無圖像者不收錄；三是收錄未見著錄的新拓，但有些銘文或器形，祇見摹本而未見原拓者也盡量收錄。疑僞者不錄。重複者選用其中較好的拓本。例如《毛公鼎》拓本，本館藏有五張拓本和印本，我們祇選用了其中的一張。有些器雖已見著錄，但不如本館藏拓清晰的，亦加錄用。對於我館收藏的影印本，其中雖有不少是名家所藏（如上海博物館、陶齋等），有些價值也很高，例如，魯山奢簋（鈐“上海博物館所藏青銅器銘文”印）印本，不但比《三代》等書著錄的拓本清楚，而且還可以糾正《三代》之誤。《三代》以爲是二器，實爲一器一蓋。虞司寇壺（一）（二），過去僅見銘文，本館所藏的全形拓印本是目前僅見的圖像，也一併收錄。

我們在每一器後面，對器物時代，銘文字數、拓本來源、著錄和器物收藏情况等，一一作了簡要的說明。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在編輯和說明中，肯定會有不當和錯誤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九八一年五月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九輯 439～444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與張亞初、徐自強合寫）



## 新版《金文編》評介

《金文編》是研究金文字形的專著，是容庚先生花費了畢生心血的力作<sup>註</sup>。1925年，青年時代的容庚編著了《金文編》一書，此書以其扎實的功力，嚴謹的學風，科學的體例冲破舊金石學的束縛，脫穎而出，得到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被公認為金文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後隨着金文資料的不斷豐富，在1939年和1959年先生又兩次重編此書，二版和三版《金文編》內容逐步充實，體例更趨完善，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頗負盛名的權威著作。又是二十年過去了，粉碎“四人幫”後，先生又着手重編四版《金文編》。1978年以前，由他的學生馬國權協助工作；1979年開始由他的另一個學生張振林接手工作，1983年3月先生去世，張振林繼承先生遺志，奮力工作，終於在1984年將這一巨著完成，交付出版，這部凝聚着兩代學者心血的著作就這樣問世了。

新版《金文編》較三版引用銅器增加737件，所收字數正編增加526字，附錄增加153字，正附重文共增加5554字，基本上將二十年來新增加的金文資料大部收入本書。

三版《金文編》問世以來的二十年，金文新資料大量涌現，如陝西周原地區成群的窖藏銅器，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銅器，湖北隨縣曾侯乙墓銅器等等，使學者們的眼界大為開闊，學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之後，成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並連年召開全國性學術討論會，使古文字研究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高潮。新版《金文編》反映了學術界這種興旺的景象，對學者們的大量研究成果，作者都審慎地全面加以消化吸收，可以說它是二十年來金文研究的一次很好的總結。新版《金文編》的精彩見解，隨處可見。如0115“番”字下收入字體變化很大的一批“番”字，其中也包括一些三版收入附錄的“番”字，0119“牡”字下收入盜壺的“駐”字，0166

---

註：《金文編》第四版，容庚先生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1985年7月中華書局影印出版，16開本1505頁。

“單”字下收入寔鼎的“𠂔”字，將“歲”與“截”合爲歲字，改“鳶”爲“鳶”，將散氏盤的“爰千罰千”改爲“鞭千罰千”，將或者鼎的“眉錄”改爲“髮錄”，將“獮”字改爲“獮”字，將三版附錄中的檐、次、妻、螾、莖、遺等字移入正編等等，都較三版有了明顯的提高。

新版較三版在字義解說上增加了很大份量，大量引用原銘文句，摘引文獻例句，使每個字的歸屬更具說服力。作者還在不少字頭之下各器銘的排列次序上按時代先後作了調整，使讀者從中可以看出字形的時代變化，如0106“分”字、0108“曾”字，三版各銘文次序比較隨意，經新版調整後，商、周、春秋、戰國的字形一目瞭然。粗看起來這只是幾個字位置互相調動了一下，而這種改動却是作者逐器經過斷代研究後才能做到的，張振林同志在1979年冬廣州古文字會上發表的《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一文，就說明他在字體斷代研究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

新版《金文編》增加了羅振玉爲本書第一版作的序言，文中考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五事，指出《金文編》與其承繼與改進的關係，這是早期金文研究的一篇很重要的文字。

這次重版《金文編》，篆書字頭，銘文摹本，楷書說解由張振林全部重摹、重寫，這就保證了新增銘文與舊收銘文在字體風格上的一致，重摹的篆文、金文字體秀麗細膩，十分準確，功力是很深的。容庚先生原書楷書說解中保留許多他自己創造的簡體字，這些字後來並未被社會公認，增加了閱讀此書的困難，這次由張振林按現行字體全部改寫過，這就解除了讀者閱讀上的困難。

另外，新編《金文編》將附錄的字也作了編號，而且附錄每字下都錄出原銘文句，這些較三版改進之處給讀者帶來很大方便。

作爲這樣大型字書的編著，涉及數千字的考釋，數千件銅器的辨僞、斷代等，要做到絕對沒有失誤是很困難的。我們在讀後也提出幾點不足之處，供作者參考。

首先，本書雖稱謹慎，但正編仍收入一些尚有爭議的字，比如多友鼎中的地名“𠂔”，本書列入“鄴”字，實際此字並未識出，釋爲鄴字是很難成立的。又比如0252將“𠂔”收入“𠂔”字，0434將“鬲”、“鬲”合併入“鬲”字，0678將“𠂔”、“𠂔”合爲“𠂔”字，1182將“𠂔”字收入“家”字等都缺乏必要的說明。人們在使用字書時，都有一種查找成說的心理，因此字書的編著，一般的說，保守些就更好。

其次，本書個別器類稱呼有錯，如玄婦壺並不是壺，而是一個方壺，此器現藏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1.20有器形照片。軌簋現藏洛陽市博物館，實際是鬲。史孔盃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也不是盃，而是一個小橢杯，等等。

另外，0815“𠂔”字三版有缺文，新版稿本已補上，可製版時又被修掉了。1590“豸”字下所收之器名不全，應爲“亞中豸父丁觚”。0200“是”字下最後一器漏寫器

名“中山王譽鼎”。2145“𧈧”下所收亞蚊鼎，實際是亞矣鼎之誤。衛盃的“趯”字在正編和附錄重出等等，這些手民之誤也希望再版時改過。

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我們應該特別提到張振林同志。進入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容先生年事已高，身體已逐漸難以支持工作，這部書主要完成於張振林之手。只要看一下那兩萬多字的銘文摹本，人們就不難估算出他為此書付出了多麼巨大的勞動。一個正當中年的學者，放下自己的研究課題，用五年多的時間去完成屬於老師的著作，這種以學術事業為公的品德，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學術事業上有一些重要的、份量大的著作，往往需要幾代人前赴後繼的努力才能完成。從事這一事業的人，可能許多年都看不到個人的勞動成果，但能否堅守初衷，不顧一切地去完成這項工作，這是對一個學者的品德和修養的考驗。張振林同志在這方面的表現，是值得我們稱道的。

（原載《考古》1986年11期1055~1056頁）

## 跋考古研究所藏彩繪本 《西清古鑑》

《西清古鑑》一書是清乾隆年間敕編的一部銅器圖錄書。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七日發佈上諭，十六年（1751年）夏五月編成，奉旨由內府刻版，至二十年（1755年）刊印成書，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收入《四庫全書》。<sup>①</sup>

該書由乾隆皇帝主持編纂，欽定梁詩正等十一名編纂官具體經辦。全書四十卷，收銅器一五二九件，其中有銘文的銅器五八五件。書前有序，書後有跋，每件器首列器名，器名的第一字為“商”、“周”、“漢”等時代稱呼，然後是器形圖像，再列銘文及釋文，最後是說解和考證。

《西清古鑑》已知有五種刊本，依其出版先後介紹如下：

第一，武英殿刊本，又稱“內府本”或“殿本”，乾隆二十年木刻本，版框高29.5cm，“上諭”後鈐印為紅色。此本最大，開花紙初印，寬大乾淨，最存原著之真，是諸刊本中之最佳者。

第二，邁宋書館在日本銅鑄本，又稱“日本銅版本”。光緒十四年（1888年）在日本銅版影印，銘文周圍可見清晰的銅網紋。版框高29.3cm，銘文圖像皆略小於“殿本”。印刷極精，其圖像往往優於“殿本”。然其銘文則多有改版及走失精神處，銘文較“殿本”筆劃細，有印刷不清者則銘文呈雙鉤狀。

第三，鴻文書局本，光緒十四年刻石縮小影印，版框高18.2cm，據“殿本”影印，然銘、圖多處改版，改動處多發生錯誤。是諸本中之較差者。

第四，集成圖書公司本，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刻石縮小影印，自稱“仿殿本”，經細校知其為縮印日本銅版本。首四頁套紅色，序與跋相接，跋後多出“《西清古鑑》恭校姓氏：慈谿孫雷、吳縣馬鉞、元和王肇鉉、慈谿凌志”二十五字。版框高18.5cm。

第五，雲華居廬本，民國十五年石刻影印，縮得更小。

《西清古鑑》還有一《四庫全書》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仿殿本摹寫謄錄而成。由於參加摹寫謄錄諸書胥缺乏專門知識，書中多有錯誤，為諸本中之最差者。<sup>②</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圖書室一九五六年在上海古舊書店購進一部《西清古鑑》彩繪本（殘本），<sup>③</sup>該書經折裝，四冊，版框高 17.8cm 無版心、無頁數，亦無題跋。經與殿本校核，知其為《西清古鑑》三十二卷的全部（缺目錄），各器次序與殿本比較亦略有不同，茲列表如下：

兩本頁數對照表

頁數	殿 本	彩 繪 本
目錄一	西清古鑑卷三十二目錄匣 周司寇匣——馬匣	缺
目錄二	獸匣——齊姬盤	缺
目錄三	貫魚盤——素鎬	缺
		第一冊 首頁“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印
一	周司寇匣圖銘	周司寇匣圖銘、鈐“古希天子”印
二	周司寇匣考證	周司寇匣考證
三	周祖匣	周姜伯匣
四	周姜伯匣	周祖匣
五	周陳伯匣	周陳伯匣
六	周伯匣	周伯匣
七	周伯和匣圖銘	周女匣
八	周伯和匣說解	周伯和匣圖銘
九	周女匣	周伯和匣說解
十	周山匣	周舉匣一
十一	周般匣	周利匣
十二	周利匣	周般匣
十三	周舉匣一	周山匣
	缺	第二冊 首頁鈐“八徵耄念之寶”印
十四	周舉匣二	周舉匣二
十五	周子匣	周子匣
十六	周子孫匣	周子孫匣

續表

頁數	殿 本	彩 繪 本
十七	周犧匜一	周犧匜一
十八	周犧匜二	周犧匜二
十九	周馬匜	周馬匜
二十	周獸匜	周獸匜
二十一	周雲雷匜	周雲雷匜
二十二	周饗簋	周饗簋
二十三	周夔龍匜	周夔龍匜
二十四	周蟠虬匜	周蟠虬匜
二十五	周蟠夔匜一	周蟠夔匜一
二十六	周蟠夔匜二	周蟠夔匜二
	缺	第三冊 首頁鈐“重華宮寶”印
二十七	周夔首匜	周貫魚盤
二十八	周螭首匜	周齊姬盤
二十九	周雲紋匜	周癸亥盤圖銘
三十	周環紋匜一	周癸亥盤說解
三十一	周環紋匜二	周丁亥盤圖銘
三十二	周環紋匜三	周丁亥盤說解
三十三	漢注水匜	漢注水匜
三十四	周丁亥盤圖銘	周環紋匜三
三十五	周丁亥盤說解	周環紋匜二
三十六	周癸亥盤	周環紋匜一
三十七	周齊姬盤	周雲紋匜
三十八	周貫魚盤	周夔首匜
三十九	周蟠夔盤	周螭首匜
四十	周夔紋盤	第四冊 周蟠夔盤
四十一	周環紋盤	周夔紋盤
四十二	漢蟠夔盤一	周環紋盤
四十三	漢蟠夔盤二	漢蟠夔盤一
四十四	漢夔耳盤	漢蟠夔盤二
四十五	漢粟紋盤	漢夔耳盤
四十六	漢環紋盤一	漢粟紋盤



續表

頁數	殿 本	彩 繪 本
四十七	漢環紋盤二	漢環紋盤一
四十八	漢素盤一	漢環紋盤二
四十九	漢素盤二	漢素盤一
五十	漢素盤三	漢素盤二
五十一	漢素盤四	漢素盤三
五十二	周素銅	漢素盤四
		周素銅
		鈐“八徵耄念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印

下面我們將彩繪本與殿本作一仔細地校讀，並把彩繪本異於殿本之處筆記如下：

### 卷三十二

#### 第一 周司寇匜

圖 彩繪、描金、有銹斑。蓋之視角小異。

楷書 蓋銘釋文第三行少一“○”

蓋、寇、枯、釋、徑、圖、僚、亂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 周祖匜

圖 彩繪、銹斑、蓋器接近合攏，蓋之兩獸角與殿本前後相反。鑿部多出一珥。

楷書 徑、流、觶等字筆劃小異。

#### 第三 周姜伯匜

圖 彩繪、銹斑、瓦楞紋多出一道。

銘 “季姜”二字較殿本傳真。

楷書 徑、流、侯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 周陳伯匜

圖 彩繪、銹斑、視角不同，四足前後位置與殿本相反。

楷書 壽、徑、分、疑、異、無、微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五 周伯匜

圖 彩繪、銹斑、花紋小異。

楷書 分、徑、流等字筆劃小異。

#### 第六 周伯和匜

圖 彩繪、銹斑、描金、視角不同，蓋器間距離較殿本接近。

楷書 稽、釋、分、徑、尊等字筆劃小異。

# 第七 周女匜

圖 彩繪、銹斑、蓋上獸目及鑿上獸耳與殿本小異。

銘 器銘“女”字小異。

楷書 釋、徑、分、肇等字筆劃小異。

# 第八 周山匜

圖 彩繪、銹斑、殿本器斜置，此橫置。細部花紋小異。

楷書 分、徑、流、收、鼎、國等字筆劃小異。

# 第九 周般匜

圖 彩繪、銹斑、視角不同，突出表現在流部不同。殿本器身斜置，此橫置。口沿下之象紋較殿本逼真。

楷書 般、分、徑、流、賓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 周利匜

圖 彩繪、銹斑。

楷書 蓋、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一 周舉匜一

圖 彩繪、銹斑、蓋上獸頭之耳、角與殿本小異。

銘 較殿本傳真。

楷書 徑、分、流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二 周舉匜二

圖 彩繪、銹斑、鑿上小獸頭較存真。

銘 較殿本存真。

楷書 尊、彝、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三 周子匜

圖 彩繪、鑿及流視角小異。

楷書 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四 周子孫匜

圖 彩繪、銹斑。

楷書 分、徑、流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五 周犧匜一

圖 彩繪、銹斑、蓋開口大。

楷書 犧、蓋、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六 周犧匜二

圖 彩繪、銹斑、蓋上牛角、牛耳與殿本小異。

楷書 犧、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七 周馬匝

圖 彩繪、銹斑、蓋獸首小異。

楷書 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八 周獸匝

圖 彩繪、銹斑，蓋上小獸頭耳部小異。

楷書 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十九 周雲雷匝

圖 彩繪、銹斑，腹部花紋不同，且寬於殿本。

楷書 分、徑、流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十 周饕餮匝

圖 彩繪、銹斑，蓋與器距離遠，花紋細部小異。

楷書 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十一 周夔龍匝

圖 彩繪、視角小異、花紋小異。

楷書 夔、龍、分、徑、流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十二 周蟠虬匝

圖 彩繪、銹斑。

楷書 蟠、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十三 周蟠夔匝一

圖 彩繪、銹斑、蓋上獸頭之角不同、四足不同。

楷書 蟠、夔、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十四 周蟠夔匝二

圖 彩繪、銹斑、瓦楞紋多出一道，四足位置與殿本小異。

楷書 蟠、夔、分、徑、流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十五 周夔首匝

圖 彩繪、瓦楞紋多出一道，鑿不同。

楷書 夔、分、徑、流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十六 周螭首匝

圖 彩繪、銹斑、流部獸頭不同，足小異。

楷書 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二十七 周雲紋匝

圖 彩繪、銹斑、鑿、流不同，口沿下一周花紋不同。

楷書 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第三十 周環紋匝一

圖 彩繪。

楷書 分、徑、流等字筆劃小異。

第三十一 周環紋匝二

圖 彩繪、視角不同，四足位置不同。

楷書 分、徑、流等字筆劃小異。

第三十二 周環紋匝三

圖 彩繪、鑿及口沿下一周的花紋不同，流短而上翹。

楷書 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第三十三 漢註水匝

圖 彩繪、流短、圈足小。

楷書 分、徑、類等字筆劃小異。

第三十四 周丁亥盤

圖 彩繪。

銘 較殿本存真。

楷書 分、徑、盤、篇、於、疑、處、鑄、鼎等字筆劃小異。“鑄父般”，彩繪本作“鑄簠般”。

第三十五 周癸亥盤

圖 彩繪、銹斑、視角不同，可見底部。

銘 較殿本存真。

楷書 鬲、分、徑、盤、據等字筆劃小異。楷書較殿本多出一頁。

第三十六 周齊姬盤

圖 彩繪、銹斑。

銘 較殿本存真。

楷書 壽、分、徑、據、盤、屬等字筆劃小異。楷書第二行彩繪本最後一字爲“曰”，殿本爲“下”。

第三十七 周貫魚盤

圖 彩繪、視角不同，殿本可見內底，彩繪本則不能。

楷書 盤、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第三十八 周蟠夔盤

圖 彩繪、視角不同，殿本內底顯露較多。

楷書 蟠、夔、盤、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三十九 周夔紋盤

圖 彩繪、銹斑、圈足花紋不同。

楷書 夔、盤、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 周環紋盤

圖 彩繪、腹及圈足之重環紋數較殷本多。

楷書 盤、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一 漢蟠夔盤一

圖 彩繪、銹斑、視角小異，三足小異。

楷書 漢、蟠、夔、盤、分、徑等字筆劃小異，殷本“一百一十兩”，彩繪本作“一百十兩”。

## 第四十二 漢蟠夔盤二

圖 彩繪、銹斑、圈足花紋不同。

楷書 漢、蟠、夔、盤、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三 漢夔耳盤

圖 彩繪、銹斑、腹部花紋不同，視角小異。

楷書 漢、夔、盤、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四 漢粟紋盤

圖 彩繪、銹斑。

楷書 漢、盤、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五 漢環紋盤一

圖 彩繪、圈足花紋小異。

楷書 漢、盤、分、經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六 漢環紋盤二

圖 彩繪、視角不同，殷本平而寬，彩繪本立而窄，腹部重環紋之重環數不同。

楷書 漢、盤、分、經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七 漢素盤一

圖 彩繪、銹斑、視角不同，殷本內底顯露多。

楷書 漢、盤、分、經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八 漢素盤二

圖 彩繪、銹斑。

楷書 漢、盤、高、分、徑等字筆劃小異。

## 第四十九 漢素盤三

圖 彩繪、銹斑。

楷書 漢、盤、分、經等字筆劃小異。

殿本“重一十一兩”彩繪本作“重十一兩”。

#### 第五十 漢素盤四

圖 彩繪、銹斑。

楷書 漢、盤、分、經等字筆劃小異。

殿本“重一十二兩”彩繪本作“重十二兩”。

#### 第五十一 周素銅

圖 彩繪、銹斑、器底多出一足。

楷書 分、經、說、銅、僅、器等字筆劃小異。

從校核情況看，彩繪本第一冊首頁鈐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周司寇匱鈐印“古希天子”。第二冊首頁鈐印“八徵耄念之寶”、第三冊首頁鈐印“重華宮寶”、第四冊末頁鈐“八徵耄念之寶”、“乾隆御覽之寶”。而殿本沒有這些印，這六方印都是乾隆年間宮中之物，其中“重華宮寶”為青玉大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為白玉大寶，經故宮楊伯達先生鑑定，二印現仍藏故宮博物院，與此校核完全相符，且印泥質料亦為宮中之物。

從兩本圖像看，絕大多數器的形制花紋基本相同，只是在視角上和少數器的細部稍有差別。銘文摹篆的差別就更小些，只是彩繪本筆劃略細而已。彩繪本與殿本之最大不同是用色彩表現實物的質地和銹斑，這說明彩繪本之圖是據實物再次臨寫而成，不可能是仿殿本而作。器藏內府，非外間人所能見，因此，彩繪本之圖出自宮中畫院供奉之手是不容置疑的。

從此殘本可以推知，乾隆年間除刊印了殿本《西清古鑑》外，還專門手寫了一部彩繪本的《西清古鑑》，這是以前人們所不知道的。從用印情況看，“古希天子”印作於乾隆七十歲時，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而“八徵耄念之寶”印作於其八十歲之前夕，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二月。<sup>④</sup>這些印都晚於《西清古鑑》殿本刊印成書的時間（乾隆二十年），所以我們估計彩繪本晚於殿本。

若論兩本的優劣，則彩繪本顯然優於殿本。首先殿本之圖用綫描，只給人以平面的印象。而彩繪本是按照銅器本來的色彩臨寫，有很強的立體感，而且把銅器銹斑、質地都力圖顯示出來，錯金之處用描金，極其真實，大大優於殿本。

銘文摹篆彩繪本較殿本存真，殿本由於多出刻版一道工序，有些字已走失精神。彩繪本還將銘文上的銅銹色表現出來，更顯得逼真。

通過校讀，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所藏彩繪本大大優於殿本，而殿本是已知五種刊本和一種寫本六種本子中最好的一種，因此可以說考古所藏彩繪本是《西清古鑑》諸本中的最佳本，可惜僅殘存一卷，不知其餘三十九卷現在是否還在人間，望海內外同人



多加留意，若有朝一日能集成數卷甚或全書，那該是何等令人興奮的事啊！

（考古所彩繪本《西清古鑑》（殘本）上的六方鈐印承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先生鑑定，特致謝意）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

## 註 釋

- ① 見《西清古鑑》序、跋。

見文津閣本《四庫全書》《西清古鑑》紀昀等校記（現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

- ② 見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文津閣本《四庫全書》。

- ③ 該書可能是由當時考古所研究員陳夢家先生從上海購回。

- ④ 《十朝東華錄》乾隆一一〇云：“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十二月辛未，上以來年八旬萬壽，命鑄八徵耄念之寶”《御制記》曰：“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鑄古稀天子之寶。而繼之日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天眷祐，幸無大隕越於茲，又浹旬矣，思有以付八旬開袞之慶，鑄爲璽，以殿諸御筆……”。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 239~253 頁，中華書局 1989 年 9 月）

## 《殷周金文集成》述評

收錄金文資料最齊全的《殷周金文集成》一書已全部完稿，全書為八開本，十八冊，前十冊已出版發行，後八冊也即將問世。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中華書局出版，上海印刷七廠珂羅版印刷。書的內容依樂器、炊器、食器、酒器、水器、雜器、兵器的順序安排。一、二冊為鐘、鐃、鐃、鐃、鈴，三、四、五冊為鬲、甗、鼎，六、七、八冊為簋，九冊為盃、簠、敦、豆，十冊為卣，十一、十二冊為尊、觶、觚，十三、十四冊為爵、角，十五冊為罍、觥、盃、壺、壺，十六冊為方彝、盤、匜、雜器等，十七、十八冊為戈、戟、矛、劍、刀、斧等兵器。各類器銘均按字數由少到多排列。所收銅器的時代斷在秦統一前，每器附有字數、時代、著錄、出土、流傳、現藏、拓片來源及備註等項說明，所收資料一般以各個分冊交付出版時掌握的為限，全書新收器大體截止在一九八五年。第一冊有夏鼐先生所寫前言。每冊首列目錄，然後是拓本，書後列文字說明、引用書目簡稱表、器物所在簡目、協助單位等。

據“出版說明”介紹，該書由郭沫若院長五十年代首倡，一九六三年考古研究所籌辦，當時由著名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主持其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十餘年，一九七九年在夏鼐先生的指導下恢復工作，由陳公柔、王世民、劉雨、張亞初、曹淑琴分別擔任各冊編纂。先後被列入“六五”、“七五”兩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項目，並被列入經國務院批准的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它的編成出版，是中國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建國以來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項重要的基礎工程建設。該書的編纂有以下幾項工作值得稱道：

### 一 詳備資料

全書銘文編號12113，去掉空號，實有近一萬二千號，其中包括宋代著錄的銘文摹

本、清代以來傳世的銘文拓本和摹本、海外流散銅器銘文的拓本、解放前後經科學發掘銅器銘文的拓本、全國各文博單位所藏銅器的銘文拓本。羅振玉編的《三代吉金文存》和于省吾編的《商周金文錄遺》合計收器銘 5447 件，本書增多一倍以上，新近臺灣出版的兩部同類性質金文彙編《商周金文集成》、《金文總集》收器總數均不足九千件，也僅及該書的三分之二強。特別應當提出的是，該書共收錄國內各博物館收藏的 2107 件從未見於著錄的器銘。如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𩺰比簋蓋（4278 號、97 字），現藏故宮博物院的縣簋殘底（4146 號、存 36 字）、復公仲簋蓋（4128 號、30 字）、章叔簋（4038 號、22 字）、寓鼎（2718 號、30 字），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兄仲鐘（36 號、12 字）、伯頤父鬲（725 號、17 字）、伯夔父甗（923 號、10 字）等。有的成組銅器過去只著錄了其中的一兩件，這次由該書儘可能將資料補齊。如梁其鐘傳世共六件（187 ~ 192 號），三件在上海博物館，一件在南京市博物館，一件在法國巴黎基美博物館，過去只著錄了上海和巴黎各一件，其餘四件則是此次由該書補齊。又如陝西長安縣張家坡出土的伯庸父鬲一組八件（616 ~ 623 號），原報告只發表了一件，這次由該書全部補齊發表，這些重要銘文的初次公佈，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該書對每件器物的出土地、流傳經過、現藏地點都作了儘可能詳細的考察。作者不僅大量查閱了有關文獻資料，還對國內外各文博單位作了深入的調查。如利鼎（2804 號）現藏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傳世的三件頌鼎（2827 ~ 2829 號），一在上博，一在臺北故宮，一在北京故宮。七件小克鼎（2796 ~ 2802 號）國內存四件：一在上博，一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一在南京大學歷史系，一在故宮。日本存三件：一在東京書道博物館，一在京都藤井有鄰館，一在兵庫縣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對經過科學發掘的銅器都記錄了詳細的出土地點，墓葬或遺址的情況。對一些傳世銅器還作了流傳經過的記錄。如天亡簋（大豐簋）除記錄原收藏於陳介祺外，還記錄了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五六年在北京琉璃廠收購的情況。毛公鼎則記錄先後由陳介祺、端方、葉恭綽、陳詠仁等收藏，現歸臺北“中央博物院”的情況。上述僅是隨便舉出的幾個例子，全書萬餘件器物，每件都詳記出土、流傳、現藏的情況，可以想見作者為此是付出了十分艱苦的勞動的。這些珍貴的記錄為科學地利用這批資料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該書所收古今中外銅器銘文拓本摹本及有關資料是目前所見最為完備的一部。

## 二 精選拓本

據瞭解，考古所為編纂此書作了多年的資料準備，他們曾先後收集了許多名家的拓本原集，如丁麟年的《柸林館金文》、陳介祺的《十鐘山房金石拓本》、陳承修的《猗

文閣集金》、羅振玉的《雪堂集金拓本》、劉體智的《善齋吉金拓本》。另有吳大澂、張叔未、素夢蟾、劉喜海、鮑子年、于省吾、孫壯和六舟和尚的拓本散頁，在編輯過程中還借到唐蘭、商承祚和陳邦懷先生珍藏的拓本，再有由陳夢家先生收集和海外友人贈送的流散各國銅器銘文拓本，合計共收集傳世銘文拓本兩萬多張，這就保證了在編輯傳世銘文時有充分的選擇餘地。像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沈子簋等著名銘文所用拓本都是十裏挑一的精拓，有的本身就是珍貴的文物精品，而製版時所用都是精拓的原件。故宮收藏的兩千餘件銘文是由考古所逐件拓回的，上海博物館的千餘件銘文拓本則是借用的，其餘全國數十家文博單位或借或拓都全力支持了該書的出版工作。所以，全書能收集原拓本 8603 件之多，佔到總數一萬二千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所收宋代著錄金文摹本約六百件，多數採自《嘯堂集古錄》一書。過去學術界對這部書評價不如其他幾部宋代金文書籍高，其實宋代流傳至今的幾部金文書，只有《嘯堂》是宋版本，其餘各書均為後世輾轉翻刻的，若從銘文存真程度而論優劣的話，當以《嘯堂》為最優，作者選用此書的摹本是有見地的。

該書選用的拓本，一律原大製版，拓本過大則用折頁。在報刊上發表的拓本，多數縮小，此書恢復原大，則便於觀察利用。對有些重器作者還不惜公佈數件拓本（以 ABC 分記），以便於對比研究。如班簋收有考古所拓已剔本、傅大卣未剔本和《西清古鑑》摹本。鄉簋（4296 號）和蔡簋（4340 號）除用薛氏本外，還列有宋石刻殘本，有的編鐘銘過大，如兩件能原鑄（155 ~ 156 號）則用縮小的全形拓以見概貌，又用分部原大拓本以見銘文細部。又比如毛公鼎全銘過大，用兩張折頁錄其全銘，又用四張拓本錄其細部，最後用董作賓氏摹本概其全貌。對一些不清晰或刻痕較淺的銘文則儘可能附摹本，如中山王墓銅器銘文全部使用張守中同志重新作的摹本。曾侯乙編鐘銘文，不僅用全部銘文原大照片，而且附有全部原大摹本。十七、十八兩冊有的兵器也附有摹本。經過這樣精心地挑選和安排，提供給讀者的自然是完整、清晰、詳盡的資料。

### 三 剔除偽銘

清代以來，古董商人為營利而偽造銘文的事屢有發生，陝西有蘇氏兄弟，山東有著名的“濰坊造”，北京琉璃廠也有專司其業的高級匠師。所以，傳世銅器中真偽雜揉，成為金文研究中一大病害。老一輩金石學家如潘祖蔭、羅振玉、容庚、商承祚、于省吾等都有獨到的辨偽能力，該書作者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由於大量目驗原器，也積累了一定辨偽經驗，使所收偽器已降到很少的程度。僅以簋類銘文為例，作者對傳世銘文著

錄情況清理後，剔除了二百六十多件偽或疑偽的銘文。《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公認收器十分審慎，但《集成》仍剔除簋類偽銘十一件之多。如《三代》的令簋（6、1、4）、魚父癸簋（6、27、6）伯魚簋（6、35、3）、向父癸簋（6、42、3）、鄭饗原父簋（6、42、6）、戈册父辛簋（6、44、5）、𣥂簋（7、1、7）、季楚簋蓋（7、10、5）、害叔簋（7、33、3）寢叔簋（8、51、1）、仲𣥂父簋（17、10、2）等皆為偽銘。可見該書收錄傳世銘文是很嚴格的，讀者儘可放心使用其拓本。

#### 四 辨正器類

前代金文書籍每不重視器類的辨別，多數書所收器類沒有統一標準，自相矛盾。即以《三代吉金文存》為例，所設彝、尊兩類內容就十分混雜，其原因有的屬於作者分類概念不清而誤收，有的則是作者不知器形，籠統用尊、彝這樣的共名來名器而造成的。近年來出版的金文書籍和著錄表都是簡單地將《三代》“彝”歸入簋類，“尊”歸入尊類。《集成》對《三代》彝類作了較徹底的清理，將其中 291 件查有實據的歸入簋、鼎、方彝、卣、尊、壺、壘等類，其餘 104 件不知器形的，則列入十六冊“類別不明之器”中。對《三代》尊類仍大部分留在尊類，少部分查出器形不同者，列入其他器類。對其餘各類器也儘可能作了辨正的工作，如《三代》4、33、2 趯鼎，依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器訂正為簋。宰甫簋（8、19、1），依山東荷澤縣文化館藏器訂正為卣。𣥂休簋（7、26、1），依上海博物館藏器訂正為鬲等。器類的辨正有利於使用者從考古學角度觀察器物組合情況，從而增加了這部分資料的科學價值。

#### 五 覆核著錄

據瞭解，考古所收藏國內外金文書籍十分齊全，他們對每件收入的銘文曾著錄於哪部書都作了認真的覆核。這是一件十分費力的工作，比如一組簋若干件，銘文相同，每件簋又器與蓋同銘，這樣就可能有十數件同銘文的拓本一起置於作者案前，而這些銘文又都零散地分佈在十幾部書中，若把每件器的著錄情況弄清楚，實在是一件煩難而不容易作好的事情。以往的著錄表多陳陳相因，誰也無力進行如此浩繁的覆核工作。《集成》的作者用了十餘年時間，逐一覆核了全部著錄，對出了大量重出的銘文，糾正了大量張冠李戴的錯誤，使一部更為翔實準確的金文著錄表的重新編制成為可能。

## 六 考究版本

流傳至今的宋清兩代金文書籍，多數存有若干種版本，如宋代的《博古圖錄》流傳有八種版本，最早的元至大重修本國內僅北京圖書館和浙江省圖書館等少數幾個地方可以見到，明版本也為數不多了，考古所圖書室藏明版兩部、清版四部，《集成》使用的就是考古所藏明嘉靖七年蔣暘翻刻至大本。《考古圖》存世有六種本子，元刻本甚劣，不能用。以明程士莊泊如齋刻本為最好，現知僅北圖曾收藏一部，《集成》所用即其複製件。《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傳世有十餘個版本，《集成》所用除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影印宋石刻殘本外，多採自于省吾影印明朱謀㙔刻本。《嘯堂集古錄》傳世有六個本子，《集成》所用為宋淳熙本（《續古逸叢書》影印本）。《鐘鼎款識》有四種版本，以清阮元嘉慶七年刻本為最好，《集成》即用此本。清代乾隆年間的《西清古鑑》已知有七種本子，其中刊本五種，抄本兩種。考古所藏有四種刊本和一種彩繪手抄本（殘），《集成》用的是武英殿刊本，是諸本中最好的本子。從每冊書後的“引用書目”中還可以看出，清代的其他金文書籍，《集成》多用“自刻本”。這都說明作者對宋清兩代金文書籍的版本作了很慎重的選擇，所用多為存世善本。

## 七 精心印製

據云該書在付印時確定的原則是“保證質量，不惜工本”。因此，為保持拓本的清晰和墨色的層次，中華書局毅然決定用珂羅版印製，用道林紙精裝，重要圖章套紅，大張拓本折頁。這些都是以往金石書籍印製中沒有先例的，應該說這是一部製作十分認真的書籍。

綜上所述，這部書確實堪稱質量上乘，但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存在的問題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有個別重出的器，特別是尊類銘文中仍混入一些其他器類的銘文。如 5696 尊與 9790 壺重出，以壺為是。5846 尊與 9568 壺重出，以壺為是。再如 9839 方彝與 10490（不知名器）重出，9289、2 觥與 5209 卣重出等。

第二，此書成於衆手，出版時間又延續多年，因而諸如器名隸定不一，時代標準不一的情況也時有發現。另外，全書編號不能完全連貫，也容易造成器數上的誤解。



第三，由於校對的疏忽，印刷上也時有錯漏現象。此書裝訂質量較差，套與書往往不能相合。

該書成本高，售價昂貴，難以為一般讀者所承受。據瞭解，編輯組準備在出版釋文時縮小開本，附縮小的拓本，改用膠版，以降低成本，便於多數讀者購買使用。

《集成》一書確實是一部巨著，由幾代專家積數十年之功，兢兢業業，為學術界默默地作了重要的基礎性資料工作，為廣大學者的研究作了無私的奉獻，這種精神是令人肅然起敬的。《集成》中所表現的學風是一絲不苟，嚴肅認真的，十餘年如一日，尤其難能可貴。我作為一個讀者，除對書的內容作了如上的評論之外，對《集成》一書所表現的學術道德和風格，也是十分有感觸的。另外，對中華書局不惜工本毅然出版學術巨著的精神，也表示敬意，希望他們繼續發揚這個優良傳統，與我國的學術界共同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而努力。

（原載《書品》1991年2期13~19頁，中華書局，1991年6月）

## 《故宮青銅器》前言

考古學者將早期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根據生產工具的材質區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在我國，較大件的青銅器最早出現在河南二里頭文化晚期，約當夏代（公元前21～前16世紀）後期。此前的仰韶文化、馬家窑文化、齊家文化時期等雖有小件紅銅或青銅製品發現，但數量少、物件小，還不能說那個時期已脫離了銅石並用時代。有的二里頭時期銅爵，從鑄痕看，內外範多達四塊，器壁薄而均勻，其工藝水平已脫離最原始狀態，不排除我國在夏代前期已掌握冶煉青銅技術的可能。所以，古史所記“夏鑄九鼎”或有所本。青銅器伴隨着早期國家的確立而出現，自然就成為王權的象徵。傳說夏鼎歷商至周，每當王朝改易，鼎則移於新主。春秋時期，王室衰弱，楚子過境，問鼎之輕重，則其覬覦王權之心，路人皆知。

商代盤庚遷殷之後，國力漸強，特別在武丁時期，達到頂峰。為適應其神權統治，需要進行大量繁複的祭祀活動，在這些活動中，青銅祭器是神壇上的重要道具，因而此期青銅器鑄造工藝有了長足的進步，體積厚重，紋飾神秘的青銅器大量涌現，形成了我國青銅文化最繁榮的時期。

西周建國以後，特別重視禮制建設。從金文記載的內容看，大概在穆王前後，一系列祭祀、軍事、饗宴、相見等禮儀制度逐漸形成，並成為當時貴族等級制度的嚴格規範，即後世所謂的“周禮”。由於青銅器在西周諸禮儀中的標示作用，周人形成“藏禮於器”的制度。因而，此時組合有序的青銅容器又名之為“禮器”。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成公二年》）青銅器被賦予“銘貴賤，別等列”的作用，其佔有狀況已成為貴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早在商代前期，青銅器上就開始有僅幾個字的、以象形為特徵的族名銘文出現，到

商代晚期開始有長達數十字的記事銘文出現，進入西周以後，更出現了許多百字以上的長篇記事銘文。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銘其功烈以示子孫。”（《左傳·襄公十九年》）為後世留下許多珍貴的史料。

隨着城市經濟的發展，自春秋中期始，青銅器的地域特徵突現，中原、楚、秦、吳、越等地的青銅器各自呈現出獨特的發展軌迹，一些小國的青銅器也成規模地出現。

戰國時代的青銅器逐漸向實用方向發展，新的形制不斷出現，紋飾趨於圖案化，還出現了一些描繪攻戰、狩獵、禮樂、桑植的寫實圖畫。

鐵質生產工具的大量出現和使用，標誌着鐵器時代的到來。我國大約在春秋早期開始出現鐵器，春秋戰國之交（即公元前5世紀前後）鐵兵器和工具逐漸增多，至戰國中期，鐵器在農業及手工業中佔據主導地位，楚、燕等國軍隊也基本以鐵兵器裝備。

在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裏，青銅器流入民間，脫去神秘的外衣，以日常生活用品和工藝品的身份，留存在社會生活裏。但是，隨着禮制傳統的延續，作為藏禮工具的青銅禮器，在其後歷代禮儀制度中，仍保留着它不可替代的地位。

## 二

成組合的具有“藏禮”作用的青銅禮器體系，是中國青銅文化有別於其他民族青銅文化的突出特徵。這是由於“以禮治國”是中國古代政治所獨創的統治藝術，以“周禮”為代表的禮儀體系，貫徹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了其後數千年中華文明史，帶有鮮明禮儀特色的中國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在大量青銅器上鑄刻銘文，是中國青銅文化有別於世界其他民族青銅文化的另一突出特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殷周金文集成》一書，是目前收錄古今中外金文資料較為詳備的著作，它著錄先秦有銘青銅器近12000件，加上該書出版後公佈的同類資料，共計約13000件左右。據1985年版《金文編》統計，先秦金文單字有3772個，已識字2420個，未識字1352個。

金文的內容就其大者而言，可分為以下幾項：

第一，祭奠父祖，許多器銘僅記父祖日名，表示該器為紀念其父祖而做。

第二，銘功紀賞，做器者記述自己對王室（或某大貴族）在祭祀、戰爭、外交、政務等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因而受到嘉獎、賞賜和冊命的榮寵。

第三，要盟約劑，“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周禮·秋官·司約》），記錄貴族間發生的土地、人事等糾紛，經王室派員調解、裁斷、訂立盟誓的經過，以傳示子孫後代。

第四，媵女陪嫁，記述做器者以該銅器作為嫁妝，送女出嫁。

第五，祈介祝嘏，西周中期後的樂器、禮器上多記載一些祈求祖考降賜福祿長壽的“嘏辭”。

第六，物勒工名，戰國兵器上多記督造衙府及工官工匠之名，容器上則多記容積重量。

金文成為史料的關鍵，首在要明確其時代。對於西周金文的斷代問題，王國維在考釋遽簋時曾指出：“此敦稱穆王者三，余謂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滿也。何以生稱穆王？曰：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謚也。”（《觀堂集林》卷十八）學者稱其斷代原則為“時王生稱說”。郭沫若用此原則先定出若干“標準器”，然後將與其人名、事件有關，形制、紋飾相近諸器串聯起來，構成一個時代相近的器組，此法被稱為“標準器斷代法”。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中串聯西周銘文 250 件，取得很大成功。陳夢家又根據新出土的考古資料，提出銘文的八種內聯條件：同作器者；同時代人；同父祖關係；同族名；同官名；同一事件；同一地名；同一時間等。將此法加以進一步完善（《西周銅器斷代》）。

唐蘭先生著名的《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 年 1 期）和《周昭王時期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二，1980 年），討論了西周金文斷代問題，他指出金文中的“康宮”即康王之廟，凡記有“康宮”的銅器應定為康王身後之器。這樣就把過去定在成王時期的一批器改定於昭王時期，並與昭王南巡的記載聯繫起來。根據這一原則，金文中所記“康宮”中的“夷宮”、“厲宮”，應為夷王、厲王之廟，金文中凡記有夷、厲二宮之器，自應是夷王、厲王身後之器。他的這些分析，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與考古發掘的器物相矛盾者，並不斷被新出土的銅器銘文所肯定。因而，他的“康宮原則”也逐漸為多數學者所接受。近年國家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在討論西周銅器斷代時，就使用了“康宮”原則。這一原則對銅器斷代之學做出了新的貢獻。

從銘文內容來區別商代與西周銅器，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已有論述，近年來有的學者做出了更好的歸納，提出：殷人特有的稱謂；殷人特有的祭名；殷人的標時習慣；殷人的歷史大事件（陳世輝、湯余惠：《古文字學概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 年）。這些原則對區分商周銅器是有一定作用的。當然，必須與銅器的類型學研究相並而行，方能得到較理想的結果。

西周金文中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記時詞語，王國維的《生霸死霸考》（《觀堂集林》），認為西周金文記時，是由上述四個月相詞語四分一月的。近時學者根據已知的古代天文學史知識推算，金文“初吉”的歷日往往超出月初若干天的範圍，有的甚至可以晚到月的下旬，顯然與其他三個詞語屬不同記時體系。

“既生霸”、“既死霸”、“既望”是月相記時詞語，學者間曾無異詞，然其所指具體時日，至今尚難以取得一致意見。

西周有紀年金文 90 餘件，用這些資料可以推出西周各王的最低金文王年。又有年、月、月相、干支日四項俱全的金文 30 餘件，這些資料可以檢驗按銅器銘文所安排的王年和絕對時間是否恰當。陳夢家《西周年代考》指出：“《竹書紀年》和金文記年是復原西周年代的主要材料。”據《竹書紀年》所載武王伐紂應在公元前 1027 年，西周積年為 257 年。根據現代天文學觀察，《竹書紀年》所記“懿王元年天再旦”是一次正確的古代日食觀測，這樣，懿王元年即可定在公元前 899 年。以上幾個年代定點，都與相應的考古地層標本碳 14 測定的年代接近。又據《史記》載共和元年為公元前 841 年，此後宣王、幽王的年代都是已知王年。根據以上定點，利用現代古天文學史知識推算，可以排出一個合理的《西周金文曆譜》，使數十件有銘銅器成為標準器，再附以器形、紋飾、銘文的內部聯繫等，將基本解決西周金文的斷代問題。一個與所擬《金文曆譜》相容的《西周王年表》，也將得到最終的承認。

商周有銘銅器的半數左右，銘文都極為簡短，有的僅有一個象形性很强的字，有的由幾個象形的字構成一個短語。郭沫若稱其為“族徽”、“族氏”（《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陳夢家稱其為“族名”（《西周銅器斷代》），張振林有“家族標記說”（《對族氏符號和短銘的理解》，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1990 年），吳其昌有“私名說”（《金文氏族譜》），日人白川靜有“特殊集團說”（《金文通釋》），林已奈夫有“旗上之物說”（《殷周時代的圖象記號》）等，諸說皆能言之成理，各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部分器物上銘刻的內容，但終難以偏概全。

其實，早在宋代對金文中的“特殊銘刻”就有一定認識。如《考古圖》4—36 木父己卣，釋文云：“木者，恐氏族也。”我們認為，這類銘文雖少有文例比附，但多數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同形的字，而分析甲骨文中這些同形字的性質，則多是一些方國名、地名和人名。因此有理由推測，這些金文“特殊銘刻”中應該有一大部分是古代方國（地區）、家族以及個人的名號。殷周金文“特殊銘刻”中的古代方國名，被成功解讀的有三個例證：郭沫若釋“𠂔”為“須句”（《金文餘釋之餘·釋須句》，後收入《金文叢考》）；裘錫圭釋“𠂔”為“無終”（中國古文字學會年會論文，1990 年）；遼寧喀左曾出土“𠂔”𠂔，唐蘭考其出土地為古“孤竹國”，李學勤循此考出其文字亦為“孤竹”。依此類推，相似的古方國名如“息”、“斟尋”、“房子”、“北子”等，也可以在銅器中找到相應的銘刻。

“特殊銘刻”中還有一些可以肯定為某貴族的家族名者，如“木羊冊”是微史家族的族名等。又比如“亞襄孤竹迺鼎”，在這一組銘文中，已知“孤竹”是方國名，“亞襄”因為在其他器中經常出現，可能是孤竹國中某家族的族名。在這裏“迺”就可能



是“亞賓”家族的一個成員的私名。根據上述分析，金文中字數較多的族名，一般是可以分出方國、家族、私名等幾個層次。此外，也有一小部分特殊銘刻是表示該銅器的方位、功能，或是八卦符號等，並不屬於上述內容範圍。

這些族名銅器的時代，有的個別可以早到商代前期，如1981年內蒙古敖包村出土的卣卣（《內蒙古文物與考古》2期），但多數屬商代後期到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仍有零星出現的，則屬於族名制度的少數殘存了。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商周時期社會組織結構的真實狀況，對商周社會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劉雨：《殷周青銅器中的特殊銘刻》，《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4期）。

### 三

早在漢代就把青銅器的出土視為祥瑞，開始注意對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西漢宣帝時的張敞考釋夷臣鼎，被稱為“好古文字”（《漢書·郊祀志》），東漢古文派巨子許慎作《說文》，其序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古文”。

至宋代，由於得到王室的倡導，青銅器與古文字的研究，蔚成風氣，成就了一批著名的學者和著作，如《考古圖》（呂大臨）、《博古圖錄》（王黼）、《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薛尚功）、《嘯堂集古錄》（王洙）、《鐘鼎款識》（王厚之）、《紹興內府古器評》（張掄）、《皇祐三館古器圖》（楊南仲）、《先秦古器圖》（劉原父）、《集古錄跋尾》（歐陽修）、《金石錄》（趙明誠、李清照）等。從研究水平看，他們已達到相當的高度。如至今尚在使用的器名：鐘、鼎、鬲、甗、敦、簠、簋、壺、尊、卣、爵、角、觚、斚、觶、盃、盤、匜等皆宋人所定。王國維說：“知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觀堂集林·說觥》）為宋人所辨識的古文亦有幾百字。應該說，有宋一代為後世的金石學以及近代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清代乾隆年間，欽定將皇家收藏編輯了《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四部青銅器資料書。晚清在乾嘉經學考據之風的影響下，“小學”得到發展，學者們除編輯了《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阮元）、《憲齋集古錄》（吳大澂）、《攬古錄金文》（吳式芬）、《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方浚益）、《奇觚室吉金文述》（劉心源）等青銅器資料書外，還編纂了《說文古籀補》（吳大澂）、《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孫詒讓）等頗有見地的古文字學專著。

民國以來，受西學東漸的影響，我國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有了很大進步，如一些青銅器資料書《周金文存》（鄒安）、《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善齋吉金錄》（劉體智）、《夢鄴草堂吉金圖》（羅振玉）、《雙劍謠吉金圖錄》（于省吾）、《武英殿彝器圖錄》（容



庚)等,銘文用拓本,圖像用照片,資料翔實完備,印刷技術亦有很大改進。

此期學者王國維,在其著名史學理論“兩重證法”的指導下,重視對古器物 and 古文字的研究。他對金文斷代和一批銘、物的考證,具有開創性意義,他的主要著作多收入《觀堂集林》一書。羅振玉的學術實踐,以嚴謹地整理出土資料見長,他編纂的《三代吉金文存》收器近 5000 件,是 30 年代殷周金文集成性的著作。二人關係密切,史稱“羅王之學”。

王氏弟子容庚,著有《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等書,系統地總結了古器物與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

王氏另一弟子徐中舒,擅長運用民族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知識,來研究古代的銘、物制度,也取得許多扎實的成果。

于省吾是近代學者中辨識古文字較有成就的一位。他善於藉助古文獻考釋古文字,更善於用古文字整理和考證古籍,所著《尚書新證》、《詩經新證》、《諸子新證》等在學術界曾產生較大影響。

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是我國近代第一部古文字學理論著作,《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則是作者用金文研究西周史的重要作品。

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是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巨著,它創造的“西周斷代、東周分國”的研究體例,把分散的銘文資料整理成互相關聯的史料,成為揭示我國古代社會性質的有力證據。他撰寫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等金文專著和論文,都體現了把金文研究與先秦史研究有機結合的鮮明特色。

陳夢家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收集了流散在美國的珍貴銅器資料(他收集的歐洲各地的金文資料都已編輯在《殷周金文集成》一書中),他的《西周銅器斷代》是對《大系》一書的補充。他注意對器物分型分式、成坑成組的研究,把考古學的方法,運用到古器物、古文字研究中。

外國學者如瑞典高本漢、日本白川靜、林已奈夫等也對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做過很好的研究。

新中國建立以來,隨着基本建設的大規模開展,青銅器資料大量出土,幾乎填補了青銅器發展史上的絕大部分缺環。考古學、古文字學的研究方法亦日漸縝密,又得到考古學會、古文字學會等民間學術團體的有力推動。學者們一方面全面集結金文資料,做基礎建設;一方面在前代學者已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深入開拓進展,除解決了學科本身的諸多問題外,還解決了古史研究、古代文化史及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系列問題,引起了學術界廣泛注意。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學,已從“蕞爾小學”一變成爲“當世顯學”。

## 四

早期青銅器曾作為王權的象徵物存在於世，其莊重典雅的形制、寧厲威嚴的紋飾，深得帝王之心，因而歷代王室都十分重視青銅器的收集和整理。清代皇家收藏，在乾隆年間即已達數千件之多，除一部分在 1949 年遷至臺灣，一部分流失外，大部分仍保留在故宮博物院。加上新中國建立以後陸續由政府調撥、私人捐獻和本院收購的大量青銅器，故宮博物院現藏歷代銅器 15000 餘件，其中先秦青銅器約萬件左右，是收藏青銅器數量最多的博物館。

時代序列完整和器類齊全是故宮銅器另一特色。故宮藏品多數為傳世品，但藉助於近代考古學對發掘品研究的經驗，故宮先秦青銅器已可分出商代前期、後期，西周早、中、晚期，春秋前期、後期，戰國前期、後期等，秦以後銅器可分出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

故宮藏先秦青銅器包括禮器、樂器、兵器、雜器等。其中禮器包括：

- (1) 食器：鼎、鬲、甗、簋、簠、盥、敦、豆、鋪、鉶、匕、勺等；
- (2) 酒器：爵、角、斚、盃、尊、卣、壺、罍、兕觥、方彝、觥、瓶、鑑、缶、觚、觶、斗等；
- (3) 水器：盤、匜、鑒、孟、盆等。

樂器包括：鐘、鐃、鐃、鐃、鈴、句鑼、鐃于、磬等。

兵器包括：戈、戟、矛、劍、鉞、匕首、刀、斧、鉞、異型兵器、鏃、鐃、鏃、冑等。

雜器包括：爐、鍤、虎子、樽、節、銅鏡、陽燧、帶鉤、車馬器、度量衡器等。

故宮收藏的秦漢青銅生活用品和唐宋以來的仿先秦青銅禮器，都有一定規模。此外，還有歷代貨幣萬餘枚，銅造像、法器兩萬餘件，以及明清時期的“宣德爐”等銅器數百件。

國內各博物館現藏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迄今為止共計 6900 件左右（包括近十餘年大陸各地出土和各博物館收集的 1000 餘件，以及臺北所藏 451 件），其中故宮一家，現藏已達 1600 件，數量列各館之首。這些青銅器的銘文大多已收入《殷周金文集成》一書，但器形的大部分尚未公佈。銘文較重要的如：

三件卣其卣，是商代銘文最長的幾件器，它記述了帝辛時期的賞賜、祭祀等內容。曾有的學者懷疑其中二祀、四祀卣為偽器，我院曾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 年 4 期組織“筆談”討論，並在 1999 年 1 期上公佈了本院所作 X 射綫檢測報告，却除懷疑，

肯定了它們的歷史價值。此外，像小臣卣鼎、遷簋、處山卣等也是重要的商代銅器。

成周鈴是西周早期難得一見的帶銘文的樂器，魯侯爵則是記錄周公後裔活動的重要銅器。此期的榮簋、耳尊、作冊虢卣，記載了王、侯對榮、耳、虢的賞賜；西周中期的師旂鼎記錄了一次對違犯軍法人員的處置法律程序，同簋、太師虢簋、豆閉簋記錄了王對貴族的冊命，格伯簋記錄了當時的土地交換；西周晚期的揚簋、諫簋、小克鼎、眉敖簋蓋、師酉簋、頌鼎、大鼎、師克盃、師比盃、寰盤、虢叔旅鐘、士父鐘等多記錄王對貴族的賞賜冊命儀典，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其中太師虢簋、大鼎、頌鼎、師比盃、寰盤等五件器的記時詞語中有年、月、月相、干支日四項內容，是全部金文僅有的三十幾例四要素俱全器中的五例，這是研究西周金文曆譜和王年的珍貴資料。

春秋後期的能原罇與臺北故宮的一件，是一組越國編罇中殘存的兩件傳世品。越國銅器上的銘文，包括一些兵器和樂器上的銘文，目前尚未得到很好釋讀，這是多年困擾古文字學界的一個難度較大的課題，我院在院刊上對此展開討論，以期推動這一問題的最後解決。

者盞鐘、余曠逖兒鐘、徐王子旃鐘、其次句鐸等，則是這一時期著名的青銅樂器。春秋戰國時期的少虞劍、梁伯戈、秦子戈、大良造鞅鐃等也都是有明確時代特徵的傳世著名兵器。

此外，故宮藏品中有大量記錄族名的青銅器，其中不乏記錄重要古國名的銘文，如記錄孤竹國和無終國國名的銅器等。族名金文的研究和釋讀，是另一個十分困難的課題，迄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決，故宮這批資料的公佈，無疑會促進這一課題的深入研究。

故宮將青銅器與陶瓷器、古代書畫設立三個經常性陳列專館，用以不間斷地展出本院藏品。此次重新佈陳青銅器館的陳列主題是“先秦青銅器精品展”。盡管我國“青銅時代”的起訖時間尚有爭議，難以定論，但先秦青銅器所蘊涵的歷史信息、藝術信息和科技信息的重要價值，無疑是其他時代銅器不可比擬的。故宮銅器藏品中，也是這部分藏品價值最高，數量最大。因此以先秦青銅器精品作為首選主題是必要的。今後我們將不斷更換主題和展品，以期將故宮豐富的青銅器藏品，以各種不同方式呈獻給廣大觀眾。

唐蘭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和青銅器專家，在海內外學術界享有盛譽。從50年代起，他就一直在故宮承擔學術領導責任，對故宮的青銅器做過深入的研究。在金文研究中他提出的“康宮原則”，作為西周銅器斷代的標準之一，已被學術界廣泛承認。他創造的“金文白話翻譯”體例，是解決在博物館陳列中，面對廣大普通觀眾，將深邃的學術研究成果通俗化的極富智慧的解決辦法，可惜在有生之年，他未來得及將這一體

例付諸實施。我們將在展品佈陳、圖錄編撰中，採用他的銅器斷代原則和文字說明體例，使他的學術成果得以發揚光大。

古老的故宮在社會主義改革的凱歌聲中，迎來了建國 50 週年大慶，謹以這本圖錄作為我們向祖國獻上的一份禮品。

（原載《故宫青銅器》，故宮博物院編，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與丁孟合寫）

## 《商周金文總著錄表》前言

我國是世界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國青銅文化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青銅器上大量鑄刻銘文（通稱“金文”），到目前為止，已知先秦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一萬餘件，無銘文的青銅器大概十倍於這個數字。

學術研究當以目錄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國維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兩表作於1914年5月和8月，後皆收入《王忠愍公遺書》）。在《宋表·序言》中，他為《著錄表》所定原則是“器以類聚，名從主人”，“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不取。這些原則規定了《著錄表》的排列次序、有銘銅器的定名辦法以及收器的範圍。《國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據諸家之書，以摹原器拓本者為限，其僅錄釋文或雖摹原文而變其行款大小者，皆不採錄”，“其偽器及疑似之器則別附於後”，進一步規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則。《國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漢以後器726件和偽及疑偽之器402件，實得先秦有銘青銅器3167件。王氏的兩《表》為金文著錄表創通了體例，積累了基礎數據，得到研讀金文諸學者的認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序》中說：“處理資料之方法，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為最多；其金文著錄表與說文諧聲譜二書，余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

在《國朝表》成書後十七年（1931），羅振玉命其子羅福頤增補修訂該表，於1933年編成《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墨緣堂石印本），收集的先秦有銘青銅器增至4279件。後羅振玉得鬱華閣全套拓本，加上自家所藏，於1937年編輯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一書，收器增至4835件。其後，羅福頤又整理清宮藏器，編輯了《內府藏器著錄表》（墨緣堂石印本1933年），對乾隆年間皇室編輯的《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四書作了初步清理。

容庚於1928年對王國維《宋表》逐器加以審定，重編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五號）。1929年他又對乾隆年間的四種銅器書所收諸器的

真偽存佚加以審定，編成《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燕京學報》第五期）。容庚多年來校補案頭的《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並將該《校補稿》傳於其弟子孫稚雛，孫以容庚的《校補稿》為基礎，收集了後世出土的金文資料，國外部分參考了陳夢家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等書，於1981年編輯了《金文著錄簡目》一書，收器編7312號。

說到金文的《著錄表》，還應該提到兩本書，一本是1939年美國人福開森主持編輯的《歷代著錄吉金目》，該書收集了1935年以前出版的宋代、清代和民國以來的青銅器書籍八十種，由唐蘭作了器物分類：分樂器、酒器（盛器、飲器、三和器）、水器、食器、烹飪器、兵器、農器、度量衡、車馬飾、雜器、鏡、造像等十二大類，馬叙倫、容庚、齊思和、劉節等著名學者也都參與協助。該書收器十分廣泛，既不限於有銘文者，也不限於秦以前的銅器，凡是當時見到著錄的青銅器（不包括錢幣），幾乎全部收入該書。書首列器名，其次列字數、釋文、著錄等項，遇有時代可考者或有分歧的器類等，則加按語依次說明。收器齊全，體例嚴謹，使該表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至今仍無可替代。另一本書是1977年由周法高主編的《三代吉金文存著錄表》，該書綜合了多個著錄表的研究成果，對《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各器的著錄作了系統的整理，是一部很有用的參考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根據當年郭沫若的倡議，由夏鼐親自指導，於1978年重新組建“《殷周金文集成》編輯小組”，小組利用了陳夢家當年為籌備編輯本書購置的大批善本金文書籍和大量的金文拓本集子，也利用了陳夢家在海外收集的大量資料和遺稿。在編書過程中，張亞初全面整理了宋代的金文資料，編成《宋代所見商周金文著錄表》（收入《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1985年），收先秦資料589件，其中偽器23件，無拓本、摹本的93件，得出宋代實際可以利用的金文資料有473件。劉雨全面清理了乾隆年間皇室的四部銅器資料書，編成《乾隆四鑑綜理表》，四書收先秦有銘青銅器1142件，其中偽及疑偽之器388件，得實際可利用資料754件。小組還收集了當時可能見到的出土先秦有銘銅器數千件，總計用時十餘年，編成《殷周金文集成》一書，該書十八冊由中華書局於1984~1994年間陸續出版，收器達11983件。

其後，《集成》原作者之一劉雨與盧岩編輯了《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一書，收集《集成》各冊截稿以後新出的同類器1354件，《集錄》收器截止到1999年5月底，《集成》與《集錄》兩書合計收器13337件，可以說這個數字是到二十世紀末為止，古今中外全部先秦金文資料的統計數字，本書就是集中了全部這些資料彙編而成的，應該說這是一部較為齊備的殷周金文著錄總表。



## 寫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 出版前夕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郭沫若先生向當時的科學院考古所提出編輯兩部銘刻學集成性著作——《甲骨文集成》和《殷周金文集成》的建議，考古所決定由著名的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主持其事。陳先生接受任務後，作了精心的準備工作，收集了大量的甲骨和金文拓本，並購進了一系列甲骨、金文書籍，使考古所成為海內外銘刻資料和文獻最為齊備的研究基地。一九五七年的那場政治運動把陳先生打成“右派”，十年後的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潮，才華橫溢的陳先生被迫害致死，使這兩項研究工作完全停頓了下來。七十年代以來，考古所集中精力整理金文資料，在夏鼐所長的直接指導下，一九七八年初正式組建了“金文集成編輯組”，該小組用了十一年的時間，於一九八九年完成了拓本部分的編寫工作，由中華書局以《殷周金文集成》為書名出版發行。該書出版以後，由於學術含量高，編撰製作精審，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肯定，先後獲得國家出版總署頒發的“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一等獎”（1992）、“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1995）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頒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 1977 - 1991 年優秀科研成果獎”（1993）、“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一等獎”（1995）等獎項。

為了繼續完成殷周金文的整理計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由當時的考古所所長徐蘋芳先生主持組建了“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編輯組”，小組由陳公柔、張亞初、劉雨三位銘刻學專家組成。其中陳公柔是當年陳夢家先生的助手，該書的體例規模主要由他擬訂。張亞初是吉林大學著名古文字學家于省吾先生的研究生，劉雨是中山大學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容庚先生和商承祚先生的研究生，三人認真地參考了近年來古文字學界在金文文字辨識和篇章解讀方面取得的進展，又融會貫通，參以己意，在九十年代初，完成了該書的初稿。書稿完成後，經考古所研究決定由劉雨通看、通校全書。劉雨校讀三遍，於一九九七年終審定稿。應該說，這部書的編寫是認真嚴肅的，其內容體現了當今金文研究的

較高水平，它的出版無疑會對考古學、古文字學、先秦史學以及一切與我國先秦文化研究有關的學科帶來莫大的益處。

早在《殷周金文集成》一書編成後不久，劉雨就開始對該書進行全面的校對，先後檢核出重複器七十四件，偽器和巴蜀符號器若干件，圖版存在的問題若干，比如：《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冊 2775 號小臣麥鼎，在編輯時漏掉了後半部十一個字；第八冊 4272 號望簋，在排版時整個器底的銘文被漏掉了；著名的小孟鼎使用了《攷古錄金文》的摹本，行款與拓本不一致。另有說明中的“器號”、“器名”、“字數”、“時代”的錯、訛、誤、漏多處等。這些校核出的問題，有的以註解的形式加以說明，有的對圖版作了增補，小孟鼎的摹本則對其作了改造處理等等，這些校對的成果，現已全部納入《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一書中，這說明，該書是在更為準確的資料基礎上編寫完成的。

作為一部學術性的資料著作，作者在版式上認真考慮了讀者的需要，一是將銘文圖版與釋文、器物說明文字置於一頁之內，釋文行款與銘文行款完全對應一致，讀者可即時對照，一目瞭然，不煩它求。二是銘文圖版雖經縮小，但縮小比例以保持其清晰度為原則，達到基本上可以代替《殷周金文集成》圖版使用的程度。三是全書編為大十六開本，壓縮在六冊之內，最大限度的減少了書的體積和重量，便於讀者案頭檢索，同時也減輕了讀者購買的經濟負擔。

考慮到本書排版製作的難度較大，經費投入較多，經考古所所長劉慶柱、副所長王巍等研究，決定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協助出版。中國文化研究所在陳方正所長的領導下，由饒宗頤教授悉心指導，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在簡牘和甲骨整理方面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陳所長毅然決定支持該書的出版，他首先確定由該所古文字學者沈建華副研究員出任責任編輯，沈建華是香港地區少數的幾個中國古文字專家之一，她有在中國文化研究所進行甲骨文電腦數據庫建設的經驗，早年又有在中華書局從事編輯工作的經歷，在該書整個編輯過程中，她忘我工作，校出了作者手稿中的和釋文錄入中的大量缺陷，由於她作責任編輯，使該書出版工作的學術質量得到可靠的保證。陳所長還聘請了北京的電腦專家主持電腦排版工作，他們首先針對金文的特點作了詳細的調研工作，然後帶領多人和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人員、在香港招聘的錄入員等十餘人投入緊張的工作，較全面的實現了作者的寫作意圖。比如他們精心設計了逐件器安排縮小比例的程序，保證了絕大多數圖版的高清晰度。他們夜以繼日的工作，克服了種種困難，僅用八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該書的全部掃描、排版工作。

陳所長還與中文大學出版社協商，決定使用輕、薄而不透光的高質量粉紙印製該書，這大大的提高了書的印刷質量。為支持《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的出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先後投資大量資金，這充分體現了該所以研究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寬闊胸懷。

出於慎重和便於界內學者使用，本次公佈的釋文未加標點。相信不久的將來，應有標點本和一系列《索引》問世，以便為更廣大的一般讀者羣使用。

大家盼望已久的《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一書即將問世了，這是學術界值得慶幸的一件喜訊。

（該文未刊）

# 本書相關文獻一覽表

(以文獻首字拼音順序排列)

	文獻名稱	作者	書中簡稱	版本信息
B	卜辭通纂	郭沫若著	通	日本文求堂石印，1933 年
C	長安獲古編	(清) 劉喜海著	長安	清道光 (1821 ~ 1850 年) 末年初版 (本書引用劉鶚補刻器名本，光緒三十一年)
F	豐西發掘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輯	豐西	文物出版社，1962 年
	簠室殷契徵文	王襄著	簠	天津博物館石印，1925 年
G	冠舉樓吉金圖	榮厚著	冠舉	1947 年
J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清) 阮元著	積古	清嘉慶九年 (1804 年) 家刻本
	積微居金文說	楊樹達著	積微	中國科學院，1952 年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輯	合集	中華書局，1978 ~ 1983 年
	甲骨文錄	孫海波著	文	河南通志館，1937 年
	甲骨文字集釋	李孝定著	集釋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 年
	甲骨文字釋林	于省吾著	釋林	中華書局，1979 年
	甲骨續存	胡厚宣著	存	群聯出版社，1955 年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王國維著	戩	藝術叢編第三集，1917 年

續表

	文獻名稱	作 者	書中簡稱	版本信息
J	金文叢考	郭沫若著	叢考	1932年初版（本書引用人民出版社改編本，1954年）
	金文分域編	柯昌濟著	分域	1934年
	金文詁林附錄	周法高、李孝定、張日昇著	詁林附錄	香港中文大學，1977年
	金文曆朔疏證	吳其昌著	疏證	1936年石印
	金文著錄簡目	孫稚雛著	簡目	中華書局，1981年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	劉雨、盧岩著	近出	中華書局，2002年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日）貝塚茂樹著	人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9年
	撫古錄金文	（清）吳式芬著	撫古	吳氏家刻本，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
K	考古學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	學報	1953年創刊
	憲齋集古錄	（清）吳大澂著	憲齋	涵芬樓石印，1919年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美）方法斂摹	庫	商務印書館石印，1935年
L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薛尚功著	薛氏	紹興十四年（1144年）初版（本書引用于省吾影印明崇禎六年朱謀壘刻本，1935年）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郭沫若著	大系	日本文求堂印，1932年（本書引用科學出版社增訂合印本，1958年）
M	美帝國主義劫掠我國商周青銅器集錄	陳夢家著	美集錄	科學出版社，1962年
	夢鄣草堂吉金圖	羅振玉著	夢鄣	1917年
N	寧壽鑒古	（清）王杰、董浩、彭元瑞等著	寧壽	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間（1776～1781年）（本書引用涵芬樓石印寧壽宮寫本，1913年）
P	攀古樓彝器款識	（清）潘祖蔭著	攀古	滂喜齋自刻王懿榮手寫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

續表

	文獻名稱	作 者	書中簡稱	版本信息
Q	奇觚室吉金文述	(清) 劉心源著	奇觚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石印
R	日本收儲支那古銅精華	(日) 梅原末治著	日精華	京都出版, 1959~1962年
S	三代吉金文存	羅振玉著	三代	日本珂羅版影印, 1937年
	陝西青銅器	陝西考古所、文管會、博物館編輯	陝青	文物出版社, 1979年
	善齋吉金錄	劉體智著	善齋	1934年
	善齋彝器圖錄	容庚著	善彝	1936年
	商周金文錄遺	于省吾著	錄遺	1957年
	商周彝器通考	容庚著	通考	1941年
	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	上海博物館編	上海	1964年
	雙劍謠殷契駢枝(初編)	于省吾著	駢枝	1940年石印
T	天馬-曲村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所編	曲村	科學出版社, 2000年
	鐵雲藏龜	劉鶚著	鐵	1903年
	鐵雲藏龜拾遺	葉玉森著	拾	1925年
W	韓華閣集古錄跋尾	柯昌濟著	韓華	1935年
	文物參考資料	文物出版社編輯	文參	1954~1958年
	武英殿彝器圖錄	容庚著	武英	1934年
X	西清古鑒	(清) 梁詩正等編	西清	內府刻本,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
	西清續鑒甲編	(清) 王杰、董浩、彭元瑞等編	西甲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本書引用涵芬樓影印甯壽宮寫本, 宣統二年)
	西清續鑒乙編	(清) 王杰、董浩、彭元瑞等編	西乙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本書引用北平古物陳列所石印清宮寫本, 1931年)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唐復年整理本)	唐蘭著	史徵	中華書局, 1986年



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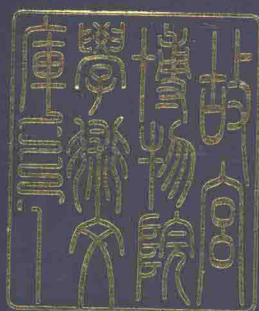
	文獻名稱	作 者	書中簡稱	版本信息
X	西周銅器斷代	陳夢家著	斷代	考古學報 9 ~ 14 冊, 1955 ~ 1956 年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	劉體智著	小校	1935 年
	嘯堂集古錄	(宋) 王俅著	嘯堂	淳熙三年(1176)初版(本書引用續古佚叢書石印淳熙本, 1922 年)
	續殷文存	王辰著	續殷	1935 年石印
	宣和博古圖錄	(宋) 王黼等著	博古	宣和五年(1123 年)初版(本書引用蔣賜翻刻元至大重修本, 明嘉靖七年)
Y	巖窟吉金圖錄	梁上椿著	巖窟	1944 年
	鄴中片羽初集	黃浚編	鄴初	1935 年
	鄴中片羽二集	黃浚編	鄴二	1937 年
	鄴中片羽三集	黃浚編	鄴三	1942 年
	殷契粹編	郭沫若著	粹	1937 年
	殷契遺珠	金祖同著	遺	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 1939 年
	殷契佚存	商承祚著	佚	1933 年
	殷虛書契	羅振玉著	前	國學叢刊石印本, 1911 年
	殷虛書契後編	羅振玉著	後	藝術叢編第一輯, 1916 年
	殷虛書契續編	羅振玉著	續	1933 年
	殷虛文字丙編	張秉權著	丙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 1957 ~ 1972 年
	殷虛文字甲編	董作賓著	甲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48 年
	殷虛文字外編	董作賓著	外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56 年
	殷虛文字乙編	董作賓等著	乙	1953 年
	殷墟卜辭綜述	陳夢家著	綜述	科學出版社, 1956 年
	殷周金文集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纂	集成	中華書局, 1984 ~ 1994 年
	殷周金文集成釋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纂	集成釋文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筠清館金文	(清) 吳榮光著	筠清	宜都楊氏重刻本, 道光二十二年(1779 年)

續表

	文獻名稱	作 者	書中簡稱	版本信息
Z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胡厚宣著	京津	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1946 年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	胡厚宣著	寧	來薰閣書店，1951 年
	中國文物報	文物出版社編輯	文物報	1987 年創刊
	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	(澳) 巴納、張光裕著	彙編	1978 年
	周金文存	鄒安著	周金	1916 年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	(清) 方濬益著	綴遺	涵芬樓石印，1935 年

本書使用的西周王年概念

分期（一）	分期（二）	西周王世系	在位年代（公元前）	在位年數	
早期	前期	武王	1027 ~ 1025 年	2	
		成王	1025 ~ 1010 年	15	
		康王	1010 ~ 985 年	25	
		昭王	985 ~ 966 年	19	
中期		穆王	966 ~ 929 年	37	
	後期	恭王	929 ~ 899 年	30	
		懿王	899 ~ 886 年	13	
		孝王	886 ~ 874 年	12	
		夷王	874 ~ 865 年	9	
		晚期	厲王	865 ~ 841 年	24
			共和	841 ~ 827 年	14
			宣王	827 ~ 781 年	46
幽王			781 ~ 771 年	1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金文论集

作者=刘雨著

页数=520

SS号=13916278

DX号=

出版日期=2008.05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